

THE
SPANISH
CIVIL
WAR

[英]
伯内特·博洛滕
Burnett Bolloten

戴大洪 译

西班牙
反
内战 [上]

**THE
SPANISH
CIVIL
WAR**

**[英] 伯内特·博洛滕
Burnett Bolloten
戴大洪 译**

**西班牙内战
[上]**

革命与反革命

THE SPANISH CIVIL WAR: REVOLUTION AND COUNTERREVOLUTION by Burnett Bolloten.

Copyright © 1991 by the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Published in simplified Chinese characters by arrangement with the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Chapel Hill, North Carolina 27514 USA www.uncpress.unc.edu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published by New Star Press 2017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西班牙内战：革命与反革命 / (英) 伯内特·博洛滕 (Burnett Bolloten) 著；戴大洪译。
——北京：新星出版社，2017.1

ISBN 978-7-5133-2320-8

I . ①西… II . ①伯… ②戴… III . ①西班牙内战 IV . ① K551.5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6) 第 207004 号

西班牙内战：革命与反革命

(英) 伯内特·博洛滕 著 戴大洪 译

出版统筹：向珂

特约编辑：杨露

责任编辑：汪欣

责任印制：李珊珊

封面设计：一千遍

封面绘画：吕欣

出版发行：新星出版社

出版人：谢刚

社址：北京市西城区车公庄大街丙3号楼 100044

网址：www.newstarpress.com

电话：010-88310888

传真：010-65270449

法律顾问：北京市大成律师事务所

读者服务：010-88310811 service@newstarpress.com

邮购地址：北京市西城区车公庄大街丙3号楼 100044

印刷：北京鹏润伟业印刷有限公司

开本：660mm × 970mm 1/16

印张：92.75

字数：1202千字

版次：2017年1月第一版 2017年1月第一次印刷

书号：ISBN 978-7-5133-2320-8

定价：178.00元 (全三册)

版权专有，侵权必究；如有质量问题，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序

西班牙革命是二十世纪的集体主义革命中最为独特的一场革命。它是唯一一场发生在西欧国家的全面的暴力革命，同时也是唯一一场由各种截然不同的政治力量——它们经常相互竞争和敌视——所推动的真正意义上的多元革命，尽管最终共产党人逐渐掌握了控制权。西班牙革命还是唯一一场发生在某个大国的没有成功的重大革命，它被敌对的军事力量彻底挫败并扑灭。由于所有这些原因，西班牙革命从来没有受到对革命进行比较研究的学者们的关注，它本应受到这种关注。西班牙革命在二十世纪革命的研究领域相对而言不见经传的另一个原因是伯内特·博洛滕所指出的见解独到的“精心的伪装”，这是发生在多党派的人民阵线共和国政治框架——这一框架只是在内战爆发之后才被打破——内部的事实，由于革命在国外的支持者和宣传者将其描述成为某种完全不同的事情，这一事实逐步显示出来。终于，在意识到西班牙内战和外国军事干涉的重大国际意义之后，它逐渐开始引起人们的极大关注。

由于二十世纪初期独特的历史状况，西班牙在最大的范围内爆发了革命。三十年代，与过去的一百余年来一样，西班牙一方面是西欧大国中现代化水平最低的国家，另一方面又是经济落后的南欧（和东欧）国家中文明

程度最高、文化最先进的国家。

尽管马克思断言，在工业化的高峰期，革命是不可避免的，但是，历史表明，在工业化的早期以及从早期到中期的过渡阶段，正在走向现代化的社会更容易发生严重的冲突。工业发展初期微薄的工资收入和巨大的经济压力，加上被社会疏离的大批工人集中在新的城市环境中，形成了潜在的剧变条件，这些条件在工业化后期逐渐弱化。在西班牙，由于同时出现了现代社会的农民问题，社会反抗的可能性增大了——主要在这个国家的南半部，庞大的无地劳动者和赤贫者阶层人口激增，在十九世纪缓慢的现代化进程中，他们的经济状况在某些方面实际上是恶化了，因此，在二十世纪初期，他们的生活比旧政权统治的最后阶段其实或者相对来说更加贫困。

西班牙政治左转的趋势最初并没有受到现代民族主义的遏制。在另外一些国家里，民族主义是右翼势力动员的重要力量，但是，它在西班牙却鲜为人知，它仅仅存在于那些具有微弱的民族分离倾向的特殊地区，在那些地方，民族主义只是加深了社会和政治的裂痕。最初，西班牙在很大程度上成功地避免了巨大的国际压力对其国内政治发展的影响，它不与外国结盟，也没有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因此，它成为一种独一无二的情况，几乎具有某种实验室的特征，对于西班牙来说，当时以及后来人们在其他国家所发现的那种全方位的现代冲突和潜在的社会政治斗争不是几乎没有产生作用，就是因国外的战争、占领或者任何形式的来自外部的明显压力而扭曲变形。

不过，某种间接的外来影响仍然是最终导致西班牙政体分裂进而崩溃的一个因素。这种影响不是通过直接施压或干预，而是通过西班牙各种主要政治角色之间的相互恐惧产生作用，当国内的对立越来越严重时，国外政治极端主义最恶劣的榜样开始在西班牙受到模仿，接着，某种西班牙式的共产主义或法西斯主义可以迅速取得胜利。西班牙内战爆发前夕，这种恐惧显而易见，它为采取最可怕的手段避免成为最激进的外国极端主义的西班牙同类的牺牲品提供了正当的心理依据，或者说，左派和右派的好斗分子逐渐开始这样认为。结果，尽管没有与外国结盟或是发生军事冲突，西班牙仍然以这种方式在心理上与欧洲其余部分的政治生活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因此，它很容易受到那个时期最强大的政治压力的影响——实际

上，由于严重的国内分裂，它对此类压力的敏感达到了某种夸张的程度，尽管这是由西班牙人自己造成的。

如果说，按照苏联的标准，声势浩大的革命运动在西班牙多少有点姗姗来迟，那么，与许多中欧和东欧国家的情况不同，这场革命运动的发展最初并没有遭到强大的中央民族主义和右翼极端保守势力的反对。这反而导致革命者过高估计了自己的实力，忽视了潜在的社会底层保守势力比文明程度落后的俄罗斯更强大，同时忽视了三十年代西欧的国际均势与一九一七至一九二〇年间东欧的情况大不相同。在挫败革命的过程中，终于被佛朗哥调动起来的两种因素最终发挥了决定性作用，它们是不太活跃的西班牙右翼底层力量和各种国际势力的影响。

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之前，西班牙内战——其间发生了革命——是三十年代欧洲最重要的政治事件，甚至也是西方最重要的政治事件。它对世界之所以重要，在很大程度上与其说是由于西班牙的国内冲突，不如说是由于列强的干涉及其以干涉相威胁，同样也是由于这场斗争在某种意义上反映了其他国家非常紧张的政治局势。对于共和国的支持者来说，西班牙内战自然而然地演变成为一场民主与法西斯主义的斗争，而且，它实际上还变成了西方世界的一个独一无二的论坛，在这个论坛上，当时法西斯主义的得寸进尺开始受到质疑。共和派控制区内部形势的实际发展状况往往不被西班牙外界所了解。西班牙内战刚一结束，人们几乎立即就把注意力转向了欧洲全面战争的进程，结果，多年以来，西班牙的这场战争仅仅被人们当作欧洲战争的序幕或注脚。

由于随后西班牙国内长达一代人的文化专制以及国外对于西班牙国内的政治和历史明显缺乏关注这种综合因素，在接下来的二十年时间里，几乎没有人对西班牙内战进行认真的研究。只是到了六十年代初期以后，随着一系列学术著作的发表，人们才开始以精确的历史视角仔细观察西班牙的这场斗争。

在这些新的专著中，唯一一部致力于研究共和派控制区革命派别内部斗争的著作是伯内特·博洛滕的《精心的伪装》，它是我们面前这本书的始祖，一九六一年由（伦敦的）霍利斯-卡特出版社出版。这部著作完成了一个重大的学术突破，它第一次详细列举了在西班牙内战爆发之初的九个

月与共和派各主要力量的政治斗争有关的文献资料。它把发生在一九三六年七月至一九三七年四月的那些事情从宣传和党争的领域提升至得到文献资料充分证明的历史记录的水平，对无政府工团主义者、马克思统一工人党以及革命的社会党人在内战的最初几个月所进行的社会经济政治革命作了详细的描述，尤其是他们在加泰罗尼亚、阿拉贡和莱万特地区进行的革命。

博洛滕这部著作的第二个重要贡献是利用文献资料一步一步地证明了共产党在政治军事力量上的成长壮大。该书揭示了共产党势力的扩张，首先在共和国的中部地区，然后逐渐向另外一些地区发展，共产党对军队、警察和政府机构的影响力稳步增强。如果这是共和国政治生活中的一个鲜为人知的派别的话，那么，充分说明它的情况尤其重要。如果不将所有重大事态发展公之于世，显然无法达到了解共和国历史的目的，因此，博洛滕所做贡献的意义在于这样一个事实：他是这项艰巨使命的先行者。重现并且认识西班牙刚刚过去的历史不只是一个学术问题，实际上，这是知识分子非上不可的一课，也可以说，这是在西班牙有效而持久地重新建立民主国家的先决条件。毫不夸张地说，在这一漫长但却必不可少的历程中，博洛滕的著作迈出了值得关注的一步。因此，重建的加泰罗尼亚自治政府首任主席何塞·塔拉德利亚斯恰如其分地将其称为“已经出版的一万五千至两万种关于西班牙内战的著作中最重要的著作之一”。

然而，并不完全让人感到意外的是，《精心的伪装》没有像它理应受到的那样受到历史学家和政治评论家的欢迎。这本书实际完成于一九五二年，但是，由于开辟了一个与通常的看法大相径庭的全新视角，它被许多美国出版社拒绝了，其中包括五家大学出版社。正如雷蒙德·卡尔在为一九七九年版的《西班牙革命》撰写的序言中所说，“也许书名不太恰当，伪装本身就是隐瞒事实，而挖掘事实真相正是一名富有献身精神的学者的工作，为了重现内战期间西班牙共和国混乱的政治局面，他千方百计地搜集各种可以利用的原始资料。”另外，霍利斯-卡特出版社坚持增加的副标题“西班牙内战中共产党的阴谋”也给人以错误的印象：这本书又是一件反共宣传品。

一九六一年出版后，这本书成为冷战狂热的牺牲品。尽管与作者的意

图或该书的主旨相去甚远，但是，由于被保守派和反共人士盛赞为揭露了共产党的阴谋和专制，它不仅受到共产党人和前共产党人的大肆谴责，而且还受到另外一些左翼人士和共和国支持者的严厉痛斥，认为它企图以某种方式诋毁污蔑共和派的事业。博洛滕的著作实际上有力地驳斥了右翼分子关于共产党人阴谋在一九三六年推翻共和国的指控。不过，仍然有人说该书作者是中央情报局或某种政治势力的代理人或枪手，而且，这本书在英国出版三个月后，巴塞罗那出现了一个完全误导读者的盗版版本，该盗版由长枪党^①人出版商路易斯·德·卡拉尔特出版，附有一篇曼努埃尔·弗拉加·伊里瓦尔内撰写的序言。尽管博洛滕竭力反对这个他称之为“仓促草率并被删改”的译本出版，但是，他还没来得及采取行动，该译本已经在西班牙面世。（一九六三年六月他在巴黎发表声明拒绝承认最初刊登在文献研究中心的刊物《通讯》上的这个译本。）^②由于一个经过准确翻译并且获得合法授权的西班牙文译本《西班牙革命：左派与权力斗争》的出版（墨西哥城，一九六二年），这种状况才得到纠正。两年后，斯坦福大学的西-美研究所出版了另外一个译本。

此外，伯内特·博洛滕不是一名受过训练的专业学者，也不是一位端着铁饭碗的大学教授。早年他当过合众社的通讯记者，后来作为一名自由职业者和个体商人独立谋生，最终，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他在加利福尼亚的房地产业从事一份稳定可靠的职业。尽管一九六二至一九六五年间他曾作为讲师在斯坦福大学短期任教，但是，自谋生计的需要大大减少了他可用于学术研究的时间。这不仅将博洛滕第一本书的出版推迟到一九六一年，而且限制了他研究的范围，使其在七十年代从生意场上退休之前不可能取得更大的学术发展。

① 长枪党（Falange）为西班牙的法西斯主义政治团体。一九三三年由何塞·安东尼奥·普里莫·德·里维拉创建，主要在对保守势力和革命党派均感失望的青年人中发展党员。最初三年，长枪党没有取得多大发展。一九三六年，长枪党参与发动反对共和政府的武装叛乱，当年十一月，普里莫·德·里维拉被共和国政府处决。一九三七年，佛朗哥成为长枪党的领袖。佛朗哥死后，长枪党于一九七七年被正式取缔。（本书脚注均为译注）

② 曼努埃尔·弗拉加·伊里瓦尔内（Manuel Fraga Iribarne，1922—2012）为西班牙政界人士，在佛朗哥独裁统治时期以及随后的民主转型时期均为西班牙政坛的重要人物。在本段所述内容发生时，担任佛朗哥政府负责宣传的信息和旅游部长的弗拉加为具有倾向性的《精心的伪装》西班牙文盗版译本的出版推波助澜，因此，博洛滕特别讨厌他。

在此之后，他才有机会准备写作一部内容扩充了的专著，一九七九年，这部专著以英文和西班牙文出版，使用了一个更加贴切的书名：《西班牙革命》。他的第二本书保留了第一本书的所有优点，尤其是以大量原始资料为依据——实际上，这已使它成为其他历史学家的一本参考书或资料来源——及其严谨的客观性。《西班牙革命》对西班牙内战头十个月的政治斗争作了更加完整的论述，其中包括一九三七年五月在巴塞罗那达到高潮的斗争以及对拉尔戈·卡瓦列罗的罢免，它不仅扩大了早期研究的范围，而且充实了大量新的材料。因此，在关于这一重要问题的整个研究领域里，它成为一部近乎完美的里程碑式的权威著作。

不过，在西班牙内战的后半程，政治活动依然存在，博洛滕收集了大量与此有关的文献资料，但是一直没有时间将这些资料充分整理以供发表。八十年代，他专心致力于最终完成这项毕生的使命，开始写作我们面前的这本书。直到他漫长而非凡的人生的最后几个星期，博洛滕才将本书杀青。博洛滕最后留下的这第三本书是一部全新的著作，论及共产党的力量在一九三七年的僵持阶段以及进入一九三八年以后的发展壮大，尤其是在军队和警察中的发展壮大。像一九三八年两次内阁改组的情况一样，针对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和其他政治观点不同的左翼党派（主要是全国劳工联合会）所发动的攻击得到了详尽的描述。本书对内战后期共和国领导人胡安·内格林独特而复杂的人物形象作了描绘，比已经出版的其他任何著作更加完整、更为精细。本书对共和派最后阶段的政治活动给予了认真的关注，包括失败主义的滋生发展以及对共产党人的专制越来越强烈的反感。这部权威著作最后的贡献是对内战即将结束时那几个问题的深入研究：最终引起争议的共产党人对军事指挥权的重新安排，内格林和共产党人在推行没有落实的拼死抵抗政策的尝试中所扮演的角色，卡萨多试图推翻他们的密谋过程。

同时，本书的主要部分增加了大量因西班牙档案馆的改组整顿和全面开放而可以利用的新的文献资料。因此，本书不仅是一部更为厚重、更加完整的研究著作，而且在许多方面进行了几乎属于权威性的颇有新意的描述，第一次从头至尾细致入微地对西班牙革命和共和派控制区的政治活动进行了全面而准确的考察。它竖起了一座将使未来的研究者永久受益的学

术丰碑，同时也为作者的不懈努力竖起了一座纪念碑。几乎没有什么人曾经在如此重要而艰巨的事业上取得如此辉煌的成就。

同样重要的是，博洛滕将其收集的大量第一手和第二手资料留给了未来的历史学家，收集这些资料花费了他一生中的许多时间。收藏在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的博洛滕资料集包括两千五百册印本（其中许多是珍本），一万两千份装订成册的内战时期的报纸，十大本剪贴簿，大约十二万五千帧缩微胶片，超过六十七箱手稿和两大箱各种各样的文件。这一珍贵的资料收藏使其成为世界上最重要的两三个西班牙内战研究的资料来源之一。伯内特·博洛滕留下的的确是一笔不朽的遗产。

斯坦利·G.佩恩

前言

伯内特·博洛滕去世之前没有来得及对这篇前言作最后的修改。不过，他留下书面和口述的说明，供整理完成其初稿时参照。与其基本上重复以前各种版本已经说过的话，我选择只列出与现在这本书有关的内容。另外，这篇前言是他的说明（由其夫人贝蒂和儿子格雷戈里记录）和早期草稿的忠实再现。

乔治·埃森魏因

一九七七年，我开始动笔撰写摆在面前的这本书，它包含了将近五十年的调查探索和分析研究。最重要的是，本书反映了我广泛使用大量与西班牙内战有关的报纸刊物的情况。与那些尚未意识到报纸作为原始资料之重要性的历史学家不同，我坚信，如果不以查阅报刊的方式触摸内战参与者的生活，就不可能理解他们的激情、冲动以及真正的问题之所在。我发现，报纸比其他任何资料来源更清楚地反映了卷入这场可怕战争的众多形形色色的政治派别的看法和感受。多年来，我查阅了近五百种报纸和期刊（有些刊物报道内战多达百期）。为了再现当年那种乱世的气氛，我直接引用了两百多篇不同的报道。

在写作本书的过程中，我明显扩大了研究的范围。我搜集了大量新的资料，包括报纸、刊物、书籍、小册子、缩微胶片和原始文件的影印件。这些资料大部分是从设在美国国内外的研究性图书馆以及公共和私人机构中找到的。

对于这些资料在提供素材和释疑解难方面给予我的无法估量的帮助，我想向本书《致谢》按字母顺序列出的那些个人、机构和出版社表达我的感激之情。但是，在此我必须专门提到为完成这部专著提供了特别帮助的一些人。

我为乔治·埃森魏因博士的友谊及其八年来的可贵帮助向他表示深深的谢意。他一次又一次地将其利用图书馆馆际出借制度从斯坦福大学格林图书馆和胡佛研究所图书馆与档案馆借到的成百上千种书籍和文章送到我家，为我节省了难以计数的工作时间。这种帮助使我得以广泛研读来自英国、法国、德国、意大利和美国的那些与三十年代欧洲外交史有关的出版物。因此，我才能够详尽阐述较早时候我在《精心的伪装》和《西班牙革命》中曾经阐述过的同一个极其重要的主题。我非常重视我与乔治长期以来所进行的讨论，并且把他当作一位可以征询意见的朋友。除了别的意义之外，就一些错综复杂而且具有较大争议的问题而言，这些讨论有助于我充实想法、巩固信念。另外，我还要为摘录他的文章及其专门为我撰写的大量注释向他表示感谢，读者将在多个章节读到他的这些注释。

我要感谢斯坦利·G.佩恩教授对本书的坚定支持及其不可或缺的贡献。除了为本书撰写序言之外，他还慷慨地腾出时间复审了原稿。[由于本书作者无法独立完成最后一章，佩恩教授费心帮助撰写了结尾的部分内容。]

特别感谢斯坦福大学的罗纳德·希尔顿教授，他是我交往二十七年的老朋友，如今是加利福尼亚国际问题研究所所长。希尔顿教授不仅始终以其富有感染力的干劲和朝气鼓励我，而且允许我利用其无与伦比的西班牙语文化知识。多年来，希尔顿教授一直是我的研究的强有力的倡导者，我最为感谢的正是这一点。

为其过去二十五年坚持不懈的精神支持和帮助，我要感谢巴黎美国学院的戴维·温盖特·派克博士。

胡佛研究所的希丽娅·库克多年来慷慨地向我提供了帮助，她从图书馆和档案馆找出许多鲜为人知的文献资料并将来自苏联的重要的原始资料精心翻译过来供我在研究中使用。

我要感谢两位西班牙人，他们真心实意地与我共同努力在西班牙出版本书和我以前的著作。近二十五年来，卢西亚诺·纳瓦斯一直为我提供关于西班牙内战的最新文献，佩德罗·F.格兰德则热心地支持《精心的伪装》和《西班牙革命》的出版发行。

一九三八至一九五二年间，格拉迪丝·艾薇·博洛滕以其奉献精神 and 辛勤工作帮助奠定了我的关于西班牙内战的全部著作赖以问世的基础。

在为出版编辑书稿的过程中，葆丽娜·B.图克夫人（打字稿）、芭芭拉·沃克夫人（参考文献）和默娜·B.罗切斯特夫人（索引）的认真工作对我助益良多。最重要的是，图克夫人是一位出色的编辑和打字员；在编辑过程的最后阶段，她那不同寻常的高标准及其审阅书稿时的深切关注和忠心支持对我具有很大的帮助。

我要向以下人士致以特别的谢意，他们欣然同意阅读极不便于阅读的大约两千页书稿并且给予有益的评论：保罗·阿夫里奇教授，刘易斯·贝特曼（编辑，北卡罗来纳），哈维尔·普拉德拉（编辑，马德里），斯蒂芬·施瓦茨，保罗·西伯里教授，琼·康奈利·厄尔曼教授和艾拉·沃尔夫。

贝蒂和格雷戈里·博洛滕事事处处尽一切力量支持我。他们以各种方式帮助我，并且为这部书稿无私地奉献了大量时间。本书得以完成在很大程度上应当感谢他们的全身心投入。

尽管作者对上述个人和团体的贡献致以谢意，但是，就本书表述或暗含的最后结论而言，他仍然需要文责自负。

作者说明

曾经查询过的图书馆及其他机构

本书准备使用的所有资料均可以在下列某个或多个图书馆和机构所保存的书籍、信函、文件、访谈录、报纸、期刊缩微胶片及剪报中找到：

西班牙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历史档案馆，马德里

国家历史档案馆，马德里

国家历史档案馆，萨拉曼卡

国家图书馆，马德里

巴塞罗那大学图书馆，巴塞罗那

国家图书馆，巴黎

布兰代斯大学，马萨诸塞州沃尔瑟姆

大英博物馆报纸图书馆，伦敦

当代历史研究中心，巴塞罗那

国际无政府主义研究中心，日内瓦

历史-社会文献中心，巴塞罗那

国际历史研究中心，地理和历史学院（毛林-宁研究室）

弗朗西斯科·拉尔戈·卡瓦列罗基金会，马德里

巴勃罗·伊格莱西亚斯基金会，马德里

哈佛学院图书馆，马萨诸塞州剑桥

马德里市期刊阅览室，马德里

国家期刊阅览室，马德里

胡佛战争、革命与和平研究所，斯坦福大学，加利福尼亚（博洛滕资料集）

巴塞罗那市历史学会，巴塞罗那

国际社会历史研究所，阿姆斯特丹

国会图书馆，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

文化部，马德里（文献资料档案中心）

纽约公共图书馆，纽约

公共档案馆，英国里士满

军事历史部门，马德里

斯坦福大学图书馆，斯坦福

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图书馆

加利福尼亚大学圣迭戈分校图书馆（索思沃思资料集）

密歇根大学图书馆，密歇根州安阿伯（拉瓦迭资料集）

内华达大学里诺分校巴斯克研究计划

注释说明

通常，如果某位作者仅有一部著作或小册子列入参考资料，那么，这部著作在每一章节被首次提到后，注释中就只写作者的名字。如果参考资料包括同一位作者的多部著作，注释中将写出完整或简化的书名以保证准确说明。

在正文和注释中引用的所有报纸和期刊的出版地均在参考资料中写明。对于具有相同名称的报纸和期刊，为了准确辨别，其出版地也在注释中写明。

参考资料写明了所有被引用的文件资料的准确出处，无论是原始资料还是副本。

敌对双方的名称

最初我把佛朗哥将军的军队称为“叛军”或“反叛者”，后来我又将其称为“民族主义者”。军事叛乱的支持者在一九三六年十月建立自己的政权之后使用了后面这个名称。

另一方面，我在全书交替使用“反佛朗哥力量”、“左翼势力”和“共和派”等名称。尽管考虑到一九三六年七月十八日以后发生在战线两侧的深刻的社会政治变革，诸如“民族主义者”和“共和派”之类名称的政治准确性也许应当受到质疑，但是，这些专用名词仍为大多数研究西班牙内战的历史学家所使用并且具有简单明了的优点。

地名

本书使用了下列地名的英式写法：

Andalusia (Andalucía, 安达卢西亚)

Estremadura (Extremadura, 埃斯特雷马杜拉)

Castile (Castilla, 卡斯蒂利亚)

Navarre (Navarra, 纳瓦拉)

Catalonia (Cataluña, 加泰罗尼亚)

Saragossa (Zaragoza, 萨拉戈萨)

Cordova (Córdoba, 科尔多瓦)

Seville (Sevilla, 塞维利亚)

为了与英式写法保持一致，西班牙语地名的重音符号在大多数情况下被省略了。例如，Aragon: Aragón (阿拉贡)；Cadiz: Cádiz (加的斯)；Malaga: Málaga (马拉加)。

正确的姓名

索引中西班牙人的姓名按照西班牙语写法以父姓顺序排列。例如，与弗朗西斯科·拉尔戈·卡瓦列罗有关的内容将在其父姓拉尔戈而非母性卡

瓦列罗项下找到。不过，我时常称其为卡列瓦罗，在西班牙语原始资料的引文中往往也是如此，当时，朋友和对手经常这样称呼他。

加泰罗尼亚名称

加泰罗尼亚人的姓名在大多数情况下使用的是相应的西班牙语写法，例如，Juan Camorera: Joan Comorera（胡安·科莫雷拉）；Luis Companys: Lluís Companys（路易斯·孔帕尼斯）；Federico Escofet: Frederic Escofet（费德里科·埃斯科菲特）；José Tarradellas: Josep Tarradellas（何塞·塔拉德利亚斯）。加泰罗尼亚名称的一个明显例外是正文中通篇使用的Genaralitat（加泰罗尼亚自治政府）。

缩写及其他简称

- AHN Archivo Histórico Nacional, Madrid and Salamance（国家历史档案馆），马德里和萨拉曼卡
- AIT Asociación Internacional de Trabajadores（国际工人协会，无政府工团主义工人国际）
- BL Bolshevik Leninists（布尔什维克列宁主义者，列昂·托洛茨基第四国际的西班牙支部）
- BOC Bloque Obrero y Campesino（工农集团，一九三五年与共产党左派联合组成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
- CADCI Centre Autonomista de Dependents del Comerç i de la Industria（工商业雇员自治中心，加泰罗尼亚的办公室雇员和商店店员工会）
- CEDA Confederación Española de Derechas Autónomas（西班牙争取自治权利联盟，右翼天主教党派联盟）
- CI Communist or Third International（共产国际或第三国际）
- CLUEA Consejo Levantino Unificado de la Exportación Agrícola（莱万特地区农业出口联合委员会，巴伦西亚地区由全国劳工联合会控制的农产品出口组织）
- CNT Confederación Nacional del Trabajo（全国劳工联合会，意识形态受伊比利亚无政府主义者联盟引导的无政府工团主义工会联盟）
- Comintern Communism International or Third International（共产国际或第三国际，各国共产党或共产国际“支部”联合起来的由莫斯科控制的世界性共产

	主义组织)
ERC	Esquerra Republicana de Catalunya (加泰罗尼亚左翼共和派, 加泰罗尼亚中产阶级的左翼共和派政党)
FAI	Federación Anarquista Ibérica (伊比利亚无政府主义者联盟, 无政府主义组织, 全国劳工联合会的意识形态引导者)
FE	Falange Española (西班牙长枪党, 法西斯政党)
FIJL	Federación Ibérica de Juventudes Libertarias (伊比利亚自由主义青年联盟, 无政府主义青年组织)
FOUS	Federación Obrera de Unidad Sindical (统一工会工人联合会, 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的工会组织)
GEPCI	Federación Catalana de Gremios y Entidades de Pequeños Comerciantes e Industriales (加泰罗尼亚小型工商业者同业公会联合会, 受加泰罗尼亚统一社会党控制)
GPU	Gosudarstvennoe Politicheskoe Upravlenie (苏联国家政治保卫局, 苏联秘密警察, 后更名为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
GRU	Glavnoye Razvedyvatelnoye Upravleniye (苏军总参谋部情报总局)
HI	Hoover Institution (胡佛研究所)
IISH	International Institute of Social History, Amsterdam (国际社会历史研究所, 阿姆斯特丹)
JAP	Juventudes de Acción Popular (青年人民行动, 何塞·马利亚·希尔·罗夫莱斯控制的天主教青年运动)
JCI	Juventud Comunista Ibérica (伊比利亚共产主义青年, 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的青年组织)
JSU	Federación de Juventudes Socialistas Unificadas (统一社会主义青年联盟, 由社会党与共产党的青年组织合并而成, 受共产党控制)
ML	Movimiento Libertario (自由主义运动, 包括全国劳工联合会、伊比利亚无政府主义者联盟和伊比利亚自由主义青年联盟在内的整个无政府工团主义运动)
NKVD	Narodnyi Komissariat Vnutrennikh Del (内务人民委员部, 苏联秘密警察, 前身为国家政治保卫局和国家政治保卫总局)
OGPU或GPU	Ob' 'edinennoe Gosudarstvennoe Politicheskoe Upravlenie (国家政治保卫总局或国家政治保卫局, 苏联秘密警察, 统一的国家政治管理机构, 隶属于人民委员会, 后更名为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

PCE	Partido Comunista de España (西班牙共产党)
Politburo	Political Buro or Political Bureau (政治局, 共产党的核心执委会或控制机构)
POUM	Partido Obrero de Unificación Marxista (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 反斯大林主义的马克思主义革命政党)
PSOE	Partido Socialista Obrero Español (西班牙社会主义工人党, 即西班牙社会党)
PSUC	Partit Socialista Unificat de Catalunya (加泰罗尼亚统一社会党, 加泰罗尼亚的四个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政党合并而成, 受共产党控制)
SHM	Servicio Histórico Militar (军事历史部门)
SIM	Servicio de Investigación Militar (军事调查局, 军事情报部门, 受共产党控制)
SIPM	Servicio de Información y Policía Militar (佛朗哥的宪兵情报局)
UGT	Unión General de Trabajadores (劳动者总工会, 社会党的工会组织)
UME	Unión Militar Española (西班牙军人联盟, 右翼军人组织)
UMRA	Unión Militar Republicanos Antifascista (共和国军人反法西斯联盟, 左翼军人组织)
USC	Unió Socialista de Catalunya (加泰罗尼亚社会主义联盟, 加泰罗尼亚的社会主义政党, 与三个较小的政党合并组成加泰罗尼亚统一社会党)

主要人物

这些人物以及其他内战参加者见索引。

Abad de Santillán, Diego (迭戈·阿瓦德·德·桑蒂连), 全国劳工联合会和伊比利亚无政府主义者联盟的主要理论家和积极分子

Adroher, Enrique (“Gironella”) (恩里克·阿德罗埃尔, “希罗内利亚”), 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负责宣传的书记

Aiguadé, Artemio (阿特米奥·艾瓜德), 加泰罗尼亚自治政府内务治安专员, 加泰罗尼亚左翼共和派成员, 亲共人士

Aiguadé, Jaime (海梅·艾瓜德), 加泰罗尼亚左翼共和派成员, 第二届内格林政府的部长, 一九三八年八月辞职

Alcalá-Zamora, Niceto (尼塞托·阿尔卡拉-萨莫拉), 自由派天主教徒, 自由共和派右翼领导人, 共和国第一任总理, 一九三一年十月辞职, 一九三一年

十二月成为共和国首任总统，一九三六年五月下台

Alvarez del Vayo, Julio (胡利奥·阿尔瓦雷斯·德尔巴约)，社会党左派，共产党的盟友，外交部长，总政治部主任

Andrade, Juan (胡安·安德拉德)，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执委会的激进派成员，前托洛茨基分子

Ansó, Mariano (马利亚诺·安索)，左翼共和派人士，一九三八年十一月任司法部长，内格林的好友

Antón, Francisco (弗朗西斯科·安东)，共产党马德里地方党组织书记，中部前线督察委员，被普列托撤职

Antonov-Ovseenko, Vladimir A. (弗拉基米尔·A.安东诺夫-奥夫谢延科)，苏联驻巴塞罗那总领事，在斯大林的清洗中消失

Araquistáin, Luis (路易斯·阿拉基斯塔因)，社会党左派领导人，弗朗西斯科·拉尔戈·卡瓦列罗的亲密助手，驻法国大使

Arredondo, Lieutenant Colonel Manuel (曼努埃尔·阿雷东多中校)，拉尔戈·卡瓦列罗的副官，因同情共产党被调离

Asensio, Colonel José (何塞·阿森西奥上校，后来晋升为将军)，共和派军官，拉尔戈·卡瓦列罗的支持者，国防部副部长，在共产党的压力下被迫辞职

Azaña, Manuel (曼努埃尔·阿萨尼亚)，左翼共和派人士，一九三六年二月至五月任共和国总理，一九三六年六月至一九三九年二月任共和国总统，左翼共和派成员

Azcárate, Pablo de (巴勃罗·德·阿斯卡拉特)，西班牙驻伦敦大使，支持内格林

Baldwin, Stanley (斯坦利·鲍德温)，内维尔·张伯伦之前的英国首相

Balius, Jaime (海梅·巴柳斯)，激进的无政府主义组织“杜鲁蒂之友会”的领导人

Baráibar, Carlos de (卡洛斯·德·巴赖瓦尔)，社会党左派领导人，接替阿森西奥任国防部副部长

Barceló, Lieutenant Colonel Luis (路易斯·巴尔塞洛中校)，共产党军官

Belayev (别拉耶夫)，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特工

Berzin, General Ian K. (“Grishin”) (伊安·K.别尔津将军，别名“格里申”)，一九三六至一九三七年的主要苏联军事顾问，在斯大林的清洗中消失

Besteiro, Julián (胡利安·贝斯泰罗)，社会党右翼领导人，加入卡萨多上校反内格林的国防委员会

Bonnet, Georges (乔治·博内), 法国外交部长

Burillo, Ricardo (里卡多·布里略), 共产党员, 马德里的警察部队指挥官, 后为巴塞罗那警察部队指挥官

Calvet, José (何塞·卡尔韦特), 加泰罗尼亚农夫联合会领导人, 支持加泰罗尼亚统一社会党

Calvo Sotelo, José (何塞·卡尔沃·索特洛), 君主主义西班牙复兴运动的议会领袖, 内战前被暗杀

“El Campesino” (“农夫”), 见González, Valentín

Cardona Rosell, Mariano (马里亚诺·卡多纳·罗塞利), 全国劳工联合会全国委员会成员

“Carlos, Comandante” (“指挥官卡洛斯”), 见Vidali

Carrillo, Santiago (圣地亚哥·卡里略), 统一社会主义青年联盟书记, 一九三六年十一月加入西班牙共产党,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担任西班牙共产党书记

Carrillo, Wenceslao (文塞斯劳·卡里略), 社会党左派领导人, 圣地亚哥·卡里略的父亲, 担任安全总局局长直到一九三七年五月, 加入卡萨多上校反内格林的国防委员会

Casado, Colonel Segismundo (塞希斯孟多·卡萨多上校), 共和派军官, 国防部军事行动负责人, 中路军司令, 一九三九年三月组成反内格林的国防委员会

Casares Quiroga, Santiago (圣地亚哥·卡萨雷斯·基罗加), 左翼共和派领导人, 一九三六年六月接替阿萨尼亚担任总理并且执掌国防部

Castro, Enrique (恩里克·卡斯特罗), 西班牙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委员, 第五团首任指挥官, 土地改革协会主任, 总政治部组织部门负责人, 后来(一九三八年九月)担任总政治部主任,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离开苏联并且脱离西班牙共产党

Checa, Pedro (佩德罗·切卡), 西班牙共产党政治局主要成员

Claudín, Fernando (费尔南多·克劳丁), 共产党员, 统一社会主义青年联盟领导人, 内战结束后与圣地亚哥·卡里略决裂

Codovila, Vittorio (“Medina”) (比托里奥·柯多维拉, 化名“梅迪纳”), 共产国际代表

Comorera, Juan (胡安·科莫雷拉), 加泰罗尼亚统一社会党书记, 前加泰罗尼亚社会主义联盟领导人, 加泰罗尼亚自治政府成员

Companys, Luis (路易斯·孔帕尼斯), 自由共和派人士, 加泰罗尼亚自治政府主席, 加泰罗尼亚左翼共和派成员

“Contreras, Carlos” (“卡洛斯·孔特雷拉斯”), 见Vidali

Cordón, Colonel Antonio (安东尼奥·科登上校), 重要的共产党军官, 国防部战术部门负责人, 东路军参谋长, 被内格林提拔为负责陆军事务的国防部副部长

Daladier, Edouard (爱德华·达拉第), 法国国防部长, 后任法国总理

Díaz, José (何塞·迪亚斯), 西班牙共产党书记

Díaz Tendero, Captain Eleuterio (埃莱乌特里奥·迪亚斯·滕德罗上尉), 亲共产党的社会党左派, 国防部情报监控部门负责人, 被内格林任命为国防部人事部门负责人

Domínguez, Edmundo (埃德蒙多·多明格斯), 社会党左派, 劳动者总工会旗下的全国建筑工人联合会书记, 改换门庭投靠共产党, 中部前线监察委员

“Douglas” (“Duglas”), General (“道格拉斯”将军), 见Smushkevich

Durán, Major Gustavo (古斯塔沃·杜兰少校), 亲共人士, 军事调查局马德里分局负责人, 被普列托撤职

Durruti, Buenaventura (布埃纳文图拉·杜鲁蒂), 无政府主义运动领导人

Escofet, Major Federico (费德里科·埃斯科费特少校), 加泰罗尼亚左翼共和派成员, 一九三六年七月任加泰罗尼亚治安总署署长

Escribano, Antonio (安东尼奥·埃斯克里瓦诺), 统一社会主义青年联盟阿利坎特省负责人, 反对共产党, 从统一社会主义青年联盟执委会辞职

Estrada, Major Manuel (曼努埃尔·埃斯特拉达少校), 共产党军官, 国防部总参谋长, 被拉尔戈·卡瓦列罗撤职

Fernández Grandizo, Manuel (曼努埃尔·费尔南德斯·格兰迪索), 见“Munis”

Fernández Ossorio y Tafall, Bibiano (比维亚诺·费尔南德斯·奥索里奥-塔法利), 左翼共和派人士, 《政治报》负责人, 左翼共和派书记, 共产党的盟友, 被内格林任命为总政治部主任

Fischer, Louis (路易斯·费希尔), 莫斯科和西班牙共产党有影响力的支持者

Franco, General Francisco (弗朗西斯科·佛朗哥将军), 内战爆发时的加那利群岛驻军指挥官, 在西属摩洛哥发动军事叛乱的领导人, 一九三六年十月以后成为民族主义者的首领和政府首脑

Galán, Francisco (弗朗西斯科·加兰), 西班牙共产党党员, 被内格林晋升为上校

Galán, Juan (胡安·加兰), 西班牙共产党党员, 情报处副处长, 军队督察
Galarza, Angel (安赫尔·加拉尔萨), 社会党左派, 拉尔戈·卡瓦列罗政府的内政部长

Garcés Arroyo, Santiago (圣地亚哥·加尔塞斯·阿罗约), 社会党人, 内格林派, 一九三八年被内格林提拔为军事调查局负责人

García Oliver, Juan (胡安·加西亚·奥利韦尔), 全国劳工联合会和伊比利亚无政府主义者联盟领导人, 一九三六年十一月至一九三七年五月任司法部长

García Pradas, José (何塞·加西亚·普拉达斯), 《全国劳工联合会报》(马德里)负责人, 一九三九年三月支持卡萨多发动的反内格林政变

Gaykis, Leon (列昂·盖基斯), 马塞尔·罗森堡之后的苏联驻西班牙大使, 在斯大林的清洗中消失

Gerö, Ernő (“Pedro”) (杰罗·埃尔诺, 化名“佩德罗”), 共产国际派到加泰罗尼亚地区的代表,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在苏联控制的匈牙利政府中担任部长

Gil Robles, José María (何塞·马利亚·希尔·罗夫莱斯), 天主教的西班牙争取自治权利联盟领导人, 逃到葡萄牙

Giral, José (何塞·希拉尔), 自由共和派人士, 一九三六年七月至九月担任政府总理, 左翼共和派成员

“Gironella” (“希罗内利亚”), 见Adroher

Goded, General Manuel (曼努埃尔·戈代德将军), 叛乱将领, 在巴塞罗那被打败

Gómez, Mariano (马利亚诺·戈麦斯), 高级法院主审法官

Gómez, Sócrates (苏格拉底·戈麦斯), 反对圣地亚哥·卡里略, 一九三八年试图重建社会主义青年联盟

Gómez Sáez, Paulino (保利诺·戈麦斯·赛斯), 社会党温和派, 普列托的支持者, 五月事变后中央政府派往加泰罗尼亚接管社会秩序的代表, 一九三八年四月任内政部长

Gómez, Trifón (特里丰·戈麦斯), 右翼社会党人, 军需部门负责人, 反对内格林

González, Valentín (“El Campesino”) (巴伦廷·冈萨雷斯, 绰号“农夫”), 共产党军事指挥官,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从苏联逃走

González Marín, Manuel (曼努埃尔·冈萨雷斯·马林), 保卫马德里代表委员会的全国劳工联合会成员, 一九三九年三月加入反内格林的国防委员会

González Peña, Ramón (拉蒙·冈萨雷斯·培尼亚), 社会党温和派,

一九三七年担任新的劳动者总工会执委会主席，支持内格林反对普列托

Gorev, General Vladimir (弗拉基米尔·戈列夫将军)，苏联军官，被称为“马德里的救星”，被斯大林处决

Gorkin, Julián (胡利安·戈尔金)，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执委会成员，负责国际事务的书记，《战斗报》负责人

“Grigorovich”，General (“格里戈罗维奇”将军)，见Shtern

“Grishin”，General (“格里申”将军)，见Berzin

Guarner, Colonel Vicente (比森特·瓜内尔上校)，一九三六年七月加泰罗尼亚地区的警察部门负责人，加泰罗尼亚左翼共和派成员

Halifax, Viscount (哈利法克斯子爵)，英国掌玺大臣，后任外交大臣并且是内维尔·张伯伦的“内阁决策委员会”成员

Henderson, Sir Nevile (内维尔·亨德森爵士)，英国驻柏林大使，内维尔·张伯伦的支持者

Hernández, Jesús (赫苏斯·埃尔南德斯)，西班牙共产党政治局委员，一九三六年九月至一九三八年四月任教育部长，一九三八年四月至一九三九年三月任中南部地区集团军第一政委，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被西班牙共产党开除出党

Hernández Zancajo, Carlos (卡洛斯·埃尔南德斯·桑卡霍)，社会党左派领导人，整个内战期间始终支持拉尔戈·卡瓦列罗

Hidalgo de Cisneros, General Ignacio (伊格纳西奥·伊达尔戈·西斯内罗斯将军)，空军司令，社会党温和派，加入共产党

Hoare, Sir Samuel (Viscount Templewood) (塞缪尔·霍尔爵士，坦普尔伍德子爵)，内维尔·张伯伦的“内阁决策委员会”成员

Ibárruri, Dolores (“La Pasionaria”) (多洛蕾丝·伊巴露丽，“热情之花”)，西班牙共产党政治局委员

Irujo, Manuel de (曼努埃尔·德·伊鲁霍)，巴斯克民族主义领导人，内格林政府的司法部长，一九三七年十二月辞职，然后担任不管部长直到一九三八年八月辞职

Isgleas, Francisco (弗朗西斯科·伊斯格莱亚斯)，全国劳工联合会成员，加泰罗尼亚自治政府防务专员

Jurado, Lieutenant Colonel Enrique (恩里克·胡拉多中校，后来晋升为将军)，共和派军官，内战结束时反对内格林

Kandelaki, David (达维德·坎杰拉基)，斯大林派往柏林的贸易代表

“Kléber, General Emilio” (Manfred Stern) (“埃米利奥·克莱贝尔将

军”，曼弗雷德·斯特恩），苏联将军，一九三六年十一月任国际纵队第十一旅指挥官，在斯大林的清洗中消失

Koltzov, Mikhail（米哈伊尔·科利佐夫），《真理报》特派记者，斯大林的私人代表，在斯大林的清洗中消失

Krivitsky, Walter（瓦尔特·克里维茨基），一九三七年叛逃西方的苏联内务人民委员会官员

Kulik, General G.（“Kuper” or “Kupper”）（Г.库利克将军，化名“库珀尔”），苏联军官，波萨斯将军的顾问

“Kuper” or “Kupper”，General（“库珀尔”将军），见Kulik

Kuznetsov, Nicolai G.（尼古拉·Г.库兹涅佐夫），苏联军官，海军武官和军事顾问，奉命在公海为运往苏联的西班牙黄金护航

Lamonedá, Ramón（拉蒙·拉莫内达），社会党温和派，西班牙社会主义工人党书记，后来成为内格林和西班牙共产党的支持者

Largo Caballero, Francisco（弗朗西斯科·拉尔戈·卡瓦列罗），社会党左派领导人，劳动者总工会书记，一九三六年九月至一九三七年五月任总理兼国防部长

Líster, Enrique（恩里克·利斯特），著名的共产党民兵武装领导人，第五团指挥官，被内格林晋升为上校

Lizarza Iribarren, Antonio de（安东尼奥·德·利萨尔萨·伊里瓦伦），卡洛斯派君主主义者民兵司令，一九三四年会见墨索里尼

Llopias, Rodolfo（鲁道夫·略皮斯），社会党左派，拉尔戈·卡瓦列罗政府的副总理，始终忠于这位社会党领导人

López, Juan（胡安·洛佩斯），全国劳工联合会领导人，一九三六年十一月至一九三七年五月任商业部长

Maisky, Ivan（伊万·迈斯基），苏联驻伦敦大使

“Malinó”（“马利诺”），见Malinovsky

Malinovsky, Rodion（“Malinó”）（罗季翁·马利诺夫斯基，化名“马利诺”），苏联军官，免遭清洗，成为苏联元帅和国防部长

Mantecón, José Ignacio（何塞·伊格纳西奥·曼特孔），左翼共和派成员，亲共人士，一九三七年八月被任命为阿拉贡地区的首席行政长官

Martí Feced, Carlos（卡洛斯·马蒂·费塞德），自由共和派人士，五月事变期间加入加泰罗尼亚临时政府，加泰罗尼亚左翼共和派成员

Martín Blázquez, José (何塞·马丁·布拉斯克斯), 任职于拉尔戈·卡瓦列罗国防部的共和派军官, 一九三七年逃往伦敦

Martínez Amutio, Justo (胡斯托·马丁内斯·阿穆蒂奥), 社会党左派, 西班牙社会主义工人党巴伦西亚地方组织领导人, 阿尔瓦塞特省省长

Martínez Barrio, Diego (迭戈·马丁内斯·巴里奥), 温和的共和联盟领导人, 共和国副总统, 一九三六年七月十八至十九日的流产政府总理

Martínez Cabrera, General Toribio (托里维奥·马丁内斯·卡夫雷拉将军), 共和派军官, 反对共产党, 被共产党人解职, 因马拉加失守受审, 被判无罪

Marty, André (安德烈·马蒂), 法国共产党领导人, 共产国际代表, 国际纵队的组织者

Más, Valerio (巴莱里奥·马斯), 全国劳工联合会地方委员会书记, 五月事变期间加入加泰罗尼亚临时政府

Maura, Miguel (米格尔·毛拉), 温和的保守共和派领导人, 内战爆发前呼吁成立多党派的民族团结政府

Maurín, Joaquín (华金·毛林), 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领导人, 内战爆发时被民族主义者监禁

“Medina” (“梅迪纳”), 见Codovila

Melchor, Federico (费德里科·梅尔乔), 统一社会主义青年联盟领导人, 一九三七年十一月加入西班牙共产党

Méndez Aspe, Francisco (弗朗西斯科·门德斯·阿斯佩), 支持内格林的左翼共和派人士, 一九三六年参与向苏联运送黄金, 一九三八年四月至一九三九年三月任财政部长

Mera, Cipriano (西普里亚诺·梅拉), 中部前线全国劳工联合会部队的无政府主义指挥官, 支持卡萨多发动反内格林的政变

Meretskov, K.A. (“Petrovich”) (K.A.梅列茨科夫, 化名“彼得罗维奇”), 苏联军官, 恩里克·利斯特和马丁内斯·卡夫雷拉的军事顾问, 免遭清洗, 成为苏联元帅, 红军总参谋长

Miaja, General José (何塞·米亚哈将军), 共和派军官, 一九三六年七月十八至十九日迭戈·马丁内斯·巴里奥不幸的和解政府成员, 保卫马德里委员会主席, 西班牙共产党党员, 卡萨多反内格林的国防委员会首脑

Mije, Antonio (安东尼奥·米赫), 西班牙共产党政治局委员, 国防部总政治部分支部门负责人

Minev, Syefan (斯特凡·米涅夫), 见“Stefanov”

Miravittles, Jaime (海梅·米拉维特列斯), 中央反法西斯民兵委员会成员, 加泰罗尼亚左翼共和派成员

Modesto, Colonel Juan (胡安·莫德斯托上校), 共产党民兵武装领导人, 后成为人民军军官, 一九三九年三月被内格林晋升为将军

Mola, General Emilio (埃米利奥·莫拉将军), 民族主义将领, 半岛军事叛乱的组织者

Montseny, Federica (费德丽卡·蒙特塞尼), 全国劳工联合会-伊比利亚无政府主义者联盟领导人, 一九三六年十一月至一九三七年五月任卫生部长

“Moreno” (“莫雷诺”), 见“Stefanov”

Morón, Gabriel (加夫列尔·莫隆), 社会党温和派, 取代安东尼奥·奥尔特加担任安全总局局长

“Munis, G.” (Manuel Fernández Grandizo) (“G.穆尼斯”, 曼努埃尔·费尔南德斯·格兰迪索), 布尔什维克列宁主义者(托洛茨基第四国际的西班牙支部)领导人

Negrín, Juan (胡安·内格林), 社会党温和派, 后来成为亲共人士, 一九三六年九月担任财政部长, 一九三七年五月担任总理, 一九三八年四月至一九三九年三月担任总理兼国防部长

Nelken, Margarita (玛加丽塔·内尔肯), 社会党左派议员, 加入西班牙共产党

Nin, Andrés (安德烈斯·宁), 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领导人, 一九三七年被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的特工杀害

Núñez Maza, Carlos (卡洛斯·努涅斯·马萨), 西班牙共产党党员, 民航总署技术干事, 一九三八年四月被内格林提拔为负责空军事务的国防部副部长

Orlov, Alexander (亚历山大·奥尔洛夫), 一九三六年九月开始担任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西班牙)特工负责人, 直到一九三八年八月叛逃美国为止

Ortega, Lieutenant Colonel Antonio (安东尼奥·奥尔特加中校), 西班牙共产党党员, 内格林任命其取代文塞斯劳·卡里略担任安全总局局长, 后因杀害安德烈斯·宁的丑闻被迫辞职

Ossorio y Gallardo, Angel (安赫尔·奥索里奥-加利亚多), 共和派法官

Ossorio y Tafall, Bibiano (比维亚诺·奥索里奥-塔法利), 见Fernández Ossorio y Tafall

“Pablo”，General（“巴勃罗”将军），见Pavlov

Pascua, Marcelino（马塞利诺·帕斯库亚），社会党温和派，内格林的支持者，西班牙驻莫斯科大使

“La Pasionaria”（“热情之花”），见Ibárruri

Pavlov, General D.G.（“Pablo”）（Д.Г.帕夫洛夫将军，化名“巴勃罗”），苏联军官，指挥西班牙的苏联坦克部队，在斯大林的清洗中遇害

“Pedro”（“佩德罗”），见Gerö

Peiró, Juan（胡安·佩罗），全国劳工联合会成员，一九三六年十一月至一九三七年五月任工业部长

Pérez Salas, Colonel Jesús（赫苏斯·佩雷斯·萨拉斯上校），共和派军官，普列托的国防部副部长

“Petrovich”（“彼得罗维奇”），见Meretskov

Pi Sunyer, Carlos（卡洛斯·皮·苏涅尔），巴塞罗那市长，加泰罗尼亚左翼共和派成员

Portela Valladares, Manuel（曼努埃尔·波特拉·巴利亚达雷斯），中间派领导人，一九三六年二月辞去总理职务

Pozas, General Sebastián（塞瓦斯蒂安·波萨斯将军），自由共和派军官，中部前线指挥官，五月事变期间被任命为加泰罗尼亚和东部驻军的指挥官，西班牙共产党和加泰罗尼亚统一社会党党员

Pretel, Felipe（费利佩·普雷特尔），社会党左派，劳动者总工会司库，国防部总政治部秘书长，改换门庭投靠西班牙共产党

Prieto, Horacio M.（奥拉西奥·M.普列托），一九三六年十一月前任全国劳工联合会全国委员会书记

Prieto, Indalecio（因达莱西奥·普列托），社会党温和派，一九三六年九月任海军和空军部长，一九三七年五月至一九三八年四月任国防部长，内格林迫使其去职

Ptukhin, E.S.（E.C.普图欣），苏联空军军官，接替斯穆什克维奇

Queipo de Llano, Gonzalo（贡萨洛·凯波·德·利亚诺），叛军将领，占领塞维利亚

Ravines, Eudocio（欧多西奥·拉维内斯），秘鲁共产党人，《红色阵线报》（巴伦西亚）编辑部成员

Regler, Gustav（古斯塔夫·雷格勒），德国共产党人，作家，国际纵队第

十二旅政委，战后脱离共产党

Río, José del (何塞·德尔·里奥)，共和派领导人，加入卡萨多反内格林的国防委员会

Rodríguez, Benigno (贝尼尼奥·罗德里格斯)，西班牙共产党党员，内格林的政治秘书

Rodríguez Salas, Eusebio (欧塞维奥·罗德里格斯·萨拉斯)，加泰罗尼亚统一社会党党员，加泰罗尼亚治安总署署长

Rodríguez Vega, José (何塞·罗德里格斯·维加)，社会党左派，为内格林背弃拉尔戈·卡瓦列罗，一九三七年成为新的劳动者总工会执委会书记

Rojo, Major Vicente (比森特·罗霍少校，后为中校，接着晋升为将军)，一九三六年十一月至一九三七年五月马德里保卫战期间的参谋长，一九三七年五月至一九三九年二月任总参谋长，支持内格林

Rosal, Amaro del (阿马罗·德尔·罗萨尔)，社会党左派，后来支持共产党，银行雇员工会主席，一九四八年正式加入西班牙共产党

Rosenberg, Marcel (马塞尔·罗森堡)，一九三六年九月至一九三七年二月任苏联驻西班牙大使，被盖基斯接替，在斯大林的清洗中消失

Salgado, Manuel (曼努埃尔·萨尔加多)，全国劳工联合会成员，加入卡萨多反内格林的国防委员会

San Andrés, Miguel (米格尔·圣安德烈斯)，左翼共和派人士，加入卡萨多反内格林的国防委员会

Sánchez Román, Felipe (费利佩·桑切斯·罗曼)，保守的民族共和党领导人，加入一九三六年七月十八至十九日迭戈·马丁内斯·巴里奥的和解政府

Sanjurjo, General José (何塞·圣胡尔霍将军)，流亡的君主主义军官，军事叛乱领导人，一九三六年七月返回西班牙途中死于飞机失事

Serra Pàmies, Miguel (米格尔·塞拉·帕米埃斯)，加泰罗尼亚统一社会党领导人，战后脱离该党

Shtern, Gregoriy M. (“Grigorovich”) (格列戈里·M.施特恩，化名“格里戈罗维奇”)，一九三七年五月在别尔津之后担任苏联首席军事顾问，在斯大林的清洗中遇害

Silva, José (何塞·席尔瓦)，共产党员，土地改革协会秘书长

Simon, John (约翰·西蒙)，内维尔·张伯伦的“内阁决策委员会”成员

Smushkevich, Yakov (“Douglas” or “Duglas”) (雅科夫·斯穆什克维

奇，化名“道格拉斯”），西班牙的苏联空军指挥官，在斯大林的清洗中遇害

Stashevsky, Arthur (阿尔图尔·斯塔舍夫斯基)，苏联贸易代表，内格林的朋友，在斯大林的清洗中消失

“Stefanov, Boris” (“Moreno”) (“鲍里斯·斯特凡诺夫”，“莫雷诺”)，保加利亚共产党领导人，共产国际代表，真实姓名斯特凡·米涅夫

Stern, Manfred (曼弗雷德·斯特恩)，见“Kléber”

Tarradellas, José (何塞·塔拉德利亚斯)，自由共和派人士，加泰罗尼亚自治政府首席专员，加泰罗尼亚左翼共和派成员

Togliatti, Palmiro (“Ercole Ercoli”，“Alfredo”) (帕尔米罗·陶里亚蒂，化名“埃尔科莱·埃尔科利”，“阿尔弗雷多”)，意大利共产党领导人，共产国际代表

Uribe, Vicente (比森特·乌里韦)，农业部长，西班牙共产党政治局委员

Val, Eduardo (爱德华多·巴尔)，全国劳工联合会成员，加入卡萨多反内格林的国防委员会

Valdéz, Miguel (米格尔·巴尔德斯)，加泰罗尼亚统一社会党领导人，加泰罗尼亚自治政府专员

Vanni, Ettore (埃托雷·万尼)，意大利共产党人，巴伦西亚《真理报》主编

Vansittart, Sir Robert (罗伯特·范西塔特爵士)，英国外交部常务副大臣，反对绥靖政策，被内维尔·张伯伦撤职

Vázquez, Mariano R. (马利亚诺·R.巴斯克斯)，一九三六年七月任全国劳工联合会加泰罗尼亚地区委员会书记，一九三六年十一月至一九三九年任全国劳工联合会全国委员会书记

Vidali, Vittorio (“Comandante Carlos”，“Carlos Contreras”，“Enea Sormenti”) (维托里奥·维达利，人称“指挥官卡洛斯”，化名“卡洛斯·孔特雷拉斯”、“埃内亚·索尔门蒂”)，意大利共产党人，第五团第一政委，与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特工关系密切

Vidarte, Juan-Simeón (胡安-西梅翁·比达特)，社会党温和派，一九三七年五月任内政部副部长，内格林的支持者

Vidiella, Rafael (拉斐尔·比迭利亚)，加泰罗尼亚统一社会党执委会成员，前西班牙社会主义工人党加泰罗尼亚地区联盟领导人

Voronov, N. (H.沃罗诺夫)，苏联军官，指挥西班牙的苏联炮兵部队，免

遭清洗，成为苏联炮兵学院院长

Wilson, Sir Horace (霍勒斯·威尔逊爵士)，内维尔·张伯伦的亲密同事和首席外交政策顾问

Zabalza, Ricardo (里卡多·萨瓦尔萨)，社会党左派，劳动者总工会旗下的全国农业工人联合会书记，反对共产党

Zugazagoitia, Julián (胡利安·苏加萨戈伊蒂亚)，社会党温和派，主管《社会主义者》直到一九三七年五月，一九三七年五月至一九三八年四月任内政部长

译者说明

本书根据美国北卡罗来纳大学出版社出版的*The Spanish Civil War: Revolution and Counterrevolution* (The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1991) 一书译出。

在本书中，除了指称在西班牙内战中与佛朗哥阵营对立的共和派阵营之外，“共和派”(Republican)一词通常指的是左翼共和派(Izquierda Republicana, IR)以及共和派阵营中不属于社会党、共产党、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无政府主义和两大工会等党派组织的其他自由共和派人士和温和共和派人士。

对于作者重点记述的共和派阵营中的重要党派之一西班牙社会主义工人党(Partido Socialista Obrero Español, PSOE)，本书多译为西班牙社会党。至于内战期间共和派阵营中的另外一些重要的党派组织，例如，全国劳工联合会(Confederación Nacional del Trabajo, CNT)，劳动者总工会(Unión General de Trabajadores, UGT)，伊比利亚无政府主义者联盟(Federación Anarquista Ibérica, FAI)，西班牙共产党(Partido Comunista Español, PCE)，加泰罗尼亚统一社会党(Partit Socialista Unificat de Catalunya, PSUC)，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Partido Obrero de Unificación

Marxista, POUM) , 加泰罗尼亚左翼共和派 (Esquerra Republicana de Catalunya, ERC) , 统一社会主义青年联盟 (Federación de Juventudes Socialistas Unificadas, JSU) 等等, 考虑到中国读者对它们并不熟悉, 所以在译文中均使用全称。

本书中的西班牙语人名根据《西班牙语姓名译名手册(修订本)》(商务印书馆, 1973) 和《西班牙语姓名译名手册》(商务印书馆, 2015) 译出, 个别通译除外。

两年来, 经常有人询问“西班牙内战史”的翻译情况。这里有必要说明一下, 本书并不是一部严格意义上的西班牙内战史, 书中主要记述的是西班牙内战期间发生在共和派阵营内部的事情。像共和派阵营与佛朗哥阵营之间的内战一样, 本书作者为读者所揭示的这一场“西班牙内战”残酷血腥, 你死我活, 而其错综复杂甚至可能超过前者, 对于认识二战之前乃至整个二十世纪的世界政治, 它也许更有启示作用。

对于卷入西班牙这场争斗的知识分子来说，最大的悲哀莫过于事实与谎言真假难辨地交织在一起，骗人者同样受到欺骗。

有人说，带着没有破灭的美妙幻想在西班牙战死的那些人是幸运的。

——朱利安·西蒙斯，
《三十年代：一场循环往复的梦幻》

目录

上册

序 / 1

前言 / 8

作者说明 / 11

译者说明 / 29

第一部分 内战、革命及一九三一至一九三六年共和国的垮台

第一章 酝酿剧变 / 3

第二章 左派的分裂与僵持 / 30

第三章 军事叛乱与内战 / 50

第四章 革命与第三共和国的崛起 / 69

第五章 革命打击小资产阶级 / 92

第六章 农村的革命、自由共产主义的理论与实践 / 100

第二部分 共产党的崛起

第七章 中产阶级的希望 / 133

第八章 人民阵线 / 144

第九章 外国干涉 / 158

第十章 将革命伪装起来 / 179

第十一章 拉尔戈·卡瓦列罗组成新政府 / 184

- 第十二章 共产党争夺控制权 / 198
- 第十三章 胡安·内格林博士和胡里奥·阿尔瓦雷斯·德尔巴约 / 218
- 第十四章 运往莫斯科的西班牙黄金 / 232
- 第十五章 苏联的影响、政治欺骗和阿萨尼亚总统的困境 / 254
- 第十六章 错综复杂的东西方外交斗争中的西班牙 / 266
- 第十七章 向英法伸出橄榄枝 / 286

第三部分 抑制革命

- 第十八章 无政府主义哲学与政府 / 303
- 第十九章 无政府工团主义者加入政府 / 311
- 第二十章 遏制革命委员会 / 333
- 第二十一章 治安力量 / 339
- 第二十二章 国有化对集体化 / 350
- 第二十三章 一个新型的议会制民主共和国 / 360
- 第二十四章 平衡各个阶层的力量 / 370

中 册

第四部分 从革命的民兵武装到正规军

- 第二十五章 革命的民兵武装 / 387
- 第二十六章 纪律与无政府工团主义民兵武装 / 403
- 第二十七章 第五团 / 410
- 第二十八章 人民军 / 419
- 第二十九章 何塞·阿森西奥将军，拉尔戈·卡瓦列罗向共产党人挑战，政府撤离马德里 / 431
- 第三十章 保卫马德里、保卫马德里委员会和国际纵队，米亚哈、罗霍和克莱贝尔 / 439
- 第三十一章 苏联军官、记者和外交官 / 472
- 第三十二章 自由主义运动与正规军 / 498
- 第三十三章 钢铁纵队 / 514
- 第三十四章 拉尔戈·卡瓦列罗与莫斯科决裂 / 527

第三十五章 对拉尔戈·卡瓦列罗的压力加大 / 543

第三十六章 拉尔戈·卡瓦列罗进行反击 / 562

第五部分 共产党人获胜

第三十七章 西班牙共产党讨好社会党温和派 / 579

第三十八章 加泰罗尼亚：军事叛乱与社会革命 / 587

第三十九章 加泰罗尼亚统一社会党的崛起、民兵委员会的解散 / 603

第四十章 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和托洛茨基分子 / 616

第四十一章 加泰罗尼亚走向公开交战 / 634

第四十二章 五月事变（一） / 658

第四十三章 五月事变（二） / 686

第四十四章 推翻拉尔戈·卡瓦列罗 / 709

第四十五章 胡安·内格林上台 / 726

第六部分 革命陷入低潮

第四十六章 内格林政府与自由主义运动的反应 / 741

第四十七章 加泰罗尼亚统一社会党取代全国劳工联合会和伊比利亚无政府主义者联盟成为加泰罗尼亚地区的主导力量 / 750

第四十八章 共产党镇压无政府主义者和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 / 761

第四十九章 与审判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有关的重要情况 / 789

第五十章 破坏集体农庄和解散阿拉贡地方委员会 / 799

下 册

第七部分 拉尔戈·卡瓦列罗和因达莱西奥·普列托失势

第五十一章 因达莱西奥·普列托挑战西班牙共产党 / 815

第五十二章 共产党讨好全国劳工联合会 / 837

第五十三章 拉尔戈·卡瓦列罗退出政坛，劳动者总工会与全国劳工联合会签订联合协议 / 845

第五十四章 将因达莱西奥·普列托赶出国防部 / 866

第八部分 共产党的影响达到巅峰

第五十五章 第二届内格林政府，共产党在军队中占据支配地位 / 887

第五十六章 共产党对安全部门的控制 / 908

第五十七章 加泰罗尼亚与八月危机 / 926

第九部分 怀疑、分歧、灾难激增，共产党的影响减弱

第五十八章 祸起萧墙 / 941

第五十九章 人民在为什么而战？ / 958

第六十章 内格林的十三点战争目标 / 967

第六十一章 英—法干预的希望破灭 / 978

第六十二章 加泰罗尼亚地区失陷 / 997

第十部分 抵抗政策终止

第六十三章 内格林返回中南部地区 / 1025

第六十四章 塞希斯孟多·卡萨多、西普里亚诺·梅拉与自由主义运动 / 1050

第六十五章 寻找替罪羊 / 1063

第六十六章 内格林逃之夭夭与第三共和国的末日 / 1083

参考资料 / 1107

致谢 / 1221

索引 / 1232

第一部分

内战、革命及一九三一至一九三六年
共和国的垮台

尽管反佛朗哥阵营所发动的一场广泛的社会革命——其最初阶段在某些方面比布尔什维克革命还要深刻——在一九三六年七月西班牙内战爆发之后接踵而至，但是，由于某种史无前例的欺骗隐瞒政策，西班牙国外成百上千万感觉敏锐的人却对此事一无所知，不仅对这场革命的深度和广度不甚了了，就连它的存在也不知道。

——伯内特·博洛滕

酝酿剧变

引发内战的矛盾不是突然激化的。自从一九三一年四月推翻君主制宣告成立共和国以来，双方的敌意持续稳定地不断加深，接着，由于左派联盟人民阵线在一九三六年二月举行的大选中获胜，形势愈发严峻起来。

在大选与内战之间的几个月里，共和国在城镇和乡村经历了一系列史无前例的工人骚乱，骚乱在一定程度上是对自一九三三年十二月以来统治西班牙的中-右政府所推行的政策的反应。在西班牙左派所谓黑暗的两年（el bienio negro）这一时期，不仅规定工资和雇佣条件的法律被废除、修改或者已失效，¹而且共和国的许多其他工作也没有开展。萨尔瓦多·德·马达里亚加是一位温和的共和派人士，曾经担任司法部长，据他本人说，内战期间他与双方保持着同样的距离。马达里亚加写道，劳动法庭显示出某种不同的政治倾向，像以前不利于雇主一样，现在它们的裁决不利于工人。“同时，土地改革协会失去了资金支持。从农村的角度看，就实际情况和农民餐桌上的面包而论，这些变化是灾难性的。许多地主一点教训也没有吸取，而且什么也不想放弃——这样的地主太多了，也许是出于对左派执政期间所受到的侮辱和伤害的报复，他们以极其野蛮残暴的方式对待雇工，以致社会环境不仅在物质生活方面、而且在道德观念方面

变得越来越恶劣。农业工人的工资重新下降到不足以维持温饱的水平；工作失去了保障，同时，分得土地的希望彻底破灭。”²

4 一九三五年七月二十三日，成立于一九三三年十月的法西斯政党西班牙长枪党领导人何塞·安东尼奥·普里莫·德·里维拉在西班牙议会发言说，农村的生活“绝对让人无法忍受”。“昨天我在塞维利亚省。”他说道，“该省有个名叫巴多拉托萨的村庄，那里的女人凌晨三点出门去摘鹰嘴豆。工作九个小时——由于技术原因工作时间无法延长——之后，她们在正午时分收工。干这种活儿这些女人一天可以挣一个比塞塔。”³

温和共和派报纸《太阳报》的报道特别具有启发性。“自从共和国建立以来，”该报在一九三六年六月九日写道，“我们一直在两个极端之间极其危险地摇摆不定，尤其是农村。前两年[一九三一至一九三三年]，农业实行了一种荒唐可笑的工作制，盛行一时的游手好闲和不受约束的风气最终毁掉了农业。农业工人挣着高额工资却能干活儿就不干活儿。⁴……接下来的两年间[一九三三至一九三五年]，我们陷入了另一个极端。在短短的几个月时间里，工资从每天十到十二个比塞塔锐减至四个、三个比塞塔，甚至减到两个比塞塔。财主开始报复劳工，但是，他们没有意识到，这是在为不久之后熊熊燃烧的社会怒火积聚燃料。与此同时，许多曾经按照政府命令被迫减租的地主想方设法驱逐佃户。……这些错误行为为人民阵线的胜利埋下了伏笔，这场胜利与其说是由于左派真正的实力，不如说是由于右派缺乏政治远见，尽管左派确实具有相当的实力。”⁵

接着，在人民阵线获胜之后不断加剧的社会动乱的影响下，天主教的西班牙争取自治权利联盟——这是一个松散的右翼政党联盟，简称CEDA，其核心党派为人民行动党⁶——领导人何塞·马利亚·希尔·罗夫莱斯宣称：“为了表明不以任何形式迁就纵容，我们必须使西班牙争取自治权利联盟扮演某种社会角色。最初可能某些团体将会退出，但这不会让我担忧，甚至可能让我高兴。西班牙的保守阶层必须明白，如果他们不想放弃所拥有的大部分利益自愿做出牺牲的话，那么，他们就将永远消失。”⁷

在另一个场合，他说：“有许许多多[雇主和地主]知道如何公平宽厚地履行自己的义务，但是也有许多人，一旦拥有了支配权，他们便以自杀式的利己手段降低工资、提高地租，试图蛮不讲理地驱逐佃户，而且忘记了

一九三一至一九三三年的惨痛教训。结果，在许多省份，左派从普通农民和农业工人那里获得的选票增加了。推行公平的社会政策之后，这些人的选票仍然将会属于我们。”⁸

主要由于上述原因，一九三六年二月人民阵线获得大选胜利之后农村发生了严重的危机，这一危机以农业工人罢工的形式表现出来，他们要求提高工资并且缩短工作时间；雇主经常以烧掉庄稼或者任其烂在地里作为回应。对于这场农村危机的描述，共和派的报刊上出现了两种说法，与其说它们相互矛盾，不如说它们相互补充。“每天，”一九三六年六月十四日的《太阳报》写道，“我们收到的来信告诉我们同样的事情。收成低于往年的平均水平，但是，不关心收成好坏的工人就收割打场的工作提出了荒谬的条件。在一些村庄，这些条件非常苛刻，以致佃户、地主、小块土地拥有者和垦殖民[根据土地改革法在土地上定居的农民]……确信，他们不得 5 不得不让庄稼烂掉或者将其付之一炬，因为如果他们答应工会提出的带有恐吓性的蛮横要求的话，他们就得以某种让购买者感到震惊的价格出售每一蒲式耳谷物。……耕种着西班牙土地的不只是有钱有势的大地主和养尊处优生活在外的土地所有者。对于数十万小块土地拥有者和垦殖民来说，公正解决当前的农业罢工是一个生死攸关的问题。”⁹

另一方面，左翼共和派的《自由报》一九三六年六月二十六日写道：“在农村……反动势力一方显然具有明确的目的，他们企图抵制共和国政权、把农民群众逼入绝境并将政府置于非常困难的境地。不然的话，怎么能够解释这种情况：在一些省份，全省的雇主打算让收成烂在地里……，只能用来作饲料，而支付他们应付的工资然后把庄稼收回来却合算得多？同时，怎么能够解释类似于发生在阿尔门德拉莱霍的情况？在那里，雇主发誓一天工作也不提供，而且威胁要杀死任何提供工作的地主。”

农村危机还通过无地农民的反叛情绪表现出来，这些农民对土地改革法的实施已经等得不耐烦了，认为政府官员在分配土地的问题上拖拖拉拉也使他们的耐心渐渐消失。“时间一点一点地过去，土地仍然留在那些政坛大佬手里。”一位地方农民领袖在五月三十日的《农业工人报》上说，“失望再次开始蔓延，我们走上了一条与一九三一年同样的路。人民阵线政府打算使农民的幻想破灭吗？农民愿意看到他们的希望再次化为泡影

吗？不。他们想要得到土地，因此，如果不加快进度的话，那么，当农民意识到政府不给他们他们迫切需要的东西时，那些有责任使农民拥有土地的人不必感到震惊意外。”《农业工人报》是社会党左派所控制的全国农业工人联合会的喉舌。¹⁰

四月十一日，规模不大但发展迅速的西班牙共产党书记何塞·迪亚斯要求政府加快实施土地分配。定居点的数量不足。大地主的土地应当没收，然后毫不拖延地分给农民。他接着指出，政府一直没有足够认真地对待这一问题。“这是民主革命需要解决的基本问题之一，因此，我们应当竭尽全力达到这一目的。”¹¹

但是，在许多村庄，人们已经失去了耐心，在全部由自由共和派及温和共和派人士组成的政府满足他们的需要之前，农民不愿意再等待了。三月七日，《农业工人报》报道说：

马德里省塞尼辛托斯的农民集体占领了面积为一千三百一十七公顷的“葡萄藤橡树林”牧场并且开始耕种这个牧场。完成占领之后，他们给农业部写了下面这封信：

6 “我们的村子有一个适于耕种的辽阔牧场，过去那里实际上被耕种过，但是如今却被用来打猎放牧。我们多次向牧场的所有者提出租种土地的要求但没有结果，他与另外两三个地主几乎占有了曾为本地公共财产的所有土地。当我们的手和犁无所事事而我们的孩子却挨饿时，除了占领这块土地，我们没有别的活路。我们做的就是这些。通过我们的劳动，它将生长出以前并不生长的庄稼；我们的苦难将会结束，国家的财富也将增加。我们不认为这样做损害了谁的利益，我们向阁下请求的唯一一件事情是，为了使我们的孩子能够平静正常地从事劳动，请您将这种状况合法化并且肯定我们的行为。”

三月十七日，《自由报》从托莱多省的马纳萨尔瓦斯报道：“当地两千名饥饿的农民刚刚占领了二十年前罗马诺内斯[伯爵]没有向国民付出任何代价便据为己有的‘栎树林’庄园。”

发表在某份共产党刊物上的一篇文章说：“马德里附近一个小村庄的

农业工人以自行接管土地的方式做出了榜样。两周之后，萨拉曼卡省九十多个村庄的农业工人如法炮制。¹²几天后，这一榜样被托莱多省一些村庄的农民所效仿；接着，在三月二十五日黎明，卡塞雷斯省和巴达霍斯省的八万名农民占领了土地并开始耕种。[这些]农民的革命行动引起了政府部门的极大恐慌。……[不过]政府没有动用武力，而是身不由己地从土地改革协会派出大批专家和官员，以使农民对土地的占领看上去是合法的。”¹³

一名西班牙共产党人写道，农民领袖“估算，土地改革法计划每年安置五万农民，这意味着安置一百万农民要二十年，分给所有农民土地要一百多年。正是意识到这一点，农民才强行占领了土地”。¹⁴

仅仅讨论有组织的占地和罢工并不足以弄清一九三六年春天和初夏严重影响着西班牙农村的极其紧张的社会形势，爱德华·E.马莱法基斯这样说，他是内战之前农村形势研究方面的权威。“如同一九三三年中-右势力的选举胜利使社会地位既定阶层有机会以各种各样的小动作——这些小动作大都置法律于不顾——向工人进行报复一样，人民阵线的胜利也使工人得到了不受惩罚地将其意志强加于人的许可。……威胁恐吓似乎已经成为所有不属于工会的工人的流行做法。最经常制造麻烦的可能是那些成群结队的工人，他们闯进农场强迫农场经理给活儿干。偷盗牲畜和庄稼以及砍伐树木当做柴火或木料的情况也普遍存在。”谈到巴达霍斯省，马莱法基斯写道：“成千上万的农民在该省流浪，毫无希望地到处寻找工作；农场管理人员的作用不断受到反复出现的住宿工人[被迫雇用的多余工人]的影响，而小块土地拥有者则生活在无法摆脱的恐惧中，因为，当‘资产阶级’和‘法西斯分子’这些词的定义扩大到把拥有各种规模财产的人包括在内时，他们也将成为工人入侵的受害者。”马莱法基斯注意到，《太阳报》——这是“我们所拥有的关于那些混乱时期的一个客观的资料来源”——深切关注那些小块土地拥有者和佃户们的命运，它认为，与大地主相比，社会和经济危机对他们造成了更为严重的伤害。¹⁵

如果说农村的骚乱是使政府严重不安的一个原因的话，那么，城市里的劳动争端也是一样。从五月底到内战爆发，共和国受到几乎波及各行各业和所有省份的工人罢工的强烈震动。尽管实行了审查制度，报刊的版面上仍然充满了关于罢工的各种报道：罢工正在进行；旧的罢工结束了，新

的罢工宣布开始，更多的罢工可能发生；有部分工人罢工，有总罢工，有静坐罢工，还有声援其他罢工的同情罢工。¹⁶工人不仅为提高工资、缩短工作时间和带薪假期而罢工，并且为实施二月二十九日颁布的法令而罢工，这项法令强制雇主恢复一九三四年一月一日以后由于政治原因被解雇的所有工人的工作并对他们进行赔偿。¹⁷这一措施由人民阵线在其竞选纲领的第一部分作出承诺，而且引起雇主们的强烈不满。¹⁸“我们的工资表上有一些重新雇用的雇员，我们没有合适的工作让他们做，”英资力拓公司^①董事长奥克兰·格迪斯爵士一九三六年四月报告说，“而且，在刚刚过去的几天，我们遭遇了一场令人烦恼的罢工，罢工者指责我们非法解雇了实际上是因为参加一九三四年十月的革命运动而被关进监狱的那些工人，在他们坐牢期间，我们当然不给他们发工资，因此，他们要求我们给予赔偿。”¹⁹

对城市中心困扰最为严重的罢工是马德里建筑工人的罢工，它使这座城市陷入瘫痪。尽管社会党的工会组织劳动者总工会（UGT）接受政府仲裁委员会提出的一项解决方案，但是，更为激进的无政府工团主义工会组织全国劳工联合会（CNT）拒绝仲裁，反而企图将罢工转变成为与雇主和政府的革命性对抗。在尝试结束罢工——这一尝试不时被对立的工会组织成员之间的流血甚至致人死命的冲突所打断——未果后，政府逮捕了无政府工团主义工会组织的一些领导人并且查封了它们的总部。给骚乱火上浇油的是长枪党党徒镇压罢工的行动和建筑承包商本身的拒不让步。用全国建筑承包商协会在内战爆发之后所发表的一项声明中的话说就是，他们的“反抗为形成有利于进行光复不朽之西班牙的圣战的局面做出了巨大贡献。……正是为了实施这一壮举，我们在六月十日下令所有工场和工地停工。”²⁰七月三日，建筑承包商接受了政府的仲裁，但是，全国劳工联合会不顾劳动者总工会结束罢工的努力继续罢工。²¹

促使骚乱蔓延的一个重要心理因素是，人们对一九三四年十月镇压阿斯图里亚斯地区左派叛乱的情况记忆犹新。那场叛乱因尼塞托·阿尔卡拉-萨莫拉总统批准以何塞·马利亚·希尔·罗夫莱斯为首的三名天主教西班牙争取自治权利联盟成员加入由激进党领导人亚历杭德罗·勒鲁十月四日组

^① 力拓有限公司（Rio Tinto Company Limited）当时拥有西班牙安达卢西亚地区韦瓦尔省内瓦尔镇附近的里奥廷托铜矿（Minas de Riotinto）的开采权，该铜矿被认为是世界上最有价值的铜矿之一。

成的内阁而引发。中-右势力在一九三三年十一月的大选中获胜后，激进党政府在议会里得到了西班牙争取自治权利联盟的支持，不过后者没有加入内阁。由于西班牙争取自治权利联盟公开宣称其目的是要建立一个天主教的专制国家，最强大的反对派社会党人将其视为“法西斯主义”的主要威胁，因此，他们决定，如果后者获准加入政府的话，他们就将进行斗争。

一九三三年十一月大选以后，因为不信任希尔·罗夫莱斯并且担心社会党人可能造反，阿尔卡拉-萨莫拉总统没有批准西班牙争取自治权利联盟加入勒鲁组建的政府，然而，由于西班牙争取自治权利联盟是最大的议会党团和政治组织，因此，它在政府中拥有代表的民主权利不可能永远被否决。尽管希尔·罗夫莱斯因共和国对教会的攻击而从未正式接受过共和国，但是，他宣称自己打算尊重获取政权的民主方式并且还将法西斯主义斥为异端邪说。尽管如此，他那反复无常和模棱两可的政治态度仍然让社会党人感到担忧。²²

“显然，西班牙争取自治权利联盟的领导人并不认为自己是法西斯政党，”理查德·鲁宾逊在他那部关于西班牙右派的极其客观、资料翔实的著作中写道，“但是，在社会党人看来，右派内部教义信仰的细微差别并不重要。希尔·罗夫莱斯对正宗法西斯主义的消极评价与他们毫不相干；现实的问题是：希尔·罗夫莱斯的真正目的是什么？实际上，他已经接受了共和国并且坚决主张以合法、民主的方式通过选举获取政权，寻求发展；但是，掌握了政权之后，他会怎么做呢？……西班牙争取自治权利联盟的终极目标是建立一个以天主教社团原则为基础的国家。这个国家应当是在以宪法和民主的方式向自由-民主体制过渡的渐变过程中最终建立起来的。……然而，正如社会主义的实现将不可避免地导致禁止天主教参政那样，只要天主教社团主义的实现仍将意味着社会主义的末日，社会党人就无意区分法西斯主义与演变的天主教社团主义之间有什么不同。”²³

虽然希尔·罗夫莱斯拒绝考虑采取暴力手段并且否认自己与法西斯主义有关联，但是，他在一九三三年竞选活动最紧张时所发表的声明仍然使对手忧心忡忡：“我们必须创建一个新的国家。……我们是否为此付出血的代价有什么关系！我们需要一切权力。……民主对于我们来说不是目的，而是开始征服一个新的国家的手段。当时机来临时，要么议会表示同

意，要么我们让它消失。”²⁴

9 “尽管有朝一日将会废除自由议会制度历来都是[希尔·罗夫莱斯]所宣称的目标之一，”鲁宾逊写道，“但是，当他以如此赤裸裸的方式阐述这一目标时，仍然给人造成印象：这样做也许宜早不宜迟。……无论在其头脑中他自己的意图是否明确，在希尔·罗夫莱斯的社会党人对手看来，他的意图显而易见。……[一九三三年十一月，社会党左派领导人]拉尔戈·卡瓦列罗告诉社会党人：‘……敌人已经宣战了，他们通过希尔·罗夫莱斯之口表明，如果议会不为他们的目的服务，他们就将反对它。好吧，我们的回答是：我们正在合法地争取社会进步。但是，如果你们不愿这样，我们将发动暴力革命。……如果合法手段对我们没有什么好处，如果它妨碍我们前进的话，我们就将绕过资产阶级民主，继续通过革命手段夺取政权。’”²⁵

一九三四年十月四日，当阿尔卡拉-萨莫拉总统同意西班牙争取自治权利联盟所提出的派代表加入政府的要求时，社会党人宣布进行总罢工。罢工在所有地方都失败了，只有阿斯图里亚斯矿区除外。在那里，罢工得到无政府主义者和共产党人的支持，它很快发展成为一场夺取政权的斗争。斗争坚持了近两周之后，在摩尔人士兵和外籍军团的帮助下，当局将这场看上去好像无产阶级革命彩排和内战前奏的罢工镇压了下去。²⁶

这次镇压的手段残酷无情。某前任激进党议员是一名毫不妥协地反对左派的保守共和派人士，他写道：“被告在监狱里受到严刑拷打；囚犯不经审判便在监狱的院子里被处决，在那十六个月当中，对于警察实施的迫害和暴行，人们以眼不见为净。官方宣称，只有三个人被处决。多仁慈啊！但是，成千上万的人身陷囹圄，成百上千的人死于非命、受到拷打、成为残废。应当受到诅咒的残忍啊！不要紧，我们还有可悲的镇压利弊分析报告，那可是非常严谨的，报告显示，镇压的手段合法、干净而且正当，它在很大程度上减轻了国家受到的危害。”²⁷另一位自由主义历史学家写道：“将要成为[一九三六年]内战特征的各种形式的狂热和残忍都在[一九三四年]十月革命期间及其之后出现过：被不时出现的红色恐怖毁掉的乌托邦革命；利用‘治安部队’进行的有计划的血腥镇压。”²⁸

由于这场镇压所引起的报复情绪，²⁹由于城镇乡村工人与雇主的相互敌

意，最后一点，由于左右两派势力之间无法妥协的对抗冲突，一九三六年二月人民阵线获得大选胜利后，人们在持续的骚乱中度过了春天和初夏，双方的挑衅和反击使骚乱愈演愈烈。何塞·安东尼奥·普里莫·德·里维拉的西班牙长枪党为暴力行为的升级火上浇油，一九三六年三月十二日，在长枪党歹徒为对三月六日几名党员被打死进行报复而企图行刺著名律师和温和社会党人议员路易斯·希门尼斯·德·阿苏亚之后，³⁰政府取缔长枪党并且逮捕了其领导人。³¹不过，这一措施完全没有收到效果，因为长枪党继续存在甚至暗中有所发展，而且，据一位右翼历史学家说，它还“作为一种催化剂对于统一这个国家某些特定人群正在不断增强的反抗意志起到了促进作用”。³²

实际上，处于困境中的以自由主义的左翼共和派领导人曼努埃尔·阿萨尼亚为总理的政府所采取的平息事态的各项措施没有一项达到目的，因此，在损害公民自由的情况下，大选过后所宣布的警戒状态月复一月地延长了下去，这是一种没有戒严令那么严厉的安全警戒形式。日复一日，周复一周，暴力和喧闹的场面层出不穷：群众集会和示威活动；纵火和破坏，包括焚烧教堂和教会学校；查封党派和工会总部；没收和试图没收财产；聚众闹事并与警察发生流血冲突；暗杀和反暗杀。³³“由于部长们担心暴力活动继续蔓延，政府审查人员试图禁止报道关于罢工和暗杀的消息，”弗兰克·E.曼努埃尔证实，“日报的副本必须火速送往官方的新闻部门接受审查：被删除的部分变成空白或者以断断续续的文字形式出现。几天后才送到马德里的巴黎《时报》经常比西班牙首都的报纸所刊登的消息更多。因为没有官方的统计资料，只有在找来一批地方报纸翻到标明‘社会冲突’的版面时，人们才能充分了解工人不满的广泛程度。”³⁴

“所有人都清醒地意识到，”一名共和派军官写道，“西班牙正坐在一个火山口上，它根本不是一个幸福欢乐的国家。”³⁵

在这种混乱的局面下，一九三六年七月十七日，军事叛乱在西属摩洛哥爆发，内战开始了。叛乱得到大部分警察的支持，得到君主主义者和长枪党的支持，得到金融界和商业界的支持，得到大多数天主教神职人员的支持，得到大地主的支持，得到中小业主、佃户、佃农以及那些被农场工人所提出的过分要求激怒了的垦殖民的支持，它还得到城市中产阶级中较

为成功的那一部分人的支持。不像通常想象的那样，由于生活在不同地区的一般农民的财产关系千差万别的多样性，农村的人们不仅仅把内战看作拥有土地的贵族与没有土地的农民之间的冲突。正如爱德华·马莱法基斯所说：“西班牙问题的与众不同之处是，没有向一方或者另一方提供大力支持

11 支持的农民内部始终存在着巨大的分歧，以致无法确定他们中的大多数究竟倾向于冲突的哪一方。……[其他国家的]内战……基本上可以被认为是农民反对其他社会群体的斗争。在西班牙，尽管此类斗争不是没有，然而，这场内战在相当大的程度上还将成为农民对农民的自相残杀。”³⁶

必须强调指出的是，这场叛乱的倡导者没有等待心理热度达到顶点便开始策划军事政变。据一位右翼历史学家证实，暴动的命令拟定于大选结束不久之后的一九三六年二月底，“在不难预见的时候，形势的发展将会使其势在必行”。³⁷同一位历史学家披露，自从一九三二年八月何塞·圣胡尔霍将军发动反对共和国的叛乱失败之后，政变的想法一直在君主主义者和军队领导人的头脑中萌动。³⁸在一九三七年十一月二十二日发表的一次演说中，拥护阿方索的君主主义派别西班牙复兴运动领导人安东尼奥·戈伊科切亚宣称，一九三四年三月，他和一些右翼领导人曾经策划过一场以军队反叛为后盾的政变。他与另外几名君主主义者一起访问了意大利，如果西班牙爆发内战，他们希望得到意大利政府的支持。³⁹一位目击者描述了西班牙君主主义者与墨索里尼举行的会谈，阿方索派和卡洛斯派均参加了这次会谈；另外，卡洛斯派的民兵司令安东尼奥·德·利萨尔萨·伊里瓦伦还提供了这次会谈所达成的一份政治和军事协议的副本——协议的原件现在与第二次世界大战所缴获的意大利文件一起存放于哥伦比亚特区华盛顿的美国国家档案馆。⁴⁰我们根据这一描述可知，协议的副本或文字记录不应带回西班牙，但是，戈伊科切亚违反其对墨索里尼的承诺，将他自己的协议草稿带回了马德里。内战期间这些草稿在马德里被人发现，使政变共谋者中唯一没能逃离共和派控制区的利萨尔萨非常不安。据利萨尔萨说，罗马协议并没有产生实际结果，因为一九三六年七月的叛乱是由军官发动的，跟与墨索里尼进行的谈判无关，⁴¹所以，西班牙最重要的内战历史学家之一里卡多·德拉·谢尔瓦认为，罗马协议的意义“被严重地夸大了”。⁴²不过，如同利萨尔萨所说，该协议帮助在罗马造成了“一种有利于叛乱的

气氛，从而使意大利在一九三六年七月二十七日比较从容地作出了支持[西班牙]军队的决定”。这可能是事实。⁴³

另外，据其传记作者描述，一九三二年那场叛乱未遂的领导人圣胡尔霍将军一直极力主张在一九三六年二月的大选之前发动一场政变。⁴⁴这个阴谋没有结果，但是，左派联盟在大选中获胜加强了右派领导人将其计划变成行动的决心。

实际上，正当第一轮投票的结果仍在陆续公布时——与其一起发表的还有关于试图越狱、游行示威、焚烧教堂以及革命者其他欢庆活动的报道，西班牙复兴运动的喉舌《阿贝赛报》就在二月十八日断言，一九三一年开始的革命将会继续走它的暴力路线，直到遭遇有力的反抗为止，反抗将“排除妥协通融的惯例以彻底解决的方式”进行。⁴⁵

二月十七日凌晨四点，第一轮选举刚一结束，希尔·罗夫莱斯叫醒了临时政府总理、新近形成的中间派领导人曼努埃尔·波特拉·巴利亚达雷斯。“我用寥寥数语向他描述了形势：无政府状态已在一些省份蔓延；地方行政官员纷纷挂冠而去；闹事的暴徒正在抢掠官方文件。⁴⁶如果不以铁腕采取紧急措施的话，西班牙的未来就有陷入悲惨境地的巨大危险。……我指出，‘必须给地方官员下达最为严厉的命令，在那些不得不进行新的选举和决胜选举的选区全力以赴采取行动’。”接着，波特拉给阿尔卡拉-萨莫拉打了电话。“我注意到，虽然总统批准在几小时之内宣布实行警备状态，但他当场拒绝了波特拉先生提出的立即宣布戒严令的建议。害怕发生军事政变？我不知道。事实是，没有采取任何可能制止诸多恶性事件发生的措施。……[我]悲哀地确信，最高层的权力人士既没有愿望也没有勇气制止威胁西班牙国家中心的危险发生。”⁴⁷

12

时任军队总参谋长的弗朗西斯科·佛朗哥将军对左派接管政权的后果忧心忡忡，当天晚些时候，他极力劝说波特拉宣布戒严令而不要把权力交给人民阵线。“‘我老了，我老了，’”据半官方的民族主义内战史描述，总理是这样回答的。“‘你提出的任务超出了我的能力。……它需要一个能力更强的人。……军队为什么不干呢？’‘军队目前缺乏执行这一任务所必需的道义上的一致性，’佛朗哥回答道。‘之所以需要你的干预，

那是因为你拥有高于波萨斯[国民卫队^①监察长塞瓦斯蒂安·波萨斯将军]的权力，而且你仍然可以动用大量国家资源，加上你所管辖的警察部门，此外还有我的合作，我保证，你不会失去我的合作。’波特拉显得焦虑不安。……‘暂时不要让我就这个问题作出决定。’他最后说。”⁴⁸

当时，君主主义者的领导人何塞·卡尔沃·索特洛强烈要求波特拉邀请佛朗哥将军“拯救西班牙”，但是没有效果。由于担心如果不把权力毫不拖延地交给人民阵线，左派的焦躁情绪可能失控，为了进一步逃避责任而且不愿陷入某种道德困境，波特拉于二月十九日辞职。以不想“刺激革命者”为由不敢宣布戒严令的阿尔卡拉-萨莫拉总统立即任命自由共和派的曼努埃尔·阿萨尼亚为政府总理。阿萨尼亚仓促组成了一个由自由共和派与温和共和派人士参加的内阁，代表人民阵线管理这个国家。⁴⁹

这一刻并非突如其来。据共产党领导人何塞·迪亚斯说，人民阵线的地方组织已经推翻了许多城市的市政当局，“不是通过法律手段，而是通过革命手段，将其置于共产党、社会党和左翼共和派的控制之下”。⁵⁰

为了保护自己免遭右派的攻击，阿萨尼亚政府立即采取措施控制关键的军队职位。佛朗哥将军被降职为偏僻的加那利群岛的驻军司令，他将在七月十七日成为摩洛哥叛乱的首领，后来又成为整个反叛运动的领导人；掌管至关重要的非洲军团的埃米利奥·莫拉将军被派到纳瓦拉省潘普洛纳的边远要塞，当地是卡洛斯派或王室正统派君主主义者及其狂热的民兵武装志愿军的活动中心，在那里，他被认为与世隔绝，但是实际上他可以从那里不受妨碍地指挥策划内地的叛乱行动，而且还能与对政府不满的纳瓦拉人合谋；⁵¹同时，国防部监察长曼努埃尔·戈代德将军被调到巴利阿里群岛担任并不重要的要塞司令一职。⁵²

13 “在二月二十二日和二十八日的大规模变动中，所有高级职务都给了或多或少被认为支持自由派共和政府的那些将军，”斯坦利·G.佩恩在他那部研究西班牙军队的鸿篇巨制中写道，“一九三六年春天，因为《[西班牙军事]年鉴》中列为将军的四百二十五名军人大部分处于不同阶段的退役状态，所以，在西班牙军队的现役军人花名册上，只剩下八十四位将军。

① 国民卫队（Guardia Civil）是建立于一八四四年的准军事性质的西班牙国家警察部队，主要维持农村地区的秩序并在边境地区和公路上巡逻，由陆军的一名将军指挥，但是隶属于内政部。

在拥有指挥权的这八十四个人当中，大多数持有温和的政治观点，而且经过最近几年一遍又一遍的筛选，基本上已经没有君主主义者或极端保守的将军了。当年三月，国防部几乎所有重要地区的指挥权和职位不是掌握在众所周知的亲共和派将军手中，就是掌握在对宪法具有责任感的将军手中。”⁵³

右翼历史学家比森特·帕拉西奥·阿塔德写道，阿萨尼亚政府所采取的措施深谋远虑，以致在西班牙按地理自然划分的八个大区中，只有一个大区的地方长官支持叛乱。此外，三位军队的监察长没有一位参与叛乱，非洲军团的高级职位也都由绝对可以信赖的人担任。“现役中拥有指挥权的两位最危险的高级将领佛朗哥和戈代德受海岛职守所限，实际上失去了活动能力。”与佛朗哥和戈代德一样在军队中具有支配地位的华金·范胡尔将军、何塞·恩里克·巴雷拉将军和路易斯·奥尔加斯将军被剥夺了指挥权，后面两位还被监禁起来。这样就保证了对军队高级职位的控制，帕拉西奥·阿塔德继续写道，政府想当然地认为，它“通过最有效的方法从上层控制了军队，这种方法以武装力量等级制度的效力为基础”。政府还采取了其他确保控制军队的措施。“虽然从三月到起义当天根据行政命令所进行的军事指挥权的变动都要受到审查，但是仍然出现过指挥权发生异常变动的迹象，其意义非常明显。当然，这些变动并未中断谋反活动的整个进程，只是引起了混乱并使那些深知自己重要性的人感到不安。”⁵⁴

三月中旬，指挥权的变动在军界引起严重的混乱，以致阿萨尼亚的国防部长卡洛斯·马斯克莱特将军为了安抚左派舆论而发表了下面这份新闻公报：“据国防部了解，一些有关在职以及未被任命的军官的精神状态的谣言正在不断流传。可以肯定地说，这些谣言虚假无据，毫无疑问，它们容易造成公众的不安，激起对军队的敌意，如果不予消除的话，还将破坏作为军队根基的纪律。本国防部长荣幸地宣布，所有在职以及未被任命的军官，从最高级别到最低的职位，保证遵守最严格的纪律，随时准备认真履行他们的义务并且——毋需赘言——服从合法政府的命令。”⁵⁵

但是，这份新闻公报并没有减轻左派的忧虑。社会党执委会机关报《社会主义者》声称，它的情报部门已经向它提供了“令人担忧的消息”，因此，轻视在营房、街头和政治中心散发的传单上的那些“带有威

胁性的不祥内容”将是危险的。⁵⁶

尽管谋反者对政府采取的措施有所顾虑，但是，他们实施计划的劲头却丝毫未减。考虑到普遍流行的恐惧担忧，而且由于右派和中间党派至少得到了半数选票，似乎可以相信，他们最终有望得到大部分民众在精神和物质上的支持。⁵⁷

土地拥有者担心中-右政府为停止共和国前两年进行的土地改革而使在一九三三年十二月以后所采取的各项措施将被废除。实际上，人民阵线已经在其竞选纲领的第三部分承诺废除其中的两项，⁵⁸即，规定向卷入一九三二年八月圣胡尔霍叛乱的地主退还地产的法律⁵⁹和土地租赁法，⁶⁰后者导致八万名佃农在最初两个月被驱逐。⁶¹

城镇和农村地区大大小小的雇工者担心，将会再次恢复那些确立劳动仲裁制度、确定工资制度和工作条件的法律，这些法律不是已经遭到废除和破坏，就是已被批准停止实施。实际上，人民阵线竞选纲领的第七部分宣称，将“在最纯粹的原则意义上”恢复劳动立法。

教会担心，宪法中被人漠视的反教权主义条款将会重新受到重视，因为人民阵线竞选纲领的第八部分宣称，“共和国必须将教育制度视为国家不可偏废的职能”。关于中-右势力获得一九三三年大选胜利之后的形势，萨尔瓦多·德·马达里亚加写道：“耶稣会教士继续执教：阿萨尼亚打算在新的学校用世俗教育取代宗教教育的计划被搁置，而且通过一项法律，作为共和国的一桩善举，同意拨款支付神职人员一九三四年三分之二的薪金，这在政治上也许是明智的，但是却有违反宪法之嫌。”⁶²由于四月二十八日只有社会党和共产党议员投票支持一项停止支付神职人员薪金的提案而使提案遭到否决，人民阵线赢得大选之后组成的阿萨尼亚政府最初在这个问题上小心行事。⁶³但是，五月十九日组成的由左翼共和派人士弗朗西斯科·J.巴尔内斯担任公共教育部长的新政府揭开了旧的伤疤。“阿萨尼亚政府曾于二月二十八日指示检查人员巡察宗教团体管理的学校。”理查德·鲁宾逊写道，“据说，这些检查人员经常自作主张关闭学校。然而，随着巴尔内斯的上任，关闭宗教团体管理的学校以及非法将私立学校收归国有实际上似乎成为官方的政策。西班牙争取自治权利联盟成员组织[Cedista]的代言人要求，除非公立学校有地方安置宗教学校的学生，否则不

要关闭它们。公共教育部长回答说，天主教徒现在必须为一九三三年以来他们没有大力发展公共教育体系的失职罪过受到惩罚。六月四日，由于公共教育部长的侮辱性言论像他的政策一样‘令人无法容忍地冒犯了这个国家天主教徒的良知’，西班牙争取自治权利联盟决定暂时退出议会。西班牙争取自治权利联盟的成员组织继续抗议宗教迫害，政府则继续推行其世俗化政策。”⁶⁴

此外，因人民阵线获胜以后公众对军队表现出的敌意⁶⁵而焦虑不安的右翼甚至温和派军官担心，他们对共和国军事改革的不满如今又没有人正视了。共和国政府前两年[一九三一年至一九三三年]的总理兼国防部长曼努埃尔·阿萨尼亚开始实行军事改革，后来被中-右政府在一定程度上所纠正。⁶⁶

最后，所有中-右势力都担心，即使阿萨尼亚组成的自由派政府想在人民阵线竞选纲领——他保证履行这个纲领，“连一个逗号、句号都不会改”⁶⁷——的框架范围之内行事，广大工人阶级和农民也一心想要突破它，他们受到大选胜利的鼓舞，而且似乎忘记了失败者的可怕力量；中-右势力还担心，根据已经控制了国家的革命者的热情判断，事态的发展只能用武力来扭转，或者像一本赞成军事叛乱的历史书籍所说的那样，只能通过“一次外科手术”来扭转。⁶⁸

曼努埃尔·阿萨尼亚总理很快就明显地表现出来，他对缓和左派的革命狂潮无能为力。的确，他在一九三六年二月出任政府首脑时曾宣称，他希望“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治理国家“而且不搞危险的试验”；⁶⁹四月三日他还在议会谴责了正在使其政府感到难堪的暴力行为和掠夺财产的行为。⁷⁰但是，如同《太阳报》在三月二十八日所指出的那样，他的政府每天都承受着来自极左派的越来越大的压力，极左派不仅要求履行人民阵线竞选纲领的基本内容——他们达到了这一目的——而且经常催促采取一些迟迟没有采取的措施。“这不符合总理谨慎克制的策略。”《太阳报》评论说，“没有人对此表示怀疑，但是，现在他能做什么呢？”

从阿萨尼亚在内战爆发三个月之前的四月十五日向议会发表的演说来看，显然，他已经觉察到将要发生大屠杀：“我非常清楚，暴力，由于它在西班牙人的性格中根深蒂固，所以不可能因为法律而绝迹，不过，我最深切地期待的是，可以宣告西班牙人愿意停止互相残杀的那一刻。大家不

要把这些话当做无能的表示，或者认为这是一个被危险——危险包围着委托他去捍卫的那个政权——吓得畏缩不前的懦夫的胡言乱语。不！我们不是来这里指挥一场内战的，相反，我们是来避免内战。”⁷¹

尽管显示出这样的信心，阿萨尼亚实际上已经精疲力尽，而且已经灰心丧气。“聪明老练的阿萨尼亚应该精明地治理一个国家而不是饱受政治动荡的折磨，他失去了经受磨难的力量。”著名的知识分子、阿萨尼亚的党内同志克劳迪奥·桑切斯-阿尔沃诺斯说，“我曾看见他颓然倒在扶手椅里，精疲力尽，一动不动。‘阿尔沃诺斯，我再也受不了了！这是个什么国家呀！这是种什么局面啊！’”⁷²

16 事实证明阿萨尼亚应付不了这种局面，斯坦利·G.佩恩写道：“也许因为无法确定军队是否可以成为一种可靠的镇压手段，总理失去了遏制极端分子的决心。阿萨尼亚不愿或者不能利用秩序的力量维持秩序在军队和国民卫队、甚至在突击卫队^①中引起了强烈的不满。军官团中年轻的活跃分子更愿意支持少数不满的高级将领而不是与那些打算对礼坏乐崩的混乱局面一笑置之的资深共和派将领为伍。”⁷³

好斗的何塞·卡尔沃·索特洛是西班牙复兴运动和同时代表阿方索和卡洛斯两派君主主义者的民族阵线（Bloque Nacional）的议会领袖，在他的带领下，君主主义者尽其所能利用了正在到处蔓延的骚乱。“如果一个国家不知道如何保证秩序、安定和所有公民的权利的话，”卡尔沃·索特洛一九三六年四月十五日在议会宣称，“那么，这个国家的代表应当辞职。”他在随后的演说中发出警告：“我们看一看俄罗斯和匈牙利，我们阅读回顾一下它们最近的历史，我们因此而知道，那是一场悲剧，对于匈牙利，悲剧是短暂的，对于俄罗斯，悲剧仍在继续，我们希望西班牙不要发生那样的悲剧。于是我们对政府说，这个任务交给它了，我们还对政府说，为了完成这个任务，它肯定不会失去在座这些人的选票或支持。啊！但是，如果政府表现得软弱，如果它犹豫不决……我们必须站起来在这里大声说，我们准备采取一切手段进行反抗，我们要说的是，资产阶级和各

① 突击卫队（Guardia de Asalto）是西班牙第二共和国一九三一年建立的特种警察部队，主要用来对付城市里的暴力活动。突击卫队身穿蓝色制服，性质类似于身穿绿色制服、维持农村秩序的国民卫队。

种各样的保守派人士此前在俄国遭受的那种被人灭绝的命运、那种毁灭性的悲剧决不会在西班牙重演。”⁷⁴

理查德·鲁宾逊在他那部关于这一时期的内容详实的历史著作中写道，右派开始相信，持续的混乱和普遍的罢工是某个计划的组成部分，这个计划打算造成作为革命先决条件的经济崩溃。“六月十一日，西班牙争取自治权利联盟的卡拉斯卡尔断言，内政部长已经完全失去了对国家的控制；[各省]省长正在独立于内阁行事，市长独立于省长行事，民众则在为所欲为。政府第二天发表的一份[公开呼吁省长和市长制止武装起来的派别夺取行政权力的]声明表明，卡拉斯卡尔所说基本属实。”⁷⁵

精力充沛、雄心勃勃的西班牙争取自治权利联盟领导人希尔·罗夫莱斯有担心忧虑的特殊理由，因为他的大批对大选结果及其非暴力主张感到失望的追随者不是公然背弃了他，就是如他本人所证实的那样，“开始帮助主张武力解决问题的其他[右翼]政党，尤其是西班牙长枪党”。⁷⁶的确，他曾经在一九三三年十一月大选之前的竞选活动中威胁说，如果不能通过民主方式征服这个国家，他就要废除议会制，但是，在中-右党派赢得大选之后，为了实现他的天主教社团国家^①的理想，不顾君主主义者的指责及其名为青年人民行动（JAP）的青年运动要求采取暴力行动的越来越大的压力，他为进化论而不是独裁手段进行辩护。⁷⁷军事叛乱的支持者里卡多·德拉·谢尔瓦明确地说：“当希尔·罗夫莱斯[在一九六八年四月十七日的《终极日报》上]用下面这一段话描述[阿方索派君主主义报纸《阿贝赛报》的老板]卢卡·德·特纳的立场时，他完全是正确的：‘他不相信法律手段；他把我在共和政体之下为争取生存和治理的权利所作的努力视为对君主政体的破坏，而且他还笃信，诉诸武力将更有效地帮助实现他的理想。……由于这个原因，他总是鼓吹暴动，尽其所能配合暴动的准备工作，在他的报纸上给[反叛]运动以最大的支持。’这一段话同样普遍适用于君主主义者当中的激进分子。”⁷⁸

即使是在一九三五年五月担任国防部长之后，希尔·罗夫莱斯仍然拒绝借助军队和君主主义者的力量夺取权力，⁷⁹在未来的岁月里，他们不会原

^① 社团国家（corporative state）指的是由国内主要产业部门中的雇主和雇工组成经济团体并由这些团体进行治理的国家。

谅他的拒绝。一九三六年，面对越来越多追随者的背弃，尤其是青年运动追随者的背弃——据长枪党的一位领导人说，当年一月至七月，这些年轻人“几乎全部”加入了长枪党；⁸⁰面对巴伦西亚右翼运动——这是西班牙争取自治权利联盟的一个主要组成部分——准备采取暴力行动的决定，⁸¹四月十五日，希尔·罗夫莱斯带着不祥的预感在议会发表演说：“不要欺骗自己，议员先生们！我向你们保证，代表了至少一半国民的公众舆论的主流不会听任死亡不可避免地降临。即使不能通过某一种方法保护自己，他们也会通过另一种方法保护自己。面对一方采取的暴力，另一方有权采取暴力，于是，政府将在一场内乱中扮演可怜的旁观者，这场内乱将从精神和物质上毁掉这个国家。一方面，那些想要继续通过革命方式夺取政权的人的暴力行为正在挑起内战，另一方面，一个不敢对其支持者表示不满的政府的冷漠正在培育、支持、怂恿内战，它的支持者正在迫使它为他们所提供的帮助付出非常惨重的代价。”⁸²

据希尔·罗夫莱斯本人承认，尽管意识到“法西斯主义正在严重损害西班牙争取自治权利联盟的情况下迅速蔓延”，⁸³他仍然坚持非暴力立场并于一九三六年五月十九日在议会宣称：“组成我们这个党派的那些人——我以他们的名义发言——既不可能对法西斯主义意识形态产生兴趣，也不可能与之发生任何关系。你们必须明白，我说这些不是为了博得你们的好感——我知道你们决不会对我有好感；我说这些是因为这符合我本人和我们党的某种深刻的信念。纯粹从国家的角度看，一个贴着外国标签而且与西班牙人民的性格和传统不协调的政治运动几乎不可能对我们具有吸引力；只要思考一下某些关于国家的极权主义学说的哲学含义，我们就不能不注意到，它们充满了与我们的教义信念深刻对立的哲学和政治的泛神论……；只要我们考虑策略问题，作为信徒，无论如何我们不能接受其唯一目的就是暴力夺取政权的那些手段。”⁸⁴

18 作为对希尔·罗夫莱斯非暴力立场的回应，长枪党的地下报纸《无所谓》六月六日写道，这是“卑鄙地企图以和平解决的诱惑麻痹人民。任何和平解决的办法已不复存在”。⁸⁵毫无疑问，长枪党的过分自信不仅归因于它对普通百姓不断增强的影响力，而且归因于里卡多·德拉·谢尔瓦所说的那种情况，“由于[长枪党]党员或支持者的数量在年轻指挥官和低级军官

中日益增多”，长枪党“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谢尔瓦指出，这是“暴动的年轻化特征”的又一个证明。⁸⁶“最重要的是认识到，”里卡多还写道，“军队中暴动支持者的平均年龄远远低于效忠政府的人的年龄。”⁸⁷

“整个形势令人担忧，”希尔·罗夫莱斯在回忆录中写道，“我确信，必须竭尽全力避免右派走上暴力之路……，然而现实却是，为了遏制正在使我们流血的无政府状态除了独裁别无他途，这种信念逐渐在所有人心目中扎下根来。再没有人真心相信还可能恢复正常的民主状态。”⁸⁸于是，在君主主义者领导人卡尔沃·索特洛被杀害后的七月十五日，希尔·罗夫莱斯对议会常务委员会说：“当我国公民的生命任凭一流的枪手摆布时，当政府无力制止这种事态时，不要幻想人民会相信法律或民主。放心吧，他们将会沿着暴力之路一步一步走下去，我们当中那些不会鼓吹或者利用暴力的人慢慢将被另外一些更加大胆、更为狂热的人所取代，他们将会利用这种强烈的国民情绪。”⁸⁹结果，这是他在西班牙发表的最后一次演说。

尽管希尔·罗夫莱斯在回忆录中坚称，他希望继续在法律体系的约束下行事；他从来不是军事政变的支持者；由于他反对暴力，暴动组织者并没有将他们的准备情况随时通知他；他为了避免内战竭尽了全力；西班牙争取自治权利联盟和他本人均没有“具体参与叛乱的准备，即使某些成员最初曾经予以配合”；负责半岛叛乱计划的莫拉将军提出建议，要求全体右派议员七月十七日齐聚布尔戈斯宣布政府和议会非法，他拒绝了莫拉的建议；而且，他的大部分追随者只是在暴动发生以后才支持暴动的，⁹⁰但是，他本人提供的大量证据表明，他不仅仅是袖手旁观，而是间或积极参与了军事叛乱的阴谋，即使不是满怀热情。

他在回忆录中写道，几乎每天都有同志或者地方上的党代表前来向他讨教。“我给他们同样的建议：在不涉及党的情况下凭良心自主行事；与军队建立直接的联系；不要组建自己的民兵组织，但在叛乱发生时，必须等待具体的指示。”⁹¹他还承认，一九三六年七月初，一些党员请求他把剩

19

款现在只能遗憾地用于防止出现无政府状态。”⁹²

此外，在一九四二年二月二十七日流亡于葡萄牙时所签署、多年之后才披露的一份文件中，希尔·罗夫莱斯声明，一九三六年大选以后使用武力恢复公共秩序是合法的。“无法想象除了军事手段还有其他解决办法，因此，西班牙争取自治权利联盟准备给予一切可能的支持。我通过提出建议、通过道义支持、通过秘密指示予以配合、而且通过从党的竞选资金中拿出不菲的数额作为经济资助等一系列方式提供了合作。”⁹³

不过，由于知道西班牙争取自治权利联盟正在分裂，他在给予这些支持时似乎显得三心二意；另外，如同一位支持叛乱的重要历史学家所说，他拒绝接受莫拉将军要求全体右派议员七月十七日齐聚布尔戈斯宣布政府和议会非法的建议也使他受到谋反者的“蔑视”。⁹⁴“我的拒绝显然使我在与叛军打交道时处境艰难。”希尔·罗夫莱斯证实，“直到最后一刻我仍然谨慎地尽量远离一切具有煽动暴力之嫌的事情。考虑到五年来我一直提倡以合法行动作为公共行为的唯一方式这一客观事实，企图通过任何与我轮廓清晰的人生轨迹相悖的行为保护我的政治生命并不合适。”⁹⁵

一九三六年二月，希尔·罗夫莱斯的政党在议会占有的席位比其他任何党派都要多，但是，由于他的暧昧立场，同时由于内战爆发以后军方更希望与“老政客”的政策断绝关系，⁹⁶仅仅过了五个月，他便逐渐被人遗忘。当然，从他的非暴力政策导致大批追随者转投长枪党并且导致中产阶级对暴力和法西斯主义解决方案更感兴趣那时起，他在政坛的失势似乎已经不可避免。六月十二日，笔名“加谢尔”的《先驱报》社长阿古斯丁·卡尔韦特——他被认为是曼努埃尔·阿萨尼亚政治上的同情者——指出了对法西斯主义意识形态日益增长的支持以及二月大选以后整个政治形势所发生的惊人变化。他指责人民阵线自己造成了法西斯主义的威胁，他问道：

在最近的大选中有多少选票投给了法西斯分子？数字可笑得不值一提。人民阵线获胜之后，如果我们在西班牙拥有一个关心全国人民的共同利益并且能让大家——从它自己的支持者开始——服从其意志的有效政府的话，一小撮法西斯分子将不复存在，他们将被现实的力

量化为齑粉。如今，恰恰相反，从西班牙归来的旅游者说：“那里的人个个都在变成法西斯分子。”什么东西改变了？什么事情发生了？难道是人们突然进行了深奥的政治学研究并在广泛阅读和大量对比之后得出了“法西斯政权是所有政权中最好的政权”的结论，这可能吗？不，朋友，不是这样！……正在发生的只不过是，人们无法在那里生活，那里没有政府的管理。由于罢工和冲突，由于局势不稳和破坏，由于数不清的日常烦恼——更不用说犯罪和暗杀的企图——许多公民感到厌倦和愤慨。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出于本能寻找某种救助和出路，接着，由于他们找不到，他们逐渐开始渴望出现一个在其统治之下至少可能找到救助和出路的政权。以极端方式镇压那些令人无法容忍的过火行为的会是哪一类政权呢？独裁政权，法西斯政权。因此，无意中，几乎没有意识到，人们“觉得”自己成了法西斯分子。他们不把独裁政权的弊害当回事，认为那是正常的。以后，当不得不忍受独裁政权的弊害时，他们将会认清它们，接着还将为它们而烦恼。但是在当下，对于这一类强势政府，除了那些用来摆脱眼前令人烦恼的、无法忍受的不法状态的绝对有效的手段之外，他们什么也看不见。⁹⁷

注释：

- 1 见《西班牙共和国雇佣合同》，第18页。
- 2 萨尔瓦多·德·马达里亚加，《西班牙》，第513页。另请参阅爱德华·E.马莱法基斯《西班牙的土地改革和农民革命：内战的起因》，第366—367页；安东尼奥·拉莫斯·奥利维拉，《现代西班牙的政治、经济和人，1808—1946》，第493页；理查德·A.H.鲁宾逊，《佛朗哥西班牙的起源：右派、共和国和革命，1931—1936》，第204—205页。
- 3 何塞·安东尼奥·普里莫·德·里维拉，《在议会的发言》，第224页。
- 4 “社会主义者控制的那些混合陪审团[劳动法庭]造成了混乱。萨拉曼卡省的陪审团只允许雇用[社会党工会组织]劳动者总工会的会员而且不许解雇他们。收割庄稼的工人一天工作八个小时可以挣到十二个比塞塔，同时因为收获季节加班加点不可避免，他们的日工资高达十九点六五比塞塔，超过了城市的技术工人。由于粮食价格的下跌，小块土地拥有者根本付不起这笔钱，结果，他们也加入了失业劳动力的行列。”（鲁宾逊，《佛朗哥西班牙的起源》，第121页）“混合陪审团的法律旨在从根本上废除已在西班牙的农村地区通用了几百年的饥饿工资制。”知识分子型的社会党左派政治家路易斯·阿拉基斯塔因写道，“共和国建立时，流行的工资标准是从日出到日落工作一天挣一个半到两个比塞塔，而且

一年只有五六个月能挣到钱。其余时间几乎肯定要失业。由于混合陪审团确定了劳动合同，甚至就在共和制的第一年，农业工人的日平均工资便提高到了五至六个比塞塔，而且在收获季节高达八至十个比塞塔，某些地区还要高。”（一九三四年四月号《外交季刊》）

- 5 作为最全面的关于人民阵线的三部著作，见维克托·阿尔瓦的《人民阵线》，桑托斯·胡利亚的《西班牙人民阵线的起源，1934—1936》和哈维尔·图塞尔·戈麦斯的《西班牙人民阵线的大选》；另请参阅本书第八章。
- 6 作为对西班牙争取自治权利联盟最全面的研究——关于它的结构、它的各个党派成员、它在不同地区的势力、它的意识形态以及它对劳工和土地改革的态度，见何塞·R.蒙特罗一千五百页的不朽之作《西班牙争取自治权利联盟》，第一卷和第二卷。
- 7 希尔·罗夫莱斯的声明，载昆卡《卫报》，被蒙特罗在《西班牙争取自治权利联盟》中引用，见第二卷，第206页。
- 8 一九三六年三月六日《论坛报》。
- 9 “在五月一日与内战爆发的七月十八日之间的两个半月时间里，劳工部记录了一百九十二次农业罢工，这与一九三二年全年的罢工次数一样多，几乎达到一年到头麻烦不断的一九三三年的罢工次数的一半。这些罢工大部分比以前的规模大。”（马莱法基斯，《西班牙的土地改革和农民革命》，第371页）
- 10 《农业工人报》抗议政府拖拖拉拉的几篇社论可以在一九三六年三月二十八日、四月十一日和十五日的几期报纸上找到。作为对于这场在内战之前几个月发生的农村危机的最出色的研究，见马莱法基斯《西班牙的土地改革和农民革命》，第364—387和375—378页。作为一九七〇年出版的关于欧洲历史的最佳书籍，该书获得美国历史学会颁发的亚当斯奖。在用所有语言写成的论著中，这部权威性的著作提供了关于内战之前那几年西班牙土地所有权、土地改革和农民革命的最详尽的研究。
- 11 何塞·迪亚斯的演说，见何塞·迪亚斯《斗争的三年》，第162页。
- 12 马莱法基斯——如同本章注释10所述，他对内战之前的农村危机进行了最详尽的研究——认为九十个村庄这一数字有所夸大（《西班牙的土地改革和农民革命》，第369页，注释17）。
- 13 塞萨尔·法尔孔的文章，载一九三六年五月九日《国际通讯》（法文版）。另请参阅佩德罗·切卡发表在同期《国际通讯》（法文版）上的文章；E.巴尔加分别发表在一九三六年六月四日《国际通讯》（法文版）、一九四四年十月十六日西班牙流亡者刊物《社会主义者》（阿尔及尔）、一九三六年四月十五日《泰晤士报》（作为驻马德里的通讯记者）上的文章；杰拉尔德·布雷南，《西班牙迷宫》，第312页；何塞·马利亚·卡波，《赤裸的西班牙》，第97—89页；霍斯福尔·卡特发表在一九三六年四月二十九日《听众》周刊上的文章；何塞·普拉，《西班牙第二共和国史》，第四卷，第356—357页；拉莫斯·奥利维拉，《现代西班牙的政治、经济和人》，第539页。卡波的著作因马塞利诺·多明戈——他在一九三六年二月大选之后组成的政府中任教育部长——所作的推荐性序言而具有更大的影响力。
- 14 保罗·尼松的文章，载一九三六年八月一日《国际新闻通讯》。虽然这篇文章发表于八月，但它是在内战爆发之前撰写的。
- 15 马莱法基斯，《西班牙的土地改革和农民革命》，第373—374页和第383页，注释69。另请参阅萨尔瓦多·德·马达里亚加《西班牙现代史》，第452—453页；右翼的农民党议员何塞·马利亚·锡德在西班牙议会的发言，他对农村形势的看法见一九三六年七月一日《议会会议记事》，第1743—1753页；里卡多·德拉·谢尔瓦，《西班牙内战史》，第697页。
- 16 限于本章简短的篇幅，只能对汹涌澎湃的罢工浪潮作一个粗略的描述；即使列举所有罢工也将需要大量篇幅。这里所作的一般描述基于下列西班牙报纸的报道：《前进报》（萨

- 拉曼卡），《战斗报》（巴塞罗那），《光明报》（马德里），《每日图片报》（巴塞罗那），《布尔戈斯日报》（布尔戈斯），《自由报》（马德里），《工人世界报》（马德里），《新闻报》（萨拉戈萨），《政治报》（马德里），《社会主义者》（马德里），《太阳报》（马德里），《工人团结报》（巴塞罗那）和《联合报》（塞维利亚）。据马莱法基斯说，从一九三六年五月一日到七月十七日，发生了七百一十九次工业工人罢工，比之前任何一年全年的次数还要多，见《西班牙的土地改革和农民革命》，第371页，注释31。
- 17 一九三六年三月一日《马德里官方公报》。
- 18 实例见各雇主协会联合签名的宣言，载一九三六年三月一日《太阳报》；另请参阅华金·阿拉拉斯《西班牙第二共和国史》，第四卷，第79—80页；《调查一九三六年七月十八日政府违法行为的委员会报告》，第54—55页；鲁宾逊，《佛朗哥西班牙的起源》，第269页。自由主义历史学家加布里埃尔·杰克逊说：“无政府主义歹徒偶尔逼迫一些雇主雇用从来没有做过他们雇员的人。”（《西班牙共和国与内战，1931—1939》，第213页）
- 19 《力拓有限公司：第六十三次例行全体会议的年度报告》，第7页。
- 20 一九三七年一月二十日塞维利亚《阿贝赛报》。
- 21 除了当地的报刊之外，关于这场罢工以及社会主义工会组织与无政府工团主义工会组织之间冲突的描述见阿拉拉斯《西班牙第二共和国史》，第四卷，第327—329页；皮埃尔·布鲁埃和埃米尔·特米姆的《革命与西班牙内战》，第79—80页；胡安·戈麦斯·卡萨斯，《西班牙无政府工团主义运动史》，第200—202页；桑托斯·胡利亚，《西班牙社会主义工人党的左派，1935—1936》，第256—264页；另请参阅爱德华多·德·古斯曼发表在一九七六年七月十九日《胜利报》上的文章。
- 22 感谢以下资料来源为我提供了有关这一时期的信息：阿拉拉斯，《西班牙第二共和国史》，第四卷，第441—467页；雷蒙德·卡尔，《西班牙，1808—1939》，第626—636页；何塞·马利亚·希尔·罗夫莱斯，《不可能和平》，第134—141页；杰克逊，《西班牙共和国与内战》，第121—168页；亚历杭德罗·勒鲁，《逸事》，第260—265页；马达里亚加，《西班牙现代史》，第421—443页；拉莫斯·奥利维拉，《现代西班牙的政治、经济和人》，第487—547页；鲁宾逊，《佛朗哥西班牙的起源》，第134—192页；休·托马斯，《西班牙内战》（一九六五年修订版），第112—124页。
- 23 鲁宾逊，《佛朗哥西班牙的起源》，第135页。
- 24 引自鲁宾逊《佛朗哥西班牙的起源》，第140页。
- 25 同上，第141—142页。
- 26 关于十月叛乱的描述见本章注释22所引资料来源，另请参阅阿德里安·舒伯特《走向革命：阿斯图里亚斯地区工人运动的社会根源，1860—1934》。
- 27 克拉拉·坎波亚莫，《一个共和派所看到的西班牙革命》，第71—72页。
- 28 杰克逊，《西班牙共和国与内战》，第167页。
- 29 实例参见共产党总书记一九三六年四月十一日所发表的演说，演说要求逮捕并且处决勒鲁和希尔·罗夫莱斯，转引于迪亚斯，《斗争的三年》，第162页。
- 30 谢尔瓦，《西班牙内战史》，第693—694页；斯坦利·G.佩恩，《长枪党》，第99—100页。
- 31 佩恩，《长枪党》，第100页；鲁宾逊，《佛朗哥西班牙的起源》，第387页，注释97。
- 32 比森特·帕拉西奥·阿塔德的文章，见帕拉西奥·阿塔德等《接近真实的西班牙内战史，1936—1939》，第151页。另请参阅斯坦利·G.佩恩《现代西班牙的政治和军队》，第316页。
- 33 为了概括地叙述这些事件，除了查阅本章注释16所提到的那些报纸之外，我还查阅了下列书籍资料：阿拉拉斯，《西班牙第二共和国史》，第四卷，第66—67、82—89、114—115、122—137、186—189、205—208、228—230、323—368和371—373页；布鲁埃和

特米姆，《革命与西班牙内战》，第65—82页；《基本原因：西班牙的赤色统治》，第13—24页；谢尔瓦，《西班牙内战史》，第692—740和792—795页；迪亚斯，《斗争的三年》，第172—173页；何塞·迪亚斯·德·比利埃加斯，《解放战争，1936—1939》，第一卷，第420—457页；希尔·罗夫莱斯，《不可能和平》，第630—707、748—758和761—765页；《西班牙内战与革命，1936—1939》，第一卷，第92—93和102—103页；杰克逊，《西班牙共和国与内战》，第196—232页；勒鲁，《逸事》，第464—477页；K.П.迈达尼克，《民族革命战争中的西班牙无产阶级，1936—1937》，第64—66页；斯坦利·G.佩恩，《西班牙革命》，第185—214页；普拉，《西班牙第二共和国史》，第四卷，第290—300、311—323、341—356、375—383和411—422页；因达莱西奥·普列托，《西班牙的动乱》，第一卷，第157—162页；第三卷，第133—134和144页；拉莫斯·奥利维拉，《现代西班牙的政治、经济和人》，第539—541和546—547页；鲁宾逊，《佛朗哥西班牙的起源》，第274—275页和392—393页，注释149；卡洛斯·塞科·塞拉诺，《西班牙史：西班牙语民族通史》，第六卷，第128—145页；托马斯，《西班牙内战》（一九六五年修订版），第136—154和170—177页。

- 34 弗兰克·E.曼努埃尔，《现代西班牙政治》，第168页。
- 35 何塞·马丁·布拉斯克斯，《我帮助建立了一支军队》，第67页。
- 36 爱德华·E.马莱法基斯，《西班牙的农民、政治和内战，1931—1939》，见罗伯特·J.贝祖查编，《现代欧洲社会史》，第192—227页。
- 37 费利佩·贝尔特兰·格尔，《民族起义的准备和发动》，第116页；另请参阅谢尔瓦，《西班牙内战史》，第763—764页。据这场叛乱的官方史——华金·阿拉拉斯编，《西班牙圣战史》——披露，三月初举行了一次将军会议，旨在“为一场行动做准备，这场行动将会防止国家出现因事态发展让人感到担心的极其危险的局面”，见第二卷，第467页。另请参阅阿拉拉斯，《西班牙第二共和国史》，第四卷，第94—95页；曼努埃尔·戈代德（巴塞罗那叛乱领导人戈代德将军之子），《一个百分之百的“小集团”》，第26页。
- 38 贝尔特兰·格尔，《民族起义的准备和发动》，第99—100页。
- 39 载一九三七年十二月四日《曼彻斯特卫报》。另请参阅戈伊科切亚亲笔记录的影印件，它记录了戈伊科切亚一九三四年三月三十一日与墨索里尼会谈的情况，见《墨索里尼是如何煽动西班牙内战的》，第6—9页。
- 40 安东尼奥·德·利萨尔萨·伊里瓦伦，《关于谋反活动的回忆，1931—1936》，第34—41页。在约翰·F.科弗代尔的杰出作品《意大利对西班牙内战的干涉》中可以看到根据文献资料对这次与意大利政府的会谈所作的描述，见第50—54页。
- 41 利萨尔萨，《关于谋反活动的回忆》，第40页。
- 42 里卡多·德拉·谢尔瓦的文章，见帕拉西奥·阿塔德等的《接近真实的西班牙内战史》，第73页。
- 43 利萨尔萨，《关于谋反活动的回忆》，第40—41页。
- 44 胡利奥·罗曼诺，《圣胡尔霍》，第188页。关于大选前后的其他谋反活动，见谢尔瓦《西班牙内战史》，第763—764页。由于圣胡尔霍的声望和资历，他被选定为一九三六年七月军事叛乱的领导人，但是内战爆发以后，他在从其流亡的葡萄牙飞回西班牙时因飞机坠毁而丧生。叛乱的领导权随后被弗朗西斯科·佛朗哥将军受命接管。一九三六年九月二十九日内战爆发后在布尔戈斯成立的叛军国防委员会颁布法令任命佛朗哥为武装力量总司令和国家元首。
- 45 引自谢尔瓦《西班牙内战史》，第740页。
- 46 西班牙复兴运动首席新闻发言人何塞·古铁雷斯—拉维多年后写道：“十七日，星期一，大选结束不到几个小时，被‘群众欢庆’煽动起来的暴行开始在马德里街头和各省出现。……当人民阵线的暴徒占领地方行政当局时，许多惊恐的地方官员向革命委员会交出

- 了他们的职权。”（《人民阵线时期动荡的议会》，第29页）
- 47 希尔·罗夫莱斯，《不可能和平》，第492—493页。
- 48 阿拉拉斯编，《西班牙圣战史》，第二卷（第九册），第441页。
- 49 关于这场危机的信息，见阿拉拉斯《西班牙第二共和国史》，第四卷，第50—51和56—61页；曼努埃尔·阿萨尼亚，《阿萨尼亚文集》（胡安·马里查尔编辑），第四卷，第563—564和718—719页；谢尔瓦，《西班牙内战史》，第639—641页；埃斯塔多·马约尔·森特拉尔·德尔·埃赫尔西托，《解放战争史》，第一卷，第420—422页；马克西米利亚诺·加西亚·贝内罗，《范胡尔将军：民族起义中的马德里》，第219—223页；《西班牙内战与革命》，第一卷，第81—82页；佩恩，《现代西班牙的政治和军队》，第310—313页；因达莱西奥·普列托，《我的一生》，第一卷，第300页；鲁宾逊，《佛朗哥西班牙的起源》，第250—251和384—385页；费尔南多·德·巴尔德索托，《弗朗西斯科·佛朗哥》，第98—99页。亚历杭德罗·勒鲁对前总理和激进党领导人波特拉把权力丢在“马路中间”所提出的尖锐批评见《逸事》，第447—449页。共和国总统对于自己在这场危机期间所扮演的有些暧昧的角色作了谨慎的描述，他在描述中承认，他劝告波特拉“暂时不要发布戒严令”，要求其“慎重和冷静”，他还抨击后者逃避责任，将其描绘成一个惊慌失措的人（《阿尔卡拉-萨莫拉回忆录》，第346—348页）。很长时间以后，在接受伦敦《泰晤士报》的劳伦斯·费恩斯沃思采访时，波特拉提供了一种更为冠冕堂皇的说法：“我首先是个西班牙人，因此，我的职责是务必使西班牙的利益得到保障。我认为，当时我立即辞职从而将权力移交给新选出的左派领导人能够最有效地维护西班牙的利益，然后他们可以按照人民的意愿行事。”（劳伦斯·费恩斯沃思，《西班牙为自由而斗争》，第182—184页）
- 50 何塞·迪亚斯一九三六年二月二十三日发表的演说，见迪亚斯《斗争的三年》，第151页。
- 51 利萨尔萨，《关于谋反活动的回忆》，第95—106页；卡洛斯·马丁内斯·德·坎波斯将军，《往昔，1931—1953》，第41页。另请参阅马丁·布林科恩《卡洛斯派君主主义者与西班牙危机，1931—1939》，第243—250页；谢尔瓦，《西班牙内战史》，第767页。关于莫拉发给参与谋反者的命令，见谢尔瓦《西班牙内战史》，第769—785页。曾经担任佛朗哥将军的总参谋长（1939—1941）的马丁内斯写道：“把埃米利奥·莫拉准将派到潘普洛纳究竟是内阁的一个致命失误，还是因为受到那些预见到他可能与卡洛斯派合作的人的鼓动，这个问题仍不得而知。人们知道的仅仅是，担任纳瓦尔驻军指挥官的莫拉有足够的时间使自己在享受舒适生活的同时与王室正统派的主要领导人秘密谈判。”（马丁内斯·德·坎波斯，《往昔》，第41页）
- 52 拉莫斯·奥利维拉，《现代西班牙的政治、经济和人》，第544—545页；佩恩，《现代西班牙的政治和军队》，第314页。
- 53 佩恩，《现代西班牙的政治和军队》，第314—315页。另请参阅谢尔瓦《西班牙内战史》，第757—758页。
- 54 帕拉西奥·阿塔德的文章，见帕拉西奥·阿塔德等的《接近真实的西班牙内战史》，第152—154页。
- 55 一九三六年三月十九日《太阳报》。
- 56 《为了政权的稳固》，载一九三六年三月十九日《社会主义者》。
- 57 由于西班牙选举制度有利于大型党派联盟的特性，人民阵线赢得了二百五十八个议会席位，中间党派赢得六十二席，右派赢得一百五十二席，尽管选票数量分布如下：人民阵线，四百二十万六千一百五十六票；中间党派，六十八万一千零四十七票；右派，三百七十八万三千六百零一票（数字根据马达里亚加，《西班牙现代史》，第445页）。虽然其他各种资料来源所提供的数字不尽相同，但是，这些数字显示，民众的选票相当平均地分别投给了人民阵线和中—右党派。实例见阿拉拉斯《西班牙第二共和国史》，

- 第四卷，第75—76页；杰克逊，《西班牙共和国与内战》，第193—194页；佩恩，《现代西班牙的政治和军队》，第311页；鲁宾逊，《佛朗哥西班牙的起源》，第248页；曼努埃尔·图尼翁·德拉拉，《国家危机：独裁，共和国，内战，1923—1939》，第214—215页和希尔·罗夫莱斯，《不可能和平》，第525—526页；后者对一些外国历史学家提供的数字发表了评论。就选举结果逐省进行的最认真细致的分析，见哈维尔·图塞尔·戈麦斯，《西班牙人民阵线的大选》，第二卷，第308—341页。他对总票数的统计数字（第13—15页）与一些著名历史学家所提供的数字不一致，但是充实了右派和中间党派至少得到一半选票的结论，拉蒙·萨拉斯·拉腊萨瓦尔提供的数字同样如此，见《准确翔实的内战资料》，第40—51和256—257页。另请参阅图塞尔发表在一九七七年二月《历史16》上的文章；维克托·阿尔瓦（一位左派的支持者，他认为中—右党派稍占优势），《人民阵线》，第391—397页和一九三六年三月三日《太阳报》。
- 58 一九三六年一月十六日《自由报》。
- 59 一九三四年四月二十五日《马德里官方公报》。
- 60 一九三五年三月二十四日《马德里官方公报》。
- 61 《人民阵线的农业政策》，第14页。另请参阅一九三五年十月五日和二十六日《光明报》，一九三五年十一月二十二日《民主报》，《西班牙的土地改革》，第40—41页；鲁宾逊，《佛朗哥西班牙的起源》，第202—203页。
- 62 马达里亚加，《西班牙》，第512页。另请参阅E.艾利森·皮尔斯《西班牙悲剧》，第145—146页；鲁宾逊，《佛朗哥西班牙的起源》，第161页。
- 63 鲁宾逊，《佛朗哥西班牙的起源》，第266—267页。关于共产党人抨击教会、要求停止对教会的补贴并且没收教会的财产，见迪亚斯《斗争的三年》，第155、163、177、191—192和216页。
- 64 鲁宾逊，《佛朗哥西班牙的起源》，第266—267页。另请参阅阿拉拉斯《西班牙第二共和国史》，第四卷，第222—226页。内战爆发以后，巴尔内斯发布法令要求地方当局以国家的名义没收所有宗教学校（一九三六年七月二十八日《马德里官方公报》）。
- 65 这种敌意的实例见谢尔瓦《西班牙内战史》，第758—759页。
- 66 一名自由共和派军官客观描述了这种不满，见赫苏斯·佩雷斯·萨拉斯上校的《西班牙内战，1936—1939》，第22、47—53和85页。关于对阿萨尼亚军事改革各种各样的不同看法，见迈克尔·阿尔佩特《阿萨尼亚的军事改革，1931—1933》；爱德华多·埃斯平发表在一九八一年十一月号《西方评论》上的文章，第39—57页；杰克逊，《西班牙共和国与内战》，第66—88和171页；埃米利奥·莫拉，《莫拉文集》，第1048—1101页；斯坦利·G.佩恩，《现代西班牙的政治和军队》，第266—276、281、284—285、294和300—304页；埃内斯托·波图翁多，《第二共和国：改革，法西斯主义与革命》，第27—36页；豪尔赫·比贡·苏埃罗迪亚斯，《军事与政治》，第287—296页。
- 67 阿萨尼亚在议会发表的演说，见一九三六年四月三日《议会会议记事》，第222页。
- 68 何塞·曼努埃尔·列瓦纳和G.奥利萨纳，《民族运动》，第5页。
- 69 对阿萨尼亚的采访，载一九三六年二月二十一日《自由报》。
- 70 一九三六年四月三日《议会会议记事》，第223—224页。
- 71 一九三六年四月十五日《议会会议记事》，第288—289页。
- 72 克劳迪奥·桑切斯-阿尔沃诺斯，《政治轶事》，第190页。
- 73 佩恩，《现代西班牙的政治和军队》，第318页。
- 74 一九三六年四月十五日《议会会议记事》，第293和297页。鲁宾逊的《佛朗哥西班牙的起源》对卡尔沃·索特洛的策略作了精辟的描述，由于上述摘选引起了我对卡尔沃·索特洛演说的注意，为此我向鲁宾逊的著作表示感谢。
- 75 鲁宾逊，《佛朗哥西班牙的起源》，第270—271页和第394页，注释168。

- 76 希尔·罗夫莱斯，《不可能和平》，第573—574页和623页，注释63。“渐渐地，”谢尔瓦写道，“希尔·罗夫莱斯开始对他那些最好斗的激进分子失去控制，他们成批地脱离西班牙争取自治权利联盟下属的组织，加入长枪党或[由阿方索和卡洛斯两派君主主义者组成的]民族阵线。”（《西班牙内战史》，第741页）
- 77 见鲁宾逊《佛朗哥西班牙的起源》，第169、173、206、208—212、214和244—245页。我从这部按照时间顺序对一九三三至一九三六年间希尔·罗夫莱斯的策略进行了精彩的分析研究的专著中获益匪浅。
- 78 谢尔瓦，《西班牙内战史》，第740页。
- 79 鲁宾逊，《佛朗哥西班牙的起源》，第194和226页。希尔·罗夫莱斯在他的回忆录中说明，他拒绝了同志和盟友就西班牙争取自治权利联盟应当放弃合法斗争策略所提出的一切建议（《不可能和平》，第574页）。
- 80 何塞·马利亚·丰塔纳，《西班牙内战中的加泰罗尼亚人》，第43页。另请参阅希尔·罗夫莱斯《不可能和平》，第623页，注释63，其中他提到，巴伦西亚右翼青年运动——西班牙争取自治权利联盟下属派别之一——“热情地表示……对正在准备暴动的那些人给予坚定的支持”。
- 81 谢尔瓦，《西班牙内战史》，第743—744页。
- 82 一九三六年四月十五日《议会会议记事》，第300页。
- 83 希尔·罗夫莱斯，《不可能和平》，第688页，注释25。
- 84 一九三六年五月十九日《议会会议记事》，第696—697页。
- 85 引自希尔·罗夫莱斯《不可能和平》，第684页。
- 86 谢尔瓦，《西班牙内战史》，第787页。
- 87 里卡多·德拉·谢尔瓦的文章，见雷蒙德·卡尔编的《西班牙共和国与内战》，第190页。另一方面，应当指出的是，哈维尔·希门尼斯·坎波发表的博士论文《西班牙第二共和国危机中的法西斯主义》在承认长枪党从一九三六年二月起“开始对军队进行新的渗透”的同时断言，“党员中的军人……仍然寥寥可数”，见第318页。
- 88 希尔·罗夫莱斯，《不可能和平》，第684—685页。
- 89 同上，第686页，注释23。
- 90 同上，第607、787—789、794和797—799页。
- 91 同上，第730页。
- 92 同上，第798页，注释50。关于转给莫拉将军五十万比塞塔的更多信息，见阿拉拉斯编的《西班牙圣战史》，第三卷，第456—457页；阿拉拉斯，《西班牙第二共和国史》，第三卷，第317页；B.费利克斯·迈斯，《莫拉这个人：谋反日记，1936》，第230—235页。
- 93 被卢卡·德·特纳侯爵引用，见一九六八年五月一日马德里《阿贝赛报》。另请参阅谢尔瓦《西班牙内战史》，第742—743页。
- 94 谢尔瓦，《西班牙内战史》，第741页。另请参阅希尔·罗夫莱斯《不可能和平》，第789页。
- 95 希尔·罗夫莱斯，《不可能和平》，第788页。
- 96 同上，第789页。
- 97 阿拉拉斯在《西班牙第二共和国史》中提到了阿古斯丁·卡尔韦特在政治上同情阿萨尼亚并且摘引了这篇文章，见第四卷，第325页；巴塞罗那历史研究所所长佩德罗·博尔特斯·博向我证实了这一点，感谢他为我复印了文章全文。

左派的分裂与僵持

如果从内战之前肆虐着这个国家的社会及政治对立的角度来看，这场冲突完全缘起于西班牙自身。外国干涉并非点燃内战火种必不可少的因素，尽管外国势力为了各自的目的利用了这场战争。在军事叛乱爆发之前的几个星期，在外国飞机或坦克第一次出现于西班牙之前的几个星期，对于即将在这个国家燃起的熊熊烈火来说，已经万事俱备了。马德里、巴塞罗那、巴伦西亚、马拉加和毕尔巴鄂等几个主要城市的暴动失败，使叛乱者打算一动手就取得决定性胜利的希望彻底落空。¹正是这些暴动的失败不可避免地促成了一场广泛的社会革命，这场革命在某些方面比早期的布尔什维克革命更深刻。军事叛乱没能保护有产阶级不受左派的侵犯，反而“加速了我们大家所希望的革命的爆发，谁也没有料到会这么快”——令人生畏的旨在建立无政府主义或自由共产主义社会的伊比利亚无政府主义者联盟（FAI）的著名成员费德丽卡·蒙特塞尼如是说。²

当然，她是在向工团主义或无政府工团主义导向的强大的工会组织全国劳工联合会发表讲话。伊比利亚无政府主义者联盟力图对全国劳工联合会施加具有指导意义的影响，结果，全国劳工联合会谴责人民阵线的竞选纲领是与“正在从西班牙的每一个毛孔散发出来的革命热情”³格格不入的

“极端保守的文件”。⁴

但是，蒙特塞尼表达的绝不是人民阵线阵营中具有代表性的温和派观点的主流意见。一场革命肯定不是左翼共和派领导人曼努埃尔·阿萨尼亚总理——他在五月十日成为共和国总统——所希望的，也不是他的党内同志和私人朋友圣地亚哥·卡萨雷斯·基罗加所希望的。五月十三日，卡萨雷斯·基罗加接任阿萨尼亚的总理职务，同时执掌国防部。⁵

一场革命同样不是领导着这个政治派别——它主要从文职人员、自由职业者、小地主和佃农以及小商人和小工厂主中吸收成员——的另外一些政治家所希望的；也不是共和国副总统兼议会议长、西班牙大东方^①的大首领迭戈·马丁内斯·巴里奥所希望的，他的政党是从亚历杭德罗·勒鲁的激进党中分裂出来的共和联盟，形成了人民阵线阵营中最温和的派别，而且还与阿萨尼亚的党派共同声明反对人民阵线竞选纲领中有关工人阶级管控生产以及国有化和将土地无偿分给农民的内容。⁶

一场革命当然也不是弱小的社会党右派领导人胡利安·贝斯泰罗或温和的中间派领导人因达莱西奥·普列托所希望的。普列托控制着社会党执委会，与强大的工会组织劳动者总工会书记弗朗西斯科·拉尔戈·卡瓦列罗所领导的人多势众的社会党左派不同，他在叛乱前的几个月奉行一种克制的政策并且谴责祸国殃民的罢工和骚乱。⁷

“同样无私而可敬的两种观点在社会党内针锋相对，”内战之前主管《社会主义者》的温和派社会党人胡利安·苏加萨戈伊蒂亚写道，“拉尔戈·卡瓦列罗领导的多数派认为与共和派的结盟已成往事，他们主张为了全面行使权力组成一个工人阶级联合阵线……；普列托代表的少数派考虑西班牙的现实情况，他们认为，由于保守派正在进行坚决的抵抗，任何与共和国及共和派的分裂都是非常危险的。……拉尔戈·卡瓦列罗及其主要合作者[路易斯·]阿拉基斯塔因和[胡利奥·]阿尔瓦雷斯·德尔巴约相信，一场军事政变必将被政府的反击和工人举行的总罢工所挫败。……因为罢工、争吵和流血冲突意味着共和国政府的失败，所以，[当时的]社会状况丝毫没有引起他们的担忧，反而让他们暗中窃喜。”⁸

^① 西班牙大东方（the Spanish Grand Orient）为共济会的地方组织。

尽管拉尔戈·卡瓦列罗签署了人民阵线竞选纲领，⁹但他认为，与自由共和派结盟只不过是赢得大选的权宜之计。一九三六年一月十二日，人民阵线竞选纲领发表的前几天，他十分明确地表明了自己未来的观点：

[我们的]责任是建立社会主义社会。当我说到社会主义时……我说的是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我们梦寐以求的目标是夺取政权。通过什么手段呢？通过我们可以利用的那些手段！……[要让]人们充分了解，与左翼共和派合作，我们绝对没有把思想和行动上的任何东西抵押进去。我也不认为他们要求我们这样做，因为要求我们这样做就像要求我们背叛自己的理想一样。这是一次结盟，一次随机的合作，为此正在准备一份竞选纲领，它肯定不会与我们的愿望相符合，但是，此时此地我要对在场的各位以及所有能够听到看到的人们说的是……每一个人，每一个联合起来的人，必须为捍卫竞选纲领而战。……当你在这份竞选纲领中看不到纯粹基于我们的思想的内容时，不要失望，不要沮丧。不！这绝不是不再以坚定的信念和满腔热情为胜利奋斗的理由。无论如何我们必须这样做。同志们，这样的话，在胜利以后，在摆脱了各种义务以后，我们可以对每一个人说，绝对是每一个人，我们将不受干扰地继续走我们自己的路，如果可能，直到实现我们的理想。¹⁰

23

卡瓦列罗从前是个泥瓦匠，四十多年来他只是一位偶尔迸发革命积极性的改良主义者，独裁政府时期他是普里莫·德·里维拉将军^①国务委员会中的一名工人代表。作为共和派-社会党联合政府的劳工部长经历了幻想破灭的两年之后，一九三三年，被革命思想所激励的卡瓦列罗在六十四岁时摇身一变成为鼓吹社会主义的西班牙左派。

这一根本转变在很大程度上是由曼努埃尔·阿萨尼亚所领导的自由共

^① 米格尔·普里莫·德·里维拉将军（General Miguel Primo de Rivera, 1870—1930），西班牙将军和政治家，长枪党创始人何塞·安东尼奥·普里莫·德·里维拉的父亲，一九二三年九月至一九三〇年一月西班牙的独裁者。一九二三年九月，他通过政变建立了一个民族主义政权，企图用“国家、宗教、君主制”的口号统一国家。一九三〇年初，当军队不再支持他的时候，他不得不辞职，两个月后死去。

和派对实施一九三二年九月颁布的土地改革法的漠不关心造成的。的确，与实施一系列土地改革方案相比，自由共和派更关心他们的反教权主义。马莱法基斯写道，共和派长期受到反教权主义、反军国主义和反君主制度观点的熏陶。“让这些法国大革命的继承人感到非常振奋的是土地改革的反贵族意义而不是改革本身。阿萨尼亚完美地体现了这种态度。……共和国初期激情澎湃的那几个月，他在一些演说中富有说服力地呼吁进行土地改革，但是随后便陷入沉默。在他的三卷本演说集中，对于这个毕竟有可能是当时最为紧迫的问题，除了两处例外，人们要想找到比一带而过更多的内容，那只能是劳而无功。”¹¹在后来通过改革法案的过程中，马莱法基斯断言：“左翼共和派之所以支持土地改革，部分是为了得到社会党人对他们主张进行的政治文化改革的支持，部分是因为他们认为这是维持社会秩序的必要措施，部分是出于他们所奉行的要求解放农民的自由主义哲学的人道主义本能。这些原因没有一条足以使他们为土地改革付出巨大的代价，此外，土地改革显然不可避免地破坏了对财产权和个人经济机遇的尊重，这种尊重一直是自由主义哲学的核心内容。因此，土地改革法刚一通过，他们几乎立即开始在履行承诺方面推三阻四。”¹²

杰拉尔德·布雷南在其经典著作《西班牙迷宫》中写道，共和派不愿认真对待土地改革使社会党人对共和国的幻想彻底破灭。“这是一种自下而上的感觉，对年轻人比对年长的人影响更大，对新入党的党员比对资深党员影响更大。……这种感觉在拉尔戈·卡瓦列罗身上找到了领袖。作为劳动者总工会的[书记]，他对在无政府工团主义者面前节节败退的危险尤其敏感。而且他还有个人的不满。首先，他与阿萨尼亚不和。由于这个原因，在他担任劳工部长期间，他所拟订的许多法案受到阻挠，这让他感到特别愤慨。……因此，早在一九三四年二月他就说，‘民众现在唯一的希望是立即发动社会革命。只有这样才能使西班牙免遭法西斯主义的统治’。”¹³

在他周围聚集了大批社会党的工人党员以及社会党青年运动全国社会主义青年联盟的大多数成员，这些人对与自由共和派合作的结果不满，同时对社会党——西班牙社会主义工人党（PSOE）——内部的“改良主义”倾向不满，他们希望社会党发生激进或者“布尔什维克化”的转变并将所

有改良分子或温和派开除出党。¹⁴这些目标在秘密散发但是被人广泛阅读的小册子《十月，第二阶段》中得到了明确的阐述，这本小册子是社会主义青年联盟领导人一九三五年起草的，当时他们正因参加一九三四年的暴动而坐牢。¹⁵小册子宣称，拉尔戈·卡瓦列罗是“这场革命复兴的领袖和发起人”，¹⁶因此，没过不久，他就被其追随者赞颂为“西班牙的列宁”。¹⁷尽管拉尔戈·卡瓦列罗因其纯朴、正直和廉洁受到党内外对手的尊敬，¹⁸但在这种情况下，他也被支持者的热情冲昏了头脑，并没有拒绝这个称号，只不过事态的发展不会承认他是“西班牙的列宁”。实际上，一九三四年的十月暴动失败后，一九三五年他在狱中接受采访时曾声称：“你在这个铁窗后面看见的是西班牙未来的主人！列宁断言西班牙将成为欧洲第二个苏维埃共和国。列宁的预言将成为现实。我将是使它成为现实的第二个列宁。”¹⁹

一九三六年三月，内战爆发四个月前，拉尔戈·卡瓦列罗掌控的有影响的马德里社会党人组织马德里社会主义者团体为社会党制订了一份提交下届代表大会的新纲领，这份纲领宣称，它的“当务之急”是“利用一切可能的手段通过工人阶级夺取政权”，然后“作为工人阶级的民主实行无产阶级专政”。“必须消除认为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革命……可以通过改造现有国家来完成的错误观念。”纲领的序言写道，“除了从根本上把现有国家消灭之外没有别的道路可走。……无产阶级专政或工人阶级的民主将被逐步转变成为一种超越阶级的绝对民主，强力压制型国家从此将会渐渐消失。社会党将会成为专政的工具，在从一个社会向另一个社会转变期间，当周围的资本主义国家使一个强大的无产阶级国家必不可少时，它就要实行专政。”²⁰

显然，马德里社会主义者团体在这份纲领中所使用的一些语言是从列宁和斯大林的权威著作中借来的，仅仅是在最近几年，逐渐衰老的拉尔戈·卡瓦列罗才开始研究进而信奉他们的学说。在随后的几个月时间里，因革命信仰焕发了青春的卡瓦列罗到各省的省会巡回演讲，面对痴迷狂热的听众，他宣称，人民阵线的施政纲领不能解决西班牙的问题，因此，必须实行工人阶级专政。²¹

卡瓦列罗的革命姿态加深了社会党内部已经无法弥合的裂痕。受人

尊敬、语调柔和而且一度是位有影响的“学院派”马克思主义者的胡利安·贝斯泰罗代表社会党的右派，他在一九三三年曾极力劝说他的社会党同志接受民主制度并警告说，“无产阶级专政的幻想需要付出极大的代价”，²²如今他已退居幕后。²³与此同时，主张革命的卡瓦列罗与主张演变的普列托为控制社会主义运动而进行的斗争也发展到了中期，这是一场政治斗争，在很大程度上也是一场个人之间的斗争。在普列托看来，卡瓦列罗不负责任：“他是一个总想显得聪明的傻瓜：他是一个呆板的官僚主义者，扮演一个走火入魔的狂热分子的角色。”²⁴普列托不认为社会党已经强大得足以进行一场成功的革命，所以应当继续巩固与共和派的联盟。普列托的改良主义让卡瓦列罗感到厌恶，他认为他这个对手更像一个“共和派”而不是一个社会党人。“在我看来，”卡瓦列罗在公开发表的回忆录《我的回忆》中写道，“无论在其思想上还是在其行动上……普列托根本不是一个社会党人。”“[他]忌妒，傲慢，目中无人；他认为他比别人都优越；他不能容忍任何稍微挡了他的道儿的人。”²⁵

虽然拉尔戈·卡瓦列罗的追随者在人数上远远超过普列托的追随者，但是，后者的力量来自他对社会党执委会及其机关报《社会主义者》的控制，除此之外，普列托的力量还来自他对党的某些地方组织的控制。另一方面，拉尔戈·卡瓦列罗的力量来自劳动者总工会；来自社会党朝气蓬勃的青年运动；来自大多数党的地方组织，尤其是马德里社会主义者团体；而且来自他的舆论工具《光明报》。两派之间关于革命还是演变这个关键问题的争斗非常激烈，以致曾经有一次，当普列托与两位著名的阿斯图里亚斯矿工领袖拉蒙·冈萨雷斯·培尼亚和贝拉米诺·托马斯被安排在埃西哈的一个群众集会上发表讲话时，他们不得不在一阵枪林弹雨之下逃之夭夭。²⁶

这场暗斗使独立共和派人士兼历史学家萨尔瓦多·德·马达里亚加断言：“导致西班牙内战不可避免的是社会党的内战。……法西斯主义发展猖獗不足为奇。不要让人以为，是法西斯分子的暴力促使社会党人采取暴力……；拉尔戈·卡瓦列罗的枪手开枪打的不是法西斯分子而是他们的社会党同志。……这是[拉尔戈·卡瓦列罗的人]公开宣称的，不仅如此，他宣布的政策是，要在西班牙迅速实行无产阶级专政。就这样，他们把国家推

上了通往暴力之路，这个一贯具有暴力倾向的国家变得比以往更加暴力。这正中法西斯分子的下怀，因为除了喜欢实施暴力并且精于此道之外，他们什么也不会。”²⁷

26 在内战爆发之前那几个月，拉尔戈·卡瓦列罗与西班牙共产党（PCE）——这是一股虽在成长但仍弱小的势力——的官方关系非常友好，以致这位社会党领导人不但鼓动社会党和共产党的青年组织合并，而且鼓动两党的工会联合会合并。²⁸此外，一九三六年三月，卡瓦列罗所控制的马德里的社会党组织决定在下一届代表大会上提议社会党与共产党合并，²⁹共产党本身也积极主张这种合并。³⁰如同斯坦利·G.佩恩所指出的那样，社会党左派“关于加入共产国际并与共产党合作的想法非常天真而且不辨是非利弊，因此，当谈到与后者的合并时，他们以为这是共产党终于被社会党兼并了”。³¹

拉尔戈·卡瓦列罗在一些公开场合亲自提出与共产党合并的建议，³²并且赞同共产党提出的以下建议：根据一项旨在“促进民主革命发展进而使其取得最后成果”的方案，组成一个代表两党的联络委员会。³³这种与因达莱西奥·普列托极其敌视共产党人的立场截然相反的立场受到共产党总书记何塞·迪亚斯的热情赞扬：“社会党的广大党员……支持拉尔戈·卡瓦列罗奉行的路线，这条路线几乎与革命路线完全一致，与共产党和共产国际的路线完全一致。”³⁴

尽管共产党人与卡瓦列罗的官方关系发展顺利，但是，这位社会党左派领导人为号召人们立即进行一场颠覆性的社会革命而进行的宣传鼓动仍然让他们感到不安，因为他们当时正在遵照克里姆林宫的外交政策试图通过加强与自由共和派的联系进一步巩固人民阵线。实际上，在公开主张建立“作为未来权力机构”的工农联盟³⁵并且毫不讳言无产阶级专政是共产党的最终目标³⁶的同时，何塞·迪亚斯曾经就拉尔戈·卡瓦列罗过激的革命姿态间接表示：“我们必须反对任何过于急躁的行为以及一切提前解散人民阵线的企图。人民阵线必须继续存在。我们与左翼共和派还要长期携手共进。”³⁷私下里，共产党人使用“左派幼稚病”³⁸和“左派衰老症”³⁹之类的言辞形容卡瓦列罗的倾向。⁴⁰但是，如果坚持与这位社会党左派领导人不同的立场，他们无力承担由此产生的后果，因为他的声望已经达到巅峰，而

且他们认为他还具有把共产党人与追随他的民众联系起来的实用价值。⁴¹另外，工人阶级联合起来的概念已经控制了他们的想象力，这有可能像曾经促进两党各自的工会组织和青年运动合二为一一样，促进西班牙社会主义工人党与西班牙共产党的合并。“对于统一革命运动和全面推动西班牙革命来说，”何塞·迪亚斯声称，“重要的问题是，拉尔戈·卡瓦列罗代表的路线应当在社会党内赢得胜利。”⁴²一九三六年四月共产主义青年联合会与社会主义青年联盟合并成为统一社会主义青年联盟（简称JSU）之后不久，该组织领导人圣地亚哥·卡里略撰文提到他和两个青年组织的其他代表此前在莫斯科参与的几次谈话：“如同老布尔什维克马努伊尔斯基告诉我们的那样……，对于联合起来的组织和西班牙革命的整个进程来说，重要的事情是，拉尔戈·卡瓦列罗代表的倾向应当在社会党内取得胜利。如果不取得这一胜利，革命组织的联合甚至还有革命的未来——我继续引用马努伊尔斯基的话——都将受到损害。”⁴³

因达莱西奥·普列托所领导的西班牙社会主义工人党中间派以不加掩饰的敌意将共产党对社会主义运动的影响视为越来越大的威胁。它指责他们为两党合并进行的宣传是“联手欺骗”，⁴⁴并且认为两党青年运动的合并是“共产党对社会党青年组织的兼并”。⁴⁵实际上，由于完全不信任共产党人并且非常厌恶他们，社会党中间派甚至拒绝回应共产党所提出的在两党之间设立一个联络或协调委员会的建议。“共产党向社会党建议，根据一项旨在促进民主革命发展进而使其取得最后成果的方案组成一个联络委员会。”何塞·迪亚斯写道，“这个建议没有得到现在的改良主义中间派领导人的答复。另一方面，它受到社会党左派的欢迎。社会党的广大党员拒绝承认现在这个改良主义的执委会，他们支持拉尔戈·卡瓦列罗奉行的路线，这条路线几乎与革命路线完全一致，与共产党和共产国际的路线完全一致。”⁴⁶

因达莱西奥·普列托是中间派的头面人物和支配力量，他感到拉尔戈·卡瓦列罗与共产党人的合作极其危险。普列托出身卑微，性格专横，一九三一年在第一届共和国政府中担任财政部长，而且是北方工业区有影响的毕尔巴鄂《自由报》——他曾先后作为广告文字撰稿员和编辑在这家报社工作过——的所有者，他在自由共和派甚至保守共和派中享有极高的

声望，他与他们比与社会党左派具有更多的共同之处。实际上，一九三六年春天，两派的分歧非常明显，以致他断言，这些分歧将会导致社会党在下一届代表大会上发生分裂。⁴⁷他是一位经验丰富的议会议员，作为一位雄辩但是时而走火入魔的演说家，他总是那么用力地捶打胸膛，以致一位议员说，“人们不知道更应当钦佩哪一点：是他拳头的力量还是他胸部的抗击打能力”。⁴⁸“他猛烈地捶打自己的胸膛，”另一位目击者写道，“用尽全力大声呼喊，结果经常弄伤自己，鲜血直流。”⁴⁹在官场及其党内擅长谋略的普列托经常作为共和派政权中最精明的政治家被人提起。他的谋略不仅帮助在五月十日把阿尔卡拉-萨莫拉赶下共和国总统的宝座并将曼努埃尔·阿萨尼亚推上这个最高的职位，⁵⁰而且成功地把卡瓦列罗赶出了社会党执委会。⁵¹他的能力既得到朋友的肯定，也得到对手的承认。⁵²

28

与卡瓦列罗截然不同，内战爆发之前普列托竭尽全力施加影响要求人们保持克制。他在五一国际劳动节的演说中大声疾呼：“任何国家都不可能容忍造成持续流血却没有明确革命目标的公共骚乱；任何国家都不可能容忍以接连制造不安、恐慌和骚乱的方式滥用公共权力，消耗人力财力。一些天真的家伙也许会争辩说，这种不安、这种恐慌和这种骚乱只会危害统治阶级。这是错误的。……由于其对我国经济造成了破坏并且可能使之崩溃，工人阶级自己过不了多久也将身受其害。……我们应当做的是，理智地继续消灭特权，捣毁这些特权赖以存在的基础；然而，这不是通过孤立、分散的过激行为来完成，在采取了这些过激行为之后，作为人民行动的标志，留下了烧焦的塑像、着火的祭坛，或是被烟雾熏黑的教堂大门。我告诉你们，这不是革命……[如果]一个真正的革命组织——理智的革命组织——不去约束这种滥用的力量，如果不去控制它，不去引导它进入有效的航道，那么，接着请听我宣布：这是在与法西斯主义沆瀣一气。”在这种环境下，法西斯主义将会盛行，因为，他继续说道，胆战心惊的中产阶级在视野之内看不到拯救他们的办法，于是，他们将向法西斯主义求助。

“[请]不要说只有在民主政府执政时才有可能出现无谓的骚乱——这使民主制度受到怀疑——因为现实紧接着就会大声说，只有民主制度允许骚乱，只有独裁者的鞭子可以制止它们。……难道施暴和骚乱[应当]成为一种固定的方式，那不会是实现社会主义或者巩固民主共和国的手段吧，我相信这

才是我们所关心的。……这条道路不是通向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的；它通向的是一种甚至与自由主义思想都格格不入的毫无希望的无政府状态；它通向的是可能毁掉这个国家的经济混乱。”⁵³

五月四日，拉尔戈·卡瓦列罗的喉舌《光明报》发表了一通指责的言论：“工人阶级需要民主共和国……不是因为它的固有长处，不是因为把它当作一种理想的国家形式，而是因为在这种政治制度下，专制制度所镇压的阶级斗争享有更大的行动自由，从而实现其直接和短期的目标。如果不是因为这个，工人阶级为什么需要共和国和民主制度？如果只是为使民主制度和共和国生存下去因而认为阶级斗争应当停止，那是不尊重这种改变历史的力量。那是本末倒置。”⁵⁴

在一九三六年春天使这个国家剧烈动荡的骚乱过程中，有人开始活动让普列托出任总理——普列托与此不无关系。“围绕着他个人，一种氛围正在形成，”一位右翼历史学家记述道，“一种支持任命普列托担任要职从而使其可以全力制止正在发生的骚乱的氛围。[一九三一年共和国的奠基人之一、温和的保守共和派领导人]米格尔·毛拉一直试图形成这种氛围并且使其扩散开来。普列托不仅是人民阵线温和派的希望……而且是许多右翼温和派人士的希望。”⁵⁵据毛拉说，与其他所有他不得不与之打交道的政治家相比，普列托让他产生了“更大的尊重和更深的敬意”。⁵⁶

然而，当阿萨尼亚总统提出让普列托担任总理时，他没敢接受这个职位，不仅因为卡瓦列罗所控制的劳动者总工会执委会表示反对，⁵⁷而且因为成员多为左派的社会党议员骨干会议以压倒多数投票决定不与共和派共同执政。⁵⁸“当组建[政府]的任务交给我时，我拒绝了，”普列托在内战结束以后写道，“因为社会党议员骨干会议的大多数人强烈反对任何形式的联合政府，特别是由我领导的联合政府。”⁵⁹这样一来，普列托失去了组建一个以其所在政党议员支持作为生存基础的政府的希望。“如果不顾议员骨干会议的决定我接受了阿萨尼亚先生交给我的权力，”几年之后普列托谈到，“人们当时会怎么说我？在某种程度上有正当的理由认为，我似乎是唯一一个应当对社会党的毁灭负责的人。另外，如果我在议会得不到大多数社会党议员的支持，那么，为了取得对议会的控制，我就不得不向右派议员寻求支持，结果，我将因此而使自己蒙羞。……当时，我被打上了叛

徒的烙印。错……不在我，错在那些阻挠这一解决方案的人。”⁶⁰

在西班牙历史学家桑托斯·胡利亚看来，当普列托以为肯定将会由他组建新的政府而导演“阿萨尼亚行动”时，他错了。“结果，在手里没有确保组成一个可靠的人民阵线政府所必需的全部王牌的情况下，他在社会政治局面非常严峻的时刻冒着巨大而又毫无意义的风险把阿萨尼亚推上了共和国总统的位置。这是一个十分危险的游戏，因此，没有百分之百成功的把握就不能参与，而普列托参与了，结果他失败了。这也许由果溯因地证明，他并不像他和他的同志们所认为的那样，是一个伟大的政治家。不负责任地把这一行动的失败归咎于拉尔戈·卡瓦列罗可能陷入相互指责的恶性循环，因为拉尔戈的政策恰恰是要阻挠这一行动。想让行动成功的不是他，而是普列托。拉尔戈的政治责任并不在于他干扰了普列托的政策，而在于他没有用它取代别的政策，这不是一回事。”⁶¹

无论情况是否如此，人们务必不要忘记这个事实，由于社会党左派的反对，普列托赌输了。

30 根据卡瓦列罗最信任的助手路易斯·阿拉基斯塔因的说法，在社会党左派反对组成一个以普列托为首政府以及几天前他们对阿萨尼亚总理当选总统所给予的支持背后，存在着某种险恶的用心。“我倾向于认为……[战后] 在于巴黎去世之前不久，路易斯·阿拉基斯塔因向我作出的以下陈述相当重要。”阿萨尼亚文集的编者胡安·马里查尔作证说，“据阿拉基斯塔因说，社会党——他是社会党内最‘深刻的’思想家——的极端分子想要剥夺阿萨尼亚的所有行政职务，同时阻止普列托出任总理。这将使政府完全无力约束群众或稳住右派，从而催生一个纯粹的革命政府。据阿拉基斯塔因说，这个策略非常简单：把阿萨尼亚推选为共和国总统，然后，如同可以预料的那样，当他想让普列托成为他的继任者时，将遭到社会党的彻底否决。‘就这样，我们使他们两人英雄无用武之地，’接着，这位前社会党领导人对我说，‘你不认为我们做得过分了吗？’”⁶²

马里查尔的记述得到曾在内战期间担任内阁部长的马利亚诺·安索的证实。尽管政治观点不同，安索与阿拉基斯塔因一直保持着友好的关系。安索声称，几年后在与这位社会党领导人进行的一次私下交谈中，后者提到了“由他设想”并由拉尔戈·卡瓦列罗派实施的“操纵大局的计谋”，

安索没有遗漏其中最微小的细节。“我与马里查尔的看法相同，”安索明确表示，“在阿拉基斯塔因的陈述中，对其行为所产生的影响深远的后果，他有一点恐惧甚至悔恨。”⁶³尽管身处这场政治危机的中心，拉尔戈·卡瓦列罗在他发表的回忆录中并没有提供与阿拉基斯塔因所说的政治阴谋有关的线索。其实，只要记得他在内战爆发之前的革命态度，人们就难以想象他会宣称自己认为把阿萨尼亚推上总统职位是个“政治错误”。因为，正如他所指出的那样，由于阿萨尼亚是左翼共和派的领导人而且还是人民阵线联盟的首脑，所以，左翼共和派是唯一一个将在某种程度上保证竞选纲领得到履行的派别。“如果推举阿萨尼亚担任共和国总统，”他说当时他想过，“西班牙的共和派就会变成一群没有牧羊人的羊；个个都将自行其是；共和国将会缺少一个支撑其成长发展的基础器官。我们的这种担忧后来不幸得到证实。”⁶⁴考虑到内战之前他们同样的革命主张，这未必是拉尔戈·卡瓦列罗或者他的贴身顾问阿拉基斯塔因当时的想法。一九三六年三月初，阿拉基斯塔因曾经写道：

不可能与那些在二月十六日选举投票中被打败的阶级和解。……只要拥有土地的贵族和教会的财产还没有被没收；只要银行和资本家的舆论工具还没有被控制；只要大型企业还没有收归国有……就不会有安定，也不会有繁荣。

右派想对西班牙革命反攻倒算，想要保住他们所有特权，而且希望中间派的阿萨尼亚会对他们有所帮助。阿萨尼亚总是喜欢限制革命行动，使其遵守资本主义社会的条条框框，他还幻想右派和左派都会帮助他完成这一子虚乌有的民族和解使命。

安定与和谐是异想天开，同样异想天开的是和解的政策。……只有两种选择：革命或反革命。……没有中间道路可走，因此，幻想采取中间立场的他处于因两面受敌而毁灭的危险境地。⁶⁵

在战后发表的一份公开声明中，阿拉基斯塔因承认：“导致共和国垮台的另一个因素很可能是我们党内的自相残杀。我认为，责任在于我们所有人。对于党内的腐败状态，我们大家都起了作用，有人以这样的方式，

31

有人以那样的方式。这种状态让敌人看到了我们的虚弱，看到了叛乱的时机已经到来。我相信，如果我们不是处在这种可悲状态的话……结果将会有所不同。”阿拉基斯塔因认为，如果是一位社会党人领导着政府，他也许可以使军事叛乱的阴谋半途而废。“有人会说这一切已经覆水难收。唉！但是，未来可能出现类似的情况，因此，认识历史绝不是毫无意义的。”⁶⁶

由于西班牙社会主义工人党内部的意见分歧排除了一个由普列托领导的政府存在的任何可能性，在内战爆发之前两个月的五月十三日，阿萨尼亚总统任命他的私人朋友和党内同志圣地亚哥·卡萨雷斯·基罗加为新政府的首脑。像其前任一样，本届内阁完全由自由共和派与温和共和派人士组成。尽管普列托在战后宣称，如果作为总理他不得不向右派议员寻求支持的话，那将使他自已蒙羞，但是，有证据表明，实际上，这种态度可能并没有对他造成任何妨碍。希尔·罗夫莱斯叙述说，四月和五月，代表西班牙争取自治权利联盟自由派的曼努埃尔·希门尼斯·费尔南德斯与带着普列托和阿萨尼亚的意图的米格尔·毛拉和胡利安·贝斯泰罗举行会谈，讨论组成民族团结政府的想法，普列托是“这些方案的核心人物”。五月十五日卡萨雷斯·基罗加组成他的内阁之后，天主教出版社社长、西班牙争取自治权利联盟的喉舌《论坛报》的出版商何塞·拉腊斯前去拜访希尔·罗夫莱斯。他告诉希尔·罗夫莱斯，前一天他拜访了普列托，他们谈到了“为反对社会党的某些人所提出的革命方案，在一个由普列托领导的政府中把西班牙争取自治权利联盟包括进去的潜在可能性”。希尔·罗夫莱斯回答说，由于卡萨雷斯·基罗加刚刚组成了新政府，他认为普列托成功的机会很值得怀疑。“在这种情况下，我怎么可能冒险让西班牙争取自治权利联盟参加一个我们的大多数议员不打算支持的想象中的政府呢？……这样做只会让我成功地毁掉西班牙右派唯一一支有组织的力量。”接着他向拉腊斯表示，一个由社会党温和派、共和派和中间派人士组成并且得到西班牙争取自治权利联盟议员支持的联合政府应当“更加合乎情理”，但是，一个由西班牙争取自治权利联盟直接参与的政府不切实际。“除了使我们在我们的选民当中彻底丧失信誉之外，考虑到[一九三四年]西班牙争取自治权利联盟加入政府引起了……十月革命这一事实，认为人民阵线的民

众将会赞同我们参加组阁似乎也显得不合逻辑。”⁶⁷

不仅因为社会党被内部争斗弄得四分五裂，而且因为西班牙争取自治权利联盟——那些决心通过暴力手段解决问题的右翼党派的背弃已经使它元气大伤——面临解体的威胁，这些私下协商没有产生什么可以避免即将到来的浩劫的结果。因此，在接下来的几周时间里，这使不幸的总理兼国防部长卡萨雷斯·基罗加眼看着西班牙迅速走向内战而无计可施。

五月十九日，卡萨雷斯·基罗加向议会介绍了他的新内阁。与阿萨尼亚的策略一样，他努力在右派与左派之间保持平衡。为了安抚左派，他宣布，他将加快落实人民阵线竞选纲领的节奏，他将保卫共和国免遭敌人的攻击，因此不会再对共和国的敌人宽大为怀。“我告诉你们，无论敌人出现在哪里，无论他是公开的还是隐蔽的，我们都要消灭他。”另一方面，为了让右派放心，他说他不会为底层民众所胁迫，同时谴责非法的政治性罢工、没收财产和暴力行为。“在这种状况下，政府不可能有尊严地开展工作。我呼吁你们大家以真诚热情的合作帮助我。”⁶⁸

但是，在其执政的短短几周时间里，他几乎没有使社会动荡得到丝毫平息，而且他也像阿萨尼亚一样，对即将发生军事叛乱的所有警告置若罔闻。⁶⁹尽管努力试图呈现出强硬而且精力充沛的对外形象，事实证明，虚弱的卡萨雷斯既鲁莽又无用。他对右派的恐吓和抨击——难得地与对左派的恐吓和抨击同样猛烈——激怒了敌人但也不过是虚张声势。“当时的政治气候需要一个能力更强的人，”主管温和派报纸《社会主义者》的苏加萨戈伊蒂亚写道，“[一九三一至一九三三年间]他任内政部长时与他共过事的一些具有判断力的人告诉我，不要相信他那精力充沛的外表。他们断言，像曼努埃尔·阿萨尼亚先生一样，他也只是嘴上的功夫，因此，一旦议会辩论结束，事情就没有下文了。”⁷⁰

到六月中旬，卡萨雷斯·基罗加政府迷失了方向，显然，他为保持不稳定的社会均势所做的种种努力都一个接一个失败了。政府的威信急剧下降，以致天主教自由派领导人米格尔·毛拉在《太阳报》上要求组成一个多党派联合的共和国独裁政府。⁷¹“西班牙现在需要的独裁政府是一种具有广泛社会基础的联合独裁政府，”他在六月二十三日写道，“其基础范围从不主张革命的社会党工人阶级到保守的中产阶级，后者确信，为了

真正的社会公平做出克制和牺牲的时刻已经到了。……独裁政府将由共和派人士来管理，由把西班牙和共和国的最高利益置于阶级或党派目标之上的……正直的共和派人士来管理。”

他在六月二十五日写道：

33

国家的混乱无序状态如今令人不能容忍。政府无力控制它。斗争的双方——而且不只是双方——陷入捕猎人类的野蛮游戏。非法罢工和雇主违反政府法令的行为以旺盛的繁殖力滋生蔓延。对于经济无法挽救的破坏以及政府财政的崩溃令人恐惧地迫在眉睫。就右派和左派的统治而言，他们合力——组织力量和武装力量——把国家压迫到了窒息的程度，显示出他们攻击并且颠覆国家的意图。发生这一切的原因在于人民阵线是一个高明的竞选工具而不是政府的工具，不可能为政府所利用。除了是个杂交的产物之外，人民阵线还是一个危害国家秩序和公共财产的混合体。……

现在，我在潜意识中愿意相信，共和国只是工人阶级当中那些主张革命的极端分子的工具，他们受到自由民主制度的保护以及某些失去判断力的共和派议员的包庇，正在精心准备对政府发动攻击进而消灭资本主义社会和中产阶级。……

他们把我们这些曾经在这个政权诞生时为了合作热忱地做出最大程度的个人牺牲的共和派称为法西斯分子，因此应当被消灭。……

如果共和国是这样的，那就可以宣告，它不可避免地即将毁于自称是其唯一捍卫者的那些人之手，或者，更有可能的是，毁于来自对立一方的反击。……

[不是]所有共和派——我将一切希望维护共和国政权的左派和右派人士包括在这个派别里——决心使他们的党派利益服从于共和政权的最高利益……就是他们任凭它在一场内战的血腥灾难中灭亡而见死不救。这场内战的后果既可能是一个法西斯政权，也可能是一个红色独裁政权。……

一个不能保护自己的政权不配继续存在下去。但是，一个顺从而愉快地向其所宣称的敌人投降的政权，除了应当灭亡之外，还应当

被钉上历史的耻辱柱。……共和国知道，在其民主制度的保护下……如果一方或者另一方获胜，西班牙的共和政体将与自由和民主一起灭亡。共和国知道，如果发生这种情况，西班牙将会遭受其历史上前所未有的浩劫，因为它的敌人没有哪个准备建立一种人道并且适于生存的政治社会制度。

六月二十七日，毛拉忧郁地写道：“我对我的论断将会说服目前在西班牙承担着政府重任的那些人不抱任何希望。”

注释：

- 1 帮助进行了叛乱准备的胡安·安东尼奥·安萨尔多证实，叛乱领导人相信，宣布戒严令之后一切将会一帆风顺（《为什么……？从阿方索十三世到胡安三世》，第120页）。“甚至还在起事之前，”里卡多·德拉·谢尔瓦肯定地说，“负责七月暴动的一些主要军官就担心可能出现一场流血的长期战争，但是绝大多数人希望，他们发动政变之后胜利马上就会到来。”（《西班牙内战中的民族主义军队》，见雷蒙德·卡尔编的《西班牙共和国与内战》，第190页）
- 2 费德丽卡·蒙特塞尼的演说，载一九三六年十二月二十二日巴塞罗那《工人团结报》。
- 3 蒙特塞尼的演说，载一九三六年四月二日巴塞罗那《工人团结报》。
- 4 蒙特塞尼的演说，载一九三六年一月十七日巴塞罗那《工人团结报》。
- 5 一九三三年一月四日，当时的总理阿萨尼亚在日记中谈到时任内政部长的卡萨雷斯·基罗加时写道，“这位好友是我的政府中最杰出的一员”。（华金·阿拉拉斯，《阿萨尼亚私人回忆录》，第109页）当时主管《社会主义者》的社会党温和派领导人胡利安·苏加萨戈伊蒂亚说，阿萨尼亚认为，必须委托卡萨雷斯·基罗加组建他的第一个内阁，将后者“与他的政策和他个人联系起来的是一种忠诚，毫不夸张地说，这种忠诚近乎崇拜”（《西班牙内战史》，第3—4页）。
- 6 一九三六年一月十六日《自由报》。在农业问题上，人民阵线的竞选纲领承诺降低租税、禁止高利贷、增加农业信贷、对农产品重新定价、鼓励出口、兴修水利和植树造林、向农村移民并且废除土地租赁法和规定向卷入圣胡尔霍叛乱的地主退还地产的法律。
- 7 见普列托的演说，分别载于一九三六年五月二日马德里《社会主义者》和一九三六年五月二十六日《自由报》；另外，华金·阿拉拉斯在《西班牙第二共和国史》引用了普列托的演说，见第四卷，第205—207页。
- 8 胡利安·苏加萨戈伊蒂亚，《西班牙内战史》，第4—5页；另请参阅加夫列尔·莫隆《过去的政治与未来的政治》，第25页。
- 9 拉尔戈·卡瓦列罗代表劳动者总工会签署了这份文件，同时，胡安-西梅翁·比达特和曼努埃尔·科尔德罗代表社会党在竞选纲领上签字（一九三六年一月十六日《自由报》）。
- 10 一九三六年一月十四日《社会主义者》。

- 11 爱德华·E.马莱法基斯，《西班牙的土地改革和农民革命》，第254—255页。
- 12 同上，第393页。“人民阵线政府本质上是一个资产阶级政府，因此，它的改革往往尊重个人财产。这延误了土地改革和土地分配，迫使农民为了满足他们对土地和工作的需要而占领土地。”（曼努埃尔·雷克尼亚·加列戈，《耶斯特事件》，第126页）
- 13 杰拉尔德·布雷南，《西班牙迷宫》，第273—274页。
- 14 关于对企图将社会主义运动“布尔什维克化”的批判性描述以及关于三派——它们分别以胡利安·贝斯泰罗（右派）、因达莱西奥·普列托（中间派）和弗朗西斯科·拉尔戈·卡瓦列罗（左派）为首——之间的党内斗争，见加夫列尔·马里奥·德·科卡《反对卡瓦列罗：社会党布尔什维克化的马克思主义批判，1930—1936》。另请参阅阿拉拉斯《西班牙第二共和国史》，第四卷，第139—141和249—266页；理查德·A.H.鲁宾逊，《佛朗哥西班牙的起源》，第260—261和271—272页。
- 15 见玛尔塔·比斯卡尔龙多《十月三十四日：关于一场革命的思考》。她收入了这本小册子，见第83—156页。她在第50页上说明，小册子的第一版由卡洛斯·埃尔南德斯·桑卡霍以社会主义青年联盟主席的名义署名，修订的第二版加上了联盟书记圣地亚哥·卡里略的署名。“但是，”她接着写道，“正式署名的人并不表示就是真正的作者。撰写工作似乎交给了在马德里模范监狱坐牢的圣地亚哥·卡里略和阿马罗·德尔·罗萨尔。”她在一条脚注中补充道，据罗萨尔说，这本九十八页的小册子有三十六页是他写的。
- 16 同上，第156页。
- 17 实例见阿马罗·德尔·罗萨尔（拉尔戈·卡瓦列罗当时的一名支持者）《西班牙劳动者总工会史，1901—1939》，第二卷，第609页；另见费尔南多·克劳丁所著《共产主义运动的危机》的第一卷《从共产国际到共产党和工人党情报局》，第173页。内战爆发之前，克劳丁是共产党青年组织的成员。一九三六年四月，该组织与社会党的青年组织合并组成统一社会主义青年联盟（JSU），他是统一社会主义青年联盟的执委会成员。一九三七年，克劳丁成为西班牙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委员并于一九四七年成为政治局委员。一九六四年克劳丁被开除出党。
- 18 实例见胡利安·戈尔金《政治食人族》，第62页；萨尔瓦多·德·马达里亚加，《西班牙》，第547页；费德丽卡·蒙特塞尼和因达莱西奥·普列托的文章，见《弗朗西斯科·拉尔戈·卡瓦列罗，1869—1946》，第71和138页；罗萨尔，《西班牙劳动者总工会史》，第二卷，第524—609页；安德烈斯·萨沃里特发表在一九四六年五月三日马赛《前进报》上的文章；苏加萨戈伊蒂亚，《西班牙内战史》，第208页。
- 19 H.爱德华·诺布劳，《在西班牙的记者》，第17页，诺布劳是美联社驻马德里记者，他提前把要发的电文交给拉尔戈·卡瓦列罗审阅，后者“满意地认可了”。卡瓦列罗以前的支持者、加利西亚地区奥伦塞省社会党议员阿方索·金塔纳·德拉·佩纳向我证实，卡瓦列罗的声明与他当时的看法完全一致。一九六三年，金塔纳在接受我的采访时说，由于卡瓦列罗“毫无异议地允许将自己称为西班牙的列宁”，他“疏远了”卡瓦列罗。然而，在其没有发表的回忆录中，拉尔戈·卡瓦列罗声称，他“坚决拒绝了”这个称号并且认为这是共产党“俘虏”他的一种尝试（《西班牙内战的历史记录》[打字稿]，第264—265页。关于这份手稿的情况，见本书第四十五章注释19）。但是证据表明，拉尔戈·卡瓦列罗那个具有影响力的政治顾问路易斯·阿拉基斯塔因比共产党更热衷于创造“西班牙列宁”的神话（实例见他为弗朗西斯科·拉尔戈·卡瓦列罗的《对工人的演说》撰写的序言，注明的日期是一九三四年三月二日，在这篇序言的最后一段[第xv页]，他将列宁在一九一七年十月革命前的历史作用与拉尔戈·卡瓦列罗一九三四年的活动进行了对比）。据社会党右派安德烈斯·萨沃里特说，“西班牙列宁”的神话源于这篇序言。
- 20 一九三六年三月十九日《光明报》。
- 21 例如在奥维耶多的演讲，见一九三六年六月十六日《自由报》。

- 22 一九三三年八月三日的演讲，见安德烈斯·萨沃里特《胡利安·贝斯泰罗：西班牙社会主义运动的代表人物》，第336页。他的立场在一九三六年没有改变。实例见何塞·马利亚·希尔·罗夫莱斯《不可能和平》，第657页；萨尔瓦多·德·马达里亚加，《西班牙现代史》，第697页。马达里亚加在一九三九年七月写给伦敦《泰晤士报》的一封信中说明，刚刚被获胜的佛朗哥政权判处三十年徒刑的贝斯泰罗“在整个共和国时期始终反对暴力斗争手段，在社会党的各种委员会里，他勇敢地站出来反对那些头脑发热的人，正是后者使国家陷入了目前这种困境”。
- 23 作为资料翔实的贝斯泰罗传记，见萨沃里特所著《胡利安·贝斯泰罗》和《胡利安·贝斯泰罗的政治思想》（埃米利亚诺·M.阿吉莱拉作序）；另见伊格纳西奥·阿雷尼利亚斯·德·克拉维斯《贝斯泰罗的历程》；卡洛斯·迪亚斯，《贝斯泰罗：自由的社会主义》（恩里克·蒂尔诺·加尔万作序）和E.拉莫·德·埃斯皮诺萨《胡利安·贝斯泰罗的哲学和政治学》。他早年在议会的发言被费尔明·索拉纳收录于《社会党的议会史：胡利安·贝斯泰罗》的第一卷和第二卷。
- 24 一九三六年八月二十六日接受米哈伊尔·科利佐夫（《真理报》特派记者）的采访，访谈录发表在一九三八年四月号《新世界》上，见第40页。该访谈录是一九三八年四月至九月号《新世界》杂志以《西班牙日记》为题连载的科利佐夫日记的一部分。在科利佐夫被斯大林清洗处决十五年后的一九五七年，他的日记作为《科利佐夫文集》的第三卷出版并由鲁埃多·伊维里科译成西班牙文，一九六三年以《西班牙内战日记》作为书名在巴黎出版。以后提到该日记时称之为发表于《新世界》的《西班牙日记》。在这本日记中，科利佐夫经常提到一位名叫米格尔·马丁内斯的墨西哥共产党员。这肯定是作者的一个替身。
- 25 弗朗西斯科·拉尔戈·卡瓦列罗，《我的回忆：致一位朋友的信》，第145和153页。
- 26 实例见苏加萨戈伊蒂亚，《西班牙内战史》，第4页；因达莱西奥·普列托，《西班牙的动乱》，第三卷，第158—159和164页。费尔南多·迪亚斯-普拉哈的《文献资料中的西班牙史：二十世纪，独裁时期……至共和国，1923—1936》提供了《光明报》（一九三六年五月三十一日）对这件事情的描述，见第870—872页。
- 27 马达里亚加《西班牙现代史》，第455—457页。这也是战后一些社会党人向我表达的看法。在阿方索·金塔纳-佩纳看来（一九六三年对他的采访），“如果社会党保持团结，就没有发生军事叛乱的可能性”。
- 28 见文塞斯拉奥·卡里略（拉尔戈·卡瓦列罗派社会党人）的演说，载一九三七年九月四日《巴伦西亚通讯》。
- 29 一九三六年三月十九日《光明报》；一九三六年四月四日《自由报》。
- 30 何塞·迪亚斯，《斗争的三年》，第165、190、194和206页。
- 31 斯坦利·G.佩恩，《西班牙革命》，第166—167页。另请参阅拉尔戈·卡瓦列罗一九三九年十一月二十日写给何塞·布列霍斯的信，见拉尔戈·卡瓦列罗《能做什么？》，第20—24页。
- 32 实例见对拉尔戈·卡瓦列罗的采访，载一九三五年十二月七日《光明报》；何塞·迪亚斯的演说，载一九三六年四月十一日《光明报》。
- 33 见共产党总书记何塞·迪亚斯发表在一九三六年四月十七日《国际通讯》（西班牙文版）上的文章，收入迪亚斯《斗争的三年》，第133—139页。
- 34 同上。
- 35 何塞·迪亚斯一九三六年（原书误为一九二六年——译注）四月十一日的演说，收入迪亚斯《斗争的三年》，第165页。
- 36 何塞·迪亚斯在议会的发言，见一九三六年四月十五日《议会会议记事》，第311页。
- 37 迪亚斯发表在一九三六年四月十七日《国际通讯》（西班牙文版）上的文章，收入迪亚斯《斗争的三年》，第133—139页。

- 38 曼努埃尔，《现代西班牙政治》，第167页。
- 39 科利佐夫，《西班牙日记》，载一九三八年四月号《新世界》，第42页。
- 40 一九三七年担任西班牙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委员的何塞·杜克一九四五年向我证实，在内战爆发前的那几个月，共产党领导人私下里对拉尔戈·卡瓦列罗的政策表示不满。
- 41 见（前西班牙共产党书记）何塞·布列霍斯《两次大战之间的欧洲，1918—1938》，第191—192页。
- 42 一九三六年五月九日《国际新闻通讯》。
- 43 一九三六年四月九日《光明报》。
- 44 一九三六年七月三日《社会主义者》。
- 45 一九三六年七月二日《社会主义者》。
- 46 迪亚斯发表在一九三六年四月十七日《国际通讯》（西班牙文版）上的文章，收入迪亚斯《斗争的三年》，第133—139页。
- 47 一九三六年五月十六日《巴伦西亚商报》。
- 48 爱德华多·奥尔特加·加塞特，引自希尔·罗夫莱斯《不可能和平》，第450页。
- 49 苏加萨戈伊蒂亚，《西班牙内战史》，第275页。
- 50 尼塞托·阿尔卡拉-萨莫拉，《阿尔卡拉-萨莫拉回忆录》，第360—373页及其发表在《日内瓦日报》上的文章，见《西班牙自由派畅谈西班牙反革命》，第11—13页；阿拉拉斯，《西班牙第二共和国史》，第四卷，第103—108和175—178页；华金·阿拉拉斯编，《西班牙圣战史》，第二卷，第477和488页；希尔·罗夫莱斯，《不可能和平》，第585和592—596页；拉尔戈·卡瓦列罗，《我的回忆》，第155页；亚历杭德罗·勒鲁，《逸事》，第462页；华金·毛林，《西班牙的革命与反革命》（后记，1965），第237—238页；普列托在议会的发言，见一九三六年四月七日《议会会议记事》，第242—250页。
- 51 见莫隆《过去的政治与未来的政治》，第60—63页。
- 52 实例见希尔·罗夫莱斯《不可能和平》，第450页；米格尔·毛拉，《阿方索十三世是这样垮台的》，第58、153和216—222页。
- 53 一九三六年五月二日《社会主义者》。更多关于普列托的资料，见阿方索·卡洛斯·塞斯·巴尔迪维尔索所写的传记，《因达莱西奥·普列托：永恒的心》。
- 54 见阿拉拉斯《西班牙第二共和国史》，第四卷，第157页。
- 55 何塞·普拉，《西班牙第二共和国史》，第四卷，第384页。
- 56 毛拉，《阿方索十三世是这样垮台的》，第222页。
- 57 见劳动者总工会执委会声明，载一九三六年五月八日《社会主义者》。
- 58 据议会发言人迭戈·马丁内斯·巴里奥说，六十名议员支持拉尔戈·卡瓦列罗，四十名议员支持普列托（《马丁内斯·巴里奥回忆录》，第303页）。
- 59 因达莱西奥·普列托，《风中话语》，第279页。
- 60 一九四〇年四月二十一日在墨西哥城的演说，收入因达莱西奥·普列托，《墨西哥“巴勃罗·伊格莱西亚斯”俱乐部开张》，第19—20页。另请参阅刊登在一九三六年五月十六日《巴伦西亚商报》的普列托的声明。
- 61 桑托斯·胡利亚，《西班牙社会主义工人党的左派，1935—1936》，第108—109页。
- 62 《阿萨尼亚文集》，第三卷，序言，第xxi-xxii页。
- 63 马利亚诺·安索，《我是内格林的内阁部长》，第112页。
- 64 拉尔戈·卡瓦列罗，《我的回忆》，第155页。
- 65 阿拉基斯塔因发表在一九三六年三月号《利维坦》上的文章，见《〈利维坦〉选集》（保罗·普雷斯顿选编并作序），第317页。桑托斯·胡利亚总结了阿拉基斯塔因对社会主义革命在西班牙取得成功的乐观看法：“他相信，欧洲列强需要专心对付它们自己国内的问题，因此不会有时间给西班牙以丝毫关注。西班牙人可以‘在没有我所过分担心的来自国

外的反革命危险的情况下’完全自由地致力于解决自己的问题并且进行社会主义革命。这场不可避免的革命一定能够成功，因为，如果欧洲各国打算对社会主义西班牙进行干涉的话，在最坏的情况下，苏联不会袖手旁观。”（《西班牙社会主义工人党的左派》，第167页）

- 66 阿拉基斯塔因一九四七年一月二十四日的演说，见萨沃里特《胡利安·贝斯泰罗》，第364页。
- 67 希尔·罗夫莱斯，《不可能和平》，第617—619页。另请参阅阿拉拉斯《西班牙第二共和国史》，第四卷，第274—276页；鲁宾逊，《佛朗哥西班牙的起源》，第263—264页和第319页，注释137。
- 68 一九三六年五月十九日《议会会议记事》，第1690—1694页。
- 69 实例见迭戈·马丁内斯·巴里奥在一九四〇年四月十三日墨西哥城《今报》上所引述的努涅斯·德·普拉多将军的警告；马丁内斯·巴里奥在一九三九年七月二十九日墨西哥城《今报》上所引述的阿维里少校的警告；多洛蕾丝·伊巴露丽（热情之花），《唯一的道路》，第238、252和268页；拉尔戈·卡瓦列罗，《我的回忆》，第162—163页和《共和国时期的文稿：桑托斯·胡利亚编辑、作序并注释》，第304—305页；普列托，《西班牙的动乱》，第三卷，第143—144页和《风中话语》，第279—281页；苏加萨戈伊蒂亚，《西班牙内战史》，第41页。
- 70 苏加萨戈伊蒂亚，《西班牙内战史》，第23页。
- 71 毛拉分别发表在一九三六年六月十八至二十七日《太阳报》上的六篇文章。

军事叛乱与内战

如果说在来自左右两派的危险更加气势汹汹地日益逼近共和国之前，阿萨尼亚和卡萨雷斯·基罗加的消极被动让人感到他们似乎是苟且偷安甚或是无能为力的话，那么，这一方面是因为他们害怕激起左派更加起劲的煽动和更为猛烈的攻击，另一方面是因为他们低估了军队中的持不同政见者发动一场成功叛乱的能力。¹这种心态是整个内阁的特点。因达莱西奥·普列托证明：“由于组成了一个个人色彩过于浓厚……过于驯顺的政府，阿萨尼亚先生在选择顾问方面并不成功。关键的部长职位……送给了好友。他的意愿和主张完全支配着他们。他在好友当中唤起的忠诚往往接近于盲目崇拜，而那些盲目崇拜者从来没有与其偶像不同的意见。由于这个原因，既然阿萨尼亚不相信将要发生一场叛乱，所以这个政府也不相信。”²如同支持军事叛乱的帕拉西奥·阿塔德所指出的那样，阿萨尼亚和卡萨雷斯·基罗加确信他们对于高级指挥官的控制保证了军队“实际上的服从”，从而忽视了“部队里的许多年轻军官具有通过制伏他们的上司成功发动叛乱的能力”。³此外，引用胡安·马里查尔的话说就是，军队谋反的报告“不像极左派的姿态和行为那样让曼努埃尔·阿萨尼亚感到头疼”。⁴这一点得到苏加萨戈伊蒂亚的证实。他说，因为他在自己主管的报

纸上批评了军方的某些破坏行为，当时还是总理的曼努埃尔·阿萨尼亚以这些批评弊大于利为由亲自训斥了他。实际情况是，他补充说，当时阿萨尼亚心烦意乱，不是因为“正在通过加强纪律的训练精心掩饰其阴谋”的军方，而是因为那些“确保人民阵线赢得大选然后又在发动数量惊人的罢工并且扰乱公共秩序”的选民。⁵在担任共和国总统后与希尔·罗夫莱斯进行的一次私人交谈中，阿萨尼亚没有掩饰他对事态发展的担忧。“我不知道我们最终将走向何方。”他说，“你的朋友应当给我留出一点信任的余地。他们不应给我制造任何麻烦。我在另一方面的问题够多了。”⁶

因为相对于天天向他们报告的谋反活动，阿萨尼亚和卡萨雷斯·基罗加更为担心社会动乱；同时，正如理查德·鲁宾逊所指出的那样，因为一支反对革命的武装力量的存在是左翼共和派在行动上对那些工人组织保持某种独立性的唯一希望，所以，他们没有采取针对军队的坚决行动。⁷例如，他们没有理会共产党提出的要求：政府应当清除“军队中的法西斯主义和君主主义将领”，并且应当对“国家机器”进行“一次有力而彻底的清洗”，把军队、秘密警察、国民卫队、突击卫队以及法院中“一切掌握实权的具有极端保守、法西斯主义、君主主义倾向的军官和人员”清理出去。⁸

“接到有人在一些部队中谋反的详细报告后，”斯坦利·G.佩恩写道，“政府的当务之急应当是把一部分军官调动到其他部队。尽管一九三六年春天出现过两三次西班牙军人联盟[UME，右翼军人组织]蠢蠢欲动的迹象，但是，甚至对于许多像莫拉和戈代德那样的将领，政府也不愿意这样做。……阿萨尼亚和卡萨雷斯似乎像右派一样相信，主要威胁将会来自阿萨尼亚自己的革命左派盟友。”⁹

然而，偶尔的指挥权变动和极左派持续不断的反军队宣传正在右翼军官当中引起恐惧。六月二十三日，佛朗哥将军从偏远的加那利要塞给卡萨雷斯·基罗加写了一封警告信，陈述了军队中“严重的焦虑状态”。他对用一些“不够格”的人取代“具有辉煌资历”的军官表示抗议，并且强调了这样做给军队的纪律带来的隐患。他声称，百分之九十的同僚具有这种看法。他指出，“那些断言军队不忠于共和国的人所说并非事实，”因此，他强烈要求对待军队要“公平、公正，三思而后行”。¹⁰佛朗哥将军的

支持者曼努埃尔·阿斯纳尔证实，将军写这封信的目的是在做出最后决定之前，“面对上帝、历史和自己的良心，他能够拥有可能拥有的一切正当理由”。¹¹

36 孤零零地身处远在大西洋上的指挥所，佛朗哥将军继续小心翼翼地行事，直到六月底或七月初他仍然没有最终决定参与叛乱，¹²他的犹豫不决激怒了一些谋反者，他们威胁将在他不参与的情况下采取行动。¹³“佛朗哥令人捉摸不透的态度可能只是出于谨慎。”理查德·鲁宾逊推测，“另一方面，他在共和国时期的行为表明他非常重视合法性，因此，他需要在心中确定，在当时的情况下，暴动是否具有正当的理由。他在六月二十三日写给卡萨雷斯·基罗加的那封信既可以解释为试图使政策改变以避免发生一场叛乱，又可以解释为为使谋反者的任务更容易完成而作的努力。”¹⁴他似乎有充分的理由推迟做出自己的承诺，因为谋反进行得并不顺利。在七月一日写给那些“爱国运动”参与者的一份秘密报告中，从外省的潘普洛纳要塞指挥着这场阴谋的埃米利奥·莫拉将军说明，对于这项事业的热情“尚未达到取得决定性胜利所必需的那种令人鼓舞的程度。……已经为在两种对立的政治势力之间挑起暴力冲突局面做出了努力，以便我们能够以发生暴力冲突为由开始行动；然而实际情况是，因为仍然有一些傻瓜认为可能与人民阵线控制下的民众代表达成协议，所以，尽管一些政治组织提供了帮助，直到目前这种局面仍未出现。”¹⁵另外，暴动计划不仅因长枪党与军队中的谋反者意见不一受到妨碍，而且因对立的阿方索派与卡洛斯派君主主义者之间的政治分歧受到干扰。

里卡多·德拉·谢尔瓦在《西班牙内战史》一书中对军事政治领导人的谋反活动以及他们达成共识的艰难作了最有价值而且最引人入胜的描述。¹⁶在佛朗哥统治时期，作为支持暴动的重要历史学家，谢尔瓦可以看到没有公开的第一手原始资料——这些资料存放在马德里官方军事历史部门的解放战争档案馆里，也可以看到重要的密谋者参与供他使用的另外一些未公开发表的文献资料。在这部著作里，谢尔瓦有效地处理了许多最初出现在官方及半官方出版物中的关于谋反活动的不够准确或真假参半的内容，例如阿拉拉斯编撰的《西班牙圣战史》中的一些描述。谢尔瓦指出，《西班牙圣战史》故意使莫拉将军在暴动准备过程中所起的作用模糊不

清，“以提高其他军事人物的地位”。谢尔瓦断言，谋反活动的主要组织者和负责人是莫拉将军，他“自觉地设法把针对共和国和人民阵线的各种阴谋与反抗欲望整合起来，尽管结果并不理想”。¹⁷因此，谢尔瓦含蓄地否认了西班牙陆军总参谋部一九四五年出版的《解放战争史，1936—1939》所主张的佛朗哥将军全面负责并且领导了这场叛乱的说法。¹⁸

当佛朗哥终于答应支持叛乱时，尽管右翼各派之间的争斗和意见分歧有愈演愈烈之势，可是很快出现了一个使对立各派联合起来的突发事件。

七月十三日，作为对谋杀共和国突击卫队中的左派何塞·卡斯蒂略中尉的报复，君主主义者的议会领袖、最重要的平民谋反者之一何塞·卡尔沃·索特洛被警察中的左翼分子所杀害。卡斯蒂略的同事伙同一些社会党人自行驾驶一辆公用卡车来到卡尔沃·索特洛的住处，宣称他们奉命前来逮捕他。“犯人不知道即将对他个人犯下的穷凶极恶的罪行，”一位社会党人历史学家写道，“因此从容地跟着这些共和派官员走了。……刚一离开市区，他们就杀害了卡尔沃·索特洛，然后将其抛尸埃斯特墓地。骚乱的底线被突破了。这一事件之后，政府和极端保守派再没什么可以失去。对于前者，权威几乎荡然无存；对于后者，只待决断。”¹⁹

37

“当然，何塞·卡尔沃·索特洛这个大人物是支持谋反的最重要的君主主义者。”里卡多·德拉·谢尔瓦写道，“由于希尔·罗夫莱斯在大选之后韬光养晦，他的作用有所增强；由于对共和国和人民阵线的大力抗争，他的地位有所提高。他认为，按照逻辑共和国必然堕落为人民阵线。……卡尔沃·索特洛是反抗的代言人，是暴动的先驱。……[他的]死向军队和平民发出了最后的暴动号召，[他的]死是内战爆发的危险信号。”²⁰

在后面的一段内容里，谢尔瓦写道：“显然，在七月十三日之前，谋反早就开始进行。它已箭在弦上，不得不发，因此，即使没有这一可怕的事件，叛乱肯定也要发生。但是，对于消除谋反者的难题和疑虑，这个骇人听闻的消息产生了决定性的作用，十三日早晨，它在几小时之内传遍了整个西班牙。”²¹

由于担心杀害卡尔沃·索特洛将被用来当作发动叛乱的借口，同时希望对谋反者加以制约，普列托发出警告：“如果反动势力梦想发动一场流血的军事政变……它就大错特错了。如果以为将会看到共和国政权毫无防

备，它就是在欺骗自己。如果想要政变成功，它就必须冲破无产阶级人民群众用来阻挡它的人墙。将会进行……殊死搏斗，因为双方都知道，如果敌人胜利了，他不会饶恕他的对手。即使出现这样的结果，一场决定性的斗争也比目前这种持续流血的局面要好。”²²

卡萨雷斯·基罗加政府严厉谴责了杀害卡尔沃·索特洛的行为。它承诺，不仅要立即采取措施保证“对人类生命的基本尊重”，而且要对这一罪行迅速展开司法调查，还要“动用一切法律手段防止众多极端分子的破坏行为改变共和国的目标”。²³

但是，政府的谴责没有起到安抚右派的作用。如同苏加萨戈伊蒂亚所指出的那样：“长期以来一直在组织暴动的保守势力和军队受到严重的伤害。卡尔沃·索特洛是这场暴动的平民领袖。由于出色的准备和过人的才能，他使所有君主主义者特别关注暴动。作为普里莫·德·里维拉将军的合作者，他在财政部的工作经历使他具有不可低估的管理经验。^①……他不仅得到君主主义者的信任，而且得到半数以上西班牙争取自治权利联盟议员的信任。后者[对争取自治权利联盟]的忠诚因希尔·罗夫莱斯的策略而淡化，他们指责希尔·罗夫莱斯没有[在一九三五年]利用他所掌管的国防部推翻共和国政权……进而效仿葡萄牙建立一个独裁政权。”²⁴

38 七月十五日，内战爆发前两天，在议会常务委员会的一次会议上，代表君主主义者发言的巴列利亚诺斯伯爵费尔南多·苏亚雷斯·德·坦希尔指控：“政府自己的特工犯下了我国政治史上没有先例的这一罪行。鉴于天天有人在议会煽动对右派议员实施暴力和人身攻击而形成的政治气候，这完全可能发生。……我们一刻也不能再与这种行为的保护者和道德帮凶和平共处了。我们不想通过在一场闹剧中扮演某种角色来欺骗民众和国际舆论，这场闹剧伪造了一种文明正常状态的假象，然而实际上，自从二月十六日以来，我们一直生活在彻头彻尾的无政府状态中。”²⁵

接着，在卡尔沃·索特洛的葬礼上，安东尼奥·戈伊科切亚以西班牙复兴运动的名义宣布：“面对着与你们胸前的十字架一样的这面旗帜，面对着听得到看得见我们的上帝，我们庄严宣誓，把我们的生命献给这项具

① 独裁政府期间，何塞·卡尔沃·索特洛于一九二五年被米格尔·普里莫·德·里维拉将军任命为财政部长。

有三重意义的使命：学习你的榜样，为你的死报仇，拯救西班牙。”²⁶

即使到了这个时候，仍有妥协的一线希望。但它立即被扑灭了。由于普列托警告说将会发生一场谁也不会饶恕对手的殊死搏斗，双方现在开始摊牌。在刚刚过去的几个月，社会党人和共产党人逐步建立了自己的民兵组织，²⁷如今，他们开始疯狂地动员武装力量；与此同时，军队和民间的谋反者正在对他们的暴动计划作最后的完善。

毫无疑问，人民阵线中的温和派被杀害君主主义者领导人的事件惊呆了，不过，最强烈地反对这种行为的是曼努埃尔·阿萨尼亚总统，他十分清楚这一事件的可怕含义。作为一个骨子里的温和派人士，他试图使西班牙坚持一条中间路线。他希望在共和国宪法的框架内进行实质性的改革，而不是来一场将使宪法湮没其中的狂风暴雨式的革命。由于这个原因，当七月十七日叛乱在西属摩洛哥的梅利利亚随着共和派指挥官曼努埃尔·罗梅拉莱斯将军被其部下成功推翻而爆发并且开始向伊比利亚半岛蔓延时，阿萨尼亚仍然希望找到某种能把共和国从左派与右派之间沉重的碾轧之下拯救出来的解决办法。七月十八日傍晚，在为防止国家陷入内战和革命所进行的最后努力中，他接受了卡萨雷斯·基罗加政府的辞职，²⁸然后委托迭戈·马丁内斯·巴里奥组成一个多少有些保守的新内阁，希望这能促使叛军军官坐下来谈判——人们应该记得，新总理的政党共和联盟是人民阵线阵营中最温和的派别。

马丁内斯·巴里奥通过电台宣布：“我出于两个最最重要的理由接受了这个任务：使我的国家免遭恐怖内战的涂炭并且保护共和国的宪法和制度。”²⁹没有时间可以浪费了，因为，当一个接着一个兵营揭竿而起造反时，当左派组织动员他们的人马并且更坚决地要求用武力对抗叛乱时，共和国的危险增加了。两天来，卡萨雷斯·基罗加拒绝把工人武装起来以免政权落入他们之手。“[他的]国防部成了一座疯人院，”一位目击者对苏加萨戈伊蒂亚说，“最疯癫的病人是部长本人。他不吃不睡，着魔似的大喊大叫。他的样子让你害怕，即使他在某次发狂时突然倒毙，我也不会感到意外。……他不愿听到武装民众的任何建议，并以最严厉的语气说，所有擅自这样做的人都将枪毙。”³⁰

人们对卡萨雷斯·基罗加的命令置之不理，因为，在他尚未辞职时，

五千支步枪已经根据炮兵兵营指挥官、拉尔戈·卡瓦列罗多年的政治伙伴罗德里戈·希尔中校的命令分发给了马德里的工人。这个经过充分证实的情况是社会党左派议员玛加丽塔·内尔肯告诉我的，社会党当时派她从劳动者总工会的总部人民之家去炮兵兵营。³¹拉萨罗·索莫查·席尔瓦在其撰写的何塞·米亚哈将军传记中提供的说法³²不仅缺少证据，而且与几小时后将军加入马丁内斯·巴里奥政府的事实相矛盾。这一说法的大意是，当时的马德里军区司令米亚哈将军下令给工人发放武器。正如我们将会看到的那样，马丁内斯·巴里奥政府做出了扣发武器的保证。实际上，据当时在米格尔·努涅斯·德·普拉多将军手下担任民航总署副署长的伊格纳西奥·伊达尔戈·德·西斯内罗斯说，³³当时任民航总署技术干事的卡洛斯·努涅斯·马萨请求米亚哈向人民之家提供武器时，将军拒绝这样做。

就在马丁内斯·巴里奥试图组成新政府时，革命的工人已经开始行使警察的职能，出现这种情况的部分原因是罗德里戈·希尔中校给他们发放了武器。“一群群武装的工人在街头巡逻并且开始截停汽车，”马丁内斯·巴里奥回忆说，“一个士兵也看不到，更加令人意外的是，一个维护公共秩序的人也看不到。显然，国家的强制机关已经停止运行了。”³⁴此外，一名共产党人证实：“当午夜的钟声敲响时，从太阳门广场通往所有方向的道路都有人站岗放哨，无论是通向兵营、通向工人总部、通向工人生活区还是通向城市各个进出口的道路。武装的工人管理着汽车交通。汽车和有轨电车受到仔细的搜查。飞行巡逻队快速飞过城市的四郊，传送命令，检查岗哨。”³⁵

夹在军事叛乱与左派的反抗之间，马丁内斯·巴里奥面临着双重危险。为了避开危险，他首先必须拒绝向聚集在内政部外面吵闹的工人发放武器，这是他与即将成为其内阁成员的那些人重点讨论的一个问题。因反对共产党的参与而拒绝加入人民阵线的小型保守派政党民族共和党³⁶领导人费利佩·桑切斯·罗曼成为马丁内斯·巴里奥政府的一员。内战结束之后不久我在墨西哥采访了他，他告诉我，新政府在组成之前应阿萨尼亚总统之邀来到总统府时，他被告知出现了“严重的事态发展——成群的工人聚集在内政部外面要求得到武器”。他说，当时已在总统府的马丁内斯·巴里奥坚决主张拒发武器。马丁内斯·巴里奥征求他的意见，桑切斯·罗曼

回答说，发放武器“在军事上不起作用，在政治上则蕴涵着难以预料的危险”。³⁷马丁内斯·巴里奥说，卡萨雷斯·基罗加政府在七月十八日星期六下午六点举行了一次会议，社会党温和派的因达莱西奥·普列托和社会党左派的拉尔戈·卡瓦列罗均参加了会议，在这次会议上，除了他之外，所有人都对卡瓦列罗认为应当发放武器的“坚决态度”报以沉默，他的回答是，应当呼吁人民“团结在合法的政府机构周围”。³⁸值得注意的是，在战后所写的一篇关于马丁内斯·巴里奥对这次政府危机的描述的文章里，因达莱西奥·普列托既没有证实也没有否认以下说法：当卡瓦列罗建议发放武器时，他是那些保持沉默的人之一。³⁹

为了防止灾难来临，马丁内斯·巴里奥必须做的不仅仅是拒绝发放武器，最重要的是，他必须劝说军队领导人不要采取极端的行动。据他本人说，为了这个目的，他通过电话与各个兵营商谈，试图争取那些态度尚不明朗的军队领导人的支持，同时说服已经造反的军队领导人放弃他们的行动。⁴⁰在所有这些通话中，最重要的是与负责伊比利亚半岛叛乱计划的潘普洛纳要塞司令莫拉将军的商谈。但是，马丁内斯·巴里奥谋求得到将军支持的努力没有效果。“如果你打算与我达成妥协，”将军答复说，“我们就将背叛自己的理想，同时还要出卖自己的同志。我们都应当被私刑处死。”⁴¹他们的通话进行时，桑切斯·罗曼与马丁内斯·巴里奥在一起，据桑切斯·罗曼说，马丁内斯·巴里奥绝望地向莫拉恳求道：“此时此刻社会党人正在准备武装民众。这将意味着共和国和民主制度的终结。我们应当为西班牙着想。我们必须不惜一切代价避免内战。我愿意向你们、向军队提供你们想要得到的职位和条件。”⁴²实际上，这次通话几小时后，莫拉指挥部所在地潘普洛纳的《纳瓦拉思想报》在一九三六年七月十九日那一期报纸上报道说，马丁内斯·巴里奥愿意向莫拉提供国防部长的职位。⁴³“我们将对迄今为止所发生的一切承担全部责任，”马丁内斯·巴里奥向莫拉保证，“我们还将对造成的损失给予赔偿。”⁴⁴对此，莫拉将军毫无商量余地地回答道：“你的建议现在已经不可能实现。潘普洛纳的大街上到处都是志愿军[卡洛斯派君主主义者的右翼民兵]。从我所在的阳台上望去，随处可见他们的红色贝雷帽。大家准备投入战斗。如果告诉这些人我已与你达成协议，我将会第一个人头落地。在马德里，同样的事情也将发生在你

身上。现在我们谁也控制不了我们的群众。”⁴⁵在其本人对这次决定性对话的记述中，马丁内斯·巴里奥声称，莫拉的回答如下：“我对投身我麾下的勇敢的纳瓦拉人民负有责任。如果我想改变行动的计划，他们就会杀了我。当然，我不怕死，我怕这种新的变化和我个人的信念不起作用。现在为时已晚，太晚了。”⁴⁶

41 尽管叛军做出这种反应，马丁内斯·巴里奥仍然继续组建后来被其称为调解政府的他的政府。⁴⁷如果这个政府具有明显的温和色彩，那么，与其说是因为它的五名共和联盟成员，不如说是因为包括党的领导人桑切斯·罗曼在内的三名民族共和党成员，众所周知，共和联盟持相对保守的观点，而民族共和党则拒绝加入人民阵线。⁴⁸

马丁内斯·巴里奥在对这次政府危机的记述中声称，他曾邀请因达莱西奥·普列托加入他的内阁，但是，由温和派控制的社会党执委会决定普列托不参加政府，尽管它愿意给予政府“坚定而忠实的支持”。⁴⁹当时主管执委会机关报《社会主义者》的胡利安·苏加萨戈伊蒂亚合乎逻辑地证明了这种态度。苏加萨戈伊蒂亚说，当另一份报纸的负责人就马丁内斯·巴里奥像卡萨雷斯·基罗加一样拒绝发放武器这一情况询问他的报纸对新政府的看法时，他答道：“我只报道与这场危机及其解决办法有关的消息。我不认为我们应当发表任何激烈的评论。我们将会帮倒忙。从现在起，只要内战还在继续，如果党没有做出其他决定，《社会主义者》将是一个全力以赴支持政府的舆论工具。”⁵⁰

但是，新政府从一开始就命蹇时乖，因为事态发展的控制权已经落入一定要让左派与右派决一死战的那些人之手。

在不到两天的时间里，叛军军官逐步推动着他们的计划。七月十七日控制西属摩洛哥后，通过贡萨洛·凯波·德·利亚诺将军一次大胆的行动，他们在星期六下午两点占领了塞维利亚兵营。凯波·德·利亚诺将军的支持者兼传记作者安东尼奥·奥尔梅多·德尔加多和何塞·奎斯塔·莫内雷奥中将描写了他冷静地从共和派指挥官何塞·费尔南德斯·德拉·比利亚·阿夫里莱将军手里夺取塞维利亚兵营的过程。⁵¹凯波·德·利亚诺是边防警察部队监察长，这是一支由海关、税务官员和警卫组成的部队。以视察海关检查站为借口，他可以出行数千英里从事谋反活动而不引起怀

疑。⁵²因为他在一九三一年对共和国的出现表示了热烈欢迎而且与第一任共和国总统阿尔卡拉-萨莫拉是姻亲，所以谋反者并不信任他。但是，人民阵线将阿尔卡拉-萨莫拉赶下总统宝座令凯波大为不满，⁵³这帮助消除了对他的怀疑。然而，如同保守派历史学家里卡多·德拉·谢尔瓦所指出的那样，叛军将领对凯波的“决策能力”没多大信心，因此把他派往塞维利亚，“据最后分析”，叛军在那里肯定失败，结果，由于凯波将军表现出来的“必死的勇气”，一场失败“变成了内战中最令人意外的一场决定性胜利”。⁵⁴不过，尽管他取得了最初的成功，但是，直到一周之后，在来自西属摩洛哥的摩尔军团和外籍军团的帮助下，凯波·德·利亚诺才平定了塞尔维亚近郊的工人区。⁵⁵为了镇压罢工，他以极端措施相威胁。据他的传记作者说，他签发了一份公告宣布，参加罢工的所有工会的领导人将“被立即枪毙”，同时枪毙“随意挑选的同等数量的工会会员”。⁵⁶

凯波·德·利亚诺于七月十八日星期六下午两点夺取塞维利亚兵营之后不久，叛军在另外一些省会开始行动。当天下午四点在加的斯，五点在马拉加，六点在科尔多瓦，午夜十二点半在巴利亚多利德，七月十九日星期日凌晨两点在布尔戈斯，他们造反了。在其中的两个省会布尔戈斯和巴利亚多利德，国民卫队和突击卫队都参加了叛乱，前者是君主建立的宪兵队，后者是共和国建立的警察部队。

在布尔戈斯，据七月二十日的《布尔戈斯日报》报道，“突击卫队和国民卫队从一开始就支持民族主义运动”。⁵⁷在巴利亚多利德，据该市出版的《卡斯蒂利亚北方报》七月十九日报道，突击卫队和国民卫队“携手加入了民族主义运动”。⁵⁸不过，同样根据叛乱方面的消息来源，在塞维利亚、加的斯和马拉加，突击卫队几乎毫无例外地全都支持人民阵线。⁵⁹另一方面，在科尔多瓦，只有少数突击卫队成员反对叛乱。⁶⁰

应当指出的是，一九三一年由共和国建立的突击卫队在城市维持秩序，而君主制遗留下来的国民卫队主要限于在农村执法。突击卫队建立之前，实际上没有用于维持城市市区秩序的警察部队。斯坦利·G.佩恩写道：

[共和国]临时政府的内政部长米格尔·毛拉是共和国产生的少数几位可靠负责、具有远见的领导人之一。他意识到，公共秩序问题对

于新政权的未来十分重要。多年来，城市的暴力行为之所以断断续续地始终困扰着这个国家，在一定程度上是因为缺少一支有效的警察部队。当此类骚乱真正引起恐慌时，通常调来军队恢复城市的秩序，而国民卫队则在农村维持秩序。没有哪个机构为承担城市的警察职责适当地装备或训练。……由于缺乏用有效方法驱散人群的训练，维持秩序的士兵往往诉诸流血杀戮的手段，从而激起更大程度的暴力和不满。为了避免向军队或国民卫队求助，毛拉创建了一支全国性的共和国警察部队，配备的武器只有手枪和警棍；这些“突击卫队队员”将被用来镇压在大城市进行的示威活动。安全总局局长[安赫尔·加拉尔萨，他是共和国的第一任总检察长，还是一九三六至一九三七年拉戈·卡瓦列罗战时政府中的社会党人内政部长]选择阿古斯丁·穆尼奥斯·格兰德斯中校担任突击卫队负责人，后者在摩洛哥军团[西班牙陆军中的现役摩尔人军团]服役期间作为一名领导者和组织者享有盛誉。⁶¹

43 据社会党温和派的苏加萨戈伊蒂亚说，尽管突击卫队由共和国创建，但是，它却包括了许多敌视新政权的人，他们是在穆尼奥斯·格兰德斯掌管这支队伍时加入的。⁶²显然，人民阵线赢得一九三六年的大选之后这些人并没有被清除，因为，据（佛朗哥政权）官方军事叛乱史《西班牙圣战史》说，这支队伍充满了共和国政权的敌人。“人民阵线出现之前一直担任这支队伍指挥官的穆尼奥斯·格兰德斯中校与突击卫队的许多军官保持着联系，”《西班牙圣战史》接着写道，“因此他知道，在突击卫队中，成百上千人非常愿意参加反政府的政变。”⁶³

就在七月十九日星期天凌晨五点前后马丁内斯·巴里奥向报界宣布他的新政府组成时，⁶⁴事态的发展比他的语速还要快。在萨拉戈萨，午夜过后不久，突击卫队开始在工会和左翼党派的总部抓人，⁶⁵军队在米格尔·卡瓦内利亚斯将军的指挥下刚刚宣布了军事管制。在韦斯卡，格雷戈里奥·德·贝尼托将军也起事了，他得到人数不多的突击卫队和国民卫队的支持。在巴塞罗那，叛军开始从兵营出发前去夺取战略要地，当天晚些时候，曼努埃尔·戈代德将军将从巴利阿里群岛抵达那里接管指挥权。在南

方，摩尔军团的一支部队正在靠近加的斯，在为反叛事业保卫这个重要港口的战斗中，它将发挥决定性的作用。此外，佛朗哥将军正从加那利群岛飞往西属摩洛哥，他将在上午七点到达目的地。据斯坦利·佩恩说，作为对他保证支持暴动的回报，军方答应把驻扎在摩洛哥的摩尔军团和外籍军团——“也就是说，西班牙陆军所有重要的作战部队”⁶⁶——的指挥权交给他，事实证明，得到这一指挥权是他向僭取民族主义一方最高权力所迈出的关键一步，两个月后，他被反叛者的权力集团任命为武装力量总司令和国家元首。⁶⁷

值得注意的是，记录显示，七月十八至十九日由塞西尔·贝布上尉所驾驶的那一架将佛朗哥将军从加那利群岛秘密送往西属摩洛哥的哈维兰快速飞龙小型客机，是马德里的君主主义报纸《阿贝赛报》驻伦敦记者路易斯·博林按照报纸出版商胡安·伊格纳西奥·卢卡·德·特纳侯爵的要求于七月九日在英国的克罗伊登包租的。⁶⁸

离开加那利群岛开始他的历史性航程之前，佛朗哥将军宣布实行军事管制并且发表以下公告：

西班牙的人民！对于所有那些感受到西班牙的神圣之爱的人……对于所有那些誓死保卫西班牙抗击它的敌人的人，这个国家要求帮助。西班牙的形势一天比一天更危急。无政府状态在大多数城镇和乡村盛行。政府任命的官员主导着社会动乱，即使动乱实际上不是他们煽动的。当行政当局拒不采取强制性手段维护社会秩序和正义时，对于被怯懦而卑鄙地杀害的公民来说，区别只是决定使用左轮手枪还是使用机关枪。各种各样的革命罢工使这个国家的生活陷入瘫痪。难道我们可以胆小怯懦、背信弃义地一枪不放毫不抵抗地听任西班牙落入祖国的敌人之手？不！叛国者也许可以这样做，而我们这些发誓保卫国家的人决不应当这样做！……我们愿意为你们提供法律面前的公正与平等、西班牙人之间的和平与友爱、摆脱了放荡和残暴的自由与博爱！……西班牙万岁！⁶⁹

44

现在，这个一九三一年诞生的自由主义共和国经过自然的发展之后很

快将被内战毁灭，这场持续数年的战争所产生的后果只能是一个或左或右的独裁政权。正是由于这个原因，阿萨尼亚总统——他担心卡萨雷斯·基罗加无法长时间拒绝发放武器，而发放武器将意味着民主政权的末日——才孤注一掷地任命马丁内斯·巴里奥组成一个新政府与叛军领导人进行谈判。

但是，尽管马丁内斯·巴里奥的内阁受到右派的抵制，它也同样受到左派的抵制，左派认为它纯粹是个投降政府。共产党官方的内战与革命史断言，作为共和派中间势力的温和派“确信，通过摆脱与工人阶级的关系的束缚，它能够与叛军将领和保守势力达成妥协。马丁内斯·巴里奥及其支持者的姿态——表示愿意向叛军将领提供部长职位，同时拒绝武装人民以使它们能够保卫共和国——不可能在投降与抵抗之间产生一条中间道路，只能导致共和国在共和派领导人的带领下缴械投降”。它还质问，卡萨雷斯·基罗加和马丁内斯·巴里奥为什么不向人民发放武器？“这说明他们的阶级局限性。这些共和派的领导人宁愿与叛乱者达成协议也不愿把武器发给人民，因为他们害怕这将导致工人阶级在领导国家方面的影响和作用得到加强。”⁷⁰

新内阁的名单公布后，工人阶级非常担忧与愤慨，⁷¹毫无疑问，这与某些部长的名字有关。社会党左派的喉舌《光明报》曾经这样谈论新政府的成员费利佩·桑切斯·罗曼，尽管他是一个“真诚无欺的共和派”，但他也是“[共和国]新政权所发现的最保守的人物之一”；⁷²在谈到另一位政府成员安东尼奥·拉腊时，《光明报》写道，他是一个“下流的政治骗子”。⁷³至于马丁内斯·巴里奥，在内战爆发的几个月前，无政府工团主义的《工人团结报》说他有一帮安达卢西亚地主好友，还说经常看见他在议会休息室里“与工人阶级最凶恶的敌人友好交谈”。⁷⁴中产阶级左翼共和派的一些成员对政府怀有敌意，虽然其中有他们的四位代表。“在左翼共和派总部，”代表该党派右翼而且也是新的内阁部长的左翼共和派主席马塞利诺·多明戈写道，“我的许多同志听到政府的组成之后因羞愧难当愤怒地撕毁了他们的党证，尽管他们始终认为我的加入至少应当是一个关心的理由，而且也是对他们的一种保证。他们对责任以及为责任不得不做出的牺牲的理解与我不同。”⁷⁵左翼共和派领导人阿萨尼亚总统同样注意到：

“一些左翼共和派成员甚至谈论共和国总统的‘叛卖行为’，那大多是一些莽撞而且缺乏理解力的人。”⁷⁶

当左派组织成员上街表示抗议时，街头的气氛一触即发。“大规模示威活动自发形成。”一位目击者写道，“他们雪崩似的涌向内政部和国防部。人们高喊‘叛徒，懦夫’，即兴的演讲者向群众高谈阔论，‘他们把我们出卖了！我们必须首先动手枪毙他们。’”⁷⁷

面对民众愤怒的大爆发，加上他与叛乱领导人达成某种和平解决办法的希望化为泡影，马丁内斯·巴里奥决定辞职。“只有普列托进行最后的努力劝阻我，”巴里奥写道，“然而这是徒劳的，我的态度让他的希望落了空。不过短短几分钟，政治示威活动导致政府垮了台。当内阁成为被剥夺了权力的影子、只是可笑地保留着部长的头衔时，要求我与军事叛乱做斗争毫无意义。”⁷⁸

“现在，两个西班牙形成对峙，准备毫不留情地战斗到最后胜利或失败，”一位军事叛乱的支持者写道，“不可能有其他选择。”⁷⁹

注释：

- 1 比森特·帕拉西奥·阿塔德的文章，见帕拉西奥·阿塔德等的《接近真实的西班牙内战史，1936—1939》，第152页；里卡多·德拉·谢尔瓦，《西班牙内战史》，第807页；何塞·马利亚·希尔·罗夫莱斯，《不可能和平》，第743—744页。
- 2 因达莱西奥·普列托，《风中话语》，第279页。激进的马克思主义政治家华金·毛林多年以后在全面回顾当时的政治局势时评论说：“阿萨尼亚任命的总理卡萨雷斯·基罗加是一个无足轻重的人；他选择的内政部长胡安·莫莱斯是一个不足挂齿的人。军队可以继续从容镇定的为叛乱做准备，这场叛乱导致了内战并且导致共和国垮台。”（一九七一年九至十月纽约《自由西班牙报》）关于卡萨雷斯·基罗加的副官伊格纳西奥·伊达尔戈·德·西斯内罗斯为提醒总理和阿萨尼亚总统军事叛乱的危险迫在眉睫、因此必须采取有效措施所作的徒劳的努力见康斯坦西娅·德拉·莫拉（伊达尔戈·德·西斯内罗斯的妻子）的《辉煌不再》，第222和229—232页。有一次卡萨雷斯回答道：“不要成为一个危言耸听的人，西斯内罗斯。一切都在我的控制下。我们已经采取了一切必要的措施对付任何叛乱的企图。你将会看到。让他们叛乱，让他们叛乱！而且越快越好！”（《辉煌不再》，第223页）因达莱西奥·普列托记述了卡萨雷斯的态度，他同样警告后者有发生军事叛乱的危险。“我注意到我的警告引起了愤怒，而我必须忍受它。但是，一天下午，我让这件事情结束了，当时……控制不住怒气的总理尖刻地回答道：‘不要烦我。你想象的东西只是你的更年期的产物。’直到叛乱已经在摩洛哥爆发的七月十七日，我没有再去拜

- 访过他。”（《西班牙的动乱》，第一卷，第163页）
- 3 帕拉西奥·阿塔德的文章的见帕拉西奥·阿塔德等的《接近真实的西班牙内战史》，第163—164页。另请参阅谢尔瓦《西班牙内战史》，第765和807页。如同弗尔·B.约翰斯顿注意到的那样，“在一些情况下，夺取指挥权需要除掉坚定支持共和派的高级军官。这是经常被内战研究者忽视的叛乱发生的一个因素。”（《巴别尔军团：西班牙内战中的国际纵队》，第20页）理查德·A.H.鲁宾逊提出了下面这个重要的观点：“谋反者基本上是一九三六年二月底被剥夺了实际指挥权的非洲军团的军官；在‘宣布’反对政府之前，他们大都不得不除掉支持阿萨尼亚的驻地指挥官”，见《佛朗哥西班牙的起源》，第376页，注释3。
 - 4 《阿萨尼亚文集》，第三卷，序言，第xxxii页。
 - 5 胡利安·苏加萨戈伊蒂亚，《西班牙内战史》，第5—6页。
 - 6 希尔·罗夫莱斯，《不可能和平》，第608页。
 - 7 鲁宾逊，《佛朗哥西班牙的起源》，第288页。
 - 8 何塞·迪亚斯，《斗争的三年》（一九三六年六月一日发表的演说），第199—200页（发表在一九三六年六月《工人世界报》上的文章）。
 - 9 斯坦利·G.佩恩，《现代西班牙的政治和军队》，第330—331页。
 - 10 见曼努埃尔·阿斯纳尔《西班牙内战军事史》，第31—32页。
 - 11 同上，第30页。另一方面，谋反者之一、米格尔·卡瓦内亚里斯将军的儿子吉列尔莫·卡瓦内利亚斯说：“那封写给政府的效忠信让人产生的印象是，在决定袭击哪一方对自己有利之前，写信的人正骑墙观望。”（《四位将军：内战的前奏》，第一卷，第439—440页）他还在别的地方明确表示，内战之前那几年佛朗哥含糊不清的立场是机会主义的（同上，第446页，注释49）。
 - 12 谢尔瓦，《西班牙内战史》，第785和803页；佩恩，《现代西班牙的政治和军队》，第334—335页；鲁宾逊，《佛朗哥西班牙的起源》，第288页。
 - 13 佩恩，《现代西班牙的政治和军队》，第332页；鲁宾逊，《佛朗哥西班牙的起源》，第288页和第405页，注释274。
 - 14 鲁宾逊，《佛朗哥西班牙的起源》，第287—288页。另请参阅吉列尔莫·卡瓦内利亚斯《四位将军：内战的前奏》，见本章注释11。
 - 15 见谢尔瓦《西班牙内战史》，第785页。关于一些军官对反政府军事政变计划的消极态度，见谢尔瓦，《西班牙内战史》，第787页；帕拉西奥·阿塔德撰写的引用了凯波·德·利亚诺将军说法的文章，收入帕拉西奥·阿塔德等著《接近真实的西班牙内战史》一书，见第160—161页；希尔·罗夫莱斯，《不可能和平》，第716—717页；安东尼奥·奥尔梅多·德尔加多和何塞·奎斯塔·莫内雷奥中将，《凯波·德·利亚诺将军》，第85页。
 - 16 谢尔瓦，《西班牙内战史》，第735—816页。
 - 17 同上，第736—737页。
 - 18 同上，第437页，注释1。关于军队领导人谋反活动及其意见分歧的其他描述，见谢尔瓦的文章，收入帕拉西奥·阿塔德等著《接近真实的西班牙内战史》一书，见第72—79页；华金·阿拉拉斯，《西班牙第二共和国史》，第四卷，第295—322和391—402页；海梅·德尔·布尔戈，《谋反与内战》，第521—552页；马克西米利亚诺·加西亚·贝内罗，《范胡尔将军》，第215—283页；希尔·罗夫莱斯，《不可能和平》，第709—787页；《西班牙内战与革命，1936—1939》，第一卷，第96—102页；安东尼奥·德·利萨尔萨·伊里瓦伦，《关于谋反活动的回忆，1931—1936》，第61—142页；佩恩，《现代西班牙的政治和军队》，第314—340页；斯坦利·G.佩恩，《长枪党》，第89—115页；鲁宾逊，《佛朗哥西班牙的起源》，第277—288页；卡洛斯·塞科·塞拉诺，《西班牙史：西班牙语

民族通史》，第六卷，第145—152页；休·托马斯，《西班牙内战》（一九六五年修订版），第153—180页；豪尔赫·比贡将军，《莫拉将军：谋反者》，第87—110页。对于莫拉将军秘密活动特别有价值的描述见莫拉将军的知己好友及其在军事叛乱准备过程中的密切合作者B.费利克斯·迈斯所著《莫拉这个人》一书的第63—311页。

- 19 安东尼奥·拉莫斯·奥利维拉，《现代西班牙的政治、经济和人，1808—1946》，第547页。关于谋杀卡斯蒂略和卡尔沃·索特洛的描述，见费利佩·阿塞多·科伦加将军的《何塞·卡尔沃·索特洛》，第329—351页；阿拉拉斯，《西班牙第二共和国史》，第四卷，第345—368页；《基本原因：西班牙的赤色统治》，第13—24页；谢尔瓦，《西班牙内战史》，第792—795页；埃斯塔多·马约尔·森特拉尔·德尔·埃赫尔西托，《解放战争史，1936—1939》，第一卷，第451—457页；希尔·罗夫莱斯，《不可能和平》，第746—756页；爱德华多·德·古斯曼发表在一九七六年七月十七日《胜利报》上的文章；普列托，《西班牙的动乱》第一卷，第157—162页；第三卷，第133—134和144页；费尔南多·里瓦斯，《人民阵线》，第359—381页；苏加萨戈伊蒂亚，《西班牙内战史》，第28—34页。不过，还可以参阅最新出版的著作：伊恩·吉布森的《杀害卡尔沃·索特洛的那个夜晚》和路易斯·罗梅罗的《杀害卡尔沃·索特洛的原因和手段》。
- 20 谢尔瓦，《西班牙内战史》，第740页。
- 21 同上，第792页。
- 22 普列托发表在一九三六年七月十四日毕尔巴鄂《自由报》上的文章，引自阿拉拉斯《西班牙第二共和国史》，第四卷，第362—363页。
- 23 一九三六年七月十四日《太阳报》。
- 24 苏加萨戈伊蒂亚，《西班牙内战史》，第16—17页。
- 25 引自何塞·古铁雷斯-拉维《人民阵线时期动荡的议会》，第99—100页。“应议长迭戈·马丁内斯·巴里奥的要求，”古铁雷斯-拉维写道，“‘政府自己的特工犯下了我国政治史上没有先例的这一罪行’的指控被从正式记录中删除，因此没有出现在官方的《议会会议记事》中。”（《人民阵线时期动荡的议会》，第100页）
- 26 引自阿拉拉斯《西班牙第二共和国史》，第四卷，第366页；奥雷略·华尼克特，《卡尔沃·索特洛》，第278页；费尔南多·德·巴尔德索托，《弗朗西斯科·佛朗哥》，第108页；苏加萨戈伊蒂亚，《西班牙内战史》，第16页。
- 27 见迪亚斯《斗争的三年》，第156和165页。
- 28 因达莱西奥·普列托的文章，载一九四三年五月一日布宜诺斯艾利斯《阿斯图里亚斯邮报》。
- 29 他的声明当时没有在报刊上发表，但是被马丁内斯·巴里奥引述，见一九四〇年四月二十日墨西哥城《今报》。
- 30 苏加萨戈伊蒂亚，《西班牙内战史》，第40页。
- 31 一九四〇在墨西哥对内尔肯的采访。关于确切的证据，见何塞·阿森西奥将军发表在一九三九年十一月号《我们的西班牙》上的文章；共产党的官方西班牙内战史，《西班牙内战与革命，1936—1939》，第一卷，第150页；何塞·马丁·布拉斯克斯，《我帮助建立了一支军队》，第112页；胡安·莫德斯托，《我是第五团》（圣地亚哥·卡里略推荐），第51和61页；拉蒙·萨拉斯·拉腊萨瓦尔，《共和国人民军史》，第一卷，第127页。
- 32 《米亚哈将军：一位英雄的传记》，第124—125页。
- 33 一九四〇年我在墨西哥对伊达尔戈·德·西斯内罗斯的采访。这次采访的速记记录现存胡佛研究所。值得注意的是，米亚哈将军的副官和仰慕者安东尼奥·洛佩斯·费尔南德斯说，将军不同意移交武器的方式（《保卫马德里》，第64页）。许多年以后，努涅斯·马萨本人向M.特蕾莎·苏埃罗·罗卡证实，米亚哈将军反对发放武器（苏埃罗·罗卡，《西班牙内战中的共和派军队》，第297—298页）；另外，在炮兵上尉乌尔万·奥拉德·德

拉·托雷未发表的回忆录中，这一点也得到证实（同上，第298页，注释5）。

- 34 一九四〇年四月二十日墨西哥城《今报》。
- 35 塞萨尔·法尔孔，《马德里》，第60页。
- 36 见谢尔瓦《西班牙内战史》，第608页。
- 37 我对这次采访所作记录的副本现存胡佛研究所。克拉拉·坎波亚莫支持并且证实了马丁内斯·巴里奥反对发放武器的说法，见《一个共和派所看到的西班牙革命》，第42页和第133页，注释1。一九三四年以前，坎波亚莫是一位共和派议员，军事叛乱爆发时，她与马德里政界关系密切（同上，第ii页）。
- 38 一九四〇年四月二十日墨西哥城《今报》。
- 39 一九四三年五月一日布宜诺斯艾利斯《阿斯图里亚斯邮报》。
- 40 一九四〇年四月二十日墨西哥城《今报》。另请参阅《马丁内斯·巴里奥回忆录》，第358—359页。
- 41 引自贝尔特兰·格尔《民族起义的准备和发动》，第76页；拉斐尔·费尔南德斯·德·卡斯特罗-佩德雷拉，《新西班牙杰出战士的事迹：佛朗哥，莫拉，巴雷拉》，第190页；迈斯，《莫拉这个人》，第306—307页；华金·佩雷斯·马德里加尔，《内战的先兆、爆发和插曲》，第168页；这些人都是军事叛乱的支持者。与马丁内斯·巴里奥通电话的另一位将军是指挥部设在萨拉戈萨的第五建制师师长米格尔·卡瓦内利亚斯，据将军的儿子说，他明确回答说，“太晚了”。（吉列尔莫·卡瓦内利亚斯，《千日战争：西班牙第二共和国的诞生、存在与灭亡》，第424—425页和《四位将军》，第二卷，第79页）
- 42 引自希尔·罗夫莱斯《不可能和平》，第791页。桑切斯·罗曼向希尔·罗夫莱斯绝对信任的某个人透露了这次谈话的细节（同上）。
- 43 马丁内斯·巴里奥的这一表示得到以下证实：伊诺·贝纳德，《莫拉，西班牙的殉道者》，第77页；海梅·德尔·布尔戈，《谋反与内战》第25页；何塞·马利亚·伊里瓦伦，《莫拉》，第107页；卡洛斯·德拉·巴尔戈马，《莫拉：以军人为天职》，第406页；比贡，《莫拉将军》，第115页。在一九四〇年四月二十日墨西哥城《今报》上的文章里，马丁内斯·巴里奥没有提到这一点。然而，多年以后，在写给萨尔瓦多·德·马达里亚加的一封信中，马丁内斯·巴里奥宣称，“从没有寻求过叛军的帮助。”（萨尔瓦多·德·马达里亚加，《西班牙》，[一九四四年]第四版序言）所有证据均与他的这一说法相反。
- 44 根据桑切斯·罗曼的说法，引自希尔·罗夫莱斯《不可能和平》，第791页。
- 45 同上。
- 46 一九四〇年四月二十七日墨西哥城《今报》。
- 47 同上。加西亚·贝内罗重现了桑切斯·罗曼所起草的一份提交叛军将领的详细调解方案，当时身为马丁内斯·巴里奥政府成员的拉蒙·费塞德多年以后向加西亚·贝内罗提供了这一方案（加西亚·贝内罗，《范胡尔将军》，第287—289页）。另请参阅加西亚·贝内罗《西班牙国际史》，第三卷，第102—108页。
- 48 刊登在一九三六年七月十九日《马德里官方公报》上的完整的内阁成员名单如下：迭戈·马丁内斯·巴里奥，曼努埃尔·布拉斯科·加尔松，安东尼奥·拉腊，普拉西多·阿尔瓦雷斯·布伊利亚，贝尔纳多·希内尔·德洛斯·里奥斯，费利佩·桑切斯·罗曼，胡斯蒂诺·阿斯卡拉特，拉蒙·费塞德，恩里克·拉莫斯，奥古斯托·巴尔西亚，马塞利诺·多明戈，何塞·希拉尔，胡安·留伊-巴列斯卡和马德里军区司令何塞·米亚哈将军。
- 49 一九四〇年四月二十日墨西哥城《今报》。另请参阅马塞利诺·多明戈《面对世界的西班牙》，231页。
- 50 苏加萨戈伊蒂亚，《西班牙内战史》，第45页。

- 51 安东尼奥·奥尔梅多·德尔加多和何塞·奎斯塔·莫内雷奥中将，《凯波·德·利亚诺将军》，第98—103页。
- 52 谢尔瓦，《西班牙内战史》，第767页。
- 53 谢尔瓦的文章，见帕拉西奥·阿塔德等的《接近真实的西班牙内战史》，第78页。
- 54 谢尔瓦，《西班牙内战史》，第767页。
- 55 见《西班牙内战与革命》，第一卷，第123—126页；奥尔梅多·德尔加多和奎斯塔·莫内雷奥，《凯波·德·利亚诺将军》，第138页；比贡，《莫拉将军》，第185页。
- 56 奥尔梅多·德尔加多和奎斯塔·莫内雷奥，《凯波·德·利亚诺将军》，第137页。这份公告刊登在一九三六年七月二十三日的《阿贝赛报》（塞维利亚）上。
- 57 另请参阅何塞·曼努埃尔·列瓦纳和G.奥利萨纳的《民族运动》，第175页。
- 58 另请参阅弗朗西斯科·J.德·雷蒙多《光荣的民族运动在巴利亚多利德的兴起和古代莱昂的英雄业绩》。
- 59 实例见曼努埃尔·桑切斯·德尔·阿尔科《马德里收复西班牙南部》，第24页；J.古斯曼·德·阿尔法拉切，《七月十八日！塞维利亚起义光荣史》，第69和92页；安赫尔·戈略内特和何塞·莫拉莱斯，《马拉加：血与火》，第24—25页；奥尔梅多·德尔加多和奎斯塔·莫内雷奥，《凯波·德·利亚诺将军》，第110—117页。
- 60 实例见列瓦纳和奥利萨纳的《民族运动》，第144—145页。
- 61 佩恩，《现代西班牙的政治和军队》，第278—279页。有趣的是，佩恩关于“毛拉是共和国产生的少数几位可靠负责、具有远见的领导人之一”的观点与共和国时期的极左派、毛拉的一位政治对手华金·毛林的观点非常相似（见一九七一年九至十月纽约《自由西班牙报》）。关于米格尔·毛拉本人对（他在加拉尔萨的帮助下）创建突击卫队及其任期内的公共秩序问题的记述以及他对加拉尔萨作为“一位言行谨慎、能力非凡、热心积极、忠实可靠的模范合作者”的毫无保留的赞誉，见毛拉，《阿方索十三世是这样垮台的》，第265—276页。
- 62 苏加萨戈伊蒂亚，《西班牙内战史》，第134页。
- 63 华金·阿拉拉斯编，《西班牙圣战史》，第四卷，第381页。
- 64 这个时间是巴里奥发表在一九四〇年四月二十七日墨西哥城《今报》上的文章提供的。
- 65 一九三六年七月二十三日萨拉戈萨《新闻报》。
- 66 佩恩，《现代西班牙的政治和军队》，第334—335页。
- 67 日期注明为一九三六年九月二十九日的法令，见费尔南多·迪亚斯-普拉哈《文献资料中的西班牙史：内战时期，1936—1939》，第249—250页。关于反叛者权力集团内部最初就该法令措辞的意见分歧，见佩恩《长枪党》，第129—131页；佩恩，《现代西班牙的政治和军队》，第369—373页；托马斯，《西班牙内战》（一九六五年修订版），第365—366页。
- 68 关于对这件重要事情的引人入胜的描述，见路易斯·博林《西班牙：重要的年代》，第10—52页。值得注意的是，据谢尔瓦说，飞机是由臭名昭著的走私者兼商业巨子胡安·马奇出资包租的（《西班牙内战史》，第80页）。另请参阅希尔·罗夫莱斯《不可能和平》，第780页。在一九四二年二月二十七日发表的一份声明（载一九六八年五月一日马德里《阿贝赛报》）中，希尔·罗夫莱斯声称他也参与了安排飞机的事情。关于对西属摩洛哥和西班牙各地军事叛乱的描述，见恩里克·阿克斯《七月十七日：非洲的壮举》，第13—58和89—95页；华金·阿拉拉斯编，《西班牙圣战史》，第二卷，第474—562页，第四卷，第14—606页，第五卷，第15—560页，第六卷，第15—436页；皮埃尔·布鲁埃和埃米尔·特米姆，《革命与西班牙内战》，第82—102页；罗纳德·弗雷泽，《流血的西班牙》，随处可见；维克托·德·弗鲁图斯，《没有输掉内战的人》，第13—22页；加西亚·贝内罗，《范胡尔将军》，第294—350页；《西班牙内战与革命》，第一卷，第123—132、138—175和180—187页；加布里埃尔·杰克逊，《西班牙共和国与内

战, 1931—1939》, 第232—246页; 塞萨尔·M.洛伦索, 《西班牙无政府主义者与权力, 1868—1969》, 第139—144页; 何塞·曼努埃尔·马丁内斯·班德上校, 《进攻阿拉贡与登陆马略卡岛》, 第15—52页; 奥尔梅多·德尔加多和奎斯塔·莫内雷奥, 《凯波·德·利亚诺将军》, 第98—138页; 佩恩, 《现代西班牙的政治和军队》, 第341—352页; 路易斯·罗梅罗, 《一九三六年七月的三天: 十八、十九和二十日》, 第3—616页; 塞科·塞拉诺, 《西班牙史: 西班牙语民族通史》, 第六卷, 第152—164页; 托马斯, 《西班牙内战》(一九六五年修订版), 第131—164和186—189页; 比森特·拉莫斯, 《阿利坎特省的内战, 1936—1936》, 第85—111页; 比贡, 《莫拉将军》, 第111—211页。

- 69 引自巴尔德索托《弗朗西斯科·佛朗哥》, 第115—117页, 注释1。
- 70 《西班牙内战与革命》, 第一卷, 第121—122页。
- 71 马丁内斯·巴里奥发表在一九四〇年四月二十七日墨西哥城《今报》上的文章; 多洛蕾丝·伊巴露丽, 《唯一的道路》, 第260页。
- 72 一九三六年一月十八日《光明报》。
- 73 一九三五年十月十二日《光明报》。
- 74 一九三六年四月二日《工人团结报》。
- 75 多明戈, 《面对世界的西班牙》, 第233页。另请参阅A.C.马尔克斯·托内罗《我的历史见证: 西班牙共和国回忆录》, 第一卷, 第9页。据苏加萨戈伊蒂亚说, 左翼共和党喉舌《政治报》的负责人伊萨克·阿维伊图亚强烈反对马丁内斯·巴里奥政府, 见《西班牙内战史》, 第45页。
- 76 《阿萨尼亚文集》, 第三卷, 第494页。
- 77 爱德华多·德·古斯曼, 《马德里, 红与黑》, 第37页。另请参阅马丁内斯·巴里奥发表在一九四〇年四月二十七日墨西哥城《今报》上的文章; 曼努埃尔·布拉斯科·加尔松(马丁内斯·巴里奥政府成员)发表在一九四七年十一月六日布宜诺斯艾利斯《西班牙共和报》上的文章; 阿图罗·巴雷亚, 《制造反叛》, 第510页; 《西班牙内战与革命》, 第一卷, 第122页。
- 78 一九四〇年四月二十七日墨西哥城《今报》。政府成员桑切斯·罗曼在接受我的采访时确认, 普列托极力劝说马丁内斯·巴里奥继续执政, 坚持认为街头的示威活动不能成为他辞职的理由。这一点得到了拉尔戈·卡瓦列罗的证实, 见《我的回忆》, 第167页。在多年后写给萨尔瓦多·德·马达里亚加的一封信中, 马丁内斯·巴里奥说: “马丁内斯·巴里奥政府毁于卡瓦列罗派社会党人、共产党人以及一些不负责任的共和党人之手。”(马达里亚加, 《西班牙》, 一九四四年第四版序言)
- 79 帕拉西奥·阿塔德的文章, 见帕拉西奥·阿塔德等的《接近真实的西班牙内战史》, 第50页。

革命与第三共和国的崛起

在七月十九日那个狂热的日子，由于遭到左派和右派的抵制，马丁内斯·巴里奥内阁的成员名单甚至还没有在《马德里官方公报》上公布，它就已经被人抛弃了。所有与叛军将领妥协的打算都被迫放弃。一个决心与叛乱斗争的新政府组成，它必须答应工人组织发放武器的要求。“当我接管共和国政府时，”这个政府的总理何塞·希拉尔声称，“我不得不认为与军事叛乱斗争的唯一方法是把我们所控制的那一点点武器发给人民。”¹左翼共和派领导人萨尔瓦多·克马德斯证明：“由于缺乏镇压叛乱的手段，政府不得不向政治组织和工会——人民——做出让步，以使他们能够与叛乱势力做斗争。”²然而，这只是一个被民众的浪潮所裹挟的孤独无助的名义上的政府，它保护不了一九三一年诞生的共和国政权，眼看着共和国政权在军事叛乱和社会革命的双重打击之下迅速瓦解而无能为力。据希拉尔总理说，在政府各部，立即成立了协助并且监督部长的人民阵线委员会，³索性把掩饰真正权力之所在的一切幌子都去掉了。

这就是由共和国总统曼努埃尔·阿萨尼亚的好友何塞·希拉尔组建的自由共和派政府。根据七月二十和二十二日《马德里官方公报》所公布的内容，它的内阁成员如下：

何塞·希拉尔	左翼共和派	总理
奥古斯托·巴尔西亚	左翼共和派	外交部长
塞巴斯蒂安·波萨斯将军	自由共和派	内政部长
路易斯·加斯特略将军	自由共和派	国防部长
普拉西多·阿尔瓦雷斯·布伊利亚	共和联盟	工商部长
恩里克·拉莫斯-拉莫斯	左翼共和派	财政部长
曼努埃尔·布拉斯科·加尔松	共和联盟	司法部长
贝尔纳多·希内尔·德洛斯·里奥斯	共和联盟	通讯和商业海运部长
马利亚诺·鲁伊斯·富内斯	左翼共和派	农业部长
弗朗西斯科·巴尔内斯	左翼共和派	教育部长
安东尼奥·贝劳	左翼共和派	公共工程部长
胡安·留伊-巴列斯卡	加泰罗尼亚左翼共和派	劳工、卫生和物资部长

八月六日，阿萨尼亚派的胡安·埃尔南德斯·萨拉维亚中校接替路易斯·加斯特略任国防部长。⁴“令人钦佩的是，”一年之后阿萨尼亚总统对何塞·希拉尔说，“当没有人愿意服从命令时，当所有人——从最重要的到最卑微的——都准备溜之大吉时，你镇静而勇敢地接过了指挥权。”⁵

当反叛的兵营加入暴动或者被武装起来的工人和忠于政府的军队打败时，这个国家在一个又一个村镇、一个又一个城市分裂成碎片。由于叛乱在马德里、巴塞罗那、巴伦西亚、马拉加、毕尔巴鄂以及一些较小城镇的失败，叛军最初只夺取了全国三分之一的地盘。七月二十日那一天，在大约八千八百五十名现役军队指挥官和军官当中，有四千六百六十人身在反叛的兵营，其余的军官处于左派控制区，这不包括西属摩洛哥，实际上，那里的整个军官团全都支持叛乱。⁶像先前其他军官所做的那样，左派控制区的许多军官最终逃到了叛军的地盘。尽管人民军中的共产党人指挥官恩里克·利斯特声称，内战期间在左派建立的人民军中服役的正规军军官有两千人，⁷但是，人民军的总政治部主任胡利奥·阿尔瓦雷斯·德尔巴约断言，“不到五百名军官仍然在为共和国效力”，“旧军队几乎没有留下什么可以利用的东西”。⁸因为军官团即使不被左派憎恶，通常也得不到左派的信任，而且因为当军官的忠诚受到怀疑时，他们往往被人排挤、遭到监

禁或者处决，所以，较低的数字也许更符合当时的特征。实际上，这得到了可以高度信赖的共和派军官赫苏斯·佩雷斯·萨拉斯上校的证实。⁹值得注意的是，与通常所认为的恰恰相反，现役将军中支持叛乱的人比继续留在政府一方的要少得多。军事叛乱的支持者兼历史学家里卡多·德拉·谢尔瓦写道，七月十七日，在西班牙的十八位师级将领中，只有四人参加了叛乱：卡瓦内利亚斯、凯波·德·利亚诺、佛朗哥和曼努埃尔·戈代德。¹⁰据同样是军事叛乱支持者的比森特·帕拉西奥·阿塔德说，在现役的五十六位准将中，“十四人反叛，至少二十九人继续站在政府一边”。¹¹不过，独立共和派人士兼历史学家马达里亚加的看法无疑是正确的：“在与政府站在一边的军官里，只有少数人是出于个人信仰而这样做的。大多数成为他们战友的人则是因为担任着不得不这样做的职务；这些人经常试图越过前线，有时他们也会得逞。”¹²

君主时期创建并被共和国当作一支国家防御力量保留下来的警察部队国民卫队同样支离破碎。¹³尽管在国民卫队总共三万四千三百二十名官兵中，大约两万零一百二十人在七月二十日那一天身处左派阵营，¹⁴不过还是难以确定究竟有多少人仍在政府的实际控制之下，因为当时许多人脱掉制服加入了无产阶级的民兵队伍，另外还有数千人开小差投靠了叛军。¹⁵实际情况是，据来自共产党方面的消息说，一九三六年十一月，在左派控制区总共有一万五千名国民卫队官兵，¹⁶不过，这已是在将其重新组建成为共和国国家卫队继而招募了数千名新兵之后。¹⁷

秘密警察也被解散，它的大部分特工支持叛乱。¹⁸就连一九三一年被共和国当作新政权的支柱之一而创建的警察部队突击卫队——它有大约两万五千名官兵，¹⁹由于大批人员倒戈投向叛军²⁰，以及在叛乱失败的地方被工会组织和左翼党派临时拼凑的治安委员会和民兵小分队夺走了警察的职能，²¹同样土崩瓦解了。

“国家崩溃而且没有给共和国留下任何军队、任何警察，留给它的是因背弃和破坏而元气大伤的行政机构，”几周之后成为外交部长的社会党左派阿尔瓦雷斯·德尔巴约写道，²²“从军队领导人和最高法院法官直到海关官员，我们不得不更换一九三六年七月十八日以前管理共和国国家机器的大部分人员。仅仅在外交部，前外交使团百分之九十的人员挂冠而去。”²³

用著名共产党领导人“热情之花”（多洛蕾丝·伊巴露丽）的话说：“整个国家机器遭到破坏，国家权力躺在了街头。”²⁴后来担任内政部长的社会党温和派人士苏加萨戈伊蒂亚写道：“国家权力在大街上零落成尘，权力的碎片被每一个反法西斯的公民掌握支配，他们以某种最符合自己心意的方式利用它。”²⁵的确，它的崩溃如此彻底，以致只剩下“国家的尘埃，国家的废墟”——一位共和派法官如是说。²⁶

49 作为国家权力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以前由边防警察部队实施的港口和边境控制被工人委员会或工会组织和左翼政党所领导的地方机构接管了。“政府完全无能为力，”社会党温和派人士胡安·内格林博士在后来出任内阁总理时回忆说，“因为没有任何边境或港口处在政府的掌握中。我国的边境和港口全部都由私人、当地、地区或者各省的机构控制着，政府当然感到无法行使它的权力。”²⁷“工人和海关官员严格控制着[里波尔的]边境地区，”一份共产党的报纸报道说，“他们只听从工人组织的命令。”²⁸“在博港的海关检查站，”一位目击者写道，“没有让我们这些巴黎人感到不安的革命迹象。海关官员仍旧身穿过去的制服，他们无精打采地做着事，似乎有什么东西连他们的这点权力也剥夺了。护照审验室的门敞开着。这里说明了一切问题。室内的各个位置都有反法西斯民兵组织的人员守卫。他们身穿蓝色制服，披挂着子弹带。他们用手枪和步枪武装到牙齿。在一条长桌后面，坐着三个佩带手枪的工人。他们正在检查护照和证件。”²⁹

在海军，据内战期间担任海军第一政委的社会党温和派人士布鲁诺·阿隆索说，百分之七十的军官被他们的部下打死，同时由水兵委员会行使指挥权。阿隆索写道：“对水兵的长期压迫及其所遭受的传统不公和羞辱在他们的内心深处积聚起仇恨，当叛乱发生并导致人们在很大程度上被激情冲昏头脑时，这种仇恨得以宣泄。”³⁰“军官能否在暴力行为中幸免于难由水兵选出的委员会决定，”苏加萨戈伊蒂亚写道，“而水兵委员会的决定完全是随心所欲做出的。”³¹

在左派控制区，市政当局和其他地方管理机构的职能也被各种委员会篡夺了，社会党人和无政府主义工会主导着这些委员会。³²“在我们控制的所有省份，”内战爆发几星期后一位无政府工团主义领导人宣称，“这

些革命机构使政府代表不复存在，因为他们除了服从委员会的决定之外别无选择。……资产阶级旧政权的地方管理部门只剩下了残骸，因为它们的生命力已经被工会的革命活力所取代。”³³“这些委员会是无产阶级政权的萌芽。”发表在某社会党左派刊物上的一篇文章写道，“它们代表一切革命力量。……在农村，它们夺取了政治生活和经济生活的控制权。在城镇……他们参与管理所有事务。”³⁴“七月十九日以后，”加泰罗尼亚地区^①监狱总长拉斐尔·塔西斯-马卡写道，“在紧张而且充满火药味的气氛中，[加泰罗尼亚各省]市政当局立即变得气息奄奄、失去了活力。……各种委员会的橡皮图章代替了……市长的签字。”³⁵无政府工团主义组织关于塔拉戈纳省的一份文件宣称，“所有地方都建立了当地的反法西斯民兵委员会。这些委员会控制着社区的全部活动。”³⁶“战争和政治的中心在大街上。”社会党人历史学家安东尼奥·拉莫斯·奥利维拉写道，“权力掌握在人民、党派、委员会手里。”³⁷

法院被以其独有方式进行审判的革命法庭所取代。“每个人做出自己的判决，然后执行这些判决。”一九三六年十一月成为司法部长的无政府主义领导人胡安·加西亚·奥利韦尔宣称，“有人习惯把这叫作‘私刑处死’[paseo]，但我坚持认为，这是人民在正规司法机关完全瘫痪的情况下直接实施的正义。”³⁸据社会党人阿图罗·巴雷亚说，在马德里，工会和政党的每个分支和派系都建立了“各自的警察、监狱、行刑队及专用刑场”。³⁹法官、地方法官和地方检察官被解除职务，一些人被监禁，另一些被处死，⁴⁰与此同时，许多地方的司法档案付之一炬。⁴¹

为了约束革命的恐怖活动，何塞·希拉尔政府设立了“人民法庭”。这些法庭给人以判处死刑合乎宪法的假象，⁴²但对控制恐怖行动几乎不起什么作用。实际上，据社会党温和派人士因达莱西奥·普列托说，一九三六年九月，由三名专业法官和十四名来自主要左翼政党和工会组织的陪审员所组成的马德里人民法庭⁴³将其判处前激进党政府部长拉斐尔·萨拉萨尔·阿隆索死刑的裁定通知政府之后，内阁做出的将萨拉萨尔减刑为终身监禁的决定没有得到贯彻执行。由于不能证明萨拉萨尔·阿隆索参加了军

① 加泰罗尼亚地区包括西班牙东北部的赫罗纳、巴塞罗那、塔拉戈纳和莱里达四个省份。

事叛乱，当时身为内阁部长的普列托投了同意减刑的决定性一票，但是，人民法庭的主审法官马里亚诺·戈麦斯——以前是巴伦西亚的地方法官，后来成为最高法院院长——随后立即告诉普列托，他确信政府的决定将在人民法庭内部引起一场“可怕的哗变”，接着，这名犯人将会随随便便地被枪毙。“政府没有强制执行其决定的足够手段，”戈麦斯接着说，“因此，它将无法挽救他的生命，而且……它将威信扫地。不过，这还不是最糟糕的：我绝对相信，人民法庭将会拒绝继续履行它的职责，接着，在萨拉萨尔·阿隆索之后，所有政治犯将被子弹打成筛子，也许就在今天晚上。”在得知一百多名犯人可能被枪毙之后，普列托改变了决定，投票支持处以死刑。⁴⁴

51 银行突然遭到搜查，它们的寄存保险箱被洗劫一空。⁴⁵宗教裁判所和监狱被闯入，它们的档案被销毁，它们的囚犯被释放。“监狱的大门被打开，以便释放政治犯，”一位共和国的支持者写道，“普通刑事犯也自动跟着出了狱。”⁴⁶当然会出现怪异的情节。马达里亚加写道：“刑事法庭的法官突然在自己的公寓里发现了不久前被他判处三十年苦役的小偷和罪犯，他们摇身一变成为民兵，在抢走了这一家人的金银物品并用亚麻床单打包之后，他们当着法官妻子女的面开枪将其打死。”⁴⁷

成百上千座教堂和修道院被放火焚烧或者改作世俗之用。⁴⁸“天主教的巢穴不复存在，”无政府工团主义者的喉舌《工人团结报》宣称，“人民的火炬将它们化为灰烬。”⁴⁹“受压迫的人民放火焚烧了他们在前进道路上发现的蒙昧欺骗的活动场所。”发表在某无政府主义青年报刊上的一篇文章写道，“教堂、修道院、反动派聚会的地方，无论香烟缭绕还是阴森黑暗，统统都被付之一炬。”⁵⁰“为了这场事实上的革命，”一份无政府主义青年宣言宣称，“我们必须摧毁反动派的三大支柱：教会、军队和资本主义制度。教会已经受到痛斥，教堂已经被我们烧毁，没能逃走的教会乌鸦已被人民监视起来。”⁵¹在塔拉戈纳省，《工人团结报》报道说：“所有村子里的教堂都被付之一炬。只有可以用于服务百姓的建筑保留了下来，但不包括那些焚烧之后非常危险的教堂。许多教堂被改成了公用仓库，还有一些改为反法西斯民兵使用的车库。”⁵²在数不尽的城镇和乡村，情况全都如此。然而，人称“红色”坎特伯雷教长的休利特·约翰逊主教大人

一九三七年春天在巴伦西亚接受我的采访时却肯定地说，“没有一座教堂”遭到破坏或亵渎。这并不奇怪。如同戴维·科特所指出的那样：“这位看似圣徒的神父是他那个时代最坚定的同路人之一。”⁵³与他断言“没有一座教堂遭到亵渎或破坏”形成对照的是，一九三七年七月一日的“西班牙主教联名信”声称，“遭到破坏或被劫掠一空”的教堂和小礼拜堂有两万座之多。⁵⁴

保罗·布兰沙德对焚烧教会建筑的现象作了如下解释：“[在最近一百年间]教会一次又一次被反教权主义的政治势力所羞辱，它的建筑一次又一次被反教会的暴民所焚烧，主要的宗教派别一次又一次被这个国家所取缔。这个号称世界上天主教最普及的国家所杀害的神父和修女、所烧毁的修道院和教会学校可能比世界上任何别的国家都要多。……由于被认为是国家统治机器的组成部分，教会因此受到迫害。近两百年来在西班牙，主张民主政治的人无意识中都成了反教权主义者，而独裁政权的捍卫者往往倾向于亲天主教的立场。”⁵⁵

成千上万名神职人员和宗教团体成员以及有产阶级人士被杀害，⁵⁶另一些人则因害怕遭到逮捕或处决而逃往国外，其中包括许多著名的自由共和派与温和共和派人士。⁵⁷在一九三七年六月与共和派法官安赫尔·奥索里奥-加利亚多进行的一次谈话中，当谈到大批“著名甚至地位显赫的共和派人士”离开西班牙时，阿萨尼亚总统不满地说：“他们离开均未经过我的同意或者征求我的意见。而且有些人（我把他们的名字告诉了他）还欺骗了我。对于那些愿意留下的人——他们都在这里——什么事情也没发生！你知道[一九三六年]二月组成我的政府的那些部长还有几个仍然留在西班牙吗？两个：卡萨雷斯和希拉尔。如果说哪个人肯定有危险，这是说的卡萨雷斯。他就在马德里。在我任命的‘政府’使节中，只有迭斯-卡涅多一人离开任所来到巴伦西亚问候[我]并为政府继续效力。其他人都留在了法国。……我把他们中的许多人从无名小卒提拔起来。我把他们大家从一九三三年的危难中解救出来并使他们成为议员、部长、大使、副部长，等等，等等。他们全都有责任为共和国服务至死方休，只要我还在职，他们就应该和我患难与共。这些人中有两三个终于明白了这一点，所以他们回来了。”⁵⁸

成千上万担心遭到监禁或草率处决的人躲进了马德里的大使馆和公使馆。关于此类避难者的人数存在着各种不同的估计。诺曼·J.帕德尔福德说，估计超过了五千人。⁵⁹智利大使兼马德里外交使团团团长奥雷略·努涅斯·莫尔加达断言避难者超过一万五千人，⁶⁰而作为外交部长为使避难者离开使馆进行谈判的阿尔瓦雷斯·德尔巴约提供的数字是两万人。⁶¹另一方面，在详细查阅了外交信函和其他资料来源之后，哈维尔·鲁维奥得出了七千五百人这个较低的数字，不过他仍然认为这“在国际关系史上前所未有”。⁶²挪威临时代办费利克斯·施莱尔说，最小的使馆之一挪威公使馆躲进了九百名避难者，⁶³与此同时，据墨西哥大使曼努埃尔·佩雷斯·特雷维尼奥将军说，墨西哥大使馆向八百多人提供了政治避难权。⁶⁴

由于这种扩展到外国使馆的避难所，成百上千人——如果不是成千上万人的话——的生命幸免于难，因为正如社会党左派路易斯·阿拉基斯塔因在革命开始的第五天写给妻子的私人信件所说：“对残敌的清理将是可怕的。它已经是可怕的了。没有一个法西斯分子可以继续活下去，尤其是那些最重要的法西斯分子。谁也不能阻止人民。”⁶⁵

在事态一片混乱的情况下，无政府主义运动的重要成员费德丽卡·蒙特塞尼写道：“我们已经证实了一些我们只是从理论上知道的东西，即，革命具有盲目性和破坏性，革命行为夸张而残忍，不加控制和无法控制的力量在革命的过程中肆无忌惮地发挥着作用；一旦迈出去第一步并且突破了第一道障碍，人民就会像洪流一样从这个突破口奔涌而出，结果，这股洪流不可阻挡。在斗争最激烈的时候，在失去理智的暴怒中，有多少人要遇难遭殃！人还是我们认识的那些人，既没有变得更好，也没有变得更坏。……他们暴露了自己的丑恶和美德，尽管以前似乎无法想象：无赖的心中萌动着某种潜在的真诚，老实人的内心深处冒出某种野兽的欲望——想去杀人，希望流血。”⁶⁶

“我们不想否认七月十九日造成了激情和伤害的泛滥，”加泰罗尼亚地区著名的无政府主义者迭戈·阿瓦德·德·桑蒂连公开宣称，“这是随着权力从特权阶级手中转移到人民手中而出现的一种自然现象。我们的胜利可能导致三四百名加泰罗尼亚居民死于暴力，他们被列为右派分子，因而人们把他们与政治或教会的反动势力联系起来。但是，这种流血是一场

革命不可避免的后果。不管出现什么障碍，这场革命就像洪流一样奔涌，将其前进道路上的一切荡涤干净，直到它渐渐失去动力为止。”⁶⁷

不过，一位巴斯克民族主义者、共和派人士兼天主教徒写道：

流血，两边都有许多无辜的人在流血。……然而，就共和派控制区而言，最根本的不同恰恰在于[军事]叛乱这一事实——这并不证明过激行为是合理的，但是至少解释了它们是为为什么发生的。且不论负有维持治安职责的警察部队是否参与，军队、几乎所有秘密警察以及司法机关丢下没有防卫能力的合法政府造了反。后者不得不把人民武装起来，监狱的大门被打开，以便释放政治犯，普通刑事犯也自动跟着出了狱。此外，随着社会底层的骚动，存在于每个城市、每个民族的那些坏人渐渐开始抛头露面，他们发现了适合自己的用武之地。在正常时期，警察会把他们置于控制之下，但是，正是这场叛乱使政府失去了强制力量，从而导致犯罪分子弄到了武器。在叛乱最初的那一段日子，这些无人管制的犯罪分子为所欲为难道令人意外吗？与此同时，极左派组织以某种粗暴而简单的方式实施正义，人们受到的审判是在仇恨的气氛中进行的。所有这一切并不证明人们在共和派控制区所犯下的那些罪行合理，但这有助于解释它们是为为什么发生的。

无法解释甚至更不合理的是军队、警察以及那些受过教育的年轻绅士——他们应有尽有并以信仰天主教而自豪——所犯下的数量更多、手段更加残忍的罪行。⁶⁸

“革命在一个既不愿意也不可能支持它的共和国政府执政期间开始进行。”过了一段时间阿萨尼亚总统写道，“过激行为逐渐开始在部长们惊讶的目光下出现。面对革命，政府可以选择支持或镇压。但是，与支持革命相比，政府更不可能进行镇压。它有没有镇压所需要的足够武力值得怀疑。我确信它没有。尽管如此，使用武力仍将引起另一场内战。”⁶⁹

失去国家的镇压机器，自由派的何塞·希拉尔政府成了有名无实的政权，⁷⁰它的权力因此而被分解为无数的碎片散落到上千个城镇和乡村的革命委员会手中，它们控制着邮政局和电报局、⁷¹广播电台⁷²和电话交换机，⁷³组

织了警察分局和法庭、公路和边防巡逻队以及运输和供应部门，并且建立了上前线打仗的民兵部队。总之，如同一些著名的反佛朗哥阵营拥护者用大量证据证明的那样，何塞·希拉尔内阁在西班牙的任何地方都无法行使真正的权力。⁷⁴

随着军事叛乱的爆发，经济像政治一样突然发生了急剧的变化。

在那些叛乱失败的省份，两个工会组织——社会党人的劳动者总工会和无政府工团主义者的全国劳工联合会⁷⁵——的工人控制了大部分经济活动。⁷⁶

尽管大量无可辩驳的证据表明，一九三六年七月，一场广泛的社会革命搞垮了共和国政权，然而，内战期间采访报道左派阵营的《纽约时报》通讯记者赫伯特·L.马修斯——四十年来他是公认的西班牙问题权威，他的著作和文章对美国舆论产生了显著的影响——在一九七三年出版的其最后一部关于西班牙内战的著作中对革命导致的变化轻描淡写毫不在意。他首先引用了自由主义历史学家加布里埃尔·杰克逊的说法，“在仍由人民阵线控制的许多地区，发生了十五世纪以来最深刻的社会革命”，接着，他评论道：“几乎每一个研究西班牙内战的历史学家都以多少有点不容置疑的措辞表达了同样的观点。我要说的是，的确发生了一些事情，勉强称得上一场革命，但是不应对它言过其实。从某种严格的意义上讲，革命根本没有发生，因为共和国政府的运转情况与内战之前几乎一样。”⁷⁷

这段引语是一个例证，证明一些支持政府的新闻记者后来通过自己的著作使他们在内战期间就基本事实所传播的真假参半的欺骗性描述和歪曲性报道继续存在。

尽管如同我们将在后面某一章所看到的那样，由于外交方面的原因，共产国际遵照克里姆林宫的指示，试图对外界掩盖这场席卷了西班牙的范围广泛的社会革命，但是，即使根据共产党方面的资料来源，从来也不缺乏有关西班牙革命之广度和深度的证据。“参加叛乱与人民为敌的大资本家还是工厂的主人吗？”共产党总书记何塞·迪亚斯问道，“不，他们已经不见了踪影，于是，工厂……落到工人手中，由工会掌控。”⁷⁸“今天，”共产党控制的劳动者总工会加泰罗尼亚地区联合会书记安东尼奥·塞赛宣称，“工人拥有了工厂，工人拥有了银行，工人拥有了土地，工人拥有了

武器。”⁷⁹内战刚刚爆发不久，苏联首席记者、斯大林个人在西班牙的代理人米哈伊尔·科利佐夫说，根据粗略的估计，约有一万八千家工商企业被工会和政府所接管，其中两千五百家设在马德里，还有三千家企业设在巴塞罗那。⁸⁰

地产被没收，一些被集体化，另外一些分给了农民，同时，在无数城镇和乡村，公证档案和财产登记簿被付之一炬，尽管官方公报一年多后仍不承认财产记录被销毁了。⁸¹在反佛朗哥阵营控制的“各个省份”，共产党领导人何塞·迪亚斯断言，“大地主已经不复存在”。⁸²

55
隶属于劳动者总工会和全国劳工联合会的农业工人工会组织成百上千次地对私人财产进行没收，然后，他们到土地改革协会把没收的财产登记在案。土地改革协会是农业部的代理机构，经常发布报告列出所没收的财产清单。这些报告的措辞似乎表明，登记在案的财产已被土地改革协会没收，随后交给农业工人工会处理，然而事实却是，除了极少数的例外，土地改革协会只是登记一下没收的财产。“我可以肯定地说，而且每个人都知道，”在革命的最初几个月担任土地改革协会秘书长的拉斐尔·莫赖塔·努涅斯写道，“把土地交给农民的不是政府。农民不等政府决定就把庄园和可耕种土地直接据为己有了。”⁸³例如，据一位敏锐的观察家说，在雷阿尔城省，“绝大多数较大的庄园都被他们没收然后实行集体化，而在整个过程中，[土地改革协会的]任务只是投出一张表示合法的赞成票”。⁸⁴工会看到了将它们没收的财产向土地改革协会登记的好处，因为这往往会使它们的行为合法化，同时还使没收的庄园有资格得到这一政府代理机构的技术和经济援助。⁸⁵

铁路、有轨电车和公共汽车、出租汽车和船舶、电灯和电力公司、煤气厂和自来水厂、工程机械和汽车组装厂、矿山和水泥厂、纺织厂和造纸厂、电气设备和化工公司、制瓶厂和香水调制厂、食品加工厂和酿造厂以及大量其他企业被工人委员会没收或控制，实际上，对于企业主来说，两种形式具有差不多同样的意义。例如，在加泰罗尼亚地区，一个由全国劳工联合会和劳动者总工会共同建立的联合委员会控制了属于国际电话电报

公司^①的子公司西班牙国家电话公司的电话系统，结果，据对该委员会具有决定性影响的无政府工团主义者证实，除了保留一个收支账户之外，没有给资方留下其他任何职权；而且，不经联合委员会同意，资方无权撤资。⁸⁶另一个例子是巴塞罗那牵引、照明及电力有限公司的子公司埃布罗河灌溉与电力公司的情况，它也被全国劳工联合会和劳动者总工会的一个联合委员会控制了。据一份正式报告称，该委员会掌管了公司的设备、银行账户和其他财产，从而使资方无法“对公司的业务和财务状况进行有效的控制”。⁸⁷

电影院和剧院、报纸和印刷厂、百货商店和旅馆、高级餐馆和酒吧也被没收或控制，同样被没收或控制的还有各种商业和行业协会的总部以及成千上万套属于上流社会人士所有的住宅。⁸⁸

56 但是，如同我们将在接下来的一些章节中所看到的那样，发生在城镇和农村的经济变化并非仅限于社会富裕阶层的财产。随着政府的垮台，所有障碍都不复存在，因此，对于革命群众来说，这是一个十分诱人的时刻，以致他们无法不按照自己内心的向往去改善整个经济生活。

“在最初那些乐观主义洋溢的日子里，”曼努埃尔·阿萨尼亚在内战结束之后写道，“几乎所有西班牙人的精神都被某种救世理想激励着。只不过，在民族主义阵营一方，那是他们正在拯救的西方基督教文明；在共和派阵营一方，预言家宣告一种新的文明诞生。多么可怕的夸张啊，轻而易举地激起了西班牙人心灵中不切实际的幻想！”⁸⁹

注释：

- 1 何塞·希拉尔的文章，载一九三八年七月十九日巴塞罗那《先驱报》。另请参阅他的演说，载一九三七年三月十日《巴伦西亚呼声报》。
- 2 萨尔瓦多·克马德斯的演说，载一九三八年十一月二日马德里《政治报》。另请参阅《阿萨尼亚文集》，第三卷，第487—488页；《西班牙内战与革命，1936—1939》，第一卷，第177页；因达莱西奥·普列托，《西班牙的动乱》，第三卷，第149页。

① 国际电话电报公司（International Telephone and Telegraph Corporation，缩写为ITT）是美国资本的电信公司，成立于一九二〇年，总部设在纽约。

- 3 一九四〇年我在墨西哥对何塞·希拉尔的采访。
- 4 一九三六年八月七日《马德里官方公报》。
- 5 《阿萨尼亚文集》，第四卷，第862页。
- 6 根据里卡多·德拉·谢尔瓦在第一手资料的基础上所进行的细致研究，见《西班牙内战史》，第756—757和760页。另请参阅比森特·帕拉西奥·阿塔德撰写的文章，见帕拉西奥·阿塔德等的《接近真实的西班牙内战史，1936—1939》，第41—42页。尽管谢尔瓦（在收入雷蒙德·卡尔所编《西班牙共和国与内战》一书的文章中，见第188页）引用这些数字来表现军队内部的意识形态分歧，但是，它们在很大程度上不可避免地受到地盘划分的影响，谢尔瓦在其主要著作《西班牙内战史》中丝毫没有低估这一因素，见第760—761页。
- 7 恩里克·利斯特，《我们的战争：对西班牙人民民族革命战争史的贡献，1936—1939》，第275页。右翼历史学家帕拉西奥·阿塔德说，这一数字高达三千五百人，见比森特·帕拉西奥·阿塔德编的（《西班牙内战文献目录笔记簿，1936—1939：见证人的回忆和报道》，第142页。
- 8 胡利奥·阿尔瓦雷斯·德尔巴约，《自由之战》，第122页。
- 9 赫苏斯·佩雷斯·萨拉斯上校，《西班牙内战，1936—1939》，第259页。另请参阅塞希斯孟多·卡萨多上校的文章，载一九三九年七月号《国家评论》。
- 10 谢尔瓦的文章，见卡尔编的《西班牙共和国与内战》，第190页。
- 11 帕拉西奥·阿塔德的文章，见帕拉西奥·阿塔德等的《接近真实的西班牙内战史，1936—1939》，第41—42页。
- 12 马达里亚加，《西班牙》，第487页。
- 13 在阿拉拉斯所编《西班牙圣战史》中可以看到对各省国民卫队立场的描述。另请参阅何塞·曼努埃尔·列瓦纳和G.奥利萨纳的《民族运动》。
- 14 根据谢尔瓦所进行的细致研究，见《西班牙内战史》，第760页。另一方面，西班牙历史学家拉蒙·萨拉斯·拉腊萨瓦尔说，内战爆发以后，百分之五十一·三六的部队仍然留在共和派阵营。以谢尔瓦的三万四千三百二十名官兵总数为基础，这意味着大约一万七千五百人仍然留在共和派控制区（萨拉斯·拉腊萨瓦尔，《准确翔实的内战资料》，第60和270—271页）。不过，只有人员的数字并不能显示事情的全貌，因为这些数字没有考虑由于革命以及左派组织僭夺警察权力所导致的部队内部指挥失灵和士气低落。
- 15 例如，雷帕拉斯上尉对他与一大批国民卫队队员一起从哈恩逃跑的情况的描述，见安东尼奥·雷帕拉斯-特雷斯加略·德·索萨上尉《从米亚哈的指挥部到圣母头像神庙》；一九三七年二月十八日《工人团结报》对四十名国民卫队队员试图加入佛朗哥将军军队的报道；胡利安·苏加萨戈伊蒂亚，《西班牙内战史》，第103页。
- 16 据一九三六年十一月三日《工人世界报》。
- 17 一九三六年八月二十一日《马德里官方公报》。
- 18 根据内战后期担任军事调查局（SIM）高级官员的何塞·穆尼奥斯·洛佩斯一九五〇年在墨西哥向我介绍的情况，叛乱爆发时秘密警察完全失去了作用，因此必须重建，它的三千名成员只有三百人仍然忠于政府。
- 19 这是谢尔瓦提供的一个约略的数字，见《西班牙内战史》，第757页。另一方面，拉蒙·萨拉斯·拉腊萨瓦尔提供的数字是将近一万八千人（《共和国的人民军队史》，第一卷，第74页）。
- 20 突击卫队支持叛乱的部分省会是布尔戈斯、韦斯卡、萨拉戈萨、巴利亚多利德、卡塞雷斯、格拉纳达、莱昂、洛格罗尼奥、潘普洛纳、萨拉曼卡（列瓦纳和奥利萨纳，《民族运动》，分别见第209—210、154、201—202、192、216和193页）、奥维耶多（奥斯卡·佩雷斯·索利斯，《包围和保卫奥维耶多》第24页；赫米尼亚诺·卡拉斯卡尔，《阿斯图里

- 亚斯：一九三六年七月十八日至一九三七年十月二十一日》，第52页）和特鲁埃尔（阿拉拉斯编，《西班牙圣战史》，第四卷，第238页）。据拉蒙·萨拉斯·拉腊萨瓦尔说，突击卫队百分之七十的部队仍然服从政府的指挥（《准确翔实的内战资料》，第61页）。不过，应当记住，像许多国民卫队成员一样，大量突击卫队队员加入了革命的民兵组织。
- 21 对内战初期政府这支警察部队的残部完全失去作用的坦率描述，见一九三六年九月成为内政部长的社会党政治家安赫尔·加拉尔萨的演说（载一九三七年八月五日《巴伦西亚通讯》），一九三六年十一月担任司法部长的无政府主义领导人胡安·加西亚·奥利韦尔的演说（载一九三七年六月一日《社会熔炉报》）。另请参阅（共和国的支持者）赫苏斯·德·加林德斯，《被围困的马德里城中的巴斯克人》，第15—19页和内政部长一九三六年十二月二十六日所颁布的法令的序言，载一九三六年十二月二十七日《马德里官方公报》。
 - 22 《自由之战》，第261页。
 - 23 同上，第224页。
 - 24 多洛蕾丝·伊巴露丽，《演讲文论集，1936—1938》，第214页。“共和国像一座纸房子似地倒塌了。”当时的一位共产党人费尔南多·克劳丁写道，“……生产手段和政治权力实际落入工会组织之手。”（《共产主义运动的危机》，第一卷，第179—180页）西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比森特·乌里韦同样直言不讳，他在自己没有发表的回忆录中断言，“旧的共和国已不复存在，它只剩下个外壳”（《回忆录》，打印稿，第12页）。
 - 25 苏加萨戈伊蒂亚，《西班牙内战史》，第47页。
 - 26 安赫尔·奥索里奥-加利亚多，《孔帕尼斯的人生与献身》，第179页，另见第169页。可能仍然需要来自共和派阵营的进一步证明共和国崩溃的证据，见曼努埃尔·阿萨尼亚《马德里》（一九三七年十一月十三日的演说），第7—8页；一九三八年七月十六日《政治报》（社论）；一九三七年八月五日《巴伦西亚通讯》（安赫尔·加拉尔萨的演说）；一九四〇年二月二日墨西哥城《加泰罗尼亚人民报》（何塞·瓜内尔少校的文章）。
 - 27 内格林的演说，载一九三七年十二月二日《每日图片报》。
 - 28 一九三六年七月二十二日《劳动报》。关于工人民兵对从包森到博港的整个加泰罗尼亚—法国边境地区的控制，见一九三六年八月六日巴塞罗那《人道报》。
 - 29 M.斯特林（马克·沙龙）的文章，载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号纽约《现代月刊》。另请参阅沃尔特·杜兰德发表在一九三六年九月十七日《纽约时报》上的文章；R.卢宗发表在一九三六年八月十日《无产阶级革命》上的文章；阿尔瓦雷斯·德尔巴约，《自由之战》，第164页；H.E.卡明斯基，《巴塞罗那》，第11页；约翰·兰登-戴维斯，《在西班牙的街垒后面》，第90—91页；佩雷斯·萨拉斯，《西班牙内战》，第122页。
 - 30 布鲁诺·阿隆索，《共和国舰队与西班牙内战》，第25页。
 - 31 苏加萨戈伊蒂亚，《西班牙内战史》，第157页。关于共和国舰队的缺乏纪律性，见《在西班牙共和国的旗帜下，1936—1939：苏联志愿参战人员回忆录》一书中苏联海军武官N.库兹涅佐夫——他是卡塔赫纳海军基地司令安东尼奥·鲁伊斯的顾问——的文章，第198页。另外，关于杀害军官、埃尔费罗尔海军基地的水兵平息军事叛乱失败、共和国舰队缺乏战斗力以及内战期间主要海军行动的情况，见内战时期佛朗哥将军的舰队司令弗朗西斯科·莫雷诺海军上将，《海上的战争》，第69—70和78—279页。关于主要海军基地和舰队舰只的更多情况，见曼努埃尔·D.贝纳维德斯《派往岬角的舰队》；路易斯·卡雷罗·布兰科，《西班牙与海洋：第二次世界大战前战争与和平中的海洋》，第一卷，第562—566页；何塞·塞尔维拉·佩里，《海上的叛乱与革命》，第41—127、129—237、260—264和269—277页；丹尼尔·苏埃罗，《红色舰队》，第121—247页。最有价值的英语文献是匹兹堡大学的小C.威拉德·弗兰克的博士论文《海上霸权，海洋政治与西班牙内战的爆发》（第546页），这是一部写作中的大部头著作的第一部分，它对海上霸权和海

洋政治在整个内战当中所起的作用进行了考察。

- 32 巴斯克各省肯定应被当做例外，在那里，主要由于信奉天主教的巴斯克民族独立党的影响，民众的反应与别的地方相比较温和。见曼努埃尔·德·伊鲁霍《内战之前巴斯克地区的状况》，第23—25、45—46、50—52和64—65以及巴斯克自治政府总理何塞·安东尼奥·阿吉雷写给中央政府的报告，第2—4、7—8、10—11、13—15、17—18和22页。另请参阅何塞·安东尼奥·阿吉雷《管理巴斯克自治政府二十年，1936—1956》，第28—29和49页；何塞·马利亚·阿雷尼利亚斯，《巴斯克地区、民族问题和社会主义革命》；A.德·利萨拉，《巴斯克人和西班牙共和国》，第58—59页及书中各处；斯坦利·G.佩恩，《巴斯克民族主义》，第178—181页。
- 33 胡安·洛佩斯的演说，载一九三六年九月二十一日马德里《全国劳工联合会报》。另请参阅其发表在一九三八年一月八日纽约《无产阶级文化报》上的文章和刊登在一九三七年五月二十九日《社会熔炉报》上的演说。例如，在巴伦西亚，革命最初几个月实际上的政府机构是人民执行委员会，在这个委员会中，工会组织是具有支配地位的主导力量（阿方斯·库科，《政治上的巴伦西亚民族主义，1874—1939》，第205—206页）。“军事叛乱的直接后果是国家机器在叛乱失败的那些地区的崩溃，”一名共产党人作者写道，“巴伦西亚的情况就是这样。以前的政府机关出现了完全的权力真空：军队，警察、国民卫队、市政当局、议会、法院都没有保留使其能够履行最简单的公共职能的最低限度的权力。……[这种]人民执行委员会……承担了国家机关的职能。”（卡洛斯·略伦斯，《巴伦西亚和特鲁埃尔前线的战争》，第40页）
- 34 一九三八年九至十月号《斯巴达克斯》。
- 35 拉斐尔·塔西斯-马卡，《市政厅里的革命》，第16—17页。
- 36 《全国劳工联合会-伊比利亚无政府主义者联盟情况通报》，载一九三六年八月十六日《每日图片报》。
- 37 拉莫斯·奥利维拉，《现代西班牙的政治、经济和人，1808—1946》，第595页。另请参阅社会党政治家安赫尔·加拉尔萨演说，分别载于一九三七年二月二日和八月五日的《巴伦西亚通讯》；R.卢宗发表在一九三六年八月十日《无产阶级革命》上的文章；塞萨尔·M.洛伦索，《西班牙无政府主义者与权力，1868—1969》，第182—204页；卡洛斯·M.拉马，《二十世纪的西班牙危机》，第294页。
- 38 加西亚·奥利韦尔的演说，载一九三七年六月一日《社会熔炉报》。
- 39 巴雷亚，《制造反叛》，第536页，另请参阅第545—547页。关于一名加泰罗尼亚左翼共和派议员对加泰罗尼亚地区司法机关崩溃的描述，见马里亚诺·鲁维奥-图杜里《加泰罗尼亚的司法：一九三六年七月十九日至一九三七年二月十九日》，第13页。
- 40 关于这些被杀害的司法官员的名单，见《基本原因：西班牙的赤色统治》，第352—354页；另请参阅弗朗西斯科·拉克鲁斯《巴塞罗那的叛乱、革命和恐怖》，第159页。
- 41 关于一九三六年十一月无政府主义领导人胡安·加西亚·奥利韦尔在马德里销毁重要司法档案的情况，见路易斯·帕卢德·克劳索的证词，收入《基本原因》一书，第363—365页。关于分别在巴塞罗那和卡斯特利翁焚毁司法档案的情况，见鲁维奥-图杜里《加泰罗尼亚的司法：一九三六年七月十九日至一九三七年二月十九日》，第13页；《关于西班牙历史的补充材料：解放战争时期，1936—1939》，第237页。
- 42 一九三六年八月二十三和二十五日颁布的法令，见一九三六年八月二十四和二十五日《马德里官方公报》；另请参阅一九三六年十月六日颁布的法令，见一九三六年十月七日《马德里官方公报》。
- 43 一九三六年十月七日《马德里官方公报》。
- 44 普列托，《西班牙的动乱》，第二卷，第314—316页。
- 45 关于与马德里开启寄存保险箱以及为迫使西班牙银行交出某些贵重物品而制定的各种法令

- 有关的信息，见安赫尔·比尼亚斯《内战中的西班牙黄金》，第160—167页；另请参阅阿马罗·德尔·罗萨尔《西班牙劳动者总工会史，1901—1939》，第二卷，第510页。
- 46 加林德斯，《被围困的马德里城中的巴斯克人》，第10页。关于从马德里模范监狱释放囚犯的情况，另请参阅胡利安·戈尔金《政治食人族》，第120页。
- 47 马达里亚加，《西班牙》，第496页。
- 48 例如，担任内阁部长的巴斯克民族主义领导人曼努埃尔·德·伊鲁霍向拉尔戈·卡瓦列罗政府提交的备忘录，见利萨拉《巴斯克人和西班牙共和国》，第200—204页。
- 49 一九三六年八月十五日《工人团结报》。
- 50 一九三六年十一月十四日巴塞罗那《道路》。
- 51 载一九三六年八月十三日巴塞罗那《土地与自由》。
- 52 一九三六年七月二十九日《工人团结报》。关于出自亲共和派而非无政府主义者消息来源的对教会财产受到破坏的情况的证实，见拉莫斯·奥利维拉《现代西班牙的政治、经济和人》，第571页；劳伦斯·费恩斯沃思的文章，收入弗兰克·哈奈恩编辑的《只有危险：十名报纸记者在西班牙内战中激动人心的冒险经历》一书，第13—47页。
- 53 戴维·科特，《同路人》，第1页。《纽约时报》一九六六年十月二十三日刊登的一份发自伦敦的讣告写道，“他被不同的人描述成一个共产党员，一个怪人，一个圣徒——有时三者都是。……他曾在一次布道时宣称，如果耶稣现在活着，他将是一名共产党员。此类言论令人特别尴尬，因为在英国以外，他经常被误认为是全英首席主教坎特伯雷大主教。”
- 54 伊西德罗·戈马-托马斯红衣主教，《西班牙内战中的牧函》，第169页。
- 55 保罗·布兰沙德，《西班牙与葡萄牙的自由和天主教力量》，第11—12页。
- 56 关于出自亲共和派消息来源的对监禁并且杀害成千上万名神职人员和宗教团体成员的情况的证实，见担任内阁部长的巴斯克民族主义领导人曼努埃尔·德·伊鲁霍向拉尔戈·卡瓦列罗政府提交的备忘录，收入利萨拉所著《巴斯克人和西班牙共和国》一书，第200—204页。伊鲁霍还说，因为与左派控制区其他省份的情况相反，巴斯克各省的神职人员对民主及共和制度表示同情，所以，在那些省份，没有人攻击教会或者干涉教徒做礼拜。作为多年勤奋研究的成果，人们可以在安东尼奥·蒙特罗所著《西班牙宗教迫害史，1936—1939》一书中发现关于杀害神职人员和宗教团体成员的最可信的调查结果，它列出了六千八百三十二名被杀害的宗教人士的姓名以及杀害他们的地点和时间，见第762—883页。另请参阅安赫尔·加西亚《西班牙教会与七月十八日》，第309—312页；阿尔韦特·马嫩特-塞希蒙和何塞·拉文托斯-希拉尔特，《西班牙内战期间加泰罗尼亚的地下教会，1936—1939》和何塞·M.桑切斯的《作为宗教悲剧的西班牙内战》。
- 57 关于议会议员、著名的共和联盟成员费尔南多·巴莱拉对这些共和派人士的指责，见巴莱拉的演说，载一九三七年一月二十七日马德里《人民报》。另请参阅左翼共和派的主要知识分子胡安·J.多梅尼奇纳发表在一九四〇年十二月二十八日墨西哥城《今报》上的文章。
- 58 《阿萨尼亚文集》，第四卷，第624页。离开西班牙并且肯定在阿萨尼亚暗指之列的著名共和派人士包括：普拉西多·阿尔瓦雷斯·布伊利亚，奥古斯托·巴尔西亚，曼努埃尔·布拉斯科·加尔松，马塞利诺·多明戈，萨尔瓦多·德·马达里亚加，格雷戈里奥·马拉尼翁，何塞·奥尔特加-加塞特，拉蒙·佩雷斯·德·阿亚拉，马里亚诺·鲁伊斯·富内斯和克劳迪奥·桑切斯-阿尔沃诺斯。桑切斯-阿尔沃诺斯是著名的共和派知识分子和阿萨尼亚所属政党左翼共和派的保守派成员，他写道：“阿萨尼亚从内心深处羡慕我们，只不过这种羡慕变成了怨恨。我们的政治关系越密切，他的怨恨就越大。”（桑切斯-阿尔沃诺斯，《政治轶事》，第227页）
- 59 诺曼·J.帕德尔福德，《西班牙内战中的国际法和外交》，第157页。

- 60 奥雷略·努涅斯·莫尔加达，《一名外交官眼中的西班牙的事态发展》，第338页。
- 61 阿尔瓦雷斯·德尔巴约，《自由之战》，第240页。
- 62 哈维尔·鲁维奥，《西班牙内战期间的庇护与交换》，第19—20页。
- 63 费利克斯·施莱尔，《在红色马德里的外交官》，第59页。
- 64 T.G.鲍威尔，《墨西哥与西班牙内战》，第77页。
- 65 根据哈维尔·图塞尔对阿拉基斯塔因的初步研究，引自路易斯·阿拉基斯塔因《关于内战和移居国外：哈维尔·图塞尔编辑并初步研究》，第22页。这封信的原件存放于马德里的国家历史档案馆。
- 66 费德丽卡·蒙特塞尼发表在一九三六年七月三十日巴塞罗那《白色评论》上的文章。
- 67 迭戈·阿瓦德·德·桑蒂连，《西班牙革命与内战》，第176页。
- 68 加林德斯，《被围困的马德里城中的巴斯克人》，第9—10页。一九七七年，拉蒙·萨拉斯·拉腊萨瓦尔出版了他精心撰写的专著《内战的损失》。在这部著作中，他按省份逐个提供了由于各种原因而造成的估计死亡人数。据他推算，在民族主义者控制区处决并杀害了五万八千人，在共和派控制区处决并杀害了七万三千人。在这部著作出版之前，由于双方明显的夸大和相互矛盾，就连极不准确的数字似乎也不大可能得到。如同休·托马斯所指出的那样（《西班牙内战》[一九六五年修订版]，第789页），民族主义者对人民阵线控制区杀人数字的估计最初高达三十至四十万。西班牙主教在他们一九三七年七月一日所写的那封联名信中估计，被杀害的世俗人士的数量超过三十万人（戈马-托马斯，《西班牙内战中的牧函》，第169页）。但是，这些估计数字后来都被降低到大约六万人。另一方面，由佛朗哥将军的司法部于一九四三年首次出版的《基本原因》一书——它包括大量关于左派阵营处决人犯的证据——所提供的经过“充分调查”的数字是八万五千九百四十人，见第390页。形成对照的是，加布里埃尔·杰克逊的《西班牙共和国与内战，1931—1939》得出一个“最初步的估计”，人民阵线控制区遭到杀害的有两万人，见第533页。如果人们接受六千八百三十二名宗教人士被杀害这一数字的话，杰克逊估计的数字就太低了。

同样无法得到内战期间西班牙民族主义者控制区比较准确的杀人数字。关于到一九三八年中期为止整个民族主义者控制区所处决的人数，西班牙共和派作家拉蒙·森德尔提出的数字是七十五万（托马斯，《西班牙内战》[一九六五年修订版]，第223页）；而在包括巴达霍斯、加的斯、科尔多瓦、格拉纳达、韦尔瓦、马拉加和塞维利亚等省份的第二建制师的军事管制区，该师师长凯波·德·利亚诺将军的前宣传负责人安东尼奥·巴亚蒙德所提供的处决人数是十五万人（安东尼奥·巴亚蒙德，《一个西班牙民族主义者的回忆录》，第90页）。在托马斯看来，这两个数字显然都被夸大了（《西班牙内战》[一九六五年修订版]，第223页），他认为，民族主义者所杀害的“总人数未必超过五万人”（《西班牙内战》[一九六五年修订版]，第789页）。另一方面，杰克逊引用了一位担任公证员的前天主教西班牙争取自治权利联盟成员向他提供的估计数字，单在塞维利亚一个省就杀害了四万七千人，在科尔多瓦和格拉纳达省，分别杀害了三万两千人 and 两万六千人，见杰克逊《西班牙共和国与内战》，第535页。一位名叫胡安·何塞·乌萨维亚加的巴斯克神职人员使用胡安·德·伊图拉尔德的笔名在《天主教与佛朗哥的圣战》一书中对民族主义者和人民阵线军队在一些省份的杀人数字作了比较冷静的估计，见第96—155页。关于在民族主义政府所在地布尔戈斯和格拉纳达省实行的镇压，见安东尼奥·鲁伊斯·比拉普拉纳（一九三八年逃往国外之前他是教长和司法委员会主席）《布尔戈斯的司法：在西班牙民族主义者控制区一年的经历》，第72—77、84—85和92—95页；伊恩·吉布森，《民族主义者一九三六年在格拉纳达实行的镇压与费德里科·加西亚·洛尔卡之死》，第58—59和137—139页。

根据本注释开始时提到的萨拉斯·拉腊萨瓦尔那部专著来看，大多数早期的数字似乎

都被严重夸大了，尽管人们将会指出，萨拉斯的评估方法及其估计数字的准确性值得怀疑。例如，《内战期间拉里奥哈地区的镇压》一书的作者安东尼奥·埃尔南德斯·加西亚在他这部专门研究民族主义者对（阿拉贡地区）洛格罗尼奥省拉里奥哈居民的镇压的三卷本著作中声称，根据口头和书面的证据，相信公民登记簿导致萨拉斯对双方的杀人数字低估了百分之一百一十。他断言，登记簿上的许多记载篡改了公民死亡的原因：枪毙击中头部被登记为“脑出血”，击中胸部登记为“心跳停止”。“而且众所周知，”他补充说，“不是所有杀害都被忠实地记录在公民登记簿里。”（埃尔南德斯·加西亚，《内战期间拉里奥哈地区的镇压》，第一卷，第16—17页）

在斯坦利·G.佩恩的《现代西班牙的政治和军队》一书中可以看到有一章描写了民族主义者控制区所实行的镇压的可怕性质和程度，佩恩的描写有创见地支持了杰克逊关于内战期间民族主义者处决的人数超过左派处决人数的论点，见第409—420页。不过，在后来的一部著作中（《西班牙革命》，第225页），佩恩写道：“尽管在内战进行期间红色恐怖夺走的生命可能比民族主义者的镇压夺走的生命要多，但是，胜利者随后可以腾出手来把这件事情做到底。”战后进行的那些处决得到了英国驻马德里大使伯纳德·马利和墨索里尼的外交部长加莱亚佐·齐亚诺伯爵的证实。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马利大使在西班牙，他证实，一九三九、一九四〇和一九四一这三年，自始至终每天都有审判和处决（布赖恩·克罗泽，《佛朗哥》，第296页）。一九三九年七月十九日，在西班牙逗留了一周后，齐亚诺在一份备忘录中记述：“处决的数量仍然很大：单是在马德里，每天处决二百至二百五十人，在巴塞罗那，一百五十人；在从未被赤色分子控制过的塞维利亚，每天处决八十人。……一万[多]个已被判处死刑的人在牢房里面等待着无法逃避的行刑时刻。”（《齐亚诺伯爵秘密档案，1936—1942》，第294页）关于“白色恐怖”的其他信息，见吉列尔莫·卡瓦内利亚斯《千日战争：西班牙第二共和国的诞生、存在与灭亡》，第二卷，第838—867页。何塞·M.索莱-萨瓦特的《佛朗哥政权对加泰罗尼亚的镇压，1938—1953》一书对民族主义者自一九三八年初次进入加泰罗尼亚地区以后处决加泰罗尼亚人的情况进行了最为深入细致的研究。在这部六百页的著作中，索莱列出了每个被处决者的姓名、出生日期、政治派别、职业以及被杀害的时间和地点，据我清点，总数超过一万人。

当震惊全国的野蛮行径突然爆发时，有一个人因其人性而格外与众不同。这个人是无政府主义者梅尔乔·罗德里格斯，他于一九三六年十二月成为监狱总监，结果，他拯救了关押在马德里模范监狱里的成百上千名右派支持者的生命，左派阵营中的某些最残忍的暴行曾在那个监狱发生。一位名叫阿塞尼奥·德·伊萨加的囚犯证实：“他于十二月四日上任。……他让我们这些不了解他的完美道德和高贵心灵的人大吃一惊。所有囚犯应当铭记在心的那个日子标志着可怕的大规模处决幸运而确定地结束了。”（阿塞尼奥·德·伊萨加，《马德里的囚犯》，第280页）另外，拉斐尔·阿维利亚写道：“随着内战的进行……由于来自塞维利亚的令人钦佩的梅尔乔·罗德里格斯的努力工作，中心区囚犯的安全保障增强了。当民族主义者加大轰炸——民族主义者的轰炸造成了‘死亡列车’那样令人震惊的事件，在‘死亡列车’惨剧中，从哈恩向阿尔卡拉转移的成百上千人被夺去了生命——的力度时，作为一名前斗牛士和纯粹的无政府主义者，罗德里格斯在监狱总监的岗位上显示出非凡的勇气……，保护着广大服刑者的安全。”（拉斐尔·阿维利亚，《西班牙内战期间共和派控制区的日常生活》，第105页）另外，巴斯克神父胡安·德·伊图拉尔德同样写道：“[当]埃纳雷斯堡遭到轰炸因而有人企图攻占监狱私刑处死囚犯时，梅尔乔出现在监狱的大门口，他对暴民高谈阔论，设法保住了囚犯的性命。在监狱关押的囚犯中，有长枪党的书记雷蒙多·费尔南德斯·奎斯塔。”（伊图拉尔德，《天主教与佛朗哥的圣战》，第129页）梅尔乔·罗德里格斯的人道主义行为和勇气还得到支持共和派的巴斯克民族主义者赫苏斯·德·加林德斯的证实，见加林德斯《被围困的马德里城中的巴斯克人》，第66页，注释10。加林德斯概述了罗德里格斯上任之前马德里监狱普遍存在

的可怕状况：“十一月六日夜间，模范监狱大约六百名囚犯的案卷被草率地复查了一遍。确认这些囚犯是法西斯分子之后，就在埃纳雷斯堡附近哈拉马河畔的小村庄帕拉奎略斯把他们给处决了；两天后，又处决了四百名囚犯，处决囚犯总数达到一千零二十人。在随后那些日子里，直到十二月四日为止，对囚犯的清理在临时监狱继续进行，尽管处决的人数较少。位于波利埃尔将军大街的监狱持续清理了好几天，最残忍的清理发生在十一月二十四日；圣安东监狱的清理在十一月二十七和三十日进行；本塔斯监狱在十一月三十日和十二月一日进行。没有清理囚犯的只剩下塞斯托公爵监狱和阿西洛·圣拉斐尔女子监狱。”（《被围困的马德里城中的巴斯克人》，第66页）关于梅尔乔·罗德里格斯的其他情况，见伊恩·吉布森《如同帕拉奎略斯村》，第150、164、174、175—184、191和236—237页；一九七二年三月一日马德里《标志报》；以及刊登在一九三九年四月二十一日——佛朗哥进入马德里三周之后——《终极日报》上的对他的采访。关于哈拉马河畔帕拉奎略斯村大屠杀的情况，见卡洛斯·费尔南德斯《哈拉马河畔的帕拉奎略斯村：卡里略有罪吗？》；吉布森，《如同帕拉奎略斯村》，《关于西班牙历史的补充材料：解放战争时期》，第240—241页和附件七；另请参阅发表在一九八三年二月二十一日马德里《变化十六》杂志上的文章（《在帕拉奎略斯村发生了什么？》）。

- 69 阿萨尼亚，《贝尼卡洛的晚会》，第96页。这本书以对话的形式写成。作出以上陈述的是一位名叫加尔塞斯的前部长，他所表达的经常是属于曼努埃尔·阿萨尼亚的思想。
- 70 当然，同样的情况还有半自治的加泰罗尼亚地区的加泰罗尼亚自治政府，用安赫尔·奥索里奥-加利亚多的话说，加泰罗尼亚自治政府成为一个“完全有名无实的机构”，该地区真正的权力被反法西斯民兵中央委员会篡夺了，见奥索里奥-加利亚多《孔帕尼斯的人生与献身》，第172页。
- 71 几名工会领导人向本书作者证实了这一点。
- 72 巴雷亚，《制造反叛》，第660页。
- 73 实例见一九三六年八月二十五日《全国劳工联合会-伊比利亚无政府主义者联盟情况通报》；一九三八年七月三十一日《工人团结报》。
- 74 例如，因达莱西奥·普列托的《风中话语》，第281页和他发表在一九四二年八月十五日《阿斯图里亚斯邮报》上的文章；阿尔瓦雷斯·德尔巴约，《自由之战》，第262页；塞萨尔·法尔孔，《马德里》，第122页；何塞·瓜内尔少校发表在一九四〇年二月二日《加泰罗尼亚人民报》上的文章；佩雷斯·萨拉斯，《西班牙内战》，第113页；苏加萨戈伊蒂亚，《西班牙内战史》，第47页。
- 75 分别是劳动者总工会和全国劳工联合会。
- 76 巴斯克地区（西班牙的巴斯克地区包括该国北部的阿拉瓦、吉普斯夸和比斯开三个省份——译注）的比斯开省肯定应当作为例外。“在共和派控制区，”斯坦利·G.佩恩写道，“比斯开几乎是唯一一个经济体系的基本结构没有发生实质性的革命变化的地区。由国家对于那些著名的佛朗哥派西班牙民族主义支持者的工商业资产进行控制（没收），同时把军工生产的各个方面置于国家的监督之下。……到十月底时，对经济已经强制实行了战时管制，包括严格的物资配给和价格控制，但是一般并未改变财产的法律归属。巴斯克民族主义者相对保守的社会主张加上与共产党人和社会党人（他们并不想触犯英国的利益和外国舆论）打交道时的小心翼翼，避免了真正的革命性变化在比斯开发生。”（佩恩，《巴斯克民族主义》，第181页）另外，拉斐尔·阿维利亚概括了巴斯克地区与共和派控制下的西班牙其他地区的不同之处，他写道：“与作为对军事政变的反应而在西班牙共和派控制区爆发的混乱相比，巴斯克地区在反宗教的痴迷和没收财产的狂潮中相当于一块罕见的绿洲。政府的委员会照常开会，银行受到尊重，工厂在不做集体化实验的情况下继续运转，宗教活动自由进行，而过激行为的出现则是由外来因素造成的，例如轰炸之后对监狱的可怕攻击。”（阿维利亚，《西班牙内战期间共和派控制区的日常生活》，第114

页)另请参阅马克西米娅诺·加西亚·贝内罗《巴斯克民族主义史》，第611—612页。这并不是说没有工人组织开展的革命活动(实例见阿雷尼利亚斯《巴斯克地区，民族问题和社会主义革命》，第7—13页；曼努埃尔·恰普索的《巴斯克政府与无政府主义者：内战中的毕尔巴鄂》和恰普索的《无政府主义者与巴斯克的战争：圣塞瓦斯蒂安自治市》)，但是，总的说来，如同佩恩所确认的那样，经济体系的基本结构保持不变。

- 77 赫伯特·L.马修斯，《半个毁灭的西班牙：对西班牙内战的重新评价》，第121页。
- 78 何塞·迪亚斯一九三七年五月九日的演说，见迪亚斯《斗争的三年》，第428页。
- 79 一九三七年四月九日《劳动报》。另请参阅安东尼奥·米赫(西共政治局委员)《为了加强战争工业》，第3页；费德里科·梅尔乔(共产党控制的统一社会主义青年联盟执委会成员)，《组织生产》，第4页。
- 80 一九三六年九月二十六日《真理报》。
- 81 见一九三七年十月二十二日《共和国官方公报》(前身为《马德里官方公报》)所发布的一项法令的序言。关于较早提及销毁财产记录的资料，见财政部副部长赫罗尼莫·布赫达的演说，载一九三七年二月九日《每日图片报》；费德丽卡·蒙特塞尼发表在一九三六年十月二十九日《土地与自由》上的文章；钢铁纵队战争委员会的报告，载一九三七年二月十六日巴伦西亚《我们》；一九三六年八月十三日《工人团结报》(关于皮纳的文章)。
- 82 一九三七年三月五日至八日向西班牙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提交的报告，见迪亚斯，《斗争的三年》，第351页。
- 83 一九四八年十月号《论坛》。
- 84 弗朗茨·博克瑙，《西班牙斗鸡场》，第148页。
- 85 关于一些列出没收财产清单的土地改革协会报告，见一九三六年十月十二日和十四日《光明报》；一九三六年八月十五日、十八日和十九日《全国劳工联合会报》；一九三六年八月八日《工人世界报》；一九三六年八月十一日、十四日、二十日、二十七日、二十八日和三十日、九月一日、十六日、十七日、二十三至二十五日和二十七日，十月十日、十五日和二十八日《政治报》；一九三六年八月二十九日和九月二十九日《社会主义者》。
- 86 一九三六年八月二十五日《全国劳工联合会-伊比利亚无政府主义者联盟情况通报》。
- 87 巴塞罗那牵引、照明及电力有限公司一九三六年九月三日发表的声明；另见该公司一九三六年十一月十六日发表的声明。
- 88 关于工会以及左翼政党没收和控制财产这一问题，仅仅根据左派提供的资料就能写出大量东西。但是考虑到篇幅所限，只在下列各项之后简要注明这些资料的部分出处：

铁路。“董事会不复存在，”工会的一份报告写道，“成立了直接代表工人阶级组织的工人委员会。”(一九三六年十月二日马德里《全国劳工联合会报》)工会组织对于铁路的这种控制在一九三六年八月十六日《马德里官方公报》所发布的一项政府法令的序言中得到确认。另请参阅一九三六年七月二十六日巴塞罗那《先锋报》；一九三六年八月十八日《战斗报》；一九三六年八月二十六日《全国劳工联合会-伊比利亚无政府主义者联盟情况通报》；一九三六年十月五日马德里《全国劳工联合会报》；一九四〇年六月十五日《无产阶级文化报》(加斯东·勒瓦尔的文章)；一九三六年九月二十四日《每日图片报》；一九三七年四月七日《社会熔炉报》；一九三六年八月十一日和十九日巴塞罗那《工人团结报》；一九三六年十月十四日《先驱报》；《从七月到七月：斗争的一年》(胡安·德·阿罗约的文章)，第165—168页；加斯东·勒瓦尔，《自由主义的西班牙，1936—1939：西班牙革命的建设性工作》，第277—278页；勒瓦尔，《既非佛朗哥亦非斯大林：与佛朗哥作战的西班牙无政府主义团体和斯大林的反应》，第97—111页；阿古斯丁·索奇和保罗·福尔加雷，《集体化：西班牙革命的建设性工作》，第55—61页；玛蒂尔德·巴斯克斯和哈维尔·巴莱罗，《马德里的内战》，第78页。

运输业的其他部门。据全国劳工联合会运输业工会全国委员会书记维克托·萨拉戈萨

在接受我的采访时说，所有重要的运输企业都被工会接管了。这不包括巴斯克各省，那个地区的经济领域几乎没有发生变化（实例见G.L.斯蒂尔《格尔尼卡之树》，第73页）。关于巴塞罗那、马德里和巴伦西亚一些最重要的运输企业被没收的情况，见一九三六年八月七日和二十六日《全国劳工联合会-伊比利亚无政府主义者联盟情况通报》以及一九三六年八月十八日《每日图片报》转载自该《情况通报》的文章；一九三六年八月七日和十日《全国劳工联合会报》；一九三六年八月六日巴塞罗那《晚报》；一九三七年七月八日和十九日《我们》；一九三六年八月六日《政治报》；一九三六年八月一日和四日、十月十三日、十一月十九日、十二月十七日《工人团结报》；一九三七年五月一日《土地与自由》；一九三六年十月八日《先驱报》；勒瓦尔，《既非佛朗哥亦非斯大林》，第111—122页；比森特·拉莫斯，《阿利坎特省的内战，1936—1936》，第一卷，第153页；索奇和福尔加雷，《集体化：西班牙革命的建设性工作》，第61—71页。关于工会对船运公司的控制，见休·托马斯《西班牙内战》（一九七七年修订版），第530页。

公用事业。据全国劳工联合会全国委员会成员马里亚诺·卡多纳·罗塞利说，左派阵营控制区的所有公用事业公司都被全国劳工联合会和劳动者总工会接管了（卡多纳·罗塞利写给我的信）。其中一些最重要的公司是：加泰罗尼亚煤气与电力公司，西班牙水电公司，马德里煤气公司，电力联合公司，巴伦西亚电力公司，桑迪利亚纳电力公司，略夫雷加特河地下水特许经营公司，莱冯煤气公司，埃布罗河灌溉与电力公司，杜罗瀑布公司，电力股份有限公司，巴塞罗那自来水总公司，马德里联合电力公司。关于这些公司的详细情况，见一九三六年八月二日和二十三日《战斗报》；一九三七年七月二十七日《全国劳工联合会-伊比利亚无政府主义者联盟情况通报》；一九三六年八月三十一日《全国劳工联合会报》；一九三八年一月号《照明与电力》；一九三七年七月三日《我们》；一九三六年八月十三日和十五日、一九三七年一月十日《工人团结报》；勒瓦尔，《自由主义的西班牙》，第261—266页；勒瓦尔，《既非佛朗哥亦非斯大林》，第127—131页；拉莫斯，《阿利坎特省的内战》，第一卷，第153—154页；索奇和福尔加雷，《集体化：西班牙革命的建设性工作》，第125—136页；巴斯克斯和巴莱罗，《马德里的内战》，第77—78页。

制造、采矿和金融企业。见一九三六年十月二十四日莱里达《无政府主义报》；一九三六年九月二十二日《战斗报》；一九三六年八月七日和九月三十日《全国劳工联合会-伊比利亚无政府主义者联盟情况通报》以及一九三六年八月五日、六日、十四日和二十五日《每日图片报》转载自该《通报》的文章；一九三七年三月一日《光明报》（比森特·乌里韦的演说）；一九三六年九月二十三日和十月五日至七日《全国劳工联合会报》；一九四七年十二月二十六日、一九四八年十二月三日和一九四九年十一月二十日巴黎《全国劳工联合会报》；一九三六年八月十五日《全国劳工联合会-伊比利亚无政府主义者联盟-国际工人协会信息》；一九三七年三月二日和八月十四日《巴伦西亚通讯》；一九三九年十一月二十五日《无产阶级文化报》；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六日《每日图片报》；一九三六年十月二十八日《加泰罗尼亚自治政府官方日志》（见集体化法令的前言）；一九三八年七月《西班牙历史文献》；一九三六年第八期（未标明日期）和十一月二十一日《反法西斯的西班牙》（克里斯坦·库代尔的文章）；一九四九年九月十八日图卢兹《自由西班牙报》；一九三七年二月十三日《土地与自由》转载的《社会熔炉报》的消息；一九三六年八月三十日和一九三七年五月十一日（贝拉米诺·托马斯的声明）《巴伦西亚商报》；一九三六年八月二十日《工人世界报》；一九三七年七月六日和十四日《我们》以及一九三七年六月十六日《全国劳工联合会-伊比利亚无政府主义者联盟情况通报》转载自该报的文章；一九三六年九月二十五日《无产阶级革命》（让·勒诺瓦的文章）；一九三七年八月二十七日《社会主义者》；一九三六年八月七日、十八日和二十二日、九月四日、十六日、十九日、二十五日、二十九日和三十日、十月二十一日和二十三

日、十一月十八至二十一日、十二月二日、五日、十一日、十五日、十七日和十九日、一九三七年一月二十一日和二十八日、四月一日和二十四日、六月三十日、八月十五日（卡多纳·罗塞利的文章）和十月二十三日《工人团结报》；一九四九年七月十六日巴黎《工人团结报》；一九三六年九月五日和一九三七年八月六日巴塞罗那《西班牙革命》；一九三七年一月三十日、三月二十七日、七月二十四日十月九日、十六日、三十日和十一月十三日《土地与自由》；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六日（安赫尔·埃斯蒂维尔的演说）和十三日《劳动报》；一九三八年四月二十一日《先驱报》（对比达尔·罗塞利的采访）。另请参阅约翰·布拉德马斯《无政府工团主义与西班牙革命，1930—1937》，第189—196页；迪亚斯，《斗争的三年》，第350—366页；卡明斯基，《巴塞罗那》，第223—227页；勒瓦尔，《自由主义的西班牙》，第241—261页；勒瓦尔，《西班牙的社会重建》，第6—7、10、22—23和32页；彼得·梅林，《灭亡与新生之间的西班牙》，第233—235页；拉莫斯，《阿利坎特省的内战》，第一卷，第122和154页；索奇和福尔加雷，《集体化：西班牙革命的建设性工作》，第73—124页；巴斯克斯和巴莱罗，《马德里的内战》，第77页。根据曾经担任全国劳工联合会巴伦西亚金属制造业工会书记的安东尼奥·比利亚努埃瓦向我提供的可靠信息，下列公司被他所在的工会接管：布鲁内特，戴维斯，马特乌，桑斯，托拉斯和莱万特联合造船公司。

城市不动产和右翼组织的房产。实例见一九三六年九月二十三日《战斗报》；一九三六年八月二十六日、九月二十六日和十一月七日《全国劳工联合会—伊比利亚无政府主义者联盟情况通报》；一九三六年七月二十二日《光明报》；一九三六年八月十日《全国劳工联合会报》；一九三六年七月二十四日和八月二十九日《每日图片报》；一九三六年十一月十九至二十日、十二月二日、五日、十七日和十九日、一九三七年一月二十日和一九三八年六月五日《工人世界报》；一九三七年一月二十三日《土地与自由》（加斯东·勒瓦尔的文章）；一九三六年九月二十九日《马德里官方公报》所发布的财政部法令，该法令确认工会和政治组织占用城市不动产合法；另请参阅财政部长对新闻界发表的声明，载一九三六年十二月二十四日巴伦西亚《人民报》；J.奥尔特拉·比科，《城市不动产的国有化和公用事业归市政管理》；拉莫斯，《阿利坎特省的内战》，第一卷，第155页；比森特·赛恩斯，《一九三六年七至八月光辉时刻的西班牙》，第18页；拉萨里略·德·托梅斯（贝尼尼奥·贝哈拉诺），《西班牙，自由的摇篮》，第67页；巴斯克斯和巴莱罗，《马德里的内战》，第78—79页。

电影院和剧院。见一九三六年八月九日和二十九日《战斗报》；一九三六年八月十七日《光明报》；一九三六年八月十五日《全国劳工联合会—伊比利亚无政府主义者联盟—国际工人协会信息》；一九三六年九月十二日《人道报》；一九三六年八月十五日、十一月十九日和一九三七年二月十日《工人团结报》；一九三六年十二月一日巴塞罗那《新时代》（A.索奇的文章）；一九三六年八月六日巴塞罗那《最后关头》；一九三六年十月二十九日巴塞罗那《加泰罗尼亚之声》；R.卢宗，《西班牙的反革命》，第34页；拉莫斯，《阿利坎特省的内战》，第一卷，第152页；巴斯克斯和巴莱罗，《马德里的内战》，第112页。

旅馆、餐馆、酒吧和百货商店。见一九三六年十月二十四日《无政府主义报》；一九三七年二月二十七日《战斗报》；一九三六年八月二十一日和十一月二十五日《每日图片报》转载自《全国劳工联合会—伊比利亚无政府主义者联盟情况通报》的消息；一九三六年十月七日《全国劳工联合会报》；一九三六年七月二十四日《每日图片报》；一九三六年九月二十六日《真理报》（米哈伊尔·科利佐夫的文章）；一九三六年十月二日《工人世界报》；一九三六年八月十五日《政治报》；一九三六年十一月一日《工人团结报》；一九三七年八月六日《西班牙革命》；一九三七年十月三十日《土地与自由》；一九三八年三月号《西班牙历史文献》刊登的第十四期《开端》；一九三七年十一

月二十四日《先驱报》；迭戈·阿瓦德·德·桑蒂连，《我们为什么输掉了内战》，第80页；勒瓦尔，《西班牙的社会重建》，第32页；卢宗，《西班牙的反革命》，第34页；《集体化：西班牙革命的建设性工作》，第27页。

报纸和印刷厂。见一九三六年七月二十四日和二十六日《光明报》；一九三六年七月二十四日、九月一日和十月七日《全国劳工联合会报》；一九三六年七月二十八日《每日图片报》；一九三六年七月二十一日、二十三日和八月二十七日《工人世界报》；一九三六年六月号《历史时期》（爱德华多·德·古斯曼，《内战期间马德里的报纸和记者》）；一九三六年七月二十五日《劳动报》；巴斯克斯和巴莱罗，《马德里的内战》，第80—81页。

关于工商各个行业工会控制企业的其他信息，见瓦尔特·L.贝内克《无政府主义与内战》，第137—211页；何塞·马利亚·布里卡尔，《政府的经济政策，1936—1939》；萨姆·多尔戈夫编，《无政府主义集体化》；罗纳德·弗雷泽，《流血的西班牙》，第209—236页；勒瓦尔，《自由主义的西班牙》，第241—352页；弗兰克·明茨，《西班牙革命的工人自治》，第210—236页；阿尔韦特·佩雷斯-巴罗，《加泰罗尼亚地区三十个月的集体化运动，1936—1939》；拉莫斯，《阿利坎特省的内战》，第一卷，第336—347页（因为该书列出了阿利坎特省三百三十三三个被劳动者总工会和全国劳工联合会接管的工商企业的名字）；巴斯克斯和巴莱罗，《马德里的内战》，第126—130页；一九三六年九月至十月号《经济与社会》，第六卷（布里卡尔的文章，《内战期间加泰罗尼亚工人自治的经验》）。另请参阅迈克尔·塞德曼未发表的手稿《西班牙内战期间巴塞罗那的工人管理》，该文披露了新的资料（这份手稿的副本现存胡佛研究所，博洛滕资料集）。

关于工商部对马德里一些企业的干预，见一九三六年七月二十七日《马德里官方公报》；另请参阅一九三六年八月三日《全国劳工联合会报》；一九三六年八月一日《工人世界报》；一九三六年八月十八日《政治报》；《西班牙内战与革命》，第一卷，第269—271页。应当看到，这些企业的绝大多数早早就被工会接管了。实例见米哈伊尔·科利佐夫发表在一九三六年九月二十六日苏联《真理报》上的文章。

89 《阿萨尼亚文集》，第三卷，第497页。

革命打击小资产阶级

让成千上万名手工业者、小工厂主和零售商人感到震惊的是，他们的经营场所和设备被无政府工团主义的全国劳工联合会所控制的工会组织没收了，经常还被社会党的劳动者总工会控制下的不那么激进的工会组织所没收。¹

例如，在马德里，工会不仅接管了鞋匠、木匠和小规模生产者的经营场所和设备，而且将所有美容院和理发店集体化，规定以前的店主只能领取与其雇员同样的报酬。²像阿利坎特省的情况一样，³在居民超过三十五万人的城市巴伦西亚，几乎所有工厂无论大小都被全国劳工联合会和劳动者总工会接管了；⁴而在加泰罗尼亚地区，由于当地的无政府工团主义者在革命头几个月里几乎处于不受任何约束的支配地位，⁵许多城镇实行了非常彻底的集体化，以致集体化的对象不仅包括大型工厂，而且包括微不足道的手工作坊。⁶集体化运动还侵犯了中产阶级的另一块领地。在人口接近一百二十万的加泰罗尼亚地区的主要城市巴塞罗那，无政府工团主义工会的工人将鸡蛋和鱼类的批发生意集体化，⁷并且成立了一个屠宰场管理委员会，不许有任何中间环节存在；⁸他们还将主要的水果蔬菜市场集体化，取缔所有从事此类生意的中间商和代理人，但是允许他们作为挣工资的人加

入这个集体化之后的实体。⁹巴塞罗那的牛奶生意同样也被集体化。无政府工团主义者以不卫生为由关闭了四十多家牛奶消毒厂，剩下九家工厂对全部牛奶进行消毒，同时着手建立自己的零售市场取代所有牛奶经销商。¹⁰许多零售商加入了这个集体，但是有些人拒绝这样做：“他们要求的工资比付给工人的高得多……他们声称无论如何不能接受为他们制定的工资标准。”¹¹格拉诺列尔斯是加泰罗尼亚地区的一个主要集镇，内战之前经纪人捎客熙来攘往。在那里，中间商全部被取缔或者被逐出流通渠道，没有选择的农民只能经由全国劳工联合会设在当地的代理委员会处置他们的产品。¹²同样的模式出现在整个左派阵营控制区的无数个地方。¹³在大型柑橘工业中心巴伦西亚地区，还开创了工会侵犯私有商业领域的另一个先例，全国劳工联合会成立了一个收购、包装、出口柑橘产品的组织，形成了一个包括二百七十个委员会在内的覆盖广大城镇和乡村的网络，把数百个中间商从这项重要的生意中排挤出去。¹⁴总之，工会在几乎所有领域侵犯了中产阶级的利益。在无数城镇和乡村，零售商和批发商，旅馆、咖啡馆和酒吧业主，配制眼镜的技师和医生，理发师和面包师，鞋匠和木匠，女装裁缝和男装裁缝，制砖工人和建筑包工头都被无情地卷入了集体化运动，这里仅仅举出了其中的一些实例。¹⁵

假如有些中产阶级成员在使自己适应新角色——在他们以前的生意或企业中充当工人而非雇主——的同时还默默地希望革命的狂热自生自灭、被没收的财产随后将会物归原主的话，他们很快就失望了；因为，在最初几个星期广泛而缺乏组织的没收之后，一些工会组织开始有计划地对所有行业进行重组，关闭了成百上千家小型工厂，将生产集中于设备优良的企业。“开明一点的小雇工者不难理解，”西班牙无政府工团主义者的主要舆论工具《工人团结报》宣称，“小型工厂的商品生产方式效率低下。分散经营抑制生产。管理手工小作坊不同于管理采用先进技术的大工厂。如果我们的目标是要消除资本主义管理制度中的偶然因素和危险因素的话，那么，我们必须采取某种能够保证造福于社会的方式来指导生产。”¹⁶根据这种观点，全国劳工联合会的工人迅速与劳动者总工会的工人一道，关闭了加泰罗尼亚地区的七十家铸造厂，把它们的设备和人员集中到二十四家工厂里。¹⁷“在这些工厂里，”一名社会主义工业的代言人宣称，“我们纠

正了那些不关心技术问题的小雇主[的铸造厂]的缺点，它们的工厂是结核病的症结之所在。”¹⁸在巴塞罗那，全国劳工联合会和劳动者总工会的木工工会通过关闭数百家小作坊并在几家大工厂里集中生产而对整个木工行业进行了重组，¹⁹它们在所有木匠铺和木工厂成立了管理委员会，并且以工人的工资标准把以前的雇主当作技术管理人员使用。²⁰在同一个城市，全国劳工联合会对制革行业实行了同样激进的改革，将七十一家皮革厂减少到四十家；²¹而在玻璃制造业，一百家工厂和货栈被削减为三十家。²²全国劳工联合会对巴塞罗那理发店和美容院的重组甚至更加极端；九百零五家店面被关闭，它们的人员和设备集中到了二百一十二家大型理发店和美容院，财产被没收的那些店主所得到的是与他们以前的雇员一样的权利和义务。²³巴伦西亚的男女服装业、金属加工业、木器制造业和皮革制品业，²⁴托伦特的糖果业——那里的四十五家小型糖果厂被关闭，然后把生产集中在一个可以容纳数百名工人的新建厂房里，²⁵锡切斯的制鞋业，²⁶阿尔科伊的金属加工业和纺织业，²⁷昆卡的木材业，²⁸格拉诺列尔斯的制砖业，²⁹比克的制革业，³⁰巴塞罗那的面包烘烤业，³¹马德里³²和卡尔卡亨特的木制家具业，³³都实施了某种类似的重组，或者称之为社会主义化。这里列举的只是几个实例。“在加泰罗尼亚、阿拉贡、莱万特和卡斯蒂利亚的所有城镇和乡村，”一位广泛游历了这些地区的观察家写道，“迅速关闭了那些在恶劣的卫生条件下进行生产劳动的经济效益低下的小型工厂。把机器集中在几个车间，有时集中在一个车间。通过这种方式简化管理程序，进而使生产协作更加有效。”³⁴

难怪当时那些在这一系列革命事件中首当其冲的小规模生产者和经营者认为自己破产了；因为，即使是在无政府工团主义工会组织尊重小业主的财产权时，他们当中的一些人也清楚，这只不过是内战持续期间的暂时宽容。“一旦这场内战结束并且取得对法西斯斗争的胜利，”一位著名的巴伦西亚无政府主义者警告说，“我们必须禁止任何形式的小型私有资产，然后使之符合我们的要求。我们将加强集体化和社会主义化，使这项工作圆满完成。”³⁵的确，无政府工团主义工会组织声称，“工人的助人为乐和理智行为赢得了许多小商人和小工厂主的好感，他们一点也不反对将其企业社会主义化并且成为与其他人具有同样权利和义务的工人”，³⁶但

是，只有在最特殊的情况下，小资产阶级分子才愿意接受革命性的变化，³⁷因此，他们显示出的友好态度并不足以反映其内心深处的真实感受。工人阶级武装了起来，成为局面的实际掌控者，结果，除了顺应事态发展默默地接受失去财产的现实之外，小资产阶级别无选择。

不过，物质上的满足并非小资产阶级的唯一追求。如同在加泰罗尼亚地区的集体化运动中扮演过重要角色的前全国劳工联合会成员阿尔韦特·佩雷斯-巴罗后来所说的那样：“加泰罗尼亚人数众多的小资产阶级总是希望通过小规模的生产经营获得某种程度上的经济独立。小商人、小工厂主或小业主往往比一个训练有素的工人活得更艰难……但是，他们宁愿过一种独立自主的普通生活，也不愿意在受制于人的条件下提高自己的生活水平。”³⁸

“店主经常在[工人]集会上发言，”全国劳工联合会商业雇员工会书记胡安·费雷尔回忆说，“他们创业的艰辛经历几乎使所有人潸然泪下——没想到如今眼看着店铺面临集体化的威胁。在这种情况下，我总是建议与会者让他担任管理方面的负责人，因为无论如何工人委员会都得任命一个人。”³⁹

但是，一般来说，工人对小商人和小工厂主几乎并不表示同情。据佩雷斯-巴罗说，三四十年的革命宣传使这些雇主在那些头脑简单的工人看来似乎不是“阶级敌人”而是他们“个人的敌人”，这导致了一系列对雇主的伤害。“我们并不同情他们，尽管直到一年以后革命运动进入衰退期时这一点才显示出来。”⁴⁰

不过，比较激进的工人并不都是凭借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达到他们的目的的。有时他们试图通过说服教育达到目的。巴塞罗那店员工会食品店员分会发出的一份呼吁书写道：“你们这些对社会问题一无所知的小店主即将经历一个发展阶段，它将彻底改变当今的社会结构，使之变得更加公平、更加高尚，经过这种改变，人剥削人的状况将成为历史。

“时至今日你们一直要把全部精力用于经营生意，为了卖掉四棵烂白菜、两公斤大米和三公升食油每天工作十二至十四个小时，这种低三下四的生存方式必须结束。……本食品店员工会要求你们去马西亚广场十二号夹层，在我们工会的帮助下参加日常学习，在那里，通过与我们的同志的

频繁接触，你们就能成功地将自己从迄今为止控制着你们的社会和道德偏见中解放出来。”⁴¹

但是，中产阶级多年以来对此没有思想准备，也没有多少物质积蓄，他们苦苦挣扎着在与大型企业的竞争中苟延残喘，突然发现独立的希望毁于一旦。如果他们对这场革命有什么期待的话，那也是摆脱竞争并且得到更大份额的社会财富，而不是财产被人没收以及一份工人的工资。甚至还未受到集体化运动的大力冲击，某种深深的不安已在他们当中蔓延，因此，无政府工团主义者企图用迷人的色彩描绘未来以减轻他们的忧虑，不过这是枉费心机。在革命进行的第二个月，《工人团结报》写道：

关于小资产阶级深感忧虑的消息我们已有耳闻。我们的印象是，革命最初那几天的忧虑已经消散，不过，店主、商人、小工厂主、手工业者和小地主仍然感到心神不安。他们对无产阶级的领导地位没有信心。……

小资产阶级不会因为资本主义制度的灭亡失去任何东西。毫无疑问，他们的利益将成倍增长。例如，大多数店主和小工厂主每天操心的是支付账单、租金和纳税。……

在消灭私有财产和自由商品交易的同时，我们将许多长期在扣押财物、扫地出门的威胁之下生活的店主从噩梦中解救了出来。……

61 小资产阶级不必担忧。他们肯定更加接近无产阶级。他们可以确信，在废除了私有财产和私人经营之后，将会出现一种新的生活方式，对于那些认为自己可能受到社会变革影响的人，这种生活方式决不会造成任何伤害。

小资产阶级应当丢掉他们的忧虑；因为一旦打败了法西斯主义，他们就能更加乐观地面向未来。⁴²

注释：

- 1 当然，这些没收行为往往是在没有得到劳动者总工会全国领导人同意的情况下进行的。关于劳动者总工会副书记帕斯库亚尔·托马斯对劳动者总工会的地方工会组织没收小型企业财产行为的批评，见一九三六年十二月二十一日《巴伦西亚通讯》；一九三七年二月十三日《前进报》；一九三八年七至八月号《斯巴达克斯》。
- 2 见一九三六年八月二十七日《光明报》；一九三六年十月七日《全国劳工联合会报》。
- 3 见比森特·拉莫斯《阿利坎特省的内战，1936—1936》，第一卷，第336—347页。拉莫斯列出了三百三十三个被劳动者总工会和全国劳工联合会接管的小型工商企业的名字。
- 4 见共产党所控制的地方工会书记的演说，载一九三七年三月三十日《红色阵线报》。全国劳工联合会巴伦西亚地方组织成员安东尼奥·比利亚努埃瓦在致本书作者的信中写道，几乎所有印刷工、木匠、男装裁缝、女装裁缝、理发师、美容师、制鞋匠以及其他皮革制品生产者的经营场所和设备都被这个城市的工会组织接管了。关于巴伦西亚对面包店、糖果店、旅馆、咖啡馆和酒吧实行集体化的情况，见一九三七年十一月二十七日和十二月三日《我们》。关于这一地区对工业企业和公用事业公司实施没收和集体化的情况，见奥罗拉·博什·桑切斯《劳动者总工会与自由主义者：巴伦西亚地区的内战与革命，1936—1939》，第23—31页；阿尔维特·希罗纳-阿尔武伊克斯克，《巴伦西亚地区的内战与革命》，第135—222页。
- 5 关于这一地区的革命发展见本书第三十八和四十三章。
- 6 见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十九日无政府工团主义的舆论工具《工人团结报》；另请参阅共产党人费德里科·梅尔乔的演说，见梅尔乔《组织生产》，第4—5页。
- 7 一九三六年十二月二十三日和二十四日《工人团结报》。
- 8 一九三六年十二月二十九日《工人团结报》。
- 9 一九三六年十月七日《工人团结报》。
- 10 见一九三七年八月二十一日《土地与自由》的报道。
- 11 同上。
- 12 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十五日《工人团结报》。
- 13 实例见一九三六年八月十日《全国劳工联合会报》（马德里省）；一九三七年一月二十三日《土地与自由》（卡尔卡亨特）；一九三七年二月六日格拉诺列尔斯《新闻导报》（蒙特梅洛）。
- 14 见分别发表于一九三七年一月三十一日、二月七日《社会熔炉报》和一九三七年四月十九日《我们》上的关于莱万特农业出口联合委员会（CLUEA）的文章；另请参阅弗朗茨·博克瑙《西班牙斗鸡场》，第197—200页；玛丽娅·何塞帕·库科·希内尔等，《巴伦西亚地区的农业》，第49—53页；希罗纳-阿尔武伊克斯克，《巴伦西亚地区的内战与革命》，第181—194页；曼努埃尔·比利亚，《走在自由主义道路上的西班牙》，第51页。尽管劳动者总工会在莱万特农业出口联合委员会中有代表，全国劳工联合会却是该委员会的主导力量。
- 15 对于本章尚未列举的实例，读者可以查阅以下出版物：一九三六年十月二十四日、一九三七年十一月十七日和十二月三日《无政府主义报》；一九三六年十月三日《战斗报》；一九三六年九月十四日、十七日和二十三日、十月八日、十一月七日《全国劳工联合会-伊比利亚无政府主义者联盟情况通报》；一九三六年八月十日、九月十九日和二十三日、十月七日、八日和十六日《全国劳工联合会报》；一九七四年三月号《人道主义自由论手册》（巴黎玫瑰采集者出版社）；一九三八年一月八日《无产阶级文化

报》；一九三六年九月四日和十一月二十五日《每日图片报》；一九四九年九月十八日图卢兹《自由西班牙报》（A.科斯塔莱斯的文章）；一九六三年八月十八日图卢兹《希望报》（曼努埃尔·希门尼斯的文章）；一九三七年一月七日奥斯皮塔莱特《思想报》；一九三七年二月十五日和十一月十五日《我们》；一九三六年九月十一日巴塞罗那《环球新闻报》一九三七年十二月二日巴黎《西班牙反法西斯新闻报》；一九三七年一月三十日和二月六日《新闻导报》；一九三七年六月二十五日《无产阶级革命》（R.卢宗的文章）；一九三六年八月十三日、九月二十四日、十一月十八至二十日和二十二日、十二月二日、五日、十一日、十五日、十七日、十九日、二十五日和二十七日、一九三七年一月二十日、四月二十三日、六月三十日和八月三日（马利亚诺·卡多纳·罗塞利的文章）《工人团结报》；一九五一年二月十日巴黎《工人团结报》（加斯东·勒瓦尔的文章）；一九三七年一月二十三日（加斯东·勒瓦尔的文章）、二月二十七日、四月十七日、十二月二十五日和一九三八年一月十五日《土地与自由》；一九三七年七月二十四日《开端》；加斯东·勒瓦尔，《必要的革命》，第192页；加斯东·勒瓦尔，《既非佛朗哥亦非斯大林：与佛朗哥作战的西班牙无政府主义团体和斯大林的反应》，第131—142页及书中各处；加斯东·勒瓦尔，《西班牙的社会重建》，第10—11页；拉莫斯，《阿利坎特省的内战，1936—1936》，第一卷，第336—347页。另请参阅本书第六章。

- 16 一九三七年二月四日《工人团结报》。
- 17 一九三七年九月一日《工人团结报》。另见一九三七年七月一日巴塞罗那《消息报》。
- 18 一九三七年九月一日《工人团结报》。
- 19 一九三六年十二月二十四日《工人团结报》；另见一九三七年一月二十二日《战斗报》；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十五日《全国劳工联合会—伊比利亚无政府主义者联盟情况通报》并请参阅阿里斯蒂德·拉佩尔《西班牙问题》，第22—23页。
- 20 一九三七年十月二日《工人团结报》。
- 21 一九三七年四月十日《全国劳工联合会—伊比利亚无政府主义者联盟情况通报》；另见一九四九年七月十七日《全国劳工联合会报》（巴黎）。
- 22 一九三七年一月二十三日《土地与自由》；另见一九三七年一月二十日《工人团结报》。
- 23 一九三八年十一月二十三日《工人团结报》；一九三六年九月二十八日《最后关头》；拉佩尔，《西班牙问题》，第22页；阿古斯丁·索奇和保罗·福尔加雷，《集体化：西班牙革命的建设性工作》，第137—143页。全国劳工联合会的激进分子并非全都赞成对理发店和美容院的这种精简。如同罗纳德·弗雷泽在他那部口述史中所记录的那样，“工人阶级显示出一种值得高度赞赏的进取意识，”塞瓦斯蒂安·克拉拉说，“但这并不是说集体化运动中没有愚蠢的事情发生。没收理发店。实际上什么东西正在被集体化？一把剪刀，一把剃刀，几把理发椅。然后出现了什么结果？所有那些可能支持抵抗法西斯主义的自食其力的小业主如今转而反对我们。比大敌当前更糟糕的情况是，敌人在我们当中。”（罗纳德·弗雷泽，《流血的西班牙》，第233页）
- 24 感谢全国劳工联合会巴伦西亚地方组织成员安东尼奥·比利亚努埃瓦向我提供了这方面的信息。关于巴伦西亚服装业集体化的详细情况，见一九三七年十月二十一日《我们》。另请参阅对劳动者总工会巴伦西亚省书记处木工工会代表的采访，接受采访者表示，他认为，对木器制造业实行社会主义化是“一个错误”，尤其是考虑到大量小业主并不支持军事叛乱（一九三七年二月二十七日《红色阵线报》）。
- 25 加斯东·勒瓦尔，《自由主义的西班牙，1936—1939》，第351—352页。
- 26 一九三六年十月二十日《工人团结报》。
- 27 一九三六年九月二十三日《全国劳工联合会报》；勒瓦尔，《必要的革命》，第192—193页；勒瓦尔，《西班牙的社会重建》，第32页。
- 28 勒瓦尔，《西班牙的社会重建》，第32页。

- 29 一九三七年八月十八日《全国劳工联合会-伊比利亚无政府主义者联盟情况通报》。
- 30 一九三七年一月十五日《全国劳工联合会-伊比利亚无政府主义者联盟情况通报》。
- 31 一九三六年九月十七日《全国劳工联合会-伊比利亚无政府主义者联盟情况通报》；一九三八年二月号哈瓦那《辩证法》；何塞·佩拉特斯，《西班牙革命中的全国劳工联合会》，第一卷，第174—175页。
- 32 根据全国劳工联合会全国委员会成员马里亚诺·卡多纳·罗塞利写给我的一封信，现存胡佛研究所。
- 33 见一九三七年一月二十三日《土地与自由》（加斯东·勒瓦尔的文章）。
- 34 勒瓦尔，《必要的革命》，第192页；勒瓦尔，《西班牙的社会重建》，第11页。
- 35 托马斯·卡诺·鲁伊斯在一九三六年十一月举行的全国劳工联合会巴伦西亚地方组织代表大会闭幕会议上的演说，引自一九三六年十一月十七日《社会熔炉报》。
- 36 一九三七年四月七日《工人团结报》。另见一九三六年十月四日和一九三七年二月四日《工人团结报》。
- 37 全国劳工联合会的一份正式报告公开承认，在加泰罗尼亚地区，不计其数的小商人反对集体化运动；见经济管理委员会会议报告，收入《一九三七年二月二十五日至三月三日在巴塞罗那举行的加泰罗尼亚地区劳工联合会特别代表大会会议纪要》，第363—365页。
- 38 阿尔韦特·佩雷斯-巴罗，《加泰罗尼亚地区三十个月的集体化运动，1936—1939》，第49页。这部颇有价值的著作的作者声称，一九二六年以前他一直积极地投身于工团主义运动，不过后来“在政治上独立了”。尽管他以值得赞赏的客观态度描述了集体化运动的正面作用和负面影响，但他显然是支持这一运动的。内战期间，佩雷斯-巴罗是加泰罗尼亚经济集体化委员会法令实施委员会书记处的一名官员（见西班牙文版《加泰罗尼亚地区三十个月的集体化运动》序言，第29页）。
- 39 根据罗纳德·弗雷泽的记录，见弗雷泽《流血的西班牙》，第221页。
- 40 佩雷斯-巴罗一九四〇年三月八日写给胡安·洛佩斯的信，见佩雷斯-巴罗《加泰罗尼亚地区三十个月的集体化运动》，第25页。关于佩雷斯-巴罗的情况，见本章注释38。
- 41 一九三六年九月九日《工人团结报》。
- 42 一九三六年八月二十九日《工人团结报》。另请参阅一九三六年八月八日、九月三日和十月八日《工人团结报》；全国劳工联合会加泰罗尼亚地区委员会和伊比利亚无政府主义者联盟半岛委员会发表的声明，见一九三六年八月二十六日《每日图片报》。

农村的革命、自由共产主义的理论与实践

如同集体化运动使手工业者、小工厂主和小商人心神不安一样，农村的集体化运动也让小地主、佃户和佃农忧心忡忡。革命最初的几个星期，在对革命之前无地农民打短工——他们出于本能而选择的一种劳作方式——的大庄园几乎毫无例外地实行农业集体化时，集体化运动波及到数以千计的中小农场主。即使是没有立即受到影响的那些人也明白，迅猛发展的集体化运动对他们具有致命的威胁，因为农村集体所有制不仅将使农业工人的劳动力市场不复存在并导致农业生产和农产品销售失去竞争，而且对现有的小地主以及那些在占用土地之后认为这场革命已经完成其任务的佃户和佃农形成某种长期的威胁。¹

“由于战线的不断推移，”爱德华·E.马莱法基斯写道，“而且由于被没收的土地只是在土地改革协会[IRA]以追溯的方式使没收土地合法化之后才逐渐成为政府统计资料的内容，因此无法确切查明，在西班牙共和派控制区，工会组织究竟没收了多少土地。……通过尽力综合平衡现有证据，我得出的结论是，在西班牙共和派控制区，大约三分之一的土地被没收，而且（因为集体化主要实行于可耕种土地）没收的耕地占全部耕地的二分之一至三分之二。说来令人感到残酷，没收土地行为的受害者主要是

那些中小地主，由于大庄园所处的大部分地区在内战爆发之后几乎立即被民族主义分子所控制，因而它们并没有包括在土地改革协会的报告中。”²

例如，在安达卢西亚地区^①的哈恩省，内战爆发前社会党人构成了那里的劳动力主体，中小地主则拥有相当可观的一部分土地，结果，集体化农业不仅以损害大庄园主的利益为手段，而且以损害中小地主的利益为手段，很快使自己成为具有支配地位的生产方式。“对革命的恐惧使大地主都逃走了。”加里多·冈萨雷斯在他那部研究哈恩省集体农庄运动的著作中写道，“另一方面，如果担心受到曾因工资和劳动条件等问题与其发生过冲突的短工的报复，中小地主则尽量在一段时间里避免引起人们的注意。……实际情况是，在最初的那些日子里，权力掌握在武装民兵的手中。”加里多继续写道，社会党人、全国劳工联合会和共产党人认定，“伟大的时刻已经来临，大规模占有土地并且集体耕种这些土地代表了他们期待已久的革命。”³

当私人农场主惊恐地看着农业集体化迅速蔓延开来时，加入了无政府工团主义者的全国劳工联合会和社会党人的劳动者总工会的农场工人则将其视为新时代的开始。无政府工团主义者是西班牙的传统革命者和农业集体化的主要推动者，他们认为集体化是西班牙革命的一个基本特征。这是他们的首要目标之一，并以极大的魅力控制着他们的思想。他们不仅相信集体化将会通过引进农业科学和机械设备改善农民的生活状况，⁴不仅相信集体化将使农民免遭大自然的危害以及中间人和放高利贷者的不公平对待，而且相信集体化将提高农民的道德水准。“认识到集体化优越性的或是具有明确革命意识的农民，还有那些已经开始采用[集体化耕作方式]的农民，应当努力通过一切令人信服的手段敦促落后者。”伊比利亚无政府主义者联盟的喉舌、对全国劳工联合会的工会组织具有极大意识形态影响力的《土地与自由》写道，“我们不能允许个人占有小片土地……因为私有土地总是产生精于算计和自私自利的资产阶级心态，那是我们希望永远根除的东西。我们需要在物质和精神上重建西班牙。我们将要进行的既是一场经济革命，又是一场道德革命。”⁵

^① 安达卢西亚地区包括西班牙南部的韦尔瓦、加的斯、塞维利亚、马拉加、科尔多瓦、哈恩、格拉纳达和阿尔梅里亚八个省份。

伊比利亚无政府主义者联盟的另一份出版物写道，集体劳动消除仇恨、忌妒和利己主义，而且开创了“相互尊重和团结”的社会风气，“因为一起过着集体生活的人们像一个大家庭的成员那样彼此相待”。⁶

集体化同时也是提高农民知识水平的一种手段。全国劳工联合会和伊比利亚无政府主义者联盟的主要理论家和活动家迭戈·阿瓦德·德·桑蒂连认为：“个体农业的最大弊病是过量的劳动，这使所有身体健全的家庭成员——父亲、母亲、孩子——终日忙碌。……没有固定的劳动时间，体力消耗没完没了。……农民不应当使自己或者孩子作出如此过分的牺牲。至关重要的是，农民应该腾出时间和精力让自己和家人接受教育，因此，集体化之光可以照亮农村的生活。”

64

“在集体农庄劳动比较轻松，这使集体农庄庄员有可能通过阅读报纸、杂志和书籍充实自己的头脑，为他们的发展进步提供了条件。”⁷

社会党人的劳动者总工会持有类似的观点，⁸但是，提倡集体农业并且反对分解大庄园的一个更重要的原因是，他们担心拥有小片土地的农民有朝一日可能成为革命未来发展的障碍，甚至成为某种威胁。劳动者总工会所属的实力强大的全国农业工人联合会某地方分会书记说：“集体化是取得进步的唯一手段。在这个阶段我们甚至不必考虑分配土地。各地的土质并不一样，有些收成……比另一些好。如果我们打算分配土地，就有可能重新陷入过去的困境，当幸运的农民丰衣足食时，一些辛勤劳动的农民却食不果腹，于是，我们将会再次看到主仆之分。”⁹全国农业工人联合会执委会宣称：“我们绝不会允许分配土地、农具和牲畜，我们之所以对没收来的全部土地实行集体化，目的就是为了给农民家庭平均分配劳动任务，然后平均分享劳动果实。”¹⁰

全国劳工联合会和伊比利亚无政府主义者联盟的青年运动通过它的喉舌宣称：“我们无政府工团主义者从一开始就认为，个体农业将直接导致出现巨富，导致对政要的控制，导致人剥削人，并将最终导致资本主义制度的重新建立。”

“全国劳工联合会不希望出现这一类情况，因而掀起了工业和农业的集体化运动。”¹¹

他们担心，如果鼓励个体农业，一个新的拥有土地的富裕阶层最终将

在旧制度的废墟上崛起。这种担忧无疑是那些集体化运动的积极推动者决心要把顽固的小自耕农——无论自愿还是强迫——纳入集体所有制的部分原因。当然，在一定的限度内，全国劳工联合会以及稍微温和一点的劳动者总工会官方执行的的确是一种尊重共和派小农场主财产的政策。¹²“我认为，自愿加入的庄员是集体农庄最根本的基础。”社会党左派领导人、全国农业工人联合会总书记里卡多·萨瓦尔萨说，“相对于由毫无积极性的农民——他们可能进行破坏直到把集体农庄搞垮为止——被迫组成的大型集体农庄来说，我更喜欢由一群勤奋可靠的劳动者所组成的充满热情的小型集体农庄。自愿实行的集体化过程也许显得更长，但是，管理有方的小型集体农庄作为榜样将会引起所有农民的关注。农民极其现实和功利，强制推行集体化则有可能因其使集体农业丧失信誉而失败。”¹³然而，因为劳动者总工会和全国劳工联合会均不允许共和派小农场主拥有的土地超出其不雇短工所能耕种的限度，¹⁴同时因为在许多情况下他们必须按照当地委员会规定的条件将富余的粮食交给后者而不得自由进行处理，¹⁵所以，如同本章稍后将要描述的那样，他们经常在各种形式的压力驱使下加入集体所有制。尤其是在无政府工团主义者处于优势的那些村庄，实际情况就是这样。社会党人所领导的劳动者总工会会员中包括人数可观的小地主和佃农，他们几乎或者根本没有农业集体化的倾向，只是因为劳动者总工会能够保护他们不受地方官员、大地主、放高利贷者和经纪人的侵害才加入了这个组织。与劳动者总工会的情况不同，¹⁶当内战爆发时，无政府工团主义的雇农工会几乎完全是由受无政府主义哲学所激励的农业工人和贫困农民组成的。在这些革命积极分子看来，农业集体化是他们期待在革命之后立即建立的无政府主义或所谓自由共产主义新制度的基石。自由共产主义应该是一种“四海之内皆兄弟”式的社会制度，“它将尝试在不设政府、不采取政治手段的情况下，按照众所周知的‘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原则解决经济问题”，¹⁷是一种以工会和自治社区为基础的没有等级的社会制度，工会和自治社区将联合组成一个全国性的联盟，在这个联盟中，大家共同拥有生产和分配的手段。¹⁸

65

“自由共产主义是没有政府和私有财产的社会形态。”著名的无政府主义作家伊萨克·普恩特写道，“由于这个原因，不必发明任何东西或者

创造任何新的组织形式。我们未来的经济生活将要围绕其运转的核心已经出现在我们的社会：工会和自由社区——工会，工厂和集体农庄的工人自发地聚集于其中；而自由社区则是一种具有古老传统的集体形式，乡村的人们同样自发地聚集在里面，它为农村地区的所有社会问题提供了一种解决方案。

“这两个按照民主和联邦原则行事的集体……作出的决定将是至高无上的，它们不被任何更高的机构所控制。它们唯一的职责应当是，组成将集体拥有一切私有财产并将在每个地区掌控生产和消费的产业联盟。”¹⁹

尽管全国劳工联合会和伊比利亚无政府主义者联盟的大多数成员都把自由共产主义当做政治运动的最终目标，仍有少数“个人主义的”无政府主义者在反对雇佣劳动的同时认为，一个无政府主义社会不应局限于某种特定的生产体制。“无政府主义社会必须由无数不同的体制所组成，从而使个人摆脱一切桎梏。”西班牙自由主义的一位重要人物写道，“对于各种各样的人性来说……它应当像一个实验场。”²⁰

66 尽管没有看到关于建立自由共产主义制度的硬性规定，但在所有地方这一过程几乎都是一样的。全国劳工联合会和伊比利亚无政府主义者联盟在实行新制度的每个地区设立了一个委员会，该委员会不仅行使立法权和行政权，而且行使执法权。它首先采取的行动包括禁止私人贸易，把肥沃的土地集体化，贫瘠的土地往往也被集体化，同时集体化的还有农场的房屋、机械、牲畜和运输工具。除了极个别情况之外，理发师、面包师、木匠、鞋匠、医生、牙科医师、教师、铁匠和裁缝也被纳入集体所有制。库存的食物、服装和其他生活必需品被集中到由地方委员会所控制的公共仓库里，没有被烧毁的教堂改作仓库、食堂、餐馆、车间、学校、车库或营房使用。在许多居民点，国内流通的货币被废除，因为无政府主义者认为：“金钱和权力是魔鬼的春药，它们把人变成了狼，变成了疯狂的敌人而不是兄弟。”²¹“在[阿拉贡地区^①的小城]弗拉加这里，你可以把钞票扔到街上，没有人愿意接受钞票。”发表在某份自由主义报纸上的一篇文章写道，“洛克菲勒，即使你带着全部银行存款来弗拉加，你也买不到一杯

^① 阿拉贡地区包括西班牙东北部的韦斯卡、萨拉戈萨和特鲁埃尔三个省份，大致与历史上属于阿拉贡王国的地区相当。

咖啡。在这里，金钱——你的上帝和仆人——已经被废除，人民因此而幸福。”²²在废除了货币的自由主义社区，工资以票证的形式支付，工资的级别由家庭的规模来决定。“大多数全国劳工联合会集体的特点是家庭工资。”一位外国观察家写道，“工资根据家庭成员的需要而不是每个工人完成的工作来支付。”²³诸如面包、葡萄酒和橄榄油之类地产商品如若充足则自由分配，同时可以凭票证到公共仓库领取其他商品。多余的商品被用来与无政府主义者控制的其他城镇和乡村进行交换；货币只在与没有实行新制度的社区交易时使用。²⁴

尽管本书无法为读者提供一幅关于自由主义者控制区城镇和乡村生活的完整画面，不过，下面这段描述也许可以给人留下充分的印象：

在阿尔科拉村，据一名见证人说，货币不再流通。每个人都能得到他所需要的东西。从哪儿得到？从委员会。当然，无论如何不可能通过单独一个分配中心供应五千人的生活所需。因此，像以前一样，那里有商店，人们可以满足自己的需要，不过，这些只是分配中心。它们属于整个村庄，以前的店主不再赢利。付账使用的不是钞票而是票证。甚至理发师理发也收委员会发给的票证。只是部分实现了每个居民应当按其所需得到商品的原则，因为它是以假定每个人的需要都一样为前提的。……

每个家庭和每个独自生活的人领到一张卡片。每天要在工作的地方给这张卡片打孔；[因为]票证是根据这些卡片发放的，所以没有人可以逃避劳动。然而，这种制度的重大缺陷是，由于没有任何其他衡量价值的手段，为了评定已经完成的劳动价值，不得不再次求助于货币。每个人——工人、商人、医生——工作一天得到价值五比塞塔的票证。部分票证盖有“面包”的印戳，每张面包票可以购买一公斤面包；另一些票证代表一定数额的钱。不过，不能认为这些票证是钞票，因为它们只能交换生活资料，而且这有一定的限度。即使这些票证的数额较大，人们也不可能用它获得生产资料成为一个资本家，哪怕是以最低的标准，因为它们只能用来购买生活资料。一切生产资料归集体共有。

67

这个集体以委员会为代表。……阿尔科拉村的所有货币都掌握在它的手中，大约有十万比塞塔。除了购买无法通过交换获得的商品，委员会还用集体的产品交换集体缺乏的商品。不过，货币只是作为一种临时代用品被保留下来，在别的地方仍未效仿阿尔科拉村的时候，保留货币有充分的理由。

委员会是这个集体的家长。它拥有一切，管理一切，关注一切。每一项特殊的要求必须提交它审议，只有它最后说了算。

也许有人表示反对，认为委员会的成员有成为官僚甚至独裁者的危险。村民并非没有注意到这种可能性。他们认为，每隔一段不长的时间委员会成员应当更换，以使每个村民能在其中任职一定的时间。

所有这些为它增添了某种天真的成分。过于严厉地指责它并且认为其中具有更大的意义都将会是错误的，这只不过是部分农民为了建立自由共产主义所进行的一种尝试。最重要的是，人们不应忘记，农业工人，甚至还有居住在这种地方的小商人，生活水平至今仍然非常低。……革命以前吃块肉都是奢侈的，只有少数知识分子的需求超出了最低限度的生活必需。²⁵

在与阿尔科拉村的一些农民进行的一次谈话中，这位敏锐的观察家继续提供了一些情况，这些情况可以被看作自由主义者控制下的每一个乡村委员会对村民生活所实行的精细控制的典型实例：

“例如，如果有人想进城怎么办？”

“这很简单。他去委员会把他的票证换成钱。”

“那么，他可以想换多少就换多少吗？”

“不是，当然不是。”

这些善良的人对我不能理解他们的意思相当吃惊。

“他什么时候能拿到钱，当时就能拿到吗？”

“每次他需要的时候。只是他得问委员会。”

“那么，委员会审查他的理由吗？”

“当然审查。”

我有点担心。在我看来，这种管理肯定将使人们在自由共产主义制度下几乎没有什么自由，于是，我试图弄清阿尔科拉村的委员会根据什么允许人们去旅行。……

“如果某人在村子外面有个女友，他能得到钱去看她吗？”

农民向我保证他能。

“每次他想去时都能吗？”

“天哪，只要他想，每天晚上他都能从阿尔科拉去看他的女友。”

“但是，如果有人想进城去看电影，他也可以得到钱吗？”

“是的。”

“每次他想去都可以吗？”

农民开始怀疑我的判断力。

“节假日当然可以，不过，干坏事可拿不到钱。”²⁶

关于自由主义者控制的卡斯特罗村，见证人弗朗茨·博克瑙写道：

无政府主义社会制度在卡斯特罗的显著特点是废除了货币。交易受到禁止；生产几乎没有变化。……委员会接管了庄园并进行管理。庄园甚至没有被合并，而是各自由其以前雇用的工人分别耕种。当然，货币工资已被禁止。要说取而代之的是实物支付也不对。不管什么形式的工资都没有；村民们直接从村子的仓库领取食品。

在这种制度下，村子提供的是少得可怜的基本口粮；我要冒昧地说，可能比以前的口粮还要少，哪怕是与安达卢西亚短工[农业工人]惯常生活的那种悲惨状况相比。所幸这个村子像许多其他同类村庄一样，不仅种植了油橄榄，而且种植了小麦；因此，至少人们有面包吃。此外，村子拥有与庄园一起没收的不少羊群，因此人们也有肉吃。他们还有一个香烟铺。这就是全部。我试图找点喝的东西，咖啡、葡萄酒或柠檬汁，但白费功夫。村里的酒吧已被当做邪恶的生意停业关门。我去商店看了看，那里的生意非常惨淡，以致估计快要倒闭。然而，村民们似乎因这种状况感到自豪。他们告诉我，不喝咖啡

让他们高兴；他们似乎把禁止这种无用的事情当做一种道德进步。对于外面的商品他们需要的非常少，主要是服装，他们希望用他们富余的油橄榄直接交换。……他们对上层社会的敌意在经济方面远远不如道德方面。他们不想过他们没收了其财产的那些人的富裕生活，而是要杜绝后者那种奢侈享受，在他们看来，奢侈享受堕落之极。他们认为，即将诞生的新制度完全是禁欲主义的。²⁷

69 清教主义是自由主义运动的一个特点。据研究西班牙无政府主义的权威乔治·埃森魏因说，清教主义是“无政府主义意识形态的几个组成部分之一，从一八六八年该运动兴起直到西班牙内战时期都可以找到它的踪迹。因承认无产阶级与中产阶级在道德方面截然对立而产生的这一倾向特别提倡一种不受物质至上主义价值观念约束的生活方式。因此，过度饮酒、抽烟以及其他被视为中产阶级特征的生活习惯几乎总是受到谴责”。²⁸例如，在自由主义者控制的马格达莱娜—德普尔皮斯村，人们把禁烟禁酒当做一场胜利来庆祝。²⁹在阿苏亚拉村，集体主义者查封了咖啡馆，因为他们认为那是一个“轻浮的场所”。³⁰“无政府主义者不应当抽烟。”无政府主义刊物《白色评论》曾经写道，“无政府主义者绝不应做任何损害自己健康的事情，尤其是这种事情还要花钱时。”无政府主义者也不应当光顾妓院：“经常出入妓院的人不是无政府主义者。……如果一名无政府主义者不比其他人优秀的话，他就不能自称为无政府主义者。……买春的男人使自己堕落到卖春女人那种地步。因此，一个无政府主义者不能购买爱情。他应无愧于爱情。”³¹

因为无政府主义者相信自由性爱或“自由结合”，所以有时需要与其他村民妥协。内战期间曾经访问过马格达莱娜—德普尔皮斯村的著名法国无政府主义作家和活动家加斯东·勒瓦尔证明：

我询问了结婚的情况。我们的同志当然相信自由结合，但是，结婚是这个平静的村庄不会忽视的一件事情。另一方面，按照正式的礼仪结婚就将违背人们的原则。因此，有必要找到一种结婚方式，使人们不按正式的礼仪也能合法成婚。这种方式的程序是：

自从革命开始以来，已经有四对新人结了婚。他们由家人和朋友陪伴着，来到委员会的秘书面前。他们的姓名、年龄和结婚请求被记录在一个登记簿上。风俗受到尊重，婚礼保证举行。同时，为了尊重自由主义的原则，当新婚夫妇走下楼梯时，委员会秘书把写着所有这些内容的纸抽出来撕成碎片，然后，在他们从阳台下面经过时，把这些碎片像彩色纸屑一样洒向他们。所有人都表示满意。

我解释说，即使除了进行社会研究之外没有别的什么理由，也有必要保留关于这些婚姻、出生和死亡的记忆，只有那些不学无术的人可能不屑于这样做。他们理解我的想法，并且答应复原那个登记簿。³²

在无政府主义者控制的格劳斯村，据一位社会党人判断，生活水平比内战之前有所提高。“土地、磨坊、牲畜、商店、运输工具、手工作坊、制鞋业、家禽养殖业和自由职业全被纳入集体所有制。村庄是一个为公共利益服务的经济集体。所有的人都有工作。所有的人都幸福地生活。苦难和奴役已被消灭。……一个大功率的汽笛管理着村子里的生活：劳动、吃饭和休息的时间。……六十岁以上的人被免除了劳动的义务。……这是集体的基本原则之一。……当集体中的某个成员决定结婚时，他得到收入不变的一周假期，同时提供给他一幢配有家具的房子——房产也被集体化了……他将逐步偿还房款，没有利息。集体为他提供一切服务。从出生到死亡，他始终受到集体的保护。”³³

70

关于门布里利亚村，一份无政府主义者的记述写道：

七月二十二日，大地主的财产被没收，小片地产进行了清算，全部土地归公社所有。小地主理解这些措施，这些措施使他们摆脱了债务和支付工资的烦恼。

地方金库空空如也。在私人财产中发现了共计三万比塞塔，于是将其全部没收。食物、衣服、工具等所有东西在村民当中平均分配。货币被废除，劳动集体化，财产被公社接管，生活资料免费分配。然而，这不是富裕的社会主义化，而是贫穷的社会主义化。……

不再有任何零售业。自由共产主义盛行。杂货店由以前的店主经

营，它的账目则被公社控制着。……

每人每周分到三升葡萄酒。租房、水电和看病是免费的。如有必要，公社以外的专家会诊由委员会付钱。当一名妇女请求准许她去雷阿尔城找专科医生看胃病时，我就坐在离委员会秘书不远的地方。没有官僚主义的拖拖拉拉，她马上得到了此行的费用。³⁴

在自由主义者控制的辛卡河畔的阿尔瓦拉特村，委员会的效率低得多，发钱或者拒发的权力使它具有专制的地位。“一名妇女想去莱里达看专科医生，”在巴塞罗那指导全国劳工联合会的外国情报部门工作的著名外国无政府工团主义者阿古斯丁·索奇写道，

她早晨七点来到委员会的办公室。……委员会成员与劳动小组一起在地里干活儿，他们在劳动之余处理村子和[全国劳工联合会]组织的事务。

“要想得到外出的钱，你首先必须提供一份医生证明，”委员会主席解释说。

这一回答令那位老年妇女不满。她诉说风湿病之苦，试图劝诱委员会在没有医生证明的情况下发给她钱，但没有成功。

“有些人利用集体提供的新的可能。”委员会主席说，“许多人以前从不进城。……如今他们没钱也能外出旅行，他们小病大治夸大其词！”

主席的解释也许失之偏颇。医生可以对这个问题发表更为客观的意见。³⁵

71 多年以后弗雷泽与这些集体中的部分幸存者进行了交谈，在他那部口述史中，弗雷泽发表了下面这一段中肯的评论：“随着货币的废除，集体占据了有利的地位，因为任何想要外出的人都必须从委员会那里弄到‘共和国的’货币。这意味着需要证明出行具有正当的理由。……在马斯-德拉斯马萨斯，集体以送人去巴塞罗那看专科医生为自豪。……但是，据一位右翼人士说，对于一个没有工会会员证的人来说，如果他要离开村子，即

使只是短时间外出，他也必须得到一张通行证。……在阿略萨，身体有病被认为是一个正当的理由，于是，小学校长的岳父外出去做疝气手术，他利用这个机会一去不回。……集体与集体之间的情况明显不同，因此，像在许多其他方面一样，不能一概而论。”³⁶

接着，在后面的一段内容里，弗雷泽写道：“这场实验的乌托邦成分使得问题复杂化，主要是因为废除了货币。一些委员会的独断专行表明了自由主义民主的局限性，这只能通过选出向村民大会负责的可以罢免的代表来克服。因此，作为一种形式的战时共产主义，集体化深受某些严重缺陷之害。”³⁷

在描述他所访问过的自由主义村庄生活的其他方面时，阿古斯丁·索奇谈到了卡拉塞特村：

过去这里有许多小自耕农……还有许多铁匠和木匠，他们都有自己的小作坊，他们在那里以某种原始的方式从事手工劳动。集体主义理想使他们看到了通往劳动共同体的道路。现在有一个大铁匠铺，十名铁匠在里面干活儿；他们拥有现代化的机械设备，整洁明亮的生产车间。村子里的所有木匠都在一个大木工场里干活儿。……

强壮的[农业]工人被分成二十四个劳动小组，每个小组二十个人。按照预先制订的规则，他们共同耕种村里的土地。以前每个人为自己干活儿，现在他们为集体劳动。……

村子里有两个杂货店和一名医生。他们属于这个集体，不是因为被迫，而是因为他们自愿。问题出在面包师身上。他们既不想加入这个集体，也不想在新的条件下工作，因此他们离开了村子。新的面包师还没有招来。找到了一个临时的解决办法：仍然由女人烤面包，但是村里需要招进新的面包师。

这曾经是个贫困的村庄，如今村民生活幸福。许多人过去经常挨饿，现在他们可以吃饱了。³⁸

一份关于特鲁埃尔省巴尔德罗夫雷斯地区的报告写道：“集体化仍然受到右派敌人和左派对手的反。如果向那些被没收了财产的长年游手好

闲者询问他们对集体化的看法，一些人可能会回答，那是抢劫；另一些人则会说，那是一种专制。但是，对于上年纪的人、打短工的人、佃农以及总是被大地主和残酷无情的放高利贷者所控制的小地主来说，集体化的出现就像是一场拯救。”³⁹

关于卡兰达村，索奇写道：

72

曾经作为教堂的地方现在是个食品仓库。……新的肉类市场设在一幢附属建筑里，村里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卫生讲究的市场。买肉不是用钱。女人们用票证换来肉，不付出任何东西，也不提供任何服务。它们属于集体而且食品供应充足。……

集体主义者和个人主义者友好相处。村里有两个咖啡馆，一个供个人主义者使用，另一个供集体主义者使用。他们每天晚上可以享受一下喝咖啡的奢侈。……

极好地体现了集体主义精神的是公共理发店，那里的服务是免费的。农民过去从不刮脸。如今几乎每张面孔都经过了精心修剪。每人一周可以修两次面。……

一星期供应五升葡萄酒。食物从来不缺乏。……

所有东西都集体化了，除了那些店主希望保持独立的小商店。附带卖药的杂货店属于集体，医生同样属于集体，他看病不收钱。像集体的其他成员一样，他由集体供养。⁴⁰

关于马埃利亚村，刊登在《土地与自由》上的一篇文章写道：“货币不复存在了。……在这个村子里，医生和教师都不收钱。他们完全无私地放弃了荒谬的特权。没有任何人收取报酬。”⁴¹

在穆涅萨村，面包、肉类和食油免费分配，但是，与自由主义倾向最严重的村庄不同，部分货币还在流通。“每个男工一天得到一个比塞塔，”索奇说明，“女工和女孩得到七毛钱，十岁以下的儿童五毛钱。这些钱不应被看作是工资。它与基本生活必需品一起分配，以使人们可以购买需要补充的商品。”⁴²

反对宗教以及反教权主义的情绪深深植根于西班牙工人阶级运动中，

在无政府主义者当中尤其深入人心。自从十九世纪七十年代以来，现代伊比利亚无政府主义者联盟的先驱社会主义民主联盟一直要求“废除迷信，用科学取代宗教信仰，用人类正义取代神圣正义”。⁴³此外，俄国无政府主义者米哈伊尔·巴枯宁——西班牙自由主义者的大部分理论源于他——曾经宣称：“上帝的存在与幸福、尊严、智慧、道德是非感以及人类的自由水火不相容，因为，如果有个上帝存在，我们的智慧，无论多么伟大，我们的意志，无论多么坚强，与神的智慧和意志相比，都一钱不值。”⁴⁴他在《上帝与国家》中断言，人可以通过三种方式摆脱他们的命运：两种是在想象中，一种是在现实里。“前两种是小酒馆和教堂，肉体的堕落和精神的堕落；第三种是社会革命。”⁴⁵自从巴枯宁和社会主义民主联盟时代以来，西班牙无政府主义者对宗教的态度没有改变。“只要人还在上帝面前下跪并且恭顺地臣服于国家，”内战爆发之前不久发表在《土地与自由》上的一篇文章写道，“人类就不会进入一个公平的新世界。”⁴⁶接着，在革命初期，自由主义者在马德里的主要舆论工具《全国劳工联合会报》发表社论宣称：“必须毫不留情地消灭天主教。我们不要求摧毁每一座教堂，但是我们要求任何教堂不应残留宗教的痕迹，不应允许狂迷的黑蜘蛛编织布满灰尘的黏性丝网，迄今为止我们的道德和物质价值观像苍蝇一样被这张大网束缚着。在西班牙，比其他任何国家更明显，在每一次倒行逆施中，在每一次反人民的行动中，在每一次对自由的攻击中，天主教会总是充当主力军。”⁴⁷

73

“[在马萨莱昂村]天主教神秘主义已不复存在。”索奇肯定地说，“神职人员不见了，基督教会停止了活动。但是，农民不想毁掉建在山顶上的那座哥特式的雄伟建筑。他们将其改成咖啡馆和气象台。……他们扩大了教堂的窗户，并把曾为圣餐台的地方建成一个宽敞的阳台。放眼望去，阿拉贡群山南坡的景色尽收眼底。这是一个让人平静和思考的地方。星期天村民坐在这里，喝着咖啡享受夜晚的宁静。”⁴⁸

在反佛朗哥阵营所控制的几乎每一个地区都有一些充满热情的积极分子，乡村集体化运动的初步进展，不论是以几乎无所不包的自由共产主义形式，还是以范围有限的集体化农业形式，都使他们精神振奋，他们以旺盛的精力继续推动集体化运动向前发展。对于其目标的正义和伟大，他们

具有某种使徒般的信念，因此决心在他们能够做到的任何地方毫不拖延地立即实现这些目标。“我们处在革命形势发展最快的时期，”一名狂热的自由主义者宣称，“所以我们必须砸碎一切束缚我们的枷锁。如果现在不采取行动，我们何时才能砸碎它们？”

“我们必须进行一场全面的革命。没收财产也必须是彻底的。现在不是高枕安卧而是开始重建的时候。当我们的同志从前线归来，看到我们无所事事他们会说些什么呢？如果西班牙的工人阶级不能开创他们的自由，国家将会卷土重来并且恢复政府的权力，逐渐毁掉以无数牺牲和英雄行为为代价而取得的革命成果。”

“为了使西班牙无产阶级的鲜血不至于白流，后方应当积极行动。……我们必须进行我们的革命，我们自己特殊的革命，没收，没收，没收大地主的财产，同时没收阻挠我们实现目标的那些人的财产。”⁴⁹

在一次阿拉贡地区集体农庄代表大会上，一名代表宣称，将以最大的强度推行集体化，以避免出现某些村庄只是部分实现集体化的情况。⁵⁰这一声明例证了集体化农业成千上万热情支持者的心情，他们并不担心集体化将使拥有土地的农民和佃农产生疏离感，因为对于后者来说，个人耕种至高无上。他们大权在握，对于工会领导人反复发出的警告——例如，工会领导人在全国劳工联合会加泰罗尼亚雇农工会代表大会期间发出警告，

74

“大规模推行集体化将会导致灾难性的后果，因为这将与农民对于土地的热爱和感情发生冲突，他们以非常巨大的代价才获得了土地”⁵¹——毫不在意。

尽管全国劳工联合会和伊比利亚无政府主义者联盟的出版物列举了许多拥有土地的农民和佃农自愿加入集体所有制的事例，⁵²但是毫无疑问，数量肯定多得多的农民坚决抵制集体所有制，或者只是在受到严重威胁的情况下才接受它。无政府工团主义者偶尔也会承认小地主和佃农对农业集体化的反感，虽然他们不时声称已经消除了这种反感。“我们最常面对的问题是大多数小地主的犹疑心态。”全国劳工联合会卡斯蒂利亚地区农民协会总书记说，“拥有土地的农民习惯了他的的小片土地、他的小毛驴、他的肮脏棚屋、他的微薄收成，他对这点有限财产的感情超过了对儿子、妻子、母亲的感情，可他不得不放弃自古以来他所背负的这一重担并且说：

‘把它们拿去吧，同志们。我这些微不足道的财产属于大家。我们都是平等的。对于我们来说，一种新的生活开始了。’试想一下，这意味着什么。然而，这正是我们成功地说服卡斯蒂利亚的农民去做的事。当农村的一个孩子死去时，人们再也听不见曾经非常普遍的那句凄惨的谚语：‘小天使上天堂了。’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农民经常在他的骡子或驴死去时大发雷霆，而在失去子女时却相当平静。孩子的死往往解决了他的经济问题。”⁵³即使是在阿拉贡地区——那里负债累累的农民深受全国劳工联合会和伊比利亚无政府主义者联盟的思想影响，这一因素为集体农业提供了强大的自发推动力——自由主义者有时自己也承认他们在对土地实行集体化时所遇到的困难。“这是一项艰巨而复杂的工作。”与莱塞拉村有关的一名自由主义者说，“更确切地说，这仍然是一项艰巨而复杂的工作。我们想让人们通过亲身体会认识到我们的想法的正确性和优越性。”⁵⁴

尽管阿拉贡地区的农业集体化涵盖了左派控制区百分之七十以上的人口，⁵⁵而且该地区的四百五十个集体农庄⁵⁶中有许多基本上是自愿组成的，但是我们必须强调，这种突飞猛进的发展在某种程度上应当归因于邻近的加泰罗尼亚地区的民兵的到来，否则情况不可能这样。因为，在巴塞罗那挫败了军事叛乱之后，民兵开往阿拉贡地区不仅是去与叛军或者民族主义者的军队作战，而且是去推广革命，绝大多数民兵都是全国劳工联合会和伊比利亚无政府主义者联盟的成员。“我们正在打仗，同时还要发动革命。”身为全国劳工联合会和伊比利亚无政府主义者联盟民兵武装阿拉贡前线指挥官的著名自由主义运动活动家布埃纳文图拉·杜鲁蒂⁵⁷宣称，“后方那些革命措施不仅要在巴塞罗那实行；我们要把它们从那里一直推行到前线。我们攻占的每一个村庄都将开始沿着革命路线向前发展。”⁵⁸“我们民兵必须唤醒因政治专制而心灵麻木的那些人。”在一份全国劳工联合会的报纸上发表的一篇关于法莱特村民的文章写道，“我们必须引导他们走上真正的生活之路，为了做到这一点，只在村里转一圈是不够的；我们必须继续转变这些头脑简单的村民的思想。”⁵⁹关于布哈拉洛斯村，发表在一份全国劳工联合会的报纸上的另一篇文章写道：“变化是彻底的。导致变化发生的主动权掌握在农民手中，这一点在几天之后杜鲁蒂所指挥的加泰罗尼亚志愿军第一纵队到达时得到了证实，部队经过村庄向萨拉戈萨挺

进，给革命气氛带来一种新的激情。”⁶⁰

作为后果之一，在全国劳工联合会和伊比利亚无政府主义者联盟民兵武装占领区的那些村庄里，有地农民和佃农的命运从一开始就注定了；因为，尽管通常召开村民大会决定是否建立集体所有制，但是，表决总是采取鼓掌通过的方式，而且武装民兵的存在绝不可能不使反对者感到畏惧。即使拥有土地的农民和佃农没有被强迫加入集体所有制，对于这些不顺从的农民来说，生活也会变得困难起来；不仅如同我们已经看到的那样，不许他们雇用短工，不许他们自行处理自己的粮食，⁶¹而且经常不许他们享受集体农庄成员所享受的一切福利。⁶²实际上这意味着，在实行自由共产主义的村子里，不许他们去集体理发店理发，不许他们使用集体面包房的烤箱，不许他们使用集体农庄的运输工具和农业机械，或者不能得到公共仓库和集体商店供应的食品。此外，那些认为由于地主或其管家遭到处决或是逃走而不用交地租的佃农往往被迫向村委会交租。⁶³所有这些因素结合起来形成某种强大的压力，几乎就像被步枪的枪托顶着一样，最终迫使许多村庄的小地主和佃农将他们的土地和其他财产交给了集体农庄。如同索奇指出的那样：“小地主出于理想主义的原因交出财产的事例很少，尽管不是完全没有。在某些情况下，担心被强行没收是他们把土地交给集体农庄的原因。”⁶⁴不过几乎总是出于经济原因。

“受到孤立而且只能听天由命，小地主们前途无望。他们既没有运输工具也没有农业机械。另一方面，集体农庄拥有他们根本无力负担的农用设施。不是所有小地主全都立即意识到这一点。过了一段时间，经过亲身体验，在集体农庄所提供的有利条件使他们信服之后，许多人加入了集体农庄。”⁶⁵

在极其罕见的情况下，据法国无政府主义作家加斯东·勒瓦尔说，小地主得到更好的地块以交换其被集体化了的土地。谈到巴伦西亚省的卡尔卡亨特，勒瓦尔宣称：“大地主逃走之后，在不必诉诸武力的情况下……耕地整个进行了调整。向那些其土地位于集体耕地范围之内并且坚决要求保留私有土地的农民提供了比其原有土地更好的地块，同时他们还得到帮助，以使他们在不剥削别人的条件下重新建立自己的生活。不过这种情况非常罕见。”⁶⁶

实际情况是，在有机会自主作出决定之前，许多小地主和佃农被迫加入了集体农庄。尽管自由主义运动往往竭力淡化甚至根本否认推行农业集体化过程中的强制因素，⁶⁷但是，有时也会坦率地承认强制因素确实存在。“在革命刚刚开始的那几个星期，”著名的全国劳工联合会成员伊希尼奥·诺哈·鲁伊斯写道，“集体化的坚定支持者按照他们的革命主张行动。他们既不尊重财产也不尊重人。在一些村庄，对于少数农民来说，只有将其强加于人，集体化才有可能被接受。这种情况每次革命必然出现。……集体化当然是好制度，并且已经在许多地方产生了令人满意的效果；但是，看到因为部分集体化推行者不够策略而在另外一些地方引起人们对集体化的反感实在让人感到痛心。”⁶⁸

加泰罗尼亚地区土地肥沃、物产丰富，那里的农民大部分是小地主和被称为农夫的土地承租人，对于这个地区，全国劳工联合会的主要报纸《工人团结报》评论道：“出现了一些滥用手段的情况，我们认为这适得其反。我们知道，某些不负责任的行为让普通农民感到害怕，迄今为止人们已经注意到，在平时的劳动中，他们表现出某种冷漠。”⁶⁹几天之后论及同一个地区时，全国劳工联合会的主要领导人之一胡安·佩罗问道：

有人相信……可以通过暴力行为在我国农民心中唤起对社会主义集体化的兴趣或者要求吗？也许有人相信用这种方式进行恐吓能使革命精神在大小城镇传播流行？

这种行为正在产生的严重危害使我不得不把话说清楚。在占领了他们各自的城镇之后，许多来自加泰罗尼亚不同地区的革命者……试图占领农村，征服农民。他们打算如何达到这一目的呢，通过告诉农民摆脱世代所受到的社会剥削的时刻已经来临？不是！他们打算如何实现这一目标呢，通过把革命的精神和道德标准带往农村灌输到农民的观念中？也不是，他们不做这些事情。他们进入农村时随身携带的是革命的火把，他们所做的第一件事是剥夺农民的一切自卫手段。……为了达到这一目的，他们甚至抢走了农民的汗衫。

如果今天你居然还去加泰罗尼亚的各个地区对农民大谈革命，农民将会告诉你，他们不相信你，农民将会告诉你，革命旗手已经从农

村路过了。为了解放农民？为了帮助农民解放自己？不，他们路过农村为的是抢劫年复一年、世世代代遭受刚刚被革命打败的那些人抢劫的农民。⁷⁰

77 当然，强迫任何人加入集体所有制都与无政府主义精神背道而驰，无论通过什么手段。意大利无政府主义者埃里科·马拉泰斯塔的文章对西班牙自由主义运动具有某种重要的影响，他曾经说过：“人们可能更喜欢共产主义，也可能更喜欢个人主义、集体主义或者其他任何能够想象出来的社会制度，而且可以通过宣传和示范为其思想的胜利而奋斗，但是，必须当心人们断言自己喜欢的社会制度是有益于所有人的唯一一种绝对正确的社会制度，在任何时代均放之四海而皆准，因此，除了在经验教训的基础上进行说服之外，应当采取其他手段去争取胜利。缺乏这种警惕性，灾难将会不可避免。”⁷¹他还曾经写道：“革命有一个目的，那就是必须消灭政府和特权阶层的暴力；而自由社会只有通过自由发展才能形成。在这一自由发展的过程中，只要人类仍然渴望控制和特权，它就始终存在着危险，因此，无政府主义者必须进行监督。”⁷²但是，为了做到切实有效，即使这种监督也意味着武装力量的存在，那是权力和强制的组成部分。的确，在这些文章写成之后发生的第一场大规模的社会革命——西班牙革命——中，全国劳工联合会和伊比利亚无政府主义者联盟建立了保卫集体所有制的武装力量，而且利用它来推行集体所有制。某些无政府主义领导人不喜欢这些武装人员的事实只是突显了教条与实践之间的矛盾。⁷³

在理论上，无政府主义者反对马克思主义者所鼓吹的国家专政。对西班牙自由主义运动影响深远的俄国无政府主义者巴枯宁在批驳无产阶级专政时写道：

马克思主义者……相信这种专政将是临时性的短期行为，他们以此安慰自己。他们说，无产阶级专政唯一关心和争取的是，通过教育提高人民在经济和政治两方面的地位，使其达到某种水平，以致一切政府很快就会变得没有必要。……

他们说，无产阶级专政的统治是实现人民彻底解放的一种必不可

少的过渡手段；无政府或自由状态是目的，国家或者专政是手段。因此，为了解放劳苦大众，首先必须控制他们。……

他们断言，只有这种专政——肯定是他们自己的专政——能够代表人民的意愿。不过，我们的回答是：除了使自己长期存在之外，专政不可能有其他目的，因此，它不可能在反对奴役的人民当中产生和发展。自由只能通过自由来创造，也就是说，通过人民的反抗和劳动群众自下而上自发地团结起来来创造。⁷⁴

一九二〇年，列宁在给无产阶级专政下定义并且为其辩护时写道：

“专政的科学概念恰恰就是直接以武力为基础的无限权力，不受任何条件限制，不受任何法律法规约束。仅此而已。”⁷⁵对无产阶级专政的这一定义，伯特伦·D.沃尔夫曾经发表过以下评论：“这一阐述以其学究式的清晰达到完美，因为，即使是在一个并非革命者统治的独裁国家，建立极权主义政权的第一个重要步骤就是消除往往会使权力受到限制的一切约束：宗教的约束，道德的约束，传统的约束，机构的约束，成文或者不成文的宪政的约束，法律的约束，习俗的约束，个人良心的约束，公众舆论的约束——总之，将可能对权力设置障碍、对毁灭改造人的企图形成制约的一切东西全部清除。极权主义政权的整个历史已经证明了列宁作出的‘科学’定义的正确性。”⁷⁶

78

在西班牙革命期间，即使全国劳工联合会和伊比利亚无政府主义者联盟理论上反对马克思主义者所鼓吹的国家专政，他们也在许多地区通过治安组织和革命法庭建立了某种形式的地方专政。虽然这还远远没有达到列宁所确定的关于极权主义专政的“科学概念”的那种标准，但是，全国劳工联合会和伊比利亚无政府主义者联盟不仅以赤裸裸的方式对神职人员和地主、放高利贷者和商人行使了他们的权力，而且在许多情况下以赤裸裸的方式对小店主和自耕农行使了他们的权力。⁷⁷

尽管教条与实践之间存在着矛盾——每当与权力的现实碰撞时，这种矛盾总是让西班牙的无政府主义者感到头疼——但是，无论出现多少强制和暴力问题，一九三六年七月开始的这场革命仍然以其集体主义运动的普遍自发性和范围广泛性等特点及其道德与精神重建的承诺而不同于任

何一场其他革命，对于这一点，怎么强调也不为过。以前从来没有出现过这种自发的运动。“与现代欧洲历史上所出现的其他社会运动不同，”乔治·埃森魏因写道，“这场集体化运动试图在一个广阔的范围内改变导致数百万人民生活痛苦的贫困状态，不仅从物质方面，而且从精神方面。例如，集体农庄最显著的特点是强烈的社会一体化意识：它们制定了福利计划，第一次要求村庄为鳏寡孤独、老弱病残以及其他急需的人提供医疗和赡养。另外还有关于教育的坚定承诺，集体农庄最积极的行动之一是创办学校，特别是在偏僻的村庄，几百年来那里的人民没有享受过接受教育的基本权利。”⁷⁸

无论我们认为集体化作为西班牙农业问题的解决办法在现代社会多么不切实际或天真幼稚，⁷⁹当时的实践肯定仍然是一种独一无二的实验，用研究无政府主义史的主要权威之一乔治·伍德科克话说就是，“无政府主义者声称他们找到了一种可以在自由和平的社会里生活的方法，当我们对此进行最终评价时”，他们的实验“不可忽视”。⁸⁰

在这一阶段必须指出，为了深刻认识内战期间盛行于左派阵营内部的血腥争斗的错综复杂性，人们首先应当了解这场社会革命的深度和广度，并且明白这样一个事实：一九三一年的西班牙共和国不是因为佛朗哥将军取得内战的胜利而在一九三九年四月灭亡的，它灭亡于一九三六年七月，当时爆发的军事叛乱和社会革命使这个政权毁于一旦。⁸¹

注释：

- 1 关于左派阵营各个不同地区的农村集体化运动的资料，可以查阅内战期间及内战以后所出版的下列报纸和期刊：一九三七年七月十九日（巴尔福格纳、卡斯特里奥—德法尔法尼亚、贝尔蒙特—德乌赫尔、波特利亚、奥斯—德巴拉格尔）、十一月十六日、十七日、二十九日和三十日（哈拉玛河畔的贝尔维斯、阿尔瓜伊雷、塞罗斯、马亚尔斯、略夫雷加特河畔的罗塞斯）、十二月六日（帕劳—德安赫尔索拉）《无政府主义报》；一九三六年八月二十六日《战斗报》（雷穆特）；一九三六年九月十六日、二十三日和二十九日（卡瓦内斯、蓬特—德莫林斯、利亚德坎斯、格拉纳德利亚）、十月八日（帕拉弗鲁赫尔、卡尔德斯—德马拉维利亚）、一九三七年三月二十四日（卡夫拉—德尔坎波）、八月四日和十七日（坎达斯诺斯、佩尼亚罗亚—德塔斯塔文斯）、一九三八年二月十一日（布

哈拉洛斯)《全国劳工联合会—伊比利亚无政府主义者联盟情况通报》;一九六三年(原书误为一九三六年——译注)十一至十二月号《人道主义自由论手册》(巴略瓦尔);一九三七年四月十六日马德里《卡斯蒂利亚自由报》(门布里利亚),亦见一九三七年十一月号《西班牙历史文献》;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十四日(瓜达苏阿尔)、一九三七年二月十六日(巴达霍斯)《光明报》;一九三六年八月十日和十七日(蓬特—德阿尔甘达、哈拉马河畔的贝尔维斯、哈拉马河畔的帕拉奎略斯、科维尼亚、比利亚斯—别哈斯)、九月一日和十九日(纳维卢西略斯、乌铁尔)、十月七日至九日(梅斯坦萨和埃林的中心地区)、一九三七年六月十九日(埃纳雷斯堡)《全国劳工联合会报》;一九三八年十一月五日和十二日(马德里、加西亚)、一九四九年一月七日和二十八日(伊哈尔、卡斯佩、安圭斯、弗拉加、辛卡河畔的托伦特、乌蒂利亚斯、佩尼亚尔瓦、法莱特、莱塞拉、阿斯纳拉、拉弗雷斯内达、马斯—德拉斯马塔斯、阿拉孔、马埃利亚)、十二月二十五日(博特)、一九五〇年一月二十九日(塞尔维亚)巴黎《全国劳工联合会报》;一九四六年十一月二十三日(蒂维萨)、一九四七年九月六日(略夫雷加特河畔的奥斯皮塔莱特)、一九五〇年十二月十七日(比利亚斯—别哈斯)图卢兹《全国劳工联合会报》;一九三七年八月十五日(因凡特斯)、九月十五日(伊涅斯塔)、十月十五日(卡斯图埃拉、巴尔德佩尼亚斯)、十二月十五日(伊维)、一九三八年一月至二月(马查马洛)、三月十五日(马尼塞斯)、五月一日(洛斯埃斯塔多斯—德圣托梅)、六月一日(本塔—德尔查科)、八月一日(拉费尔瓜拉福)、九月一日(比利亚鲁维亚—德圣地亚哥)、十二月一日(马查尔)巴伦西亚《集体所有制》;一九三七年十月十九日《巴伦西亚情况通报》(卡斯图埃拉);一九三七年十月二日(佩尼亚罗亚)、一九三八年一月八日和二十九日(塔湖尼亚河畔的佩拉莱斯、略夫雷加特河畔的奥斯皮塔莱特)、四月二十三日(巴伦西亚省)、一九三九年十月二十一日和二十八日、十一月四日和十一日(卡兰达)、一九四八年二月七日和二十一日(法莱特、比内法尔、阿尔塔米拉、弗拉加、阿尔科里萨、蒙松、伊哈尔、阿尔卡尼斯、卡斯佩)、一九五〇年一月二十八日(巴略瓦尔)《无产阶级文化报》;一九三七年八月六日(比内法尔)、五月一日(阿尔卡尼斯)阿尔卡尼斯《文化与行动报》;一九三八年十二月号《西班牙历史文献》(利里亚);一九六三年八月四日(安波斯塔)、一九七二年七月三十日(《安达卢西亚农村的无政府主义革命》)《希望报》;一九三六年八月二十六日《每日图片报》(鲁维);一九三七年六月十七日(乌铁尔)、八月二十八日(库列拉)、十二月二日(格拉马内特—德尔贝索斯)、一九三八年二月二十六日(苏埃卡)《社会熔炉报》;一九三六年十月三十一日马德里《自由青年报》(乌铁尔);一九四八年七月二十三日巴黎《自由主义报》(莱万特地区);一九三七年七月号巴塞罗那《自由女性》(卡兰达、卡韦萨—德布埃、埃雷拉—德尔卡斯蒂略、锡鲁埃拉);一九三七年二月十九日(锡马特—德巴尔迪尼亚)、六月二十四日(贝纳瓜西尔)、十二月一日(马德里)《我们》;一九三七年十一月二十五日《西班牙反法西斯新闻报》(巴尔萨雷尼);一九三七年二月六日《新闻导报》(蒙特梅洛);一九三七年九月十日《无产阶级革命》(塞戈尔韦);一九三六年八月十四日(布哈拉洛斯)、十月六日(拉菲格拉)、十一月十七日、十九日、二十二日和二十八日(巴尔洪克拉、塔拉萨、普雷米亚—德达尔特、马尔托雷尔)、十二月五日、十一日、十九日和二十七日(塞尔达尼奥拉—里波列特、比利亚努埃瓦—赫尔特鲁、诺亚河畔的萨杜尔尼、鲁维)、一九三七年一月二十日(安波斯塔)、六月二十六日和三十日(奥列特、普拉—德卡夫拉)、十一月十日(莱里达)、十二月二十五日(卡拉瓦卡)、一九三八年十二月十日(比拉沃伊)《工人团结报》;一九五一年二月十日巴黎《工人团结报》(塔马里特—德利特拉);一九三六年八月二十七日(马埃利亚)、一九三七年一月十六日(卡尔卡亨特、巴尔福古纳—德巴拉格尔、埃布罗河畔的皮纳、帕拉弗鲁赫尔)、二月十三日(利维亚)《土地与自由》;一九五〇年一月八日罗马《人类新星报》

(特里亚纳)；一九三七年七月二十四日《开端》(安波斯塔)；一九三七年十月二十二日《生活》(贝尼奥帕、奥利瓦、特雷萨、塔韦内斯—德巴尔迪尼亚、贝尼法伊罗、锡马特)，亦见一九三七年十月二十二日《工人团结报》。关于农村集体化运动的其他资料，见一九三八年七月号巴塞罗那《方向盘》杂志(阿古斯丁·索奇的文章)；瓦尔特·L.贝内克，《无政府主义与内战》，第45—72页；弗朗茨·博克瑙，《西班牙斗鸡场》，第148—151页；胡利安·卡萨诺瓦·鲁伊斯，《阿拉贡地区农业社会的无政府主义运动与革命，1936—1938》，第177—219和323—337页；《农村的集体化运动，1936—1939》；全国劳工联合会，《(韦斯卡省)蒙松地区革命及集体化改造的成果》；玛丽娅·何塞帕·库科·希内尔等，《巴伦西亚地区的农业》，第58—62页；萨姆·多尔戈夫编，《无政府主义集体化》；罗纳德·弗雷泽，《流血的西班牙》，第347—373页；路易斯·加里多·冈萨雷斯，《安达卢西亚地区哈恩省的农村集体化，1931—1938》，第27—174页；何塞·路易斯·古铁雷斯·莫利纳，《卡斯蒂利亚地区的无政府主义集体化运动》，第9—113页；加斯东·勒瓦尔，《共产主义》，第60—66页；加斯东·勒瓦尔，《自由主义的西班牙，1936—1939》，第83—256页；加斯东·勒瓦尔，《既非佛朗哥亦非斯大林：与佛朗哥作战的西班牙无政府主义团体和斯大林的反应》，第43—300页；弗兰克·明茨，《西班牙革命的工人自治》，第51—78和98—111页以及书后所附由合作与发展社会学国际档案馆公布的关于集体化的参考文献目录(一九六七年七月至十二月号《共享》杂志增刊)；何塞·佩拉特斯，《西班牙政治危机中的无政府主义者》，第147—172页；何塞·佩拉特斯，《西班牙革命中的全国劳工联合会》，第一卷，第302—326和331—353页；安东尼奥·罗萨多，《土地与自由：一名安达卢西亚农民无政府工团主义者的回忆》，第149—205页；拉斐尔·萨尔达，《农业集体化》；阿古斯丁·索奇，《在阿拉贡的农民中间》；阿古斯丁·索奇和保罗·福尔加雷，《集体化：西班牙革命的建设性工作，1936—1939》，第145—155、193—194、201—202、205—206和223—236页；还有本章注释42所提供的资料。最近几年所发表的关于农村集体化的最重要的研究成果——不过仅限于巴伦西亚地区的情况——是奥罗拉·博什·桑切斯的《劳动者总工会与自由主义者：巴伦西亚地区的内战与革命，1936—1939》。她这部著作的尤为可贵之处在于它涉及到集体化运动的各个方面，描述了自愿与被迫的集体化以及个体农业支持者与集体农业支持者之间的冲突。

- 2 爱德华·E.马莱法基斯，《西班牙的土地改革和农民革命》，第386页，注释75。马莱法基斯另外指出，在军事叛乱成功的地方，共和国安置的那些移民大部分被从他们占用的土地上赶走了：“民族主义当局主张把人民阵线执政期间所建立的移民定居点与更早时建立的少数移民定居点区分开来，他们以违法为由立即对前者进行清除，同时承认后者的合法性，直到一九四一年土改协会的全部遗产受到清算为止。不过，在一些地区，尤其是在凯波·德·利亚诺将军所控制的那些地区，已于一九三六年春天得到临时土地使用许可的自耕农仍被允许继续耕种他们占用的土地直到内战结束。”(同上，第386页，注释76)
- 3 加里多·冈萨雷斯，《安达卢西亚地区哈恩省的农村集体化》，第28—30页。这部精心撰写的研究著作的可贵之处在于它纠正了普遍存在的以下印象：集体化运动主要局限于全国劳工联合会控制的地区。在加里多可以确定的哈恩省的一百零四个集体农庄当中，三十八个(百分之三十六点五三)由劳动者总工会管理，十九个(百分之十八点二六)由全国劳工联合会管理，十八个(百分之十七点三)由劳动者总工会和全国劳工联合会共同管理，十四个(百分之十三点四六)由共产党管理(同上，第33页；另见，同上，第5页)。迄今为止还没有人写出全面的集体农庄运动史，不过，由于加里多·冈萨雷斯的《安达卢西亚地区哈恩省的农村集体化》、库科·希内尔等人的《巴伦西亚地区的农业》和古铁雷斯·莫利纳的《卡斯蒂利亚地区的无政府主义集体化运动》这一类最新研究成果的出现，它逐渐变得越来越清楚，在内战期间以及内战结束后的短时间内，这一运动的范围比其反

对者愿意承认的广泛得多。所出现的具有说服力的证据表明，尽管战时困难重重，政治上也有反对意见，还出现了许多强制和暴力问题，它在很大程度上仍然是自发的并取得了成功。

- 4 实例见J.巴莱里发表在一九三七年七月二十三日《社会熔炉报》上的文章。
- 5 一九三七年一月十六日《土地与自由》。
- 6 一九三八年九月号《新时代》。
- 7 迭戈·阿瓦德·德·桑蒂连，《西班牙革命与内战》，第107—108页。另请参阅一九三六年九月四日《工人团结报》；一九三七年六月七日马德里《自由阵线报》。
- 8 实例见发表在一九三七年十一月十五日《集体所有制》上的文章《我们的专家如何工作》；另见全国农业工人联合会某地方分会书记的声明，载一九三七年六月十六日《前进报》。
- 9 一九三七年四月一日《前进报》。
- 10 一九三六年八月三十日《农业工人报》，转载于一九三七年七月二十一日《前进报》。尽管如此，农业工人联合会全国委员会仍然在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决定，每个反对把大庄园集体化的会员将会按比例得到一块相应的土地（引自《为了土地革命》，第8页）。
- 11 一九三七年七月三日《自由青年报》。另请参阅胡安·J.多梅内奇的演说，载一九三七年一月七日《工人团结报》；来自巴瓦斯特罗的由科斯梅·森佩里斯签署的报告，载一九三六年九月一日《工人团结报》；加斯东·勒瓦尔关于卡尔卡亨特的文章，载一九三七年一月十六日《土地与自由》。
- 12 见一九三七年四月五日《全国劳工联合会报》（全国劳工联合会卡斯蒂利亚地区农民代表大会）；一九三六年十一月十五日《社会熔炉报》（全国劳工联合会巴伦西亚地区代表大会第八次会议）；一九三六年九月八日《工人团结报》（全国劳工联合会加泰罗尼亚雇农工会代表大会）；一九三七年三月十日《前进报》（劳动者总工会巴伦西亚省农业工人代表大会通过的决议）；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十六日《光明报》（社论）；一九三六年十二月二十一日《巴伦西亚通讯》（劳动者总工会副书记帕斯库亚尔·托马斯的演说）；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全国农业工人联合会的决议和宣言，收入《为了土地革命》一书，第5—13和29—33页，另见第38—39页。
- 13 一九三七年一月八日巴伦西亚《真理报》。
- 14 见一九三七年四月五日《全国劳工联合会报》（全国劳工联合会卡斯蒂利亚地区农民代表大会）；一九三七年二月十八日《文化与行动报》（阿拉贡地区集体农庄代表大会）；一九三六年十一月十五日《社会熔炉报》（全国劳工联合会巴伦西亚地区代表大会第八次会议）；一九三六年九月八日《工人团结报》（全国劳工联合会加泰罗尼亚雇农工会代表大会）；一九三七年三月十日《前进报》（劳动者总工会巴伦西亚省农业工人代表大会）；一九三六年十月二十五日《光明报》（劳动者总工会格拉纳达省农业工人代表大会）；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全国农业工人联合会的决议和宣言，收入《为了土地革命》一书，第5—13和29—33页。
- 15 例如发生在劳动者总工会和全国劳工联合会控制下的瓜达苏尔村的事情，见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十四日《光明报》；另见全国劳工联合会控制下的阿拉贡地区二十一个村庄的代表所通过的决议，载一九三六年八月十六日《工人团结报》。在卡兰达村，著名的外国无政府主义者加斯东·勒瓦尔写道：“个体农民只有最低限度的自由。他们可以拥有土地，因为这是他们想要的东西，但是他们不能用自己的劳动果实做生意。他们不能投机买卖，不能狡猾地与年轻的集体农庄竞争。”（一九三九年十一月四日《无产阶级文化报》）值得一提的是，一九三七年初隶属于全国劳工联合会的全国农民联合会成立后，至少是在理论上，该组织成为其管辖范围内的个体农民和集体农庄农产品的唯一销售者（见《全国农民联合会章程》，第13页）。

- 16 见一九三七年四月二十一日《前进报》；另请参阅劳动者总工会总书记里卡多·萨瓦尔萨发表在一九三七年五月二十六日《全国劳工联合会报》上的文章。
- 17 伊萨克·普恩特，《全国劳工联合会的目标：自由共产主义》，第3页。另请参阅一九三六年五月在萨拉戈萨举行的全国劳工联合会特别代表大会通过的决议，载一九三六年五月十二日《工人团结报》。在刊登于一九八〇年一月号《历史时期》的一篇访谈中，激进的无政府工团主义者兼历史学家何塞·佩拉特斯对这项决议发表了下面的评论：“这份文件现在也许显得天真幼稚或不切实际，以致让许多人觉得可笑。其实，我们把自己视为最后的幻想家……也没有低估这个社会将在我们通往目标的道路上所设置的障碍，我们认为，我们必须表明自己的目标。……我已经说了，这项关于自由共产主义的决议可能显得天真幼稚……因为一九三六年以后社会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但是，由于许多负面因素的出现，这种变化并不代表纯粹的进步。尽管这项决议涉及的是一个像西班牙这样的半封建或不发达社会，它仍然具有某种对于完美的渴望以及关于人类永恒价值的信念，如今那些嘲讽的批评并没有注意到这一点。”
- 18 普恩特，《全国劳工联合会的目标》，第4页。另请参阅《全国劳工联合会的目标》，第24—26页，一九三七年一月二十五日《白色评论》。
- 19 普恩特，《全国劳工联合会的目标》，第4页。
- 20 费德里科·乌拉莱斯，《每个人眼中的无政府状态》，第29页。
- 21 伊萨克·普恩特发表在一九三二年八月《土地与自由》增刊上的文章，收入普恩特《宣传品》，第101页。
- 22 一九三七年一月第三期《社会革命》。“闯进（巴塞罗那）女修道院的男人和女人焚烧了他们在里面找到的所有东西，包括钞票。我清楚地记得一个健壮的工人自豪地指给我看烧掉了一千比塞塔钞票的角落。”（费德丽卡·蒙特塞尼，《加泰罗尼亚的七月十九日》，载一九三七年七月十九日《社会熔炉报》，收入《从七月到七月：斗争的一年》一书，第22页）
- 23 阿古斯丁·索奇发表在一九三八年八月六日《土地与自由》上的文章。
- 24 无政府主义者的一份关于弗拉加的报告详细说明了在那个小小社会里所进行的革命实验的情况：

“人们自己的劳动果实——小麦、水果、油橄榄——可以随意取用。为了满足其他需要，每个家庭每周收到一笔钱，这笔钱的数目根据家庭成员的数量和成年工人的人数而增加。

“这笔钱不是用西班牙银行的钞票支付的，原因很简单，因为它们在村子里没有价值，那些钞票不能使用。工会所印制的面值从一毛到二十五比塞塔不等的小纸片被用来作为购物券。只有理发师、鞋匠和分配食品的办事员接受这种购物券……

“想在弗拉加过夜或者居留的旅行者必须到委员会去把西班牙共和国流通的钞票兑换成当地的票证。居民如果想要离开这个城镇，他也必须去委员会说明出行的理由和需要的钱数；然后委员会把他的当地票证换成西班牙货币。”（阿古斯丁·索奇和保罗·福尔加雷，《集体化：西班牙革命的建设性工作》，第230—231页）

关于集体所有制实验在马斯-德拉斯马萨斯——阿拉贡地区的一个拥有两千三百名居民的村庄——所造成的难题，见弗雷泽，《流血的西班牙》，第351—358页。弗雷泽引用了全国劳工联合会的幸存者多年以后提供的口头证词，这些证词呈现了一幅关于马斯-德拉斯马萨斯村生活的清晰画面。
- 25 H.E.卡明斯基，《巴塞罗那》，第118—121页。
- 26 同上，第121—122页。
- 27 博克瑙，《西班牙斗鸡场》，第166—167页。
- 28 引自题为《无政府主义意识形态与西班牙的工人阶级运动（1880—1900）》，特别涉及里卡

多·梅利亚的思想的（伦敦大学）论文，第237页，注释12。埃森魏因还说明：“关于这一倾向[清教主义]的实例，见《生产者》（巴塞罗那，1887—1993）、《社会主义》（加的斯，1886—1891）和《团结报》（塞维利亚，1888—1889）。后来，清教主义在诸如《白色评论》（马德里，1898—1905和1923—1936）之类具有声誉和影响力的无政府主义报刊上受到宣传。对具有自我牺牲精神的革命者形象的生动描写出现于比森特·布拉斯科·伊巴涅斯的《酿酒厂》，在这部作品中，小说人物费尔明·萨尔瓦铁拉以传奇式的无政府主义者费尔明·萨尔沃切亚为原型。”我个人的记忆是，中产阶级西班牙人对关闭妓院并给妓女安排有益工作的无政府主义者冷嘲热讽。但是，对于纯粹的无政府主义者来说，清除社会不良风气是一个信条。在他那部口述史中，罗纳德·弗雷泽讲述了年轻的爱德华多·庞斯·普拉德斯在全国劳工联合会巴塞罗那木工工会总部——那里紧挨着设有音乐厅、夜总会和酒吧的帕雷莱洛酒店——听见人们正在讨论应该做什么事情：“‘听着，在这些藏污纳垢的场所工作的人怎么办？’‘我们得去解救他们，教育他们，这样他们就有机会做一些更有价值的事。’‘你问他们愿不愿意被解救了吗？’‘你怎么这么迟钝？你想在那种地方受剥削吗？’‘不想，当然不想。但是，做了多年同样的事情之后很难改变。’‘那么他们必须改变。革命的首要任务就是清除这种场所，改变人的观念。’”（《流血的西班牙》，第137页）关于阿拉贡地区的马斯—德拉斯塔马斯村，弗雷泽写道：“所有酒馆被关闭。‘我们自由派一贯反对开设酒吧，因为它们是堕落、争吵与殴斗的根源，’塞维利亚·帕斯托回忆说。……只有全国劳工联合会中心的大厅继续营业，人们可以在那里喝咖啡或非酒精饮料。葡萄酒作为配给供应的一部分发给人们让其在家里自己喝。赌博受到禁止。”（同上，第354—355页）

- 29 一九三七年一月三十日《土地与自由》。
- 30 阿古斯丁·索奇，《在阿拉贡的农民中间》，第73页。
- 31 分别见一九三四年七月十三日和六月八日《白色评论》。
- 32 一九六八年三月号《人道主义自由论手册》。
- 33 阿拉尔多·普拉特斯，《阿拉贡地区的带头与落后》，第85—93页。
- 34 索奇和福尔加雷，《集体化：西班牙革命的建设性工作》，第233—234页。
- 35 索奇，《在阿拉贡的农民中间》，第92页。
- 36 弗雷泽，《流血的西班牙》，第368页，注释1。
- 37 同上，第371页。
- 38 索奇，《在阿拉贡的农民中间》，第84—85页。
- 39 全国劳工联合会，《（特鲁埃尔省）巴尔德罗夫雷斯地区：那里的社会斗争和革命斗争》，第73页。
- 40 索奇和福尔加雷，《集体化：西班牙革命的建设性工作》，第45—47页。
- 41 一九三六年九月二十四日《土地与自由》。
- 42 索奇，《在阿拉贡的农民中间》，第66页。“索奇提到的男女之间的工资差别表明了无政府主义的理论与实践在其进行集体所有制实验时所出现的一个重大脱节之处，”乔治·埃森魏因写道，“无政府主义者多年来一直主张男女之间一律平等。内战前夕在一九三六年的萨拉戈萨代表大会上，他们重申了对这一主张的承诺，满怀信心地宣称，随着革命的到来，资本主义制度下男女之间的经济差别将不复存在，两性在权利和义务方面实现平等（见《[全国劳工联合会]萨拉戈萨代表大会》，马德里零点出版社，一九七八年版，第237—238页）。最近的研究成果显示，尽管无政府主义者在一些集体农庄向这些目标大步迈进，他们在女性权利方面的总体表现与他们的自由主义原则并不相符。实例见玛莎·A. 阿克尔斯伯格，《无政府主义革命的实践：女性在西班牙无政府主义团体中的地位》，未发表的论文，一九八〇年；贝内克，《无政府主义与内战》，汉堡霍夫曼和坎佩出版社，一九七八年版，第106—110页；特玛·卡普兰，《西班牙无政府主义与妇女解放》，载

《当代历史杂志》，第六卷，一九七一年第二期，第101—110页；玛丽·纳什编，《“自由女性”，女性的双重斗争》，巴塞罗那图斯克特斯出版社，一九七五年版和她的《伟大的女权意识》（对玛丽·纳什的采访），载《历史时期》，第二卷，一九七六年五月第十九期，第43—47页；玛丽娅·皮诺，《“自由女性”，内战中的女权运动》（同上，第36—42页）；杰拉尔丁·斯坎伦，《现代西班牙的女权主义论战》；孔塞普西翁·索纳德利亚斯，《西班牙的工人阶级与社会革命，1936—1939》，第149—174页。”埃森魏因根据自己的研究所作的这一条注释是应我的要求而写的。

本书显然并不打算涉及自由主义集体方方面面的所有细节。有兴趣的读者可以查阅以下资料：一九三七年二月二十日（塔韦内斯—德巴尔迪尼亚）、八月十七日（佩尼亚罗亚—德塔斯塔文斯）《全国劳工联合会—伊比利亚无政府主义者联盟情况通报》，一九六三年十一至十二月号（巴略瓦尔）、一九六八年三月一日（马格达莱娜—德普尔皮斯）《人道主义自由论手册》；一九三六年十月七日（门布里利亚）、一九三七年五月二十七日（托雷韦利利亚）《全国劳工联合会报》；一九四八年十二月二十四日（比内法尔）、一九四九年十一月二十七日（圣马格达莱娜—德普尔皮斯）巴黎《全国劳工联合会报》；一九四七年八月二十三日（格劳斯）、一九五一年七月二十二日（巴略瓦尔）图卢兹《全国劳工联合会报》；一九三七年三月十三日《文化与行动报》（莫斯克鲁埃拉）；一九三六年十一月二十一日《反法西斯的西班牙》（阿尔科伊、恩格拉、哈蒂瓦）；一九三七年四月六日《社会熔炉报》（布哈拉洛斯），另见根据这一报道撰写的关于乌铁尔的文章，载一九三七年六月十九日《全国劳工联合会—伊比利亚无政府主义者联盟情况通报》；一九三六年十一月十四日《自由青年报》（佩德里利亚）；一九三七年七月十五日《自由主义报》，亦见一九三七年八月六日《西班牙革命》；一九三七年八月十五日阿尔特阿《海洋与陆地》（拉努西亚）；一九三七年七月号《自由女性》（卡兰达）；一九三七年二月二十四日《我们》（贝尼奥帕）；一九三六年十一月十三日、十七日和十九日《工人团结报》（布哈拉洛斯、埃布罗河畔的贝利利亚、莱塞拉、法莱特）；一九四七年五月十七日墨西哥城《工人团结报》（格劳斯）；一九五一年二月二十四日和三月十日（马斯—德拉斯马塔斯）、四月七日、十四日和二十一日（格劳斯）、六月二十三日和二十九日（辛卡河畔的阿尔科莱阿）、七月七日和十四日（阿尔科里萨）巴黎《工人团结报》；一九三六年九月十七日和二十四日（马埃利亚）、一九三七年一月三十日（马格达莱娜—德普尔皮斯）《土地与自由》；一九四七年一月二十五日（阿斯科）、七月十日（巴略瓦尔）墨西哥城《土地与自由》；一九五〇年十二月二十五日《人类新星报》（圣马格达莱娜—德普尔皮斯）；博克瑙，《西班牙斗鸡场》，第166—167页；胡利安·卡萨诺瓦·鲁伊斯，《阿拉贡地区农业社会的无政府主义运动与革命》，第177—219和323—327页；胡利安·卡萨诺瓦·鲁伊斯，《卡斯佩，1936—1938》，第55—56页；《农村的集体化运动，1936—1939》，第122—142页；全国劳工联合会，《（韦斯卡省）蒙松地区革命及集体化改造的成果》，（全国劳工联合会）阿拉贡、里奥哈和纳瓦拉地区联合会，《（特鲁埃尔省）巴尔德罗夫雷斯地区》；何塞·杜克，《内战初期阿拉贡地区的形势》，第2—4页；弗雷泽，《流血的西班牙》，第347—373页；何塞·加夫列尔，《阿拉贡地区的生存与死亡》，第146页；费利克斯·加西亚，《西班牙革命中的农民和工人集体》，第23—32页；卡明斯基，《巴塞罗那》，第118—125页；阿里斯蒂德·拉佩尔，《西班牙问题》，第18—20页；勒瓦尔，《自由主义的西班牙》，第85—126页；勒瓦尔，《既非佛朗哥亦非斯大林》，第143—300页；勒瓦尔，《西班牙的社会重建》，第12—13、15和17—18页；克萨维尔·帕尼亚瓜，《自由主义社会：无政府主义西班牙的平分土地和工业化，1930—1939》，第99—114页；佩拉特斯，《西班牙革命中的全国劳工联合会》，第一卷，第19—326页；阿拉尔多·普拉特斯，《阿拉贡地区的带头与落后》，第84—93页；索奇，《在阿拉贡的农民中间》；索奇和福尔加雷，《集体化：西班牙

牙革命的建设性工作》，第223—242页。

- 43 迭戈·阿瓦德·德·桑蒂连在其发表于一九三八年八月《方向盘》的文章中引用。
- 44 阿瓦德·德·桑蒂连在《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的破产》一书中引用，见第53页。
- 45 巴枯宁，《上帝与国家》，第16页。
- 46 一九三六年六月五日《土地与自由》。
- 47 一九三六年八月五日《全国劳工联合会报》。另请参阅一九三六年八月十五日《工人团结报》。
- 48 索奇，《在阿拉贡的农民中间》，第87—88页。
- 49 刊登在一九三六年八月二十六日《工人团结报》上的一篇来自辛卡河畔的阿尔瓦拉特的报道。
- 50 一九三七年二月十八日《文化与行动报》。
- 51 一九三六年九月九日《工人团结报》对塔拉戈纳省的代表、全国劳工联合会加泰罗尼亚地区委员会成员拉蒙·波特演说中的一段内容的解读。通过这一段演说，他使人们注意到前面的演讲者所发出的类似警告。
- 52 实例见一九三七年三月三十日《卡斯蒂利亚自由报》；一九三六年八月十日《全国劳工联合会报》；一九三七年八月四日《文化与行动报》和《全国劳工联合会—伊比利亚无政府主义者联盟情况通报》；一九三七年六月二十四日《我们》；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十九日和一九三七年五月十三日《工人团结报》；一九三七年一月十六日《土地与自由》；一九三八年七月号《方向盘》（索奇的文章）。
- 53 一九三七年七月十日《自由青年报》。另请参阅一九三六年十一月十四日《自由青年报》（关于佩德拉尔瓦的文章）。
- 54 一九三六年十一月十九日《工人团结报》。另请参阅索奇和福尔加雷《集体化：西班牙革命的建设性工作》，第224页以及发表在一九三七年七月号《自由女性》上的关于卡兰达的文章。
- 55 这是无政府工团主义领导人阿瓦德·德·桑蒂连提供的数字，见迭戈·阿瓦德·德·桑蒂连《我们为什么输掉了内战》，第94页。保卫阿拉贡委员会——革命最初几个月该地区的主要管理机构——的两位共产党人成员何塞·杜克和曼努埃尔·阿尔穆迪（原书误为何塞·阿尔穆迪——译注）向本书作者确认了这个数字（一九三九年在墨西哥城进行的采访，采访阿尔穆迪时所作的速记记录现存胡佛研究所）。另请参阅（社会党人）普拉特斯所著《阿拉贡地区的带头与落后》，他说百分之七十的土地实行了集体化，见第81页。
- 56 数字来自塞萨尔·马丁内斯·洛伦索《西班牙无政府主义者与权力，1868—1969》，第152页，注释17；佩拉特斯，《西班牙政治危机中的无政府主义者》，第300页；普拉特斯，《阿拉贡地区的带头与落后》，第81页。
- 57 值得注意的是，无政府主义者并不把该运动的杰出人士称为领导人，因为这个称呼含有权力和控制的意思。作为替代，他们使用“代理人”、“代表”和“积极分子”等词汇。尽管如此，因为那些杰出人士具有以其能力引导影响全国劳工联合会和伊比利亚无政府主义者联盟成员的领导人素质，而且经过从普通成员中识别运动领导人的几乎每一次考验，他们确实成为了领导人，所以我更喜欢使用这个称呼。
- 58 一九三六年十月六日《全国劳工联合会报》引述。
- 59 一九三六年十一月十七日《工人团结报》。
- 60 一九三七年四月六日《社会熔炉报》。
- 61 例如，在赫尔萨村，革命政权刚一建立便发布了一份公告，公告规定，“不把各种食物和衣物存放[在公共仓库]而是留着自己享用的人将会受到最严厉的惩罚。”（一九三六年八月十六日《工人团结报》）
- 62 见阿拉贡地区农业集体代表大会通过的决议，载一九三七年二月十八日《文化与行动

报》。另请参阅阿古斯丁·索奇为《集体化：西班牙革命的建设性工作》一书撰写的序言，第20页；一九三七年十二月二十五日《自由阵线报》。

- 63 见加泰罗尼亚政府农业委员的声明，载一九三七年一月三日《每日图片报》；另见巴伦西亚省农民联合会发布的通告，载一九三七年一月二十一日《真理报》。
- 64 一个有趣的例子是略夫雷加特河畔的普拉特的集体农庄。根据伊比利亚无政府主义者联盟的报纸《土地与自由》一九三八年七月一日所刊登的一篇报道，一九三六年十月，一千名农业工人、佃农和有地的农民建立了这个集体农庄，他们“几乎一致”同意集体耕种农庄的土地。但是，政治形势刚一变得不利于全国劳工联合会和伊比利亚无政府主义者联盟，佃农和有地的农民就要求归还他们的财产，据这篇报道说，原来那个集体农庄的规模缩小到当初的四分之一。
- 65 一九三八年七月号《方向盘》。
- 66 发表在一九七八年九月号《历史时期》上的访谈录。
- 67 实例见一九三七年八月六日《文化与行动报》；一九三七年七月十日《自由青年报》（全国劳工联合会卡斯蒂利亚农民联合会总书记克里亚多发表的声明）；一九三七年七月十一日《工人团结报》。另请参阅阿瓦德·德·桑蒂连《西班牙革命与内战》和勒瓦尔的《西班牙的社会重建》，第13页。
- 68 诺哈·鲁伊斯发表在《研究》杂志上的文章，被亨利·拉巴塞尔在《西班牙：政治熔炉》一书中引用，见第130页。另见一九三七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全国劳工联合会的《自由阵线报》。关于一些集体农庄建立过程中的强制和暴力行为的更多证据，见全国劳工联合会的民兵向弗雷泽提供的口头证词，《流血的西班牙》，第362和366—367页。
- 69 一九三六年九月十日《工人团结报》。
- 70 发表在一九三六年九月二十九日马塔罗《自由报》上的文章，收入胡安·佩罗所著《后方的危险》一书，见第102—103页。另请参阅胡安·佩罗《后方的危险》，第107—110和158—159页；华金·阿斯卡索（无政府主义者控制的保卫阿拉贡委员会主席）发表在一九三七年七月二十八日《文化与行动报》上的文章。在为胡安·佩罗的《全国劳工联合会的历程：工团主义与无政府主义》撰写的序言中，佩罗的儿子何塞写道：“在生命的价值微不足道、革命需要之外因个人猜忌和仇恨处人死刑、争吵辩论是家常便饭的那些日子里，不计其数的人应当把他们的生存归功于胡安·佩罗的敏感，这种敏感并不是——如某些人所说的——多愁善感，而是某种深刻的正义感的产物。佩罗，一个全国劳工联合会的积极分子，曾经深受反动资本主义制度的非正义之害，因此不能允许以‘革命正义’的名义实施最不道德的‘公众正义’，对此他坚定不移。……为了表示对于人的个性以及自己关于人类解放的理想的尊重，他[不顾]危险与所有反对者作斗争。他在那些激情澎湃的日子[在《自由报》上]所进行的轰动一时的舆论宣传是其坚定不移的革命信念的一座名副其实的纪念碑。”（《全国劳工联合会的历程》，第28—29页）
- 71 一九二九年十一月三十日日内瓦《觉醒的无政府主义者》。
- 72 一九二二年十月十四日《新人类》，见路易斯·法夫里《马拉泰斯塔的生活与思想》，第220页。
- 73 实例见阿瓦德·德·桑蒂连《我们为什么输掉了内战》，第71页。特别令人感兴趣的是事过四十多年后全国劳工联合会和伊比利亚无政府主义者联盟领导人费德丽卡·蒙特塞尼就阿古斯蒂·庞斯提出的关于治安巡逻队——由无政府工团主义者和其他左派组织在巴塞罗那建立的革命执勤小分队——的问题所作的以下回答。

“庞斯：‘回想一下，您对治安巡逻队是什么看法？’

“蒙特塞尼：‘这个问题影响到所有组织而不仅仅是我们。……实际情况是，最能干的人留在集体农庄里。正是他们继续种植着农作物。最爱冒险和最爱幻想的人上了前

线。……剩下的是那种既不勇敢也不能干的人。……我们的同志大部分是理想主义者。他们不喜欢警察工作，因此不想当警察。……这并不是说没有什么高尚的人去当警察，因为有人认为“清除坏人”很有必要。……不过他们是少数。’

“庞斯：‘相当一部分最初支持共和派的手工业者和小资产阶级最终或多或少支持入侵的佛朗哥军队，在这个意义上，治安巡逻队的行动并不是一个决定性的因素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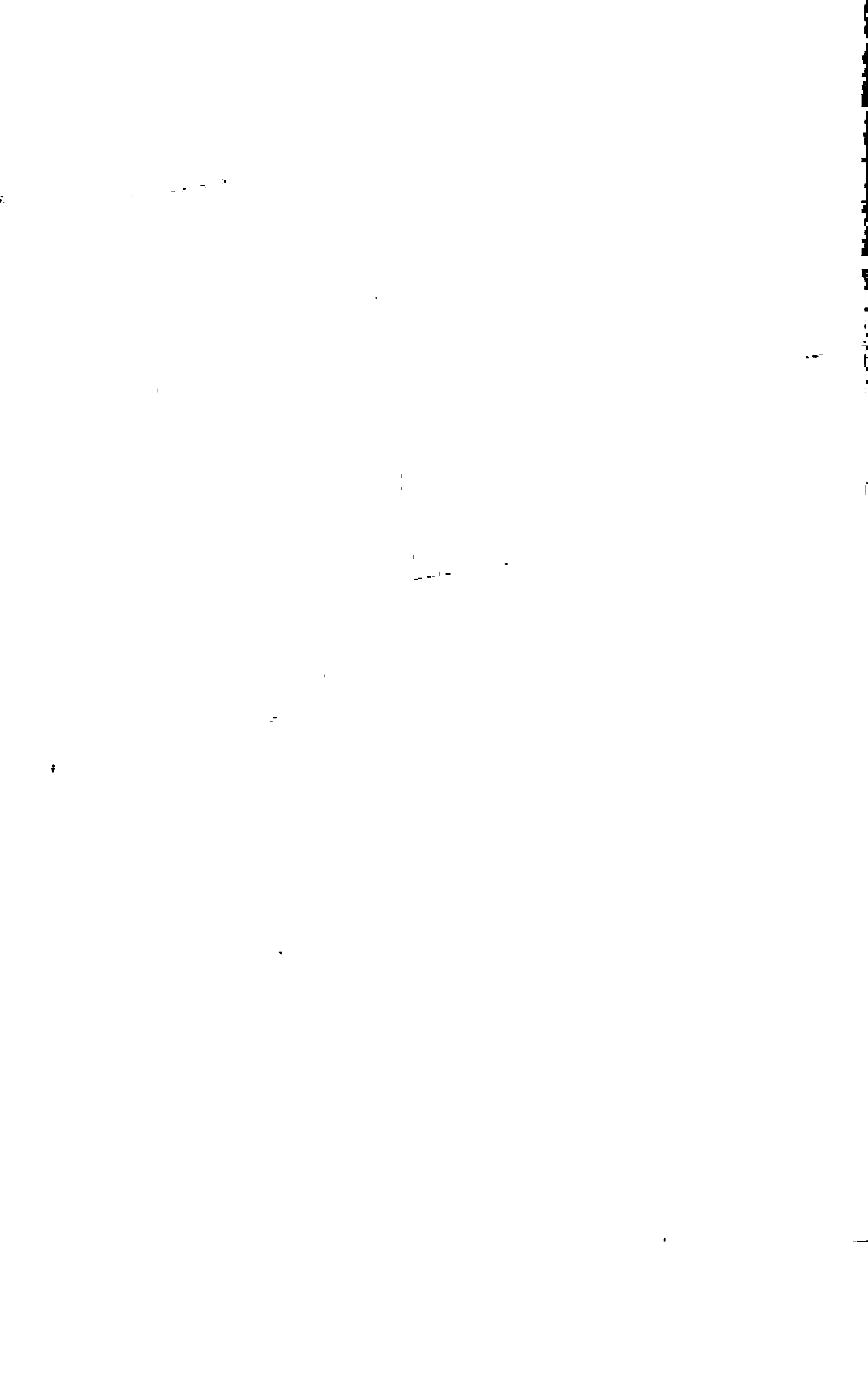
“蒙特塞尼：‘发生的事情是，治安巡逻队腐化堕落了。加入治安巡逻队的人变成了职业警察，然后发展到迷恋于阴谋间谍活动并与敌人勾结的地步。……我逐渐得出一个结论：无论你把他们叫做治安巡逻队还是叫做国家政治保卫局或者其他什么名字，尽管他们也是革命的某种产物，一旦你把警察的权力交给他们，那么你就输定了，因为你引发了一种警察心态。这种情况不仅发生在我们这里，它也发生在俄国和法国的革命中。它还将发生在一切革命中……而且总是会有过后让我们大家懊悔不已的暴行发生。’”（庞斯，《费德丽卡·蒙特塞尼访谈录》，第141—145页）

- 74 巴枯宁，《国家与无政府状态》（《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сть и анархия》），第234—235页。
- 75 《对专政问题的历史贡献》，载一九二〇年十一月六日第十四期《共产国际》，收入《列宁选集》第三十一卷，见第326页，被伯特伦·沃尔夫在《赫鲁晓夫与斯大林的幽灵》一书中引用，见第9页。
- 76 《马克思主义与俄国革命》，见米洛拉德·M.德拉奇科维奇编《俄国共产主义五十年》，第32页。
- 77 这不是西班牙无政府主义者第一次违背他们所宣称的原则。自由主义历史学家塞萨尔·M.洛伦索写道：“一九三二年一月十八日，伊比利亚无政府主义者联盟的成员在略夫雷加特河和卡多内尔河上游的矿区——那里的劳动条件恶劣，工人受到残酷的剥削——举行暴动，‘宣布’在贝尔加、卡尔多纳、菲戈尔斯、萨连特和苏里亚等地实行自由共产主义。但是，这场运动没有向加泰罗尼亚这一地区之外推进。这使政府轻而易举地在五天之内将其镇压了下去。……在所有那些自由主义者暂时控制了局面并且试图发动社会革命的地方，他们与自己的原则背道而驰。由于他们打算废除法律，建立一个没有权威、没有管制的社会，听任群众充分发挥自己的创造性，他们不得不设立负责维持秩序并对不满现实者或反对派进行监视的执委会。他们用武力强行把他们的规定变成他们谦虚地称之为‘公告’的法令。用炸药武装起来的革命领导人根本没有实现‘无政府主义’，他们建立的应该是一个不考虑农民和小资产阶级意见的以‘无产阶级专政’为特征的社会。”（洛伦索，《西班牙无政府主义者与权力》，第73—74页）《西班牙无政府主义者与权力》一书的作者是一九三六年担任全国劳工联合会全国委员会总书记的奥拉蒂奥·M.普列托的儿子，在内战之前和内战期间，普列托与伊比利亚无政府主义者联盟均存在着严重的意见分歧。尽管洛伦索——他没有表明自己与普列托的关系——特意为父亲的观点努力进行了辩护，这本书仍然对西班牙自由主义运动史作出了非常宝贵的贡献。
- 78 阿德里安·舒伯特和乔治·埃森魏因，《西班牙内战：多种战争之战》。
- 79 《历史时期》对何塞·佩拉特斯的采访，载一九八〇年一月号《历史时期》，见本章注释17。
- 80 乔治·伍德科克，《无政府主义：自由主义思想和运动史》，第398页。
- 81 自由主义历史学家没有强调社会革命的重要性和一九三六年七月共和国政权的彻底崩溃导致诺姆·乔姆斯基在《美国权力与新官僚》（1967）一书中指责学校“滥发奖学金”，见第23—158页。他的批评主要针对加布里埃尔·杰克逊的《西班牙共和国与内战，1931—1939》（1965）和休·托马斯的《西班牙内战》（一九六一年版），正如乔姆斯基所指出的那样，后者“几乎没有提到人民革命”。杰克逊后来试图在其向美国历史学会哥伦比亚特区华盛顿年会（一九六九年十二月三十日）所提交的题为《西班牙内战期间充满生气的集体化实践》的论文中弥补——尽管只是部分弥补——这一疏漏，这篇论文后来发表在

《西班牙和葡萄牙历史研究学会业务通讯》（一九七〇年四月一日）上，并且收入他的著作《改良与革命，1931—1939》（1980）的“共和派控制区的社会革命”一章，其中包括对论及西班牙革命的多种著作的长篇摘录，见第218—268页。另一方面，托马斯在经过修订的《西班牙内战》的企鹅丛书版（1965）中增加了关于集体化的十一页篇幅的一章内容，并于一年之后就同一主题发表了一篇论文，收入马丁·吉尔伯特所编《百年争斗，1850—1950：为A.J.P.泰勒而写的论文》一书，见第247—263页，稍加改动后再次收入雷蒙德·卡尔所编《西班牙共和国与内战》一书，见第239—255页。尽管托马斯在他的论文中贬斥了所有独立人士和无政府主义者关于集体农庄生活的记述，认为它们不是带有偏见或者片面，就是下结论过早，可是他的著作仍然完全建立在这些资料来源的基础上。此外，他没有使用我在《精心的伪装》一书（第55—56和61页）中所使用的另外几十种参考资料，然而，在对我的原文所作的一条注释中，他试图通过把我说成“一个显然对集体农庄感兴趣的……坚定的反共分子”来削弱我的研究的客观性（《西班牙内战》，一九六五年修订版，第249页，注释1）。

第二部分

共产党的崛起



中产阶级的希望

前面几章说明了大部分城乡中产阶级由于革命爆发而产生了近乎绝望的悲观情绪的原因。面对残酷的现实，他们在安赫尔·奥索里奥-加利亚多的话语中找到了某种心理安慰，鉴于已经发生了“广泛的社会革命”，这位共和派法官说：“我们中产阶级所能做的唯一一件事情就是与无产阶级站在一起。”¹革命者承诺：一旦私有财产和私人贸易成为往事不复存在，一个美好的新世界将会来临。但是，这种承诺无法给中产阶级带来慰藉，因为，绝大多数小工厂主、手工业者、零售商人、小地主和佃农不是将改善自己生活的希望寄托于废除私有财产，而是寄托在私有财产的积累上。为了实现自己的愿望，他们需要自由贸易，需要摆脱与如今被工会集体化的大企业的竞争，需要自由生产商品来赢利，需要随心所欲地自由耕种更多的土地，需要不受限制地自由雇用工人。最重要的是，为了维护这些自由，他们需要一个按照他们的想法而建立在他们自己的政党、自己的法庭、自己的军队基础上的政权；在这个政权里，他们的权力不受各种革命委员会的挑战，不被它们所削弱。但是现在，对于这样一个政权的所有希望都落空了，因此，中产阶级别无选择，只能退隐到幕后去。他们过于小心谨慎，以致不得不随波逐流，他们还使自己的衣着打扮与变化的环境

相适应。一名保守的共和派人士注意到，“马德里表面看上去让人不相信自己的眼睛：资产阶级行握拳礼。……男人穿着工装裤和麻绳编织的浅帮鞋，模仿[工人]民兵的装束；女人不戴帽子，衣服过时而破旧；比实际情况更明显的是，低三下四乞求继续活下去的人们全都装扮出一副绝对丑恶的模样”。²一名共产党人观察者描写了巴塞罗那的情况：“林荫大道向上延伸，直到一英里外的加泰罗尼亚广场。你从另一端俯视过去，人头攒动，一眼望不到边。如今看不见人群中谁戴帽子、穿领圈、打领带；资产阶级服饰的标志消失了，从平行线大道，沿着医院街和花园别墅街，人们都是无产者的某种随意装束。”³“由于街头看不见帽子了，”全国劳工联合会在巴塞罗那的喉舌《工人团结报》宣称，“革命是属于我们的。”⁴

杰拉尔德·布雷南在回忆录中写道，在马拉加，“我与下电车的彼得·查默斯-米切尔爵士偶然相遇。他身穿一套洁白的毛呢西装，打着蝴蝶领结——除了那些外国领事之外，他是马拉加唯一一个敢于穿着这种象征资产阶级的服装的人”。⁵

除了冒着失去自由、毁掉生活的危险公开反对革命之外，中产阶级无计可施，他们只能适应新的社会制度，希望形势最终可以改变。他们肯定不能向内战爆发之前代表更保守阶层的右翼党派寻求帮助，因为这些党派已经在革命的烈焰中毁灭。他们也不能转投自由共和派政党，例如左翼共和派、共和联盟以及加泰罗尼亚地区最强大的中产阶级政党加泰罗尼亚左翼共和派等，因为这些政党的大多数领导人不是正在适应激进主义的新形势，就是具有天生怕事的性格特征。“在二十四小时之内，一度出现的反对变革的意见已经发生了显著的演变。”革命开始没几天，一位著名的无政府主义者写道，“精神世界与我们相去甚远的人们表现出不同寻常的适应能力，他们毫无异议地接受了各种事情的新法则。如今在加泰罗尼亚，没有人因为听说工业实行了社会主义化以及私有财产不复存在而大惊小怪”。⁶

另一些共和派领导人认为一切都输掉了，他们不是已经离开了国内，就是正在逃往各个口岸。甚至就在昨天还是中产阶级自由派宠儿的共和国总统曼努埃尔·阿萨尼亚也因悲观和恐惧而不知所措，一夜之间从万众欢呼的权力顶峰迅速坠落。安赫尔·奥索里奥-加利亚多断言，曼努埃尔·阿

萨尼亚从最初那一刻就认为内战已经输掉了，早期出现的暴力行为也使他反感厌恶并心灰意冷。⁷的确，许多自由共和派领导人在风平浪静的大海上是能干合格的领航员，然而，在内战之前猛烈冲击共和国的风暴中，他们就显得软弱无力，如今面对摧毁了国家强制机关的飓风，他们更是身不由己。“我们对其他组织的攻击所进行的微弱抵抗、我们面对胆大妄为的得寸进尺所显示的沉默和超然使许多人相信，我们已经不复存在。”左翼共和派领导人萨尔瓦多·克马德斯声称，“他们不可能理解激励着我们的高尚目标使我们压抑着自己的义愤。只要我们不得不用手中的武器建立起来的抵抗敌人发动的凶猛攻击的屏障没有崩溃，别人所缺乏的谨慎和责任感必定使我们的行为与众不同。”⁸但是，当时只有所在党派显而易见的软弱无力给那些在革命洪流中举步维艰的中产阶级自由派和保守派成员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于是，他们马上开始寻找一个组织，可以作为遏制无政府工团主义和社会党工会所掀起的革命浪潮的防洪堤。

他们不必寻找太久。在之前过去的几周里，成功地把他们寻找眼前希望的目光集中在自己身上的组织是共产党。

内战爆发之前，共产党在西班牙政坛是一个微不足道的因素，它只有十七个议会席位，⁹一九三六年七月十八日，官方估计它有四万名党员，¹⁰很快，共产党将在反佛朗哥势力的阵营中对事态发展形成决定性的影响。共产党提倡保护城乡中产阶级的利益，在当时那种激情澎湃的革命气氛中，几乎没有共和派人士敢于提出这种主张，于是，在短短几个月时间里，据它自己统计，共产党成了七万六千七百名农村土地拥有者和佃农以及一万五千四百八十五名城镇中产阶级的避难所。¹¹“共和国的中产阶级对共产党宣传的温和语气感到意外，共产党内流行的团结务实气氛给他们留下深刻的印象，”一名社会党人写道，“他们成群结队地大批加入了它的行列。”¹²

毋庸置疑，共产党在中产阶级当中的影响远远超出前面提到的统计数字，因为，成千上万实际上并非共产党追随者的城乡中产阶级人士将自己置于其庇护之下。与共产党所控制的加泰罗尼亚统一社会党一样，从革命刚一爆发开始，共产党就积极维护中产阶级的利益，后者正被卷入集体化运动的漩涡，或者正因私人贸易中断、缺乏经济来源以及工人民兵征用财

产而陷入困境。

“在资本主义社会里，小商人和小工厂主形成了一个在许多方面与无产阶级具有共同之处的阶层。”马德里的共产党机关报《工人世界报》断言，“当然，在关于民主共和国的立场上是这样，而且他们像工人一样反对大资本家和强大的法西斯工业巨头。既然如此，尊重这些小商人和小工厂主财产权就是每个人的责任。

“因此，我们坚决主张我党的党员和民兵普遍要求并在必要的情况下强迫人们尊重这些中产阶级公民，他们都是工人，所以不应对他们进行骚扰。不应以超出其微薄财力的征用和要求损害他们的正当利益。”¹³

共产党在加泰罗尼亚的喉舌《劳动报》写道：

84 忽视我们本地的众多商品小生产者和小商人将是不可原谅的。他们中的许多人只想为自己创造一种独立自主的生活条件，他们已经成功地做起了自己的生意。接着，由于法西斯分子的未遂政变，形势发生了急剧的变化。完全生活在事变边缘的绝大多数小商品生产者和小商人如今比别人更惶惑，因为他们感到自己正在受到危害，而且感到，与挣工资的工人相比，他们处于某种明显不利的境地。他们认为没有人关心他们的命运。他们可能成为倾向于支持反动势力的群体，因为在他们看来，没有比本地区正在实行的经济制度更坏的东西。……¹⁴

他们当中许多人的悲惨处境显而易见。他们不能经营自己的作坊和生意，因为他们没有储备金；他们几乎到了吃不饱饭的地步，尤其是那些小工厂主，因为他们必须向所雇用的寥寥可数的工人支付工资，这使他们无法顾及自己的日常生活需要。……

必须准许所有那些听从反法西斯民兵征召的人暂缓履行其义务，以使他们不必承担战时征用的全部负担。必须准许缓期支付，同时应当开设赊欠账户，以使他们的生意不致停业。¹⁵

为了保护这一地区城镇中产阶级的利益，共产党人把一万八千名商人、手工业者和小工厂主组织起来，成立了加泰罗尼亚小型工商业者同业

公会联合会（简称GEPCI），¹⁶按照全国劳工联合会的喉舌《工人团结报》的说法，联合会的一些成员是“强烈敌视工人的顽固的雇主”，其中包括前裁剪同业协会会长古里。¹⁷

为使读者不致认为共产党人对中产阶级的支持是一种利他主义而非实用主义的行为，不致认为共产党人更关心中产阶级的幸福而不是对加强自身相对于无政府工团主义和社会党对手的实力地位感兴趣，应当提醒读者记住列宁的话，只有“利用一切手段”才有可能克敌制胜，“甚至利用最小的机会争取得到大批盟友，即使这只是一些暂时的、犹豫不定的、反复无常的、不可靠的而且附带了条件的盟友。不明白这一点的人根本不懂马克思主义，不懂现代科学社会主义常识”。¹⁸

在农村，针对挣工资的农业工人大力推动的集体化，针对工会禁止农民拥有超出自己耕种能力的更多土地的政策，针对革命委员会征用收获的农作物、干涉私人贸易以及向佃户收租的做法，共产党人努力保护中小地主和佃户不受它们的伤害。

另一方面，自由共和派人士——他们主要关心的应该就是共产党正在主张保护的中产阶级的利益——一直保持小心翼翼，甚至到了胆怯的程度。查阅自由共和派的报纸可以发现与此有关的足够证据。事实上，直到一九三七年四月，它们才敢大胆地发表自己的意见，当时，革命的大浪正在退潮。“我们厌倦了保持沉默。”左翼共和派议员米格尔·圣安德烈斯声称，“我们不能容忍对小工厂主、小地主和知识分子的抢劫，不能容忍对所有那些年复一年为了积攒一点钱而劳动的人们的抢劫。……我们曾经眼看着我们的利益被践踏，我们曾经保持沉默。”¹⁹

共产党人不是这样。从革命刚开始，他们就大声疾呼，不仅呼吁保护小工商业主，而且呼吁保护小地主，他们还千方百计地从农村出现的不满中获益。“军事叛乱初期，”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委员胡里奥·马特乌在谈到巴伦西亚省的情况时说，“当一系列无以计数、越来越多的委员会试图通过立即将所有小地主转变成为农业工人并且没收他们的土地及其收获的农作物的方式彻底改变整个农村的面貌时，出现了使农民成为反法西斯组织的敌人的现实危险。长期以来深受政治寡头和反动高利贷者压迫的本分的农业生产者再次受到粗暴的对待，这一次是由那些应该帮助他们发

展进步的人对他们缺乏了解造成的。把信仰天主教的纯朴农民视为敌人的错误认识促使某些组织做出了诸如向佃户收取地租之类的不义之举，就像以前他们要向地主缴纳一样。……我们经历了真正危险的时刻，差点在后方引发了一场小地主与农业工人之间的内战。幸运的是，这场内战被制止了，但是仍然付出了代价：在为确保尊重小地主的财产权而进行的紧张的政治教育运动中，我们把肺都喊炸了。”²⁰

在一次公众集会上讲话时，从一九三六年九月起担任农业部长的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委员比森特·乌里韦宣称：

粗暴对待农民的现行政策有两个危险。第一个危险是，它可能疏离站在我们反法西斯阵营这一边的那些人。另一个危险更严重：它将危及西班牙未来的粮食供应。……令人不能容忍的是，当前线的士兵为共同的事业献出他们的鲜血和生命时，在远离前线的后方，有人根据人民拒绝接受的暴力思想使用属于人民的步枪横征暴敛。

但是，我告诉你们，农民；我告诉你们，农村的工人，尽管一些人正在伤害别人，尽管他们正在实施暴行，你们的职责是耕种土地，多打粮食，因为你们受到政府的保护，受到一些政党和组织的保护，因为你们身边还有共产党。……尽管有人使用了暴力，作为爱国者，作为共和国的支持者，作为反对法西斯分子的人，向政府呼吁、向共产党人呼吁是你们的责任，而且你们可以确信，为了使你们平静地耕种土地，我们将全副武装站在你们一边。²¹

86

几天后在另一次集会上讲话时，他就无政府工团主义者在巴伦西亚省的一些村庄建立自由共产主义制度的情况阐述说：“我们知道，一些委员会建立了某种类型的社会制度，在这种制度下，每个人都要服从委员会，受它的意志所支配。我们知道，委员会把收获的农作物充公，而且滥用其他手段，例如，没收小地主的农田，强行罚款，用票证购买商品，也就是说，一套完整的不讲规矩的行为。你们非常清楚地知道，这些行为——仔细听好这一点——绝不可能得到政府的批准，就连默许也不可能。……我们声明，小地主的财产神圣不可侵犯，因此，那些侵犯或者试图侵犯这些

财产的人必将被认为是共和国政权的敌人。”²²

共产党保护小地主和佃农利益的运动应该给它带来了大批追随者，这再自然不过了。当然，在中小地主占优势的那些地区，他们的运动最为成功。例如，盛产柑橘和稻米的巴伦西亚省的农户家业兴旺，内战之前他们支持右翼团体，在那里，据官方统计，到一九三七年三月，五万农民加入了共产党在革命初期为保护他们而成立的农民联合会。²³一名社会党人抱怨说：“共产党在村子里专门网罗前自治党最顽固的残渣余孽，这些人不仅极端保守，而且道德败坏，通过保证允许他们继续拥有自己的土地，共产党把这些小地主组织起来成立了新的农民联合会。”²⁴劳动者总工会的社会党人书记佩德罗·加西亚还声称，隶属于强大的全国农业工人联合会的巴伦西亚省农业工人抗议说，共产党正在该省促进一个与之竞争的农民组织的发展，“迟早有人将会为了政治目的而把这个组织当作一支在农村与劳动者总工会下属的农民协会对抗的突击力量来使用”。²⁵

除了向其成员提供肥料和种子并为他们向——同样由共产党所控制的——农业部贷款提供担保之外，新的农民联合会还成为一种有效的手段，被用来抑制全国劳工联合会和劳动者总工会的农业工人所发起的农村集体化运动并与莱万特地区农业出口联合委员会（CLUEA）进行斗争，后者是两大工会（主要是全国劳工联合会）为控制具有经济价值的柑橘的收购、包装和出口而设立的，这一控制权以前掌握在一群中间商的手里。²⁶农民联合会提供的保护及其对最终变化做出的保证可能诱使许多成员申请加入共产党，这是可以理解的。“我们在巴伦西亚农村得到广泛的支持，”农民联合会总书记胡里奥·马特乌证实，“以致如果我们允许的话，成千上万的农民将会加入我们的党。这些农民当中的许多人相信上帝而且现在仍然相信，他们祈祷并在私下里捶胸忏悔，他们像热爱神圣的事物一样热爱我们的党。当我们告诉他们不应把农民联合会与党混为一谈，即使没有党证也可以通过为党的政治路线工作成为一名共产党人时，他们往往回答说，‘共产党是我们的党。’同志们，说这些话时农民流露出多么深厚的感情啊！”²⁷

由于共产党给城乡中产阶级带来了新的希望和活力，在革命之后那几个月入党的大批新党员中有一大部分来自中产阶级并不让人感到意外。

几乎不必赘言，这些新党员不是被共产党的原则所吸引，而是希望从旧的社会制度的废墟中抢救出来一些东西。同时，除了保护他们的各种财产权之外，共产党还把这场天翻地覆的社会变革解释成一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而不是一场无产阶级革命。内战爆发没几天，人称“热情之花”（La Pasionaria）的共产党政治局委员多洛蕾丝·伊巴露丽以中央委员会的名义宣布：

我国正在发生的革命是一个多世纪以前在其他国家——例如法国——已经完成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在这一场与以前的蒙昧主义势力的斗争中，我们共产党人站在第一线。

在西班牙人民的伟大斗争中，你们这些将军，多次背叛祖国的人，不要再用脱离人民的思想凭空捏造共产主义的幽灵，人们反对的是那些希望把西班牙变成一个悲惨、落后的国家的人，在那样一个国家里，军队、神父和政治寡头将是生活和财产的绝对主人！我们共产党人正在捍卫一个自由、民主的政权，我们将与共和派、社会党人和无政府主义者并肩作战，不惜任何代价防止西班牙倒退。……

混乱的说法是个谎言；当共和国的叛徒散布消息说局势一片混乱时，那是在说谎！

在这一历史时刻，忠于自己的革命原则并且尊重人民的意愿的共产党站在表达了这种意愿的政府一边，站在共和国一边，站在民主一边。……

西班牙政府是二月十六日大选胜利产生的政府，我们支持它，我们保卫它，因为它是为民主和自由而战的西班牙人民的合法代表。……

反对反动派和法西斯主义的人民斗争万岁！民主共和国万岁！²⁸

因此，从一开始，共产党就不仅作为财产保护人，而且作为共和国和正常的政府管理程序的捍卫者出现在烦恼不安的中产阶级面前。中产阶级并不完全相信它的诚意，但是，只要它为他们提供保护并且帮助恢复被革命委员会篡夺的政府权力，他们就准备支持它。当然，他们的支持充满了

怀疑和担忧，因为共产党以前曾经奉行一种完全不同的政策，正如我们将在下一章里看到的那样。

注释：

- 1 引自一九三六年九月二十日《工人团结报》所报道的广播演说。
- 2 克拉拉·坎波亚莫，《一个共和派所看到的西班牙革命》，第103页。另请参阅《阿萨尼亚文集》，第三卷，第499页。
- 3 约翰·兰登-戴维斯，《在西班牙的街垒后面》，第123—124页。另请参阅路易斯·费希尔《人与政治》，第353页；赫苏斯·德·加林德斯，《被围困的马德里城中的巴斯克人》，第22页；弗兰克·杰利内克，《西班牙内战》，第380页；H.E.卡明斯基，《巴塞罗那》，第30—31页；梅甘·莱尔德发表在一九三六年十一月号《大西洋月刊》上的文章；E.普伊格·莫拉，《巴塞罗那的红色悲剧》，第52页；一九三五年五月二十八日《全国劳工联合会报》（何塞·加西亚·普拉达斯的文章）；一九三六年八月十一日（西斯托的文章）、十三日和十七日（服装业联合会制帽业分会强烈要求公众为拯救制帽业而戴帽子的宣言）《工人团结报》；一九三六年十月十六日和十二月十四日《最后关头》。
- 4 一九三六年八月十一日《工人团结报》。
- 5 杰拉尔德·布雷南，《个人记录，1920—1972》，第311页。
- 6 费德丽卡·蒙特塞尼发表在一九三六年七月三十日《白色评论》上的文章。
- 7 安赫尔·奥索里奥-加利亚多，《我的回忆》，第226页。
- 8 萨尔瓦多·克马德斯的演说，一九三八年十二月六日《政治报》报道。另请参阅一九三七年一月十三日《政治报》。关于某位共和派军官对共和派自由放任态度的批评，见赫苏斯·佩雷斯·萨拉斯《西班牙内战，1936—1939》，第135页。
- 9 一些历史学家提供的数字是十六席。正确的数字是十七席（见爱德华多·科明·科洛梅尔《西班牙共产党史》，第169和732页，他提供了在议会中代表共产党的十七名议员的姓名和选区）。
- 10 西班牙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委员曼努埃尔·德利卡多提供这个数字作为一九三六年七月十八日的党员人数（一九三九年七月二十三日西班牙文版《国际通讯》）。不过，大约二十五年后，当时流亡莫斯科的西共书记多洛蕾丝·伊巴露丽（热情之花）声称，一九三六年七月，西共党员人数从当年一月的三万人增加到了超过十万人（《唯一的道路》，第375页）。官方的共产党史《西班牙内战与革命，1936—1939》（一九五六年在莫斯科出版，热情之花主要负责其准备工作）也提供了同样的数字，见第一卷，第87页；该书还声称，由于其党员数量，“共产党当时[一九三六年七月]已经成为西班牙最强大的民主政党”。根据我自己的研究，我倾向于认为比较低的四万人这个数字更接近于一九三六年七月真实的党员人数。
- 11 见一九三七年三月共产党总书记何塞·迪亚斯向中央委员会所作的报告，收入迪亚斯《斗争的三年》，第390页。
- 12 安东尼奥·拉莫斯·奥利维拉，《现代西班牙的政治、经济和人，1808—1946》，第599页。
- 13 一九三六年七月二十七日《工人世界报》。

- 14 全国劳工联合会的一份正式报告承认大部分小资产者对革命的这种敌意：见经济管理委员会会议报告，收入加泰罗尼亚地区劳工联合会《一九三七年二月二十五日至三月三日在巴塞罗那举行的加泰罗尼亚地区劳工联合会特别代表大会会议纪要》，第363—365页。
- 15 一九三六年八月八日《劳动报》。关于共产党在内战最初几个月所发表的保护城镇中产阶级的声明和文章，见一九三六年八月五日、十三日至十五日、二十日、三十一日和九月十六日《工人世界报》；一九三六年八月十七日、九月二十二日和十二月二十二日（塞赛的演说）《劳动报》；迪亚斯，《斗争的三年》，第273、311和331页。下面的几行文字值得引述，它们引自一名参加过西班牙国际纵队的前外国共产党人所写的文章：“在穆尔西亚和其他地方，我看到我们的标语和传单以绝对支持私有财产的承诺向广大店主发出呼吁。”（亨利·斯科特·贝蒂发表在一九三八年四月号《加拿大论坛》上的文章）
- 16 该数字由共产党政治局委员安东尼奥·米赫提供，见一九三七年十月二十一日《红色阵线报》；另请参阅由共产党控制的劳动者总工会加泰罗尼亚分会总书记米格尔·费雷尔发表在一九三八年四月九日《先驱报》上的文章。
- 17 一九三七年四月二十五日《工人团结报》。
- 18 《列宁全集》（莫斯科，一九五〇年版），第二十九卷，第133页，被伊沃·J.莱德勒在《苏联外交政策》一文中引用，见米洛拉德·M.德拉奇科维奇编的《俄国共产主义五十年》，第177页。
- 19 一九三七年四月十九日《政治报》报道的米格尔·圣安德烈斯的演说。
- 20 《红色黎明》中的文章，载一九三六年十二月二日巴伦西亚《真理报》。
- 21 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八日巴伦西亚《真理报》。
- 22 一九三六年十二月一日巴伦西亚《真理报》。关于共产党领导人支持中小地主的其他演说，见一九三七年一月二十四日《巴伦西亚商报》（乌里韦）；一九三六年十月二十日（科莫雷拉）和一九三七年二月七日（科洛梅尔）《劳动报》；塞希斯·阿尔瓦雷斯，《青年与农民：一九三七年一月的全国青年大会》；何塞·迪亚斯，《斗争的三年》，第272、309—311和326—327页；《为西班牙自由和独立的共产党：呼吁和演讲》，第181—191页。
- 23 胡里奥·马特乌，《农民联合会的工作》，第7页。马特乌是农民联合会总书记。
- 24 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十四日《光明报》。另请参阅圣地亚哥·博斯卡发表在社会党左派报纸《前进报》上的文章，载一九三七年五月十五日《全国劳工联合会报》；劳动者总工会中的全国农业工人联合会巴伦西亚书记处致农民联合会的信，载一九三七年八月十二日《社会熔炉报》。关于某个无政府工团主义者对加入农民联合会的富裕农民的猛烈抨击，见一九三七年六月五日《我们》。
- 25 一九三七年四月十八日《前进报》。
- 26 尽管劳动者总工会在莱万特地区农业出口联合委员会中派有代表，全国劳工联合会却是该委员会的主导力量。全国劳工联合会对于这一重要经济成分——它提供了大量的外汇——的控制招致了尖锐的批评，批评不仅来自共产党，而且来自社会党左派。像共产党一样，社会党左派认为，出口贸易是政府的职能而不是工会的职能（见一九三七年二月六日和八日《前进报》以及一九三六年十二月二十四日和一九三七年四月九日《巴伦西亚通讯》）。据说莱万特地区农业出口联合委员会还低价收购农民的柑橘，它也因此受到谴责并被当时还是共产党员的赫苏斯·埃尔南德斯描绘成为“调拨抢劫而来的农民柑橘的管理中心”（赫苏斯·埃尔南德斯，《黑与红：西班牙革命中的无政府主义者》，第363页）。关于发表在全国劳工联合会报刊上的为莱万特地区农业出口联合委员会辩护的文章，见一九三七年二月七日、九月一日和四日以及十月九日《社会熔炉报》。至今没有对这个组织进行研究的重要论著发表，有关资料也是零散、残缺的，而且具有严重的党派偏

见。弗朗茨·博克瑙的《西班牙斗鸡场》中有一段简短的内容公正地记述了围绕着莱万特地区农业出口联合委员会出现的争论，见第198—200页。

27 马特乌，《农民联合会的工作》，第9—10页。

28 一九三六年七月三十日《工人世界报》。

人民阵线

“我们的任务是把大多数无产阶级争取过来并且准备夺取政权。”热情之花在将近一九三三年年底时宣称，“这意味着我们必须全力以赴组织工会和农会并且创建苏维埃。……革命运动的发展对于我们非常有利。我们正沿着共产国际为我们指引的道路前进，这条道路将导致在西班牙建立一个苏维埃政权，一个工人和农民的政权。”¹

这一政策与共产党在一九三六年七月内战和革命爆发后所追求的貌似温和的目标形成了诡异的对比。发生这种变化的原因是一九三五年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所通过的那一项正式批准采取人民阵线政策的决议。

产生这项新政策的根本原因在于一九三三年一月希特勒上台后德-苏关系的恶化，约瑟夫·斯大林担心重新武装起来的德国军事力量最终将用来对付苏联。由于饱受强制实行集体化之苦并且正在竭尽全力巩固自己的政治制度和军事体系，苏联小心谨慎地不挑衅生事以免造成与纳粹政权的长期不合。

艾萨克·多伊彻写道：

希特勒血腥镇压国内的一切反对派及其实行的种族迫害对莫斯科

与柏林之间日常外交事务的影响与它们对巴黎或伦敦与柏林之间日常外交事务的影响不大一样。斯大林肯定寄希望于俾斯麦传统在德国外交官中的影响力，这一传统要求德意志帝国应当避免与俄国冲突。在希特勒担任德国总理的第一年，[斯大林]没有对德国发生的事情公开发表过任何言论，尽管他的沉默使迷惑的共产国际追随者难以忍受。

只是在一九三四年一月举行的苏共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他才打破了这种沉默。即便是这样，他也尽量避免从那些在欧洲左派看来造成了如此严重的灾难性后果的事件得出结论，他还含糊其辞地加深了以下错误印象：作为“一种资本主义衰落的征兆”，法西斯主义将被证明是短命的。不过，他也认为纳粹的崛起是“复仇意识在欧洲取得的一场胜利”，而且他还注意到，德国政策的反苏倾向已经逐渐压倒了旧有的俾斯麦传统。尽管如此，他仍然煞费苦心明确表示，苏联希望在同样的条件下与第三帝国保持与魏玛共和国同样的关系。²

的确，苏联政府的喉舌《消息报》在希特勒担任德国总理不到几个星期就声明，“无论德国政府是什么形式或是由什么人组成”，苏联只是一个“对德国没有敌意”的国家。³但是，苏联的友好表示受到冷遇，因此，一九三三年底苏联人民委员会会议主席维亚切斯拉夫·莫洛托夫抱怨说，在过去的一年，德国统治集团试图改变与苏联的关系。⁴

为了寻找预防德国扩张主义威胁的办法并使西欧各国政府受它的影响，苏联彻底改变了其敌视国际联盟的态度并于一九三四年九月加入这个国际机构。“通过加入国际联盟，”共产国际出版的周刊《国际新闻通讯》宣称，“苏联可以更加实际有效地继续与一场针对苏联的反革命战争做斗争。”⁵但是，尽管采取了这一行动，对德国意图的严重担忧继续存在。“对于苏联来说，战争的直接威胁加剧了。”莫洛托夫在一九三五年一月声称，“我们务必不要忘记，目前在欧洲，有一个公然宣称其历史使命是占领苏联领土的执政党。”⁶

作为防止德国威胁其安全的进一步行动，一九三五年五月二日，苏联与法国缔结了互助条约。法国愿意签订这项条约主要是想消除自一九二二

年苏德两国签订拉帕洛条约^①恢复友好关系以来苏联与德国仍然保持的一切联系⁷并使法国共产党不再反对国防计划；⁸实际上，两国总参谋部之间从未签订过任何军事协定以充实这项条约，⁹因此，从一开始它就几乎没有引起人们的兴趣，甚至从政府层面来说也是如此。¹⁰

即使是在莱昂·布鲁姆的人民阵线政府时期，法国外交部也有某种观点认为，可以根据德国外交部代理国务秘书就一九三六年九月一日与法国大使弗朗索瓦-蓬塞进行的会谈所做的一份备忘录判断法苏条约的意义。关于为在西方各国之间谈判协商一项取代洛迦诺公约的新条约而提议举行的洛迦诺公约五国（英国、法国、比利时、意大利和德国）会议，这份备忘录写道：

90 弗朗索瓦-蓬塞先生特别想知道我们是否愿意参加会议并在不涉及第五点的情况下就议事日程的主要问题协商，还是打算强迫法国政府事先明确表示放弃第五点，即断绝与东方的关系。也就是说，德国政府有可能采取在搁置东方问题的情况下就一项西方国家之间的条约开启谈判的立场，还是必须首先要求法国在德国开始讨论西方国家的条约之前断绝其与东方的关系？如果德国遵循前一条路线的话，他认为他可以说，法苏关系将逐渐冷淡，特别是因为这种关系从没有被大部分法国人所接受；于是，我们将缓慢而稳步地达到我们的目的。另一方面，如果我们立即对法国政府施加压力，要求它放弃与苏联的盟约，法国政府只能拒绝这样做。在长时间交谈的过程中，弗朗索瓦-蓬塞先生极力使我相信正确的选择和错误的选择是什么，他在陈述的过程中郑重强调，法国与苏联之间不存在特殊的军事关系。¹¹

莫斯科充分意识到法苏条约最终将被束之高阁的可能性，因此，保证法国履行其义务成为法国共产党的一项极其重要的任务。

“我们可以祝贺法苏条约的签订，”法共领导人瓦扬-库蒂里耶宣

① 这里的拉帕洛条约指的是一九二二年四月十六日德国与苏联在意大利的拉帕洛签订的友好条约，根据这项条约，德国和苏联同意放弃因布列斯特-立陶夫斯克条约和第一次世界大战而产生的相互之间的领土和经济要求并使两国外交关系正常化。

称，“但是，因为我们不相信法国资产阶级和军队中的法西斯骨干分子将会遵行它的条款，我们应采取相应的行动。我们知道，无论是什么利害关系驱使某些法国政治势力与苏联修好，法国的帝国主义分子都是仇恨苏联的。”¹²

由于外交上的原因，法国的政策制定者不能公开暴露他们陷入的令人痛苦的两难窘境，但是，这种窘境还是被右派众议员皮埃尔·泰坦热直截了当地说了出来：“法国的生存确实岌岌可危。由于公开与苏联结盟的政策，我们可能立即卷入一场与德国的战争。这场战争的后果对我们来说是可怕的。如果德国被打败，我们的国家很快将被布尔什维主义所污染。如果德国获胜，它将把法国从地图上抹掉。”¹³

法国和英国的强势集团都反对向东欧做出可能使西方卷入一场与德国的战争的不可变通的承诺，这些势力集团似乎乐于鼓励德国那些损害苏联的扩张目的。

在法国，保王党人、《周刊》编辑弗朗索瓦·勒格里一九三五年四月六日声称，保护西方文明的两个基本条件是避免战争以及通过“让它们互相残杀”消灭泛日耳曼主义和布尔什维主义，因此，他希望德国进攻俄国，假使这样的话，“它很可能感到满足；至少西欧将有一个进行调整的喘息机会”。¹⁴

“在战前的那几年，”一九三七年担任美国副国务卿的萨姆纳·韦尔斯写道，“西方民主国家的大型金融和商业利益集团——包括美国的许多利益集团——确信，苏联与希特勒德国之间的战争只会有利于它们。它们断言，苏联肯定被打败，共产主义也将随着苏联的战败被消灭；另外，由于这场多年的战争，德国将被严重削弱，以后它将不可能对世界上的其他国家构成任何真正的威胁。”¹⁵

一九三五年五月六日，美国驻柏林大使威廉·多德在日记中对富有影响力的英国政治家兼外交家洛西恩勋爵写给他的一封信作了如下批注：

“他明确表示，他支持建立一个民主国家的联盟，以遏制德国对西方采取的行动并把德国的目标转向东方。”¹⁶在发表于《每日邮报》上的一篇题为《为什么不是英法联盟？》的文章里，英国报业巨头之一罗瑟米尔子爵写道：“英法两国的新盟约将会具有另外一种不可估量的重要作用。它

将把德国的领土野心转移到一个能够以最小的代价取得最大的成果的方向上——转向东欧。”¹⁷

在战前的那几年，《每日邮报》的影响力和公众接受的程度不可低估。根据富兰克林·里德·甘农对英国新闻界与德国的分析，“[它]是英国最完善的报业集团发行量最大的报纸。一九三七年，它的发行量为一百五十八万份；它是唯一一份主要读者为中上阶层人士的大众日报。”关于罗瑟米尔子爵本人，甘农写道：“[他]对共产主义这个问题近乎精神失常，因此经常强求沃德·普赖斯[《每日邮报》的首席驻外记者乔治·沃德·普赖斯]写一些一九三六年九月二十一日那样的文章，在那篇文章里，沃德·普赖斯阐述道，对于大英帝国来说，布尔什维主义是一种比国家社会主义更大的威胁，因此……如果没有希特勒，‘整个西欧可能很快就会大叫大嚷着要求出现一位这样的斗士’。”¹⁸但是，这种想法并没有什么古怪异常。就连前自由党首相戴维·劳合·乔治也在一年后对下院宣称：“用不了多长时间，可能一年，也可能两年，英国保守党人将把德国当作欧洲对抗共产主义的堡垒。……[如果]德国防不住共产党人……欧洲也将步其后尘。我们不要急着谴责德国。我们应当欢迎德国做我们的朋友。”¹⁹

92 尽管《每日邮报》从没有被认为是斯坦利·鲍德温和内维尔·张伯伦的保守党政府的喉舌，它仍然表达了庞大而富有影响力的保守意见主流群体的私下关切。据前德国驻伦敦大使馆武官盖尔·冯·施韦彭布尔格将军男爵说，英国陆军部的约翰·迪尔少将爵士和英军总参谋部的一些与他想法一样的成员“确信，大英帝国与德国之间的下一场战争不仅对于大英帝国，而且对于整个欧洲都将会是一场悲剧。他们非常清楚地意识到，这样一场战争只会助长苏联的阴谋”。²⁰在航空界，有一群坚定的亲德分子，据理查德·格里菲思说，其中最喧嚣、最激烈的鼓吹者是《飞机》杂志的编辑C.G.格雷。一九三三年四月十九日，《飞机》杂志发表了这样的看法：德国“站在抵御东方的野蛮落后、保卫西方文明的第一线”。²¹

尽管内阁成员在战前的那几年没有当众表达过他们对于苏联的担忧，但是，几年之后，曾在鲍德温和张伯伦的内阁中担任过一些关键职务的塞缪尔·霍尔爵士（后来的坦普尔伍德子爵）公开说出了这些忧虑：“[我们]有不信任苏联的充分理由。二十多年来，历届英国政府饱受俄国人的阴谋

诡计之苦。英国的党派政治经常受到苏联宣传的毒害。苏联秘密特工利用一切机会接连不断地制造麻烦。苏联资金进入英国煽动分子的囊中。……在两次大战之间的这一段时间，煽动军队叛乱、工人罢工的尝试持续进行，苏联驻伦敦大使馆没有一刻不被当作间谍捣乱活动的中心。……如果说我们没有受到苏联这些长期以来有案可查的两面三刀和敌对行为的影响，[我们]应该不是人类。”²²

无论我们如何看待西方战前对德国采取的“绥靖”政策，如果不考虑对于苏联的这种担忧，就不可能理解包括西班牙内战在内的欧洲事态发展的过程。

毫无疑问，西方民主国家面临着某种重大选择。一方面，它们可以在纳粹政权羽毛未丰时遏制并且消灭它，同时任凭苏联自由发展其国力进而在一段时间之后通过结成共产党联盟成为世界上的最大威胁。“我认为，如果纳粹政权被消灭，德国接着将会走向共产主义，”一九三一至一九三五年担任英国空军大臣的伦敦德里侯爵在一九三六年五月九日写给温斯顿·丘吉尔的一封信中说，“我们还将发现法国、德国与苏联站在了一起，而且感到共产主义的威胁，它成为世界上最有力的政策。”²³

这不是他唯一的忧虑。在一九三八年出版的《我们自己与德国》一书中，伦敦德里侯爵表示担心，除非英国立即与德国达成某种谅解，德国将“根据一项直接对抗的国际政策猛烈打击英国并且侵犯它的诸多殖民利益和商业利益。正是为了避免出现这种不幸的后果，我竭尽全力使本国人民相信英德两国之间友好谅解的价值和重要性”。他还在后面的段落中写道，他“不理解我们为什么不能与德国达成某种反对共产主义的共识”。²⁴

93

蒂埃里·莫尼耶同样一点也不含糊，一九三八年九月的慕尼黑会议把捷克斯洛伐克作为牺牲品献给纳粹德国之后，他在一篇文章里表达了法国右翼党派的观点。“这些党派认为，”他写道，“如果爆发战争的话，不仅将造成巨大的灾难，不仅法国可能战败并遭到破坏，而且更有甚者，德国的战败将意味着形成了防止共产主义革命蔓延的主要屏障的那些独裁政权的垮台，这可能导致欧洲立即布尔什维化。也就是说，法国战败实际上只是法国的失败，而法国的胜利与其说是法国的胜利不如说是某些主义的胜利，人们非常正确地认识到，这些主义将直接导致法国及其文明自身的

毁灭。令人遗憾的是，在法国，由于不能公开发表与此有关的任何看法，所以，具有这种看法的人士和党派通常也不承认它。²⁵实际上，在我看来，一九三八年九月之所以没有发生战争，这是一个理由充分的主要原因，即使不是一个理由最为充分的原因。”²⁶

另一方面，西方民主国家可能任由纳粹政权侵犯中欧和东南欧的那些位于苏联国界以西的非极权主义国家，希望它有朝一日将与日益强大的苏联政权发生冲突，尽管这也会给他们带来耻辱和巨大的风险。

对于任何把中欧和东南欧的小国作为牺牲品献给纳粹德国的政策，最坚定的保守党反对派人士的意见必须在此予以陈述。一九三七年十月，温斯顿·丘吉尔在写给伦敦德里侯爵的信中说：

我们大家都希望与德国友好相处。我们知道，最优秀的德国人为纳粹的暴行以及从宗教信仰自由的基础上倒退感到羞耻。我们当然不应奉行一种有损德国合法利益的政策，但是，你肯定知道，当德国政府谈论与英国的友谊时，它的意思是，我们应当归还它以前的殖民地，而且我们还要同意，对我们来说，它在中欧和南欧拥有自由行事的权力。

这意味着，它将把吞并奥地利和捷克斯洛伐克作为缔造一个庞大的国家阵营的预演。纵容这种侵略政策肯定不符合我们的利益。以中欧小国为代价使我们自己免遭祸害的政策将是非常错误的，而且极其不严肃。

在我们看来，为纳粹暴政向那些具有相当程度民主自由的国家蔓延推波助澜与英国和美国的舆论倾向完全背道而驰。依我之见，我们应当在国际联盟的监督下达成一项具有约束力的区域联盟协定，使得德国满足于在它自己的疆界之内以合法的方式生存而不是企图侵略其弱小的邻国，消灭这些小国并把它们的领土和家园据为己有。²⁷

一九三五年春天，在与苏联驻英国大使伊万·迈斯基交谈时，丘吉尔批评了某些西方安全的维护者。根据迈斯基对这次谈话的描述，丘吉尔说：“这些人坚持认为，德国必须在某个地方打仗……因此，最好让它以

东欧和东南欧的那些国家为代价建立一个自己的帝国……当然，这种想法非常愚蠢，然而不幸的是，在保守党的某些人士中，它们仍然很受欢迎。但是我坚信，胜利最终不属于西方安全的维护者，而是属于[一九三一至一九三八年担任英国外交部常务副大臣的罗伯特·]范西塔特[爵士]和我这样的人，我们认为，和平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英国、法国和苏联必须成为防御同盟的骨干力量，这个同盟将把德国限制在某种不足为虑的安全状态。”²⁸

一九三五年十一月七日，范西塔特写信对英国国王乔治五世的私人秘书威格拉姆勋爵说：“试图给予德国吞并中欧和东欧其他国家人民财产自由行事权的任何做法都是非常不道德的行为，而且与构成本国政策基础的[国际]联盟的所有准则背道而驰。几乎可以肯定，任何试图进行交易的英国政府将可耻并罪有应得地被赶下台。……英国政府如果考虑任何听任德国以牺牲俄国为代价满足其领土野心的建议的话，更不必说怂恿了，那么，绝对可以保证的是，这将使英国彻底分裂。”²⁹

但是，在战前那几年，有一些声音比温斯顿·丘吉尔和罗伯特·范西塔特的声音更强大，结果，范西塔特一九三八年被内维尔·张伯伦首相撤了职。劳埃德勋爵是一位保守党贵族，而且是一名重要的英国外交官，他阐释说，英国的对德政策在多大程度上是由对苏联的担忧决定的。一九三九年九月，英国与德国开战后不久，在他所撰写并由内维尔·张伯伦首相的外交大臣哈利法克斯勋爵用推荐性序言打上官方认可印记的小册子《英国问题》中，劳埃德勋爵写道：“无论[希特勒的]手段多么可恶，无论他的外交政策多么具有欺骗性，无论他表现出他多么不能容忍欧洲其他国家人民享有的权利，但他仍然声称，他最终主张的是某种欧洲的共同利益，因此我们可以想象，总有一天这将提供一种与其他国家达成谅解的基础，平等地决定不把它们传统的制度和习俗当作祭品摆上世界革命滴血的祭坛。”³⁰

为了防止西方民主国家可能以牺牲苏联为代价与第三帝国消除分歧达成和解，为了保证法苏互助条约不致半途而废，而且为了与其他国家——尤其是英国——签订类似的条约，在苏联看来至关重要，各国政府对德国在东欧的企图的敌视态度应当成为官方的行动。为了达到这个目的，

一九三五年八月召开的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正式决定采取人民阵线这一路线。于是，一个向社会党人和自由派政党示好的时期煞有介事地开始了，它结束了此前奉行的分裂政策，该政策谴责社会党人是“社会法西斯分子”，是“资产阶级的中坚力量，其中包括法西斯国家的资产阶级”，³¹后者有力地促成了希特勒的上台。但是，人们不应忘记，甚至还在一九三五以前，共产国际的某些支部已经开始谋求与其他政党合作，这符合苏联外交政策的新动向。³²这种尝试在法国取得了最好的效果。³³

苏联外交的政治目的不应掩盖这一事实：早在共产国际正式采取人民阵线路线的很长时间之前，西班牙的大部分左派政党就为开展一场团结运动找到了一个令人信服的国内理由，即，左派在一九三三年十一月的大选中被中-右党派击败了。共产党人声称他们发起了西班牙的团结运动，但是，曼努埃尔·阿萨尼亚所领导的自由共和派努力缔造了一个共和派与社会党的联盟，在下次大选中，以这个联盟对抗中-右党派应当不会落下风。³⁴

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在其方案中决定，各国共产党当前的首要任务之一是使农民和城镇小资产阶级加入一个“广泛的反法西斯人民阵线”。它坚持认为这是最最重要的，因为，“英国资产阶级的统治阶层支持德国武装起来，以便削弱法国在欧洲大陆的霸权……并将德国的侵略矛头对准苏联”。³⁵毫无疑问，一九三五年上半年英国对德国重整军备给予的支持只是为这些指责提供了证据。

一九三五年二月六日，当时的英国外交大臣约翰·西蒙爵士在下院表示：“我们无法拒绝而且也不应当拒绝德国在军备问题上提出的权利平等的要求。”³⁶一九三五年六月十八日，英德海军协定签字，同意德国海军拥有相当于英国海军百分之三十五的舰船吨位。一九三五年七月十一日，温斯顿·丘吉尔对这份协定提出批评，他指出：“我们容忍甚至鼓励德国在建立舰队的问题上撕毁和约。”³⁷“在苏联，”英国历史学家马克斯·贝洛夫写道，“[英德海军]协定被认为是英国虚弱的表现，同时也暴露了英国想使德国从整备空军转向海军建设的愿望，因为它觉得自己在海军方面更强大。这份协定也许还有助于将德国的注意力转向东方从而使英国从欧洲事务中解脱出来，以便挽救其在远东岌岌可危的地位。主张与德国合作的英

国人将会发现一个新的活动领域。苏联人坚持认为，德国人不会遵守英德海军协定，只是把它当作撕毁各项条约的一个突破口接受下来。显然，德国对[苏联的门户]波罗的海的控制将无懈可击。[据迈斯基说，“英国政府希望确保德国在波罗的海对于苏联的优势地位”，这是签订英德海军协定的首要目的。]”³⁸似乎没有任何理由怀疑，希特勒先生主要考虑的也是波罗的海的局面。”³⁹此外，德国在一九三五年夏天违反凡尔赛和约重新开始征兵。这也被英国所容忍。⁴⁰

肯定是考虑到德国军事力量日益增长的威胁，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宣称，为和平而斗争给建立包括农民和城镇小资产阶级在内的最广泛的统一战线带来了宝贵的良机，“应当把所有热心维护和平的人吸引到这个统一战线中来”。这一目标必须通过动员人民反对“垄断资本和资产阶级政府的掠夺性价格政策”以及反对“不断增加的税收和高昂的生活成本”来实现。⁴¹尽管这次大会重申，共产国际的目标仍然是用革命推翻资产阶级的统治并且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苏维埃政权，⁴²但是，团结中产阶级的政策迟早将会导致共产国际各个支部试图在某种程度上淡化它们的革命目标，从而消除人们曾经对它们产生的怀疑。一九三五年，当时为共产国际宣传部门工作的阿瑟·科斯特勒写道：“所有关于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的标语口号一下子都被清理进了杂物室。它们被一种新的装饰所取代，名曰‘和平与反法西斯的人民阵线’，配着窗口的天竺葵。它的大门向所有善良的人们——社会党人，天主教徒，保守人士，民族主义者——敞开着。我们曾经鼓吹的革命和暴力的观念将被当做奇谈怪论受到嘲笑，就像反动的战争贩子到处诋毁的那样。我们不再自称‘布尔什维克’，甚至不再自称共产党人——现在党内很不赞成公开使用这个词。我们只是纯朴、正直、热爱和平的反法西斯人士和民主的捍卫者。”⁴³

这意味着共产国际放弃了夺取政权的目标吗？肯定不是。代表大会清楚地表明，人民阵线政府“可以成为一种向无产阶级专政过渡的特殊形式”。⁴⁴“十五年前，”共产国际总书记格奥尔吉·季米特洛夫在他向大会所作的重要报告中宣称，“列宁要求我们集中精力‘找到向无产阶级革命过渡或者接近它的形式’。在一些国家，统一战线政府可能将被证明是最重要的过渡形式之一。”⁴⁵

正如一位历史学家所指出的那样，共产国际这一新的政策在西班牙产生的结果是，共产党人“小心翼翼地行走在争取革命群众和温和共和派[中产阶级]双重支持的中间地带，有时无法自圆其说”。⁴⁶

注释：

- 1 共产国际执委会第十三次全体会议工作报告速记稿，第531页。另请参阅《在西班牙为夺取政权建立工农共和国而进行的反法西斯斗争》，载一九三四年十二月五日《共产国际》和西班牙共产党一九三三年十月三十日竞选纲领，在竞选纲领中，“工农政府将立即采取的最重要的革命措施”包括以下内容：“将大型工业垄断企业收归国有；由苏维埃控制生产和分配；将银行、铁路和所有掌握在大资本家手中的运输通讯工具（航运、有轨电车、公共汽车、飞机、电报、电话和广播公司）国有化；取缔国民卫队、突击卫队以及大资本家和大地主的一切武装力量；全面武装工人和农民；清除敌视人民的官僚政客并由苏维埃推举政府官员；防止常备军队成为资本家和地主手中的工具；清理将军和军官团；由士兵民主选举指挥官；士兵选出代表参加工农兵委员会；创建保卫人民群众和革命利益的工农红军。”（见米格尔·阿托拉《政党与政治纲领：1808—1936》，第二卷，第479—480页）西共中央由热情之花（多洛蕾丝·伊巴露丽）主持的一个委员会所编撰的官方《西班牙共产党史》完全忽略了这一极端革命的竞选纲领。关于对内战之前——一九三一至一九三七年——的西班牙共产党的详细研究，见贝尔纳德·拜尔莱因的论文《西班牙内战之前的共产国际成员西班牙共产党：1931—1936》（波鸿，鲁尔大学，1978）
- 2 艾萨克·多伊彻，《斯大林政治传记》，第415页。
- 3 一九三三年三月四日《消息报》。
- 4 在苏联中央执委会第四次会议上的讲话，见一九三三年十二月二十九日《消息报》。
- 5 一九三四年十月十二日《国际新闻通讯》。关于苏联就其改变对国际联盟的政策所作的更加详细的解释，见齐妮娅·J.尤丁和罗伯特·M.斯拉瑟的《一九二八至一九三四年的苏联外交政策：文献与资料》，第664—672页。
- 6 在苏联最高苏维埃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讲话，见一九三五年一月二十九日《消息报》。
- 7 安德烈·热罗（佩蒂纳），《法兰西的掘墓人》，第244—245和342—343页；热纳维耶芙·塔布伊，《讹诈或战争》，第90页。
- 8 塔布伊，《讹诈或战争》，第91—93页；温斯顿·丘吉尔，《风云际会》，第134—135页；路易斯·费希尔，《苏联从和平走向战争之路：苏联外交关系，1917—1941》，第264—265页；亨利·德·克里利，《法国人！这就是战争！》，第111—112页。关于对法国共产党在法苏条约签订之前反对国防计划的情况所作的引证翔实的描述，见莫里斯·塞拉《永久的背叛：共产党与苏联的政策》，第26—41页。法苏条约签订之后，斯大林公开表示赞成法国的国防计划（见刊登在一九三五年五月十七日《时报》上的官方公报），一段时间之后，法国共产党又来了一次一百八十度大转变。
- 9 马克斯·贝洛夫，《苏联的外交政策，1929—1941》，第一卷，第157页；丘吉尔，《风云际会》，第135页；费希尔，《苏联从和平走向战争之路》，第265页；И.К.科布利亚科夫，《为了和平反对侵略的苏联，1933—1941》，第57—58页；保罗·雷诺，《法国

- 挽救了欧洲》，第一卷，第115页及其后各页。在《从协和广场到总督大道，一九三四年二月至一九四〇年六月》这本书中，法苏条约签订时的法国陆军部长法布里披露，他和总理赖伐尔都反对签订军事协定的主意（被保罗·雷诺在向为调查一九三三至一九四五年间发生在法国的重大事件而设立于一九四七年的国民议会调查委员会作证时引述，见《一九三三至一九四五年间发生在法国的重大事件：国民议会调查委员会收集的证据和材料》，第89—90页）。
- 10 见贝洛夫《苏联的外交政策》，第一卷，第160页；克里利，《法国人！这就是战争！》，第117页；夏尔·A.米科，《法国右派与纳粹德国，1933—1939》，第67—84页；热纳维耶芙·塔布伊，《他们被称为灾难预言者》，第244—245页。
 - 11 美国国务院，《一九一八至一九四五年德国外交政策文件》，D辑，第三卷，第67页。另请参阅德国驻巴黎大使约翰内斯·冯·韦尔切克一九三六年十二月二十六日写给德国外交部长诺伊拉特的报告，报告说，“尽管过去几年法国人受到各种侮辱，他们现在仍然准备为达成谅解进行谈判。”报告还说，“倘若德法两国恢复睦邻友好关系，法苏条约的作用将会逐渐降低到拉帕洛条约的水平。这是德尔博斯（德尔博斯为当时的法国外交部长——译注）在我们最近的会谈中使用的表述。”
 - 12 一九三五年五月十七日法国《人道报》。另请参阅M马尼安发表在一九三五年五月十六日法国《人道报》上的文章。
 - 13 一九三五年（原书误为一九二五年——译注）十一月二十八日《老实人》。
 - 14 被米科在《法国右派与纳粹德国》一书中引用，见第73页。“大多数右派拒绝接受法苏条约……显示了法国民族主义者[将德国限制在其现有领土范围之内]的传统方针的突变，”米科写道，“这也许可以被看作以东欧为代价绥靖德国的前奏。”（《法国右派与纳粹德国》，第70页）
 - 15 萨姆纳·韦尔斯，《决定性时刻》，第321页。安东尼·C.萨顿（前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研究人员）根据文献资料所作的描述显示了美国的一些银行业和工业利益集团对纳粹的支持，见《华尔街与希特勒的崛起》。
 - 16 《多德大使日记，1933—1938》，第241页。据英国历史学家马丁·吉尔伯特说，“[洛西恩勋爵]认为，通过帮助希特勒彻底修改凡尔赛和约、将所有说德语的人集中在他的统治下、向东方扩张和收复殖民领地，英国很快将会把纳粹主义从一种邪恶的信条改变成为一种可以接受的信条。正如他在一九三六年写给阿斯奎思[勋爵]的遗孀的信中所说：“我的看法很简单。我不喜欢一切独裁政权。我认为墨索里尼和教皇最坏了。然后我认为李维诺夫次之，他对整个欧洲施展阴谋企图使欧洲大国处在战争的边缘或者将它们推进战争。希特勒与其说是一个暴徒不如说是一个幻想家，在这一类人当中，他显然是最邪恶的。”（《绥靖主义的根源》，第164—165页）这封信注明的日期是一九三六年五月七日，并且写在洛西恩的信纸上。一九三五年五月二日，洛西恩给一位朋友写信说：“除非我们准备妨碍[德国的]东方行动路线——本国肯定不准备，唯一现实的解决办法是，海洋民主国家应当坚定地准备团结起来，防止这个独裁政权干涉它们的自由，侵犯它们的领土。”（被J.R.M.巴特勒在《洛西恩勋爵（菲利普·克尔），1882—1940》一书中引用，见第209页）。另请参阅巴特勒《洛西恩勋爵》，第214页，
 - 17 一九三三年十一月二十八日《每日邮报》。
 - 18 富兰克林·里德·甘农，《英国新闻界与德国，1936—1939》，第32和25—26页。
 - 19 《下院辩论记录》，第二百九十五卷，第五辑，第919—920页。
 - 20 盖尔·冯·施韦彭布尔格和莱奥·迪特里希·弗朗茨，《关键的几年》，第86页。
 - 21 理查德·格里菲思，《右派的同路人：纳粹德国的英国狂热支持者，1933—1939》，第139页。
 - 22 塞缪尔·霍尔爵士，《纷乱的九年》，第350页。

- 23 被伦敦德里侯爵在《命运的翅膀》中引用，见第171页。
- 24 伦敦德里侯爵，《我们自己与德国》，第8和129页。另请参阅该书第21页。
- 25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公布的德国文件证实，当时法国政府的一些主要成员有这种想法。
- 26 一九三八年十一月号《斗争》。另请参阅莱昂·巴伊比发表在一九三六年九月二十四日《今报》上的文章。
- 27 引自伦敦德里侯爵，《命运的翅膀》，第187页。令历史学家感兴趣的是，一九二〇年二月，最著名的干涉苏联的倡导者丘吉尔断言：“谁也不知道俄国的大锅里将要冒出什么来，但是几乎可以肯定那是某种充满邪恶的东西，对英国、法国和美国具有极大的威胁。因此，在我看来，我们的危险……没有因为这场战争最终被消除，几年之后，它们可能在一场新的战争中卷土重来，而且仍然是以一种惨烈的方式。为了避免这场战争，我们应当与德国人民建立一种真正、持久的和平。”（一九二〇年二月十六日《泰晤士报》报道，见马丁·吉尔伯特，《两次大战之间的英国与德国》，第130页）
- 28 伊万·迈斯基，《谁帮助了希特勒？》，第61页。另请参阅该书第55—56页和伊恩·科尔文，《从政的范西塔特：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起因》，第34页。科尔文写道：“在英国保守党和受保守党影响的各个不同的阶层中有那样一些人，他们认为德国是欧洲未来的警察，而另一些人则认为，可以把希特勒毫不费力地转向东方使他在与苏联的战争中耗尽力气。”
- 29 见哈罗德·尼科尔森爵士《乔治五世国王：生平和统治》，第529页。尼科尔森写道，一九三六年四月二十八日，“我单独与罗伯特·范西塔特在他家中共进午餐。……他认为，德国在欧洲的霸权意味着英帝国的没落，因此，我们没有权利为了一代人的利益通过给予德国对斯拉夫国家的自由行事权来收买它。一旦它确立了某种坚不可摧的地位，它将转过身来对付我们，而我们将会太虚弱，以致不能与之抗衡。我认为他在理论上是正确的，但是，我们实际上根本不可能使英国人民为了捷克人的利益与德国打仗”（尼科尔森，《日记与书信，1930—1939》，第259页）。另外，一九三六年七月十六日，尼科尔森在日记中写了下面这条重要的内容：“外交委员会。温斯顿不同意大家都接受的那个前提，即，我们的主要责任是保卫大英帝国和莱茵河防线。在当前的情况下，这本身就是‘一项艰巨的任务’。我们必须问自己的是，这项任务是否最终使我们轻易地向德国表示，它可以在东方采取它想采取的行动。我们应该这样说，在短短的一年时间之内，德国将成为从汉堡到黑海的统治者，接着，我们将面对一个自拿破仑时代以来不曾出现过的联盟。给人留下的总体印象是，大多数民族党人内心里是反国际联盟和反苏的，因此，他们真正想要的是一份与德国达成的可靠的协议，如有可能，也与意大利达成协议，通过这些协议，我们可以以牺牲那些小国为代价来换取和平。在我看来，这种完全不顾别人的政策必定将在二十年之内引发一场英德战争。”（尼科尔森，《日记与书信》，第269页）
- 30 劳埃德勋爵，《英国问题》，第55页。根据基思·费林所撰写的内维尔·张伯伦的传记，劳埃德勋爵是鲍德温首相追随者中的“权贵”之一（费林，《内维尔·张伯伦传》，第285页）。
- 31 《共产国际简史》，第359页。
- 32 关于共产国际的某些部门向人民阵线路线的转变，见《共产国际简史》，第349—400页。
- 33 《共产国际简史》，第351—353、356和360—363页。另请参阅菲利普·罗布里厄《共产党内幕，1920—1945》，第452—458页。
- 34 见维克托·阿尔瓦《人民阵线》，第277—281页；戴维·T.卡特尔，《共产主义与西班牙内战》，第29—31页；里卡多·德拉·谢尔瓦的文章，见比森特·帕拉西奥·阿塔德等《接近真实的西班牙内战史，1936—1939》，第61—64页；弗朗西斯科·拉尔戈·卡瓦列罗，《共和国时期的文稿》，第254—261页；桑托斯·胡利亚，《西班牙人民阵线的起源，1934—1936》，第27—55页。

- 35 一九三五年九月十九日《国际新闻通讯》。
- 36 一九三五年二月七日《泰晤士报》。
- 37 引自温斯顿·丘吉尔，《武装与公约》，第249页。另请参阅丘吉尔《风云际会》，第137—141页。“英国政府不仅接受了百分之三十五这个舰船吨位的比例，而且它还同意，应当允许德国拥有相当于英国兵力百分之四十五的潜艇。”（戈登·A.克雷格，《德国，1866—1945》，第686页）关于英国政府签订英德海军协定的理由，见坦普尔伍德子爵（塞缪尔·霍尔爵士），《纷乱的九年》，第139—148页。霍尔是当时的外交大臣。
- 38 迈斯基，《谁帮助了希特勒？》，第64页。
- 39 贝洛夫《苏联的外交政策》，第一卷，第133—134页。
- 40 见丘吉尔《风云际会》，第189页。
- 41 一九三五年九月十九日《国际新闻通讯》。
- 42 同上。
- 43 见理查德·克罗斯曼编的《令人失望的上帝》，第54—55页。
- 44 《共产国际简史》，第408页。
- 45 格奥尔吉·季米特洛夫，《统一战线：反对法西斯主义和战争的斗争》，第75页。
- 46 卡特尔，《共产主义与西班牙内战》，第30页。

外国干涉

从苏联外交政策的角度看，人民阵线这一策略取得了明显的效果。一九三六年初的几个月，在法国和西班牙，共产党人不仅与它以前的对手社会党人，而且还与温和的中间党派联合起来参加了大选，大选在广泛的基础上进行，结果导致自由派政府上台执政。

当然，德国应当已经警觉地注意到一项旨在通过增强并扩大苏联与西欧的政治和军事联系来建立一条反德阵线的策略所取得的成效，但是，直到一九三六年七月西班牙爆发军事叛乱，才出现了以站在叛军一方直接进行干涉的方式反击这种对其计划的威胁的机会。与普遍持有的看法相反，武力对抗爆发之前，德国并没有向叛乱的组织者做出军事援助的承诺。根据一九五〇年美国国务院在华盛顿公布的德国外交部档案中与西班牙有关的文件，直到叛乱爆发几天后，希特勒才答应提供援助，当时佛朗哥将军派遣一名侨居西属摩洛哥的德国商人和当地的纳粹领导人前往德国请求给予飞机和其他支援。¹佛朗哥的请求很快就得到了同意，因为根据纳粹方面的原始资料，德国飞机在内战的头几个星期便加入了佛朗哥将军一方的行动，或者从西属摩洛哥运送摩洛哥军团和外籍军团到内地，或者执行轰炸任务。²

一九四六年，在纽伦堡审判的法庭上，希特勒的空军司令赫尔曼·戈林说：

西班牙内战爆发时，佛朗哥打电话向德国求助，请求给予支援，特别是空军的支援。人们不应忘记，佛朗哥和他的部队驻扎在非洲，由于海军掌握在共产党[左翼势力]手中，他无法使部队渡过海峡。……决定性的因素是，首先，必须使他的部队过海到达西班牙。

元首认真考虑了这个问题。我极力劝他无论如何都要支援，第一，为了防止共产主义在那个地方继续蔓延；第二，利用这个机会测试一下年轻的德国空军各个方面的技术水平。

98

经元首许可，我派出了大部分运输机以及一些试验性的战斗机、轰炸机中队和高射炮兵；这样我就有机会弄清，在实战的条件下，装备是否符合任务要求。另外，为使个人可以积累一些经验，我注意形成一种连续的轮换，也就是说，不断把新人派出去，同时把另一些人召回来。³

即使德国实际上的确利用西班牙这个战场为后来的战争训练了人员并且试验了新式武器，戈林在内战初期也根本不可能有这种想法。正如安赫尔·比尼亚斯在他的重要著作《纳粹德国与七月十八日》中所指出的那样，希特勒在一九三六年七月提供的第一批援助由汉莎航空公司的飞行员所驾驶的二十架容克—52型运输机组成。⁴“确实派出了六架海因克尔—51式战斗机，但那只是为了护航……而且除了自卫之外禁止飞行员参加战斗。……一九三六年十月决定分批派遣作战飞机，十一月开始调动它们，也就是说，时间要晚得多。”⁵

德国援助佛朗哥将军有双重目的。一方面，尽管担心在还没有为一场大规模战争准备好的时候由于深深卷入西班牙内战造成复杂的国际局面，⁶它仍然希望取得战略优势为即将在西欧进行的斗争做准备。内战刚一开希特勒本人就向一些纳粹党的领导人和外交官表示：“在形成法国与北非之间的陆地桥梁[的西班牙]，非布尔什维克政府的存在应当对我们有利。”⁷他还在另外一个场合声称，“他唯一的目的是防止西班牙的外交政策在内

战结束以后被巴黎、伦敦或莫斯科所左右。这样的话，在因欧洲的重组而进行的最后交锋中，西班牙将不会成为德国的敌人，如有可能，还会成为德国的朋友。”⁸

99 在一封日期表明为一九三七年五月一日的德国外交部信函中，德国大使对佛朗哥将军说：“毫无疑问，一场由于我国的干涉而获胜的战争[过后]，一个在我国的帮助下稳定了社会秩序、恢复了经济发展的西班牙，不仅将在未来成为我国非常重要的原材料产地，而且将成为我国长期可靠的朋友。”⁹另一方面，希特勒肯定希望西班牙人民阵线的失败和右翼势力的复兴削弱法国的人民阵线并使某些法国势力得到加强。这些势力反对妨碍德国向东方扩张的政策并且认为法苏互助条约很可能使法国卷入一场斗争，万一德国在斗争中失败，将会导致共产主义在欧洲取得统治地位。一篇文章提出了相当一部分法国人的典型看法：“莫斯科需要的是一场法国军队与德国军队之间的战争。在某个时候，以某种借口，苏联希望能够迫使我们不得不把法国军队布置在[德国]边境从而达到一箭双雕的目的，既削弱了德国可怕的军事力量，又使我国陷入一场对外战争，这场战争将敲响欢迎布尔什维克革命时刻到来的钟声。”¹⁰

苏联并非没有看到德国干涉西班牙所产生的种种威胁。但是，由于唯恐引起西方国家温和党派——它们的身上寄托着苏联建立反德阵线的希望——的敌意，它不愿给对其公开资助世界革命的指责提供口实、添枝加叶。一九三六年八月二十三日，它正式加入法国为防止冲突扩大而提出的国际不干涉公约，¹¹与加入该公约的其他国家一起保证，不向西班牙运送武器。“如果苏联不同意法国提出的中立政策，”一份共产党报纸评论道，

“那将使[法国]政府陷入非常严重的困境，而且在很大程度上帮助了法国和英国的法西斯分子，同时有利于德国和意大利政府对西班牙人民采取行动。……如果苏联政府对当前欧洲一触即发的形势采取进一步激化的措施，那将受到各国法西斯分子的欢迎，并将造成民主力量的分裂，从而直接为发动针对以苏联为代表的布尔什维主义的所谓‘预防性战争’铺平道路。”¹²

苏联对西方国家民主舆论的关心与叛乱发动者根据公布的共产国际“秘密”文件所提出的“共产国际一九三六年夏天密谋在西班牙建立一个

苏维埃政权”¹³的指控有矛盾，因为，建立这样一个政权的尝试显然将会破坏克里姆林宫为与西方民主力量建立一个牢固同盟所做的努力。仅仅由于这个原因——更不必说共产国际根本没有必要的力量这一事实，就可以对叛乱者的指控完全不予考虑。实际上，甚至右翼的天主教西班牙争取自治权利联盟领导人何塞·马利亚·希尔·罗夫莱斯都承认：“我决不相信当时有共产党暴动的可能性，更不必说共产国际直接参与。……面对希特勒分子的威胁，斯大林愿意与英国和法国建立友好关系。法苏条约和第三国际[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的决议证明，与遏制德国帝国主义的政策相比，他把欧洲革命置于比较次要的地位。而且，没有什么能比向西班牙输入一个共产党政权在西方民主国家中激起更大的敌意了。……真正的危险并不是隐藏在一场精心组织的共产党的暴动中，而是隐藏在到处盛行的无政府主义状态中。我与阿萨尼亚先生最后一次谈话时……他没有向我掩饰人民阵线群众的不可阻挡之势使他产生的恐惧。”¹⁴

构成指控“共产党人一九三六年夏天密谋在西班牙建立一个苏维埃政权”的依据的那些“秘密”文件不仅最终被支持左派的赫伯特·R.索思沃思揭露出来是伪造的，¹⁵西班牙最重要的内战历史学家之一、军事叛乱的支持者里卡多·德拉·谢尔瓦也认为是这样的，他说，它们是西班牙右翼作家托马斯·博拉斯起草的。“因此，”谢尔瓦断言，“这些文件肯定是伪造的……[但是]它们被西班牙和国外的宣传人员非常有效地利用了。”不过，他告诫人们，“否认它们的真实性”并非否认当时存在的共产主义威胁以及对共产主义的极度恐惧。¹⁶此外，他根据西班牙共产党的原始文件而提出的证据显示，共产党并没有放弃它的革命目标，因此，他坚持认为，一九三六年上半年，西班牙共产党“有效地增强了无产阶级的革命积极性”。¹⁷

尽管存在着这样的证据，尽管内战之前他们为了附和無政府工团主义者和社会党左派的激进倾向不时使用带有明显革命特征的语言，尽管他们公开主张建立工农联盟作为“未来的权力机构”，¹⁸同时承认无产阶级专政是共产党的终极目标，¹⁹尽管他们曾经警告自由派政府，若不加快进行土地改革，农业工人将以武力把大地主的土地分掉，²⁰但是，共产党人仍然谨慎地坚持与温和派结盟。“人民阵线必须继续存在。”何塞·迪亚斯写道，

“我们与左翼共和派仍然有很长的路要走。”²¹另外，尽管他们要求清洗军队²²并且就在武装叛乱爆发之前还威胁说，除非政府履行人民阵线的竞选纲领，他们将为建立一个具有“一般革命特征”的政府而奋斗，²³但是，这种表达与其说是旨在立即激发一场翻天覆地的社会变革，不如说是为了抚慰民众的革命情绪并且促使政府对右派采取行动。实际上，在内战爆发前马德里建筑工人罢工——这场罢工使政府陷入严重的困境，而且具有发展成为一场与雇主和政府的革命性对抗的危险——期间，共产党人曾竭尽全力劝说无政府工团主义者停止罢工。²⁴

毫无疑问，对于克里姆林宫来说，军事叛乱及其引起的广泛的社会革命在一个令人尴尬的时刻发生了。此外，正如前西班牙共产党领导人费尔南多·克劳丁多年以后所说：“西班牙革命——除了一九一九年短命的匈牙利苏维埃共和国之外，这是共产国际存在期间发生在欧洲的唯一一场革命——的爆发使这个‘世界政党’的领导人措手不及。”²⁵他们陷入了令人再难受不过的进退两难的境地。他们怎么可能在西班牙支持革命运动的同时继续在其他国家向温和派舆论求助呢？

如同我们很快就将看到的那样，为了化解这种困境，尽管正式加入了不干涉公约，斯大林仍于一九三六年八月二十八日决定，在宣布中立的幌子下谨慎地进行军事干涉，同时继续推行温和的政策，在表面上制止革命性剧变的发生。

他的干涉决定与希特勒的相比姗姗来迟，实际上，比贝尼托·墨索里尼的也要晚，因为，根据意大利法西斯党方面的原始资料，意大利的飞机和军舰在八月初就行动了。²⁶与希特勒的情况一样，直到战事即将爆发，墨索里尼没有给过佛朗哥将军或莫拉将军任何有案可查的援助承诺。确实，意大利政府曾于一九三四年与西班牙君主主义者领导人签订过一份协议，答应在西班牙爆发内战时提供军事援助。但是，正如密谋参与者之一利萨尔萨·伊里瓦伦所指出的那样，协议没有什么结果，因为，一九三六年七月的军事叛乱不是与墨索里尼谈判的军官发动的。不过，这份协议有助于在罗马形成“某种支持叛乱的气氛”，并且促使墨索里尼在稍稍犹豫之后于七月二十七日决定向叛军提供援助。另一方面，意大利外交部长加莱亚佐·齐亚诺伯爵在没有首先与其上司磋商的情况下从一开始就表示同意援

助叛军。

这一点在一九六七年得到马德里的君主主义报纸《阿贝赛报》驻伦敦记者路易斯·博林的证实，七月十八至十九日把佛朗哥将军从加那利群岛送往西属摩洛哥指挥叛乱的那架哈维兰快速飞龙小型客机就是博林包租的。在他的《西班牙：重要的年代》一书中，博林复制了一份由佛朗哥将军签署（并由里斯本的圣胡尔霍将军连署，在飞往西班牙指挥叛乱途中不幸遇难之前，圣胡尔霍将军被指定为叛乱领导人）的迄今为止没有公布过的文件，文件授权博林在英国、德国和意大利紧急洽谈购买飞机和军需物品。博林七月二十一日飞到罗马，在那里，他得到前西班牙国王阿方索的侍从武官比亚纳侯爵的帮助。尽管外交部长齐亚诺同情地接受了他们提出的援助请求，这一请求最初仍被墨索里尼拒绝了——意大利驻佛朗哥方面的大使罗伯托·坎塔卢波证明情况确实如此。²⁷几天后，墨索里尼终于同意提供援助，接着，十二架萨沃亚—81式轰炸机于七月三十日被派往西属摩洛哥，不过，只有九架安全到达目的地。²⁸

一九六八年，何塞·马利亚·希尔·罗夫莱斯对购买第一批意大利飞机的情况作了下面这种描述：“当暴动发生因而必须建立一座从摩洛哥向半岛运送军队的空中桥梁时，意大利政府发出通知，购买飞机的协议应当与一九三四年[罗马]协议的某位签署者签订。戈伊科切亚[西班牙复兴运动领导人，参与签订了罗马协议]、赛恩斯·罗德里格斯和顺苏内吉先生带着莫拉[将军]的具体指示火速赶往意大利至关重要。几乎就在佛朗哥将军授权的路易斯·安东尼奥·博林谈判遇到困难的时候，他们成功地进行了购买战争物资的初步谈判。七月二十五日，他们在罗马会见齐亚诺伯爵，双方商定了运输机的装运事宜。到八月一日，已经有十四架意大利的萨沃亚—马尔凯蒂式军用飞机到达纳祖尔[西属摩洛哥梅利利亚附近的机场]，接着，在八月二日，到达同一机场的飞机数量是二十四架。一九三四年的那份协议以这种方式履行了。”²⁹一九四〇年出版的官方（亲佛朗哥）《西班牙圣战史》也声称，莫拉将军知道一九三四年安东尼奥·戈伊科切亚进行的谈判，因此，当博林的谈判遇到困难时，他要求戈伊科切亚赶往意大利首都协助已在那里的人。《西班牙圣战史》接着写道，直到此时，由于不太了解军事叛乱的意义所在，意大利政府对于提供援助仍然心存疑虑。“已于

102

一九三四年就一场可能发生的反革命运动与齐亚诺达成协议的戈伊科切亚现身罗马消除了所有疑虑。”³⁰

尽管日期稍有出入，从四种原始资料中得到的上述证据反驳了法国人民阵线政府的空军部长皮埃尔·科特的证词。科特证词的大意是，意大利运送飞机的决定是在发生军事叛乱的七月十七日那一天之前做出的。³¹上述证据还证明，法国外交部长伊冯·德尔博斯一九三六年八月六日对美国驻巴黎临时代办所说的那些话也没有根据，德尔博斯说：“至少早在七月二十日，驾驶着飞机的意大利空军飞行员已经参战执行任务。”³²

下面这段内容摘自德国驻罗马大使乌尔里希·冯·哈塞尔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十八日写给德国外交部的一份报告，报告论述了德国和意大利在西班牙内战中的利益，这段内容说明了意大利干涉西班牙的动机。它还解释说，因为从一九三五年意大利入侵埃塞俄比亚起，墨索里尼与西方民主国家之间出现了隔阂，因为如果欧洲爆发普遍的战争法国从北非调兵的路线将受到威胁，所以，意大利的卷入对德国有利：

由于两国都在试图阻止布尔什维主义在西班牙或加泰罗尼亚获胜，因此，德国和意大利在西班牙动乱中的利益一致。但是，虽然德国除此之外并不追求任何直接的外交利益，罗马却肯定要为将西班牙纳入其地中海政策的轨道而努力，至少也要为阻止西班牙与法国和/或英国之间的政治合作而努力。为此需要：佛朗哥的直接支持；巴利阿里群岛的一个立足点，除非建立一个与意大利友好的西班牙中央政府，估计不会自动撤离这个立足点；佛朗哥对意大利的政治承诺以及法西斯主义与西班牙新建政治体制的紧密联系。……

对于上述总体政策，在我看来，如果意大利继续深度介入西班牙事务，德国有充分的理由感到满意。就意大利与法国和英国的关系而言，西班牙内战所起的作用可能与阿比西尼亚战争的作用相似，明显造成了大国之间现实利益的对抗，从而避免意大利落入西方列强的圈套并为它们的阴谋所利用。为在西班牙拥有决定性的政治影响力而进行的斗争使意大利与法国之间天生的矛盾暴露出来；同时，作为西地中海的大国，意大利的地位与英国的地位发生了冲突。意大利将更加

清楚地认识到与德国并肩对抗西方列强是明智的——尤其是考虑到西欧与中欧之间未来在完全平等的基础上达成某种普遍谅解的理想时。在我看来，由这种局面所产生的我们的指导原则是，我们应当让意大利在它的西班牙政策中扮演主角，但是，我们同时应当以非常积极的友好态度协助执行这项政策，以免出现可能损害德国的直接或者间接利益的结果，无论这种结果是以西班牙民族主义者失败的形式还是以英意两国在战事继续胶着的情况下直接达成谅解的形式出现。如果法西斯主义在承担创造某种政治社会实体——迄今为止它背面贴着纯军事和否定性的反赤化标签——的艰巨任务方面一马当先，我们肯定没有理由表示嫉妒。……如果在法国南边出现了某种因素——一种妨碍法国从非洲调兵并在经济领域充分考虑我们的需要的因素，它摆脱了布尔什维主义并且破除了西方列强的霸权，另一方面却与意大利结为盟友，迫使英法两国停下来思考，我们必须认为这种因素值得期待。³³

由于意大利干涉带来的利益，德国鼓励意大利在内战的过程中向西班牙大规模投入军事力量。对于德国来说，比前面提到的那些利益更重要的是，意大利转移了它对奥地利和捷克斯洛伐克的注意力，吞并这两个国家是希特勒的东欧计划最终取得成功的关键。并非巧合的是，一九三八年三月，在意大利——它曾于一九三四年挫败一场纳粹政变，保卫了奥地利的独立——默许的情况下，希特勒占领了奥地利。到那时，意大利已经深深陷入了西班牙内战，以致没有德国的帮助就无法脱身。

另一方面，希特勒小心翼翼地将德国的干涉局限于数量有限的空军中队和炮兵、坦克部队，并不理睬向西班牙派遣大量地面部队的建议。一九三六年十二月五日，他派驻佛朗哥将军方面的大使威廉·福佩尔建议：“为了阻止布尔什维主义首先控制一半西班牙然后控制整个西班牙……需要一个强大的德国师团和一个强大的意大利师团，[它们]良好的训练和出色的指挥仍然可以迅速取得决定性胜利，几个月后，即使派来更强大的部队，或许再也不可能取得这种胜利了。”³⁴这个建议没有被采纳。希特勒在西班牙的政策精明而且深谋远虑。一方面，他小心翼翼地防止西班牙内战在他还没有准备好时变成一场大规模的欧洲战争；另一方面，他希

望延长这场战争以使西欧各国继续存在隔阂从而将意大利更牢固地与德国绑在一起。在一九三七年十一月五日举行的一次秘密会议上，他概述了他的战争计划并由其副官弗里德里希·霍斯巴赫上校作了记录，正如他所透露的那样，从德国的观点来看，佛朗哥的彻底胜利并不是一种理想状况，德国宁愿“这场战争继续进行”从而“维持地中海的紧张局面”。³⁵简单地说，正如格哈德·L.魏因贝格恰如其分地说明的那样：“一场佛朗哥无法迅速取胜的战争拖延下去正好符合希特勒所阐释的德国利益的要求。可以通过零零星星而非大规模地提供援助有效地达到这个目的。”³⁶

尽管某些历史学家否认希特勒故意拖延西班牙内战，³⁷安德烈·布里索在他那本关于希特勒的德国情报局长卡纳里斯海军上将的书里非常清楚地描述了德国的政策：“卡利纳斯的头脑里对希特勒西班牙政策的定位没有疑问，这种定位是持续向佛朗哥提供适度的援助——足以使其感恩戴德（允许德国在伊比利亚半岛获得大量经济利益）并且阻止共和派获胜——但又不能多到使这位叛军首领迅速取胜。另一方面，希特勒希望‘维持地中海的紧张局面’为的是达到一个双重目的：吞并奥地利和捷克斯洛伐克。在听任墨索里尼越来越深地陷入西班牙内战的同时，促使其不停地加大赌注从而削弱意大利在欧洲大陆的實力，直到迫使其乖乖就范，在不可能表示反对的情况下，首先接受德国吞并奥地利，然后接受德国吞并捷克斯洛伐克。”³⁸

尽管希特勒和墨索里尼在西班牙内战爆发之初仅仅稍做犹豫便答应了佛朗哥将军恳请援助的要求，斯大林在采取行动之前却非常谨慎地动摇不定。瓦尔特·克里维茨基是苏联派往西欧的一名以海牙为总部的高级特工，一九三七年底叛逃西方，他证明：

八月下旬，三名西班牙共和国高级军官终于受到苏联的接待。他们是来购买战争物资的，他们表示愿意用西班牙的黄金支付巨额货款。……[为了]掩盖这笔交易，一九三六年八月二十八日那个星期五，斯大林通过苏联贸易人民委员颁布了一项法令，禁止“向西班牙出口、转口或者运输各种类型的武器、军火、战争物资、飞机和军舰”。……共产国际的同路人及其唤起的民众私下里已经对斯大林没

有立即援助西班牙共和国感到失望，现在又听说他要与莱昂·布鲁姆的不干涉政策同流合污。实际上，斯大林正在偷偷地援助西班牙共和国。[在一次政治局特别会议上，斯大林说]法国和英国都不会心甘情愿地听任把守着地中海进出口的西班牙被罗马和柏林所控制。一个友好的西班牙对巴黎和伦敦至关重要。不必公开进行干涉，而是巧妙地利用其作为军用物资提供者的地位，斯大林认为有可能在西班牙建立一个受他控制的政权。做到这些他就可以赢得法国和英国的尊重，争取由它们提出实际结成同盟的建议，然后，或者接受这个建议，或者——用它作为讨价还价的筹码——达到其潜在的既定目标，与德国签订一项条约。³⁹

这是斯大林关于干涉西班牙的中心思想。不过，他也是因为需要向苏联那些可能对他大规模清洗并且枪毙布尔什维克老战友不满的外国朋友做出交代而采取行动。西方世界并没有意识到，当时斯大林对权力的控制多么微妙，愿意为他那些血腥行为进行辩护的外国共产党人和国际著名的理想主义者对他作为一个独裁者继续存在多么重要。一点也不过分地说，他们的支持对他来说生死攸关。因此，不去保卫西班牙共和国……可能使他失去他们的支持。⁴⁰

一九三八和一九三九年，克里维茨基发表了一系列揭露性文章，后来又于一九三九年出书揭露了一些事情。⁴¹由于此后他被共产党和共产党的支持者斥为江湖骗子，⁴²而且由于本书将多次引用他的文字，所以，引述下面这段话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这段话引自受到广泛尊敬的著名苏联问题学者鲍里斯·尼古拉耶夫斯基在一九四一年克里维茨基于美国首都华盛顿神秘自杀之后所写的一篇文章：⁴³“[克里维茨基的]能力和智力确实出类拔萃。他断断续续地在[设在法国、荷兰和意大利的]共产国际谍报组织、苏联军事情报机构（所谓四局）和国家政治保卫总局^①[内务人民委员部]担任要职。……在这期间，没有什么人他没见过，没有什么秘密他没听说过。……[在他叛逃之前的]最后三年，克里维茨基在国家政治保卫总局

① 原书误为国家政治保卫局。下同。

的……对外部门工作，是令人生畏的西欧处的三位负责人之一。关于这个部门——它的任务和他的工作性质——外国几乎没有概念。他在国家政治保卫总局的组织中扮演着极其重要的角色，对苏联整个政策的制定具有很大的影响。”⁴⁴

指责克里维茨基是江湖骗子的宣传运动成功地围绕着他制造了一种怀疑的气氛，这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为什么一些历史学家甚至在多年以后仍以谨慎的态度对待他所提供的证据。例如，休·托马斯认为，在他那部出版于一九六一年的西班牙内战史的第一版中有必要提醒读者，“克里维茨基所提供的证据除经证实之外应被认为带有偏见”，而且，“他那本书和发表在《星期六晚邮报》上的那些文章……可能是由某个著名的美国苏联问题专家撰写的，后者通常被认为是联邦调查局……资助的”，⁴⁵尽管在四年后出版的修订版本中，他把这种说法修改成为“克里维茨基所提供的证据一般可以被接受，虽然他的细节有时不太准确”。⁴⁶

著名历史学家安赫尔·比尼亚斯是西班牙外交部的一名官员，这个僵化死板的人在写给加泰罗尼亚作家胡安·利亚尔奇的一封信中说：“我恳求您不要关心仍在疯传的那些说法，它们大概的意思是，内格林的行为、[他]运送黄金[去莫斯科]及其[处理]共和国财政的方式是由苏联贸易专员斯塔舍夫斯基的操控造成的。不过，仍有像博洛滕那样的绅士，他们拒绝抛弃投奔西方的苏联叛逃者所编造的传奇故事，这些叛逃者并不了解发生在西班牙的事情。”⁴⁷

尽管克里维茨基的书籍和文章里存在着某些伊丽莎白·波列茨基——她是被暗杀的苏联特工伊格纳斯·赖斯的妻子——所谓的“错误和夸大之处”，⁴⁸但是事实上，正如后来在他的书中显示的那样，克里维茨基是第一个揭露苏联首席军事顾问扬·K.别尔津将军、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秘密警察）特工头子亚历山大·奥尔洛夫和财政部长胡安·内格林的苏联顾问阿尔图尔·斯塔舍夫斯基在西班牙所从事的活动的人，他还第一个揭露了国际纵队富有魅力的指挥官埃米利奥·克莱贝尔将军的真实姓名。不过，正如我们所知，更重要的仍然是，他还宣称，西班牙内战期间，在寻求与英国和法国结盟的同时，斯大林头脑里有一个替代方案——与德国签订一项条约。克里维茨基进一步宣称，早在一九三六年十二月，斯大林就

授权其派往柏林的贸易代表达维德·坎杰拉基，“尽一切力量与希特勒达成一项秘密协议”。⁴⁹尽管谈判没有结果，克里维茨基的说法仍在几年之后得到验证，虽然他的说法与苏联一贯热情支持集体安全的表态相抵触。欧洲最重要的苏联问题学者之一伦纳德·夏皮罗在一九六〇年写道：“这些非常秘密的谈判首先被克里维茨基揭露出来。现在，[德国外长]诺伊拉特一九三七年二月十一日写给[帝国银行行长]沙赫特的一封私人信件证明，确实举行过这些谈判。这封私信清楚地显示，坎杰拉基以斯大林和莫洛托夫的名义对与德国达成一项协议进行了试探，但是遭到希特勒的断然拒绝。这份文件保存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被盟军缴获的德国外交部档案中。”⁵⁰

诺伊拉特在同一封信中解释了希特勒不愿开始谈判的原因：“说到与苏联政府开始会谈的可能性，我与元首的意见一致，我认为，现在这个时候不可能谈出什么结果，而且正好相反，这种会谈顶多会被俄国人用来达到他们一直谋求的与法国建立某种更紧密的军事同盟的目的，如有可能，还要达到与英国进一步恢复友好关系的目的。”⁵¹

五十年代初期，对于某些历史学家来说，斯大林早在一九三六至一九三七年就开始为与德国达成某种政治谅解进行试探的说法不可接受。爱德华·哈里特·卡尔一九五一年写道：“许多苏联流亡者出版的书籍包含了一些对德苏秘密关系，尤其是三十年代的德苏关系耸人听闻的描写，但是，这些描写经常相互矛盾而且尚未得到可靠证据的证实。”⁵²因此，回忆深谙内情的克里维茨基早在一九三八年三月所写的一篇文章将是十分有趣的，这篇文章当时几乎没有引起人们的注意：

一九三五年秋天……斯大林似乎觉得一个成功进行谈判的有利时机正在来临。斯大林的乐观态度可以用德国以优惠的条件新增了对苏联的贷款这一事实来解释。于是，人们立即在政治局听到了斯大林十分招摇的声音：“好啦，如果希特勒给了我们这些贷款，我们怎么还能认为他要对我们发动战争？”决定向苏联提供贷款确有其事，但是，其他问题仍没有变化。不过，斯大林充满信心而且不会放弃。一九三六年秋天，斯大林好像再次认为希特勒将同意谈判。在政治局的会议上，仔细审查了预备好的所有资料。……为谈判进行准备的工

作交给了苏联贸易代表坎杰拉基和国际事务人民委员部的一个[柏林]常驻代表。……一九三七年春天，坎杰拉基与前面提到的那个国际事务人民委员部的特派员一起前往莫斯科。当他们到达那里时，政治局的气氛为之一振；所有人都在谈论即将发生的重大事件，它将使我国的外交政策发生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变。……在欧洲，希特勒和斯大林将要玩弄一个大花招。现在还不能说最终谁将骗到谁。⁵³

但是，当时人们对这些幕后活动一无所知，而且在一九三四至一九三八年间，苏联还是集体安全和国际联盟的主要拥护者。我们不能断言斯大林的最终目的如克里维茨基所说是与希特勒签订一项条约，也不能断言他仅仅是把这一选择当作集体安全万一无效所采取的预备措施。我们知道，集体安全肯定无效，而且一点也不令人感到意外，造成其无效的主要原因是苏联的支持，因为，总的来说，绝大多数欧洲政治家内心担忧：集体安全可能导致与德国的战争，纳粹政权的垮台将使欧洲布尔什维化。如同我们将会看到的那样，英法两国对西班牙内战以及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之前另外几次左右了欧洲形势的重大事件所采取的政策根源正是这种担忧。

由于斯大林对在西班牙冒险的小心谨慎，直到一九三六年十月，第一批苏联大炮、坦克和飞机才与飞行员和坦克驾驶员一起到达西班牙。尽管所有说法恰恰相反，但是，正如我在战后得以与之随意交谈的何塞·米亚哈将军、塞瓦斯蒂安·波萨斯将军和伊格纳西奥·伊达尔戈·德·西斯内罗斯等高级军官所证实的那样，它们不是在那之前到达的。例如，空军司令伊达尔戈·德·西斯内罗斯说，第一批苏联轰炸机、坦克和大炮十月到达西班牙，第一批战斗机十一月二日到达西班牙。这一情况后来得到共产党控制的第五团指挥官胡安·莫德斯托的证实。莫德斯托写道，第一批苏联坦克十月下旬到达，十一月，苏联飞机“结束了德国和意大利飞机肆无忌惮地轰炸西班牙首都的局面”。⁵⁴

苏联直到七十年代才公布了估计运往西班牙的苏联武器总数。一份一九七四年的苏联原始资料说：“苏联送给西班牙政府八百零六架军用飞机，主要是战斗机，三百六十二辆坦克，一百二十辆装甲车，

一千五百五十五门大炮，大约五十万支步枪，三百四十支榴弹发射器，一万五千一百一十三挺机关枪，十一万多颗炸弹，大约三百四十万发子弹，五十万颗手榴弹，八亿六千二百万个弹壳，一千五百吨黑色火药，鱼雷艇，防空探照灯装置，汽车，无线电台，鱼雷和燃料。这些战争物资没有全部到达目的地，因为……苏联从其他国家租用的一些船只被意大利人击沉或者进入叛军控制的港口。”⁵⁵同样发表于一九七四年的另一份原始资料提供了内战期间苏联“设法运往”（“удалось направить”）西班牙的武器的以下分类（根据由苏联军事历史研究所提供的官方统计数字）：六百四十八架飞机，三百四十七辆坦克，六十辆装甲车，一千一百八十六门大炮，两万零四百八十六挺机关枪和四十九万七千八百一十三支步枪。⁵⁶

关于苏联对西班牙的其他军事援助，左派控制区的国防部总参谋部军事行动负责人塞希斯孟多·卡萨多证实，在九月份的下半月，“国防部出现了一些苏联将军和军官，据说他们是‘军事专家’而且被称为‘友军顾问’”，接着，从那一天开始，轻型武器陆续到达。⁵⁷另一方面，马德里保卫战期间的参谋长、与苏联军事顾问工作关系密切的比森特·罗霍说：

“具有作战能力的苏联专家在第一批武器运到之前于十月份到达。”⁵⁸

尽管俄国人没有向西班牙派遣苏军地面部队，但是，在十一月的第二个星期，国际纵队的第一批部队便参加了军事行动。国际纵队由共产国际倡议组建，⁵⁹据加里波第^①旅旅长卡洛·彭基耶纳蒂说，除了极少数例外，国际纵队的指挥官全部都是共产党员。⁶⁰另外，化名加略的意大利共产党员路易吉·隆哥——他是国际纵队第十二旅政委，多年后接替去世的帕尔米罗·陶里亚蒂成为意大利共产党领导人——说，一九三六年十月十四日，第一批五百名志愿人员到达他们的训练基地阿尔瓦塞特。⁶¹据苏联方面估计，可能有来自五十三个国家的多达四万两千名反法西斯人士作为志愿者前往西班牙。⁶²志愿者当中有一些俄国流亡者，主要是居住在法国的俄国流放者，据苏联作家Л.К.什卡伦科夫说，他们“并不隐瞒在西班牙参加反法西斯战斗这一事实，他们想为自己赢得原谅和返回祖国的权利”。⁶³

在提供武器及其手下一些最好的外国干部的过程中，斯大林小心翼翼

① 朱塞佩·加里波第（Giuseppe Garibaldi, 1807—1882），意大利民族统一运动著名领袖。

地避免与意大利和德国发生严重的冲突。克里维茨基证实，斯大林“特别告诫他的政治委员，为了消除使苏联政府卷入战争的一切可能，苏联对西班牙的援助必须以非官方的名义秘密进行。由这些政治委员传达下去的他在那次向所有参加这一行动的高级军官发号施令的政治局会议上所说的最后一句话是：‘远离炮火！’（подальше от артиллерийского огня）”⁶⁴“不过，在地理上距离战场如此遥远的苏联具有严重的后勤问题，因此，它在向西班牙供应武器的过程中承担着巨大的风险。“任何飘扬着苏联或者共和国国旗的船只都有可能受到法西斯潜艇或飞机的攻击，从而被佛朗哥击沉或掳走。”前面援引过的一份苏联原始资料写道，“从西班牙内战爆发到一九三七年五月四日，苏联船只受到八十六次攻击。‘共青团号’‘季米里亚泽夫号’和‘布拉戈耶夫号’被击沉，‘彼得罗夫斯基号’‘第二个五年计划号’‘联盟舵手号’和‘斯米多维奇号’被掳走并被带到叛军所控制的港口。无论飘扬着什么旗帜的船只，只要怀疑船上装载着苏联运往西班牙共和国的货物，法西斯分子就会攻击并且击沉它们。”⁶⁵

有证据表明，尽管斯大林起初希望共和派军队迅速获胜，但他最终作出判断，将这场战争拖延下去有利可图。据前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特工头子亚历山大·奥尔洛夫说，一九三七年夏天，一位从莫斯科返回西班牙的苏联将军告诉他，政治局对西班牙采取了一种策略。“在那之前，”奥尔洛夫写道，“政治局的政策是，用武器装备、飞行中队和坦克部队尽力帮助西班牙共和国政府迅速战胜佛朗哥。但是，政治局现在[已经]得出结论，如果交战双方都不能取得压倒优势，如果西班牙内战尽可能长期打下去从而使希特勒更长久地陷在那里，对于苏联更加有利。……政治局这种马基雅维利式的计谋让[我]大为震惊，它想让西班牙人民长期流血以赢得时间。”⁶⁶

尽管难以想象苏共政治局的马基雅维利式计谋能让奥尔洛夫这样一个冷酷老练的特工大为震惊，但是，他对斯大林决定尽量使西班牙内战拖延下去的说法符合共产国际在西班牙的策略。

注释：

- 1 美国国务院，《一九一八至一九四五年德国外交政策文件》，D辑，第三卷，第1—2页。关于一项在大量德国文件和口头证词的基础上对内战爆发最初几天佛朗哥将军争取获得希特勒援助的努力所作的认真细致的研究，见安赫尔·比尼亚斯《纳粹德国与七月十八日》，第312—401页。据比尼亚斯说，希特勒在七月二十五至二十六日夜间接定提供援助。
- 2 见维尔纳·博伊梅尔堡《为西班牙作战：神鹰军团的故事》，第22—29页；武尔夫·布莱，《西班牙飞行员的书》，第23—27和31—32页；马克斯·霍约斯，《佩德罗和巴勃罗们：在西班牙飞行、生活和作战》，第15—22页；奥托·申普，《专制的西班牙》，第69—71页；鲁德·施塔赫，《执行秘密任务的军队》，第10—26页；汉内斯·特劳特洛夫特，《在西班牙当战斗机飞行员》，第29页；德国报刊发表的关于德国干涉的官方报道（见一九三九年五月三十一日英国《每日电讯报》）；一九三九年五月由德国最高统帅部发行的题为《我们在西班牙作战》的《国防军》特刊；一九三九年五月三十一日《民族观察家》。根据上面提到的德国报刊所发表的关于德国干涉的官方报道，一九三六年十月德国派出了第一支装甲特遣部队。它编制完整，由两个坦克连和一个运输连组成，除了参加战斗之外，还为西班牙人建立了一所学校，教他们使用装甲车辆、枪支大炮和火焰喷射器。根据同一报道，一九三六年十一月，一支由战斗机、驱逐机和侦察机组成的完整的空军部队到达西班牙，另外还有情报人员和防空部队。在上面提到的《国防军》特刊所发表的一篇文章里，施佩尔将军说，一九三六年十一月初，六千五百名德国“志愿军”到达西班牙。
- 3 国际军事法庭，《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对德国主要战犯的审判》，第九部分，第93页。
- 4 据比尼亚斯说，七月二十八日，这批飞机中的第一架到达摩洛哥的得土安，飞机驾驶员阿尔弗雷德·亨克“用他的飞机满载部队……每天在得土安与塞维利亚之间往返几次”（比尼亚斯，《纳粹德国与七月十八日》，第385—386页）。
- 5 同上，第353页。
- 6 见德国外交部代理国务秘书汉斯·海因里希·迪克霍夫所提交的备忘录，收入《一九一八至一九四五年德国外交政策文件》，D辑，第三卷，第155—156页。另请参阅《一九一八至一九四五年德国外交政策文件》，D辑，第三卷，第168、222、230、265和391—392页；恩斯特·冯·魏茨泽克，《恩斯特·冯·魏茨泽克回忆录》，第113—114页。
- 7 《“这是元首说的”，希特勒七次有代表性的演讲》，第173页。
- 8 根据德国外交官汉斯·施蒂勒提交的一份备忘录，备忘录标明的日期是一九四二年六月二日，被比尼亚斯在《纳粹德国与七月十八日》一书中引述，见第363页。
- 9 《一九一八至一九四五年德国外交政策文件》，D辑，第三卷，第279页。另请参阅德国驻罗马大使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十八日写给德国外交部的一份报告中论述德国和意大利在西班牙内战中的利益的部分内容（本章将在后面引述）。
- 10 莱昂·巴伊比发表在一九三六年九月二十四日《今报》上的文章。另请参阅皮埃尔·贝尔尼发表在一九三六年八月十五日《争论报》上的文章；皮埃尔·加克索特发表在一九三六年八月二十七日《老实人》上的文章；皮埃尔·多米尼克发表在一九三六年十月八日和九日《共和国报》上的文章。
- 11 诺曼·J.帕德尔福德的《西班牙内战中的国际法和外交》对不干涉政策进行了广泛的研究。关于违反不干涉公约的情况，见戴维·T.卡特尔《苏联外交与西班牙内战》；另见丹特·A.普佐《西班牙与列强，1936—1941》。

- 12 一九三六年九月九日伦敦《工人日报》。关于苏联忧虑的更多迹象，见卡特尔《苏联外交与西班牙内战》，第15—16页。
- 13 实例见华金·阿拉拉斯《西班牙第二共和国史》，第四卷，第266—170页；曼努埃尔·阿斯纳，《西班牙内战军事史》，第25—30页；《揭露在西班牙建立苏维埃政权的秘密计划》。
- 14 何塞·马利亚·希尔·罗夫莱斯，《不可能和平》，第705—706页。
- 15 赫伯特·R.索思沃思，《佛朗哥圣战的神话》，第247—258页。
- 16 谢尔瓦，《西班牙内战史》，第一卷，第709页。另请参阅里卡多·德拉·谢尔瓦《关于悲剧根源的文件：一九三六年七月十八日前夕背景情况的档案分析》，第428页。
- 17 谢尔瓦，《西班牙内战史》，第一卷，第713—120页。
- 18 何塞·迪亚斯一九三六年四月十一日发表的演说，见何塞·迪亚斯《斗争的三年》，第165页。
- 19 何塞·迪亚斯在议会的发言，见《议会会议记事》，一九三六年四月十五日，第311页。
- 20 迪亚斯一九三六年四月五日发表的演说，见迪亚斯《斗争的三年》，第155页。
- 21 何塞·迪亚斯发表在一九三六年四月十七日《国际通讯》上的文章，见迪亚斯《斗争的三年》，第133—139页。另请参阅迪亚斯发表在一九三六年五月一日《工人世界报》上的文章，见迪亚斯《斗争的三年》，第184—185页。
- 22 迪亚斯一九三六年六月一日发表的演说，见迪亚斯《斗争的三年》，第188页；迪亚斯发表在一九三六年六月《工人世界报》上的文章，见迪亚斯《斗争的三年》，第199页。
- 23 迪亚斯一九三六年七月五日发表的演说，见迪亚斯《斗争的三年》，第215页。
- 24 见一九三六年七月六日、八日至十一日、十三日和十五日至十七日《工人世界报》。另请参阅何塞·布列霍斯（前共产党书记）《两次大战之间的欧洲，1918—1938》，第189—190页。
- 25 费尔南多·克劳丁，《共产主义运动的危机》，第168页。
- 26 实例见弗朗切斯科·贝尔福特将军《西班牙内战》，第三卷，第28页；圭多·马蒂奥利，《空军在西班牙》，第22—28页；一九三九年六月八日《武装力量》（意大利陆军部的官方刊物）。根据最近公布的文件，一九三六年九月，意大利军舰在保卫马略卡岛以及占领毗邻的伊维萨岛的战斗中援助了佛朗哥将军的军队。至于意大利的地面部队，第一批三千人的黑衫党志愿军直到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十八日才离开意大利（见德国驻罗马大使发给德国外交部的电报，收入《一九一八至一九四五年德国外交政策文件》，D辑，第三卷，第169和173页）。不过，意大利的大炮、高射炮和装甲车已在九月底运到西班牙（阿斯纳，《西班牙内战军事史》，第316页）。约翰·F.科弗代尔的《意大利对西班牙内战的干涉》一书最详尽地讨论了意大利援助佛朗哥将军的所有问题。
- 27 罗伯托·坎塔卢波，《这就是西班牙》，第63页。
- 28 路易斯·博林，《西班牙：重要的年代》，第53和159—172页。关于佛朗哥将军签署的那份文件的影印件，见博林《西班牙：重要的年代》，第38与39页之间的插页。
- 29 希尔·罗夫莱斯，《不可能和平》，第713页。
- 30 华金·阿拉拉斯编，《西班牙圣战史》，第三卷，第126页。博林在他的书里没有提到谈判期间戈伊科切亚出现在罗马。对墨索里尼最初不愿介入西班牙内战的精彩描述，见科弗代尔《意大利对西班牙内战的干涉》，第68—88页；另外，一份现存马德里军事历史部门档案馆的关于戈伊科切亚访问罗马的鲜为人知的匿名报告的完整文本，见比尼亚斯《纳粹德国与七月十八日》，308—310页。根据这份报告，意大利人要求为十二架萨沃亚式飞机预付一百多万英镑，这笔钱可以由西班牙著名金融家和“走私犯”胡安·马奇支付。
- 31 皮埃尔·科特：《叛国行径的胜利》，第340—341页。
- 32 美国国务院，《美国外交关系：一九三六和一九三七年的外交文件》，第二卷，第467页。

- 33 《一九一八至一九四五年德国外交政策文件》，D辑，第三卷，第170—173页。科弗代尔的《意大利对西班牙内战的干涉》讨论了意大利干涉的动机，见第74—84页。
- 34 《一九一八至一九四五年德国外交政策文件》，D辑，第三卷，第155页。无法确定福佩尔还提出过多少这种建议，但是，有充分的证据证明，十二月二十一日，在柏林举行的一次会议上，福佩尔要求派三个师的德国军队未果（格哈德·L.魏因贝格，《希特勒德国的外交政策：欧洲的外交革命，1933—1936》，第297—298页）。
- 35 《一九一八至一九四五年德国外交政策文件》，D辑，第一卷，第37页。
- 36 格哈德·L.魏因贝格，《希特勒德国的外交政策，1937—1939》，第143—144页。
- 37 魏因贝格在《希特勒德国的外交政策，1937—1939》中（第144页注释5和注释8）引述了两个例证，例证一：“科弗代尔[《意大利对西班牙内战的干涉》，第164页]坚持认为，‘希特勒也许没有做过一定要使西班牙内战早点结束的事情，但也决不能说他想要故意延长它。’”例证二：“曼弗雷德·默克斯在《德国对西班牙内战的政策，1936—1939》（第二版，波恩：罗尔沙伊德出版社，1969）的第102页上写道，在西班牙的德军指挥官所提出的那些旨在帮助佛朗哥取得速胜的建议使‘德国想要一场长期战争’的论点‘不攻自破’，这种论点……建立在把战场指挥官——他们不愿看到自己的士兵死于一场拖延的战争——的建议与希特勒更宏观的目标混为一谈的基础上。”魏因贝格在其更早的那部著作中（《希特勒德国的外交政策：欧洲的外交革命，1933—1936》，第299页，注释149）阐述道：“由于默克斯不了解在这个问题上德国政策的基本方针，他断言（《德国对西班牙内战的政策》，第127—128页），那些接受哈塞尔备忘录观点的人产生了误解；实际上，产生误解的是默克斯自己，正如德特威勒已经指出的那样（《希特勒、佛朗哥与直布罗陀》，第141—142页，注释31）。”受到默克斯误导的历史学家应该认真读一读魏因贝格提到的这条长长的注释。这部完整的参考书是：唐纳德·S.德特威勒，《希特勒、佛朗哥与直布罗陀》（威斯巴登：弗朗茨·施蒂纳出版社）。
- 38 安德烈·布里索，《卡纳里斯》，第172—173页。
- 39 克里维茨基声称，斯大林希望与德国达成某种谅解的目标早在一九三九年八月二十三日苏德互不侵犯条约签订之前很久就已确定。见其发表在一九三八年三月三十一日《社会主义先驱报》以及一九三九年四月二十二日和二十九日《星期六晚邮报》上的几篇文章。
- 40 瓦尔特·克里维茨基，《在斯大林的情报部门工作》，第80—81页。
- 41 见一九三八年三月十八日和三十一日、四月十五日和二十九日《社会主义先驱报》；一九三九年四月十五日、二十二日和二十九日、六月十七日和十一月四日《星期六晚邮报》；克里维茨基，《在斯大林的情报部门工作》。
- 42 实例见一九三九年五月九日《新大众》以及一九三九年六月二十四日《星期六晚邮报》对所有这些指控的答复。克里维茨基的出版代理人艾萨克·唐·莱文写道：“谩骂活动达到了歇斯底里的程度，以致发表的某些说法断言克里维茨基根本就没有存在过，所以是一个编造出来的文学人物。社会主义刊物《新领袖》以及类似的报刊作为反证报道的事实好像一种旷野呼告的声音。苏珊·拉福莱特指出，当克里维茨基在一九三七年十二月宣布与斯大林决裂时，共产党的报刊以沉默对待他。她强调了克里维茨基最初那份公开声明的开头部分：‘署名人，塞缪尔·金斯伯格，生于苏联，作为一名苏联公民，本名瓦尔特·克里维茨基，政治化名瓦尔特……’还强调了它的署名：‘塞缪尔·金斯伯格（克里维茨基）。’另一些人——例如托派刊物《社会主义魅力》的编辑马克斯·沙赫特曼——提醒人们注意，用‘什梅利卡’称呼塞缪尔就像希特勒分子把他当成‘一个肮脏的犹太人’一样，同时还向[共产党的]《新大众》的主要编辑阿贝u·马吉尔、约瑟夫·诺思、西奥多·德雷珀、罗伯特·福赛思、约瑟夫·弗里曼、迈克尔·戈尔德和威廉·格罗珀提出挑战，要揭露他们的真实姓名，‘包括中间名’。”（艾萨克·唐·莱文，《历史见证人》，第186页）

- 43 对克里维茨基事件精彩但却并不总是观点一致的描述见保罗·沃尔发表在一九四一年二月二十八日《公益》上的文章；弗洛拉·刘易斯发表在一九六六年二月十三日《华盛顿邮报》上的文章；戈登·布鲁克-谢泼德，《暴风雨中的海燕：第一批苏联叛逃者的飞翔》，第141—181页；莱文，《历史见证人》，第182—200页；维克托·谢尔盖，《一个革命者的回忆》，第374页和伊丽莎白·K.波列茨基，《我们自己的人》。伊丽莎白·K.波列茨基的丈夫伊格纳斯·赖斯，化名卢德维克，是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在欧洲与克里维茨基密切联系的主要特工，叛逃后于一九三七年在瑞士被暗杀。波列茨基本人认识克里维茨基，在她的书里多次提到后者。与克里维茨基的另外一些熟人和朋友不同，她认为，他确实是自杀的（波列茨基，《我们自己的人》，第270页）。安杰丽卡·巴拉巴诺夫曾任列宁的秘书和共产国际第一书记，不久之后与苏联领导人决裂（见伯特伦·D.沃尔夫的文章，《安杰丽卡·巴拉巴诺夫与弗·伊·列宁》，载一九六四年夏季刊《安蒂奥克评论》），她告诉著名苏联问题专家伯特伦·D.沃尔夫的妻子埃拉·沃尔夫，就在动身前往华盛顿之前，克里维茨基在纽约对她说，如果听说他自杀，她应当知道，他是被“自杀”的（埃拉·沃尔夫一九七九年向我提供的信息）。
- 44 一九四一年二月二十五日《社会主义先驱报》。尼古拉耶夫斯基与克里维茨基熟识这一事实有助于增加他的陈述的可信度。另请参阅保罗·沃尔发表在一九四一年二月二十八日（原书误为二十九日——译注）《公益》上的文章，沃尔与克里维茨基也很熟悉。克里维茨基说他的正式职务是苏联军事情报部门（总参谋部情报总局或所谓四局）西欧处处长（克里维茨基，《在斯大林的情报部门工作》，第75页），但是现在我们知道，叛逃时他是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驻海牙的“特派员”，苏军总参谋部情报总局西欧处处长的尊贵头衔是在美国造势宣传的一部分，克里维茨基的出版代理人艾萨克·唐·莱文想必对此负有一定的责任，因为，据伊丽莎白·波列茨基说，“不能用英语写作的”克里维茨基“必须依靠捉刀人”（波列茨基，《我们自己的人》，第270页）。正如尼古拉耶夫斯基指出的那样，克里维茨基确实曾在苏联军事情报部门工作过。这得到了波列茨基的证实，但是她还说，“无论四局[总参谋部情报总局]还是内务人民委员部都不曾有过一个集中掌控欧洲间谍活动的职位。各个国家的特派员有一个由其完全负责的区域。克里维茨基只是在莫斯科轮流负责过‘中心’或总部，不是任何西欧地区的负责人”（《我们自己的人》，第139页和第148页注释2）。在为他的书所进行的宣传活动中，克里维茨基被描述成一个苏联总参谋部情报总局的将军。关于这个问题，著名英国作家兼记者戈登·布鲁克-谢泼德写道：“瓦尔特·克里维茨基决不是苏联总参谋部情报总局的将军。……他在那个部门工作多年级别很低，但在一九三三年或是一九三四年从那里调到内务人民委员部。[波列茨基说，因为在四局工作过，他在内务人民委员部得到了一个负责人的职位（《我们自己的人》，第185页，脚注1）。]这个职位是内务人民委员部驻荷兰的‘特派员’，负责与其他西欧国家联系，直到一九三七年叛逃为止。众所周知，他本人因被贴上将军的假标签而陷入了尴尬的境地，那好像是在美国为他的书造势宣传的一部分。”（布鲁克-谢泼德，《暴风雨中的海燕》，第154页，注释3）。关于苏联总参谋部情报总局的情况，见约翰·巴伦，《克格勃》，第15和343—345页；戴维·J.达林，《苏联的间谍活动》，第4—5页；理查德·迪肯，《俄国谍报史》，第223—225页；彼得·德里亚宾，《可怕的监视者》，第215页；《麦克劳希尔俄罗斯和苏联百科全书》，第245—246页。
- 45 休·托马斯，《西班牙内战》（一九六一年版），第263页，注释1。感谢约翰·阿姆斯登向我提供了他未发表的文稿《克里维茨基》的副本，在这部文稿中，他评论了许多西班牙内战历史学家（包括托马斯）对待克里维茨基的态度。这份文稿的副本现存胡佛研究所。
- 46 休·托马斯，《西班牙内战》（一九六五年版），第337页，注释1。
- 47 胡安·利亚尔奇，《内格林：镇压抵抗！》，第104页。
- 48 波列茨基，《我们自己的人》，第75页，脚注2；第124页，脚注1；第146页，脚注1；第

171页，脚注1；第204页，脚注1和第211页，脚注1。不过，这些所谓错误和夸大之处均与西班牙内战无关。

- 49 克里维茨基发表在一九三九年四月二十九日《星期六晚邮报》上的文章；另请参阅克里维茨基《在斯大林的情报部门工作》，第21页。
- 50 伦纳德·B·夏皮罗，《苏联共产党》，第485页，注释2。夏皮罗为得到一九三七年二月十一日这份文件的副本向圣安德鲁斯大学的约翰·埃里克森表示感谢。我也十分感谢埃里克森教授为我提供了这份参考资料以及另外一些与坎杰拉基的试探有关的重要参考文件，即，日期注明一九三七年二月六日、十七日、十九日和二十日的名为“坎杰拉基使命”的文件，德国外交部档案胶片系列1907H/429294—324（华盛顿国家档案馆）。我还要感谢他引起了我对他那部出版于一九六二年的气势恢宏的著作《苏联最高司令部：一部军事-政治史，1918—1941》的注意，在这部著作中，他讨论了苏德之间的秘密谈判以及坎杰拉基在其中所充当的角色（第396—397、432、453、458和464页以及第731页，注释79）。这些重要文件为什么没有被包括在官方公布的《一九一八至一九四五年德国外交政策文件》D辑第三卷（1950）中——因为与所有已经公布的文件相比这些文件最适合公布，没有人作出令人满意的解释。是粗心大意把它们漏掉了，还是在进行挑选时认为它们会让苏联政府太尴尬？在我看来，夏皮罗所提到的某位权威人士就二月十一日那份文件说明的理由（因为“通常它被归入‘贸易谈判’类的文件而没有人给予多大注意，另外，无论如何，谁会知道坎杰拉基这个名字？”）所以，“把它从文件集中去掉——或者漏掉——了”。）根本不能令人满意。一九六二和一九六六年，两卷德国文件（《一九一八至一九四五年德国外交政策文件》C辑的第四卷和第五卷）公布，其中包括许多关于坎杰拉基及其在一九三五年四月九日和一九三六年五月六日与德国进行贸易谈判的文件。一些文件透露了苏联要求改善两国政治关系的愿望（《一九一八至一九四五年德国外交政策文件》，C辑，第四卷，第28—29、453—454、783—784、870—871和967—972页；第五卷，第488—491、512和571—573页），但是没有像一九三七年二月二十一日那份文件一样重要的文件，最终，它在一九八三年——与西班牙内战有关的那一卷文件公布三十三年后——公诸于世（《一九一八至一九四五年德国外交政策文件》，C辑，第六卷，第403—404页）。人们在一九四五年落入盟国之手但是直到一九六三年仍未公布的德国档案中所发现的另一些文件（一九六三年十月号《概述》杂志）披露了一九三五和一九三六年苏联驻柏林大使馆官员叶夫根尼·格涅金与纳粹党（APA）国外政治事务部门的官员迪克森（不要与冯·迪克森弄混了）之间的会谈，会谈期间，据文件记载，格涅金“表达了他对两国……不能建立更友好的关系的遗憾”并且说，他来德国“带有研究改善两国关系可能性的特殊使命”。格涅金还意味深长地说明，尽管“共产国际与苏联具有相同的意识形态，苏联的现实政策与共产国际没有关系”。《概述》杂志提供的这些文件的来源是外事部东方处EAP250-d—18—15，可以在（华盛顿国家档案馆）的T81/14缩微胶片上找到。关于以官方文件为依据的与坎杰拉基和苏联改善与德国的政治关系的尝试有关的附加信息，见卡尔海因茨·尼克劳斯《苏联与希特勒的上台》，第十四章，“斯大林-希特勒条约的桥梁”，第182—199页；另外，与一九三九年纳粹-苏联条约的由来有关的更多信息，见路易斯·费希尔《苏联从和平走向战争之路：苏联外交关系，1917—1941》，第240—249页和费希尔给亚历山大·达林的答复，载一九六九年八月十六日《星期六评论》。
- 51 《一九一八至一九四五年德国外交政策文件》（1983），C辑，第六卷，第404页。
- 52 爱德华·哈利特·卡尔，《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德苏关系，1919—1939》，第141页。
- 53 一九三八年三月三十一日《社会主义先驱报》。在其发表于《星期六晚邮报》（一九三九年四月二十九日）的一篇文章里，克里维茨基声称，一九三七年四月，当坎杰拉基随身带着与纳粹政府的“协议草案”来到莫斯科时，他正在那里。考虑到前面引述的诺伊拉特

在一九三七年二月十一日写给沙赫特的信中透露希特勒对苏联的姿态表示怀疑的那一段内容，这根本不可能。

- 54 胡安·莫德斯托，《我是第五团》，第235—236页。另请参阅伊格纳西奥·伊达尔戈·德·西斯内罗斯的《回忆录二：共和国与西班牙内战》，第332页；И.К.科布利亚科夫《为了和平反对侵略的苏联，1933—1941》，第69页；伊万·M.迈斯基，《西班牙笔记本》第116和119页。
- 55 苏联科学院，《与西班牙共和国的国际合作，1936—1939》，第329—330页。关于攻击并且击沉苏联船只的情况，见东欧基金会苏联课题研究组的《西班牙内战中的苏联船只》，油印丛刊，第59册。
- 56 《第二次世界大战史》（莫斯科，军事出版社，1973—1982），第二卷，《战争前夕》（1974），第54页。
- 57 塞希斯孟多·卡萨多，《马德里最后的日子》，第51页。
- 58 比森特·罗霍将军，《这就是马德里保卫战》，第213页。
- 59 见马努伊尔斯基向一九三九年三月召开的苏共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所作的报告，收入《社会主义国家的今天和明天：在苏联共产党（布尔什维克）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发表的报告和演说，一九三九年三月十日至二十一日》，第57—100页。
- 60 卡洛·彭基耶纳蒂，《国际纵队在西班牙：共产党“契卡”的罪行》，第30页。对于研究国际纵队，它的起因、它的招募、把它送往西班牙以及它的人数，R.丹·理查森的《共产国际的军队：国际纵队与西班牙内战》一书做出了不可或缺贡献。
- 61 路易吉·隆哥，《国际纵队在西班牙》，第49页。
- 62 见苏联科学院的《与西班牙共和国的国际合作，1936—1939》，第370页。这份文件写道：“各种史料对西班牙共和国军队中国际志愿人员的总数作出了不同的估计。最经常被提到的统计数字是三万五千人，尽管像共和国军队第三十五师师长瓦尔特将军（卡罗尔·斯维尔采夫斯基）那样善于思考、称职胜任的军事指挥官认为四万两千人是一个相当可信的数字。他把统计的困难归因于阿尔瓦塞特训练基地和国际纵队本身缺乏人员登记。”
- 63 И.К.什卡伦科夫，《白俄侨民的痛苦挣扎》，第173页。
- 64 克里维茨基，《在斯大林的情报部门工作》，第80页，另请参阅第85页。
- 65 苏联科学院，《与西班牙共和国的国际合作，1936—1939》，第312—313页。关于攻击苏联船只的更多信息，见东欧基金会苏联课题研究组的《西班牙内战中的苏联船只》，油印丛刊，第59册。
- 66 亚历山大·奥尔洛夫，《斯大林罪行秘史》，第238页。

将革命伪装起来

由于担心卷入一场与意大利和德国的战争，在英国和法国可能因意大利和德国在西班牙的强势地位威胁到它们的地中海利益而被迫放弃不干涉政策之前，苏联的援助仅限于支持反佛朗哥势力的抵抗行动。此外，苏联小心翼翼地不去影响革命左派，也不与他们发生关系。如果不这样做的话，就会在世界各地那些共产国际正在谋求其支持的阶层当中重新引起恐惧和反感，而这正是苏联一直万分焦虑地竭力避免出现的情况。这将给法国的人民阵线致命一击，在那里，人民阵线内部的意见分歧已经越来越严重；¹而在其他国家，这将使与温和党派建立某种合作基础的一切努力白费功夫，特别是在英国，那里的共产党人为组成人民阵线而开展的活动受到来自工党的抵制。²“法国的人民阵线已经击退了法西斯反动派并且坚持为了和平与苏联结盟的政策。”一名英国共产党员写道，“如果我们能够在英国做到同样的事，如果我们能够战胜反对联合的邪恶势力，如果我们能够缔结一项与法苏条约相应的英苏条约，那么，我们就能建立一条可以遏制法西斯的战争攻势的战线。”³实际上，正是由于这些原因，从西班牙内战刚一爆发，共产国际就试图把反对佛朗哥将军的斗争解释成为一场保卫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的斗争，以向外界最大程度地淡化甚至掩盖这场深刻

的革命。

111 大约四十年后，一名反对西班牙共产党的左翼人士概括性地描述了共产国际及其西班牙支部在下面这种意义上的政治困境：“共产国际和西班牙共产党只能通过歪曲事实解决使其进退两难的那些问题。在西班牙共和派控制区所发生的事情——消灭雇主和神父，没收企业和土地，工人管理，建立革命委员会，农民集体化，工人民兵和人民法庭——不是进行社会革命；这终究不是一场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之间的战争。这是一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是一场资产阶级民主与封建蒙昧残余之间的战争，是一场合法政府反对军事叛乱的斗争，是一场西班牙国家与纳粹入侵者的斗争。”⁴

具有三十年党龄的前共产党人费尔南多·克劳丁写道：“[对于斯大林来说]问题是，西班牙的无产阶级摆脱了远远落后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那些合理的限制。七月十九日之后的那几个星期，在共和派控制区，资本主义制度的秩序实际上已经不复存在：生产资料和政治权力事实上落入工人组织之手。所有研究西班牙内战的历史学家在这一点上意见一致，只有那些为了证明斯大林和共产国际的政策合理而罔顾历史真相的人除外。后面这种‘历史学家’始终宣称，西班牙革命的实质从未超越‘资产阶级民主阶段’，因为如果不这么说，那就是承认斯大林分子在西班牙的政策是要掩盖这场革命。”⁵

一位西班牙问题的权威学者写道，共产国际特别担心它的政策在民主国家中被广泛宣传。“因此，各国共产党的前沿组织和支持共产党政策的观察家都强调新政策的资产阶级特征，例如美国的路易斯·费希尔。路易斯·费希尔在他的《西班牙内战》一书中宣称：‘……有些人把共产党在西班牙的民主主张看作一种诱导外国民主政府和资产阶级自由派人士支持共和派的战术策略。这样认为是错误的；这种策略使用起来很快就会被识破。民主口号意味着，共产党不想在西班牙建立一个与苏联一样的由一党支配的独裁政权。西班牙的条件不同。’”⁶

尽管西方各国政府通过外交渠道、通过外国媒体驻西班牙的机构以及逃离西班牙的商人和难民充分了解了西班牙革命的激进性质，共产党人及其盟友仍然慷慨激昂地反复谈论这场革命的民主特征。

一九三六年八月，在一篇被世界各地的共产党报刊普遍转载的文章里，共产国际执委会成员安德烈·马蒂写道：“西班牙的工人阶级政党已经在一些场合明确表示了它们的奋斗目标，尤其是西班牙共产党。我们这个兄弟政党一再表明，目前在西班牙进行的斗争不是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斗争，而是法西斯主义与民主的斗争。在一个像西班牙这样的国家里，封建的习俗和基础仍然根深蒂固，工人阶级和全国人民当前的迫切任务不是进行社会主义革命，而是捍卫、巩固并且发展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这是唯一可能完成的任务，共产党最近发出的所有呼吁反复强调证明的也是这一点。”

“七月十八日我们党在自己的日报《工人世界报》各个版面的显著位置上所刊登的唯一一句口号是：‘民主共和国万岁！’”

“所有这些尽人皆知。只有不诚实的人才会相信相反的说法。……对极少数财产——例如叛乱分子的办公室和报纸——的没收充公合法制裁了证据确凿的敌对分子和阴谋颠覆政权的人，采取没收措施不是作为社会主义革命的手段而是作为保卫共和国的手段。”⁷

112

“作为对于某些报刊偏颇离奇报道的回应，”法国共产党八月三日发表声明，“西班牙共产党中央委员会请求我们告诉公众，在与军事叛乱的斗争中，西班牙人民并不是在为建立无产阶级专政而奋斗，他们只有一个目的：捍卫共和国的秩序并且尊重个人财产。”⁸另外，法国共产党在同一天发表的一份宣言中声称：

“当我们宣布西班牙不存在建立社会主义制度的问题时，我们是在代表共产党的同志、代表社会党人以及所有在西班牙为自由而战的人说话。”

“那里只有一个简单的捍卫由宪法政府所领导的民主共和国的问题，面对军事叛乱，这个政府已经号召人民保卫共和国政权。”⁹

“西班牙人民不是在为建立苏维埃或无产阶级专政而战。”几天之后英国共产党的书记哈里·波利特写道，“只有满口谎言的骗子或者蛊惑人心的自封‘左派’才会说他们正在这样做——而且两者都有助于法西斯叛乱分子达到目的。”¹⁰甚至直到七个月后，发表在伦敦出版的共产党刊物《劳动月刊》上的一篇文章还宣称：“说资产阶级经济已经‘消失’纯属一派胡言。”¹¹

“的确，人们有时感到意外。”敏锐的观察家弗朗茨·博克瑙写道，
“[由共产党控制的]加泰罗尼亚统一社会党的议员表示，西班牙根本没有发生革命，另外，我与之进行过长时间讨论的那些人不是人们所认为的加泰罗尼亚的资深社会党人，而是外国共产党人。他们解释说，西班牙面临着特殊的形势：政府正在与自己的敌人作战。这就是一切。我暗示了这样一些事实：工人被武装了起来，行政权力被革命委员会掌握，成千上万的人不经审判就被处决，工厂和农庄不断被没收并且由其以前的雇员管理。如果这都不是革命，那么革命是什么呢？他们对我说我弄错了；这些都没有政治意义；它们是没有政治含义的应急措施。”¹²

113 八月七日，社会动乱蔓延的第三个星期，主管马德里的共产党报纸《工人世界报》的西班牙共产党政治局委员赫苏斯·埃尔南德斯向外国新闻界发表如下声明：“[我]可以如实地告诉你们，发动一场无产阶级革命既不是工人阶级的计划，也不是工人阶级的想法。过去几天我党已经通过我们的书记何塞·迪亚斯、我们的同志‘热情之花’和《工人世界报》多次重申了这一点。也就是说，在不失共产党人的本色并且完整地保持党的革命性的同时，我们确信，为了建立我们能够实现最高理想的国家所必需的某些历史条件目前并不存在。一段时间以来，我们一直进行的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土地问题和一切具有民主革命特征的问题仍有待解决。因此，在完成[革命的]这一阶段之前，我们不可能，我们不应当，我们也不会谈论无产阶级专政，不会像共和国的反叛者所宣称那样建立共产主义。”¹³

在前面过去的几个星期，共产党人利用意大利和德国的干涉进一步淡化了西班牙内战的阶级特征。“起初，”西班牙共产党的一份宣言声称，“它可能仅仅被称为一场民主与法西斯主义、进步与反动、过去与未来的斗争。但是现在，它已经突破了这些界限，转变成为一场圣战、一场民族战争、一场人民保卫战，人民感到他们被背叛了，感到他们内心深处的感情受到伤害。”¹⁴

注释：

- 1 实例见法国激进党代表大会上的代表发言，载一九三六年十月二十五日《新时代》。
- 2 实例见一九三六年十月十日《每日先驱报》。
- 3 R.帕姆·杜德发表在一九三六年八月号《劳动月刊》上的文章。
- 4 霍安·埃斯特鲁奇，《西班牙共产党史，1920—1939》，第一卷，第95页。
- 5 费尔南多·克劳丁，《共产主义运动的危机》，第180—181页。
- 6 戴维·T.卡特尔，《共产主义与西班牙内战》，第58页。
- 7 一九三六年八月四日《人道报》；一九三六年十月号《共产国际》；一九三六年八月八日《国际新闻通讯》；一九三六年八月五日《工人日报》。有趣的是，马蒂的说法——“对极少数财产的没收充公”——与西班牙内战期间的苏联驻伦敦大使伊万·迈斯基三十年后在其《西班牙笔记本》一书中发表的说法形成对照。在这本书的第118页，迈斯基证实，“从内战初期那几个月起，政府、市政当局，最常见的工会……就对数以万计的企业进行大规模的巧取”豪夺。
- 8 一九三六年八月三日《人道报》。
- 9 同上。
- 10 一九三六年八月八日《国际新闻通讯》。
- 11 一九三七年三月号《劳动月刊》，第174页。
- 12 弗朗茨·博克瑙，《西班牙斗鸡场》，第110页。
- 13 一九三六年八月八日《工人世界报》。
- 14 一九三六年八月十八日《工人世界报》；一九三六年八月二十九日《国际新闻通讯》。尽管这些引述——其中大部分在拙著《精心的伪装》的正文和注释中出现过，见第101—103页——证明共产党人竭力对外界淡化或者掩盖这场席卷全国的社会革命的深度，赫伯特·R.索思沃思仍然嘲笑我的论点，试图掩盖真相（索思沃思，《佛朗哥圣战的神话》，第155页）。

拉尔戈·卡瓦列罗组成新政府

毋庸置疑，只有在其他党派组织默许或者积极支持的情况下，共产党才能开始推行其掩饰或者歪曲西班牙革命的真正性质和波及范围的政策；同样毋庸置疑的是，为了确保它的政策取得成效，共产党必须成为左派阵营中居于支配地位的政党。只有通过削弱其他左翼运动，共产党才能达到这个目的，尤其是要削弱社会党左派的力量，后者控制着社会党的工会组织劳动者总工会和有影响力的社会党马德里分支马德里社会主义者团体。尽管内战之前无政府工团主义者的工会组织全国劳工联合会开始在首都不断壮大，社会党人很可能仍然是革命爆发之后马德里和新旧卡斯蒂利亚地区^①最强大的力量。

我们已经看到，在内战爆发之前的那几个月，社会党左派与共产党的官方关系极其热情友好，以致社会党左派领导人弗朗西斯科·拉尔戈·卡瓦列罗天真地认为，他能够兼并共产党——后者已经支持他合并了社会党与共产党的工会组织以及两党的青年组织。此外，他所控制的马德里社会主义者团体已于一九三六年三月决定，在党的下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提议

^① 卡斯蒂利亚（Castilla/ Castile）是西班牙中部地区的传统名称，面积占西班牙本土的四分之一以上。其北部称为旧卡斯蒂利亚地区，南部称为新卡斯蒂利亚地区。

社会党与共产党合并，共产党本身坚决拥护这一合并。但是，尽管官方关系顺利发展，社会党左派领导人为立即进行一场翻天覆地的社会变革而开展的鼓动宣传却让共产党人不胜其烦，因此，他们在私下里将拉尔戈·卡瓦列罗的极端革命倾向形容为“左派幼稚病”。¹

由于共产党与社会党左派潜在的分歧，一九三六年七月革命的爆发使他们截然不同的态度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并不让人感到意外。一九三七年三月，共产党总书记何塞·迪亚斯在向中央委员会所作的一份报告中声称：“当共产党提出必须保卫民主共和国时，社会党人——我们的大部分社会党同志——认为民主共和国已经失去政治意义，因此主张建立社会主义共和国。这将使工人阶级脱离民主力量，脱离小资产阶级和西班牙的大众阶层。当然，由于一些社会党同志不明白……现在不是谈论社会主义共和国而是谈论具有深刻社会意义的民主共和国的时候，我们所奉行的把一切民主力量与无产阶级联合起来的政策将会遇到一定的困难。”²

115

尽管没有记录显示社会党领导人在革命爆发时曾以口头或者书面的形式发表过强烈要求建立一个社会主义共和国的公开声明，但是，在与共产党人私下进行的会谈中，他们可能提出过这个建议。毫无疑问，这个建议与拉尔戈·卡瓦列罗战前推行的要求建立工人阶级专政的政策完全一致，与内战爆发初期其最狂热的支持者所追求的目标完全一致，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共产党领导人的主张从没有受到故意的挑战。确实也没有任何人站出来否认法国共产党领导人、共产国际成员和西班牙国际纵队的组织者安德烈·马蒂的说法，马蒂的大概意思是，由于共产党人的影响，社会党人放弃了建立社会主义共和国的计划。“从军事叛乱的第一天起，”马蒂在一九三七年说，“当共产党宣称当务之急是保卫民主共和国时，许多社会党高级领导人则相反，他们主张应当立即建立一个社会主义共和国。这将直接瓦解人民阵线从而导致法西斯主义的胜利。今天，由于我们的影响，许多社会党领导人已经改变了他们的看法并且接受了共产党的纲领。”³

在一九三六年九月上旬发表的一次演说中，西班牙共产党政治局委员安东尼奥·米赫断言：“就连过去那些经常不顾当前的形势大谈特谈无产阶级革命的人，现在也都认识到了共产党保卫民主共和国这一路线的正确性。”⁴

肯定是为了不让拉尔戈·卡瓦列罗受到屈从于共产政策的指责，其支持者竭力避免公开谈论他的态度的突然转变。实际上，直到内战结束多年以后，当被别人问到时，这位社会党领导人的最亲密的朋友路易斯·阿拉基斯塔因仍然认为何塞·迪亚斯和安德烈·马蒂的说法是一个“纯属胡说八道”的“共产党谎言”而不予置评。⁵

116 到八月中旬，与其早期使用的——至少是对外界使用的——革命用语相比，拉尔戈·卡瓦列罗的语言已经变得相当温和，例如，他在写给英国工会领导人本·蒂利特的一封信中声称，西班牙社会党人只是在为民主的胜利而斗争，并不打算建立社会主义。⁶从没有人确切地透露过共产党领导人究竟向摇摆不定的拉尔戈·卡瓦列罗列举了一些什么理由，但是，如果他们的说法确有其事——这似乎非常有可能，那么，他们肯定认为，建立一个社会主义共和国将会引起西方列强的敌意，从而失去通过使何塞·希拉尔内阁继续执政而获得的那些利益，因为，鉴于各个大国在发生反对合法政府叛乱的情况下所普遍采取的政策，希拉尔内阁可以合理地认为，它被允许在世界市场上自由购买武器。⁷

共产党人竭力想让西方民主国家认为一个温和的非革命政府全面控制着西班牙的形势有其迫不得已的原因。例如，公共档案馆^①多年以后公布的英国外交大臣安东尼·艾登的副手亚历山大·卡多根爵士一九三六年八月二十九日所写的下面这份备忘录证明：“我要说的是，在相对正常的情况下——即，‘[西班牙]现政府’实际控制着国家并有继续存在下去的可能性——即使没有两国间的协议，我们也应当最严格地遵守我们一贯奉行的常规政策，允许或者批准向公认的西班牙政府运送物资，同时对叛军实行禁运。但是，在西班牙目前的情况下，或者说在有可能迅速发展的形势下，不能盲目遵循常规。西班牙现政府是怎么回事？巴塞罗那那些掌权者在多大程度上承认马德里当局？后者在多大程度上有效控制着马德里？……撇开国际方面的问题和我们想要避免‘一刀切’的愿望不说，在不久的将来人们可能更清楚地看到，‘西班牙现政府’越来越不值得他们同情，甚至对于我国的工党人士来说也是如此。”⁸

^① 公共档案馆（the Public Record Office）设在伦敦，保存着英格兰和威尔士的官方档案。

无论在私下进行的讨论中共产党人提出的“西班牙政府应当向西方列强显示某种温和的外表”这一有力论点对拉尔戈·卡瓦列罗的影响可能有多大，但是，从他的喉舌《光明报》一九三六年八月二十二日所发表的一篇社论来看，显然，他对共产党的政策持有异议，因此，并不准备完全放弃革命行动。这篇社论肯定是由这份社会党左派日报的负责人和拉尔戈·卡瓦列罗的私人顾问路易斯·阿拉基斯塔因撰写的，它写道：“有些人一直在说，‘让我们首先打败法西斯主义，让我们胜利地结束这场战争，然后，如果需要的话，我们将会有时间谈论并且发动革命。’表达这种意见的人显然没有慎重地考虑过我们正在经历的不可抗拒的辩证过程。战争和革命是同一件事情。它们不仅并不相互排斥或妨碍，而且相互促进或补充。为了战争胜利需要革命，同样，为了发动革命需要战争。”

“革命是在经济上对法西斯主义的毁灭性打击，因此，它是在军事上消灭法西斯主义的第一步。……人民不是在为七月十六日的西班牙而战，那个西班牙仍然是一个被世袭的等级制度统治的社会，人们是在为一个最终根除了等级制度的西班牙而战。辅助战争的最强大的手段是在经济上彻底消灭法西斯主义。后方的革命将更加有效地促进并保证在战场上取得胜利。”

在内战爆发之后那几个星期造成共产党人与社会党左派不和的一个重要原因竟然是他们对何塞·希拉尔的自由共和派政府意见不一。共产党人尽其所能支持摇摇欲坠的希拉尔政府，为此甚至让人想起他们用过的溢美之辞。共产党的西班牙内战史断言：“希拉尔政府的历史意义在于，它知道接受并且承认正在西班牙出现的新的政治社会现实。”⁹

在一部没有发表的回忆录中，共产党的政治局委员比森特·乌里韦写道：“尽管希拉尔政府更像是一个影子内阁，党仍然竭尽全力支持它。……它随时可能自动垮台。它是共和国的合法化身，因此，必须不惜一切代价维护它。”¹⁰

正如拉尔戈·卡瓦列罗最信赖的顾问路易斯·阿拉基斯塔因一九三六年八月二十四日——当时巴达霍斯和梅里达刚刚陷落，它们的失陷使佛朗哥将军的南方部队与北方部队会师——写给这位社会党左派领导人的一封信所显示的那样，共产党对希拉尔政府的支持与阿拉基斯塔因对希

拉尔政府的怀疑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在乖巧地表示他为在“根本性的问题上不必经过事先讨论我的想法几乎总是与您一致”感到自豪之后，阿拉基斯塔因写道：“……我们现在承担的责任如此重大，尤其是作为我们报纸的负责人，我身上的责任特别重大，因此，由于不知道您是否具有同样的看法，我不敢冒昧地就当前的政治形势应当发生的必要变化发表个人意见。”接着，他继续写道：

共和国政府名存实亡。它既没有权威和能力，也没有进行残酷的战争从而保证取得完全彻底的革命胜利的决心。比任何人都了解正在发生的事情的您比我更清楚这一点。支持这个政府继续执政将使胜利受到威胁。……由于完全是因为政府的无能而发生的那些事情，例如前天晚上人们在模范监狱的所作所为[处决政治犯]，每过一天出现复杂的国际局面的可能性都在增加，我们失去外界同情的可能性也在增加。由于这些原因，我认为，这个政府应尽快消失。……

再组成一个共和派政府毫无意义。它将像目前这个政府一样愚笨无能、不起作用。一个以普列托为首的全部由他的朋友[西班牙社会主义工人党的温和派人士]和共和派人士组成的政府也不可能使局面得到多大的改善。……从革命进程的角度看，[这]将使前方的战士更不信任共和国政府。这将加重民兵的担忧，同时可能妨碍他们为一项其政治社会目标对他们来说并不明确的事业而战。

如果我们拒绝接受普列托或者其他政治倾向与他相同或者接近的人——例如[胡利安·]贝斯泰罗——的话，那么，您就成为所剩下的唯一人选。存在着两种可能性：一个由我们左派组成的清一色政府或是一个由各派组成的混合政府。前者将遭到共和派政党、温和派人士的坚决反对，尤其是阿萨尼亚的坚决反对，至少在战争持续期间会是这样。……另一方面，我相信，他不会反对一个以您为首政府……只要温和派与共和派接受这种解决方案。……如果他们不接受，那么，在战争结束之前考虑用暴力夺取政权的时候就到了。……

我知道，您也不愿与那些具有截然不同甚至互不相容的意识形态的人组成一个联合政府。……但是，我认为，一个可能的联合政府不

会在国内外引起恐慌，而且实际上它可以成为一个强大的战时政府，不用说，同时也可以成为一个强大的革命政府。一切取决于如何分配部长的数量和职位。……下面是我所说的这个设想中的政府：

社会党人（第一类——左派）

总理

国防部长

内政部长

海军部长或财政部长

国务[外交]部长或农业部长

社会党人（第二类——中间派）

财政部长或海军部长

农业部长或国务部长

工商部长

共产党人（最终，一名全国劳工联合会成员）

公共工程部长

劳工部长

共和派人士

交通部长（左翼共和派）

公共教育部长（共和联盟）

司法部长（加泰罗尼亚左翼共和派）

这样分配肯定能够改善局面。不过，重要的是控制那些对战争和革命起关键作用的部长职位并且掌握足够的部长数量以确保多数。……这样一来，严格地讲，真正的政府是第一类人，那就是您。……

我所勾画的这样一个联合政府将会产生预期的效果，不然的话，

可以通过清除三心二意的人或反革命分子来改组政府使其具有更纯粹的左派倾向。一旦权力被您掌握，阿萨尼亚将不再是政府发生进一步的革命性转变的障碍。……

我不要求您对这封信作书面回复。您可以用只言片语把您对这一切的意见口头告诉我。¹¹

119

拉尔戈·卡瓦列罗对阿拉基斯塔因答复无案可查，但是，他肯定具有同样的看法。三天后的八月二十七日，他向《真理报》记者米哈伊尔·科利佐夫——认识科利佐夫的阿瑟·科斯特勒称其为“苏联最杰出与最有影响力的新闻记者”和“斯大林的密友”¹²——抱怨说，希拉尔政府“完全不称职”。“那些部长无能、愚蠢而且懒惰。”他怒斥道，“没有人听[部长的]。他们根本不关心别人正在做什么。他们没有一点责任心或者形势严峻的概念。……此外，他们代表的是谁？所有民众的力量脱离了政府体系团结在社会党和无政府主义工会的周围。工人民兵不信任政府。群众向我们伸出了手；他们要求我们领导政府，但是我们保持低调，我们避免承担责任，我们仍然按兵不动！”¹³

关于一触即发的危机，一名前议会议员提出了下面这种说法，尽管没有直接的证据，考虑到阿拉基斯塔因写给拉尔戈·卡瓦列罗的密信，他的说法有可信的成分：在巴达霍斯陷落之后其追随者在马德里举行的一次会议上，拉尔戈·卡瓦列罗决定以一个工人阶级政府取代“无能的”希拉尔政府并且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只是由于苏联大使的及时干预，这一计划才半途而废。大使成功地论述了战争应当继续“在民主共和国的旗帜下”进行，从而避免“过早地建立工人阶级政府和无产阶级专政将带来的危险”。¹⁴尽管西班牙共产党否认这种说法，但其官方内战史实际上仍然证实了它：“另一方面，拉尔戈·卡瓦列罗确实加强了对希拉尔政府的攻击，他对希拉尔政府的指责更加尖锐，特别是在八月底，当时共和国的军事形势已经恶化。他的一些最亲密的战友，像阿拉基斯塔因和[卡洛斯·德·]巴赖瓦尔，或多或少地公开鼓动支持清除共和派部长，然后为建立‘工人阶级专政’把国家交给卡瓦列罗管理。”¹⁵

没有共产党人和社会党温和派——他们在内阁中并没有正式职位，却

发挥着极其重要的作用——的支持，希拉尔政府肯定将孤立无援。就连几周以来一直努力在幕后支持政府的社会党温和派或中间派领导人因达莱西奥·普列托都嘲笑它的无能。“因达莱西奥·普列托没有担任正式职务。不过，”八月二十六日采访了这位社会党领导人的科利佐夫写道，“为他提供了宽敞、豪华的办公室，还有一名海军部的秘书人员。……他坐在扶手椅子里，带着嘲讽表情的苍白的脸上堆满了横肉。他沉重的眼皮半睁半闭，但是，眼皮下面那双西班牙最警觉的眼睛凝视着你。他赢得了务实政治家稳固而持久的声誉，非常精明甚至狡猾。……我问他对形势的看法。十分钟后他进行了细致的分析，透彻而悲观。他嘲笑了政府的无能。”¹⁶

另外，国际纵队政委和二战后的意大利社会党领袖彼得罗·南尼在一九三六年八月十四日写道：“我曾经观察过普列托几天。与一般人相比，他是一部不停运转的庞大的机器。他同时思考一百件事情。他了解一切。他洞察一切。……穿着衬衫，汗流浹背，气喘吁吁，因达莱西奥叫来一个又一个人，下达指示，签署文件，记下笔记，对着电话咆哮，责骂某个人，对另一个人微笑。他什么也不是；他不是部长；他只是休会议会的一名议员。然而他又什么都是；他是政府行动的策划者和协调人。”¹⁷

120

任凭普列托在幕后疯狂活动，政府仍然虚弱无力，这位社会党温和派领导人对此也是心知肚明。尽管看不起拉尔戈·卡瓦列罗及其激进政策，但是，普列托承认，他是当时可以担任政府首脑的唯一一位政界人士。“他是一个总想显示聪明的傻瓜。”普列托对米哈伊尔·科利佐夫说，“他是一个扮演狂热分子角色的死板官僚，一个搅局者，一个把自己想象成为领导有方的官员的好事者。他是一个可以毁掉一切事情和所有人的家伙。过去几年我们的政治分歧是社会党内斗争的焦点。但是无论如何，至少在目前，他是唯一的人选，或者说仍是更为合适的人选，他是唯一一个可能适合担任新的政府首脑的人。”普列托接着补充道，他准备加入拉尔戈·卡瓦列罗领导的政府，因为“对于西班牙或者我来说，没有别的办法，如果我对国家还有用处的话”。¹⁸

另一方面，共产党人反对政府的任何变更，因此，摇摇欲坠的何塞·希拉尔政府又苟延残喘了一段时间。但是，面对佛朗哥将军的军队向马德里闪电般的推进¹⁹，同时厌倦了主持一个只是在理论上拥有国家权力并

且失去大多数工人支持的政府，据《光明报》报道，在阿萨尼亚总统的建议下，何塞·希拉尔提出，将政府扩大到包括人民阵线的其他党派。²⁰尽管报道没有说拉尔戈·卡瓦列罗是出任一个新内阁的首脑还是仅仅参加一个由希拉尔领导的扩大了了的政府，不过，权威的科利佐夫澄清了这个疑点。他在九月三日的日记中特别提到，内阁最初的改组是有限度的。分属普列托和卡瓦列罗派的两三名社会党人加入政府。但是，那位“老人”突然要求由他担任国防部长，随后几乎立即要求担任总理。这遭到了除普列托之外的普遍反对。人们认为卡瓦列罗的“直率、孤僻、急躁”将使“正常的合作不可能进行”。当时身为拉尔戈·卡瓦列罗信赖的顾问但是同情共产党的阿尔瓦雷斯·德尔巴约极力劝说这位社会党领导人，他应当担任国防部长而把总理职位留给希拉尔。接着，大家拜访了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以使它能出面调解。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同样反对拉尔戈·卡瓦列罗担任政府首脑，但是后者坚持“非这样不可”。科利佐夫注意到，总体形势和时间的压力对卡瓦列罗有利，因为危机的传闻正在蔓延，而且在战时这种形势一天也不能继续拖延。“普列托宣称，尽管他与卡瓦列罗的关系众所周知，但他不会反对后者并且准备接受由其领导的政府中的任何职位。……对于大家来说，接受一个以这位老人为首的政府是一件令人非常苦恼的事情。……无论如何，拉尔戈·卡瓦列罗现在事实上是工人运动最德高望重而且最具代表性的人物。……至于他的具有煽动性的左倾极端主义，德尔巴约让大家放心：在他担负着治理国家职责的非常时期，这种倾向将销声匿迹。”由于认为自己拥有坚实的基础，接着，科利佐夫继续写道，卡瓦列罗以最后通牒的形式又提出了一个要求：共产党加入他的内阁。“共产党对此表示反对。它更愿意全力支持人民阵线政府同时继续置身事外；此外，它不想制造不必要的国际麻烦，以免未来的政府被人称为布尔什维克的苏维埃政府。老人声明，所有这些都是废话，他也会拒绝，²¹也可以让一切见鬼去，但是，无论发生什么事情，[共产]党都将负有责任。”²²塞萨尔·法尔孔在内战爆发的头几个月担任马德里的共产党机关报《工人世界报》的编辑，共产党拒绝参加政府得到了他的证实：“共产党坚持与卡瓦列罗相反的立场。当由于种种原因国内和国际形势均不适宜社会党人和共产党人参与时，为什么要改组政府呢？”²³

值得注意的是，社会党温和派人士胡安·内格林博士（他将成为西班牙内战时期最具争议的人物）对组成一个以拉尔戈·卡瓦列罗为首的政府——他在这个政府中得到了财政部长的职位——这个主意的最初反应与共产党人相似。“从国内和国际的角度看，”他对一位社会党的同志说，“我没有听说过更愚蠢的行为。我们决定输掉这场战争吗？不要指望我的配合。”²⁴

在其没有发表的回忆录中，西班牙共产党政治局委员比森特·乌里韦写道：“有一次，拉尔戈·卡瓦列罗提出建议，我们应当接管国防部并把希拉尔赶走。当然，我们予以断然地拒绝并且解释了我的理由。气氛变得紧张起来，于是我们中止了会谈。后来，卡瓦列罗派代表询问我们是否已与他断绝关系。我们告诉他，我们没有与他断交，但是，他不能指望我们强行赶走希拉尔，因为我们大家必须把彼此视为从事一项共同事业的盟友。”²⁵

不过，面对拉尔戈·卡瓦列罗的顽固态度和莫斯科下达的共产党应该加入政府的新指示——据前西共政治局委员赫苏斯·埃尔南德斯说，接到莫斯科的指示时他们“一点也不惊讶”²⁶——西班牙共产党领导人彻底改变了他们的立场，结果，一个新的内阁组成了。

面对拉尔戈·卡瓦列罗的固执己见，克里姆林宫和共产党政治局别无选择只能让步。共产国际代表鲍里斯·斯特凡诺夫在写给莫斯科的一份长篇报告中清楚地表明了这一点。“面对卡瓦列罗和社会党少壮派准备以暴力推翻希拉尔政府的局面，”他写道，“共产党决定加入[新]政府以防止发生这种变化。”²⁷如今可以在马德里的西班牙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历史档案馆里找到这份报告。

尽管拉尔戈·卡瓦列罗未能在激烈的讨价还价过程中组成阿拉基斯塔因所建议的那种类型的政府，但是，公众表现出特别的热情欢迎九月四日组成的新政府。胡利安·苏加萨戈伊蒂亚是社会党温和派人士和拉尔戈·卡瓦列罗的对手，他回忆说：“形势正在恶化，情况非常严重。敌军到达[位于通往马德里的交通要道上的]塔拉韦拉-德拉雷纳。人们以难以形容的热情为拉尔戈·卡瓦列罗政府的出现而欢呼。民兵列队从他面前走过，向他发出欢呼声并且宣誓宁死也不后退。内阁改组恢复了低落的士

气。”²⁸

内阁成员——他们所属的党派及其所担任的部长职务——如下：²⁹

弗朗西斯科·拉尔戈·卡瓦列罗	社会党（左派）	总理兼国防部长
胡利奥·阿尔瓦雷斯·德尔巴约	社会党（左派）	外交部长
安赫尔·加拉尔萨	社会党（左派）	内政部长
安纳斯塔西奥·德·格拉西亚	社会党（温和派）	工商部长
胡安·内格林	社会党（温和派）	财政部长
因达莱西奥·普列托	社会党（温和派）	海军和空军部长
赫苏斯·埃尔南德斯	共产党	教育和艺术部长
比森特·乌里韦	共产党	农业部长
何塞·希拉尔	左翼共和派	不管部长
马里亚诺·鲁伊斯·富内斯	左翼共和派	司法部长
贝尔纳多·希内尔·德洛斯·里奥斯	共和联盟	通讯部长
何塞·托马斯-彼埃拉	加泰罗尼亚左翼共和派	劳工和卫生部长

123 何塞·马利亚·阿吉雷是卡瓦列罗的政治军事秘书，曾经陪同这位社会党领导人去总统府与阿萨尼亚磋商，他作证说，卡瓦列罗希望阿拉基斯塔因担任他的外交部长，但阿萨尼亚否决了这个建议。据说，卡瓦列罗告诉阿吉雷：“德尔巴约是一个苏联间谍。俄国人对阿萨尼亚施加了压力——就像他们正在对我做的一样，让他把外交部长的职位交给德尔巴约。如果我们拒绝的话，他们将不向我们提供武器。”接着，卡瓦列罗把这个消息告诉了阿拉基斯塔因。后者后来对阿吉雷说：“我劝告[卡瓦列罗]向阿萨尼亚和俄国人让步。因为德尔巴约不太聪明，我们应当控制他。我将前往巴黎[担任大使]。为了避免失败，我们必须做到不可能做到的事情。”³⁰

当月晚些时候，左翼共和派成员胡利奥·胡斯特被任命为公共工程部长，³¹接着，巴斯克民族独立党成员曼努埃尔·德·伊鲁霍被任命为不管部长。³²

“资产阶级党派加入忠于共和国的政府是……一种象征。”当时苏联政策的代言人路易斯·费希尔写道，“它是为了向法西斯西班牙的资本家

和外部世界表明，共和国并不打算在取得内战的胜利后建立苏维埃政权或共产主义制度。”³³

信奉天主教的中产阶级政党巴斯克民族独立党反对军事叛乱并且——以准许巴斯克地区自治为条件³⁴——同意加入拉尔戈·卡瓦列罗政府这一事实被共产党和同路人在国内外的宣传中充分利用。下面一段话摘自一九三七年六月十日刊登在民族主义报纸《阿拉贡信使报》上的一封信，据说这封信是阿尔瓦雷斯·德尔巴约写给另一名未说明身份的政府成员的，鉴于它的可信性，值得在此予以引述：“我多次想起四个月前你在我面前说过的话！你说，必须给外界造成[政府]具有资产阶级倾向这种印象——你也应该记得，我立即表示同意。在国外，没有什么事情像联合巴斯克民族独立党一样对我们这么有利。”

共产党对成为巴斯克自治政府总理的何塞·安东尼奥·阿吉雷的赞扬时常夸张得令其尴尬。“我必须承认，”他在一份致中央政府的报告中写道，“对我来说，报纸的赞誉和宣传有时过于夸大其词，尤其是共产党的报纸，它们的形容极尽热情褒奖之意，反而让我受宠若惊，羞愧得无地自容。这种老套的策略在巴斯克人民中没有市场，他们简单纯朴，从不口是心非。”³⁵

关于拉尔戈·卡瓦列罗政府的组成，西班牙共产党的官方内战史注意到：“共产党与社会党以及形形色色的中产阶级政党还是第一次一起加入一个联合政府。共产党人与天主教徒成为同一个政府的组成部分同样也是第一次。³⁶在国际舞台上，具有这些特点的联合政府尚无先例。”³⁷正如斯坦利·G.佩恩所指出的那样，具有更重要的历史意义的是以下事实：这一前所未有的联合是“战时的西班牙人民阵线政府率先体现的几个主要特点之一，凭借着这些特点，它预演了在欧洲的二战废墟上冒出来的那些联合政权和‘人民民主政府’”。³⁸

注释：

- 1 弗兰克·E.曼努埃尔，《现代西班牙政治》，第164页。
- 2 何塞·迪亚斯，《斗争的三年》，第352页。
- 3 安德烈·马蒂，《西班牙……欧洲的前途之所在》，第34页。前西班牙共产党政治局委员赫苏斯·埃尔南德斯在一九四八年十一月四日写给我的一封信（现存胡佛研究所）中表示，马蒂的说法不对。他补充说：“社会党左派内部确实存在极端的倾向……但是，他们从没有正式提出过宣布建立‘社会主义共和国’这个问题。”
- 4 载一九三六年九月九日《工人世界报》。
- 5 路易斯·阿拉基斯塔因一九四八年写给我的信（现存胡佛研究所）。其他著名的社会党左派人士对我了解这个问题的书面请求干脆置之不理。
- 6 一九三六年八月十三日巴塞罗那《人道报》从伦敦报道。
- 7 “尽管根据国际法，对于外国政府允许一个得到承认的友好政府为镇压叛乱在它们的市场上购买武器和军需物资并没有什么硬性规定，但是实际上这种行为一般都会得到允许。”（丹特·A.普佐，《西班牙与列强，1936—1941》，第149—150页）另一方面，在一九三六年九月接替希拉尔内阁的政府中担任外交部长的前共产党人胡利奥·阿尔瓦雷斯·德尔巴约写道：“法律不可能保护不干涉政策。一个与英国和法国保持着正常外交关系的合法政府有权要求得到镇压几个反叛将军的叛乱所必需的战争物资，不承认它拥有这种不容置疑的权利是非常极端的随意行为。”（阿尔瓦雷斯·德尔巴约，《自由之战》，第44页）
- 8 英国里士满公共档案馆，外交部文件，第371/20573号。
- 9 《西班牙内战与革命，1936—1939》，第一卷，第265页。另请参阅安东尼奥·科登《历程》，第248页。
- 10 比森特·乌里韦，《回忆录》（打印稿），第11页。
- 11 马德里国家历史档案馆，路易斯·阿拉基斯塔因先生文件集，卷宗32/L30^a。
- 12 阿瑟·科斯特勒，《看不见的文字》，第372页。
- 13 《西班牙日记》，载一九三八年四月号《新世界》，第41—42页。关于《西班牙日记》的情况，见本书第二章注释24。
- 14 克拉拉·坎波亚莫，《一个共和派所看到的西班牙革命》，第143—146页，参见亨利·拉巴塞尔《西班牙：政治熔炉》，第98页。另请参阅皮埃尔·布鲁埃和埃米尔·特米姆《革命与西班牙内战》，180—181页和费尔南多·克劳丁，《共产主义运动的危机》，第一卷，第610页，后者相信这种说法。
- 15 《西班牙内战与革命，1936—1939》，第二卷，第45—46页。不过，没有确凿的证据证明阿拉基斯塔因或巴赖瓦尔当时像这部共产党的官方内战史所声称的那样或多或少地公开支持建立工人阶级专政。就连与这种说法间接有关的证据也只有阿拉基斯塔因写给卡瓦列罗的那封密信。
- 16 《西班牙日记》，载一九三八年四月号《新世界》，第39—40页。
- 17 彼得罗·南尼，《西班牙内战》，第146页。另请参阅阿马罗·德尔·罗萨尔《西班牙劳动者总工会史，1901—1939》，第二卷，第500页。认识普列托的西班牙著名作家拉蒙·森德尔告诉我，“在内战爆发的头几个星期”，普列托是“共和派与社会党人中唯一一个充满活力的人”，他在海军部“激励着其他人”（一九三九年在墨西哥的采访）。
- 18 《西班牙日记》，载一九三八年四月号《新世界》，第40页。
- 19 何塞·曼努埃尔·马丁内斯·班德上校非常详细地描述了这一令人惊叹的推进，见《向马

- 德里进军》（一九八二年修订版）。这本书以马德里军事历史部门档案馆的文献资料为依据。
- 20 一九三六年九月四日《光明报》。希拉尔在一九四〇年接受我的采访时说，由于失去了工人阶级的支持，他建议，应当由拉尔戈·卡瓦列罗担任新政府的首脑。
 - 21 除非共产党共同承担政府的职责，他不会组成一个政府，卡瓦列罗提出的这个条件得到多种资料来源的证实。胡利奥·阿尔瓦雷斯·德尔巴约，《自由之战》，第212页；赫苏斯·埃尔南德斯，《我是一个斯大林的部长》，第47页；《西班牙内战与革命》，第二卷，第47页；《西班牙共产党史》，第139页。后两本书是由热情之花所主持的委员会编撰的西班牙共产党的官方内战史和党史。
 - 22 《西班牙日记》，载一九三八年四月号《新世界》，第46—47页。
 - 23 塞萨尔·法尔孔，《马德里》，第159页。
 - 24 胡利安·苏加萨戈伊蒂亚，《西班牙内战史》，第137页。
 - 25 乌里韦，《回忆录》（打印稿），第14页。
 - 26 埃尔南德斯，《我是一个斯大林的部长》，第47页。莫斯科方面为什么突然作出这一决定？埃尔南德斯没有对此作出解释。前共产党领导人费尔南多·克劳丁写道：“对于工人阶级来说，担任政府首脑的拉尔戈·卡瓦列罗成为革命的某种保证。对于阿萨尼亚和普列托来说，就像对于斯大林及其在西班牙的代理人一样，拉尔戈·卡瓦列罗担任总理可能提供某种保证，革命将自行转变成为与重建的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之间的合作。”（《共产主义运动的危机》，第一卷，第184页）这提出了下面的问题：斯大林究竟是真的想在西班牙恢复资产阶级民主，还是只想利用其外在形式掩盖他的真实目的？另外，对于斯大林的政策来说，拉尔戈·卡瓦列罗是一个合适的工具吗？希拉尔总理的儿子弗朗西斯科·希拉尔写道，由于国际联盟的“漠不关心”，“共和国政府领导人意识到，危急的形势已经出现。他们手里仅剩的一张牌是苏联，而且我父亲知道，[苏联]不会支持像我父亲这样的左翼共和派政治家。当时双方都想到，他们应当支持一个‘极左派’的社会党人。唯一可能的人选是弗朗西斯科·拉尔戈·卡瓦列罗先生”（一九八〇年一月号《历史时期》）。尽管克里姆林宫由于担心外国舆论因而支持温和的希拉尔政府，这一说法仍然迅速扩散。某种似乎更为可信的解释是，面对失去公众支持的希拉尔政府，克里姆林宫不得不向拉尔戈·卡瓦列罗的不妥协政策作出让步，直到可以顺利地用一位温和的政治家取而代之为止。我们将在本书后面的某一章里看到，当八个月后胡安·内格林接替拉尔戈·卡瓦列罗担任总理职务时，实际发生的情况就是这样。
 - 27 鲍里斯·斯特凡诺夫，《西班牙共和国失败的原因》（俄文），第19页。
 - 28 苏加萨戈伊蒂亚，《西班牙内战史》，第135页。
 - 29 见一九三六年九月五日《马德里官方公报》。
 - 30 在阿拉基斯塔因文件中发现的由何塞·马利亚·阿吉雷所写的备忘录（阿拉基斯塔因文件，卷宗75/7）。
 - 31 一九三六年九月十六日《马德里官方公报》。
 - 32 一九三六年九月二十六日《马德里官方公报》。
 - 33 路易斯·费希尔，《西班牙为何而战》，第37页。另请参阅一九三七年五月一日巴黎《时报》所引用的马塞尔·罗森堡（一九三七年四月之前的苏联驻西班牙大使）在《莫斯科日报》上发表的文章的摘要。
 - 34 赫苏斯·德·加林德斯，《被围困的马德里城中的巴斯克人》，第19页。
 - 35 这一段内容见《巴斯克自治政府总理何塞·安东尼奥·德·阿吉雷致中央政府的报告》，第68页。
 - 36 实际上，如同前面的内阁成员名单所显示的那样，只有曼努埃尔·德·伊鲁霍是天主教徒。
 - 37 《西班牙内战与革命》，第二卷，第49页。
 - 38 斯坦利·G.佩恩，《西班牙革命》，第235页。

共产党争夺控制权

尽管共产党在新政府中只占据了两个部长职位，但是，为数不多的部长职位并没有真实反映共产党在这个国家拥有的实力：内阁组成时，它的追随者队伍已迅速壮大，远远超过了内战之前的四万人；几个月后，它成为反佛朗哥阵营中最强大的政治派别，根据一项官方统计，其党员将近二十五万。据共产党总书记何塞·迪亚斯在一九三七年三月写给中央委员会的一份报告中说，准确的统计数字是二十四万九千一百四十人，其中产业工人为八万七千六百六十人（百分之三十五点二），农业工人六万二千二百五十人（百分之二十五），农民——也就是小地主和佃农——七万六千七百人（百分之三十点七），城市中产阶级一万五千四百八十五人（百分之六点二）以及知识分子和专业人员七千零四十五人（百分之二点九）。¹

如果许多新的共产党的追随者——例如小地主、佃农、小店主、小工厂主、公务员、军官、警察、医生、教师、作家、艺术家和其他知识分子——战前曾经是自由共和派人士甚至是右派的同情者，只是由于希望从旧政权的废墟中挽救某种东西或者分享共产党越来越大的权力才受到共产党的吸引的话；此外，如果数量可观的共产党的追随者战前曾是社会党党

员或劳动者总工会会员的话，那么，数量更多的共产党的追随者以前从来没有把他们的信仰纳入过任何政治模式，如今，像改变对社会主义运动的想法一样，由于共产党发展党员的热情、极其巧妙的宣传、在政治和军事两个领域表现出来的活力和组织能力以及因苏联武器和专家而获得的威望，他们被共产党所吸引。

下面这些来自各种原始资料的证据说明了共产党人在发展新党员方面取得的成功：

“共和派中产阶级对共产党宣传的温和腔调感到意外并对普遍存在于该党党内的团结气氛和务实态度印象深刻，他们成群结队地大批加入了它的队伍。”社会党人历史学家安东尼奥·拉莫斯·奥利维拉写道，“从没有翻阅过马克思主义宣传品的军官和官员变成了共产党员，一些人经过深思熟虑，一些人由于道德缺陷，还有一些人则为被该组织激起的热情所驱使。”²

125

“如今，资产阶级将军和政治家以及许多赞成共产党保护小块土地拥有者的政策的农民已经加入了它的队伍。”路易斯·费希尔写道，“我想到了这些人的影响力以及他们所受到的影响。不过，最重要的是，他们新的政治身份反映了对旧的社会制度的绝望，同时他们还希望挽救残存的一些旧的制度。”³

“每当波尔迪带我们去与各部年轻的官员交谈时，”社会党人阿图罗·巴雷亚写道，“我总是试图对他们进行评估。给我印象最深的是，这些大多来自上层中产阶级的野心勃勃的年轻人现在纷纷宣称自己是共产党员，对于他们来说，在马德里加入共产党，不是因为它是一个革命工人的政党，而是因为这意味着他们加入了最强大的团体，可以分享其既定的权力。他们已经跃过了人道主义的社会主义阶段；他们讲求实效，冷酷无情。”⁴

至于知识分子，另一名社会党人F.费兰迪斯·阿尔沃斯肯定地说：“西班牙传统的骄傲已经因为知识分子而变成了耻辱。他们几乎全都向共产党的意志卑躬屈膝。”⁵在马德里围城初期，共产党控制的第五团以精心设计的方案疏散知识分子和科学家，为他们提供各种安慰和保护，这表明了共产党为争取西班牙知识界的支持所做的努力。⁶

前共产党人费尔南多·克劳丁是一名具有三十年党龄的党员，他写道：

共产国际和西班牙共产党从一开始就知道军事问题的决定性意义。在苏联专家和外国共产党精英的帮助下，西班牙共产党全力以赴设法解决这个问题。它的组织结构、运转方式以及训练有素的骨干分子使它特别适于做这件事。……必须立即创建半军事化的布尔什维克模式，按照这种模式，西班牙共产党可以迅速将自己变成共和国的军事组织、变成军队的核心力量。离开这种模式，自由主义实验、共和国政权、共和派政党和工会，一切都将死路一条。这个最基本的常识使群众超越其政治和党派倾向认识到，没有一支军队，没有统一指挥，没有纪律约束，没有战时经济，在前线和后方没有共产党所提出的那种“钢铁般的”团结，不使一切考虑服从于打败正在逼近的敌军这一当务之急，就没有生路。在内战爆发的头几个月，如果共产党及其庞大的外围组织统一社会主义青年联盟（JSU）的成员数量像它的政治威信和影响力一样迅速增加了的话，那不是因为无产阶级认为西班牙共产党比卡瓦列罗分子和无政府工团主义者“更革命”，而是因为它的目光更锐利并且具有更强的处理关键问题的能力。苏联通过援助共和国而获得的声望肯定对西班牙共产党的实力增长影响不小，不过，我们刚刚指出的才是其发展壮大的主要原因。值得注意的是，在劳动者总工会——更不必说全国劳工联合会——的基层工会中，也就是说，在组织起来的工人阶级当中，共产党的党员人数和影响力相对来说增长较慢。西班牙共产党所获得的秩序和法律的捍卫者以及小业主的保护人的声誉吸引许多小资产阶级分子入了党。而且尤为重要是，共产党的军事才能以及某种被简化的意识形态——在这种意识形态中，革命被认为是掺杂着爱国精神的反法西斯主义——吸引大量没有受过传统的工会和工人组织训练的青年人成为共产党的追随者，或者通过统一社会主义青年联盟接受共产党的领导。⁷

126

作为共产党实力增强的某种原因，与上面这些几乎同样重要的一个因素是其他党派组织的相对虚弱甚至无能。从内战爆发开始，对民众失去了

影响并且明显力不从心的共和派退居幕后，或者像一位西班牙共和国的朋友指出的那样，他们“在整个内战期间保持着一种麻木状态”，⁸把阻止左派革命和保护中产阶级利益的棘手任务丢给了共产党人。这种变化的征兆是左翼共和派的喉舌《政治报》对共产党作了正面的宣传。“资产阶级共和派的态度变化……非常有趣。”发表在苏联《真理报》上的一篇文章写道，“过去他们尽量不提共产党，并以仇恨和轻蔑的语气谈论它。现在，某些共和派的舆论工具用整版的文章赞美它。”⁹

左翼共和派不仅友好地宣传共产党，声称它所表明政策与他们自己的正好相同，例如，本人身为左翼共和派成员的何塞·希拉尔就说，他的党派与共产党人的观点几乎完全一致；¹⁰而且，用社会党温和派领导人因达莱西奥·普列托的话说就是，他们竟然多次为苏联的野心效力。¹¹

此外，尽管无政府工团主义者人数众多，但是，由于失去了中心目标，与具有稳固的组织、强大的凝聚力，尤其是严格的纪律的共产党人相比，他们已经不是对手。据前意大利共产党员、巴伦西亚的共产党报纸《真理报》的负责人埃托雷·万尼说，共产党的纪律“被狂热地接受，以致人们立即变成了工具，从而形成了我们的力量。面对战争的需要，家庭，个人，一切东西都不复存在。对我们来说只有党——党无时无刻不在”。¹²

在西班牙共产党的行为准则中，不择手段和极权主义本质成为其政治成功的主要因素。杰拉尔德·布雷南写道：

127

[共产党人]不能理性地讨论问题。他们的每一个毛孔都散发着顽固的极权主义气息。他们的权力欲贪得无厌而且完全不择手段。对于他们来说，打赢内战意味着为共产党赢得权力。……不过，更为重要的也许是，他们没有道德底线或政治操守。他们的机会主义涉及方方面面。只要出尔反尔保证获利，他们似乎没有什么不能改变的纲领，就像利用无产阶级对付中产阶级一样，他们打算利用中产阶级对付无产阶级。马克思主义的历史方法肯定有助于随心所欲地歪曲历史；尽管如此，他们对于自己过去许多信条的背弃仍然让人想起十七世纪耶稣会传教士的壮举，为了更有利于改变中国人的宗教信仰，这些传教士隐瞒了耶稣被钉死在十字架上的事迹。这是一个值得强调的对比。因为

他们忠于一个组织而不是一种思想，忠于一个外国教皇而不是一个民族群体，他们遵循的是罗耀拉^①所开创的道路。他们对西班牙的影响也非常相似。正如耶稣会士从莱内斯^②时期起就已背弃了他们那个时代的伟大的苦行神秘运动并且拼命将一切都变成盲目的服从和奉献一样，共产党人表明，他们不喜欢伴随着革命而产生的极度的情感释放。他们不赞成一切冲动，无论是情感失控还是情感所造成的失控，因此，他们对各种形式的情感释放采取严格的实用主义态度。¹³

由于失去了中心目标，无政府工团主义者无法与组织稳固的共产党对抗，外国共产党的精英出谋划策指导并且加强了共产党的组织。“在为自由主义者辩护的同时，应当清楚地说明，”自由主义历史学家塞萨尔·M.洛伦索写道，“社会党人、共产党人以及其他党派成员的文化水平并不高。严重影响政治生活的不仅是教育的缺失，而且还有陈腐过时的教育，这种教育几乎不传授科学知识并且一直被教会所垄断（尽管有人努力推广教育，例如中产阶级的弗朗西斯科·希内尔·德洛斯·里奥斯^③和无产阶级的弗朗西斯科·费雷尔^④），使受教育的人能力低下。”¹⁴即使确如洛伦索所说，内战爆发初期全国劳工联合会在马德里占据了支配的地位，它这种并不稳固的支配地位也没有持续多长时间。¹⁵他证实，由于不打算夺取政权，全国劳工联合会没有它在加泰罗尼亚、阿拉贡或马拉加所拥有的那种无可争辩的控制权，因此，它不能大权独揽地指挥军事行动、领导警察和司法部门或者改变经济结构。“结果，马德里陷入了难以形容的混乱状态。各种意识形态群体形成了一个国中之国。每个国中之国都有自己的民兵、自己的法庭、自己的‘契卡’、自己的监狱、自己独占的建筑物、自己的食品和军火库；它们以自己的方式打仗并且完全根据自己的需要采取行动。……[共和国]政府无法履行统一的职责。由于事实证明社会党人太

128

① 伊格纳西奥·德·罗耀拉(Ignacio de Loyola, 1491—1556), 西班牙人, 一五三九年创立天主教耶稣会, 一六二二年被教皇谥为圣徒。

② 迭戈·莱内斯(Diego Laynez, 1512—1565), 西班牙耶稣会士和神学家, 耶稣会第二任总教长。

③ 弗朗西斯科·希内尔·德洛斯·里奥斯(Francisco Giner de los R í os, 1839—1915), 西班牙哲学家、文学评论家和教育家。

④ 弗朗西斯科·费雷尔(Francisco Ferrer, 1859—1909), 西班牙自由思想家和无政府主义者。

缺乏活力以致无法承担这一责任，由于共和派因其信条、因其坚决反对独裁专制而不能或者不愿承担这一责任，其他党派理所当然将取而代之。这个党派就是共产党。

“从一开始斯大林分子就创建了一种军事组织。他们遵守纪律的军队等级森严，配备了完善的后勤供应，因此很快显示出对于其他民兵武装的优势。……九月和十月，他们从共和派手中夺取了控制权并且吸引其他党派跟随其后，俨然首都最有力的保卫者。”¹⁶

在后面的一段内容里，洛伦索坚持认为，只要百分之九十的民众赞同全国劳工联合会和伊比利亚无政府主义者联盟所宣传的思想，西班牙就可能发生一场自由主义革命。但是，他承认，对无政府工团主义者怀有敌意的社会政治团体在人数上远远超过全国劳工联合会和伊比利亚无政府主义者联盟的追随者。

因此，为了建立自由共产主义，必须对许多人采取强制措施，阻止他们进行破坏，阻止他们造谣诽谤，阻止他们制造混乱：必须逮捕他们的首领，解散他们的组织，查禁他们的出版物。也就是说，建立自由共产主义将意味着建立某种自由共产主义专政；这将意味着否定……所谓“共产主义与各种政权背道而驰，它反对一切压制行为，不设警察和军队”。这将意味着重建国家，把有组织的无政府主义者变成一种管理其他人的统治阶层，这个阶层将会变得越来越专制并且享有越来越多的特权。（巴枯宁、克鲁泡特金和马拉泰斯塔已经明确指出了权力的危险并且解释了国家的起源。）

但是，如果这些理论上的考虑及其对于意识形态的忠诚没有使西班牙自由主义者退缩的话，他们实际上有可能掌握政权吗？这一点非常令人怀疑。……只有执行铁一般纪律的政党才有可能掌握政权，那是一个以军队的形式组织起来的政党，它有一个革命的参谋部，有权力集中、等级森严的组织结构和决不妥协的思想路线，作战团队拥有不容置疑的指挥官。在全国劳工联合会内部，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主张，每个人都按自己的判断行动，领导人不断受到批评和挑战，各地区联合会的自主权不可侵犯，同样，在各地区联合会的内部，地方协

会和分会的自主权不可侵犯。为了做出一项大家普遍接受的决定……积极分子必须全力以赴，发表演说，私下接触，从一个地方到一个地方四处活动。自由主义者对投票表决极为反感；他们追求的一致同意需要进行没完没了的辩论。在这些条件下，纵使其“领导人”希望，全国劳工联合会怎么可能掌握政权？¹⁷

129

当革命爆发时，社会党很可能仍然是首都马德里和新旧卡斯蒂利亚地区最强大的势力——尽管无政府工团主义者声称情况并非如此。他们的力量很快就被共产党公开和暗中的背叛削弱了，他们自己的消极被动在某种程度上对此负有责任。一位曾经深受共产党影响的社会党左派领导人承认：“与许多社会党人的暮气沉沉相比，我很欣赏共产党人的朝气蓬勃。”¹⁸另一名社会党左派人士写道：“我对社会党在困难的情况下承担责任行使职权的能力彻底失去了信心，我的同志托雷斯是社会党青年组织的资深成员，他最近加入了共产党。”¹⁹一九三七年三月九日，社会党温和派的报纸《社会主义者》编发了一群社会党人写来的一封信，信中写道，他们将要加入共产党，因为他们自己的政党在各条战线没有显示出活力。²⁰

社会党人陷入了派系纷争。以因达莱西奥·普列托为首的温和派所控制的社会党执委会与支持拉尔戈·卡瓦列罗的地方组织势不两立。“各省的组织 and 部门自行其是。”左派控制的马德里社会主义者团体中的卡瓦列罗派领导人之一文塞斯劳·卡里略证实，“马德里的党组织只与一些向其请示的地方组织和支部保持着联系。”²¹“内部纷争表明，”著名温和派人士加夫列尔·莫隆写道，“社会主义运动的生命已经衰弱到了苟延残喘的地步。……在后方，像在前线一样，最大胆、最狂热和最不择手段的人把他们的观点强加于人，让他人感到他们的影响，并显示着自己的个性。”他在后面证实：“具有这些道德品质和多变性格的人没有谁留在社会党内。另一方面，共产党内充满了他们这种人。”²²

共产党人充分利用了社会党内部的分裂。前西班牙共产党政治局委员赫苏斯·埃尔南德斯是两名共产党人政府部长之一，他在内战结束多年以后论及社会党领导人之间的不和时写道：“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我们千方百计地利用他们的自相残杀。今天我们支持一方反对另一方。明天我们

改变立场转而支持另一方。于是，今天这样，明天那样，每天我们都在煽动一方反对另一方，最终导致他们互相残杀，我们在众目睽睽之下采取了相当成功的策略。”²³

在大有希望的情况下，共产党发起的吞并社会主义运动的行动开始了。当然，他们迅速取得的成功——尤其是在扩大其对左派的优势方面取得的成功——将不可避免地使拉尔戈·卡瓦列罗心烦意乱；因为，如他后来声称的那样，当内战之前主张与共产党联合时，他可能以为他有能力兼并他们，²⁴绝没有料到被兼并的是他自己的追随者。内战爆发没几天，当此前一直坚定支持他的拉斐尔·比迭利亚所领导的西班牙社会党加泰罗尼亚地方组织与共产党的加泰罗尼亚支部以及另外两个组织联合创建加泰罗尼亚统一社会党——该党接受第三国际的纪律约束²⁵并将劳动者总工会的加泰罗尼亚分会置于自己的控制之下²⁶——时，他表示了强烈不满。但是，在左派控制的其他地区，尤其是在社会党左派的大本营马德里，对拉尔戈·卡瓦列罗势力的威胁全方位地显示出来。由于社会党被内部纷争弄得四分五裂，大批得不到本党派指示的社会党左派工人在共产党的活力及其拉拢手段的影响下发生了动摇，²⁷他们的士气越来越低落并且开始加入竞争对手的队伍。更糟糕的是，拉尔戈·卡瓦列罗在社会党和劳动者总工会中最信任的一些助手秘密或者公开地转身投靠了共产党人。这些人包括外交部长和社会党马德里地方组织副主席胡利奥·阿尔瓦雷斯·德尔巴约；劳动者总工会全国建筑工人联合会书记埃德蒙多·多明格斯；劳动者总工会银行雇员工会主席和劳动者总工会执委会成员阿马罗·德尔·罗萨尔；社会党工会组织司库费利佩·普雷特尔；²⁸以及两位著名的知识分子议员玛加丽塔·内尔肯²⁹和弗朗西斯科·蒙铁尔，他们都是西班牙社会主义工人党党员。

一九三七年三月，蒙铁尔在西班牙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上发表讲话说：“在这场革命斗争中，一个组织，多年来始终是一支强大的政治力量而且几乎是西班牙无产阶级独一无二的领头羊，因为自己的错误四分五裂趋于毁灭；另一个组织，最初由少数人所组成，但是，七月十八日以后，它却在无比正确的马克思主义和列宁主义的指引下成为反法西斯斗争的真正动力和西班牙人民实际上的带头力量，对此进行思考让我们这些几周之前还不是共产党员的人感到惊讶。”³⁰

有损拉尔戈·卡瓦列罗政治影响力的一个更重要的新情况是他对统一社会主义青年联盟³¹失去了权威。在内战爆发的三个月前，统一社会主义青年联盟由共产主义青年联盟与社会主义青年联合会合并而成，双方代表在莫斯科与青年共产国际执委会一起商定了两个组织的合并方案。³²统一社会主义青年联盟总书记圣地亚哥·卡里略一九三七年声称，在内战即将爆发之前，联盟成员已从合并时的（据他提供的统计数字）四万人增加到了十五万人，³³一九三七年四月继续增加到三十万人。³⁴

131 据拉尔戈·卡瓦列罗的亲密战友兼顾问——或者像其对手形容的那样是“幕后操纵者”——路易斯·阿拉基斯塔因描述，这一合并的准备工作在他的姻兄弟胡利奥·阿尔瓦雷斯·德尔巴约的家里进行。³⁵“我在马德里住他楼上，因此看到社会党青年组织的领导人常来他家与共产国际的代表会面，后者是个名叫[比托里奥·]柯多维拉³⁶的人，当时在西班牙引人注目，他使用梅迪纳这个化名，说西班牙语带有浓重的南美口音。……在那里，为他们安排了莫斯科的朝圣之旅；在那里，为把青年社会党人、西班牙工人阶级的新一代拱手交给共产主义达成了协议。”³⁷尽管阿拉基斯塔因当时肯定赞成进行这些谈判，但在内战爆发后他从没有公开承认过他的默许。

人们应当记住的是，内战爆发之前，阿拉基斯塔因和拉尔戈·卡瓦列罗都与共产国际的代表长期保持着热情友好的关系。内战期间以及战后支持共产党的阿马罗·德尔·罗萨尔曾经是卡瓦列罗的支持者和劳动者总工会执委会成员，据他说，一九三四年左派叛乱失败后，共产国际的代表经常去监狱探望卡瓦列罗。他写道：“与共产党的关系进入了一个热情友好的阶段并在各种场合表现出对苏联的支持。第三[共产]国际的代表与最有名的卡瓦列罗派人士保持着友好关系，例如阿拉基斯塔因、阿尔瓦雷斯·德尔巴约等等。尽管卡瓦列罗在[他公开发表的回忆录]《我的回忆》中忘了说，[一九三四年十月的叛乱失败后]他经常在狱中接待共产国际的代表，其中包括梅迪纳（比托里奥·柯多维拉），后者总是由阿拉基斯塔因或阿尔瓦雷斯·德尔巴约陪同。一九三四年以前，他在劳动者总工会的办公室里接待他们。……他被释放之后，会见继续在同一个地方进行。”³⁸

至于发生在一九三六年四月的两党青年组织的合并，尽管后来所有的

说法都截然相反，拉尔戈·卡瓦列罗鼓励推进了这次合并，³⁹即使以下情况确有其事：合并进行之前，双方在一九三六年三月发表的一份联合声明中一致同意，在一个统一的全国代表大会以民主方式确定统一组织的原则、纲领和最终的组织形式并且选出一个领导机构之前，合并以共产党的青年组织成员加入社会主义青年联合会的形式进行。⁴⁰但是，在拉尔戈·卡瓦列罗整合工人运动的政策推动下，两个青年组织的合并迅速进行，并没有召开统一的全国代表大会。⁴¹拉尔戈·卡瓦列罗不反对合并，因为共产主义青年联盟规模小得无法与他的社会主义青年联合会相比，据估计，与后者的五万名成员形成对照，前者只有三千名成员；⁴²而且因为他相信，他可以通过其支持者控制统一后的工人运动。结果，事与愿违，他被无情地欺骗了；因为，内战爆发没几个月，此前一直狂热崇拜他的统一社会主义青年联盟总书记圣地亚哥·卡里略⁴³——被人称为宠儿（niño mimado）的社会党领导人，总是讨人喜欢地自称“小圣地亚哥”⁴⁴——与社会主义青年联合会的另外几名前领导人一起悄悄加入了共产党。⁴⁵包括卡里略在内，他们中的一些人后来成为西共中央委员会委员⁴⁶（卡里略被任命为政治局候补委员，流亡期间成为党的书记并在一九七五年佛朗哥将军去世之后以这一身份回到西班牙）并将统一社会主义青年联盟变成了共产党政策的主要后盾之一。

132

当以卡里略为首的一批社会党青年组织领导人透露出他们背叛拉尔戈·卡瓦列罗的消息时，后者受到了巨大的打击。卡里略本人证实：“……听我们说了之后，他眼含热泪说道：‘从现在起，我再也无法相信西班牙革命了。’这是因为我们这些青年人是革命的真正力量。这支力量正在离他而去。他是真诚的，因为他相信，领导西班牙革命是他的任务。但他没有责备我们。他只是显示了他的悲伤。”⁴⁷不过，拉尔戈·卡瓦列罗后来对一位关系密切的合作者说：“他更像是我的一个孩子。我决不会忘记共产党人把他从我身边夺走了。”⁴⁸在其没有发表的回忆录中，他也发泄了自己的怨恨：“在社会主义青年联合会中，不乏圣地亚哥·卡里略那样的犹太，他们千方百计搞了一次假合并，成立了他们所谓的统一社会主义青年联盟。后来，当他们加入共产国际时，他们暴露出自己的叛徒嘴脸。”⁴⁹

社会党左派领导人卡洛斯·德·巴赖瓦尔承认自己在内战初期曾经深受共产党人的影响，他在评论这次背叛时回忆说：“一群统一社会主义青年联盟[JSU]的领导人到我这儿来告诉我，他们决定一起加入共产党。……我认为非常可怕的是，这样的事情竟能发生……我后来得知，没有人知道这件事，只有阿尔瓦雷斯·德尔巴约除外，他们采取每一步行动都通知他。他们一伙还得到了我们习惯称之为‘莫斯科眼线’的那个人的指点，他是共产国际的秘密代表[比托里奥·柯多维拉]。”⁵⁰

多年以后卡里略承认，甚至早在内战爆发之前，他就受到柯多维拉的影响。“那时我已认识他。”卡里略告诉雷吉斯·德布雷和马克斯·加洛，“……我必须说，柯都维亚（原文如此）与我合作得非常好。我成为一名共产党员要在一定程度上感谢他。”⁵¹

一九三六年十一月七日，卡里略加入共产党。⁵²他从前的好友费尔南多·克劳丁是内战期间的统一社会主义青年联盟领导人，而且是有关问题的权威人士。克劳丁写道：“正如当时他向我们解释的那样，[卡里略加入共产党]是因为，在保卫马德里的关键时刻，当敌军攻打首都脆弱的防线时，社会党显得无能为力。它的全国和地方领导人放弃首都逃往巴伦西亚和巴塞罗那。……共产党的高级领导人则坚持继续留在那里，为人们树立了某种榜样。”他在后面又写道：“[作为]统一社会主义青年联盟的领导人，他成为一个显要的人物，但是他的政治局候补委员这一职务几乎可以忽略不提。……他很少参加[政治局会议]，只是一个负责执行党的政策的人。他不属于决定重大问题的核心集团，那个集团由共产国际代表……和西班牙共产党的主要领导人组成，前者是苏联（在外交、军事和情报方面）的高级代理人。”⁵³

为了充分了解未来的事态发展，有必要在此强调莫斯科的国外代理人——他们称之为共产国际“代表”或“讲师”⁵⁴——当时对西班牙共产党领导人行使的权力。用前西共中央委员会委员恩里克·卡斯特罗的话说，阿根廷人比托里奥·柯多维拉是“党的真正首脑”。⁵⁵此外，据曾在巴伦西亚的共产党喉舌《红色阵线报》任职并且认识柯多维拉的前秘鲁共产党人欧多西奥·拉维内斯说，内战之前柯多维拉“在政治上清理了”西班牙共产党的领导层，用“顺从其旨意的人”取而代之。⁵⁶据同一位知情人说，保

加利亚人鲍里斯·斯特凡诺夫是“少数几个在大清洗中得以幸存的列宁的朋友之一”，而且还是斯大林的好友，他也在西班牙，使用莫雷诺这个化名，认识他的拉维内斯形容他是“革命、战争、共产党的各种骗局和花招的总导演。他的话被当作圣旨，仿佛斯大林亲自授意一般”。⁵⁷同样重要的事实是，意大利共产党人帕尔米罗·陶里亚蒂也在西班牙活动，特别是在柯多维拉于一九三七年夏天离开以后。与斯特凡诺夫一样，陶里亚蒂是共产国际执委会成员，他一九二五年逃出墨索里尼统治的意大利，二战之后成为意大利共产党的领导人。陶里亚蒂这时成为西班牙共产党实际上的领导人，指导战略部署并且多次为何塞·迪亚斯和热情之花撰写演说稿。⁵⁸陶里亚蒂使用化名埃尔科莱·埃尔科利和阿尔弗雷多，与斯特凡诺夫一起在西班牙一直待到内战结束。

陶里亚蒂是西班牙共产党实际上的领导人这一点得到了坚定支持克里姆林宫的恩里克·利斯特的证实：“他是共产国际在西班牙的代表，全体政治局委员毫无怨言地服从他。”⁵⁹

在一九五七年二月向美国参议院国内安全小组委员会所作的证词中，从一九三六年九月起到一九三八年七月叛逃为止一直担任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秘密警察）派往西班牙的特工负责人的亚历山大·奥尔洛夫说：

“帕尔米罗·陶里亚蒂也与我一起……在西班牙，当时他是我的好友。他代表莫斯科领导西班牙共产党并且指挥共产党的民兵武装。……[现在担任]意大利共产党领导人的就是共产主义运动中最能干的那个人——即帕尔米罗·陶里亚蒂。”⁶⁰此外，在曾于一九三八年担任国际纵队第十五旅第一政委的美国共产党人约翰·盖茨看来，“陶里亚蒂是共产党在西班牙权力最大的人物。他负责制订西班牙共产党的总体政策。……法西斯分子叛乱之后西班牙共产党的巨大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应当归功于他的意见和领导。……陶里亚蒂非常善于出谋划策，他也许是最能干的共产党人”。⁶¹

圣地亚哥·卡里略同样对陶里亚蒂赞誉有加，一九七一年，这位流亡中的共产党书记写道：“对于我们这些年轻而且缺乏经验的人来说，[他]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顾问和名副其实的导师。”⁶²“他是一个非凡的人。”一九七四年，卡里略对雷吉斯·德布雷和马克斯·加洛说，“我认为他是最有教养和才华的共产主义运动领导人。”⁶³

134

国际纵队大本营所在的阿尔瓦塞特省的社会党人省长、与陶里亚蒂有私交的胡斯托·马丁内斯·阿穆蒂奥提供了最耐人寻味的说明：“他在斯大林派来的所有[政治]代表中最有手段，内战结束前他是共产政策的实际负责人。我认为……他的智力和能力高于斯特凡诺夫。……共产国际在国际纵队内部的政治方向完全是由这个人引导的，他与斯特凡诺夫一同制定共产党的国内政策和军事政策。……他常常谦虚地请教问题，习惯于注重细节，总是通过各种渠道了解政治军事要人的性格特点并且诱使对话者说出他们的看法。但是，关于他，人们无法根据他的姿态或者面部表情判断……他在想什么或者他是什么感觉。”⁶⁴

“农夫”认为陶里亚蒂“冷漠，玩世不恭，从不紧张，毫无顾忌”。⁶⁵在战后于莫斯科举行的一次西班牙共产党领导人会议上，恩里克·卡斯特罗在发言中作了形象的描述：“陶里亚蒂把眼镜擦拭干净，最后对着光线检查了一下，然后挨个审视我们。他盘着双腿，俨然一尊石像般端坐不动。……我想起了他的西班牙秘书说过的话：‘他是那么一种人，与我做爱就像下令枪毙我一样冷漠！’”⁶⁶

鉴于共产国际这个组织铁板一块的特点，这种情况不足为奇：凭借他们丰富的政治经验及其所掌握的由克里姆林宫直接授予的权力，柯多维拉、斯特凡诺夫以及后来的陶里亚蒂几乎毫不困难地主导了制定西班牙共产党和统一社会主义青年联盟的政策的政治局会议。“西班牙没有列宁，”费尔南多·克劳丁写道，“但却有足够的共产国际顾问。何塞·迪亚斯和佩德罗·切卡这些真正的革命家和组织者以及多洛蕾丝·伊巴露丽那种深受民众欢迎的演说家不具备反对共产国际的人民阵线政策所必不可少的理论基础。”⁶⁷据共产党内的一名坚定的反对派人士说，他们的领导人“智力平庸，性格懦弱，惯于服从”。⁶⁸

无论如何，由于比托里奥·柯多维拉的权力和影响，由于他对圣地亚哥·卡里略以及另外几个加入共产党的社会党青年组织领导人的帮助，统一社会主义青年联盟迅速成为推行共产国际政策的一个重要工具。背叛社会党后不久，共产党人进一步加强了他们对这个组织的控制。一九三七年一月，取代拟议中的将以民主方式确定统一组织的原则、纲领和最终的组织形式并且选出一个执行机构的统一的全国代表大会，圣地亚哥·卡里

略在巴伦西亚召开了一次全国会议。他为这次大会指定的代表不仅有统一社会主义青年联盟地方组织的代表，而且还有许多来自前线 and 工厂的年轻共产党员，这是一种策略，使他可以自始至终控制会议并保证选出一个安插了大量共产党提名的候选人的全国委员会和执行机构。“共产党人没有举行代表大会，”来自阿利坎特省的代表安东尼奥·埃斯克里瓦诺写道，“而是玩弄‘骗局’召开了所谓巴伦西亚会议。他们竭力把它说成一次‘民主’的统一代表大会，但是事实完全相反。”⁶⁹

“考虑到我们的国家和我们的组织战时发生的种种变化，”几个月后在为自己的行为辩护时，圣地亚哥·卡里略问道，“我们能够举行一次只有地方组织代表参加的代表大会吗？当我们的青年纷纷奔赴前线时，我们能够举行一次我们可能会在七月十八日之前我们的青年尚未拿起武器捍卫他们的自由时所举行的那种形式的代表大会吗？不，我们不能举行这样的代表大会。我们必须适应形势。形势使我们的代表大会，我们的全国会议，不仅应当由地方组织的代表参加，而且必须让那些在工厂里为努力提高战时生产做出巨大奉献的青年出席，必须让那些在陆地、在海上、在空中为我们的自由浴血奋战的青年出席；也就是说，让最优秀的那一部分青年，不是地方组织里的而是前线的那一部分青年，拥有掌控联盟生活的合法权利。”⁷⁰

下面这一段从内战结束多年以后安东尼奥·埃斯克里瓦诺写给我的一封信中摘录的内容耐人寻味：“我记得当时选举统一社会主义青年联盟全国委员会的情况。……几位青年运动的老战士会晤了卡里略及其助手以及各省选出的代表。随后他们获悉，由于得到了同意领导所有安排的指示，每一位全国委员会成员的‘选举’均以口头表决的方式通过。”⁷¹

在这次政变中，卡里略对拉尔戈·卡瓦列罗的慷慨赞誉肯定有助于他达到目的。“此时此地我必须说，”他在向会议发表的演说中宣称，“拉尔戈·卡瓦列罗一如既往地享有西班牙青年人的支持，而且这种支持超过了以往。我还必须补充的是，对于我们来说，像过去一样，卡瓦列罗同志是帮助我们联合起来的那个人。他是这样一个人：为了我们正在捍卫的共同事业，我们期待从他那里得到更多有益的建议，以使西班牙青年人的团

结成为现实。”⁷²

136

下面这些事实肯定也帮助了卡里略：首先，社会党的青年代表当时几乎无人知道他已加入了共产党，以为他和统一社会主义青年联盟的其他领导人完全是在按照拉尔戈·卡瓦列罗及其社会党内的支持者的指示行事；此外，完全没有进行讨论。安东尼奥·埃斯克里瓦诺回忆说：

[在会议上]没有讨论任何事情。讲话的人仅限于发表演说或作报告，但是接着不进行讨论。一个名叫卡拉斯科的人代表反坦克部队作了如何摧毁坦克的报告；一名水手讲了他自己的事，一名飞行员讲的也是自己的事，如此等等，不一而足。事实是，没有讨论有关两个组织合并的问题。相反，发生的一切都被认为顺理成章。由于两个原因，我们这些忠于卡瓦列罗的人没在会议上提出任何异议，现在看来都是因为缺乏经验造成的，尽管当时无可非议。这两个原因是：1.参加会议的社会党青年代表有百分之九十的人不知道卡里略、莱恩、梅尔乔和奥罗拉·阿奈斯等人全都投靠了共产党。我们以为他们还是青年社会党人，因此，尽管我们感到似乎有些蹊跷，但是仍然相信他们是在按照卡瓦列罗和社会党的指示行事。如果我们知道这一伙懦夫已经背叛了我们，我可以向你保证，出现的情况将完全不同。但是我们丧失了警惕。这就是事情的真相，我不为承认它感到羞耻。2.会议的气氛和形式出乎我们的意料，当我们打算做出反应时，会议已经接近尾声。我们社会主义青年联合会的成员通常要对代表大会的议事日程及与会代表进行充分民主的讨论，因此确信巴伦西亚会议将以同样的方式进行。……没有采用这种方式。当我们意识到什么事情发生了时已经太晚。会议结束了。⁷³

实际上，直到一段时间之后，当拉尔戈·卡瓦列罗与共产党人之间的斗争进入白热化而且人们充分意识到共产党在巴伦西亚会议上所取得的胜利的全部意义时，第一道裂痕才真正出现。当包括苏格拉底·戈麦斯、顿迪多尔·洛佩斯和莱昂西奥·佩雷斯在内的一些著名的卡瓦列罗支持者公开抗议这次政变时，⁷⁴当统一社会主义青年联盟巴伦西亚省委员会总书记何

塞·格雷戈里·马丁内斯和统一社会主义青年联盟阿斯图里亚斯地区总书记拉斐尔·费尔南德斯写给圣地亚哥·卡里略的公开信——他们在公开信中以没有与他们的地方组织进行协商为由，拒绝接受巴伦西亚会议选举他们担任的统一社会主义青年联盟全国委员会的职务——发表时，⁷⁵裂痕出现了。“像我抗议共产党对统一社会主义青年联盟的控制那样表示抗议[的人都遭到了污蔑和诽谤，有时甚至被杀害。”直到内战结束一直在统一社会主义青年联盟内部领导着反对共产党的社会党反对派的苏格拉底·戈麦斯回忆说，“共产党从没有尝试过心平气和地冷静考虑一下政治上的不同意见；他们只是进行漫骂、污蔑和诽谤。”⁷⁶

如果结合所有这些事态发展，同时考虑到共产党人在玩弄阴谋诡计、挑动敌对派别相互斗争、大量安插秘密党员或同路人于关键岗位、对加入他们的队伍或者为他们的利益效力的人软硬兼施等各个方面所表现出来的能力，那么，内战初期他们作为实力派出现在反佛朗哥阵营中就不难让人理解了。

137

注释：

- 1 何塞·迪亚斯，《斗争的三年》，第390页。值得一提的是，在一九三八年一月二十八日写给共产国际的一份报告中，共产国际在西班牙的代表帕尔米罗·陶里亚蒂说，当时党的组织部门所声称的三十三万九千名党员这个数字看来似乎有些可疑，因此不应予以公布。“三十三万九千是中央委员会在发给地方组织的通讯中假定的数字而不是实际缴纳党费的人数。”他补充说，“我认为，党员的实际人数稍稍多于二十万，但这不是准确的估计。”（帕尔米罗·陶里亚蒂，《关于西班牙内战的文件》，第174页）
- 2 安东尼奥·拉莫斯·奥利维拉，《现代西班牙的政治、经济和人，1808—1946》，第599页。
- 3 一九三七年八月七日《民族》。
- 4 阿图罗·巴雷亚，《制造反叛》，第706页。
- 5 F.费兰迪斯·阿尔沃斯，《西班牙的祸害》，第95页。
- 6 实例见一九三六年十一月二十四日和十二月一日《政治报》。
- 7 费尔南多·克劳丁，《共产主义运动的危机》，第一卷，第186页。
- 8 亨利·巴克利，《西班牙共和国的生死存亡》，第402页。
- 9 一九三六年十一月六日苏联《真理报》。
- 10 何塞·希拉尔的演说，载一九三七年三月十日《巴伦西亚呼声报》。
- 11 因达莱西奥·普列托一九四〇年四月二十一日发表的演说，见普列托《墨西哥“巴勃

- 罗·伊格莱西亚斯”俱乐部开业》，第13页。另请参阅胡安·洛佩斯发表在一九三七年六月十九日《全国劳工联合会报》（马德里）上的文章。
- 12 埃托雷·万尼，《我，苏联共产党员》，第29页。
 - 13 杰拉尔德·布雷南，《西班牙迷宫》，第326页。
 - 14 塞萨尔·M.洛伦索，《西班牙无政府主义者与权力，1868—1969》，第96—97页，注释78。
 - 15 同上，第210—211页。
 - 16 同上，第211—212页。
 - 17 同上，第236—237页。
 - 18 卡洛斯·德·巴赖瓦尔发表在一九三九年八月五日《自由之路》上的文章。另请参阅他发表在一九四〇年六月号《方向盘》（布宜诺斯艾利斯）上的文章。
 - 19 巴雷亚，《制造反叛》，第579页。
 - 20 关于一名社会党左派人士对社会党如何在与共产党人和无政府主义者争夺阿利坎特省会主导地位控制权的角逐中败下阵来的描述，见费兰迪斯·阿尔沃斯《西班牙的祸害》，第64—65页。
 - 21 一九三九年五月二十三日向工党及社会党国际提交的报告，载（一九三九年六月？）《独立新闻》特刊。
 - 22 加夫列尔·莫隆，《过去的政治与未来的政治》，第79和88页。人们饶有兴趣地注意到，在莫隆这本书出版五年后，他本人加入了共产党（见一九四七年四月十一日墨西哥城的西班牙共产党流亡者的报纸《人民阵线报》所发表的公告）。
 - 23 赫苏斯·埃尔南德斯，《我是一个斯大林的部长》，第135页。一九四四年埃尔南德斯被开除出党。见赫苏斯·埃尔南德斯，《在这个充满谎言的国家》，第215—227页。在后来的日子里，他受到共产党及其支持者的严厉谴责。一九七七年，共产党的秘密党员阿马罗·德尔·罗萨尔对他进行了最离奇的攻击：“由于他那些了解他的道德品质及其过往经历的同志们的疏忽大意，[他]被提拔到[教育和艺术]部长的职位上。……在一次从布拉格乘火车去华沙的旅途中，[拉尔戈·卡瓦列罗政府的共产党人农业部长]比森特·乌里韦详细地给我讲了赫苏斯·埃尔南德斯过去的一些事情：他是一个吃软饭的人，一个职业混混，一个从教堂的施舍箱里偷钱的人。”（阿马罗·德尔·罗萨尔，《西班牙劳动者总工会史，1901—1939》，第二卷，第525页）倘若确如罗萨尔所说，共产党真的了解埃尔南德斯的道德品质，人们纳闷，他怎么会在一九三一年成为政治局委员并且负责党的机关报《工人世界报》，怎么会在一九三六年成为议会议员和公共教育部长。
 - 24 见其一九三九年十一月二十日写给何塞·布列霍斯的信，收入弗朗西斯科·拉尔戈·卡瓦列罗，《能做什么？》，第20—24页。
 - 25 拉尔戈·卡瓦列罗在他的演说中谈到了这个问题，见弗朗西斯科·拉尔戈·卡瓦列罗《劳动者总工会与内战》，第32页。
 - 26 见拉尔戈·卡瓦列罗《劳动者总工会与内战》，第32页；另见一九三七年四月八日《前进报》，该报是拉尔戈·卡瓦列罗在巴伦西亚的喉舌。
 - 27 关于社会党左派报纸对这些手段——例如吹捧奉承、以物质利益相诱惑和强制逼迫——的不满，见一九三七年三月十一日《光明报》所转载的发表在《劳动者联合会通讯》上的文章；另请参阅S.埃斯特维·格雷戈里发表在一九三七年三月二十七日《前进报》上的文章。
 - 28 见文塞斯劳·卡里略一九三九年五月二十三日向工党及社会党国际提交的报告，这份报告提到了多明格斯、罗萨尔和普雷特尔对共产党的支持，发表在（一九三九年六月？）《独立新闻》特刊上；另请参阅弗朗西斯科·拉尔戈·卡瓦列罗《我的回忆：致一位朋友的信》，第212页。关于罗萨尔对拉尔戈·卡瓦列罗的“反共”和“反苏”立场的批判，见

- 罗萨尔《西班牙劳动者总工会史》，第二卷，第611—631页，他把这种“反共”和“反苏”的立场主要归因于“卡瓦列罗的幕后操纵者路易斯·阿拉基斯塔因”的影响。尽管罗萨尔在整个内战期间以及战后追随共产党的路线，但是，直到一九四八年他才加入西班牙共产党（见其发表在一九四八年六月至七月号巴黎《我们的旗帜》上的要求入党的信）。
- 29 见社会党左派领导人鲁道夫·略皮斯发表在一九四九年三月号《论坛》上的文章；卡洛斯·略伦斯，《巴伦西亚和特鲁埃尔前线的战争》，第158—159页和胡利安·苏加萨戈伊蒂亚，《西班牙内战史》，第170页。多年以后，无政府主义运动的领导人费德丽卡·蒙特塞尼——她与热情之花和玛加丽塔·内尔肯是内战期间最著名的三个女性——发表了以下评论：“也许[内尔肯]希望凭借她的品德，凭借从知识分子的角度来看她对多洛蕾丝·伊巴露丽之辈的巨大优势[在共产党内]占有属于她的位置。但是，位置已经被人占据，而且热情之花将会竭尽全力保住它。玛加丽塔待在幕后，失去了她在社会党所拥有的声望，也没有在共产党内成为一个有影响的人物。这是一个错误，她为此付出了高昂的代价。”（一九六八年四月十四日《希望报》）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领导人胡利安·戈金在（一九八一年三月九日和一九八二年十月二十日）写给我的信中说，在一九三四年十月的左派叛乱之后，内尔肯已经开始转向支持共产党。
- 30 弗朗西斯科·蒙铁尔，《我为什么加入共产党》，第4页。一九三七年，蒙铁尔成为西班牙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委员（见佩德罗·切卡《伟大的政党，伟大的组织》，第23页）。
- 31 统一社会主义青年联盟。
- 32 见何塞·迪亚斯发表在一九三六年五月九日《国际新闻通讯》上的文章；塞希斯·阿尔瓦雷斯，《我们的组织和我们的干部》，第7页；另见一九三六年四月二日和六日《工人世界报》。
- 33 圣地亚哥·卡里略，《在通往胜利的道路上》，第13页。
- 34 见他的演说，载一九三七年四月二日《红色阵线报》。
- 35 不过，他在一九三九年一月一日写给美国社会党领导人诺曼·托马斯的信中承认，他是与共产党联合的建议者之一，但是，与统一社会主义青年联盟和加泰罗尼亚统一社会党的情况一样，这一联合以社会党被兼并和毁灭而告终，“现在那都是些共产党的组织”（阿拉基斯塔因文件，卷宗58/V7^b）。
- 36 柯多维拉是正确的拼读，尽管一些西班牙和外国作家把他叫做柯都维亚。
- 37 路易斯·阿拉基斯塔因，《共产主义与西班牙内战》，第9页。关于一九三六年三月初圣地亚哥·卡里略与两名社会主义青年联合会成员费德里科·梅尔乔和何塞·莱恩以及共产主义青年联盟总书记特里丰·梅德拉诺的莫斯科之旅的描述，见费尔南多·克劳丁（当时的共产党青年组织领导人）的《圣地亚哥·卡里略：一位总书记的大事记》，第35—39页。
- 38 罗萨尔，《西班牙劳动者总工会史》，第二卷，第622页。
- 39 见圣地亚哥·卡里略对拉尔戈·卡瓦列罗有效地促进了这一合并的赞颂（刊登在一九三六年四月六日《工人世界报》上的卡里略的演说）；另见西班牙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在一九三六年四月二日《工人世界报》上发表的一封致“弗朗西斯科·拉尔戈·卡瓦列罗同志”的公开信，这封公开信盛赞卡瓦列罗是社会党和共产党青年组织合并的“最有力的推动者”并向他致以“热烈的布尔什维克敬礼”。
- 40 卡洛斯·埃尔南德斯·桑卡霍（社会主义青年联合会主席）在《十月的第三阶段》中引用了这份联合声明的部分内容，见第9—11页。联合声明的全文见里卡德·比尼亚斯《统一的社会主义青年组织的形成，1934—1936》，第145—146页。
- 41 见路易斯·罗梅罗·索拉诺《西班牙内战前夕》，第77页。罗梅罗·索拉诺在社会主义青年联合会全国委员会中代表埃斯特雷马杜拉地区（埃斯特雷马杜拉地区包括西班牙西南部的卡塞雷斯和巴达霍斯两个省份——译注）。
- 42 这是统一社会主义青年联盟阿利坎特省地方组织书记安东尼奥·埃斯克里瓦诺在一九五〇

- 年五月二十三日写给我的一封信（现存胡佛研究所）中作出的估计。但是，人们应该记得，统一社会主义青年联盟总书记圣地亚哥·卡里略所提供的合并时的成员总数是四万人，不过，三千对五万的比例可能是相当准确的。据共产党人作家叶夫根尼·C.瓦尔加说，仅共产主义青年联盟就有五万一千人，见叶夫根尼·C.瓦尔加《西班牙革命》，第117页。这显然是一个夸大的数字。
- 43 实例见卡里略发表在一九三六年五月十三日《光明报》上的文章和一九三六年六月一日《光明报》刊登的他在萨拉戈萨发表的演说。
- 44 根据前社会党议员阿方索·金塔纳-佩纳向我提供的信息。
- 45 例如阿尔弗雷多·卡韦略、何塞·卡索拉、何塞·莱恩、费德里科·梅尔乔和塞拉诺·庞塞拉。据曾任共产党第五团团长的前西共中央委员会委员恩里克·卡斯特罗说，圣地亚哥·卡里略和何塞·卡索拉是一九三六年十一月六日入的党（恩里克·卡斯特罗·德尔加多，《莫斯科培养出来的人》，第439页）。另请参阅费尔南多·克劳丁，《圣地亚哥·卡里略》，第48页和一九四〇年六月十五日的西班牙共产党流亡者刊物《人民西班牙》。关于卡里略为他们的行为所作的辩护，见圣地亚哥·卡里略《青年，胜利的要素》，第14页。
- 46 根据西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佩德罗·切卡一九三七年三月所发表的一次演说（切卡，《伟大的政党，伟大的组织》，第23页）。另请参阅一九四〇年六月七日《西班牙青年》。费尔南多·克劳丁说，一九三七年三月卡里略被任命为政治局候补委员（miembro suplente）（克劳丁，《圣地亚哥·卡里略》，第48页）。
- 47 圣地亚哥·卡里略，《西班牙的明天：与雷吉斯·德布雷和马克斯·加洛对话录》，第51页。
- 48 见安德烈斯·卡拉万特斯和欧塞维奥·西莫拉，《被称为热情之花的神话》，第163—164页。
- 49 弗朗西斯科·拉尔戈·卡瓦列罗《关于西班牙内战的历史记录》（打字稿），第264—265页。
- 50 一九四〇年六月号《方向盘》杂志（布宜诺斯艾利斯）。
- 51 卡里略，《西班牙的明天》，第43页。艾萨克·唐·莱文谈到柯多维拉：“……一个矮胖、结实、几乎没有脖子的男人，出生于意大利的阿根廷共产党创始人。四分之一世纪以来他一直是苏联的地下工作者，已经升至共产国际南美地区负责人的高位。”（艾萨克·唐·莱文，《一个刺客的心灵》，第70页）
- 52 克劳丁，《圣地亚哥·卡里略》，第48页。
- 53 同上，第44和56页。
- 54 据西班牙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委员何塞·杜克（在战后接受我的采访时）说，“讲师”的叫法后来被“合作者”取而代之，他们认为后面这个称呼更策略一些。
- 55 卡斯特罗，《莫斯科培养出来的人》，第374页。
- 56 欧多西奥·拉维内斯，《大骗局》，第307页。
- 57 同上，第309—310页。关于斯特凡诺夫的更多情况，见布兰科·拉季奇和米洛拉德·M.德拉奇科维奇《共产国际人物传记辞典》，第383—384页；胡斯托·马丁内斯·阿穆蒂奥（认识斯特凡诺夫的社会党左派人士），《挟持民众》，第269—280页。后面这本书中（第271—272页）写道：“在巴塞罗那、巴伦西亚和马德里，他有专门为他保留的陈设豪华铺张的办公套间。在他身边的是他的秘书兼翻译，神秘的安赫莉塔，一个好斗的共产党人，一个真正的恶魔，天生丽质，但是冷酷和残忍。……他的另一名助手是凶恶的‘胖子卡门’（Carmen la Gorda），一个俄国人，只看相貌和姿态就让人极为反感。她先后被任命为统一社会主义青年联盟和西班牙共产党的‘干部主管’。……她的绰号是她自己挑选的。”我在西班牙遇见过“胖子卡门”，后来又在墨西哥遇见她，她在那里嫁给了瘦小的

- 西共政治局委员佩德罗·马丁内斯·卡顿，据我个人观察，后者生活在对她的恐惧中。
- 58 我为这些信息感谢二十世纪四十年代我在墨西哥遇见的一些西班牙共产党流亡者。
- 59 恩里克·利斯特，《一个战士的回忆》，第一卷，《最初的战斗》，第432页。著名的共产党民兵武装领导人巴伦廷·冈萨雷斯（农夫）在脱离共产党之后写道：“西班牙内战期间，实际领导共产党的是‘阿尔弗雷多’，即赫赫有名的帕尔米罗·陶里亚蒂，共产国际的高层人士之一。……何塞·迪亚斯和整个政治局只是在执行他的指示。”（巴伦廷·冈萨雷斯，《西班牙共产党与苏联的斯大林反对派》，第92页）
- 60 美国参议院司法委员会，《苏联在美国的活动范围：调查国内安全法案实施情况的小组委员会听证会》，第3446页。
- 61 引自约翰·盖茨未发表的对弗尔·B.约翰斯顿的手稿《西班牙内战中的国际纵队，1936—1939》（现存胡佛研究所）的评论。
- 62 《共产党人与西班牙革命：帕尔米罗·陶里亚蒂，何塞·迪亚斯，圣地亚哥·卡里略》，第144页。
- 63 卡里略，《西班牙的明天》，第64页。另请参阅安东尼奥·科登《历程》，第467页。
- 64 马丁内斯·阿穆蒂奥，《挟持民众》，第345—346页。
- 65 冈萨雷斯，《西班牙共产党与苏联的斯大林反对派》，第99页。
- 66 恩里克·卡斯特罗·德尔加多，《我对莫斯科失去信心》，第130页。
- 67 克劳丁，《共产主义运动的危机》，第一卷，第178页。
- 68 维克托·阿尔瓦，《人民阵线》，第511页。另一方面，在多年以后谈到陶里亚蒂时，热情之花否认西班牙共产党屈从于他的意志：“陶里亚蒂没有干预我们的政策。他总是说：‘你们是必须带头的人；没有任何外来者能够解决你们的问题。’换句话说，他总是以某种方式与我们交谈，给我们建议，但他决不会干涉党的政策和党的工作。他是一个非常聪明、能干而且很有教养的人。”（海梅·卡米诺，《与热情之花的秘密谈话录》，第45页）
- 69 引自安东尼奥·埃斯克里瓦诺向我提供的一篇没有发表的文章（编号1）（现存胡佛研究所，博洛滕资料集）。
- 70 见《我们为团结而进行的斗争》，第34页。另请参阅圣地亚哥·卡里略《我们是党的青年组织》，第6—9页。
- 71 安东尼奥·埃斯克里瓦诺一九五〇年五月二十八日写给我的信（现存胡佛研究所）。
- 72 卡里略，《在通往胜利的道路上》，第9页。
- 73 埃斯克里瓦诺一九五〇年五月二十八日写给我的信（现存胡佛研究所）。
- 74 实例见苏格拉底·戈麦斯发表在一九三七年六月二十五日《前进报》和一九三七年六月十一日《全国劳工联合会报》上的文章。
- 75 两封公开信分别发表在一九三七年三月三十一日和四月一日《巴伦西亚通讯》上。另见何塞·格雷戈里·马丁内斯在《前进报》上发表的声明，一九三七年四月九日《巴伦西亚通讯》转载。
- 76 罗纳德·弗雷泽，《流血的西班牙》，第333页。

胡安·内格林博士和 胡里奥·阿尔瓦雷斯·德尔巴约

共产党在政府中所占据的两个部长职位既没有体现他们在西班牙的真正实力，也没有反映他们对内阁的真正影响。共产党在政府中的真实分量与其说取决于他们占据的两个部长职位，不如说取决于他们所具有的对财政部长胡安·内格林博士和外交部长胡里奥·阿尔瓦雷斯·德尔巴约所具有的影响力，这两个人当时都是拉尔戈·卡瓦列罗的亲信。

尽管阿尔瓦雷斯·德尔巴约身为社会党马德里地方组织的副主席而且表面上是个社会党左派，但是，他很快将被一些重要的社会党人视为实际上的共产党人。拉尔戈·卡瓦列罗断言：“他自称是个社会党人，但是却无条件地为共产党效劳并且为他们的各种阴谋诡计推波助澜。”¹内战结束前不久，因为他的亲共活动，社会党的马德里地方组织决定将其停职并且建议社会党全国执委会将其开除出党。²正如我们所看到的那样，内战之前作为一名苏联的支持者和共产国际政策的拥护者，³他对促成社会党与共产党的青年运动合并起了重要作用；内战期间，他支持共产党为使社会党与共产党合并而开展的运动。⁴然而，时过境迁，在移居美国并且成为《民族》杂志的编辑部成员之后，⁵他否认自己曾经支持两党合并。⁶

作为内战初期拉尔戈·卡瓦列罗所信任的顾问，他不仅在外交政策问

题上听取德尔巴约的意见，而且指派其负责至关重要的引导武装力量政治方向的国防部总政治部。在这个部门，据西班牙共产党政治局委员和中央委员会负责人佩德罗·切卡说，德尔巴约“全心全意地”为共产党效力。⁷可是，尽管他出力不少，仍然有证据证明，他几乎或者完全没有赢得共产党核心集团的尊重。“他是个白痴，但是多少还有点用处”，据一名前西共中央委员会委员说，这是党的看法。⁸不过有人说，他有另外一些特点。为苏联政权鼓吹将近二十年的路易斯·费希尔说他“是个讨人喜欢的人”，⁹而一九三七至一九三九年间塔斯社驻西班牙的代表奥瓦季·萨维奇则认为他是“政府里面最可爱的人”。¹⁰

身为外交部长，阿尔瓦雷斯·德尔巴约不仅负责任命对外新闻司——该司审查以国外舆论为对象的通讯记者的新闻报道——的官员，而且负责任命外交部宣传部门的官员。¹¹“在阿尔瓦雷斯·德尔巴约手下负责对美英两国宣传工作的三个月里，”利斯顿·奥克写道，“我得到指示，关于西班牙共和派控制区的这一场经济制度革命，不得向外界泄露一个字。不许在巴伦西亚[一九三六年十一月以后西班牙政府的临时驻地]的外国记者随便报道发生的革命。”¹²德尔巴约还任命化名安德烈·西蒙的捷克共产党员奥托·卡茨为外交部在巴黎的宣传机构西班牙通讯社的负责人，¹³卡茨与他的助手阿瑟·科斯特勒都听命于共产国际主管西欧宣传的维利·明岑贝格。¹⁴在伦敦，名为西班牙新闻社的外交宣传机构由英国共产党员杰弗里·宾负责。¹⁵

不过，阿尔瓦雷斯·德尔巴约对共产党人做出的重要贡献是内战初期帮助他们实施其渗透和控制战略，最终使他们的计划达到目的的主要工具是胡安·内格林博士，即使五十年已经过去，内格林仍然是西班牙内战时期最具争议性的人物。他是一个富商的儿子，马德里医学院的生理学教授，代表加那利群岛的议会议员，内战之前他是以因达莱西奥·普列托为首的反对共产党的西班牙社会党中间派的追随者，¹⁶如今是拉尔戈·卡瓦列罗政府的财政部长，一九三七年五月至一九三八年四月出任总理，从一九三八年四月起担任总理兼国防部长直到内战结束前夕的一九三九年三月，对于后来共产党成功地实施其政策，他比任何西班牙人负有更大的责任。至于他是否像拉尔戈·卡瓦列罗所指责的那样将自己的“肉体 and 灵

魂”交给了共产党，¹⁷只有通过认真周密地评估所有证据才能确定。

本书将在后面详细记述他为共产党人效力的情况以及他对共产党人成功实施他们的政策所作出的巨大贡献，特别是在内战最后一年他担任总理兼国防部长期间。但是，由于近几年来某些著名作家和历史学家试图通过将内格林所扮演角色的各种批评归因于“战后流亡圈子里的相互攻讦”来淡化¹⁸或者全盘否定这些批评，¹⁹而且他们还试图通过贬低或者无视揭露其背后真正力量的重要信息和关键证据来“重塑”内格林的历史地位，²⁰因此，在最初这个阶段，为了将内格林置于其崇拜者称之为“共和国化身”之前他所处的真实的历史背景之下，考虑下面的相对信息非常重要。

140

例如，对内格林施加了特别但鲜为人知的影响的一个人是贝尼尼奥·罗德里格斯。罗德里格斯是一名共产党员，著名的共产党民兵武装第五团的创建者之一，负责第五团的宣传工作，编辑该团的报纸《人民战士报》。据圣地亚哥·卡里略流亡时期的多年好友豪尔赫·森普鲁伦说，贝尼尼奥·罗德里格斯“根据党的指示”成为内格林的政治秘书，因此他“什么都知道”。“贝尼尼奥是一个了不起的人，几乎令人难以置信，他自学成才，知识丰富而扎实，具有敏锐的政治嗅觉和人的直觉，但是，一个斯大林主义的超我长期压抑着他内心深处的情感。”²¹

前西班牙共产党共中央委员会委员恩里克·卡斯特罗断言，内格林直接受到共产党及其最亲密的两个合作者贝尼尼奥·罗德里格斯和曼努埃尔·桑切斯·阿尔卡斯的控制，后者是“一名出色的建筑师，经历不凡，对党盲目服从，[一九三八年]担任外交部主管宣传的副部长”。²²贝尼尼奥·罗德里格斯在内格林身边一直待到内战结束，他与陶里亚蒂一同起草了这位总理在西班牙本土发表的最后一篇演说。²³

内格林并不认为罗德里格斯的支持和友谊理所当然。用一九三八年四月担任国防部副部长的著名共产党员安东尼奥·科登——像内格林的所有支持者和辩护士一样，他大肆宣扬内格林的政治独立性并且断言，正是内格林的“正确思想”使其赢得了共产党的支持²⁴——的话说，“内格林欣赏贝尼尼奥过人的长处，欣赏他的才干、他极强的工作能力、坚持不懈的热情以及始终——即使是在内战结束以后——对自己表现出来的热爱和尊重”。²⁵曾经主管全国劳工联合会的喉舌《工人团结报》的哈辛托·托里

奥认为，贝尼尼奥·罗德里格斯是内格林担任总理期间的“首席顾问”和“黑衣主教”。我个人则有保留地认为，这描述了两人关系的某种特征：内格林对罗德里格斯并不总是言听计从。“他的办公室紧挨着总理的办公室，”托里奥证实，“不与他商量总理从不做出决定。他被安排在那里以便内格林明白自己的前进方向。”²⁶

像阿尔瓦雷斯·德尔巴约一样，内战将要结束时，内格林因其政治表现被社会党的马德里地方组织停职。²⁷尽管他是普列托派成员并在一九三六年九月经其推荐成为拉尔戈·卡瓦列罗政府的财政部长，²⁸但是，早在内战爆发之前，内格林已经自行摆脱了将他与这位社会党温和派领导人联系起来的个人和政治束缚，最初是秘密地，后来是公开地。他从来不是共产党员，为了达到控制全局的目的，共产党为他提供了一个表面看上去合适的身份。

许多为共和国的事业不要受到伤害而焦虑的人似乎看不到内格林对共产党的贡献。²⁹例如，内战期间的美国驻西班牙大使克劳德·鲍尔斯声称，内格林“尽可能远离共产主义”。³⁰由于一个人不必成为党员就能为党谋取利益，而且由于在党外甚至可以自觉不自觉地为实现党的目标做出更有成效的贡献，因此，鲍尔斯的天真及其对于共和派事业的同情无疑使他失去了判断力。曾经支持共产党的西班牙著名作家拉蒙·森德尔说：“鲍尔斯先生是我们的朋友——他是一个正直的人，我们强有力的论点给他留下深刻的印象，以致他对莫斯科邪恶的马基雅维利主义投到我们身上的阴影视而不见。我们大多数西班牙人同样看不见这些阴影。”³¹值得称赞的是，鲍尔斯后来对森德尔承认，他已经改变了对内格林的看法。³²

141

“内格林准备敞开大门让共产党控制政府和军队。”弗兰克·塞德威克写道，“……不可否认，他是一位强有力的领导人，一个不屈不挠的工作者，一名血战到底的斗士。他的勇气、自信、足智多谋及其充满活力的个性赢得了[《纽约时报》的]赫伯特·马修斯以及另外一些记者的长期赞誉，这些人参与共和派事业的亲身经历可能在某种程度上使他们的文字失去了客观性。”³³

令人不可思议的是，在内战结束后的三十四年间，不顾所有可以用来证实内格林支持共产党的确凿证据，赫伯特·马修斯仍然否认内格林

对共产党人的事业所做出的特殊贡献，在卷帙浩繁的关于西班牙内战的文献目录中，直到一九五六年内格林去世，他始终是其主要的辩护士。他在一九五七年写道：“那些在内战期间密切关注着他的人，例如我本人，还有那些多年以后仍然深深地敬佩并且爱戴他的人，都不会怀疑时间的裁决。他失败了，但他成为西班牙历史上的一个标志性人物，子孙后代有理由为他感到自豪。”³⁴在其一九七三年出版的最后一部关于西班牙的著作中，马修斯写道：“有关内格林的不实之词歪曲篡改了许多历史事实，尤其是那些貌似最严谨的战后学者，他们几乎根本不了解内格林博士。他是共和派方面的关键人物。误解他的性格和动机将会错误地书写历史。即使像休·托马斯——他对内格林博士的描述相当公正而且富有同情心——那样敏锐精明的学者也不相信，对堂胡安的某些指责竟然完全是无中生有，例如，说他对共产党的要求言听计从。在《西班牙革命》一书中，佩恩教授错误地写道：‘看来毫无疑问的是，[内格林]为实现左派的奋斗目标全力以赴，不择手段，不计后果。’内格林博士利用共产党人并与之合作只是出于实用的考虑，与‘左派思想’或任何意识形态没有关系。他没有政治色彩，对任何政党或政治运动本身也没有偏爱。”³⁵

142

尽管马修斯温和地批评了托马斯，但是，关于内格林所谓的独立性，两位作家均发表了误导公众的相似观点。“的确，几乎没有政治家成功地利用了共产党然后却不被其吞噬。”一九六五年托马斯写道，“但是，三十年代在西班牙，未必不存在这种可能性。内格林的自信及其守口如瓶的本性也许使他认为，必要时他可以断绝与共产党的联系。……认为这样一个意志坚强、思想独立而且脾气很坏的知识分子可能一度屈从于他人实际上是荒谬可笑的。”³⁶尽管与苏联经济顾问[阿尔图尔·]斯塔舍夫斯基的关系良好，但是有一次（当时他任财政部长），他告诉另一名苏联人，不要试图对西班牙的内部事务指手画脚。否则的话，内格林接着说，‘门在那边’。”³⁷在一九七七年版的《西班牙内战》中，托马斯把这一段内容删掉了。³⁸这一桩轶事的提供者是共和国驻伦敦大使巴勃罗·德·阿斯卡拉特，他是内格林的激赏者，³⁹不过，据他以前的朋友和国际联盟同事萨尔瓦多·德·马达里亚加说，他后来“背离了寻求真理的严谨路线，堕落成为共产主义的知识分子走狗”。⁴⁰

虽然托马斯删掉了这桩轶事，但他实际上仍然保留了下面的论断：“内格林与西班牙共产党领导人没有什么密切关系，而且他非常讨厌热情之花。”为了支持自己关于内格林总体上对共产党人保持了独立的论点，他在两个版本的《西班牙内战》中均引用了前西班牙共产党中央政局委员赫苏斯·埃尔南德斯的话，承认“时间将在必要的时候‘清算’内格林”。⁴¹但是，埃尔南德斯的话实际上支持的是相反的论点：“为了除掉弗朗西斯科·拉尔戈·卡瓦列罗，我们主要依靠内格林，同时在一定程度上依靠普列托。为了除掉普列托，我们利用内格林和另外一些著名的社会党人。如果内战持续下去，只要内格林妨碍了我们，我们将会毫不犹豫地与魔鬼结盟除掉他。”⁴²事实上，如同我们将在本书的叙述过程中看到的那样，直到必须除掉内格林时，他也没有妨碍过共产党的政策。此外，与托马斯的论断相反，内格林不仅与某些重要的共产党人保持着密切关系，例如贝尼尼奥·罗德里格斯、桑切斯·阿尔卡斯以及我们将在后面看到的另一些人，而且与苏联贸易特使阿尔图尔·斯塔舍夫斯基保持着密切关系，后者是内格林非正式的经济顾问，据苏联派往西欧的高级情报特工瓦尔特·克里维茨基说，斯大林交给斯塔舍夫斯基的任务是，“掌握西班牙共和派控制区的政治和财政控制权”。⁴³

哈佛大学的胡安·马里查尔教授是另一位著名的内格林的辩护士，他写道：“不能把内格林看成一个自愿追随苏联政策的人。……我相信，我并非武断地断言……在最近一个半世纪的欧洲历史上，几乎没有人显示出这种智慧与性格、高尚品德与知识能力的珠联璧合。”⁴⁴形成对照的是，克里维茨基断言，斯塔舍夫斯基发现内格林是“其财政计划的一个心甘情愿的合作者”。⁴⁵尽管这种说法只有克里维茨基的一面之词，但是，四位见多识广的内格林的支持者证实了两人之间的密切关系。本人认识苏联派往西班牙的大部分要人的路易斯·费希尔——因达莱西奥·普列托将其称为内格林在国外的“主要宣传代理人”，另外，根据他从内格林那里得到的“大笔金钱”来判断，普列托还认为他“可能”是内格林宣传方面的“财务总监”⁴⁶——肯定地说，斯塔舍夫斯基“不仅安排西班牙购买苏联武器事宜，而且在许多经济问题上对内格林的亲密顾问”。⁴⁷内格林的坚定支持者阿尔瓦雷斯·德尔巴约承认，内格林交往最多的俄国人是斯塔舍夫斯

基，他们建立了“真正的友谊”。⁴⁸马里亚诺·安索是内格林政府的一名部长，他注意到，内格林的“才能和不可抗拒的魅力”给苏联贸易特使“留下了深刻的印象”。⁴⁹此外，被内格林任命为军事调查局（SIM）负责人的圣地亚哥·加尔塞斯·阿罗约说，内格林与斯塔舍夫斯基“相处得非常友好”，“他们天天一起进餐”；⁵⁰另一方面，研究共和国财政问题和西班牙黄金储备问题的权威安赫尔·比尼亚斯同样是内格林的坚定支持者，他认为内格林是整个共和国时期“最清醒、最非凡的政治家之一”，而且是“共和国伟大的国务活动家”，⁵¹不过，在确认斯塔舍夫斯基是一个“向西班牙共和派提供最初援助的关键人物”，并且在与购买苏联武器有关的重大财务活动中直接影响了内格林⁵²的同时，比尼亚斯对克里维茨基关于斯大林派遣这位苏联贸易特使前来扮演操控角色的说法表示怀疑。⁵³

克里维茨基还宣称，斯塔舍夫斯基提议将西班牙的巨额黄金储备——估计当时位居世界第三——运往苏联以换取供应马德里的武器弹药。“通过内格林，”克里维茨基说，“他与卡瓦列罗政府达成协议。”⁵⁴另一方面，从一九三六年起到一九三八年叛逃美国为止一直担任苏联在西班牙的特工负责人的亚历山大·奥尔洛夫⁵⁵肯定地说，“意识到[军事]形势正在恶化”的内格林向斯塔舍夫斯基提出将西班牙的黄金存放在苏联。“特使电告莫斯科，”奥尔洛夫补充说，“于是，斯大林迅速抓住了这个机会。”⁵⁶我们将会看到，奥尔洛夫受斯大林的委托具体安排黄金运送事宜。

拉尔戈·卡瓦列罗总理给苏联大使马塞尔·罗森堡写了两封信，正式请求苏联政府同意把黄金运往莫斯科，这至少在表面上看来排除了斯塔舍夫斯基干预的嫌疑。三十四年后，内格林的多年好友、战时担任西班牙驻莫斯科大使的马塞利诺·帕斯库亚⁵⁷公布了这两封信，当年是他亲自把它们带到苏联首都的。⁵⁸在一九三六年十月十五日所写的第一封信中，拉尔戈·卡瓦列罗表示，他以总理的身份决定请求苏联大使询问“贵国政府是否欣然同意存放大约五百吨黄金的建议，准确的重量待移交时确定”；⁵⁹在十月十七日所写的确认苏联接受了他的建议的第二封信中，拉尔戈·卡瓦列罗声明：“我们打算兑付一些国外存款的汇票……同时转让一些外汇以凑足贵国政府同意接受存放的黄金。”⁶⁰

尽管这些正式信件似乎使斯塔舍夫斯基的作用成为问题，但是，它

们并没有排除下面这种可能性：这两封信是苏联贸易特使与西班牙财政部长初步讨论的结果，只不过随后把它们交给拉尔戈·卡瓦列罗总理批准签字而已。据帕斯库亚说，两封信都是内格林起草的。⁶¹信中字斟句酌的词语——第一封请求、第二封确认苏联同意运送黄金的建议——很可能是根据斯塔舍夫斯基的建议用来掩盖斯大林对占有西班牙财富的特殊兴趣。

注释：

- 1 弗朗西斯科·拉尔戈·卡瓦列罗，《我的回忆：致一位朋友的信》，第212页，另请参阅拉尔戈·卡瓦列罗《我的回忆》，第230页；路易斯·阿拉基斯塔因，《共产主义与西班牙内战》，第8页；阿拉基斯塔因写给迭戈·马丁内斯·巴里奥的信，载一九三九年五月十五日《自由之路》；卡洛斯·德·巴赖瓦尔发表在一九四〇年六月号《方向盘》（布宜诺斯艾利斯）上的文章；文塞斯劳·卡里略发表在一九三九年十一月号《方向盘》上的文章；因达莱西奥·普列托发表在一九四三年七月十日《阿斯图里亚斯邮报》上的文章。阿拉基斯塔因写给马丁内斯·巴里奥的那封信的手稿保存在马德里国家历史档案馆，阿拉基斯塔因文件，卷宗33/M66^b。
- 2 见一九三九年三月十五日《光明报》。另请参阅文塞斯劳·卡里略一九三九年五月二十三日向工党及社会党国际提交的报告，载（一九三九年六月？）《独立新闻》特刊。
- 3 见阿尔瓦雷斯·德尔巴约发表在一九三五年十月五日和十一月九日《光明报》上的文章；另请参阅一九三六年三月二日《泰晤士报》（发自马德里的报道）；一九三七年八月十三日巴伦西亚《真理报》所刊登的他的演说表明了他战前的立场。
- 4 见阿尔瓦雷斯·德尔巴约发表在一九三七年六月十九日《红色阵线报》上的文章和一九三七年八月十三日巴伦西亚《真理报》所刊登的他的演说；另请参阅多洛蕾丝·伊巴露丽在一九三七年六月十七日西班牙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上所发表的演说中关于他的内容（载一九三七年六月二十一日《红色阵线报》）。
- 5 胡利奥·阿尔瓦雷斯·德尔巴约，《最后一个乐观主义者》，第323页。“《民族》堕落时期的魔鬼是阿尔瓦雷斯·德尔巴约及其对 [主编和出版人] 弗蕾达·柯奇韦的致命影响。”为《民族》撰稿十三年的刘易斯·科里写道，“此人推销苏联共产主义和帝国主义的所有乌七八糟的东西。”（见彼得·维雷克《知识分子的耻辱与荣耀》，第179页）
- 6 阿尔瓦雷斯·德尔巴约，《最后一个乐观主义者》，第228页。
- 7 见恩里克·卡斯特罗·德尔加多《莫斯科培养出来的人》，第659页。尽管我在以前的书中提出了大量关于阿尔瓦雷斯·德尔巴约为共产党及其苏联盟友效力的文献资料证据，但是，西班牙左派历史学家胡里奥·阿罗斯特吉却在没有任何证据证明的情况下声称，我“虚构”了阿尔瓦雷斯·德尔巴约、米亚哈、罗霍和内格林等人的亲共立场（见曼努埃尔·图尼翁·德拉拉编的《西班牙内战：五十年后》，第72页）。
- 8 卡斯特罗，《莫斯科培养出来的人》，第553页。
- 9 路易斯·费希尔，《人与政治》，457页。
- 10 奥瓦季·萨维奇，《在西班牙的两年：1937—1939》，第115页。另请参阅莉莲·海尔曼《三》，第97页。

- 11 内战后期，他任命共产党员、著名的保守派首相安东尼奥·毛拉的外孙女康斯坦西娅·德拉·莫拉为对外新闻司司长（见康斯坦西娅·德拉·莫拉《辉煌不再》，第340页）。
- 12 利斯顿·奥克发表在一九三七年九月号《社会主义评论》（纽约）上的文章。一九三六年以前奥克是美国共产党党员，他在一九三七年对共产国际进行了谴责（见奥克一九五〇年一月十六日写给伯特伦·D.沃尔夫的信[胡佛研究所]）。我能够以亲身经历用文献资料证据证实利斯顿·奥克关于不许外国记者随便报道革命的说法。在一九三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发往伦敦的报道中，我引用了时任司法部长的无政府工团主义者胡安·加西亚·奥利韦尔所发表的一篇演说，他在演说中声称，“必须在战争的同时进行革命”，而且“必须全面革新西班牙人的生活”。这些内容被阿尔瓦雷斯·德尔巴约委任的外国新闻司负责人鲁维奥·伊达尔戈删掉了。见伯内特·博洛滕《一九三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发给合众社伦敦分社的报道》（现存胡佛研究所）。另请参阅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我从巴伦西亚发出的报道（现存胡佛研究所），共产党人新闻检查官康斯坦西娅·德拉·莫拉从报道中删掉了“巩固人民革命成果”这句话。
- 13 见西蒙发表在一九四三年八月二十七日《时代》（墨西哥城）上的信。另请参阅克劳德·科伯恩（化名弗兰克·皮特凯恩，内战期间伦敦的共产党报纸《工人日报》的记者）《不和谐的鼓吹》，第305—309页和《越线》，第26—28页；海尔曼，《三》，第91—92页；阿瑟·科斯特勒，《看不见的文字》，第400—401和409页。二战之后，西蒙在克莱门特·哥特瓦尔德的斯大林主义政权统治时期成为捷克共产党的报纸《红色权利报》的编辑，一九五二年，他与另外十位著名的共产党人受到审判，这些受审的人几乎全是犹太人，其中包括前捷克共产党总书记兼政府总理鲁道夫·斯兰斯基，在“承认”了“破坏、叛国、间谍”等罪行后，他们被绞死（见阿瑟·G.伦敦《自白》，第277—324页。伦敦是捷克共产党员，曾经担任过外交部副部长，在同一次审判中，他与另外两位共产党要人被判处无期徒刑）。十六年后，一九六八年，西蒙与其他所有获罪的人被“恢复名誉”（伦敦，《自白》，第324页）。
- 14 科斯特勒，《看不见的文字》，第333页。关于奥托·卡茨迷人的外表，见科斯特勒《看不见的文字》，第255—256页。在阿尔瓦雷斯·德尔巴约分别于一九三六年十二月二十四日、二十五日和一九三七年三月十日写给西班牙驻巴黎大使路易斯·阿拉基斯塔因的三封信中，均提到了“奥托”和“维利”（阿拉基斯塔因文件集，卷宗23/A108^a、A109^a和A117^a）。
- 15 科斯特勒，《看不见的文字》，第333和335页。
- 16 由于他对共产党的事业的贡献，一些西班牙人断定，他在内战爆发时是一名社会党左派。这种说法并不正确。例如，（社会党温和派人士）胡利安·苏加萨戈伊蒂亚证明他是普列托的追随者，见苏加萨戈伊蒂亚《西班牙内战史》，第138页；另请参阅胡斯托·马丁内斯·阿穆蒂奥（拉尔戈·卡瓦列罗的支持者）《挟持民众》，第41页。
- 17 拉尔戈·卡瓦列罗，《我的回忆》，第230页。
- 18 雷蒙德·卡尔，《现代西班牙，1875—1980》，第144页。
- 19 例如本章注释7所提到的西班牙左派历史学家胡里奥·阿罗斯特吉。另请参阅丹特·A.普佐《西班牙与列强，1936—1941》，第186页和第267页，注释48（其关于内格林独立于共产党人的可疑证据正是由阿尔瓦雷斯·德尔巴约提供的）；（玛丽亚·鲁伊佩雷斯）对赫伯特·R.索思沃思的采访，载一九七八年十月号《历史时期》和赫伯特·R.索思沃思发表在一九七八年六月九日《泰晤士报文学副刊》上的文章。“为了理解索思沃思对内格林的坚信不疑以及由此而来的对其不加批判的支持，”乔治·埃森魏因写道，“人们必须牢记，他曾经作为重要的宣传人员为内格林政府效力。一九三八年二月至一九三九年二月，他编辑出版纽约的《西班牙新闻》（见《当代作家》，第八十五至八十八卷。第557页），这份简报显然是西班牙共和政府的政策的传声筒，即使后者没有资助它或者与它没

有什么正式关系。”摘自一篇认真研究这份简报合订本的论文。

20 实例见对安赫尔·比尼亚斯的采访（载一九七九年五月号《历史时期》，第9和13页）。

21 豪尔赫·森普鲁伦，《费德里科·桑切斯自传》，第17和24页。着重体是我加的。

22 卡斯特罗，《莫斯科培养出来的人》，第660页。一九三八年一月二十二日，桑切斯·阿尔卡斯被当时担任外交部长的左翼共和派人士何塞·希拉尔任命为宣传部门的副主管（见一九三八年一月二十五日《共和国官方公报》）。他接替了费德里科·梅尔乔，后者是共产党控制的统一社会主义青年联盟执委会成员，一九三六年加入西班牙共产党。

23 见帕尔米罗·陶里亚蒂《关于西班牙内战的文件》，第280页。关于罗德里格斯更多的情况，见西班牙共产党的官方内战史《西班牙内战与革命，1936—1939》，第一卷，第301页，第四卷，第296—297页。一九三九年我在墨西哥城通过意大利共产党员维托里奥·维达利认识了罗德里格斯。维达利在西班牙化名卡洛斯·孔特雷拉斯，是第五团的主要组织者之一。毫无疑问，维达利是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秘密警察）的一名重要特工，从其对西班牙共产党流亡者的影响来判断，他肯定接到莫斯科的指示，要使这些人保持一致性。正是通过与维达利的交往，我在墨西哥认识了许多重要的西班牙共产党人，从而得以了解罗德里格斯与内格林的私人关系。罗德里格斯匆忙陪同内格林去墨西哥与内战结束前夕从西班牙装船运出的大量西班牙财宝有关。在与墨西哥总统拉萨罗·卡德纳斯谈判期间，他是内格林的得力助手。

从西班牙运往墨西哥的财宝包括黄金、宝石、外币、股票、债券以及内战期间从贵重物品仓库和反政府人士的家中没收的艺术品。（关于打开马德里各种贵重物品仓库的情况以及要求西班牙银行交出某些贵重物品的形形色色的法令，见安赫尔·比尼亚斯《内战中的西班牙黄金》，第160—167页）这些财宝被以前为阿方索十三世所有的“比塔”号豪华游艇运到了韦拉克鲁斯并被用来作为西班牙流亡者的经济来源。通过财政部长弗朗西斯科·门德斯·阿斯佩，内格林派自己信赖的助手恩里克·普恩特在运往墨西哥途中看管这些财宝。内战期间晋升为边防警察部队上校的普恩特应当把这一批贵重的货物交给内格林在墨西哥的朋友何塞·普切医生，但他改换门庭投靠了内格林当时的头号敌人因达莱西奥·普列托（见加夫列尔·莫隆《过去的政治与未来的政治》，第171页），后者通过援助西班牙共和派委员会（JARE）控制了这笔财富的收益。后来，由于流亡者之间的内斗，通过曼努埃尔·阿维拉·卡马乔总统一九四一年一月二十一日签署的法令（法令原文见阿马罗·德尔·罗萨尔《西班牙银行的黄金与“比塔”号事件》，第155—162页），墨西哥政府把援助西班牙共和派委员会变成了由西班牙和墨西哥代表组成的“受墨西哥法律管辖的经济实体”。不过，由于西班牙与墨西哥代表之间的摩擦，阿维拉·卡马乔在一九四二年十一月二十七日颁布一项新的法令，组成一个委员会，使墨西哥当局对这笔资金的管理具有更大的控制权（罗萨尔，《西班牙银行的黄金与“比塔”号事件》，第192—197页）。劳动者总工会的银行雇员工会组织全国银行联合会主席罗萨尔最初是一名社会党左派，后来背弃拉尔戈·卡瓦列罗投靠了共产党并且成为——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内格林博士及其财政部长弗朗西斯科·门德斯·阿斯佩的直接合作伙伴”（阿马罗·德尔·罗萨尔，《西班牙劳动者总工会史，1901—1939》，第二卷，第538页），他还是赔偿处的负责人，看管西班牙没收的财物。（关于赔偿处的情况，见安赫尔·比尼亚斯《莫斯科的黄金》，第198—202页。关于罗萨尔对“比塔”号事件的描述，见罗萨尔《西班牙银行的黄金与“比塔”号事件》，第81—235页和他发表在一九八四年三月号《历史16》上的文章《“比塔”号上的财宝》。）据普列托说，“比塔”号运送的财宝只是“没收财物的一小部分，这些财物杂乱无章地存放在西班牙驻巴黎大使馆。佛朗哥可以毫不费力地收回剩余的财物”（因达莱西奥·普列托，《西班牙的动乱》，第三卷，第144页）。与内格林关系非常密切的路易斯·费希尔说，全部财物存放在靠近法国边境的非格拉斯要塞，随着战线离非格拉斯越来越近，内格林下令将它们运往多维尔一个漂亮的别墅。“一九三九年

二月第二个星期的一天夜里，多维尔别墅衣着讲究的住户穿上工作服，带着装满了钻石、蓝宝石、绿宝石、珍珠以及黄金和白金首饰的几个大箱子来到海边将它们装上“比塔”号游艇。这些珠宝的价值总计五千万美元。船上的货物还包括一些装满了股票和债券的大箱子。”（路易斯·费希尔，《人与政治》，第596—597页）关于“比塔”号事件和援助西班牙共和派委员会的更多情况，见阿尔瓦雷斯·德尔巴约，《最后一个乐观主义者》，第292—297页；何塞·博拉斯，《西班牙流亡者的策略，1944—1950》，第86—88页；何塞·富恩特斯·马雷斯，《一段冲突的始末：“比塔”号上的财宝》，第173—191页；恩里克·利斯特，《一个战士的回忆》，第一卷，第413—422页；萨尔瓦多·德·马达里亚加，《西班牙现代史》，第589—591页；普列托，《西班牙的动乱》，第三卷，第97—110和123—128页；洛伊丝·埃尔温·史密斯《墨西哥与西班牙共和派》，第229—230、233—236、270和274—275页。

- 24 安东尼奥·科登《历程》，第391页。直到一九六九年去世科登始终是一名共产党员。另请参阅亲共人士阿马罗·德尔·罗萨尔的《西班牙劳动者总工会史，1901—1939》，第二卷，第626页。
- 25 科登，《历程》，第411页。
- 26 哈辛托·托里奥，《从胜利到失败》，第369页。
- 27 见一九三九年三月十五日《光明报》。另请参阅文塞斯劳·卡里略一九三九年五月二十三日向工党及社会党国际提交的报告，载（一九三九年六月？）《独立新闻》特刊。
- 28 见安赫尔·加拉尔萨发表在一九四六年十二月二日《西班牙社会主义者》上的文章和马丁内斯·阿穆蒂奥的《挟持民众》，第40—42页。
- 29 感兴趣的读者可以在下面这些社会党上层人士所写的文章著作中以及本书所引用的其他资料来源中发现大量没有丝毫疑问的关于内格林与共产党合作的确凿证据：路易斯·阿拉基斯塔因（写给迭戈·马丁内斯·巴里奥的信，载一九三九年五月十五日《自由之路》；见路易斯·阿拉基斯塔因《共产主义与西班牙内战》，第14和17页）；卡洛斯·德·巴赖瓦尔（发表在一九四〇年六月号[布宜诺斯艾利斯]《方向盘》上的文章）；文塞斯劳·卡里略（一九四六年五月的演说，见《流亡的西班牙社会主义工人党第二次代表大会》，第95—107页；文塞斯劳·卡里略，《西班牙内战的最后一幕》，第10页）；马丁内斯·阿穆蒂奥，《挟持民众》，第60页；加夫列尔·莫隆，《过去的政治与未来的政治》，第108—109页；因达莱西奥·普列托，《我如何以及为什么离开国防部》，墨西哥和法国版的序言，第12和25页；普列托，《西班牙的动乱》，第二卷，第141页，第三卷，第219页；《普列托与内格林通信集》，第17和99—100页；普列托发表在一九四三年七月十日《阿斯图里亚斯邮报》上的文章；普列托发表在一九五〇年十一月九日（巴黎）《社会主义者》上的文章；合众社对普列托的采访，载一九三九年七月三十日《环球》；安德烈斯·萨沃里特，《胡利安·巴斯特罗：西班牙社会主义的代表人物》，第398—399页；苏加萨戈伊蒂亚，《西班牙内战史》，第408、464和535页。不过，另请参阅两名温和共和派军官的证言：塞希斯孟多·卡萨多的《马德里最后的日子》，第101和281页；赫苏斯·佩雷斯·萨拉斯的《西班牙内战，1936—1939》，第141和162页以及左翼共和派报纸《政治报》一九三九年三月十六日和二十日的社论。关于无政府主义者对内格林的印象，见迭戈·阿瓦德·德·桑蒂连《为什么我们输掉了内战》，第210—213页。两名前共产党领导人认为内格林是共产党“实现其野心的驯服工具”和“莫斯科所信任的人”（分别见巴伦廷·冈萨雷斯[农夫]发表在一九五一年三月十一日[巴黎]《工人团结报》上的文章和赫苏斯·埃尔南德斯的《我是一个斯大林的部长》，第157页）。
- 30 克劳德·鲍尔斯，《我赴西班牙的使命》，第358页。
- 31 一九五四年七月五日《新领袖》。
- 32 鲍尔斯写给森德尔的信。“内战之前及内战初期，”鲍尔斯写道，“我相信内格林不是一

个同路人。我认为他是在某个关键时期出于需要达成了妥协，另外，当我战后在巴黎遇见他时，他谈吐直率，因此，我天真地看待共产党人。现在我对他的看法改变了。我写信向他询问一些与共产党有关的情况，他甚至都不回信。”写给森德尔的这封信的影印件见存放于胡佛研究所的华金·毛林文件集（第三档案柜）。

- 33 弗兰克·塞德威克，《曼努埃尔·阿萨尼亚的悲剧与西班牙共和国的命运》，第182页。
- 34 赫伯特·L.马修斯，《轭与箭》，第58页。
- 35 赫伯特·L.马修斯：《半个毁灭的西班牙：对西班牙内战的重新评价》，第225—226页。与马修斯多年保持友好关系的阿尔瓦雷斯·德尔巴约写道：“几乎没有政治家比内格林更不愿意做别人的傀儡。西班牙共产党最先知道这一点。……想当然地认为内格林可以被莫斯科或者别的什么人‘操纵’或‘控制’，那是不了解他是什么样的人。”（阿尔瓦雷斯·德尔巴约，《最后一个乐观主义者》，第290页）在马修斯向美国公众提供虚假的内格林形象的过程中，他的文字可以与一九六四年他对菲德尔·卡斯特罗具有倾向性的描述相提并论：“华盛顿和古巴流亡者希望人们相信，菲德尔·卡斯特罗是古巴共产党的一名囚犯或者是莫斯科的一个傀儡，这都是些骗人的鬼话。由于性格方面的原因，他不会接受命令，甚至不会接受建议。……他所选择的道路使他的需要和愿望与苏联集团大致相同，但这是另外一个问题。现在，五年已经过去了，对于美国官员和美国公众来说，确实到了清醒的时候：无论他们如何想象菲德尔·卡斯特罗，他都是我们这个时代最奇特的人物之一。”（赫伯特·L.马修斯，《重返古巴》[《拉丁美洲报告》特刊，1964]）
- 36 一九三四年八月被内格林任命为至关重要的国防部副部长的共产党人安东尼奥·科登并不认同内格林是个“意志坚强”的人的说法。尽管佩服内格林具有“惊人的毅力和生命力”，科登仍然写道：“[内格林]看上去似乎是个性格坚强的人。但是，根据在他身边工作的那段时间的观察判断，我不认为他是一个这样的人。他的坏脾气经常令人吃惊地突然发作，这是性格脆弱的典型表现。”（科登，《历程》，第390—391页）
- 37 休·托马斯，《西班牙内战》（一九六五年版），第556页和注释1。
- 38 休·托马斯，《西班牙内战》（一九七七年版），第669页。
- 39 在为巴勃罗·德·阿斯卡拉特的《我在西班牙内战期间的伦敦大使生涯》一书所写的序言中，他的儿子曼努埃尔·阿斯卡拉特这样谈到自己的父亲：“内格林可能是对他影响最大的政治人物。尽管我们之间争论激烈意见分歧，他始终尊重我在一九三四年所作的加入共产党的选择。”见《我在西班牙内战期间的伦敦大使生涯》，第17页。在一九四九年一月二十三日写给我的一封信（现存胡佛研究所）中，一九三六年九月至一九三七年七月间任西班牙驻巴黎大使的路易斯·阿拉基斯塔因说，这个儿子对他的父亲产生了“很大的政治影响”，而父亲则“一直与俄国人密切合作”。
- 40 萨尔瓦多·德·马达里亚加，《与我同时代的西班牙人》，第414页。
- 41 托马斯，《西班牙内战》，一九六五年版，第557页；一九七七年版，第669页。
- 42 埃尔南德斯，《我是一个斯大林的部长》，第135页。着重体是我加的。
- 43 瓦尔特·克里维茨基，《在斯大林的情报部门工作》，第96—97页。关于克里维茨基的情况，见本书第九章。
- 44 一九七四年六月二十二日《胜利报》。
- 45 克里维茨基，《在斯大林的情报部门工作》，第99—100页。
- 46 《普列托与内格林通信集》，第104页。在战后的书信往来中，内格林并没有否认普列托关于路易斯·费希尔接受资助的论断。另请参阅西普里亚诺·里瓦斯-切里弗（阿萨尼亚的私人朋友和姻兄弟）《不为人知的肖像：曼努埃尔·阿萨尼亚的人生》，第291页。“费希尔到底收了多少钱？”在为了一本未出版的书（《内战期间我们没有沉默》）所写的序言中，阿拉基斯塔因问道。“这不是一件容易查清的事。在内战的最初几个月，应阿尔瓦雷斯·德尔巴约的要求并且由其签字，付给他六十万美元（三十万美元是当时的财政部

长内格林在巴伦西亚批准的；另外三十万美元是他在纽约收取的）在美国招募志愿者。我听费希尔说，从纽约送出一名志愿者需要花费一百美元。因此，如果这笔钱全都用上的话，应当有六千名北美志愿者奔赴西班牙。后来，他得到了更多的钱。”（费希尔本人承认，“为了向西班牙派遣志愿者”，他“收到了大笔款项”[费希尔，《人与政治》，第547页]。）阿拉基斯塔因还声称，一名前外国共产党员告诉他，曾经委托费希尔向巴黎、伦敦和纽约的某些报纸分发一定的资金，这些资金是内格林交给他用以“维持自己作为政治家稍纵即逝的荣光闪耀”（阿拉基斯塔因文件集，卷宗75/5⁴）。当然，不可能核实所提到的费希尔的全部活动，但是，鉴于他在内战期间所扮演的鲜为人知的重要角色，应当把下面这些个人信息记录在案。一八九六年二月二十九日，他出生于费城（《名人录，1961—1970》）。一九二七至一九三九年，他与妻子马尔库莎以及他们的两个孩子以只有特权阶层才能享受的居住条件生活在莫斯科（见马尔库莎·费希尔《我在俄国的生活》，第45—46、87—88、112和114页）。在此期间，他写了几本歌颂苏联的书籍并为《纽约邮报》和《民族》杂志投稿。一九四〇年与莫斯科断绝关系之后，他声称自己从来不是任何政党的成员（费希尔，《人与政治》，第160页）。“对于那些指责费希尔先生没有在他二三十年代从俄国发回的文章里揭露斯大林大清洗的范围和专制的程度的人来说，”刊登在（一九七〇年一月十七日）《纽约时报》上的一则讣告写道，“他不承认自己是党员几乎没有任何意义。”关于他拥护苏联的立场，见戴维·科特《同路人》，第66、85、123、178—179和189页和费希尔写给拉尔戈·卡瓦列罗的信，他在信中提到自己“热爱苏联”（《人与政治》，第372页）。在内战期间的西班牙，某种神秘的气氛笼罩着他。胡斯托·马丁内斯·阿穆蒂奥是卡瓦列罗长期的合作伙伴，内战期间担任阿尔瓦塞特省省长，国际纵队的指挥部设在阿尔瓦塞特省，费希尔被安德烈·马蒂任命为国际纵队的军需官。马丁内斯·阿穆蒂奥本人认识费希尔，他写道：“唯一可以确认的是，他为某个苏联代理人工作，尽管他说他不是一名共产党员，也没有人派他从莫斯科来西班牙。……[但是]同样认识他的路易斯·阿拉基斯塔因在担任共和国驻柏林大使时警告说，他实际上是共产党的一名秘密党员，而且是斯大林直接派遣的代理人。他积极地……以观光采访的方式进行活动。……尽管费希尔试图表现得真诚谦恭，但是他对西班牙共产党人特别傲慢。……人们看到他经常与内格林博士在一起，他说，多年前他们在巴黎和柏林相遇时，他与他就建立了友谊。正是他把斯塔舍夫斯基介绍给了内格林，当时内格林尚未担任财政部长，离[一九三六年九月苏联]大使[马塞尔·]罗森堡到任还有很长一段时间，罗森堡也是费希尔的好朋友。”（马丁内斯·阿穆蒂奥，《挟持民众》，第367—368页，另请参阅该书第39—40和42页）在前面提到的为他那本未出版的书所写的序言中，阿拉基斯塔因写道：“如果是费希尔‘发现’了内格林并且把他作为未来的总理推荐给那些在莫斯科操控西班牙政治生活的人，那我一点也不意外。”（阿拉基斯塔因文件集，卷宗75/5⁴）值得注意的是，费希尔声称，他经常看到阿尔瓦雷斯·德尔巴约和西班牙驻伦敦大使巴勃罗·德·阿斯卡拉特为在国际联盟演说准备的讲话稿，他“偶尔提出一些建议，都被包括在定稿中”（费希尔，《人与政治》，第450页）。

- 47 一九四〇年一月十三日《民族》。据马丁内斯·阿穆蒂奥说（见本章注释46），把斯塔舍夫斯基介绍给内格林的就是费希尔。
- 48 阿尔瓦雷斯·德尔巴约，《最后一个乐观主义者》，第291页。他在第292页接着写道：“内格林认为与俄国人保持良好关系的关键[因素]是清楚地知道他不容许任何人对共和国政府的事务或西班牙的国内政策指手画脚。……对于某些西班牙领导人关于内格林一夜之间变成了‘莫斯科的工具’的指责，最先感到好笑的肯定是[俄国人]。”
- 49 马里亚诺·安索，《我是内格林的内阁部长》，第188页。
- 50 埃莱诺·萨尼亚对圣地亚哥·加尔塞斯·阿罗约的采访，载一九七四年六月十五日《标志》。

- 51 对安赫尔·比尼亚斯的采访，载一九七九年五月号《历史时期》。
- 52 比尼亚斯，《内战中的西班牙黄金》，第212—213页注释69，第69、226、235、261、178和281页。这本六百页的书籍出版于一九七六年十一月，主要根据一九七三年在西班牙银行和财政部所发现的机密文件写成，是迄今为止已出版的关于内战期间西班牙动用黄金储备以及共和国财政的其他方面的最重要的著作。此后，比尼亚斯根据第一手资料完成了一部更加受人欢迎的著作（《莫斯科的黄金》，1979）。
- 53 比尼亚斯，《内战中的西班牙黄金》，第212—213页，注释69。另请参阅比尼亚斯《莫斯科的黄金》，第184页，注释14。在写给我的一封信中，比尼亚斯坚持认为斯塔舍夫斯基的作用被高估了。
- 54 克里维茨基，《在斯大林的情报部门工作》，第99—100页。
- 55 奥尔洛夫所提供的获准在美国政治避难的日期是他离开西班牙一个月后的一九三八年八月十三日（亚历山大·奥尔洛夫，《斯大林罪行秘史》，第xv页）。一九七三年四月十日奥尔洛夫在美国去世后，美国参议院国内安全小组委员会起草了一份题为《亚历山大·奥尔洛夫的遗产》的报告，其中包括奥尔洛夫的一幅照片，他出生后取名列昂·拉扎列维奇·费尔德宾，入党时名叫列夫·拉扎列维奇·尼科利斯基（《亚历山大·奥尔洛夫的遗产》，第3—4页）。一九五五年九月二十八日奥尔洛夫告诉该委员会，一九三六年九月他被苏共中央政治局派往西班牙（《亚历山大·奥尔洛夫的遗产》，第16页）。“我于西班牙内战爆发两个月后的一九三六年九月十六日到达马德里，”他在一九六六年写道，“领导庞大的苏联情报组织和大批军事专家。作为（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情报局的一位将军，我是共和国政府在情报、反情报和游击战问题上的首席苏联顾问，我担任这一职务将近两年。”（一九六六年十一月号《读者文摘》）
- 56 一九六六年十一月号《读者文摘》。比尼亚斯说，内格林是决定把黄金运往苏联的“推动力量”，见《内战中的西班牙黄金》，第190页；但是，后来再谈到这个问题时，关于究竟是西班牙当局还是苏联当局想出的这个主意，他没有作出结论（一九七九年一月号《欧洲研究评论》，第112页）。
- 57 见贡萨洛·莫亚的文章《马塞利诺·帕斯库亚先生：一个被人遗忘的伟大的社会党人医生》，载一九七七年七月九日《胜利报》。路易斯·阿拉基斯塔因说帕斯库亚是“一个默默无闻的医学博士”，“在内格林的要求下”被派往莫斯科，是“[内格林]绝对信任的人……以近乎奴性的忠诚依附于他”（阿拉基斯塔因，《共产主义与西班牙内战》，第28页）。通常不骂人的共和派法官安赫尔·奥索里奥-加利亚多把这位大使称为“共党分子或亲共分子”（安赫尔·奥索里奥-加利亚多，《我的回忆》，第242页）。提到马塞利诺·帕斯库亚的文字非常少。马德里国家历史档案馆得到了他的私人文件，一九八九年对外开放。
- 58 见马塞利诺·帕斯库亚发表在一九七〇年六月至七月号《对话记录》上的文章；比尼亚斯，《莫斯科的黄金》，第288页。
- 59 比尼亚斯所提供的实际运往苏联的黄金重量是五百一十吨，见《内战中的西班牙黄金》，第76页。
- 60 帕斯库亚发表在一九七〇年六至七月号《对话记录》上的文章。
- 61 同上。

运往莫斯科的西班牙黄金

由于马德里受到威胁，¹最先讨论将黄金储备从首都转移到更安全的地方保存这一问题的是希拉尔内阁，²不过，直到九月四日拉尔戈·卡瓦列罗组成其以胡安·内格林博士为财政部长的政府为止，它也没有拿定主意。

九月十三日，根据阿萨尼亚总统批准的一项秘密法令（decreto reservado），内格林获得内阁的授权，将西班牙银行储存的黄金、白银和纸币转移到“在他看来最安全的地方”。法令第二条规定，该法令“在适当的时候”将提交议会，但是根本没有提交。³几天之内，一万箱金币和金锭被运到卡塔赫纳^①的一个大山洞里。⁴

选中卡塔赫纳并不让人感到意外。“那是一个兵力充足、戒备森严的大型海军基地，”安赫尔·比尼亚斯写道，“与战区具有一定的距离，因此，在必要时可以把黄金储备从那里运往其他地方。……也许内阁还没有想好它们的最终目的地。”他认为，“实际上，黄金运到卡塔赫纳之后，立即加大了决定运往法国的可能性”。⁵

显然，把黄金储备转移到卡塔赫纳不只是为了防止落入敌军之手，而

^① 卡塔赫纳（Cartagena），西班牙城市，地中海东岸的港口，内战期间为共和派的海军基地。

且是为了尽快将其兑换成外汇购买迫切需要的战争物资。正如比尼亚斯引用保守共和派人士戈东·奥尔达斯的话所指出的那样，在有“足够的钱支付现金”之前，不干涉公约使购买武器变得困难重重，“因为任何以赊账方式购买的尝试都是徒劳的”。⁶奥尔达斯是政府委托的几位在国外购买武器的代理人之一。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希拉尔和拉尔戈·卡瓦列罗政府都曾把一些黄金送到法兰西银行换成外汇，在总共大约七百一十吨的黄金储备中，这样送出的黄金合计有二百吨左右。⁷拿到法国兑换外汇的黄金大部分是在转移到卡塔赫纳之后送出的。⁸不过，据武器购买人和最大的资金接收者⁹之一路易斯·阿拉基斯塔因说，由于部分运输没有规律，由于在获得法兰西银行发放资金的许可方面的拖延，出现了一些严重的问题，结果导致有几次白白浪费了几周时间，没有做成一单生意。¹⁰戈东·奥尔达斯说，这种拖延是一些重要交易失败的原因，另外，英国的银行也试图“尽量拖延把资金汇往某个似乎不合它们心意的账户”。¹¹

几乎同样令人不安的是布尔戈斯的叛军或民族主义势力的愤怒反应，通过在西班牙和法国的特工和朋友，他们准确地得到了装运黄金的消息。¹²利用正式公告、电台广播以及发往西方各国政府、法兰西银行和其他国家中央银行的抗议函电并以法律诉讼相威胁，布尔戈斯方面竭尽所能阻挠出售黄金储备，指责西班牙银行同意用黄金储备为共和派的货币担保是“与马克思主义歹徒的恶意串通”，出售黄金储备是一种“掠夺”行为，是对银行基本守则的侵犯，因为银行法规定，黄金储备“组成了国家遗产的一部分，就像国家领土一样”。¹³

黄金储备的首要目的应当是作为纸币流通的保证。尽管比尼亚斯没有详细考察消耗黄金储备的法律问题，但他认为，战时的财政状况使得人们必须“规避银行法的严格规定，因为银行法必定禁止为了诸如购买武器和战争物资之类的目的转让使用黄金储备”。¹⁴另一方面，阿尔瓦雷斯·德尔巴约对把大量黄金运往苏联一笔带过，他满不在乎地评论说，那是“严格按照银行法进行的”。¹⁵

毫无疑问，民族主义者就共和派将黄金运往法国而开展的舆论活动所造成的紧张气氛引起了内格林和拉尔戈·卡瓦列罗的忧虑，使他们担心

法国最终可能将会禁止使用黄金储备。这种忧虑很可能还促使他们——无论是否受到斯塔舍夫斯基的怂恿——决定将大量黄金储备运往苏联，在那里，这些黄金不仅可以用来购买苏联武器和补给，而且可以换成需要的外汇在其他国家购买武器和补给。在西欧和中欧进行这些交易的主要渠道是巴黎的北欧商业银行（欧洲银行），这家银行由（而且始终由）苏联控制，其业务在极其秘密的状态下暗箱操作，在当时的环境下这无疑是一种有利因素，¹⁶但是，由于从来没有公布过以共和国政府名义进行的交易的任何记录，¹⁷这一因素如今使人们对银行账目可能造假的指控难下定论。¹⁸

147 同样没有发现这一关键时期内格林掌管的西班牙财政部的外汇账目。内格林的门生¹⁹和战时西班牙驻莫斯科大使马塞利诺·帕斯库亚断言：“只有胡安·内格林掌握着有关记录。”²⁰比尼亚斯特别强调了这种文件资料缺失的状况：“只要找不到共和国财政部和欧洲银行的有关资料……就不可能再现——即使是部分再现——共和国在国外进行的金融活动，也不可能确定通过出售运到莫斯科的西班牙黄金所获得的外汇流向了何处。我们必须无条件接受……这一令人痛苦的结论。”²¹

同样不为人知的是通过伦敦的莫斯科人民银行以财政部的名义进行的交易。比尼亚斯写道：“没有探讨过[这家银行]参与共和国国际交易网络的问题，我们担心获得有关资料的难度甚至比欧洲银行的更大。这两家银行紧密合作，即使只是因为共和国包租的大多是英国船只，也可以肯定共和国的外汇资金大量流向了伦敦的这家苏联银行。”²²

一九三六年十月二十日，拉尔戈·卡瓦列罗写信确认苏联同意存放黄金储备三天后，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特工负责人亚历山大·奥尔洛夫收到了约瑟夫·斯大林发来的下面这封密码电报：

“会同罗森堡大使一起与西班牙政府首脑卡瓦列罗商定将西班牙的黄金储备运到苏联事宜。……这一行动必须极其秘密地进行。

“如果西班牙人要你出具这批货物的收据，拒绝他们。我再说一遍，拒绝签署任何东西并告诉他们，正式收据将在莫斯科由国家银行开具。”²³

斯大林的指示完全符合商业准则因而不会被误解。我认为，身为劳动者总工会银行雇员工会主席的亲共人士阿马罗·德尔·罗萨尔所发表的下

述言论准确无误：“拒绝出具收据没有什么大不了的。由于这次运输的性质，不可能让保险公司为它保险，因为这将意味着把秘密泄露给敌人。另一方面，苏联银行不可能承担任何风险。运输的货物可能落入敌人之手，运输的船只可能因某一次战争行动被击沉。西班牙政府的保证在于这样一个事实，每艘船上都有一名西班牙银行的代表，他在到达目的地之前看管货物，监督航程。……收据将在到达目的地并且列出货物清单之后开具，西班牙银行的代表可以参与清单的制作。制作清单是一项细致的工作，它持续了三个月之久。”²⁴

一九三七年二月五日，为最初从马德里运到卡特赫纳的一万箱金锭和金币中的七千八百箱（其余两千二百箱在一九三六年九月至一九三七年二月间运往法国和巴伦西亚²⁵）开具了正式的收据，收据上有西班牙大使马塞利诺·帕斯库亚、苏联财政人民委员Г.Ф.格林科和副外交人民委员Н.Н.克列斯京斯基的签名。²⁶收据显示，“在下列人员之一在场并且参与的情况下：阿图罗·坎德拉、阿维拉多·帕丁、何塞·冈萨雷克[原文如此]和何塞·贝拉斯科”，对七千八百箱黄金中的每一箱进行了开箱、点数和称重。收据提供的运到莫斯科的黄金重量为五亿一千零七万九千五百二十九点一三克或五百一十点零八吨，根据纯金含量四百六十点五二吨的估计，当时的价值为五亿一千八百万美元。²⁷

148

几乎将近二十年后，内格林与苏联的关系开始冷淡之后又过了很长时间，作为应内格林的要求开始进行的谈判的结果，该收据的一份副本和内格林所拥有的与存放在莫斯科的黄金有关的大量文件被他的儿子罗慕洛移交给了佛朗哥当局。谈判的要求是内格林在一九五六年十一月十二日于法国去世之前不久通过其好友、前司法部长马里亚诺·安索提出的。内格林告诉安索，无论什么样的政府执政，这些文件都是西班牙的国家财产。内格林去世后不久，他的儿子罗慕洛“希望完成其父的心愿”，将这些文件移交给西班牙驻巴黎总领事馆。²⁸

在一份由安索于一九五六年十二月十四日起草和签署并由内格林的儿子连署以确认其忠实反映了父亲心情的补充文件中，安索表达了内格林“对西班牙而非苏联利益的深切关注”和他的忧虑：“没有支持其权利的

文件，在必须清算因两国之间所进行的那一笔可能是最大和最重要的交易而产生的账目时”，西班牙将被置于“赤手空拳无以自卫”的境地。

在列举了一些“压在内格林心头”的其他问题——包括“许多重要的西班牙商船船队”被苏联滞留的问题——之后，安索断言，在西班牙与苏联之间进行任何财务结算时，内格林认为这是“他作为一个西班牙人被赋予的无条件维护国家利益的义务”。²⁹

我们必须假定这些都是一个饱经沧桑的老人考虑关心的事情，他在晚年对苏联的幻想逐渐破灭，³⁰他和那个懵懵懂懂的理想主义生理学教授大不相同，和那个在一九三六年十月二十二日与亚历山大·奥尔洛夫商定将大量西班牙黄金储备运往苏联的政府新人也大不相同。“财政部长看上去是一个非常典型的知识分子——在理论上反对共产主义，还不确定是否赞成俄国进行的‘伟大实验’。”多年以后亚历山大·奥尔洛夫写道，“这种政治上的幼稚有助于解释他把黄金运往那个国家的冲动。此外，由于希特勒和墨索里尼支持民族主义者而民主国家冷眼旁观，苏联是一个盟友，一个帮助西班牙共和派的大国。‘黄金储备现在在哪儿？’我问他。‘在卡塔赫纳，’内格林答道，‘在一个海军用来存放弹药的古老的山洞里。’斯大林

149 大林的运气又来了，我激动地想到。货物已在卡塔赫纳这一情况大大简化了我的问题。苏联船只正在那个大型港口卸下武器和物资。这样的话，不仅是苏联船只，而且还有可靠的苏联行动人员，都近在咫尺。”³¹

无论我们如何想象奥尔洛夫谈到内格林——尤其是从马丁内斯·阿穆蒂奥对他的描述来看，这是一个“雄心勃勃”的人，一个“出众的才华几乎全部用于实现自己的欲望和抱负”的人³²——时所使用的“政治上幼稚”这种说法，毫无疑问，鉴于西方列强的态度，如果不是运到苏联，就不可能有效地为了战争动用西班牙的黄金储备。奥尔洛夫告诉内格林，他将与最近到达西班牙的苏联坦克兵一起执行这项任务。“我希望强调的是，当时西班牙政府……并没有完全控制局面。”他对美国参议院负责调查国内安全法案实施情况的小组委员会说，“我坦率地告诉财政部长内格林，如果有人听到风声，如果无政府主义者截击我手下用卡车运送黄金的俄国人，他们会杀了我的人，然后，这将成为一个轰动全世界的政治丑闻，它甚至可能引发一场国内革命。因此……我问他，西班牙政府能否用某个虚

构的名字给我弄到……英格兰银行或美洲银行代表的身份证明文件，因为到时候……我可以这样说，为了妥善保管正在把黄金运往美国。……内格林不反对这样做。他认为这是一个好主意。我的英语说得大概还算不错，可以冒充外国人。就这样，他给我弄了一份某个布莱克斯通先生的证明文件，于是，我成为美洲银行的代表。”³³比美国参议院听证会早八年，阿尔瓦雷斯·德尔巴约在其所写的一本书中提到了这件事情，不过，他要么是不知道、要么就是不想泄露这位布莱克斯通先生的真实身份。“苏联方面参加行动的只有罗森堡大使选派的一名大使馆随员，”阿尔瓦雷斯·德尔巴约写道，“我们只知道他将被称为布莱克斯通。当大使介绍他的时候，内格林开玩笑地给他起了这个名字。”³⁴

奥尔洛夫对无政府主义者的担心并非空穴来风。他们已经对把黄金储备运到全国劳工联合会和伊比利亚无政府主义者联盟的大本营巴塞罗那表现出了强烈的兴趣，这不仅是为了妥善保管，也是为了购买战争物资。著名的伊比利亚无政府主义者联盟领导人迭戈·阿瓦德·德·桑蒂连提到了一九三六年八月与希拉尔总理的一次会晤：“我们向他说明，只要他帮助我们获得我们需要的资金来源，我们就能独自打败敌人。我们深感遗憾的是，由于对加泰罗尼亚的无端敌意和对人民革命的恐惧……中央政府可能妨碍我们的工作，而胜利和拯救大家取决于我们的工作。……我们最后谈到西班牙银行的黄金有危险，欢迎立即将其转移[到巴塞罗那]。不久之后，希拉尔政府就垮台了。”³⁵

后来，桑蒂连制订了为至少夺取部分黄金袭击西班牙银行金库的计划。他说：“我们事先知道必须使用武力。我们在马德里大约有三千名可靠人员而且为用专列转移黄金进行了周密的准备。……在政府可能采取任何行动之前，我们已经驶向加泰罗尼亚。……我们把我们的意图向全国劳工联合会的全国委员会作了汇报，并且通知了[伊比利亚无政府主义者联盟的]一些较有名望的同志。计划让我们的朋友不寒而栗。他们反对这个计划的主要理由……是，它只会增加对加泰罗尼亚的敌意。”³⁶

另有证据表明，一些无政府主义者确实打算袭击西班牙银行。社会党温和派领导人胡安-西梅翁·比达尔特声称，加泰罗尼亚自治区主席路易斯·孔帕尼斯告诉拉尔戈·卡瓦列罗，伊比利亚无政府主义者联盟正准备

“袭击西班牙银行的金库夺取黄金，然后将其转移到巴塞罗那更安全的地方”，敦促后者采取“一切措施予以防范”。³⁷此外，阿萨尼亚总统也说，一九三六年九月桑蒂连告诉他，全国劳工联合会有四千人“准备来马德里抢夺黄金”。³⁸

尽管无政府主义者的计划不了了之，然而，几乎毫无疑问的是，如果无政府主义者截击奥尔洛夫的人马，他对产生轰动世界的政治丑闻的担心将被证明言之有理。

被内格林授予布莱克斯通的名分之后，奥尔洛夫动身前往卡塔赫纳，为了把黄金装上苏联商船，他要求派来六十名西班牙水手。紧接着，他安排把黄金从山洞里运到码头上。“两周前一个苏联坦克旅已经上岸，”他写道，“此时驻扎在四十英里之外[穆尔西亚以北]的阿切纳。它由在西班牙化名梅莱的C.克里沃舍因上校指挥。克里沃舍因给我派了二十辆军用卡车和二十名最好的坦克驾驶员。……提前一两个小时把六十名西班牙水手送到了山洞。……于是，十月二十二日，当夜色降临时，我驾车向存放弹药的山洞驶去，卡车车队跟在我的后面。”靠墙堆放着几千个完全一样的木箱子。“木板箱里装着金锭和金币——价值几亿美元！一个古老的国家多少个世纪积累的财富都在这里！”³⁹装车用了三个夜晚，从晚上七点直到黎明。奥尔洛夫向美国参议院小组委员会作证说，在第二或者第三天，发生了一次猛烈的轰炸，有人说，如果一颗炸弹击中旁边那个存放着几千磅炸药的山洞的话，他们都将炸成碎片。“[内格林信任的财政部长弗朗西斯科·]门德斯·阿斯佩的健康状况是个严重问题。他的神经非常紧张。他对我们说，我们必须停止装车，不然我们[将被]炸死。我告诉他，我们不能停下来，因为德国人将会持续轰炸港口，船只[可能被]炸沉。我们必须继续装车。于是，他逃走了，只留下了一个助手，那是一个非常细心的西班牙人，为他们清点黄金[箱子]的数量。”⁴⁰

151 十月二十五日，七千八百箱黄金装上四艘苏联商船运往敖德萨，⁴¹并于十一月六日至十日在莫斯科移交给苏联财政人民委员部贵重金属局。⁴²一位同事向克里维茨基描述了苏联港口的反常情况：“码头四周全部清空并被特种部队包围起来。国家政治保卫总局[内务人民委员部]的高级军官从船坞穿过这一清空地带把一箱箱黄金扛到铁路旁边。⁴³他们搬运了几天这些沉重

的黄金并把它们装上货运列车，然后在武装押解之下运往莫斯科。他试图向我估计他们在敖德萨卸下的黄金数量。我们正走过广阔的红场。他指着我们周围几英亩的空地说：‘如果把堆放在敖德萨铁路调车场的所有装着黄金的箱子一个挨一个地放在红场这里，它们将把这里全部堆满。’”⁴⁴

不过，事实比这种形象的描述给人的印象更深刻。正如收据所显示的那样，在七千八百箱黄金中，只有十三箱装的是金锭，另外七千七百八十七箱装的都是金币，成百上千万金币——美国的美元，阿根廷、智利和墨西哥的比索，奥地利、比利时、法国和瑞士的法郎，荷兰的盾，英国的沙弗林，德国的马克，意大利的里拉，葡萄牙的埃斯库多，俄国的卢布和西班牙的比塞塔——中有一些古币，还有一些极为罕见，金币本身的价值超过了它们的纯金含量。如果我们借用上面那种形象的描述，这些金币可以铺满整个红场。

这些稀有古币从来没有以其本身的价值在西班牙财政部的账本上登记过。可是却非常仔细地将假币、残币或者黄金含量低于法定标准的钱币列了出来。⁴⁵另一方面，苏联人也没有对这些本身价值大大超出其黄金含量的稀有古币做出说明。根本不可能把所有金币都熔化了，特别是重达三十一万八千六百零三点三克的葡萄牙古币，在苏联的正式收据中，专门列出了这一重量，这些金币的价值显然远远超过其所含估计约为二十八万六千七百四十三克纯金的价值。⁴⁶至于在其余的金币中还有多少稀有古币，那也许永远都是一个未知数。

大英博物馆钱币和金属部的罗杰·布兰德估计金币总数超过六千万枚，他在写给我的一封信中表达了自己的看法：“只是为了发现是否存在有价值的钱币而把它们整理一遍，我非常怀疑值得不值得这么做。”他还认为：“当时的钱币市场比现在的市场小得多，即使其中的一小部分它都可能接受不了。”⁴⁷他说的这两个问题肯定不错，但他不知道的是，事实上，为了找出假币和残币，苏联人确实把这些钱币全部整理了一遍。⁴⁸因此，可以合乎逻辑地提出下面这个问题：难道苏联人不会在打算把有价值的钱币逐步拿到国际市场上卖掉的同时把它们全都放在一边吗？

赫伯特·马修斯声称，几个月后内格林失望地发现，苏联人不仅把金币熔铸成金条，而且还要为此收取高额费用。⁴⁹“由于按重量计算金币的价

值高于金条，因此，他要求停止这种加工并对苏联要求收费表示抗议。”⁵⁰但是，没有证据证明他曾经提出过抗议或者曾经将他所谓的关切告诉过任何内阁成员。同样没有证据证明的是，苏联人曾向西班牙财政部退赔过任何高额收费或是西班牙财政部收到过根据稀有古币本身的价值支付的款项。因为身为财政部长的内格林肯定知道黄金储备包括稀有古币，所以我们必须提出这个问题：在同意运往苏联之前，他为什么没有坚持要求就这些古币给予西班牙财政部适当的确认？在西班牙银行发现的文件——安赫尔·比尼亚斯的研究依据的就是这些文件——显示，西班牙财政部没有得到对稀有古币价值的确认，只是由于出售这些黄金的订单的生效，金币所含纯金的价值记在了它的账本上，无论苏联财政人民委员部贵金属局声称它熔化提炼了多少纯金。⁵¹此外，这些文件中没有任何要求苏联人停止熔化提纯金币的记录。相反，内格林的支持者比尼亚斯证明，西班牙财政部一九三七年开出的涉及出售三百五十八点五吨黄金（超过总数的百分之七十）的十五份订单经内格林批准全部生效。⁵²

苏联人从未披露那一批葡萄牙古币的最终去向，也没有披露经过他们细致检查的六千万枚金币中究竟有多少稀有古币。除了二十年后马修斯的说法之外，没有证据证明内格林曾经与苏联人讨论过这个问题。另外，没有持客观立场的人见证过这些金币的熔化提纯，因此，怀疑苏联人甚至可能将他们发现的稀有古币据为己有然后代之以本国的黄金储备完成西班牙的订单并非毫无道理。在缺乏苏联档案的情况下，不能完全无视这种可能性。下面的情况增加了稀有古币命运的不确定性：可以肯定，即使是随船到达敖德萨并于点数、称重时在场的四名西班牙银行的代表也没有亲眼看到将金币熔化与提纯。总之，不许他们返回西班牙。“可能是内格林和门德斯·阿斯佩决定，”比尼亚斯写道，“为了避免有关黄金运往何处的消息泄露出去，他们应当留在莫斯科。”⁵³他描述了他们在苏联首都的困境：他们根本没有准备长期留下来，因此非常担心他们在西班牙的家人，也为其他个人问题忧心忡忡。最终，他们的家人到莫斯科与他们团聚，但是他们始终希望返回西班牙。⁵⁴在西班牙银行进行广泛研究的过程中，比尼亚斯看到了跟随黄金到达莫斯科的四名银行雇员之一阿图罗·坎德拉写给银行副总裁胡利奥·卡拉维亚斯的“一封感人的信”，恳求后者“暗中让他

们离开这里”。⁵⁵ “一九三八年夏天，”比尼亚斯证实，“内格林和门德斯·阿斯佩决定采纳帕斯库亚的建议，允许他们离开苏联。⁵⁶……苏联政府坚决要求他们绝对保持沉默，但是允许他们离开。共和国政府建议银行把他们分派到设在斯德哥尔摩、美国、墨西哥和布宜诺斯艾利斯的西班牙代理机构。一九三八年十月二十七日，他们离开莫斯科。”⁵⁷

至于参与黄金行动的苏联高级官员，有证据表明，至少两人被枪毙，尽管无从了解他们的死是否直接或者间接地与运送西班牙黄金有关。据权威的《苏联名人录》记载，一九三八年三月十五日，苏联财政人民委员Г.Ф.格林科和副外交人民委员Н.Н.克列斯京斯基（两人均在正式收据上签了名）因所谓反苏“右倾托派集团”成员的罪名遭到处决。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格林科还被指控“试图削弱苏联的经济实力”。⁵⁸另外，有证据表明，与运送黄金直接有关的内格林的经济顾问斯塔舍夫斯基也在大清洗中销声匿迹。

尽管安赫尔·比尼亚斯得出结论，西班牙的黄金储备在离内战结束还有不到一年时就已几乎全部用光，⁵⁹我们仍然必须询问一个重要问题。通过向苏联国家银行出售黄金获得了大量的外汇，它们被转到苏联控制的巴黎北欧商业银行并被存入西班牙财政部在那里开设的账户，这些外汇也用光了吗？由于该银行的业务在极其秘密的状态下暗箱操作而且财政部在该银行所开账户的记录从来没有公布过，另外，由于没有找到财政部自己的有关文件，因此，当比尼亚斯得出他的结论时，这个问题应当还没有找到答案。一九八〇年四月在纽约西班牙学会进行的一次交谈中，比尼亚斯用下面的话概括了这个问题：“我们对法国的苏联银行一无所知，我们也不知道属于共和国的外汇究竟出了什么问题。”⁶⁰

任何对西班牙与苏联之间的金融业务所进行的全面研究必须考虑苏联向内格林政府贷款的问题。迄今为止，只有比尼亚斯尝试进行了这种研究。他根据共和国的档案资料指出，内格林的策略是，确保从苏联得到长期贷款，以尽量保留剩余的黄金储备。这一策略并不成功。一九三七年秋天，内格林指示帕斯库亚申请一笔一亿五千万美元的贷款，但这位大使十月二十九日回复说：“我一直在紧锣密鼓地催促贷款。可是你不知道迅速落实有多么难。他们[苏联人]非常精明，办事拖沓，有时完全靠不住。”

比尼亚斯接着写道，苏联人答应提供仅限于购买民用物资的两千万美元，同时坚决要求像迄今为止那样通过出售存放的黄金支付战争物资的订单，

“因为，为了完成这些订单，苏联必须进口原材料，结果一定会消耗它的外汇储备。”比尼亚斯披露，直到一九三八年三月，斯大林才批准了一笔七千万美元的贷款，但是附带了极其苛刻的条件：三千五百万美元须以同等价值的黄金担保并在两年之内偿还，而没有担保的其余贷款须在四年之内偿还。⁶¹根据苏联的消息来源，由于黄金储备到一九三八年夏天已经用光，可能不得不为购买当年年底运往西班牙的武器另外提供贷款，但是，没有发现任何记录。比尼亚斯能够看到所有可以利用的资料，他也只是简单地说：“不排除最后运送的苏联货物是以贷款取得的。”⁶²另外，他在发表于《欧洲研究评论》的一篇文章里证实：“一九三八年七月十三日，[当时的西班牙驻巴黎大使]帕斯库亚[在莫斯科]会见了苏联领导人，后者同意了内格林提出的总计六千万美元的贷款要求。……帕斯库亚立即返回巴黎，随后，内格林本人亲自与苏联在西班牙的代表接触，商讨这笔贷款业务的细节。没有发现关于这次磋商结果的文件。”⁶³

没有提到消息来源的马丁内斯·阿穆蒂奥说，内格林为自己要求的贷款担保，却不告诉任何人它存在何处。“没有说明，没有可以帮助澄清这个悬而未决的问题的丝毫信息。”⁶⁴内格林的朋友帕斯库亚说，“我真的不知道这笔交易的最后结果，因为内格林存心对我采取了令人心寒的相同策略，什么情况都不说，偶尔还会闪烁其词。”⁶⁵

过了十九年，在内格林去世几个月后，一九五七年四月五日，苏联《真理报》报道，不仅西班牙的黄金储备全部用光——它提到一封一九三八年八月八日由内格林和门德斯·阿斯佩签名的要求出售剩余黄金的信件作为证据——而且在苏联提供的八千五百万美元贷款中，西班牙政府仍欠五千万美元没有还。“内格林清楚地知道这件事，”这篇报道补充说，“因为他在所有与使用黄金和贷款有关的命令上都签了字。”

如果我们考虑到一九三八年底运到西班牙的武器，五千万美元这个数字似乎非常合情合理，但是，它完全忽略了苏联没有计算在内的下列情况：稀有古币的价值，西班牙财政部在巴黎苏联银行开设的账户上的不为人知的外汇存款数额，运到苏联的西班牙原材料和工业产品，⁶⁶由于运到法

国的时间太晚以致无法在一九三九年保卫加泰罗尼亚的战斗中使用的武器可能最终运回了苏联，⁶⁷内战结束时向西班牙政府购买的商船可能没有付款，还有据说转移到苏联的机械设备。⁶⁸由于苏联控制的巴黎银行如本章前引安赫尔·比尼亚斯的证词所证实的那样从未公布过内战期间它与西班牙财政部业务往来的任何记录，由于内格林关于这一问题的个人记录五十年来“未被呈堂”，不仅使人们——像比尼亚斯所指出的那样——不可能对一九三六年十月运到莫斯科的大量黄金所换取的外汇进行准确的核算，而且使人们不可能对共和国政府与苏联之间的其他财政经济往来进行准确的核算，甚至到了今天，它们仍然被怀疑和猜测笼罩着。

对于《真理报》“黄金储备全部用光”的说法，因达莱西奥·普列托不以为然并且做出了强烈的反应：“我们在这里谈论的是一个大规模侵吞的问题。无论我对胡安·内格林的看法如何，我断定他不会制造可怕的骗局，在去世之前安排……交给佛朗哥一份没有实际价值的文件[运到莫斯科的那些黄金的正式收据]。”他列举了用西班牙的资金为法国共产党谋利益的各种方式，其中包括对《今晚报》的补贴以及法国共产党秘密拥有的法国航海公司购买了十几艘轮船，⁶⁹然后，普列托继续写道：“即使所有这些费用都由运到苏联的黄金储备支付，它也不可能全部用光。我再说一遍：我们正在谈论一个大规模侵吞的问题。为了给自己辩护，苏联将会伪造它认为必要的任何证明文件。由于内格林进了坟墓，他无法否认造假专家模仿的签名的真实性。”⁷⁰

还有最后一个问题：黄金运往苏联之前内阁进行磋商了吗？内格林和阿尔瓦雷斯·德尔巴约都说进行了磋商。⁷¹可是，海军部长普列托却说没有进行磋商。他写道：“身为财政部长的内格林先生得到政府和共和国总统签署的一项法令[九月十三日的秘密法令]的批准，授权他采取他认为必要的一切措施保护西班牙银行的黄金储备。作为当时政府的一员，我同意承担我对这项法令负有的责任，尽管我和其他部长都不知道这项法令的目的何在。我不知道当时的政府首脑拉尔戈·卡瓦列罗是否清楚这一点。⁷²装运是在极其秘密的情况下进行的。我发现这件事情纯属偶然，当时正在按照内格林和门德斯·阿斯佩的指示装运黄金，到达卡塔赫纳之后有一些与我的部门有关的问题需要处理。”⁷³很难相信普列托在到达卡塔赫纳之前对运送

黄金的计划一无所知，而且我们马上将会看到，奥尔洛夫的说法与他的说法有出入。

普列托还宣称，内格林在卡塔赫纳见到他时无法掩饰自己的“恼怒”。“他肯定认为我是去那里打探消息的。他没有对我说明他在场的原因。我知道他去那里的目的，因为海军基地司令告诉我，财政部长要求他派水手装运黄金……而他已经答应了。我对基地司令的应允表示认可，我对这件事情的参与也到此为止。”⁷⁴

奥尔洛夫提供的证据有利于证明普列托最初并不知道把黄金储备运往苏联的计划。在向美国参议院小组委员会作证时，奥尔洛夫说，在把黄金装上苏联商船之前，他决定要求西班牙政府下达一道沿地中海航线部署军舰的命令。“我知道这种命令只能由普列托下达，……而他对黄金行动的整个计划一无所知。于是，我打电话给苏联大使。[我]请求他与卡瓦列罗总理交涉此事，安排海军部长普列托给西班牙军舰下命令。……没过几天，财政部长内格林和……普列托来到卡塔赫纳，那道命令下达了。”⁷⁵

156 阿尔瓦雷斯·德尔巴约也说普列托安排了必要的海军保护，尽管这无意中与他所宣称的内格林“只是在得到内阁全体成员的同意后”才把黄金转移到苏联的说法⁷⁶自相矛盾。“由于必须确保海上运输的安全，”他写道，“因达莱西奥·普列托……成为这一秘密行动的合作伙伴。他也满意地听取了情况介绍，然后直接亲自负责，安排一支海军舰队一路护送到突尼斯近海。”⁷⁷但普列托却说，不仅最初他不知道把黄金运往苏联的计划，而且没有人向他请求海军护航，他也没有建议提供海军护航。⁷⁸他举出卡塔赫纳驱逐舰司令比森特·拉米雷斯·德·托戈雷斯所写的一封信作为证据，这位舰队司令宣称，没有任何西班牙军舰为苏联商船护过航。⁷⁹内格林的好友马利亚诺·安索暗示，这封信可能正是应普列托的要求而写的。⁸⁰无论如何，西班牙舰队司令的说法与苏联海军武官兼军事顾问尼古拉·Γ·库兹涅佐夫的说法正好相反。库兹涅佐夫负责在公海保护黄金的安全，他明确地说，包括“自由”号巡洋舰在内的一支舰队把苏联商船一直护送到北非海域。⁸¹

普列托还将阿尔瓦雷斯·德尔巴约的下列说法斥为“谎言”：“内格林坚决要求充分告知阿萨尼亚总统”，而总统“对这个计划感到惊喜”。⁸²阿

萨尼亚“根本不知道这件事”，普列托反驳说。“拉尔戈·卡瓦列罗和内格林用对待内阁部长的同样方式对待国家元首，他们向大家隐瞒了一切，甚至在这成为既成事实之后。阿萨尼亚极为愤怒。……他对我说，他打算立即辞职。尽管我很同情他，但我仍然努力让他冷静下来。‘你的辞职将意味着共和国的崩溃，’我对他说，‘因为，鉴于在目前的情况下不可能依照宪法产生一位继任总统的事实，这可能被其他国家用来作为终止[外交]承认的借口。’”⁸³

从这些相互矛盾的说法中，可以得出大致可信的以下结论：（1）尽管内格林得到政府和阿萨尼亚总统签署的九月十三日法令的批准，授权他将黄金储备转移到最安全的地方去，但是，一个月后他决定把黄金运往苏联时并没有与内阁磋商，也没有征询普列托或阿萨尼亚的意见；（2）如阿尔瓦雷斯·德尔巴约所说，普列托成为“这一秘密行动的合作伙伴”，但那只是在内格林和卡瓦列罗决定把黄金运往莫斯科之后；（3）对答应派水手把黄金装上苏联商船表示认可的普列托很可能被要求提供海军护航，他甚至有可能建议提供海军护航，因为，认为可以在他不知情、不同意的情况下接受如此重要的任务是异想天开。实际上，马塞利诺·帕斯库亚说，当时内格林与普列托之间的关系“密切，甚至可以说是亲密”；内格林还告诉帕斯库亚，他经常向普列托咨询“各种问题，不仅因为他看重普列托丰富的政治经验，而且因为他们相互信任和忠诚”。⁸⁴

那么，普列托为什么否认他对运送黄金负有责任？答案是，他第一次否认发生在一九四〇年，那是战后他与内格林的不和最严重的时期。另外，人们也许会问，一向不信任莫斯科的普列托为什么要合作？因为他在一九三六年十月的想法不可能与拉尔戈·卡瓦列罗的想法有多大不同，尽管与普列托一样不信任莫斯科，卡瓦列罗仍然认为，除了把黄金运往苏联之外，西方国家的态度让他没有别的选择。

拉尔戈·卡瓦列罗清楚地表明了自己的态度：与普列托和其他运送计划参与者的态度无疑是一模一样的。“由于叛军兵临马德里城下，”他在内战结束以后写道，“在没有说明地点的情况下，[内格林]要求政府授权把黄金从西班牙银行转移到某个安全的地方。这是为了防止黄金不幸落入叛军之手而采取的正常行动；因为，如果失去了用来购买武器的黄金，共和

国的毁灭将不可避免。……内格林首先采取的措施是将黄金转移到卡塔赫纳[的海军基地]。后来，由于担心敌军登陆，他决定将黄金运往国外。运到哪里去呢？英国和法国是那个不干涉公约的主要推动者。……我们可以信任它们吗？不可以。那么，我们还能把它运到哪里去？除了正在用武器和食品帮助我们的苏联之外，没有别的地方了。……我们用这些黄金换取它不断供给我们的战争物资。……另外，我们还用黄金购买我们需要的其他东西。”⁸⁵

尽管把黄金运到莫斯科肯定在军事和财政方面对共和国有利，但是，它有一个不容忽视的弊端：这一重大的财产——当时价值五亿美元，按现在（一九八七年）的黄金价格计算大约七十六亿美元——转移将使西班牙政府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莫斯科的友好政策。在其一九七六年出版的关于西班牙黄金的第一本书中，研究这一问题公认的权威安赫尔·比尼亚斯承认，在把大量黄金储备运到莫斯科之后，“共和国失去了讨价还价的筹码”；他还承认，把黄金转移到莫斯科有利于“增强苏联对某些共和国领导人的决策的影响”。⁸⁶可是，三年以后，比尼亚斯来了个惊人的一百八十度大转变，他声称，断言把黄金运到莫斯科将共和国置于某种依附境地是“具有严重的反共偏见的……人们所采用的一种愚蠢的论点”，这些人不明白，由于为了得到武器共和国必须依靠苏联，因此，把黄金运到莫斯科并没有在“实质上”增强它对苏联的依赖程度。⁸⁷

另一方面，在他们那部关于法国航海公司的独具特色的著作中，多米尼克·格里索尼和吉勒·埃尔佐格坚持认为，把黄金运到莫斯科使苏联不仅可以控制它对西班牙的武器供应，而且可以控制西班牙在苏联国外进行的任何采购，因为这些交易必须通过苏联控制的巴黎北欧商业银行付款。此外，他们断言，苏联对武器供应的垄断使它得以控制共和国的政治“进程”。⁸⁸

158 由于把黄金运到莫斯科将西班牙政府置于在财政上依赖苏联的境地，使它丧失了讨价还价的能力，而且一旦武器禁运解除——这是其外交政策追求的主要目标——它也不可能与其他国家进行交易，人们也许要问，内格林和拉尔戈·卡瓦列罗为什么没有尝试把运走的黄金留下一些以便在需要时购买武器和外汇从而保留哪怕是一点点财政上的独立性。拉尔戈·卡

瓦列罗说这是因为内格林担心敌军在卡塔赫纳登陆，事实使这种论点毫无说服力，正如比尼亚斯指出的那样，这个大型海军基地“兵力充足、戒备森严，与战区具有一定的距离”。民族主义者知道，试图攻占卡塔赫纳是徒劳的，因为他们没有海军，而且实际上他们也从来没有进行过任何这样的尝试。因此，人们不仅必须怀疑那些对把黄金运到莫斯科负有责任的人是否具有正常的判断力，而且必须怀疑他们对苏联的诱骗和控制是否进行了某种程度的反抗。人们还应当怀疑他们在认可苏联人的结算时的判断力，没有尝试进行任何认真的核查或监督。即使进行过这种尝试，在内格林死后移交给佛朗哥政府的文件中，或是在比尼亚斯于西班牙银行发现的文件中，也没有任何这方面的记录。

西班牙的黄金储备安全运到肯定使斯大林心满意足，因为他已经开始向西班牙运送武器，只有通过实际占有黄金才能让他对付款放心并且确保他拥有政治影响力。亚历山大·奥尔洛夫声称，“当……得知西班牙政府愿意将西班牙国家的全部积蓄托付给斯大林时”，他和罗森堡大使“大吃一惊”。据奥尔洛夫说，斯大林为庆祝黄金运到莫斯科举行了一个由政治局委员出席的盛大宴会，他在宴会上用一句俄国谚语表达了他的意思：“西班牙人再也看不见他们的黄金了，就像他们看不见自己的耳朵一样。”⁸⁹

一九三七年一月，黄金运到莫斯科两个月后，根据奥尔洛夫本人的描述，他收到了斯大林的姻兄弟保罗·阿利卢耶夫寄来的“一封热情洋溢的信”，祝贺他获得“苏联的最高奖章列宁勋章”。尽管奥尔洛夫没有说明获奖的原因，但它只可能与运送黄金有关。⁹⁰

注释：

- 1 关于佛朗哥将军对马德里的大举进攻，见何塞·曼努埃尔·马丁内斯·班德上校的《向马德里进军》（一九八二年修订版），该书根据马德里军事历史部门的文献资料写成。
- 2 安赫尔·比尼亚斯，《内战中的西班牙黄金》，第140页和《莫斯科的黄金》，第108—109页。
- 3 《基本原因：西班牙的红色统治》影印了该法令的文本，见附录十三。另请参阅比尼亚斯《内战中的西班牙黄金》，第133—134页。在一九五四年出版于墨西哥的回忆录中，拉尔

戈·卡瓦列罗声称，内格林要求授权把西班牙银行的黄金储备转移到“一个他没有说明的安全的地方”（弗朗西斯科·拉尔戈·卡瓦列罗，《我的回忆：致一位朋友的信》，第203页）。这可能是由于必须绝对保守秘密，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不告诉总理它们将被运往何处。事实上，拉尔戈·卡瓦列罗明确同意将黄金储备转移到卡塔赫纳，然后运往苏联。因此，安赫尔·比尼亚斯——我们已知他是内格林的坚定支持者——把拉尔戈·卡瓦列罗的声明作为“必须谨慎地阅读”其回忆录的理由之一（比尼亚斯，《莫斯科的黄金》，第143页注释50）几乎没有什么道理。另一方面，他对卡瓦列罗下述说法的非议言之有理，该说法有关发往莫斯科的出售部分黄金的命令：“内格林和我必须签署这些命令。我签署了两三个。后来，没有给我任何解释。内格林独自签署了它们。”（拉尔戈·卡瓦列罗，《我的回忆》，第204页）正如比尼亚斯正确指出的那样，卡瓦列罗“在其任期内”签署了“所有关于出售黄金的命令，包括一九三七年二月十六日至四月二十三日期间的前六个命令”（比尼亚斯，《莫斯科的黄金》，第314页）。不过，在没有举出任何证据的情况下，卡瓦列罗的错误说法——比尼亚斯称之为“诽谤内格林的骗人鬼话”——并不能使比尼亚斯断言《我的回忆》被“蓄意修改”（比尼亚斯，《莫斯科的黄金》，第314页）或者用其他毫无根据的说法质疑这部回忆录的真实性（比尼亚斯，《莫斯科的黄金》，第138页注释12）。

- 4 比尼亚斯说，九月十五至二十一日期间，通过铁路运送了一万箱黄金，他还提供了火车发车的准确时间，见《内战中的西班牙黄金》，第146—147页。另请参阅比尼亚斯的文章《黄金，苏联与西班牙内战》，载一九七九年一月号《欧洲研究评论》。
- 5 比尼亚斯，《内战中的西班牙黄金》，第139和137页。
- 6 同上，第129页。
- 7 同上，第76页。
- 8 关于送黄金到法国兑换外汇的详细账目以及其他相关信息，见比尼亚斯《内战中的西班牙黄金》，第47—89页；另请参阅比尼亚斯《莫斯科的黄金》，第83—101页以及发表在一九七七年三月号《历史16》上的文章《内战的黄金传说》。
- 9 关于一份资金接收者的名单以及他们接收的金额，见比尼亚斯《内战中的西班牙黄金》，第87页，补充信息另请参阅第121—123页。
- 10 引自比尼亚斯《内战中的西班牙黄金》，第84—85页。
- 11 引自比尼亚斯《内战中的西班牙黄金》，第99页。
- 12 同上，第101—105页。
- 13 同上，105—121、114—115和119页。另请参阅佛朗哥将军在一九三六年十月十五日《阿拉贡信使报》上发布的正式公告。
- 14 比尼亚斯，《内战中的西班牙黄金》，第35页。关于银行法的某些规定，见《内战中的西班牙黄金》，第33—34页。为了规避这项法律，希拉尔和拉尔戈·卡瓦列罗政府都批准了一些关于出口黄金和划拨外汇的秘密法令，尽管是在已经开始把黄金运往法国之后（比尼亚斯，《内战中的西班牙黄金》，第38—39和132页）。另外，关于一九三八年四月二十九日批准的那项使出售黄金合法化的秘密法令，见《内战中的西班牙黄金》，第553—557页。黄金储备全部运到国外、纸币流通失去任何黄金保证之后过了很长时间，这项法令获得批准。据比尼亚斯说，共和国领导人从来都不承认这项法令的存在（发表在一九七七年三月号《历史16》上的文章）。这并不奇怪，如果这项法令泄露出去，那将使比塞塔在国际外汇市场上变得几乎一文不值。
- 15 胡利奥·阿尔瓦雷斯·德尔巴约，《最后一个乐观主义者》，第284页。
- 16 比尼亚斯，《内战中的西班牙黄金》，第227页。比尼亚斯承认——但是后来又予以否认——把大量黄金储备运往苏联造成了政治上的不利局面（《内战中的西班牙黄金》，第187页），在他看来，把黄金运往其他任何国家都不可能有效地为了战争动用它们（《内

- 战中的西班牙黄金》，第182—186页）。另请参阅马利亚诺·安索《我是内格林的内阁部长》，第309—311页。前西班牙驻苏联大使马塞利诺·帕斯库亚在他的文章《莫斯科的西班牙黄金》中论述了认为把黄金运往英国、法国、瑞士、美国或墨西哥不切实际或不明智的理由（一九七〇年六月至七月号《对话记录》）。
- 17 关于该银行进行交易的绝密状态及其不公布共和国政府交易账目的情况，见比尼亚斯，《内战中的西班牙黄金》，第362页。关于与该银行有关的更多信息，见比尼亚斯《内战中的西班牙黄金》，第81、227—229和460—461页。另请参阅他在纽约西班牙学会发表的声明。对最近几年这家银行与法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人和舆论工具之间暧昧的财务关系感兴趣的读者可以查阅让·蒙塔尔多杰作的《法国苏联银行的秘密》。据该书作者说，这家银行以“法国最神秘莫测的银行”而著称。尽管如此，他仍然搜集到了“数千份原始文件”。“我的调查不容易进行，我遇到了典型的苏联式的特殊防范制度，苏联人是保密艺术的大师。”（蒙塔尔多，《法国苏联银行的秘密》，第11页）
 - 18 实例见因达莱西奥·普列托《西班牙的动乱》，第二卷，第156页。
 - 19 阿萨尼亚的姻兄弟西普里亚诺·里瓦斯-切里弗说，内格林是帕斯库亚的“医学同事并向他提供稳定的保护以换取某种为人不齿的效忠”（西普里亚诺·里瓦斯-切里弗，《不为人知的肖像：曼努埃尔·阿萨尼亚的人生》，第316页）。
 - 20 发表在一九七〇年六月至七月号《对话记录》上的文章。
 - 21 比尼亚斯，《莫斯科的黄金》，第311页。
 - 22 同上，第382页注释10。
 - 23 美国参议院司法委员会，《苏联在美国的活动范围：调查国内安全法案实施情况的小组委员会听证会》，第3430页。
 - 24 阿马罗·德尔·罗萨尔，《西班牙银行的黄金与“比塔”号事件》，第36—37页。
 - 25 据比尼亚斯说，一千九百九十八箱运往法国，二百零二箱运往巴伦西亚的财政部，见比尼亚斯《内战中的西班牙黄金》，第147—150页。另请参阅他发表在一九七七年三月号《历史16》上的文章。
 - 26 路易斯·博林的《西班牙：重要的年代》复制了法文版的八页正式收据，见第375—382页。
 - 27 五亿一千八百万美元和四百六十点五二吨这两个数字是比尼亚斯的《内战中的西班牙黄金》提供的，见第207—210页。
 - 28 安索，《我是内格林的内阁部长》，第313—330页。路易斯·博林所著《西班牙：重要的年代》的西班牙文版包括了一些英文版所没有的移交给佛朗哥政府的文件的影印件。
 - 29 安索，《我是内格林的内阁部长》，第325—329页。比尼亚斯认为安索关于西班牙船队的说法不对。“为了确保向苏联商业机构支付某些应付的款项，”他写道，“船队被滞留在敖德萨。苏联当局打算得到或者租用它们。最终，在一九三九年二月[内战结束前一个月]，共和国政府决定接受苏联购买它们的建议。”（比尼亚斯一九七八年一月十五日写给我的信，现存胡佛研究所）。另请参阅比尼亚斯《莫斯科的黄金》，第356、412和425页注释32—33。比尼亚斯在注释33中说明，一九三九年二月二十一日，门德斯·阿斯佩从巴黎通知内格林，苏联人希望用六十万七千英镑购买四艘西班牙商船。“门德斯·阿斯佩认为这笔交易可以做，只等内格林赶快批准以最后确定。”一个月后，一九三九年三月二十四日，门德斯·阿斯佩通知他正在与之谈判协商向逃到法国的巴斯克难民提供更多财政援助事宜的巴斯克自治政府成员埃利奥多罗·德拉·托雷，“苏联人尚未将有关款项划入我方账户。”（根据西班牙历史学家哈维尔·鲁维奥所引用的一份会谈备忘录，见一九八〇年一月号《历史16》）比尼亚斯和鲁维奥均未说明苏联人是否支付了购买西班牙商船的款项。另请参阅里瓦斯-切里弗《不为人知的肖像》，第324—325页。
 - 30 阿尔瓦雷斯·德尔巴约说，内格林与苏联人的关系变冷始于一九四五年，而且“在扬·马

萨里克死于布拉格[一九四八年二月共产党在布拉格发动政变几天后，官方宣布马萨里克跳楼自杀]后更加冷淡。内格林与马萨里克因为一段可以追溯到二战期间他们在伦敦流亡时的热情友好的关系而成为朋友”（胡里奥·阿尔瓦雷斯·德尔巴约，《让我去战斗》，第193页）。在伦敦流亡期间，内格林与苏联大使伊万·迈斯基夫妇非常友好，大使夫妇经常到内格林在离伦敦不远的博温顿的乡间住所作客。迈斯基说：“博温顿成为我们周末休息的固定的地方。”（伊万·迈斯基，《一个苏联大使的回忆：战争，1939—1943》，第117—118页）

- 31 一九六六年十一月号《读者文摘》。很难相信对正在发生的所有事情都非常警觉的奥尔洛夫会不知道黄金储备的下落。
- 32 马丁内斯·阿穆蒂奥一九七九年十二月十五日写给我的信，现存胡佛研究所。马丁内斯·阿穆蒂奥是社会党第二大组织巴伦西亚社会主义联盟的书记。
- 33 美国参议院司法委员会，《苏联在美国的活动范围》，第3431—3432页。
- 34 阿尔瓦雷斯·德尔巴约，《最后一个乐观主义者》，第285—286页。
- 35 迭戈·阿瓦德·德·桑蒂连，《我们为什么输掉了内战》，第105—106页。
- 36 同上，第113页。
- 37 胡安-西梅翁·比达尔特，《全都是罪犯》，第503页。
- 38 《阿萨尼亚文集》，第四卷，第704页。
- 39 一九六六年十一月号《读者文摘》。
- 40 美国参议院司法委员会，《苏联在美国的活动范围》，第3431—3432页。阿马罗·德尔·罗萨尔证实了门德斯·阿斯佩的“‘焦虑’状态，……这符合他的个性”（罗萨尔，《西班牙银行的黄金与“比塔”号事件》，第35页）。
- 41 苏联海军武官、卡塔赫纳海军基地司令安东尼奥·鲁伊斯的军事顾问尼古拉·库兹涅佐夫的文章，收入《在西班牙共和国的旗帜下，1936—1939：苏联志愿参战人员回忆录》，见第241—244页。苏联商船的数量得到了帕斯库亚和罗萨尔的确认，分别见帕斯库亚发表在一九七〇年六月至七月号《对话记录》上的文章和罗萨尔，《西班牙银行的黄金与“比塔”号事件》，第38页。
- 42 比尼亚斯，《莫斯科的黄金》，第262页。
- 43 据罗萨尔说，每一箱黄金的重量是六十五公斤（《西班牙银行的黄金与“比塔”号事件》，第30页）。
- 44 瓦尔特·克里维茨基，《在斯大林的情报部门工作》，第112—113页。
- 45 帕斯库亚发表在一九七〇年六月至七月号《对话记录》上的文章；比尼亚斯，《莫斯科的黄金》，第285页、第298页注释2和第304页注释65。
- 46 这一估计的纯金含量见比尼亚斯《内战中的西班牙黄金》，第206页，图表14。
- 47 着重体是我加的，布兰德的这封信现存胡佛研究所。
- 48 由衷地感谢罗杰·布兰德对我的帮助，也对当时我没有把这个重要信息告诉他深感懊悔。
- 49 关于对苏联人将金币熔化提纯的指责，见比尼亚斯《内战中的西班牙黄金》，图表18（第242与243页之间）。关于向西班牙政府收取的额外费用，例如，为“维持”看守黄金的“武装警卫”每月就得一万四千五百美元，见比尼亚斯《莫斯科的黄金》，第293页。
- 50 赫伯特·L·马修斯，《轭与箭》，第98页。
- 51 关于比尼亚斯根据苏联官方的统计数字而得到的对含金量不同的黄金熔化提纯的详细结果，见《内战中的西班牙黄金》，图表19（第244与245页之间），这些黄金按照西班牙财政部发来的十五份订单卖掉了。
- 52 比尼亚斯，《内战中的西班牙黄金》，第235页。他回忆说，拉尔戈·卡瓦列罗也在前六份订单上签了名。
- 53 比尼亚斯，《莫斯科的黄金》，第381页注释6。在比尼亚斯将他们被迫留在莫斯科归因于

内格林和门德斯·阿斯佩的决定之前，人们一直认为只有苏联人应该对他们的延期滞留负责。比尼亚斯还说：“这几名官员的问题引起了一片指责，但是，他们留在莫斯科似乎是因为共和国当局不希望他们回来。……当共和国政府决定召他们回国时，苏联人稍微犹豫了一下之后就同意了。”（比尼亚斯一九七八年一月十五日写给我的信，现存胡佛研究所）

54 比尼亚斯，《莫斯科的黄金》，第285页和注释66、第381页注释6。

55 比尼亚斯，《内战中的西班牙黄金》，第197页注释57。

56 据马丁内斯·阿穆蒂奥说，当四名西班牙人被告知他们离开西班牙不会超过一个月时，他们请求帕斯库亚为他们说情，帕斯库亚“答应立即过问此事并且建议他们坚守岗位，不要与苏联人作对或者出现什么问题。……这些西班牙官员进一步向大使投诉。过了将近两个月，当他们被迫更换住处以致无法相互联系时，没有得到任何解释。即使从住处外出他们也被单独分开，每个人由一名显然属于秘密警察的苏联人陪同。……帕斯库亚大使本人的做法比玩忽职守更恶劣：明显对苏联人奴颜婢膝而且与他们串通一气，因为，尽管西班牙收到了这些官员的投诉，大使的解释却是他们对自己的处境言过其实”（胡斯托·马丁内斯·阿穆蒂奥，《挟持民众》，第56—57页）。另请参阅马丁内斯·阿穆蒂奥《挟持民众》，第63页。据普列托说，多亏西班牙大使馆临时代办曼努埃尔·马丁内斯·佩德罗索，这四名银行雇员才得以离开苏联。“对我国大使马塞利诺·帕斯库亚先生[投诉]是徒劳的。不允许他们离开；他们必须与家人一起留在苏联。两年过后，当内战接近尾声时，临时代办曼努埃尔·马丁内斯·佩德罗索先生结束了他们的囚禁生涯。但是，并没有把四名银行职员送回国；他们可能说出来的东西太多了。为了防止出现这种情况，他们被遣散到了世界各地。”（因达莱西奥·普列托，《我如何以及为什么离开国防部》[墨西哥版序言]，第16页）关于马丁内斯·佩德罗索所起的作用，比尼亚斯与普列托的看法不同。他说：“马丁内斯·佩德罗索一九三八年夏天来到莫斯科，当时实际上已经决定让他们回国。”（比尼亚斯一九七八年一月十五日写给我的信，现存胡佛研究所）

57 比尼亚斯，《莫斯科的黄金》，第381页注释6。

58 《苏联名人录》，第217和313页。《苏联大百科全书》确认了一九三八年三月十五日这个日期（第七卷，1972和第十三卷，1973），但是没有提到死因。普列托写道：“参与[西班牙黄金]这件事的苏联高级官员从他们的职位上消失了：财政部长格林科，国家银行行长马尔古利斯[原文如此]，副行长卡甘[原文如此]，财政部[驻国家银行]代表伊万诺夫斯基，国家银行新任行长马丁松。在所有丢掉职位的官员中，一些人进了监狱，格林科被枪毙了。”（普列托，《我如何以及为什么离开国防部》，第16页）在上面提到的这些官员所担任的职务中，普列托把两个人的职务弄错了。根据比尼亚斯复制的一份苏联官方文件（《莫斯科的黄金》，“图表文件”部分，第17页），Д.В.马尔古利斯是财政人民委员部贵重金属局局长，О.И.卡甘是财政人民委员部外汇管理局局长。

59 比尼亚斯，《内战中的西班牙黄金》，第229—259页。另请参阅比尼亚斯《莫斯科的黄金》，第328、375、377、380和388页。

60 根据我对这次谈话的记录（现存胡佛研究所）。

61 比尼亚斯，《莫斯科的黄金》，第366页。

62 同上，第420页。

63 一九七九年一月号《欧洲研究评论》。

64 马丁内斯·阿穆蒂奥，《挟持民众》，第62页。

65 帕斯库亚发表在一九七〇年六月至七月号《对话记录》上的文章。

66 赫伯特·马修斯在其出版于一九七三年的《半个毁灭的西班牙：对西班牙内战的重新评价》一书中写道：“内格林先生一九五四年告诉我，从苏联购买的货物并没有用光运到苏联的所有黄金，因此苏联欠西班牙一笔钱，必须核算这笔钱，部分是因为苏联人未经许可

- 擅自将价值更高的英国沙弗林金币熔铸成金条，部分是因为西班牙向苏联运送了原材料以部分抵偿购买的货物。”见马修斯《半个毁灭的西班牙》，第171页。（着重体是我加的）关于运到苏联的纺织品和其他工业产品的情况，另请参阅阿瓦德·德·桑蒂连《我们为什么输掉了内战》，第253页。
- 67 马修斯写道：“由于屡屡拖延和不太情愿，最后一批大约价值六千万美元的武器在内战就要结束时获准经过法国运送，但是到达的时间太晚以致根本没有用上，于是又被运回了苏联。为了这批武器应该贷过一笔款。”（马修斯，《轭与箭》，第117页）不过，比尼亚斯提供了一种不同的说法：“一九三九年初，新的物资陆续[从苏联]运抵西班牙。但为时已晚：民族主义者对加泰罗尼亚的攻势推进得很快，以致妨碍了部分物资的发放；另外一部分物资报废或者遭到破坏；还有一部分被佛朗哥的军队所缴获；剩余的物资留在了法国。”（一九七九年一月号《欧洲研究评论》）大约价值六千万美元的这批武器不知是否与同样数额的苏联贷款有关。
- 68 关于传说中的转移机械设备这个问题，见阿瓦德·德·桑蒂连《我们为什么输掉了内战》，第253页和第265页注释1以及胡安·加西亚·奥利韦尔的《脚步的回声》，第526页。我没有找到其他证据。
- 69 有兴趣的读者将在多米尼克·格里索尼和吉勒·埃尔佐格那部具有启发性的著作《航海队》中发现与这个航海公司的组织结构、秘密产权、各种活动有关的大量信息。据两位作者说，该公司成立于一九三七年四月十五日，然后，它在八个月之内拥有了十六艘船只，总吨位达到三十一万吨（《航海队》，第417页）。两位作者断言：“通过把向西班牙共和派运送武器的责任转嫁给一家可靠的外国公司，苏联获益无穷。支持这种做法的第一个理由是实用主义的：从一九三六年秋天起，苏联已经开始向西班牙运送武器，而且在大多数情况下都是用苏联船只运送的。……它们不可避免地将被设在博斯普鲁斯海峡的‘观察哨’发现。任何被认为正在向西班牙共和派运送武器的船只都将成为意大利潜艇的靶子，这些潜艇严密监视着西西里与突尼斯之间狭窄的航道。据估计，在一年的时间里，将近三十艘苏联船只被击沉。对于共和派军队来说，这是一种严重损失，当然，对于苏联来说也是一种相当大的损失。……支持这种做法的第二个理由与骗人的不干涉公约有关。……法国航海公司的船只不像飘扬着红旗的船只那样引人注目，它们可以更顺利地避开海上的危险而且不易引起人们……对苏联人违反不干涉公约行为的注意。”（多米尼克·格里索尼和吉勒·埃尔佐格，《航海队》，第121页）关于攻击苏联船只的更多信息，见东欧基金会苏联课题研究组的《西班牙内战中的苏联船只》，油印丛刊，第59册。
- 70 普列托，《西班牙的动乱》，第二卷，第146—147页。另请参阅普列托《我如何以及为什么离开国防部》，第12—14页。
- 71 安索，《我是内格林的内阁部长》，第328页；阿尔瓦雷斯·德尔巴约，《最后一个乐观主义者》，第284页。
- 72 普列托后来说，直到拉尔戈·卡瓦列罗去世多年之后的一九五四年，当后者的回忆录《我的回忆》出版时，他才得知拉尔戈·卡瓦列罗知道并且同意把黄金运往苏联（普列托，《西班牙的动乱》，第三卷，第221页）。
- 73 普列托，《我如何以及为什么离开国防部》，第15页。不过，马塞利诺·帕斯库亚说，内格林告诉他，普列托在卡塔赫纳是两个人事先商量好的（帕斯库亚发表在一九七〇年六月至七月号《对话记录》上的文章）。
- 74 普列托，《西班牙的动乱》，第二卷，第125页。普列托没有解释他为什么对基地司令的应允表示认可。
- 75 美国参议院司法委员会，《苏联在美国的活动范围》，第3433页。着重体是我加的。另请参阅奥尔洛夫发表在一九六六年十一月号《读者文摘》上的文章。
- 76 阿尔瓦雷斯·德尔巴约，《最后一个乐观主义者》，第284页。

- 77 同上，第283页。着重体是我加的。
- 78 普列托，《西班牙的动乱》，第二卷，第124—125页。
- 79 同上，第131—133页。
- 80 安索，《我是内格林的内阁部长》，第312页。
- 81 尼古拉·库兹涅佐夫的文章，见《在西班牙共和国的旗帜下，1936—1939：苏联志愿参战人员回忆录》，第241—244页。这一证言否定了马塞利诺·帕斯库亚的以下说法：为了不引起敌人的怀疑，决定让四艘苏联商船在没有护航的情况下夜间启航离开卡塔赫纳驶往敖德萨（帕斯库亚发表在一九七〇年六月至七月号《对话记录》上的文章）。
- 82 阿尔瓦雷斯·德尔巴约，《最后一个乐观主义者》，第285页。马塞利诺·帕斯库亚说，内格林一再告诉他，阿萨尼亚始终没有反对把黄金运往苏联（帕斯库亚发表在一九七〇年六月至七月号《对话记录》上的文章）。
- 83 普列托，《西班牙的动乱》，第二卷，第133页。
- 84 帕斯库亚发表在一九七〇年六月至七月号《对话记录》上的文章
- 85 拉尔戈·卡瓦列罗，《我的回忆》，第203—204页。这一段话否定了比尼亚斯下面的说法：拉尔戈·卡瓦列罗指责内格林不与他商量便把黄金运往苏联（见一九七九年八月十二日[马德里]《社会主义者》）。
- 86 比尼亚斯，《内战中的西班牙黄金》，第187页。
- 87 一九七九年八月十二日（马德里）《社会主义者》。
- 88 格里索尼和埃尔佐格，《航海队》，第59和120页。
- 89 美国参议院司法委员会，《苏联在美国的活动范围》，第3431和3433—3434页。
- 90 发表在一九五三年四月二十七日《生活》周刊上的文章。

苏联的影响、政治欺骗和阿萨尼亚总统的困境

除了通过得到黄金确保其在西班牙的政治经济影响力之外，莫斯科还取得了一个同样重要的进展，它大大有利于加强苏联对西班牙政府事务的影响。那就是一九三六年九、十两个月军事顾问和政治代表的到位，在一些部门，即使不是在形式上，实际上他们也在行使着部长的权力。

“随着时间的推移，”内战初期的总参谋部军事行动负责人塞希斯孟多·卡萨多写道，“苏联人在国防部的影响越来越大。[苏联军事顾问]研究总参谋部的作战计划，通过部长，他们拒绝了许多专业建议并且把他们的计划强加于人。”¹他在后面的一段内容中写道：“在空军和坦克部队中，这些‘友军顾问’也在同样行使着权力。”²关于苏联在高层的影响，路易斯·阿拉基斯塔因写道：“苏联人指挥的空军在他们喜欢的时间和地点作战，与陆军和海军之间没有任何配合。海军和空军部长因达莱西奥·普列托逆来顺受，玩世不恭，到他的办公室拜访他的任何人都会受到他的嘲笑，他宣称，他不是部长而且什么都不是，因为空军根本不服从他的命令。真正的空军部长是苏联人道格拉斯将军[雅科夫·斯穆什克维奇]。”³他在后面继续写道：“在[苏联军官]背后的是数不清的政治代表，他们伪装成共产国际的代表并且实际控制着西班牙的政治生活。……他们指挥苏联

军官和西班牙共产党以及[苏联大使]罗森堡本人，后者实际上只是一个幌子大使，真正的大使是那些以化名进入西班牙并且在克里姆林宫和苏联秘密警察的直接指挥下活动的神秘人物。”⁴

苏联的影响不能用苏联仅凭其在西班牙的军人数量就足以胁迫西班牙政府来解释。“我确信，”因达莱西奥·普列托证实，“在我国境内的苏联人总数从来没有超过五百，其中包括飞行员、工业技术人员、军事顾问、海军人员、翻译和秘密特工。”⁵他们大部分是飞行员，像德国和意大利飞行员一样，短时间后即被替换。⁶苏联不可能因其派到西班牙的军人数量而达到强行行使权力的目的。它之所以能够这样做是因为，由于其他大国的态度，它是我们唯一的战争物资供应者，而且，为了达到这一目的，它让西班牙共产党、共产主义者和共产党的同路人渗入其他政治派别，尤其是社会党。”⁷

160

此外，由于在内外政策的重大问题上可以期望得到共和派和社会党温和派代表的支持，共产党人在政府中的地位加强了。代表左翼共和派的何塞·希拉尔在七月十九日组成的政府中出任总理并在拉尔戈·卡瓦列罗政府中担任不管部长，我们应该记得，他在一九三七年三月的一次演说中宣称，他的党派与共产党人的观点几乎完全一致。“我们必须考虑周边国家的态度。”表达社会党温和派领导人普列托的观点的《社会主义者》写道，“我们仍然希望某些民主国家对西班牙形势的看法有所改变，与某种不可抑制的促进革命的欲望可能导致的后果妥协将是令人遗憾的，也许会酿成一场悲剧。”⁸此外，在拉尔戈·卡瓦列罗执政的头几个月，尽管苏联施加压力严重地分化了其追随者，他仍然可以容忍与共产党的关系；因为，无论他私下里如何被激怒，他们之间在很大程度上仍然存在着一致性。实际上，从卡瓦列罗政府组成的那一天起，他就采纳了共产党的意见，要以它的温和给外界留下深刻的印象。他或者内阁中的其他非共产党成员并不关心苏联政策的远大目标。他们只是希望，在表示尊重法律形式之后，担心出现一个依附于德意的西班牙的英法两国将最终解除武器禁运。在上任之后不久进行的一次私人谈话中，拉尔戈·卡瓦列罗表明，必须“放弃革命口号以赢得民主国家的友谊”。⁹他在这个方面没有疏忽。

“西班牙政府不是在为社会主义而战，”他向一个英国下院议员代表团声

明，“它是在为民主和宪法而战。”¹⁰他还在一份向外国新闻界发表的公报中说：“西班牙共和国政府的目的是在西班牙建立一个苏维埃政权，尽管国外有些人这么说。政府的首要目标是保卫议会制共和国，因为它是根据西班牙人民自愿接受的宪法建立的。”¹¹同样具有启发性的是一九三七年二月一日作为总理他向残缺不全的议会发表演说时所使用的克制语气：

“我在接受这个职务时并没有放弃什么东西，我绝对没有放弃自己的政治见解。我向你们和全体国民说明这一点。……但是，鉴于军事叛乱使我们面临的威胁，我认为我有义务暂时把我始终捍卫的思想观念所固有的现实希望放在一边，承担起我的职务必然赋予我的责任。”¹²

161 说明其内阁重视外国舆论的是第一次内阁会议后发表的声明。为了与已经发生的深刻的革命性变化或任何社会改革方案完全划清界限，拉尔戈·卡瓦列罗政府声明：

1. 鉴于内阁的组成，本届政府认为自己直接代表正在前线为保卫民主共和国而战的所有政治力量，叛乱分子用武力反对的正是这个共和国。……

2. 本届政府的计划具有明确的基本目的，通过必要的联合行动协调各界人士的力量，迅速取得镇压叛乱的胜利。……为了达到这个目的，所有其他政治利益都被置于从属地位，意识形态分歧被束之高阁。……

4. 本届政府确认西班牙对所有国家的友好感情并明确表示最忠实地遵守国际联盟盟约，同时希望，仅仅作为回报，其他国家将像我国对待它们那样对待我国。……

6. 本届政府向陆海空三军致以最热情的问候，同时也向正在保卫共和国宪法的民兵致以最热情的问候。它的崇高目标配得上这些英勇的战士，他们改善社会的合法愿望将使他们成为这一目标的坚定捍卫者。¹³

因为必须让外国舆论注意到合法的形式，议会于十月一日根据宪法的规定开会。共产党的喉舌《工人世界报》的负责人写道：

“人民的合法代表，二月十六日根据人民的自由意愿选举产生的议会

议员，今天上午开会。政府根据共和国宪法在议会亮相。

“内战期间，当违背人民的意愿强加于合法共和国的战争正在前线进行时，本届政府得到了议会的正式批准。它由真正的人民代表所组成，迄今为止一直如此。国家元首信任它，今天，它以议会的信任……加强了自己的合法地位。……一边是拥有合法机构的共和国。……另一边是军队的叛国者，法西斯恶棍，西班牙国内外各个阶层的冒险家。文明世界现已可以作出判断；它完全站在我们一边。帮助合法的西班牙政府是国际法规定的一项义务；帮助叛乱者是一种反文明、反人类的罪行。”¹⁴

在议会于十二月举行了另一次会议之后，左翼共和派的喉舌以与共产党人相同的政治术语宣称：

合法性只有一种表现形式。那就是昨天的共和国议会会议所显示的。它也是民主共和国政权的连续性的最有说服力的证明，同时它还有力地证明了这个国家不可动摇的决心，它决不允许其公共生活的合法性在这场血腥的内战所掀起的激情与欲望的风潮中荡然无存。

162

现在，……当世界注视着全体马德里人民和西班牙人民所进行的这一场不同寻常的斗争时，共和国保持着丰富多彩、充满活力的法制生活。考虑到时势危急和国家处于战争状态的特殊情况，它的所有基础机制运转正常。没有什么被废弃。……¹⁵

共和国议会昨天再次举行会议使某些似是而非的论点不攻自破，持有这些论点的人，尤其是西班牙国外的那些人，热衷于对一场捍卫合法权利的人民战争百般责难，在一些具有古老民主传统的国家甚至不必谈论这些权利，因为它们被认为是天经地义的。像其他国家许多年前所经历的一样，西班牙目前正在进行一场巩固共和政体和民主制度的斗争。

要求那些容忍德-意干涉西班牙所犯下的国际罪行的政府正确评价这场斗争的意义过分了吗？面对国内的敌人，在二月大选中获胜的西班牙人民将在几天之内打败野蛮的叛乱者。但是，面对德国和意大利的军事机器，它无章可循，只能开诚布公地诉诸国际舆论。

今天，企图废除西班牙宪法的叛乱爆发四个多月以后，七月十七

日之前世界各国与之保持着热情友好关系的同一个政府——或者更确切地说是那个政府的合法接替者、同一个议会、同一个共和国总统以及同样的公共机构行使着同样权力，履行着同样的职责。这不意味着什么吗？要不然就是，面对以这些机构为目标的不可容忍的侵略行为，这个世界无动于衷？¹⁶

内战结束以后，流亡中的共产党人、共和派人士和社会党人仍然希望对国际舆论施加有利于西班牙共和派事业的影响，他们竭尽全力掩盖一九三六年革命的深度。实际上，一些人甚至坚称，内战期间共和国宪法没有遭到破坏。例如，前西班牙驻伦敦大使、内格林的热情支持者巴勃罗·德·阿斯卡拉特断言：“从一九三六年七月十六日到[内格林政府被左派组织联合推翻的]一九三九年三月五日，在共和国合法政府控制的所有地区，宪法是法律，事实上存在而且有效，在叛军控制区，它只是法律。”¹⁷毫无疑问，正是这种政治歪曲和欺骗使萨尔瓦多·德·马达里亚加变成了尖锐的批评家。内战之前马达里亚加是阿斯卡拉特的朋友及其在国际联盟的同事，对后者的“能力、正直和知识分子的纯洁性”赞赏有加。当阿斯卡拉特抛出上面的谬论时，我们可以再次引用马达里亚加的那句话，他“背离了寻求真理的严谨路线，堕落成为共产主义的知识分子走狗”。¹⁸

163

为了保证西方民主国家继续承认西班牙政府是合法政府，共和国总统曼努埃尔·阿萨尼亚留在他的职位上批准政府的法令、履行宪法规定的各种职能至关重要。能否说服他无限期地这样做下去非常令人怀疑，不仅因为他对革命以及随之出现的暴力行为的敌意众所周知，而且因为他相信注定要输掉这场战争。在战后所写的一封信中，他坦率承认了自己的悲观情绪：“大家知道，从一九三六年九月起，我竭力对政策施加有利于折中解决的影响，因为打败敌人是一种幻想。”¹⁹一九三七年夏天，著名的共和派知识分子、阿萨尼亚左翼共和派的保守派成员克劳迪奥·桑切斯-阿尔沃诺斯记录了下面这段与总统的谈话：“‘战争注定要失败，彻底失败，’阿萨尼亚说，‘但是，如果战争奇迹般地获胜了，只要还有可能，我们共和派[即共和派各个政党的成员]将不得不登上第一艘船离开西班牙。’我对他的说法表示同意，然后接着说：‘如果您认为……战争注定要失败而

且共和派难逃悲惨的命运，那您为什么不谋求和解?’ ‘因为我不能谋求和解。’他立即答道。我从他眼中不难看出，他的无能为力让他感到极度痛苦。”²⁰

正是因为坚信战争注定失败，一九三六年十月九日，政府由于敌军进攻首都的威胁迁到巴伦西亚的三周前，阿萨尼亚决定转移到巴塞罗那。有人担心，他可能从那里越过边境进入法国，然后在法国辞去总统职务。

“与总统一同商定的是，”拉尔戈·卡瓦列罗回忆说，“我们大家全部迁往巴伦西亚。……第一个离开的是阿萨尼亚先生，他没有像商定的那样待在巴伦西亚，而是去了巴塞罗那。这是为了更靠近边境。他没有与我们商量，也没有跟谁说一声。”²¹

这一指责也许并不十分公平。阿萨尼亚的多年知己何塞菲娜·卡拉维阿斯写道：“有人说，当总统通知他们无论他们是否同意他打算当天下午离开马德里时，一些部长提出了强烈抗议。‘这肯定是违反宪法的。’一名部长告诉他，‘显然，打开监狱并向犯人发放枪支都要更符合[阿萨尼亚依赖的]宪法。此外，我们今天要做的事情恰恰是你几天之后将会去做的事情。’”卡拉维阿斯否认了下述指控：如果不是伊比利亚无政府主义者联盟警觉，阿萨尼亚已经从巴塞罗那逃走了。“毫无疑问，他多次想到辞职，而且有几次决定这样做，但他从来没有想过逃跑。……他认为，留在自己的岗位上是他的责任，尤其是因为他知道，在另一边，只是由于被指控为他的朋友或支持者，许多人进了监狱或者已经被处决。”²²

尽管阿萨尼亚确实没有辞去总统职务，但是，这是由于共和派对他施加了压力，特别是因达莱西奥·普列托，他们两人始终保持着密切的联系。一九三八年四月阿萨尼亚曾经通知普列托，由于无法按照自己的愿望解决政府危机，他打算辞职。关于这件事，普列托在内战结束以后把他的回答记录如下：“你不能辞职……[因为]你的辞职将给一切带来消极影响，而且因为你是共和国的化身，在一定程度上受到那些没有与佛朗哥结盟的国家的尊重。由于这种尊重，我们仍然能够存在，你一旦辞职，这种尊重将荡然无存。”²³人们应当记得，在阿萨尼亚听说黄金运往苏联的消息后，普列托曾用同样的论点劝他不要辞职。

弗兰克·塞德威克在他为这位总统所写的传记中记述道，一九三六年

十月，当阿萨尼亚离开马德里时，新闻界报道说，他打算巡视东部和加泰罗尼亚前线。“许多文章说他不是去视察前线，还有人说他‘胆怯地’逃离了马德里，尽管当时共和派方面几乎没有人认为可以守住马德里。”²⁴所有的一切似乎都在土崩瓦解，不出三个星期，残缺的政府便步了阿萨尼亚的后尘。原来的外交使团几乎无人留下；许多共和国的缔造者和知识分子，例如[格雷戈里奥·]马拉尼翁、[拉蒙·]佩雷斯·德·阿亚拉、[何塞·]奥尔特加-加塞特和马达里亚加，不是已经离开西班牙，就是即将退出历史舞台。……离开马德里之后，阿萨尼亚去了巴塞罗那。他的敌人说，他选择巴塞罗那为的是能够靠近法国边境，以防共和派的军事溃败；他的朋友说，他在那里居留为的是以他的存在帮助控制加泰罗尼亚。²⁵

但是，几乎没有人对总统职位的权威或者总统在无政府工团主义者控制的加泰罗尼亚地区制止革命的能力或愿望抱有幻想，尤其是阿萨尼亚本人。“从内战爆发开始，”《阿萨尼亚文集》的编辑者胡安·马里查尔证实，“他发现他可能起到的作用非常有限，其中之一是对革命暴力的象征性制约。”²⁶

像共和派人士和普列托一样，阿萨尼亚的悲观情绪及其随时可能辞去总统职务的危险让共产党人及其盟友大伤脑筋。“我们收到的关于阿萨尼亚先生态度的报告……让人放心不下。”阿尔瓦雷斯·德尔巴约证实，“我们担心他天生的悲观情绪因与世隔绝而加剧，这可能导致他做出某种无法改变的决定。”²⁷

据阿萨尼亚的批评者说，真实的恐惧也像悲观情绪一样影响着他的战时行为。拉尔戈·卡瓦列罗回忆说，在马德里，每当他有公事去与阿萨尼亚商量时，总统总是问他政府打算何时离开。“一直等到没有退路的最后时刻吗？我提醒你，我可不想被人用一根绳子套在脖子上拖着游街。”²⁸

“真正困扰他的是担心自己可能落入法西斯分子之手，”共产党人空军司令伊格纳西奥·伊达尔戈·德·西斯内罗斯写道。²⁹保守共和派领导人米格尔·毛拉曾在一九三一年的最初两届共和国政府中担任内政部长，内战期间置身事外，他在证明阿萨尼亚具有“过人的智慧和威严的气质”的同时确认了这种担心。“[他]备受肉体恐惧的压倒性折磨。……这种恐惧比他更强大，以致他没有想到要掩饰它。”³⁰

另一方面，阿萨尼亚的私人朋友和姻兄弟西普里亚诺·里瓦斯-切里弗描绘了一个更为勇敢的人物，³¹与前议会议员、阿萨尼亚的左翼共和派成员马里亚诺·安索描绘的一样。“渐渐地，”安索写道，“关于他胆小如鼠的骗人鬼话暗中滋生出来……还有一些自称是他朋友的人推波助澜。……[内战之前]我与他共同面对过无数威胁，但我从没有看见他失去自制或尊严。……在警卫室和圣器室，在贵族和银行界的高层会议上，他们想要他的脑袋。对于许多人来说，只有消灭他的肉体才能恢复他们想要的局面。”³²

无论阿萨尼亚的内心是否坚强，辞职的想法肯定一直压在他的心头。正如克劳迪奥·桑切斯-阿尔沃诺斯所指出的那样，阿萨尼亚是一名资产阶级自由主义者，在第三共和国时期的法国，他可以成为一位杰出的政府首脑，但是，“一九三六年七月十八日以后”，他“成为一个政治力量——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共产主义——集团的囚徒，在这个集团中，共和派——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自由主义者——一钱不值。在伴随军事叛乱出现的社会动荡中，他被迫目睹使共和国沾上鲜血的暴力行为。人们不必太了解他也能理解……他为无力制止暴力行为而忍受的痛苦。……有人在马德里模范监狱犯下罪行之后他曾说过一句名言：‘我不想担任一个杀手共和国的总统。’这句名言使他受到人们的尊重，因为在敌对阵营，没有人谴责类似的罪行。”³³

里瓦斯-切里弗注意到姻兄弟的极度痛苦，他证实，安赫尔·奥索里奥-加利亚多设法劝阻了阿萨尼亚辞职。³⁴塞德威克写道，一九三六年夏天以及随后一段时间，在另外一些重要场合，一方面是因达莱西奥·普列托和真诚的温和派人士坚决要求阿萨尼亚将他本人和他的职务视为共和国必要的对外象征，另一方面则是那些按照莫斯科的旨意行事的人必须维持一种民主西班牙的假象。“于是，不管有意还是无意，阿萨尼亚成为双方必不可少的傀儡。这位敏感严谨的知识分子是一个以笔作枪的勇士、纸上谈兵的专家、典型的宪政主义者，他决不想在一场实际战争中，尤其是一场其结果可能预示他在西班牙实现民主的抱负希望渺茫的内战中扮演任何角色。不过，他继续留在他的职位上。”³⁵

克里姆林宫对阿萨尼亚总统和许多共和派领导人的悲观情绪心知肚

明。一九三六年十二月二十一日，斯大林给拉尔戈·卡瓦列罗写了一封信，在信上署名的还有人民委员会主席维亚切斯拉夫·莫洛托夫和国防人民委员克利门特·伏罗希洛夫。这封信显示斯大林非常重视外交手段的作用，他在信中向卡瓦列罗提出以下建议：“西班牙革命走的是它自己的道路，在许多方面与俄国所走的道路不同。这是由不同的社会、历史和地理条件决定的，而且还要根据国际形势的需要。……在西班牙，议会道路可能被证明是一种比在俄国更有效地推动革命发展的手段。……千万不要排斥共和派领导人，而是相反，务必把他们吸引过来使他们的关系更加密切。首先必须保证政府得到阿萨尼亚及其派别的支持，尽可能帮助他们克服他们的动摇犹豫。为了防止西班牙的敌人说它是一个共产主义共和国从而阻止他们以此为公开干涉，这是非做不可的，外国公开干涉构成了对西班牙共和国的最大威胁。”

这封信还包括其他建议：（1）“在一个像西班牙这样的农业国家里，农民非常重要，必须重视他们。可以颁布关于农业问题和税务问题的法令，这些问题事关前线农民的利益。”（2）“有必要把城镇中小资产阶级吸引到政府一边来，无论如何也要通过保护他们的财产不被没收以及最大限度地保证他们的贸易自由为他们提供采取有利于政府的中立立场的机会；否则的话，这些群体就会投靠法西斯主义。”³⁶

“这份文件是一个无可辩驳的证据，”前共产党人阿马罗·德尔·罗萨尔写道，“证明了三位共产党领导人，真正的社会主义者，向另一位在工人阶级革命运动中享有国际政治声誉的社会主义者表达的对西班牙人民的爱。”³⁷我们已经知道，内战爆发之后不久，罗萨尔就背弃了拉尔戈·卡瓦列罗。

在一九三七年一月十二日的回信中，拉尔戈·卡瓦列罗写道：“你们正确地指出了俄国革命与我国革命发展过程中明显存在的不同之处。的确，正如你们自己指出的那样，两国的各种条件不同。……但是，作为对你们[关于议会道路]的说的答复，应当指出的是，无论将来保留议会制度与否，我们当中没有热心的支持者，甚至共和派当中也没有。……我完全同意你们关于共和派政党的说法。我们总是想方设法让他们参与政府的工作和战争行动。他们很大程度地参与了地方、省级和国家各级政府机构的

工作。目前出现的情况是，他们正在千方百计地努力维护他们各自的政治特性。”³⁸

不过，那些情绪低落、无能为力的共和派领导人在为革命裹上一层温和的外衣方面起到了某种有效的作用。就连众所周知与世隔绝、悲观失望的阿萨尼亚总统也在沉默了六个月之后决定公开支持官方关于内战的说法。针对国外民主人士的观点，官方说法否认这场内战是一场阶级斗争，而是把它解释成为一场全体西班牙人民为了民族独立反对外国入侵者及其西班牙卖国贼帮凶的斗争。阐明了官方说法的道理之后，阿萨尼亚宣称，共和国正在战斗，他没有提到践踏一九三一年宪法的广泛的社会、经济和政治动乱。他也只字不提在左派阵营内部进行的将会决定未来革命走向的意识形态和政治派别斗争。“[我们]大家都在战斗，”他宣称，“工人和知识分子，教师和资产阶级——是的，正在战斗的也有资产阶级成员，工会和政党以及所有团结在共和国旗帜下的西班牙人，我们大家都在为西班牙的独立以及西班牙人民和国家的自由而战。”³⁹

167

注释：

- 1 塞希斯孟多·卡萨多上校，《马德里最后的日子》，第52页。
- 2 同上，第54页。
- 3 路易斯·阿拉基斯塔因，《共产主义与西班牙内战》，第24—25页。
- 4 同上，第26页。
- 5 路易斯·费希尔一九四一年写道，“在西班牙的苏联人从来没有超过七百”（路易斯·费希尔，《人与政治》，第498页）。这个数字大致得到了一九七三年的一份苏联文献资料的确认。这份苏联文献资料声称：“人们在西方的文学作品中看到了被离奇地夸大的在西班牙参与军事行动的苏联人的人数。事实上，整个内战期间，只有两千多一点苏联志愿者在西班牙为共和派战斗和工作，其中包括七百七十二名飞行员、三百五十一名坦克手、二百二十二名军事顾问和教官、七十七名海军专家、一百名炮兵专家、五十二名其他专家、一百三十名制造飞机的工人和工程师、一百五十六名无线电话务员和其他信号设备人员以及二百零四名翻译。更重要的是，同时出现在西班牙的苏联人从未超过六百至八百。”（苏联科学院，《与西班牙共和国的国际合作，1936—1939》，第328—329页，着重体是我加的）不过，一九七八年苏联军事百科全书提供了一个“大约三千名苏联志愿者”的数字（《苏联军事百科全书》，第五卷，第550页）。根据公开发表的文献资料汇集的一份参加西班牙内战的三百多名苏联人——既有平民也有军人——的名单，见何塞·路易斯·阿尔科法尔·纳塞斯《西班牙内战中的苏联顾问》，第153—162页。

- 6 西班牙空军司令伊格纳西奥·伊达尔戈·德·西斯内罗斯一九四〇年接受我的采访时说，苏联飞行员没几个月就轮换一次，因此，内战期间总共上千名苏联飞行员在西班牙驾驶过飞机（这次采访的速记记录现存胡佛研究所）。据希特勒的空军司令赫尔曼·戈林说，为了积累飞行经验，德国飞行员也经常轮换。
- 7 因达莱西奥·普列托，《我如何以及为什么离开国防部》（法文版序言），第24—25页。
- 8 一九三六年十月四日《社会主义者》。
- 9 被（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领导人）胡利安·戈金引用，见一九三九年五月三十一日《工人时代》。另请参阅戈金一九四六年七月七日写给我的信（现存胡佛研究所）。
- 10 摘自拉尔戈·卡瓦列罗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四日发表的声明，这份声明是那个英国代表团亲手交给我的，当时我是合众社派到巴伦西亚的记者，因此，外国新闻检查官允许我向合众社驻伦敦办事处传送这份声明。这段话没有在我查阅过的任何报纸上刊登（见参考文献：伯内特，博洛滕，《从巴伦西亚发给合众社的报道，没有公开发表的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四日拉尔戈·卡瓦列罗对英国下院议员代表团的声明的摘要》）。
- 11 实例见一九三六年十一月二十五日《曼彻斯特卫报》。不出人们的意料，同一天的《真理报》在显著位置刊登了这条新闻。另请参阅拉尔戈·卡瓦列罗向阿索尔公爵夫人以及另外一些女议员发表的声明，载一九三七年四月二十二日《光明报》。
- 12 《内阁总理弗朗西斯科·拉尔戈·卡瓦列罗一九三七年二月一日的演说》，第9页，引自卡洛斯·M.拉马《二十世纪的西班牙危机》，第260页。
- 13 一九三六年九月五日《政治报》。着重体是我加的。
- 14 一九三六年十月一日《工人世界报》。
- 15 左翼共和派不是唯一一个试图掩盖左派控制区在经济、社会和政治生活方面所发生的变化自由主义党派。实例见共和国副总统、共和联盟领导人迭戈·马丁内斯·巴里奥向全世界发表的广播演说，载一九三六年八月二日《政治报》。
- 16 一九三六年十二月二日《政治报》。着重体是我加的。
- 17 巴勃罗·德·阿斯卡拉特发表在一九四三年一月号《左派新闻》上的文章。
- 18 萨尔瓦多·德·马达里亚加，《与我同时代的西班牙人》，第407—414页。
- 19 《阿萨尼亚文集》，第三卷，第558页。在写给罗伯特·A.弗里德兰德的一封信中，与阿萨尼亚关系非常密切的普列托证实，从内战爆发的第一个月起，总统就“预见到了共和派的失败”（一九六五年十一月号《历史学家》）。另请参阅何塞菲娜·卡拉维加斯（阿萨尼亚的密友）的《阿萨尼亚：被称为曼努埃尔先生的那个人》，第245—246页。
- 20 克劳迪奥·桑切斯-阿尔沃诺斯，《政治轶事》，第228—229页。
- 21 拉尔戈·卡瓦列罗，《我的回忆：致一位朋友的信》，第187页。在其没有发表的回忆录《关于西班牙内战的历史记录》中，拉尔戈·卡瓦列罗声称，他与阿萨尼亚商定，总统将把他的官邸安置在巴伦西亚，见第482页。“在前往巴伦西亚途中，”卡瓦列罗接着说，“没有与任何人商量，共和国总统决定去巴塞罗那。我仍然不知道他为什么做出这个决定。”另一方面，阿萨尼亚声称，他与内阁一致同意转移到巴塞罗那，而且他是希望第二天在巴塞罗那找到内阁的部长们才离开马德里的。“他们推迟了离开的时间而且没有告诉我商定的变化，他们后来把自己安置在了巴伦西亚。我在巴塞罗那待了七个月，我相信，我在那里是有用的。”（《阿萨尼亚文集》，第四卷，第817—818页）据阿萨尼亚派的不管部长何塞·希拉尔（一九三九年十一月接受我的采访时）说，巴塞罗那只是几个政府可能的落脚点之一。十月中旬，五名部长离开马德里考察可供选择的城市：阿利坎特，卡塔赫纳，巴塞罗那和巴伦西亚。希拉尔告诉我：“卡瓦列罗想去巴塞罗那。起初决定政府将于十月十五日迁往巴塞罗那。这就是普列托为什么要去那里察看情况，[但是]巴塞罗那自治政府可能表示了反对意见。由于这个原因，政府不去那里了。”（采访速记记录的打字副本现存胡佛研究所）直到十一月初才作出了（迁往巴伦西亚的）最终决定。在此期间，

阿萨尼亚于十月十九日离开马德里，也许如其姻兄弟所说，他认为卡瓦列罗决定将政府迁往巴塞罗那（西普里亚诺·里瓦斯-切里弗，《不为人知的肖像：曼努埃尔·阿萨尼亚的人生》，第271页）。

- 22 卡拉维阿斯，《阿萨尼亚》，第243页。
- 23 因达莱西奥·普列托，《风中话语》，第140页。
- 24 读者应当记得阿萨尼亚对离开西班牙的大批“著名甚至地位显赫的共和派人士”的指责，他还声称，他把他们从无名小卒提拔起来，使他们成为“议员、部长、大使、副部长，等等，等等”。决定离开西班牙的阿萨尼亚派著名人士之一是曾任希拉尔政府外交部长的奥古斯托·巴尔西亚（见马里亚诺·安索《我是内格林的内阁部长》，第158页）。至于那些共和派议员，特蕾莎·帕米埃斯在一九七五年写道：“今天[翻阅]《西班牙议会记事》，我们可以查证一九三六年二月十六日当选之议员的缺席和背叛。除了右派议员的正常缺席之外，肯定还有消极、胆怯、失去信心和受到伤害的共和派议员缺席。在共和国议会被迫离开马德里迁往巴伦西亚之后，它不再反映[当初]构成它的那些政治力量的意愿。”（特蕾莎·帕米埃斯，《一个名叫多洛蕾丝·伊巴露丽的西班牙人》，第81—82页）另外，阿萨尼亚的私人朋友和姻兄弟西普里亚诺·里瓦斯-切里弗证明：“共和派中途抛弃阿萨尼亚以及与他同在的共和国使[阿萨尼亚]伤心之至，这也大大增强了叛乱者用以证明其反叛正当的那个论点的合理性，即，政府无力对抗蛊惑人心的无政府主义革命。叛乱者声称，由于这个政权，这种革命已经发生，他们起义针对的正是这个政权的合法性。”（里瓦斯-切里弗，《不为人知的肖像》，第226—227页）
- 25 弗兰克·塞德威克，《曼努埃尔·阿萨尼亚的悲剧与西班牙共和国的命运》，第174—175页。关于离开西班牙的某些著名知识分子的更多信息，见里卡多·德拉·谢尔瓦《西班牙现代通史，1800—1974》，第428页。
- 26 《阿萨尼亚文集》，第三卷，第xxxiii页。
- 27 胡利奥·阿尔瓦雷斯·德尔巴约，《自由之战》，第214页。
- 28 拉尔戈·卡瓦列罗，《我的回忆》，第187页。
- 29 伊格纳西奥·伊达尔戈·德·西斯内罗斯，《回忆录二：共和国与西班牙内战》，第457页。
- 30 米格尔·毛拉，《阿方索十三世是这样垮台的》，第167页；另见第230页。与阿萨尼亚的担心有关的更多信息，见埃内斯特·乌迪纳《何塞·塔拉德利亚斯：忠诚的冒险》，第210—211页。
- 31 里瓦斯-切里弗，《不为人知的肖像》，第161—162页。
- 32 安索，《我是内格林的内阁部长》，第154—155页。
- 33 桑切斯-阿尔沃诺斯，《政治轶事》，第226—227页。
- 34 奥索里奥准确的说法（根据里瓦斯-切里弗《不为人知的肖像》，第261页）是：“他甚至跟我谈到了辞职。我对他说了我必须对他说的话。”
- 35 塞德威克，《曼努埃尔·阿萨尼亚的悲剧与西班牙共和国的命运》，第169页。
- 36 这封信的法语——外交语言——全文见萨尔瓦多·德·马达里亚加《西班牙现代史》，第672—674页。不过，最初它是以英语发表的，内战结束不久，与首尾两页复印件一起出现在一九三九年六月四日《纽约时报》刊登的一篇路易斯·阿拉基斯塔因的文章里。这封信的俄语原文与西班牙语译文一起被收入西班牙共产党的官方内战史《西班牙内战与革命，1936—1939》，第二卷，第100—102页。着重体是我加的。
- 37 阿马罗·德尔·罗萨尔，《西班牙劳动者总工会史，1901—1939》，第629页。
- 38 这封信（法语）的影印件，见《西班牙内战与革命》，第二卷，第102与103页之间。
- 39 见曼努埃尔·阿萨尼亚的《西班牙内战》，第33页。演说发表于一九三七年一月二十一日。

错综复杂的东西方外交斗争中的西班牙

斯大林肯定看到了继续承认西班牙政府为合法政权的巨大好处。他知道，只要英法两国承认它是合法政权，那就不仅可以将德意两国干涉的问题提交国际联盟审议，而且可以要求按照普遍接受的国际法准则，在发生反对合法政府的叛乱的情况下，允许合法政府在国际市场上自由购买武器。此外他还知道，如果英法两国打算放弃其中立政策的话，希特勒一九二五年在《我的奋斗》中所预言的德国在中欧和东欧的野心——“[我们]把目光瞄准东方的国家[并且]主要考虑俄国以及附庸于它的那些邻国”——有可能暂时受到遏制从而推迟对苏联的可怕进攻。一九三六年十一月三日，英国外交大臣安东尼·艾登与苏联驻伦敦大使伊万·迈斯基举行了一次会谈，会谈之后，艾登写信告诉英国驻莫斯科大使奇尔斯顿子爵，苏联政府确信，如果佛朗哥将军获胜的话，“德国和意大利受到的鼓励将使发动下一次侵略的日子更加逼近——这一次也许是侵犯中欧或东欧。那是苏联不惜一切代价希望避免出现的事态，这就是苏联希望西班牙政府赢得这场内战的主要原因”。¹

此外，这种认识肯定已经进入斯大林的战略考虑：由于德意两国的干涉，西班牙内战对法国的南部边境和英法两国在地中海的利益形成了某种

潜在的威胁，因此，它可能发展成为一场大规模的西欧战争，在交战双方打到各自的元气耗尽之前，他实际上可以袖手旁观，结果，苏联将因这场战争脱颖而出成为欧洲大陆的霸主。

一九二五年斯大林已经阐明了他在一场全面战争肆虐欧洲时的战略。他在苏共中央委员会的一次全体会议上发表讲话时宣称：“如果战争爆发的话，我们不应袖手旁观。我们必须参战，但是，我们应当最后一个参战。我们参战为的是对战局施加决定性影响，决定战争结果的影响。”² 一九四七年，这篇讲话首次对外公布。

据三十年代德国驻莫斯科大使馆参赞古斯塔夫·希尔格说：“克里姆林宫一直坚信，资本主义列强之间总有一天会爆发战争。如果苏联能够置身于这样一场战争之外，它就可以期待坐收巨大的渔人之利，因为资本主义列强的实力将因战争而削弱，力量的平衡将发生有利于苏俄的变化。……此外，在斯大林看来，与希特勒缔结一项互不侵犯条约意味着排除了德国进攻苏联的危险。从一九三三年[希特勒上台]以来，这种危险像噩梦一般困扰着苏联政府和民众。……因此，他希望得到宝贵的时间加速推进苏联的军备计划。同时他将关注形势的进一步发展。在某个适当的时候，在交战各国元气大伤以后，他就可以利用苏联的力量影响世界政治的格局。”³英国著名历史学家、皇家国际事务学会研究室主任阿诺德·J.汤因比在《一九三六年国际事务概览》一书中写道：“如果迟早将与德国发生另一场战争，它显然是为了苏联的利益，因为战争将由一场争端引发，在这场争端中，西方列强根本不考虑可能将苏联首先推进战争的问题。”

一九一八至一九二〇年——只是西班牙内战爆发十六年前——外国对这个新生苏维埃国家的干涉和共产国际暗中破坏资产阶级社会的不懈努力已经在两种社会制度之间形成了一条鸿沟，几年后的外交承认并没有在这条鸿沟上架起桥梁。“自从一九一七年十月革命以来，”杰出的英国历史学家约翰·W.惠勒-贝内特爵士写道，“布尔什维克对西方世界充满了畏惧和怀疑。列宁和斯大林都非常清楚，他们以自己的行动和政策向世界上的其他国家发动了一场意识形态战争；这是一场永恒的战争；尽管可能出现长时间休战，但是，在一方或者另一方被彻底打败之前，这是一场不可能结束的战争。”⁴

几乎毋庸赘言的是，在英法两国政府要人的圈子里，对苏联存在着根深蒂固的不信任感，因为他们没有纯粹将其视为当前的一种军事威胁，而是将其视为一种新的、不断变化的意识形态的源头，一旦与德国发生战争，这种意识形态将会蔓延到整个欧洲，而且它只会受益于一场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消耗战。一九三七至一九四〇年担任英国首相的内维尔·张伯伦怀疑，这些“极端分子”——这里用的是他的原话——“最想看到的是‘资本主义’国家相互厮杀两败俱伤，而他们则袖手旁观坐收渔利”。⁵

张伯伦的首席外交政策顾问霍勒斯·威尔逊爵士一九三八年八月二十三日对德国驻伦敦大使馆代办特奥多尔·科尔特所作的下面这一段陈述意味深长，它无疑反映了首相的看法：“英国和德国实际上是运行最为有序、管理最为完善的两个国家，两国均建立在国家原则的基础上……那是人类关系唯一有效的原则。与此背道而驰的布尔什维主义意味着无政府状态和野蛮。如果这两个优秀的白人种族在战争中相互灭绝的话，那将是愚蠢至极的。由此获益的只能是布尔什维主义。”⁶

由一九三六年三月希特勒重新军事占领莱茵兰首先在西欧造成的战争恐慌因当年七月西班牙内战的爆发加剧了。美国大使威廉·布利特认为：“在下一场战争中只有苏联肯定会得到好处，它将以一场‘全面革命’以及‘斯大林和同志们’的最终胜利而结束。”⁷十一月二十五日，他向美国国务院报告说：“[当时以社会党领导人莱昂·布鲁姆为首的]法国政府确信，苏联政府理论上希望把西班牙内战进行到底，因为，尽管苏联政府首先将因马德里政府和巴塞罗那政府[即中央政府和加泰罗尼亚地区半自治政府]被支持佛朗哥叛军的意大利和德国军队推翻而遭受挫折，但是，这将使德国企图在西属摩洛哥确立某种新的地位，同时使意大利企图继续占有巴利阿里群岛，进而导致以德国和意大利为一方、以法国和英国为另一方的战争。苏联政府的这一预谋最终可能将使整个欧洲布尔什维克化。”⁸

西班牙内战爆发七个月后，英国帝国国防委员会下设的参谋长委员会在一九三七年二月二十二日的一份秘密报告中表示了类似的怀疑。这份报告没有特别提到西班牙内战，它断言，“苏联政府根本不会反对在欧洲资本主义国家之间进行的一场战争，只要苏联不受牵连”，因为，“在某些条件下，它可以期望这样一场战争为在欧洲普遍建立共产主义制度提供机

会”，所以，没有理由认为它已放弃“世界革命的最后希望”。⁹

对一场被认为只有苏联将从中受益的欧洲全面战争的恐惧在西班牙内战期间不断加剧，并在捷克斯洛伐克危机中达到顶峰。在一九三八年九月十七日举行的一次英国内阁会议上，张伯伦的国防协调大臣托马斯·英斯基普爵士发言说，在进行一场可能消灭希特勒的战争的同时，“几乎可以肯定将毁掉大量别的东西。结果可能是欧洲的状况发生了变化，除了莫斯科和布尔什维克之外，没人愿意看到这种结果”。¹⁰在同一次会议上，印度事务大臣泽特兰勋爵谈到了“一场世界大战可能产生的可怕后果。它将导致现存世界秩序的崩溃和某种状况的出现，这种状况接近于控制着苏联命运的那些人的最终目标”。¹¹一九三七年三月十七日，英国外交部常务副大臣亚历山大·卡多根爵士写道：“苏联人[倡导集体安全]的目的是在欧洲制造混乱促成战争：他们不用亲自参与；他们希望结果将导致世界革命（而这非常有可能）。”¹²

171

另外，在一九三八年五月二十三日发给英国驻德国大使内维尔·亨德森爵士的一封电报中，当时的英国外交大臣哈利法克斯勋爵要求大使“以你能采取的最认真的态度”警告德国外长冯·里宾特洛甫，如果由于任何轻举妄动引发了一场欧洲战火，“只有那些希望看到欧洲文明毁灭的人将从这场灾难中获益”。¹³

这种不安并不仅限于政界。据德国驻伦敦大使馆武官盖尔·冯·施韦彭布尔格将军男爵说，陆军部的约翰·迪尔爵士和英军总参谋部的一些与他具有同样想法的成员确信，大英帝国与德国之间的下一场战争不仅对于大英帝国，而且对于整个欧洲都将会是一场悲剧。“他们非常清楚地意识到，这样一场战争只会有利于苏联的阴谋，因此，与他们的许多同胞相比，他们对这场战争表现出更多的忧虑。”¹⁴

尽管这些忧虑与一九三八年九月的捷克危机直接有关，但是，毫无疑问，它们在西班牙内战期间同样困扰着英国政府，并且成为不干涉政策以及英国决定不与德国在西班牙发生军事冲突的根本原因。在本书作者看来，它们也是英国政府在中欧和东欧采取亲德政策的根本原因，这种政策很快将以绥靖主义而著称。根据二战之后所公布的一系列与德国驻巴黎大使冯·韦尔切克伯爵的私人谈话记录，由温和的法国激进社会党人组成的

爱德华·达拉第政府私下里显然怀有同样不祥的预感。一九三八年五月，慕尼黑协定签订之前五个月，外交部长乔治·博内对这位德国大使说，“任何解决方案”都比战争要好，因为“一旦发生战争，整个欧洲将遭到毁灭，无论是胜利者还是失败者都将成为世界共产主义的受害者”。¹⁵司法部长保罗·雷诺同样直言不讳。他对韦尔切克说，战争对于欧洲将是一场万劫不复的灾难，“只有遥远的已被共产主义统治的俄国除外”，因此，“必须尽一切努力防止古老文明世界的毁灭”。¹⁶至于总理达拉第，他用启示录式的语言向德国大使表达了自己的担忧：“一场现代战争所造成的可怕的灾难性后果将为人类前所未见，那将意味着欧洲文明的彻底毁灭。一上战场，赤裸裸的破坏者——哥萨克和蒙古人——就会源源不断地大批涌现，给欧洲带来一种新的‘文明’。必须防止这种事情发生，即使需要付出巨大的代价也在所不惜。”¹⁷另外，在几个月后与德国代办布罗伊尔进行的一次谈话中，达拉第“特别强调了一场欧洲战争的可怕的灾难性后果”。他还说：“在欧洲大陆衰弱之后，苏联不会让发动世界革命的机会溜走。”¹⁸

德国人不失时机地助长法国领导人的这种担忧。“在德国和法国耗尽了国力之后，”德国驻巴黎大使馆武官屈伦塔尔将军对法军总参谋长甘末林将军说，“等待时机的苏联就会介入，那将意味着世界革命。”¹⁹即使只是因为与苏联签订的互助条约，出于明显的外交考虑，法国领导人从来没有公开表示过他们的担忧，不过，像蒂埃里·莫尼耶那样的右派作家，公开表示过这种担忧。我们已经看到，莫尼耶坚持认为，“德国的战败将意味着形成了防止共产主义革命蔓延的主要屏障的那些独裁政权的垮台，这可能导致欧洲立即布尔什维克化”。他接着说，令人遗憾的是，“在法国，由于不能公开发表与此有关的任何看法，所以，具有这种看法的人士和党派通常也不承认它”。

如果不考虑“一场全面的欧洲战争只会对苏联有利”这种担忧，对英国和法国的外交所作出的任何评价都会存在缺陷，然而，英国关于这一时期的历史研究状况正是如此愚蠢混乱，所以，只有极个别公认的权威触及到了这个问题，而且仅仅触及表面。但是，必须把约翰·W.惠勒-贝内特爵士当作一个例外对待。他的经典著作《慕尼黑：悲剧的序幕》中包括下面

这一段直言不讳的内容：“在英国保守党和法国保守派人士中，存在着一种根深蒂固的信念，那就是苏联希望促成一场欧洲战争，它将对战争袖手旁观，而战争将导致资本主义制度的毁灭或崩溃。莫斯科将在资产阶级-资本主义的瓦砾废墟上建立某种无产阶级专政，即使与[德国的]国家社会主义独裁政权有所不同，这种专政也不会更好，甚至可能更加糟糕。……[于是]产生了这样的希望，只要能把德国的扩张引向东方，它就不再威胁西方文明，苏联人的阴谋也可能使他们自食其果。在一场两败俱伤的战争中，德国的人侵行动迟早要把它的兵力耗尽在俄国的干草原上，多年无法卷土重来。”²⁰

支持温斯顿·丘吉尔的国民工党下院议员哈罗德·尼科尔森爵士是一位职业外交官和著名作家，我们从他的日记和书信中发现了一些极具启发性的内容，有助于我们深入了解困扰着当时许多政治家的恐惧和担忧，这种恐惧和担忧决定了英国的对德政策，后来又决定了英国对西班牙内战的政策。一九三六年三月七日，德军进占莱茵兰，只要英法两国不怕打仗，它们就能采取联合行动成功地制止这一违反凡尔赛和约和洛迦诺公约的行为。在此前不久所写的日记中，尼科尔森道破了英法两国不愿干预的要害：“我们当然应该战而胜之并攻进柏林。但是，这有什么好处呢？这只会使德国和法国产生共产主义制度，这也是苏联人非常希望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²¹关于亨利和霍诺尔·钱农夫妇（亨利是下院的一位保守党议员），尼科尔森一九三六年九月二十日写道：“[他们认为]我们应当让德国这个勇敢的小国对东方的赤色国家随心所欲，还要让堕落的法国在它这样做时保持安静。否则的话，我们不仅将会看到西方出现赤色国家，而且还会在伦敦、凯尔维登[钱农家的乡间别墅在那里]和绍森德发现炸弹。”²²第二年，一九三七年九月十八日，尼科尔森在日记中记述说：“保守党的主张完全不变，愿意让德国进攻俄国并在近东横行霸道，只要它不来打扰我们。”²³他在一九三八年六月六日写道：“我们已经丧失了意志的力量，因为我们的意志力量四分五裂。管理阶层的人满脑子想的是他们的财富，这意味着对赤色国家的敌视。这种敌视在我们与希特勒之间达成了某种纯属虚幻但在目前行之有效的默契。”²⁴另外，一九三八年九月十一日，捷克斯洛伐克危机期间，在战前和战时的保守党政府中担任过许多重要职务的奥

利弗·斯坦利对哈罗德爵士说：“‘你知道，无论胜败，这都是我们所代表的一切的末日。’他用‘我们’指的显然是资本主义国家。”²⁵

同样具有启发性的是下面这一篇奥利弗·哈维的日记。一九三六年一月至一九三八年二月，哈维担任外交大臣安东尼·艾登的私人秘书，然后继续担任哈利法克斯勋爵的私人秘书直到一九三九年十二月，他在一九三八年十一月十八日的外交日记中写道：“任何战争无论胜败都将带来巨大而且不可预知的社会变革，所以战争不是一种解决办法——请看一九一四年。因此，除非关系到英国头等重要的切身利益，应当不惜一切代价拖延时间从而避免打仗。……[保守]党内的富有阶层……认为，纳粹分子总的看来比共产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更保守：任何战争无论胜败都将毁灭悠闲的富有阶层，因此他们为了和平不惜付出一切代价。”²⁶

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希特勒不失时机地企图使英国政治家和上层社会名流相信，他是西方文明的守护人和潜在的反共斗士，而且他希望与英国和平友好相处。他在这方面得到了德国驻伦敦大使约阿希姆·冯·里宾特洛甫的协助。“一段时间以来，里宾特洛甫忙于在伦敦营造某种对第三帝国的友好气氛。”有影响的半官方的《泰晤士报》编辑、绥靖主义的坚定支持者杰弗里·道森的传记作者约翰·伊夫林·伦奇写道，“他的宣传引起人们的认真思考。纳粹德国肯定是共产主义俄国与西方之间的一个楔子，这是杰弗里充分注意到的一个事实。”²⁷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那样，在二战爆发之后不久撰写的那本被当时的外交大臣哈利法克斯勋爵给予官方认可的小册子《英国问题》中，著名政治家和保守党贵族劳埃德勋爵表示，尽管希特勒的“手段可恶”而且无视欧洲其他国家人民的权利，但“他仍然声称，他最终主张的是某种欧洲的共同利益，因此我们可以想象，总有一天这将提供一种与其他国家达成谅解的基础，平等地决定不把它们传统的制度和习俗当作祭品摆上世界革命滴血的祭坛”。

174

一九三五年一月二十五日，当有影响的政治家兼外交家洛西恩勋爵拜访希特勒时，这位纳粹领导人明确表示，“当共产主义成为一个问题时，他知道他在谈论什么。关于这个问题没有发现什么人比他谈得更好：他看到了共产主义给德国带来的灾难性后果并且与之斗争了多年。共产主义不是一种将在一二十年之内灭绝的思想。……它是一种征服世界的思想，堪

与创建了某个大型宗教的思想相提并论。……必须用另一种哲学与它斗争”。²⁸据认识勋爵的英国历史学家A.L.罗斯说，从那以后，洛西恩勋爵变成了“著名的与希特勒达成‘更充分的谅解’的鼓吹者，而且他比大多数鼓吹者的危害更大，因为他有魅力，因为他与英国政界上层人士关系友好过从甚密——他属于核心集团的一员，因为他有写作能力，其他鼓吹者都不具备这些东西。”²⁹

同样，一九三五年担任外交大臣的约翰·西蒙爵士在当年三月二十五日与这位纳粹领导人会谈之后记述道：“希特勒非常坦率地表示，他决不会同意与苏联签订一项‘互助’条约。他断言，共产主义是一场瘟疫：不像——他声称只想让德国人接受的——国家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是一种扩散性的传染病，它可能传遍整个欧洲和亚洲。他在德国已经消灭了共产主义，因此，德国是防止这种瘟疫向西扩散的屏障。所以他声称，我们应当心存感激。他不会与东方签订条约。我们访问柏林的实质性成果是，确认德国非常希望与英国达成充分的谅解。”³⁰

希特勒轻而易举地使许多来访者相信了他的真诚。正如英国历史学家马丁·吉尔伯特所指出的那样，有些人可能心存疑虑，但是他们仍然“相信，他们的担忧没有道理；希特勒是欧洲和平的虔诚信徒；如果他怀有敌意的话，那么，他敌视的是共产主义而不是英国”。³¹不过，另一些人在到访之前已经改变了看法。例如，当哈利法克斯勋爵在出任外交大臣之前不久应内维尔·张伯伦首相的要求于一九三七年十一月十九日拜访希特勒时，根据德国方面的谈话记录，他表示，完全认可元首对重建德国所作出的巨大贡献，如果英国公众舆论有时对德国的一些问题采取了批评的态度的话，那在一定程度上是因为英国人民不十分了解德国的某些措施产生的动机和条件。“尽管存在这些困难，他和英国政府的其他成员仍然充分意识到，元首不仅在德国国内取得了许多成就，而且通过在德国消灭共产主义，切断了共产主义入侵西欧的道路，因此，可以理所当然地把德国看作西方反对布尔什维主义的一座堡垒。”³²

一年前，托马斯·琼斯以一种明显急迫的语气强调了英国与德国达成某种谅解的必要性。琼斯在政界上层人士中交际广泛，是斯坦利·鲍德温首相的好友、顾问和知己，首相的“惰性”让热衷于英德友好的人们担

心。一九三六年五月二十三日，在从首相周末度假的契克斯寄给朋友的一封信中，几天前刚刚飞去会见了阿道夫·希特勒的琼斯写道：“我们必须 在苏联与德国之间做出选择而且要快。……[希特勒]一直要求与我们结盟以 形成一道防止共产主义蔓延的屏障。我们的首相将在明年的加冕典礼之后 让位给内维尔·张伯伦，他在辞职之前并非不想作为最后的努力进行一下 这种尝试。”³³

但是，优柔寡断、犹豫不决的鲍德温始终没有进行这种尝试，他不想 使自己陷入外交事务，³⁴结果，与德国达成某种谅解的尝试留给了他的更果 断的继任者内维尔·张伯伦。不过，西班牙内战的爆发和对苏联介入的担 心足以促使鲍德温在七月二十六日向外交大臣安东尼·艾登表示，“无论 法国人或其他人怎么做，他决不考虑让英国人与苏联人并肩作战”。³⁵

这也是鲍德温内阁的海军大臣塞缪尔·霍尔爵士对西班牙内战的反 应，他后来成为内维尔·张伯伦政府的“内阁决策委员会”成员。八月 五日，鼓吹“严守中立”的霍尔写道：“我们决不应该在西班牙采取任 何支持共产主义的行动，特别是在人们对葡萄牙的共产主义记忆犹新时， 它可能蔓延到葡萄牙，尤其是在里斯本，这对大英帝国将是一个严重的威 胁。”³⁶

同样重要的是主管英国内阁和帝国国防委员会内部机构达二十五年 之久的莫里斯·汉基爵士的观点。“根据欧洲目前的状况来看，随着法国 和西班牙受到布尔什维主义的威胁，”他在一九三六年七月二十日断言， “可以想象的是，不久的将来与德国和意大利结盟也许对我们更有利，我 们的队伍越大越好。”³⁷

根据查阅了第一海事大臣查特菲尔德勋爵的私人文件的劳伦斯·R.普 拉特的叙述，这位大臣及其部门人员与汉基具有同样的想法，而且还有证 据证明，英国基地舰队司令、查特菲尔德的继任者罗杰·巴克豪斯海军 上将曾于一九三六年提议，英国应与德国和意大利联合“镇压西班牙革 命”。³⁸

至此，我们在本章以及前面的一些章节里已经列举足够的证据证明这 种说法言之有据：英法两国的权势人物将德国视为欧洲反对共产主义的堡 垒并且不愿卷入一场全面的欧洲战争，因为只有苏联可能从中受益。当伦

敦《观察家报》的编辑、保守党观点有影响的传播者J.R.加文写下下面这段话时，他表达的显然不只是个人观点：“推翻德国政权从而使苏联的势力进一步加强并且成为未来无法遏制的力量绝不可能符合英国和大英帝国的利益，这也将使共产主义在欧洲和亚洲取得决定性的优势。”³⁹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那样，法国右派以及温和的法国激进社会党成员持有类似的观点，尽管后者没有公开表达过。因此，强调下述看法并不为过：英法两国不会不顾陷入一个可能被意大利和德国控制的西班牙的危险，改变它们的不干涉政策；共产党人及其盟友在形式和本质上改变西班牙革命特征的努力也不可能诱使英法两国政府在西班牙向德国政府提出挑战。

尽管法国人民阵线政府的社会党人总理莱昂·布鲁姆据说是在英国的强大压力下采取中立立场的，⁴⁰但是，布鲁姆本人始终否认这些传言并且承担全部责任。⁴¹不过，当内战爆发时，应西班牙总理何塞·希拉尔的吁请，他最初准备向西班牙政府提供战争物资，⁴²但是，在去伦敦参加了因德国重新占领莱茵兰而召开的关于洛迦诺公约前途问题的会议后，他改变了主意。尽管西班牙问题不在议事日程上，但仍被间接提了出来。乔尔·科尔顿在他那部资料充分翔实的莱昂·布鲁姆传记中写道：“[英国]政府成员纷纷就援助西班牙共和派的政策表达了各自的意见，布鲁姆后来把这些意见形容为‘严重的忧虑’。‘要说那是反对或许有些言过其实。’多年以后他在回忆这次会谈时说，‘他们不过是在给予小心翼翼的忠告并且表示严重的忧虑而已。’⁴³在一次午餐交谈中，一些保守党人表示，他们希望法西斯分子与布尔什维克之间进行一场极端分子自相残杀的战斗；这是暗示，西班牙可以成为这样一场大决战的合适地方。⁴⁴布鲁姆、德尔博斯[伊冯·德尔博斯，法国外交部长]和莱热[亚历克西·圣-莱热·莱热，法国外交部秘书长]清楚地知道了英国保守党人的消极态度，他们不想在这场西班牙‘内部斗争’中支持任何一方；他们希望西班牙内战不要转化成为一场欧洲战争。⁴⁵不过，布鲁姆本人证实，他在伦敦逗留期间没有受到要他采取不干涉政策的直接压力。”

尽管如此，英国人仍然间接施加了巨大的压力。“不承认受到这种压力然后坚持自己承担全部责任是布鲁姆典型的行为方式。毫无疑问，由于英国官方的舆论环境，他离开伦敦时非常烦恼，因此，即使他还不准备放

弃最初的打算，援助西班牙的决心也有所动摇。不过，他在巴黎意外地遭到坚决的反对。”⁴⁶这其实是正常的，因为在那里，他是人们直接施压的对象，这些压力来自内阁中的某些激进社会党成员，来自共和国总统，⁴⁷来自联合起来的法国右翼势力，来自强大的激进社会党，⁴⁸后者代表了人民阵线联盟内部的大部分中产阶级。据莱昂·布鲁姆的法文传记作者让·拉库蒂尔说，中产阶级“胆战心惊地拒绝承担外交事务方面的任何风险”。⁴⁹

177

对法苏互助条约的敌视同样表明英法两国的权势人物反对任何可能使它们卷入一场与德国的战争的军事承诺。当部分重要的法国舆论毫不掩饰这种敌视而官方人士公开表示他们的反感时，⁵⁰权威的英国报纸竟别出心裁。英国政府的非正式喉舌《泰晤士报》写道：“英国舆论不准备接受……法国在整个国际政治领域的领导地位，也不准备承认它对所有义务负有责任，它正在以结成反德联盟的方式……不断积累这种义务。……此间并不认为法苏条约是一项积极有益的外交成就。”⁵¹

“法国为了势力范围在东欧结盟——其目的仍然在于势力范围，即使没有侵略的意图只是为了自卫。”“观察者”在《星期日泰晤士报》上写道，“它正确或者错误地——我国有些人认为是错误地——相信，因与苏联和小协约国^①结盟而得到的好处超过了卷入某些实际上与它无关的争端所带来的风险。在这个问题上，法国的政策与我国的不同。”⁵²

“这些条约[法苏条约和捷苏条约]意味着战争而且不可能意味着别的事情。”J.L.加文在《观察家报》上写道，“如果我们支持它们，它们意味着英国与德国之间的战争而且不可能意味着别的事情。如果英国打算支持或者赞成使用那些致命的手段；如果我们打算全面或者部分参与其中；如果我们打算支持苏联和共产主义的潜在盟友法国和捷克斯洛伐克反对德国——那么，必将导致对和平局面的致命破坏而且再说什么也没有用。我们不可能左右逢源。如果我们准备在东方与德国冲突，最终它必定在西方攻击我们。没有别的可能性。”⁵³

尽管从来没有任何官方声明像这些极具影响力的一流报纸一样如此直截了当地表达意见，不过毫无疑问的是，这些意见大致相当于政府的立

^① 小协约国指的是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签订共同防御协定的捷克斯洛伐克、南斯拉夫和罗马尼亚三国。

场。根据二战之后公布的外交事务委员会一九三八年三月十八日的会议记录，这一点显而易见。这次会议“详细研究了法国[因其中欧和东欧承担的义务]可能将英国拖入战争的危險，因为，正如[张伯伦首相]所指出的那样，‘我们不能眼看着法国灭亡’。”⁵⁴

同样表示关切的还有英军参谋长联席会议，它在一九三七年报告说：“如果法国因为与我们无关的抉择受到牵连，我们可能被卷入一场欧洲的全面战争，即使到时候对我们来说这场战争非常危險。”⁵⁵“尽管受到先决条件和各种因素的限制，”英国历史学家基思·米德尔马斯写道，“英国实际上从来没有否定过这一基本原则并且在[一九三八年三月]奥地利沦陷之后不久由参谋长联席会议阐明了它。当法国‘陷入险境时……我们不能允许[它]被蹂躪，也不能允许把机场建在法国国土上。几百年来，英国人民为阻止低地国家[荷兰和比利时]被某个敌对的大国据为己有而战斗过’。”正如米德尔马斯所指出的那样，张伯伦政府勉强承认，不能眼看着法国被德国打败是英国最重要的国家利益。一九三八年希特勒几乎可以随心所欲地向东方扩张，但是，并没有出现西欧的力量平衡被打破这种最后的局面。⁵⁶因此，当张伯伦在外交事务委员会上表示“最令人不安的情况是法国部长可以决定英国是否参战”时，⁵⁷一点也不让人感到意外。

178

于是，正如英国政府所察觉的那样，至关重要的问题是，不仅要防止因西班牙内战和法国介入的可能性所造成的持续威胁引起一场欧洲战争，而且要防止因法国在东欧承担的义务引起一场欧洲战争。有人认为，只有在法国摆脱它与东方的种种纠葛、英德两国达成某种政治谅解以保证在西欧维持现状并且允许德国作为反苏堡垒在东方谋求霸权之后，西方的战争才能避免。

尽管英国的历史学家基本上都在回避“英国的目的是把纳粹的侵略引向东方从而使两个极权国家在那里两败俱伤力量耗尽”这一论题——考虑到对共产主义的担忧，这一论题至少符合逻辑——并且强调奉行绥靖政策的其他理由，尽管公开档案中的官方文件受到监管甚至导致某些文件消失不见，但是，证据仍然不容辩驳地表明，在政界上层以及上流社会人士中，存在着强大的舆论倾向，希望德国至少起到抗衡苏联遏制共产主义蔓延的作用。证据已经充分证明，纳粹政权上台初期这些倾向就已存在，证

据还使人们确信，直到一九四〇年春天德国入侵西欧打破力量平衡为止，这些倾向一直存在。

如果我们不得不喋喋不休地详细讨论绥靖政策背后的主要动力，那是因为英国对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历史的研究状况令人非常不满意。如果不能无可辩驳地确定绥靖政策的主要动力，不仅无法理解战前的欧洲历史和英国政策——后者看上去并非一个接一个的荒唐失误，而且无法理解斯大林在西班牙内战和革命期间所坚持的“温和”路线。同样无法理解的是，斯大林的努力——他企图通过曲解西班牙革命的性质诱使西方民主国家放弃它们的不干涉政策，进而在西班牙与德国对抗——为什么绝不可能取得他所希望的那种效果。

不过，当大多数英国历史学家都在回避绥靖政策背后的主要动力这一问题或者将其一带而过并且企图以其他辩解来搪塞时，的确存在着一些明显的例外。可以认为像阿诺德·J.汤因比——据（认识他的）托马斯·琼斯说，汤因比曾经“相信[希特勒]希望欧洲和平并与英国友好相处的诚意”⁵⁸——这样的权威在一九三七年作出那么明确的表述理所当然：“应当缔结一份西方条约并且应当默许希特勒先生在东方随心所欲地自由行动的建议将会被那些（不是因为害怕德国日益增强的实力，就是因为不喜欢苏联，或者出于其他目的）认为英德友好非常必要的英国人所接受；那些坚决反对向德国提出的归还其战前殖民地的要求做出任何让步的英国人可能也会考虑这个建议。……几乎毫无疑问的是，相当一部分英国公众——包括议会下院中的一些支持政府的议员——将认为，为了大英帝国的利益应当放弃东欧任其听天由命，只要能用这种方法把重新分配殖民地的问题暂时搁置就行。”⁵⁹

另外还有担任张伯伦政府陆军部长莱斯利·霍尔-贝利沙的顾问的军事战略家兼历史学家巴兹尔·亨利·利德尔·哈特的证词，他说，在“政府的圈子里我早就听到过这样一些精明的论点：允许德国向东方扩张，逃避我国所承担的国际联盟盟约义务，让其他国家首先承受侵略的冲击”。⁶⁰

约翰·W.惠勒-贝内特爵士甚至更加直截了当：“然而，这种宁愿看到德国控制中欧和东欧的态度不仅仅是英国外交基本倾向的附带产物。它的意义应当比这大得多，在整个形势中，它是关键因素之一。在‘迁就’希

特勒以争取和平的一般愿望背后，暗中隐藏着一种期待，即使不是隐藏在张伯伦先生本人心里，至少也是隐藏在他的某些顾问心里：如果能够把德国的扩张引向东方，它迟早会与敌对的苏俄极权帝国主义发生冲突。在接着爆发的战争中，国家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将两败俱伤力量耗尽，而且由于持有这种观点的那些人认为，对于英国来说，布尔什维克俄国比纳粹德国更危险，因此，希特勒打败斯大林并在这个过程中极大削弱自己的前景不会不让人抱有期待。”⁶¹

注释：

- 1 《英国外交政策文件，1936—1937》，第二辑，第十七卷，第496页。
- 2 《斯大林全集》，第七卷，第14页。
- 3 古斯塔夫·希尔格和阿尔弗雷德·G.迈尔，《互不相容的盟友》，第306—307页。
- 4 约翰·W.惠勒-贝内特，《慕尼黑：悲剧的序幕》，第392页。
- 5 引自（其传记作者）伊恩·麦克劳德《内维尔·张伯伦》，第273页。另请参阅基思·费林的《内维尔·张伯伦传》，该书在第十七章里引用了这段话。
- 6 《一九一八至一九四五年德国外交政策文件》，D辑，第二卷，第608页（科尔特向德国外交部国务秘书恩斯特·冯·魏茨泽克提交的关于这次谈话的备忘录）。科尔特在密信中把威尔逊（张伯伦担任首相期间他在唐宁街十号有一个房间）描述成为“张伯伦最亲密的同事”并且补充说，“[他]被普遍认为是英国政府中最有影响力的人物之一。他不喜欢抛头露面。公认的事实是，内维尔·张伯伦为所有问题都会征求他的意见。这个反对一切作秀的人让所有与他打过交道的人肃然起敬。他具体体现了毛奇的理念：‘真人不露相。’”（同上，第605页）关于这个能力出众但富有争议的文职官员，至今没人写过一部全面的传记，反对他的人说他是张伯伦的幕后操纵者。在一段对威尔逊生平的简短描述中，英国历史学家基思·米德尔马斯提供了以下信息：“官方档案提供的证据表明，他的活动没有战时那本有争议的书《罪人》所说的那么重要。一九三五年，作为一名‘聪明的顾问’，他被[首相]鲍德温带到了唐宁街，多少有点身不由己。……[作为]劳工部常务副大臣，他在一九二六年的总罢工期间是一个重要的人物。……作为精明干练的谈判者，他在白厅享有盛名。一九三一至一九三九年，他的工作主要涉及国内政策或者与其作为首相的非正式顾问的职责有关，只是渐渐地扩大到了外交政策领域。……就威尔逊而言，张伯伦从前任那里得到了一个‘可以另派用场的人’……资历深厚，经验丰富，具有异常清醒的头脑，……对首相应有的基本忠诚。威尔逊是执行非正式任务的理想人选。……张伯伦可以把他作为密使派往德国大使馆，传达关于英国目标的简略意见，告诉对方在对外交往中没有一成不变的承诺；同时察觉德国人的基本想法。……当然，他的行动引起了外交部的不满。……[直到]一九三八年夏天和慕尼黑会议[为止]，他似乎顶多只是一个执行首相指示的称职官员。……伍尔顿勋爵的评论也许最为公正：‘对于政府范围内正在发生的事情，他比别人知道得更详细。他深知首相们工作的压力。……作为一名文职官员，他的洞察力及其出色的执行力难能可贵，但是我认为，他对首相最大的帮助是他给予首相的同

情。……他以自己的知识和判断力使首相们有了可以交谈和依靠的人’。”（基思·米德尔马斯，《外交幻觉》，第83—84页）关于威尔逊的另外一些信息可以在下列著作中找到：（埃冯伯爵）安东尼·艾登，《面对独裁者》；安德鲁·博伊尔，《蒙塔古·诺曼》；伊恩·科尔文，《张伯伦内阁》和《任职于政府的范西塔特：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起因》；马丁·吉尔伯特和理查德·戈特，《绥靖主义者》；查尔斯·洛赫·莫厄特，《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英国，1918—1940》；坦普尔伍德子爵（塞缪尔·霍尔爵士），《纷乱的九年》；范西塔特勋爵，《在迷雾中前行》。

- 7 C.A.麦克唐纳，《美国、英国与绥靖主义，1936—1939》，第8页（布利特一九三六年十二月二十日致罗斯福）。
- 8 美国国务院，《美国外交关系：一九三六和一九三七年的外交文件》，第二卷，第575页。一九三八年九月二日，捷克斯洛伐克危机期间，英国驻巴黎大使埃里克·菲普斯向外交大臣哈利法克斯勋爵报告说，布利特认为，“苏联非常希望燃起一场全面战火，这场战火几乎与它毫不相干，也许只能隐约听到远方传来的爆炸声。但是，硝烟过后它将像凤凰一样从我们的废墟上飞起，发动一场世界革命。”（《英国外交政策文件，1919—1939》，第三辑，第二卷，第219页）
- 9 《英国外交政策文件，1919—1939》，第二辑，第十八卷，第975页。
- 10 英国政府办公室，《内阁会议记录，1916—1939》，23/29，第27页。
- 11 同上，第29页。
- 12 英国里士满公共档案馆，外交部文件，第C1935/95/62 FO371//21626号。感谢米德尔马斯的《外交幻觉》让我看到这份参考资料。我亲自查阅了这份资料。
- 13 《英国外交政策文件，1919—1939》，第三辑，第一卷，第341页。
- 14 盖尔·冯·施韦彭布尔格和莱奥·迪特里希·弗朗茨，《关键的几年》，第56和86页。
- 15 《一九一八至一九四五年德国外交政策文件》，D辑，第二卷，第25页。在九月二日提交外交大臣哈利法克斯勋爵的一份报告中，英国驻巴黎大使埃里克·菲普斯爵士写道，据博内说，“苏联的愿望之一是挑起一场全面的战争，然后它趁机浑水摸鱼。他在这个问题上证实了布利特先生向我表达过的看法”（《英国外交政策文件，1919—1945》，第三辑，第二卷，第220页）。
- 16 《一九一八至一九四五年德国外交政策文件》，D辑，第二卷，第267页。
- 17 同上，第327页。
- 18 同上，第713页。“我真心希望不要在法国与德国之间发生战争。”法国驻莫斯科大使对他的德国同行说，“你和我都知道，假如我们相互厮杀那是在为什么人卖命。”（同上，第631页）
- 19 莫里斯·甘末林将军，《为国效力》，第二卷，第343页。
- 20 惠勒-贝内特，《慕尼黑：悲剧的序幕》，第389—390页。“如果发生任何战斗，我希望看到布尔什维克与纳粹分子作战，”一九三六年七月鲍德温首相对丘吉尔这样说（见米德尔马斯《外交幻觉》，第54页）。
- 21 哈罗德·尼科尔森，《日记与书信，1930—1939》，第250页。据鲍德温首相的传记作者说，他在大约同一时期说过，“被法国和苏联打败的德国将会成为共产主义德国。”（G.M.扬，《斯坦利·鲍德温》，第223页）读者是否应当对英法两国将希特勒赶回莱茵河对岸去的能力表示怀疑，下面这些从权威性原始资料中引用的内容将有助于解答这个问题。当时的法军总参谋长甘末林将军在回忆录中写道：“如果我们在一九三六年显示出我们决心打仗，[德国人]将撤回去，他们的整个计划可能因此受到危及，甚至危及‘元首’的威信。”（甘末林，《为国效力》，第二卷，第193页）丘吉尔写道：“[法国总理]萨罗先生和[外交部长]弗里丹情急之下希望通过总动员立即采取行动。……可是，他们似乎不经英国同意就无法行动。这是一种解释，但不能成为理由。对于法国这是生死攸关的问

题，因此，任何名副其实的法国政府都应作出自己的决定并且信赖条约义务。……情况可能的确是，他们没有从英国得到对抵抗德国侵略的任何鼓励。[埃冯伯爵（当时的外交大臣安东尼·艾登）证实了这一点。艾登写道：“尽管个人对法国友好，（鲍德温首相）心里明白，英国不会支持法国采取任何军事行动。我只能对此表示同意。”（艾登，《面对独裁者》，第385页）]恰恰相反，只要他们对采取行动犹豫不决，他们的英国盟友就会毫不犹豫地劝阻他们。……如果法国政府真的动员了法国军队……德军总参谋部肯定会迫使希特勒撤退，他的狂妄将会因此受到抑制，这对他的统治来说很可能是致命的。……事实上，法国始终反应迟钝，行动无力，从而无法挽回地失去了不必通过一场大战遏制希特勒野心的最后机会。在英国的怂恿下，法国政府反而把责任推给了国际联盟。”（温斯顿·丘吉尔，《风云际会》，第193—195页）“[人们]不禁会想，”前德国驻伦敦大使馆武官盖尔·冯·施韦彭布尔格将军男爵写道，“西方列强在有利的时机没有采取积极的军事反击行动实在是德国人民的不幸。”（施韦彭布尔格和弗朗茨，《关键的几年》，第68页）最后，我们还有内维尔·张伯伦的“内阁决策委员会”成员、绥靖主义的主要鼓吹者之一塞缪尔·霍尔爵士（坦普尔伍德子爵）的证言：“我现在确信，如果我们和我们的盟友干涉的话，我们肯定可以迫使希特勒撤退从而给他正在提高的威信一个毁灭性的打击。”（塞缪尔·霍尔爵士，《纷乱的九年》，第201页）不过，使英法两国在对德国重新占领莱茵兰采取反击行动时退缩不前的正是伴随着对希特勒地位的“毁灭性打击”可能在德国以及欧洲其他国家所产生的社会后果。无论如何，事实证明，法国没有采取行动严重损害了它在欧洲的地位。夏尔·A.米科得出的结论毫无疑问是正确的：一九三六年三月是法国外交政策的转折点，它从“欧洲最重要的国家”变成了“英国的附庸国”（夏尔·A.米科，《法国右派与纳粹德国，1933—1939》，第97页）。

22 尼科尔森，《日记与书信》，第273页。

23 同上，第313页。

24 同上，第346页。

25 同上，第359页。

26 约翰·哈维编，《奥利弗·哈维外交日记，1937—1940》，第222页。

27 约翰·伊夫林·伦奇，《杰弗里·道森与我们的时代》，第362页。

28 詹姆斯·拉姆齐·蒙塔古·巴特勒，《洛西恩勋爵（菲利普·克尔），1882—1940》，第331页。

29 A.L.罗斯，《绥靖主义》，第32页。

30 约翰·西蒙爵士，《回首往事》，第202—203页。

31 马丁·吉尔伯特，《绥靖主义的根源》，第162页。

32 《关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夕的文件资料》，第一卷，第14—45页。这份谈话记录是一份苏联人译成英文的德国文件。在《一九一八至一九四五年德国外交政策文件》的英译本中，没有那些着重体标注，见D辑，第一卷，第55—67页。在其他方面，两个文本大致相同。哈利法克斯本人对谈话中有关共产主义的内容记述如下：“[我对希特勒说]我并不是没有看到他为德国所做的事情，也不是不了解从他的不使德国出现共产主义并且阻止其——像他感觉到的那样——向西方传播的观点来看所取得的那些成就。”（《英国外交政策文件，1919—1939》，第二辑，第十九卷，第543页）

33 托马斯·琼斯，《日记书信集，1931—1950》，第202和209页。对于那些有兴趣了解琼斯试图对鲍德温施加的政治影响的读者来说，这是一本非常有价值的书。琼斯的熟人A.L.罗斯写道：“[他]是一个非常爱管闲事的中间人。……如果知道琼斯一直为[德国驻伦敦大使，后来的德国外交部长]里宾特洛甫从事卑鄙的勾当，我与他应当不会多么亲近。……我知道他站在那一边，但在他的《日记书信集》发表之前，我不知道他在多大程度上参与了里宾特洛甫的阴谋活动。”（A.L.罗斯，《冥冥众生》，第35页）

- 34 鲍德温的传记作者扬写道：“当内阁讨论外交事务时，他总是夸张地闭上眼睛。他会说，‘你们完事以后叫醒我。’”（扬，《斯坦利·鲍德温》，第63页）
- 35 根据托马斯·琼斯，《日记书信集》，第231页。
- 36 霍尔致外交部，第一海事大臣查特菲尔德勋爵的附加备忘录，英国里士满公共档案馆，外交部文件，第W7781/62/41 FO371/20527号。感谢劳伦斯·R.普拉特的《马耳他以东，苏伊士以西：英国的地中海危机，1936—1939》让我看到这份参考资料以及其他参考资料。我亲自查阅了它们。
- 37 莫里斯·汉基（“机密”备忘录），英国里士满公共档案馆，外交部文件，第W11340/79/98 FO371/20475号。见关于劳伦斯·R.普拉特的注释41。
- 38 普拉特对这段叙述的部分注释如下：“[外交部常务副大臣]范西斯塔特致查特菲尔德，一九三七年二月十六日。查特菲尔德私人文件。英国驻巴塞罗那领事诺曼·金谴责了‘红色西班牙’并使巴克豪斯相信，必须镇压革命。”（普拉特，《马耳他以东，苏伊士以西：英国的地中海危机》，第43页）
- 39 一九三六年十一月二十九日《观察家报》。
- 40 佩蒂纳（安德烈·热罗）为E. N.捷勒皮的《西班牙阴谋》一书所写的序言，第vii页。另请参阅莫里斯·皮若发表在一九三六年七月二十五日《法兰西行动报》上的文章；因达莱西奥·普列托在一九四八年七月十七日《西班牙共和报》上引述的樊尚·奥里奥尔的话；克劳德·鲍尔斯，《我赴西班牙的使命》，第281页；芬纳·布罗克韦，《工人阵线》，第159—160页；皮埃尔·拉扎雷夫，《最后期限》，第134页；休·托马斯，《西班牙内战》（一九六五年版），第331页；亚历山大·沃思，《法国走的是哪条路？》，第397页。
- 41 见乔尔·科尔顿《莱昂·布鲁姆，政界的人道主义者》，第235页和第241—242页注释6。布鲁姆告诉英国工党全国执委会主席休·多尔顿，对西班牙的不干涉政策是他的政策。“正如某些传说所言，首先提出这一政策的是他而不是[英国外交大臣]艾登。”（休·多尔顿，《重要的年代：回忆录，1931—1945》，第95页）
- 42 科尔顿，《莱昂·布鲁姆》，第236页和第239页注释9。另请参阅（法国空军部长）皮埃尔·科特发表在一九六六年八月三日《新观察家报》上的文章；朱尔·莫克，《会见……莱昂·布鲁姆》，第191页和政治事务副主管罗贝尔·库隆德尔一九三六年七月二十三日写给伊冯·德尔博斯的秘密信件，见法国外交部的《法国外交文件，1932—1939》，第三卷，第37页。
- 43 科尔顿的这一段引语来源于布鲁姆一九四六年向法国社会党大会发表的演说，载一九五〇七月十九日《人民报》。
- 44 科尔顿对这一段谈话的注释如下：“布鲁姆一九三九年三月二十七日晚餐时的私下言论，布吕梅尔[安德烈·布吕梅尔，布鲁姆政府的办公室主任]在场：备忘录打印稿，布吕梅尔私人文件。”乔治·勒弗朗的《人民阵线史》所提供的布吕梅尔备忘录关于这一段内容稍有不同，见第462页。据莱昂·布鲁姆政府的秘书长朱尔·莫克说，当时的英国财政大臣内维尔·张伯伦发表了以下言论：“我们英国人憎恨法西斯主义。不过我们同样憎恨布尔什维主义。因此，如果这两种东西在某个国家互相残杀，对于人类来说那是再好不过的。”（见约翰·E.德雷福特《伊冯·德尔博斯在凯道赛：人民阵线时期的法国外交政策，1936—1938》，第46页）
- 45 埃冯伯爵（前外交大臣安东尼·艾登）在他的回忆录《面对独裁者》中写道：“尽管处在要求他支持马德里的西班牙政府的压力下，布鲁姆仍于七月二十六日宣布法国决不可能进行干涉。他和德尔博斯非常清楚，任何其他行动方针都将即使法国陷入分裂，而大国的公开干涉可能导致一场欧洲战争。我们赞成法国作出这种决策。”（《面对独裁者》，第450—451页）英国反对进行支持共和派的干涉还有另外一个原因。一九三六年八月二十日，亚历山大·卡多根爵士——他曾在安东尼·艾登手下担任副外交大臣（1936—1937）

并在随后担任外交部常务副大臣（1938—1946）——写了下面这份本书前面引用过的备忘录：“我要说的是，在相对正常的情况下——即，‘现政府’实际控制着国家并有继续存在下去的可能性——即使没有两国间的协议，我们也应当最严格地遵守我们一贯奉行的常规政策，允许或者批准向公认的西班牙政府运送物资，同时对叛军实行禁运。但是，在西班牙目前的情况下，或者说在有可能迅速发展的形势下，不能盲目遵循常规。西班牙现政府是怎么回事？巴塞罗那的那些掌权者在多大程度上承认马德里当局？后者在多大程度上有效控制着马德里？……撇开国际方面的问题和我们想要避免‘一刀切’的愿望不说，在不久的将来人们可能更清楚地看到，‘西班牙现政府’越来越不值得他们同情，甚至对于我国的工党人士来说也是如此。”（英国里士满公共档案馆，外交部文件，第371/20573号）

- 46 科尔顿，《莱昂·布鲁姆》，第241—242页。另请参阅德雷福特《伊冯·德尔博斯在凯道赛：人民阵线时期的法国外交政策》，第31—54页和M.D.加拉格尔的文章，《莱昂·布鲁姆与西班牙内战》，载《当代历史季刊》，6，（一九七一年）第三期。值得注意的是，英国历史学家戴维·卡尔顿否认英国施加了任何压力，他的论点的依据是，在他查阅的英国官方档案和法国外交部文件中没有找到相关的证据（《艾登，布鲁姆和不干涉政策的由来》，同上）。另一方面，英国布里斯托尔理工学院世界史讲师格林·A.斯通坚持认为，尽管“乍看起来科尔顿的反驳似乎是以对已经发表和尚未发表的原始资料的进一步研究……为基础的……但是，这决不表明它是最后的结论”（《英国，不干涉政策与西班牙内战》，载《欧洲研究评论》，9，[一九七九年一月]第一期）。西班牙内战期间担任保守的伦敦《泰晤士报》军事记者的英国军事战略家兼历史学家利德尔·哈特断言，一九三六年八月八日，英国政府递交了“一份事实上的最后通牒，如果法国不立即禁止向西班牙出口战争物资从而避免发生一场与德国的战争的话，英国将考虑自行解除洛迦诺公约赋予它的援助法国的义务”（巴兹尔·亨利·利德尔·哈特，《利德尔·哈特上尉回忆录》，第二卷，第128页）。不过，他没有援引任何原始资料支持这个论断，这看上去明显是复制了休·托马斯那部西班牙内战史第一版的论点，几乎一字不差，见休·托马斯《西班牙内战》（一九六一年版），第258页。就托马斯而言，他只引用了西班牙共产党的秘密党员阿尔瓦雷斯·德尔巴约和亲共的巴勃罗·德·阿斯卡拉特的证言，从而使这一指控的可信度存疑，因为至今没有人拿出充分的证据证明英国政府施加了这种赤裸裸的压力。关于对托马斯的论断的驳斥，见戴维·卡尔顿《艾登，布鲁姆和不干涉政策的由来》，载《当代历史季刊》，6，（一九七一年）第三期。
- 47 根据莱昂·布鲁姆的好友路易·莱维的说法，见路易·莱维《关于法国的真理》，第114页。
- 48 莱昂·布鲁姆向成立于一九四七年的调查一九三三至一九四五年间发生在法国的重大事件的国民议会调查委员会所作的证词，见《一九三三至一九四五年间发生在法国的重大事件：国民议会调查委员会收集的证据和材料》，第一卷，第216—227页。一九三六年十月举行的激进社会党全国代表大会通过了一项议案，赞扬政府通过提议签订不干涉公约“避免了一场严重的国际危机”（见一九三六年十月二十四日《新时代》）。
- 试图全面展示西班牙内战期间法国不同政党和派别的态度的研究者们将会发现戴维·温盖特·派克的精心之作《法国与西班牙内战，1936—1939》很有价值。基于对数千份报刊杂志的研究，派克引用的大量资料可以为研究者和历史学家免去无数单调乏味的工作。另请参阅派克早期的研究著作《猜测、宣传和欺骗与西班牙内战》和《法国新闻界眼中的一九三六年西班牙危机》。之后出版的另外一部有价值的著作是何塞·马利亚·博拉斯·略普的《面对西班牙内战的法国：资产阶级，国家利益和阶级利益》，它把焦点主要集中在法国工商金融报刊对西班牙内战的态度上。
- 49 让·拉库蒂尔，《莱昂·布鲁姆》（乔治·霍洛赫英译），第317页。

- 50 “人民阵线的外交政策因这一事实而被削弱：实际上只有共产党议员、一小部分社会党议员以及不到一半激进社会党议员赞成理应是其外交政策坚实基础的法苏条约。对于那些希望看到条约被批准的人来说，最难以拒绝的难道不是莱昂·布鲁姆本人在《人民报》的文章里所发表的论点吗？他关于集体安全的个人观点——‘从根本上说，可以合乎逻辑地要求我们为了避免以后发生的另一场战争现在去冒战争的风险吗？’——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流行。”（热纳维耶芙·塔布伊，《他们被称为灾难预言者》，第297页）
- 51 一九三六年七月六日《泰晤士报》。据富兰克林·里德·甘农说，“《泰晤士报》是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无可争议的最重要的英国报纸。”尽管得到了“英国政府官方发言人”的名声，但它仍然是“一份具有独立见解的保守报纸，制订了一套独具特色的针对纳粹德国的政策，这种政策碰巧与鲍德温政府和张伯伦政府所实施的政策一致，尤其是后者”（甘农，《英国新闻界与德国，1936—1939》，第56、70和73—74页）。它的英国政府正式或非正式喉舌的名声在很大程度上源于长期支持绥靖主义的报纸编辑杰弗里·道森与重要的保守党政治家之间密切友好的关系。据甘农说，对道森的主要指责之一是，他是一个“阴险的人物，绥靖主义时期的反面角色。他在这个最顽固、最令人恼怒的统治集团喉舌中的显要地位足以使激进报纸、左派人士和共产党的宣传工具把他看成这种人”（同上，第64页）。据英国历史学家A.J.P.泰勒说，“道森对他的正当性充满自信。……他……坚定地谋求与德国和解。他把《泰晤士报》变成了一种宣传品并且毫不犹豫地封杀或者歪曲报纸自己的记者的报道”（A.J.P.泰勒，《一九一四至一九四五年英国史》，第418页）。另请参阅罗斯《绥靖主义》，第5—13页。道森的传记作者写道：“杰弗里肯定受到‘纳粹德国是阻止共产主义向西方蔓延的一道屏障’这一思想……的影响。”（伦奇，《杰弗里·道森与我们的时代》，第376页）在一九三七年五月的一封信中，道森写道：“我天天晚上竭尽全力务使报纸不要刊登任何可能伤害[德国人]感情的内容。现在我真的不记得过去几个月刊登过什么可能被视为不公正的评论而让他们不满的东西。”（同上，第361页）
- 52 一九三六年十二月二十日《星期日泰晤士报》。据甘农说（《英国新闻界与德国》，第55页），《星期日泰晤士报》是两份一流的星期日报纸之一，另一份是《观察家报》。从一九二九年至一九四〇年，《观察家报》关于外交政策的主要发言人是“斯克鲁泰特”（赫伯特·赛德博特姆）。赛德博特姆的继任者R.C.K.恩索尔说，当时所写的文章并没有“被权势人物更广泛、更用心地阅读”（同上）。
- 53 一九三六年十一月一日《观察家报》。关于加文和《观察家报》，甘农写道：“作为两份一流的星期日报纸之一，《观察家报》的影响肯定很大。……[加文]认为凡尔赛和约的作用不值一提：它所代表的整个国际事务体系以英国与法国在欧洲的密切合作为基础，在他看来这与英国的利益相悖而且具有危险性。尽管加文决不容忍纳粹的种族政策，但他显然认为，德国与英国之间可能而且应当达成谅解。”（《英国新闻界与德国》，第51页）关于加文的一些重要文章的摘要，见玛格丽特·乔治《扭曲的看法：一九三三至一九三九年的英国外交政策》，第146—150页，这些文章显示了加文对共产主义的忧虑以及对纳粹德国的同情。
- 54 科尔文，《张伯伦内阁》，第109页。科尔文的这一信息来源于（英国内阁文件）Cab. 27.623，第164页。
- 55 见米德尔马斯《外交幻觉》，第18页。资料来源是CID（帝国国防委员会）1385-B，参谋长联席会议一九三七年战略研究报告。
- 56 米德尔马斯，《外交幻觉》，第18—19页。引文源于（英国内阁文件）Cab. 50—37，《关于德国面对其他欧洲大国的形势说明》，一九三八年三月十三日。
- 57 科尔文，《张伯伦内阁》，第110页。
- 58 琼斯，《日记书信集》，第181页。

- 59 阿诺德·J.汤因比，《一九三六年国际事务概览》，第280—281页。
- 60 利德尔·哈特，《利德尔·哈特上尉回忆录》，第一卷，第221页。
- 61 惠勒-贝内特，《慕尼黑：悲剧的序幕》，第295—296页。作为对比，应当引述英国历史学家罗伯特·斯基德尔斯基的观点。他是战后发展起来的那些历史修正学派之一的追随者，这些学派进行的研究使世界历史的这一重要时期变得模糊而不是清晰。在发表于一九七二年七月号《文汇》杂志的文章里，斯基德尔斯基写道：“如果英国确如许多政治家和外交部官员私下讨论的那样决定给予德国在东方‘自由行使的权力’，那么，英国可以向法国施加强大的压力迫使它背弃它的承诺——并且撕毁法苏条约——以换取英国方面更加可靠的保卫法国本土的军事保证。从来没有认真考虑过这种选择的原因是，英国并不打算对中欧和东欧撒手不管。……当然，英国有一些群体……主张进行希特勒肯定一直希望进行的那种交易——‘德国与大英帝国达成一项以牺牲苏联为代价的政治密约’。但是，这种犬儒主义（或现实主义）与英国官方没有关系。”斯基德尔斯基应当清楚地记得，当内维尔·张伯伦领导的英国政府判定捷克斯洛伐克的独立不值得捍卫时，当它在几个月后秘密地向德国提出一项英国背弃其援助波兰的承诺的解决方案时，英国的确对中欧和东欧撒手不管了。正如我们将会看到的那样，只是由于希特勒依仗他与斯大林签订的条约决意立即军事解决波兰问题，英国关于波兰的建议才流了产。斯基德尔斯基也不应当忘记，英国的确为使法国背弃它与捷克斯洛伐克的盟约向法国施加了压力。一九三八年九月十九日，英法两国在慕尼黑向希特勒的要求让步前几天，张伯伦的外交大臣哈利法克斯勋爵的私人秘书奥利弗·哈维在日记中写了下面这段话：“我必须记下我的看法。巴黎的[英国大使]菲普斯竭力劝说法国人不要为履行其与捷克斯洛伐克的条约采取任何实际行动，也不要做诸如此类的任何事情。……他给人留下的明确印象是，[英王陛下政府]希望能够阻止法国（事实当然也是这样）。另外，关于西班牙，他始终支持佛朗哥一方并且竭力阻止法国政府援助巴塞罗那[一九三八年共和派政府所在地]。尽管法国政府现在像英王陛下政府一样为不惜一切代价避免战争而忧心忡忡是事实，但是，法国人……从我们嘴里听到了他们的失败主义腔调也是事实。”（约翰·哈维编，《奥利弗·哈维外交日记》，第188页）四个月前，英国外交部常务副大臣亚历山大·卡多根爵士在他的私人日记中记录了下面这段内容：“哈[内维尔·张伯伦的外交大臣哈利法克斯]打算切断法国与捷克和捷克与苏联的联系。他完全正确。”（《亚历山大·卡多根爵士日记，1938—1945》，第80页）

向英法伸出橄榄枝

现在应当清楚的是，法国在中欧和东欧所承担的军事义务与英国外交政策的目标背道而驰。根据德国文件我们同样清楚的是，即使在法国政府官员当中，法苏条约也被一些人认为是与德国达成最终谅解的一个障碍。克里姆林宫充分意识到了这一点。实际上，对英法两国可能以牺牲东欧为代价与德国达成某种协议的担忧在莫斯科根深蒂固。一九三七年二月，在与美国驻苏联大使约瑟夫·E. 戴维斯的一次谈话中，苏联外交人民委员马克西姆·李维诺夫毫不掩饰这种忧虑。“他无法理解英国为什么看不到，希特勒一旦控制了欧洲，他也将吞并英伦三岛。”戴维斯向美国国务院报告说，“他为此似乎非常纠结，并且担心法英两国与德国之间可能就某些分歧达成了谅解。”¹

毫无疑问，正是这种对德国军国主义势力最终可能向东方而不是向西方扩张的担忧促使克里姆林宫在西班牙加倍努力以引诱英法两国放弃它们的中立政策。由于对英法两国不顾意大利和德国越来越大的干涉力度²继续采取不干涉西班牙内战的中立政策、对法国政府没有以实际的军事协定补充法苏条约以及对英国工党抵制人民阵线感到失望，³苏联的担忧加重了。

一九三七年一月底，加泰罗尼亚统一社会党领导人胡安·科莫雷拉向

党中央委员会汇报了与共产国际高级代表杰罗·埃尔诺进行的讨论，杰罗在西班牙化名“佩德罗”，刚从莫斯科回来，“他们认为，“当前的头等大事是寻求欧洲民主国家的合作，尤其是英国的合作。”⁵

“在民主阵营的大国中，决定性因素不是法国；”两天后科莫雷拉在一次公众集会上说，“决定性因素是英国。全党同志务必认识到这一点，克制一下[他们]现在使用的口号。……英国这个国家不像法国。英国是保守党统治的国家。英国是一个变化缓慢的国家，它始终专注于帝国的利益。英国是一个富人的国家，它有一个不会轻易做出反应的极其保守的中产阶级。……有人说，英国无论如何决不会答应德国征服西班牙，因为这将意味着对其切身利益的某种威胁。但是，我们应当认识到，如果英国的大资本家得出结论，认为他们在西班牙问题上没有别的选择的话，那么，他们随时可能与意大利和德国的资本家们达成协议。

“[因此]我们必须不惜一切代价把这个仁慈地保持中立的国家争取过来，即使得不到它的直接援助。”⁶

达到这一目的不仅要靠共产党人在革命爆发时所采取的强调革命温和倾向的策略，而且要靠另外一些具体手段，支持共产党的外交部长阿尔瓦雷斯·德尔巴约一九三七年二月发给英法两国政府的一份照会清楚地表明了这一点。照会提出，将西属摩洛哥转让给这两个大国，作为回报，它们采取措施阻止意大利和德国进一步干涉西班牙事务。⁷

值得注意的是，一九三七年一月底，提出这个建议约两周前，在从莫斯科回来之后立即与加泰罗尼亚统一社会党领导人进行的讨论中，“佩德罗”谈到了为了得到两个大国的支持而将西属摩洛哥以及同样被佛朗哥将军控制的加那利群岛交给英法两国的可行性。他提出的理由是，在俄国革命期间，苏俄也不得不付出了领土的代价。⁸

西班牙共产党政治局委员、教育部长赫苏斯·埃尔南德斯在脱离共产党之后证实，“[苏联外交人民委员]李维诺夫在日内瓦以及[苏联大使]罗森堡在西班牙都曾敦促阿尔瓦雷斯·德尔巴约……就西属摩洛哥提出一些让英法两国感兴趣的‘建议’以换取两个大国对共和国的援助”。⁹另一方面，支持共产党的西班牙驻伦敦大使巴勃罗·德·阿斯卡拉特声称，这份照会是他在阿尔瓦雷斯·德尔巴约的授意下起草的。¹⁰鉴于两人的亲苏立场

以及他们与两位苏联外交官的频繁联系，这种说法与埃尔南德斯的说法没有什么实质性区别。由于西属摩洛哥在佛朗哥将军的控制之下，而且最近不断有报道称，德国正在加强直布罗陀海峡对岸的海防，¹¹所以，莫斯科肯定清楚地看到，英法两国不可能同意如此进行利益分配，在不冒突发国际冲突风险的情况下，它们也不可能接受这种分配的结果。实际上，埃尔南德斯断言，如果“有充分理由对强行改变摩洛哥现状的前景表示担忧”的英法两国“被这个诱人的建议吸引”的话，那么，“民主国家与德国和意大利的摩擦将会达到白热化，这将为实现苏联的计划创造有利条件，把两个集团推进一场远离俄国边界的战争”。¹²

182

不过，值得怀疑的是，在提出摩洛哥建议时，共和国政府的大部分成员是否了解苏联西班牙政策的深谋远虑，就连他们是否知道摩洛哥建议也值得怀疑。因达莱西奥·普列托声称，从来没有人向内阁提出过与摩洛哥有关的任何建议；他表示，如果有人提出的话，他将“反对所有支持这种不切实际的想法的措施”。他还声称，在担任内阁部长期间他从未听说过这个建议。¹³这是事实，因为，据阿斯卡拉特说，阿尔瓦雷斯·德尔巴约告诉他，只有阿萨尼亚、拉尔戈·卡瓦列罗和他知道这一份秘密照会。“暂时没有通知其他内阁成员。”阿斯卡拉特补充说。¹⁴在阿尔瓦雷斯·德尔巴约一九三七年二月七日写给西班牙驻巴黎大使路易斯·阿拉基斯塔因的一封信中，这一点得到了证实，德尔巴约还在这封信中表示，由于普列托“日益增长的悲观情绪”及其“富有煽动性的高谈阔论”，“如果外交政策的一举一动都要经过多数批准”，那就什么事情也做不成了。¹⁵

尽管是在秘密的情况下进行的，这份照会的副本仍然落到了佛朗哥将军政府的手中，¹⁶并且被全文发表在敌方的报纸上。¹⁷随后几天，照会的节选或摘要出现在英法两国的主要报纸上。“我国大使馆里有人与叛军有接触。”三月十八日德尔巴约写信告诉阿拉基斯塔因，“否则的话，无法解释他们怎么会知道照会的事，……[但是]我不介意这件事受到过分的宣传，因为它表明，我们的国际政策目的在于与西方民主国家紧密合作[并且]有助于促进集体安全与和平。”¹⁸

还有，在四月九日致阿拉基斯塔因的另一封信中，德尔巴约写道：“我们必须不惜一切代价把伦敦争取过来。……我们已经发现，除了大多

数内阁成员对我们怀有根深蒂固的敌意这一事实之外，英国政府……的愚蠢和惰性令人恼火。但是，我们必须把它争取过来。如何做到这一点？一方面，通过鼓动各个阶层的公众舆论（在这方面，拜会[访问共和派控制区的]英国教会代表团是一次无与伦比的成功）；另一方面，通过不断挑逗大英帝国天生的私欲和利己主义。”¹⁹

由阿尔瓦雷斯·德尔巴约签署的这份照会的部分内容如下：

—

1. 西班牙政府希望，就西欧而言，西班牙未来的外交政策采取与法国和联合王国积极合作的形式。

2. 为此，西班牙将愿意考虑，在符合自身利益的范围内，不仅在经济重建方面，而且在两个大国感兴趣的军事、海军和空军的关系方面进行合作。

3. 同样，西班牙将愿意与两个大国一起研究是否应当改变北非（西属摩洛哥）的现状，只要这种改变的发生对英法两国比对其他大国更有利。……

二

183

如果本着全面进行国际合作的精神所提出的这些建议的真正价值得到英法两国政府的正确评价，那么，鉴于和平事业——这等同于西方民主国家的国家利益——要求有效地达到以下目的这一事实，两国政府将因此承担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采取措施阻止意大利和德国进一步干涉西班牙事务的责任。

如果西班牙政府愿意做出的牺牲被证明不足以阻止意大利和德国继续向叛军提供人员和物资，如果共和国政府因此将不得不与两个大国援助的叛军将领继续作战，那么，除非取得胜利，鉴于其基本目的——使西班牙人民免遭更多的苦难——没有达到这一事实，本照会第一部分所提出的建议将被视为无效条款。²⁰

“这份西班牙照会为共和国希望与英法两国达成谅解提供了最确凿

的证据。”阿尔瓦雷斯·德尔巴约在内战结束之后写道，“尽管由于现实条件无法采取互助条约或者结盟的形式，但是，它的意图和目的是相同的。”²¹他在后面的一节中写道：

两国政府均不愿接受共和国的建议，²²而通过国际“泄密”将西班牙照会的内容公布于众也表明，有一只活跃的幕后黑手正在千方百计地破坏有利于西班牙政府事业的各种努力。……

尽管二月照会是一份与内战期间共和国的外交政策有关的官方声明，但是，并不能认为它代表了我们为劝说英法两国采取某种更符合他们自身利益的态度而进行的努力的限度。通过所有相关论据，通过通报意大利和德国针对两国政府采取的行动，通过提出消除意大利对马略卡岛的威胁的具体建议——通过我们所能采取的一切手段，我们全力争取使伦敦和巴黎的态度发生转变。²³

我们没有异想天开。我们并不要求军事援助。我们仅仅要求严格遵守“西班牙应当留给西班牙人”的不干涉政策——这是英法两国强加于我们的，就凭这个它也应当得到遵守；如果这两个民主国家觉得无法阻止德国和意大利继续干涉西班牙，他们就应当体面地承认其政策的失败并且重新全面确认自由贸易的权利。简言之，我们要求国际法得到应有的尊重。

英法两国对我们的警告、建议和要求置之不理的做法实在令人心碎。²⁴

184

尽管这些情况令人失望，苏联仍然继续支持反佛朗哥阵营的抵抗行动，它坚信，英法两国不可能允许一个附庸于意大利和德国的西班牙存在，为了保护自身的利益，它们迟早将会被迫干预，从而在德国来得及为东欧的战争做准备之前削弱或者消灭它的军事力量。

“[莫斯科]将千方百计地避免自己被孤立，”共产国际代表鲍里斯·斯特凡诺夫断言，“如果除了战争之外没有其他出路的话，那就努力迫使西方民主国家与希特勒打仗。”²⁵

“我们希望[民主国家]帮助我们并且相信它们将以这种方式保护它们自

身的利益。”西班牙共产党总书记何塞·迪亚斯宣称，“我们努力使它们认识到这一点进而争取它们的帮助。……我们非常清楚，法西斯侵略者在每个国家都能找到支持他们的资产阶级群体，例如英国的保守党人和法国的右派分子，但是，法西斯侵略正以飞快的速度进行，因此，必须使希望其国家自由独立的所有人相信，勇敢面对这种侵略是国家利益的需要，例如，在一个像法国这样的国家里。如今，除了向西班牙人民提供具体的帮助之外，没有什么办法可以更有效地做到这一点。”²⁶

“莫斯科试图使法国和英国认识到它们应当为它们自己做的事情。”内战最后两年的政府总理胡安·内格林在内战结束之后说，“苏联援助西班牙共和国的希望是，巴黎和伦敦最终将会意识到意大利和德国在西班牙的胜利给它们所带来的危险，从而与苏联一起支持我们。”²⁷

不过，英法两国都不想冒爆发一场欧洲战争的风险，甚至不想因为在西班牙向德国挑战而削弱了纳粹政权。德国的干涉可能确实意味着未来对于英法两国的地中海利益以及对于法国南部边境的威胁，但是，这应当不影响通过在东方对德国姑息让步并且把它当作一支对抗苏联的力量以保证西欧和平的长期战略。

一九三七年五月，内维尔·张伯伦接替斯坦利·鲍德温担任英国首相大大加强了绥靖主义支持者的力量。当然，鲍德温支持绥靖主义并且赞成与德国达成政治和解，但是，他不是一个实干家。正如伯肯黑德伯爵所证实的那样，他喜欢“梦想和顺乎自然，希望问题以某种方式自行解决”。²⁸另一方面，据伯肯黑德说，张伯伦的“卓越天资并不是这个特定的历史时刻所需要的”，他“在各个方面都是一个实干家”、“一个高层管理者和一个不妥协的熟练、严谨的辩论家”，带有些许“冷酷无情，让人想起他父亲约瑟夫·张伯伦的许多事情以及某种专制倾向，这种倾向使他对内阁实行铁腕控制”。伯肯黑德还说，张伯伦关于协商之公平基础的概念是，“应当告诉德国人，只要他们通过和平的手段，我们不会使用武力反对他们在奥地利和捷克斯洛伐克达到目的”。²⁹

“通过和平的手段”这一先决条件是张伯伦政策的基本要素，因为，尽管张伯伦及其支持者已经容许德国通过吞并捷克斯洛伐克在东欧取得支配地位，他们甚至——如同我们将在后面某一章里所看到的那样——放弃

了一九三九年三月三十一日英国向波兰做出的军事保证，但他们知道，如果希特勒打算使用武力达到目的，英国很可能因为议会中的反对派和新闻界的压力以及法国与中欧和东欧的纠葛卷入一场西欧的战争。由于这些原因，苏联边境以西的任何领土改变“只能通过谈判的方式和英国政策的逐步修正”来实现。³⁰

至于张伯伦在其绥靖战略中对于苏联命运的预见，公开的英国文件中没有证据证明他试图在两个极权国家之间挑起一场军事冲突。我们也不能指望任何详细阐述张伯伦策略的官方文件；因为，正如一位英国历史学家在一份关于英国政策制定的一般性声明中注意到的那样，“决定经常是在没有记录的情况下做出的，在议会那间哥特风格的首相办公室里，在圣詹姆斯公园散步时，在伦敦西区的某个俱乐部或者某个乡间别墅里”³¹——而且我们应当加上，在唐宁街十号霍勒斯·威尔逊爵士那间私密的办公室里。³²

尽管包括二战之前那些年的文件资料在内的英国档案已经根据一九六七年的公共档案法公布于众，但是，根本不可能发现任何可以具体证明关于东欧的宏观战略的内阁文件、备忘录或会议记录，因为这个具有争议的政治问题只能由张伯伦信任的同事私下讨论。实际上，迄今为止所公布的内阁档案没有提供任何与讨论这个问题有关的蛛丝马迹。此外，即使英国政策的明确目的写成了文字，那也应当记住，大法官^①——负责所有政府文件的内阁官员——的自由裁量权可以以安全为由把某些文件从“可供历史学家使用”变成“一百年或者实际上永远”³³限制使用的资料。如同我们将在后面某一章里所看到的那样，用英国历史学家A.J.P.泰勒的话说就是，这种自由裁量权也许解释了张伯伦向德国提出的关于波兰的秘密建议为什么“并不令人意外地……从英国档案中消失了”，³⁴以及在编辑成册的英国外交政策文件中为什么“信件极少，会议记录甚至更少”。³⁵它还可能解释了内维尔·张伯伦发给阿道夫·希特勒的一些“秘密电报”为什么像英国历史学家戴维·欧文所说的那样没有在编辑成册的官方文件中公布。³⁶

但是，即使可能永远无法找到张伯伦策略的文件证据，仍然不乏证

① 大法官（lord chancellor）为英国内阁成员之一，是英国司法系统首脑和内阁法律总顾问，同时兼任上院议长和掌玺大臣。

据证明，他认为苏联是对英国利益的主要威胁，因而对苏联的目的持根深蒂固的怀疑态度。据英国历史学家基思·米德尔马斯说，他在私人日记中“对法西斯主义与共产主义意识形态之间发生冲突的可能性”表现出某种“乐天主义，而对协商解决东欧安全则漠不关心”。³⁷这并不让人感到意外。多年以后，曾任张伯伦议会私人秘书并且是其政策支持者的道格拉斯-霍姆勋爵（当时称为邓格拉斯勋爵）也许比任何英国历史学家都更清楚地揭示了绥靖主义的根源：“我认为最重要的原因是，像别的许多人一样，张伯伦把共产主义视为主要的长期威胁。他憎恶希特勒和德国的法西斯主义，但他觉得，欧洲普遍面临来自共产主义的更大威胁，尤其是英国。希特勒是一个坏人，但在短期之内人们应当——而且可能——与他打交道，然后可以控制他。”³⁸至于张伯伦对苏联的不信任感，读者将会想起他怀疑这些“极端分子最想看到的是‘资本主义’国家相互厮杀两败俱伤，而他们则袖手旁观坐收渔利”。他的传记作者基思·费林指出，他怀疑“[苏联]动机的纯洁性”，“西班牙加深了这种怀疑”，苏联不会因为看到西方大国与德国卷入一场致命的战争而哭泣。³⁹张伯伦在一九三八年三月二十日写给一个妹妹的信中说，俄国人“狡猾地躲在幕后费尽心机想使我们卷入一场与德国的战争”。⁴⁰在另一封家信中，他写道：“我必须承认对苏联具有根深蒂固的不信任感。……我怀疑它的动机，在我看来，它的动机与我们的自由思想几乎没有关系，它只关心别人听到它说什么没有。”⁴¹

在评价从一九三三年阿道夫·希特勒政权上台到一九三九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这一时期的英国外交政策时，必须了解存在于政治精英当中的对苏联的怀疑和担忧，这种怀疑和担忧因西班牙的革命形势而加剧。如果我们像许多关于这一时期的历史著作、回忆录和传记那样忽视甚至低估这种怀疑和担忧，那么，英国对德国的重新武装及其在中欧和东欧谋求霸权的默许就会变得难以理解，执行英国外交政策的政治家似乎也变成了完全不懂欧洲事务的天真幼稚、容易上当受骗的蠢货。的确，在英国历史学家A.L.罗斯看来，张伯伦是一个“自负的老笨蛋”，他“使用的全部都是相当愚蠢的商人的方法”。⁴²

几乎同样误导读者的是伯肯黑德伯爵的判断：“张伯伦对世界的认知浅薄粗略，他的政治职业素养也不足以使他在[一九三七年担任首相的]

六十八岁时理解比较重大的外交政策问题，这是他的不幸，同时也是国家的不幸。”⁴³著名国际史教授W.N.梅德利科特否认张伯伦具有这些特征，他写道：“张伯伦先生认真研究外交政策多年，在这些与重整军备、制裁和援助有关的领域，他对内阁的决定具有强大的影响力。”⁴⁴此外，这些特征也与温斯顿·丘吉尔——这绝不是一位友好的见证人——所描述的张伯伦的“坚韧的毅力”、“缜密的思维”和“非凡的智慧”不相符。⁴⁵最重要的是，使人对张伯伦的能力产生误解的那些评价忽视了这样一个事实：张伯伦的两名关系最密切的支持者塞缪尔·霍尔爵士和约翰·西蒙爵士是具有丰富欧洲事务经验的前外交大臣。无法相信这三个人——他们与从一九三八年开始担任外交大臣的哈利法克斯勋爵一起组成了“内阁决策委员会”，该委员会把整个内阁排除在关于外交政策的“重大决定”之外⁴⁶——没有制订保护英国利益的战略并且不清楚他们容忍德国在东欧达到目的最终将导致什么后果。同样无法相信的是，英法两国所有支持对德国采取绥靖政策的政界人士都是天真幼稚的人，一点也不知道在德国成为东欧的统治力量并且与苏联确定了共同边界之后将会发生什么事情。

人们从公开发表的声明中，从迄今为止所公布的曾经是机密或者绝密的官方文件中，从外交官、政治家和政府官员的日记和自传中艰难地搜集各种各样的零星证据，在像本书作者在本章以及其他章节所做的那样把它们组合成为某种容易理解、符合逻辑的形式之后，所有证据均毫无疑问地证明，英法两国的强势集团希望利用德国作为一支抗衡苏联的力量，通过支持德国在东欧谋求霸权以抵御共产主义的威胁，从而使西方免受战争与革命的祸害。如此众多的英国历史学家忽视绥靖政策这一最重要的组成部分的原因将在本书后面进行讨论。

于是，英法两国强势集团对于西班牙内战的态度不仅是由他们对革命性变化——尽管有人竭力将这些变化隐藏在“民主共和国”的外表后面，他们仍然对其了如指掌——的敌意所决定，而且是由全方位的国际政治所决定。因此，主要是在听命于莫斯科的共产党人敦促之下组成的相继几届西班牙政府所进行的任何掩饰以及游说的努力，甚至约束革命的努力，都不可能改变英法两国对西班牙内战的政策。关于这一点，如何强调也不过分。

然而，尽管偶尔也被种种质疑所困扰，西班牙共产党领导人仍然坚

决执行克里姆林宫的命令，没有表现出任何明显的犹豫不决，即使这些命令意味着将不可避免地引起其他左翼党派的反感并将最终损害战争努力和斗争意志。“我们这些‘领导’西班牙共产党人所充当的更像是苏联的臣民而不是西班牙人民的儿子。”赫苏斯·埃尔南德斯在被开除出党几年后所发表的一次讲话中说，“这看上去似乎荒谬绝伦不可思议，但是，我们接受的苏联训练把我们异化到这种程度，以致完全不像西班牙人了；我们民族的灵魂出离了我们，被一种具有沙文主义征的狂热的国际主义所取代，它产生于克里姆林宫的城楼，最后消失在那里。”⁴⁷

不过，西班牙共产党领导人未必知道克里姆林宫向反佛朗哥地区提供援助纯粹出于实用主义目的。通常被称为“农夫”的共产党民兵部队指挥官巴伦廷·冈萨雷斯内战期间风头十足，是个具有几分个人魅力的人物，他写道：“我真诚地相信克里姆林宫向我们提供武器并给我们派来军事顾问和政治顾问以及它所控制的国际纵队证明了它与我们的革命团结。……后来我才意识到，克里姆林宫并不是为人民服务，而是利用人民为它自己的利益服务；它以无人能比的背叛和伪善把各国工人阶级当作其政治策略的筹码；它企图以世界革命的名义巩固其反革命的极权主义政权并为统治世界做准备。”⁴⁸

注释：

- 1 戴维斯一九三七年二月六日致美国国务院的信，见约瑟夫·E.戴维斯《出使莫斯科》，第57—60页。另请参阅戴维斯一九三七年二月十九日的信，同上，第77—79页。
- 2 西班牙内战结束后，在其发表的一篇关于意大利对佛朗哥将军的援助的坦率报道中，意大利国防部的官方喉舌《武装力量》（一九三九年六月八日）披露，在一九三六年十二月中旬至一九三七年四月中旬期间，意大利海军向西班牙运送了十万人，另外还有四千三百七十辆汽车、四万吨战争物资和七百五十门大炮。这份刊物还披露，意大利军舰被用来为意大利驶往西班牙港口的运输船只护航，而且还参加了针对共和派舰队及其所控制的沿海地区的海军行动，这种行动也针对向共和派控制的港口运送货物的船只，许多船只被击沉。关于一篇对内战初期德国干涉行动同样坦率的报道，见一九三九年五月德国最高统帅部发行的题为《我们在西班牙作战》的《国防军》特刊。关于攻击商船的更多情况，见东欧基金会苏联课题研究组的《西班牙内战中的苏联船只》，油印丛刊，第59册。
- 3 见一九三七年一月十三日《每日先驱报》关于工党呼吁劳工运动“建立本阶层内部的团结而不要与和党的目标不一致的组织联合”的报道。另请参阅英国共产党书记哈里·波利特

- 发表在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号《左派评论》上的文章。
- 4 加泰罗尼亚统一社会党中央委员会米格尔·塞拉·帕米埃斯一九四四年在墨西哥接受我的采访时这么说。
 - 5 一九三七年一月三十一日《每日图片报》。
 - 6 一九三七年二月二日《劳动报》。
 - 7 在通过马德里国家历史档案馆取得的西班牙驻巴黎大使路易斯·阿拉基斯塔因的私人文件中，有两封阿尔瓦雷斯·德尔巴约寄来的信提到了关于西属摩洛哥的建议，日期分别是一九三七年一月三十一日和二月七日（阿拉基斯塔因文件集，卷宗76/146和卷宗23/A112^a）。德尔巴约在第一封信中写道，如果英国对在巴利阿里群岛设立海军基地感兴趣的话，“我们应当共同协商建造这种基地”。不过，如同随后将会看到的那样，发给伦敦和巴黎的正式照会并没有提到海军基地而只提到转让西属摩洛哥。在同一封信中，德尔巴约强调说，把西属摩洛哥交给英国和法国的好处超过了阿拉基斯塔因所赞成的一项计划，该计划建议通过提供贷款使德国“保持中立”，贷款“主要用西班牙的钱”，在德尔巴约看来，这项计划“就像把钱扔进大海一样”。在一九三七年一月十二日的一份报告中，阿拉基斯塔因简要介绍了他的计划（阿拉基斯塔因文件集，卷宗76/119），接着，在一九三七年三月九日写给拉尔戈·卡瓦列罗的一封信中，他进一步论述了这项计划（同上，卷宗76/118）。
 - 8 感谢米格尔·塞拉·帕米埃斯使我了解到这一情况。
 - 9 赫苏斯·埃尔南德斯，《我是一个斯大林的部长》，第75页。
 - 10 巴勃罗·德·阿斯卡拉特，《我在西班牙内战期间的伦敦大使生涯》，第73页。关于这份照会的全文，见阿斯卡拉特《我在西班牙内战期间的伦敦大使生涯》，第266—268页。德尔巴约一九三七年一月三十一日写给路易斯·阿拉基斯塔因的一封信清楚地表明，德尔巴约和阿斯卡拉特均参与了这份照会的起草（阿拉基斯塔因文件集，卷宗76/146）。
 - 11 实例见一九三七年一月十一日伦敦《每日电讯报》和巴黎《时报》。
 - 12 埃尔南德斯，《我是一个斯大林的部长》，第75—76页。
 - 13 因达莱西奥·普列托，《西班牙的动乱》，第二卷，第92页。
 - 14 阿斯卡拉特，《我在西班牙内战期间的伦敦大使生涯》，第74页，注释4。
 - 15 阿拉基斯塔因文件集，卷宗23/A112^a。
 - 16 见一九三七年四月十二日《泰晤士报》。
 - 17 一九三七年三月十七日萨拉曼卡《前进报》。
 - 18 阿拉基斯塔因文件集，卷宗76/152。
 - 19 同上，卷宗23/A112^a。
 - 20 一九三七年三月十七日萨拉曼卡《前进报》。
 - 21 胡利奥·阿尔瓦雷斯·德尔巴约，《自由之战》，第235页。
 - 22 关于英法两国的答复，见一九三七年四月二十二日《泰晤士报》和阿斯卡拉特的《我在西班牙内战期间的伦敦大使生涯》，第74—75页。“与克里姆林宫那些‘战略家’的预测相反，”前西共政治局委员赫苏斯·埃尔南德斯写道，“法国和英国都没有上钩。”（埃尔南德斯，《我是一个斯大林的部长》，第76页）
 - 23 “慕尼黑会议以后，当英国政府显然决定严格遵循已因前一年四月签订的英意协定而形成的与罗马友好的政策时，”阿尔瓦雷斯·德尔巴约写道，“尽管坚决反对意大利对西班牙的干涉，西班牙政府仍然毫不犹豫地明确通知英国政府，如果英国能够结束意大利的干涉，西班牙共和国的胜利和巩固将不妨碍奉行任何与意大利在地中海合作的政策。他们甚至还宣称，他们愿意在尊重各自国家领土完整和政治独立的正常基础上与意大利合作。我亲自将这一声明传达给了在巴塞罗那的法国代办富克·迪帕克先生，英国政府对它同样置之不理。”（阿尔瓦雷斯·德尔巴约，《自由之战》，第255页）

- 24 同上，第238—239页。
- 25 引自埃尔南德斯《我是一个斯大林的部长》，第159页。
- 26 一九三八年三月三十日《红色阵线报》，另见何塞·迪亚斯《斗争的三年》，第559页。
- 27 一九三九年五月在纽约向外交关系委员会发表的演说，见阿尔瓦雷斯·德尔巴约《自由之战》，第76页。
- 28 伯肯黑德伯爵，《哈利法克斯勋爵传》，第362页。一九三五年，时任鲍德温内阁财政大臣的张伯伦在日记中作了如下批注：“我正在越来越多地承担这个政府的责任。首相病弱疲劳……因此不能集中精力解决问题。肯定是发生变化的时候了。”（基思·费林，《内维尔·张伯伦传》，第242页）
- 29 伯肯黑德伯爵，《哈利法克斯勋爵传》，第362和375页。在一九三七年十一月所写的一封信中，张伯伦表示：“我不知道为什么我们不应该对德国人说——‘向我们充分保证你们不会使用武力对待奥地利人和捷克斯洛伐克人，我们也将向你们作出同样的保证：只要你们能够通过和平手段达到目的，我们不会使用武力阻止你们所希望的改变。’”（见伊恩·科尔文《任职于政府的范西塔特：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起因》，第156页）
- 30 见德国驻伦敦大使赫伯特·冯·迪克森所写的备忘录，本书将在第六十一章中引述。
- 31 科尔文，《任职于政府的范西塔特》，第12页。
- 32 英国历史学家查尔斯·洛赫·莫厄特写道：“张伯伦严重依赖他，在自己的办公室旁边给了他一间办公室，而且在三年的时间里，每天与他一起去公园散步。”（查尔斯·洛赫·莫厄特，《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英国，1918—1940》，第598页和注释4）
- 33 伊恩·科尔文，《张伯伦内阁》，第9页。在《一九一四年以来的英国》一书关于英国内阁档案的一章里，查尔斯·洛赫·莫厄特指出，历史学家的困难之一是“文件消失造成的”，消失的文件包括“希特勒和内维尔·张伯伦在慕尼黑协定签订当晚签署的友好声明”。“这并不意味着移交到公共档案馆并且符合三十年规定的文件必然会对研究开放；”他接着写道，“任何与‘敏感’问题有关的文件可能封闭五十年、七十年甚至一百年。”（查尔斯·洛赫·莫厄特，《一九一四年以来的英国》，第76页）着重体是我加的。
- 34 A.J.P.泰勒，《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起因》，第244页。
- 35 A.J.P.泰勒，《一九一四至一九四五年英国史》，第627页。
- 36 戴维·欧文，《战争之路：希特勒的德国，1933—1939》，第156和191页。该书还有对被缴获的里宾特洛甫与英国要人会谈的谈话记录消失不见的描述，见第56页。这部引起争议的著作是在一千五百页资料笔记（见序言，第xiii页）的基础上并且利用以前的历史学家未曾利用过的原始资料（见序言，第ix-xviii页）进行的非凡研究的成果。禁止公众查阅与温莎公爵（前英国国王爱德华八世）——其亲德观点被人们作了翔实的描述（实例见弗朗西丝·唐纳森所著《爱德华八世》）——有关的所有文件的事实进一步妨碍了对绥靖主义时期的深入研究。造成这一事实的原因是，盟军最高司令德怀特·D.艾森豪威尔将军一九四五年决定与英国人合作，命令他的情报负责人埃德温·L.赛伯特少将把在美军缴获的档案中关于温莎公爵的文件所有交给他。根据赛伯特本人的证词，他后来交出了在德国外交部长冯·里宾特洛甫家里发现的一部分文件，结果，这些文件“或者被销毁了，或者不知藏在了何处”（安东尼·C.凯夫·布朗和查尔斯·B.麦克唐纳，《关于一个红色领域：共产国际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来临》，第554页）。据欧文说，“里宾特洛甫在温莎公爵身上发现了‘某种类似于一个英国国家社会主义者的东西’。令人遗憾的是，他们会谈的记录从缴获的档案中消失了。”（欧文，《战争之路》，第59页）值得注意的是，当英美两国的代表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即将结束时商谈如何对待被俘的纳粹领导人时，丘吉尔战时内阁的大法官、前张伯伦内阁决策委员会成员约翰·西蒙爵士坚决主张简单处理，反对进行全面的审判。他认为，全面的审判将会产生无休止的辩论并且打

开一个法律和政治问题的潘多拉盒子，“引起我们难以预测的反应”（布拉德利·F.史密斯，《通向纽伦堡之路》，第179页）。与英国主张有关的其他内容，见史密斯《通向纽伦堡之路》，第45—46、64、171—175、178—179、185—188、192—193和219页。据史密斯记述，在英美进行协商期间，约翰·西蒙爵士曾经出示过一份文件，这份文件以下面这段话结尾：“如果在希特勒被捕时向他出示一份记录着其罪行的文件将是‘非常必要的’，只要这被理解为不会进行以这份文件为基础的听证或审判。”（同上，第197页）人们从史密斯这部不同凡响的著作中必然得出的结论是，如果不是美国陆军部长亨利·L.史汀生和副部长约翰·J.麦克罗伊的坚持，可能根本不会有纽伦堡审判。英国反对进行审判、赞成简单处理的主张在亨利·L.史汀生和麦乔治·邦迪所著《在和平和战争中服役》一书中得到证实：“让史汀生深感意外的是，对法律审判的反对主要来自英国，它一直极力主张代之以直接军事处决。但是，由于法国和苏联的坚定支持，美国的意见占了上风，结果，一九四五年八月在伦敦签订了一份四国协议，特别批准当年十一月成立设在纽伦堡的国际法庭。”（第587页）尽管如此，如同没有揭示苏联外交政策针对西方的策略一样，纽伦堡审判也没有澄清英国战前的外交政策。“由于检察官团队选择当庭出示的证据的方法，由于随后公布的印刷工整、编制了索引的经过筛选的文件集，由于在巴伐利亚森林的一个大坑里烧毁了被认为可能破坏盟国起诉效果的一些文件，”戴维·欧文写道，“一九四五年以来的历史深受纽伦堡审判的影响。选择当庭出示的证据与其说是因为它们代表性，不如说是因为它们显示了轴心国的犯罪。”（《战争之路》，第xi页）英国历史学家A.J.P.泰勒持有类似的观点：“文件的选择不仅是为了证明受到审判的那些人的战争罪行，而且是为了掩盖起诉他们的那些国家的战争罪行。如果组成纽伦堡法庭的四个大国中的任何一个单独处理这件事的话，它将更广泛地揭露罪行。西方国家将会指控纳粹—苏联条约；苏联则将用慕尼黑会议以及更多暗中的交易以牙还牙。”（《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起因》，第13页）关于这一时期可以利用的档案文件多么不完整以及这种不足给历史学家带来的烦恼见T.德斯蒙德·威廉斯的文章，收入埃斯蒙德·M.罗伯逊所编《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起因》，第37—64页。

37 基思·米德尔马斯，《外交幻觉》，第54页。

38 一九六二年九月十六日《观察家报》（《外交大臣坦言》）

39 费林，《内维尔·张伯伦传》，第325页。

40 同上，第347页。

41 同上，第403页。另请参阅张伯伦的核心集团成员塞缪尔·霍尔爵士（坦普尔伍德子爵）所著《纷乱的九年》，第342—343页。

42 A.L.罗斯，《绥靖主义》，第83和63页。尽管没有揭示绥靖主义的主要动力，美国历史学家威廉·R.罗克仍然对内维尔·张伯伦作了某种更为可观的描述：“出生于一个显赫的政治世家，他曾经在伯明翰经商，一九一八年当选议员之前，他在英国中部地区的实业家中获得很高的地位并且担任各种公职，其中包括伯明翰市市长。（一九二二年）他作为邮政总局局长首次进入内阁，后来作为卫生大臣（一九二四至一九二九年）取得了杰出的成就并在经济形势严峻的时期作为财政大臣（一九三一至一九三七年）显示出才干。他用工作效率、管理能力、献身精神以及愿意接受别人避之唯恐不及的任务弥补了他在想象力和个人魅力方面的不足。他的兴趣和能力主要集中于国内政治（社会、经济、卫生和福利问题）；作为首相，他几乎完全不关注外交政策，这是历史的吊诡之处。他肯定不像某些人所认为的那样对外交事务孤陋寡闻，但是，他对外交形势并没有真正‘身临其境’，不是总能理解外交政策问题的全部含义而且过于依赖自己的判断。”（威廉·R.罗克，《二十世纪三十年代英国的绥靖主义》，第55—56页）

43 伯肯黑德伯爵，《哈利法克斯勋爵传》，第363页。甚至因反对导致肢解捷克斯洛伐克的慕尼黑协定而从张伯伦内阁辞职的达夫·库珀（后来的诺里奇子爵）也没有看清张伯伦的

策略，他把绥靖主义的整个问题归结为荒唐：“张伯伦具有许多优良的品质，但他缺乏世界的经验，同时他还缺乏可以弥补经验不足这一缺陷的想象力。他从来没有进入过政治或者金融的广阔世界[可他在成为首相之前担任过六年财政大臣！]，对于他来说，欧洲大陆是一本没有打开的书。他曾经是一位成功的伯明翰市市长，在他看来，德国和意大利的独裁者就像利物浦和曼彻斯特的市长一样，他们可能属于不同的政党因而具有不同的兴趣，但是，他们肯定希望造福于人类，而且肯定像他本人一样，基本上是讲道理的正派人。这种根本性的错觉形成了其政策的根源并且解释了其错误的原因。”（《老者释怀：达夫·库珀自传》，第200页。着重体是我加的），英国历史学家基思·米德尔马斯也许写出了关于张伯伦政府活动的最佳研究著作，但是并未直接触及绥靖主义真正的实质，他不同意把张伯伦首相说成一个拙劣的政治家，认为这种描述站不住脚：“他决不是用从伯明翰市政厅带来的短浅目光看待外交事务的，在众多诋毁者中，劳合·乔治以嘲笑这种目光为乐。”在后面的一段内容中，米德尔马斯写道：“把张伯伦描绘成一个没用的笨蛋、像绵羊一样在奸诈的第三帝国领导人中间坐立不安是错误的。他习惯于直接讨价还价，在过去，在英国国内政治事务中，他表现得像二十世纪任何保守党领导人一样强硬和冷酷。不幸的是，他以前仅有的外交谈判经验应当是一九三二年在洛桑相对温和的气氛中取得的，在那里，让步似乎是明智之举。”（《外交幻觉》，第47和339页）

- 44 《英国外交政策文件，1919—1939》序言，第二辑，第十八卷，第ix页。着重体是我加的。
- 45 告别辞，载一九四〇年十一月十二日《议会议事录》，收入罗伯特·罗兹·詹姆斯所编《温斯顿·S.丘吉尔演讲全集，1897—1963》，第六卷，第6307页。关于张伯伦的最客观的描述也许出自法国历史学家弗朗索瓦·贝达里达笔下：“尽管[一九四〇年时]年已七十一岁，他仍然轻松地承担着许多工作和责任，处理文件、参加会议和议会辩论，对自身使命的某种永恒的信念支持着他。他并非没有虚荣心，通常表现得自信甚至傲慢，这种自信不仅在与法国人打交道时非常明显，而且妨碍了他对自己同胞的判断。……他神秘、专横、高效。所有这些解释了他对内阁的支配地位。……另外，除了依靠长期从政的经验之外，他还可以依靠自己卓越的能力：清晰的阐述，清醒的判断和严密的逻辑性。在最高军事会议的会议[盟国最高军事会议一九三九年九月十二日至一九四〇年四月二十七日之间举行的会议]记录中，这些优良的品质历历在目。在这些会议上，我们看到的是一个完全不同的辩论家，一个敏锐、精明、有时甚至是狡猾的质问者。”（弗朗索瓦·贝达里达，《离奇战争的秘密战略》，第66—67页）
- 46 米德尔马斯，《外交幻觉》，第60—61和65页。
- 47 见一九五二年一月十五日《社会主义行动报》。关于埃尔南德斯一九四四年被开除出党的情况，见其本人所著《在这个充满谎言的国家里》，第215—227页。
- 48 一九五一年三月十一日（巴黎）《工人团结报》。共产党人及其支持者声称，“农夫”的文章和几本书都是由内战时期反斯大林的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POUM）领导人之一胡利安·戈尔金代写的。这的确是事实。“农夫”实际上是个文盲，无法书面表达他的想法和感受。内战结束以后，“农夫”躲在苏联避难，十年后他从那里逃走时，幻想完全破灭了。见“农夫”的《在苏联的生与死，1939—1949》，该书由戈尔金根据“农夫”从苏联逃出之后的口述撰写（见戈尔金一九八四年十月十八日写给我的信，这封信现存胡佛研究所）。其重要性在于，它记录了内战期间“农夫”在执行共产党的政策时所实施的众所周知的暴行（实例见何塞·加西亚·普拉达斯发表在一九四六年五月五日《无产阶级文化报》上的文章）。



第三部分

抑制革命

无政府主义哲学与政府

从内战刚一爆发起，共产党人就在努力争取获得英法两国的支持并且确保它们继续承认最初的希拉尔政府和后来的拉尔戈·卡瓦列罗政府是合法政府，对于革命的进程来说，这种努力肯定具有重要的影响。如果想使这种努力对英法两国产生哪怕是极其微弱的作用，西班牙政府就得修复遭到破坏的国家机器，不是根据革命的方针新建，而是按照灭亡的共和国的形象复原。此外，如果卡瓦列罗政府还是一个实质性的政府而不是徒有其名的话，它就必须夺回内战初期被革命委员会夺走的对所有国家权力部门的控制权。¹全体内阁成员在这个问题上意见一致，而且几乎可以肯定，他们这样做完全不必顾虑对于外国舆论的影响。

但是，在极端革命派不加入政府的情况下，无法完成恢复国家权力的工作，或者说，至少完成起来非常困难。极端革命派指的是强大的无政府工团主义运动，它也经常被人们称为自由主义运动，其代表是全国劳工联合会及其意识形态向导伊比利亚无政府主义者联盟，前者以无政府主义为指导思想，后者的任务是保护前者免受偏离无政府主义的思想倾向的影响，²同时引导工会组织把自由共产主义作为无政府主义者的奋斗目标。伊比利亚无政府主义者联盟作为一个秘密组织成立于一九二七年，由分散

在全国各地的无政府主义小组组成，它最初的目的是帮助进行反对米格尔·普里莫·德·里维拉的军事独裁（1923—1930）的斗争，因为成立于一九一〇年³并被普里莫取缔的全国劳工联合会当时实际上已失去了功能。塞萨尔·M.洛伦索写道：

只是在一九二九年初，当全国劳工联合会部分重组时，[伊比利亚无政府主义者联盟]才开始变得有名了。……它在平均十人左右的独立小组[小组成员在同一个地方工作或者居住的所谓“爱好”小组，与共产党基层组织的情况一样]的基础上非常松散地组织起来，有一个半岛委员会……作为联络机构。……伊比利亚无政府主义者联盟的真正凝聚力来自其成员在意识形态方面的不妥协态度，他们是权力、等级、政治、国家、法律和妥协的凶猛敌人。这些“伊比利亚无政府主义者”用他们的激进主义、极端表达方式、无休止的批评指责以及不断预言明天就将爆发社会革命征服了全国劳工联合会。……应当予以强调的是，伊比利亚无政府主义者联盟实际上只是全国劳工联合会的一个发展迅猛的派别；它不是一股诸如共产党——尽管其渗透的努力没有立即取得成效——之类的企图控制全国劳工联合会的外来势力，而是一种附带的结果，是全国劳工联合会自身发展的一种产物，由已在工会内部组织起来的激进分子所组成。伊比利亚无政府主义者联盟真正的活动中心是自由主义运动的摇篮和曾经汹涌澎湃的地方加泰罗尼亚。不久之前，它成为全国劳工联合会内部的“国中之国”。⁴

192

“明显而且毫无疑问的是，”全国劳工联合会和伊比利亚无政府主义者联盟的重要成员费德丽卡·蒙特塞尼在内战结束多年以后写道，“全国劳工联合会由最忠诚和最有活力的无政府主义者所创建，正是因为这种活力和忠诚，它把工人阶级吸引了过来。……同时，人们不应忘记的另外一件事情是，如果全国劳工联合会在各种情况下都没有使自己被其他政治组织所控制，那正是因为……工会队伍中的那些[无政府主义]同志们的时刻警惕和不懈努力。就这样，在俄国革命之后的那个时期，它防止了马克思主义者的大量涌入。”⁵

伊比利亚无政府主义者联盟试图凭借以下事实完成它的指导任务：其成员几乎毫无例外地属于全国劳工联合会并且担任着诸多重要的职务。属于某个政党的个人不应当在工会组织中担任任何正式职务，这是一个公认的原则。⁶此外，伊比利亚无政府主义者联盟对全国劳工联合会下属的工会始终进行着严密的监督，在争论失败之后经常威胁要用武力反对偏离无政府主义的思想倾向。当然，全国劳工联合会和伊比利亚无政府主义者联盟并不总是公开承认伊比利亚无政府主义者联盟的这种控制——或者至少是试图控制，实际上，有时它们对此坚决予以否认，⁷但是，内战结束以后，全国劳工联合会的其他领导人坦率地承认了这一点。⁸不过，确如自由主义历史学家何塞·佩拉特斯所指出的那样，尽管伊比利亚无政府主义者联盟对全国劳工联合会施加了极大的影响——“密切注意那些不是伊比利亚无政府主义者联盟成员的全国劳工联合会领导人的异端邪说”——全国劳工联合会反过来也对伊比利亚无政府主义者联盟施加了有力的影响。⁹不过，佩拉特斯关于伊比利亚无政府主义者联盟“实际上”受全国劳工联合会指挥的说法与其他人的说法大相径庭。¹⁰

尽管内阁在从外国舆论的角度看允许自由主义者加入政府是否明智这一点上存在意见分歧，¹¹但是，此举的好处却是毋庸置疑的：这可以使他们为政府的措施分担责任。“全国劳工联合会的代表进入现在的内阁肯定将给国家管理部门带来新的活力和威信，”拉尔戈·卡瓦列罗的喉舌《光明报》一九三六年十月二十五日写道，“因为相当一部分政府目前没有考虑到的工人阶级将会受到它的措施和权力的约束。”但是，无政府工团主义者愿意担任中央政府的部长并且参与国家的重建吗？这是值得怀疑的，尽管不久以前他们违反古老的原则加入了加泰罗尼亚地区自治政府。

坚决反对国家的自由主义者——他们认为国家是“人压迫人的权力的最高表现形式，奴役人民的最有力工具”¹²——同样反对无论是左派还是右派的所有政府，包括在俄国革命初期消灭了无政府主义运动的苏联政府。内战爆发两周前，伊比利亚无政府主义者联盟的喉舌《土地与自由》写道：“苏联政府的整个官方辩证法抹杀不了与俄国的实验有关的一个明显的事实：国家的路线就是反革命路线。我们始终坚持认为事实如此，而且，对俄国最近十九年发展过程的研究为我们这一观点的正确性提供了

最有说服力的证明。相应地，随着苏维埃国家变得越来越强大，革命在法令、官僚、镇压机器和税收的无情限制之下夭折了。革命是人民的事情，是大众的创造；反革命是国家的事情。它过去一直如此，今后也将永远如此，无论是在俄国、西班牙还是在中国。”¹³

内战结束以后，一位前西班牙共产党领导人写道：“苏维埃国家的演变、无政府主义在其统治下的命运以及苏联的工会堕落成为一个纯粹的官僚附庸对于坚定广大西班牙无政府工团主义者、特别是其领导干部疏离政治、反对国家的观点起了重要作用。”¹⁴

无政府主义反对所有形式的政府的观点在十九世纪后半叶巴枯宁与卡尔·马克思的论战中得到了强烈的表达。巴枯宁是伟大的俄国无政府主义者，他的著作对西班牙的工人运动产生了广泛的影响。用巴枯宁的话说，马克思提出的“人民政府”只是享有特权的少数人对大多数劳动群众的统治。“但是，马克思主义者坚持认为，这个少数将由工人所组成。是的，我想是由以前的工人所组成，只不过他们立即变成了统治者和人民的代表，他们不再是无产阶级，而且将要从他们占据的政治制高点上俯视所有工人群众。他们不再代表人民；他们代表的只是他们自己。……对此表示怀疑的人肯定完全不了解人性。”¹⁵另外，对西班牙自由主义运动产生过明显影响的意大利无政府主义者埃里科·马拉泰斯塔阐述道：“所有政府主要关心的是确保自己继续掌权，不论组成政府的是什么人。如果他们是恶人坏蛋，那么，他们继续掌权为的是使自己发财致富并且满足他们对于权力的欲望；如果他们是正人君子，那么，他们相信为了人民的利益继续掌权是他们的责任。……只要不是自相矛盾并且否定其所有信条，无政府主义者……绝不可能组成一个政府，即使他们足够强大；而且，万一他们这样做了，这个政府与其他政府将不会有任何区别；甚至可能更加糟糕。”¹⁶

194

西班牙无政府主义领导人迭戈·阿瓦德·德·桑蒂连在革命发生六年前的一九三〇年撰文强调，“从中央集权向无政府主义过渡需要一种新人，一种具有道德优势的新型个人”，造就这种人是无政府主义者的使命。“只有成功地造就出有资格生活于其中的人，我们才能找到无政府主

义的应许之地^①。同时，如果我们自己迟迟不能从精神上证明，主人和暴君并非必不可少而且我们知道如何像有资格享受自由的自由人那样生活，我们也不可能造就他们。”¹⁷

推翻君主制和贝伦格尔的独裁统治后，一九三一年民主共和国的建立并没有使自由主义者改变他们的基本信条：“所有政府都是令人憎恶的，消灭它们是我们的任务。”¹⁸“所有政府毫无例外同样邪恶，同样卑鄙。”¹⁹“所有政府都是自由的毁灭者。”²⁰“在君主制和独裁政府的统治下，工人们忍饥挨饿，严重缺乏各种生活必需品；”一名无政府主义者在一九三三年共和派与社会党人联合时写道，“如今，在共和国的统治下，他们的生活依然如此。昨天，他们最基本的需要得不到满足；今天的情况完全相同。我们无政府主义者说这些并不担心任何工人反驳我们，而且我们说得更多。我们总是说，无论在哪一种政府的统治下，工人均遭受压迫并且不得不痛苦挣扎，以使他们的生存权利以及在长时间筋疲力尽地劳动之后享受生活的权利受到重视。”²¹就像自由主义者把左派的政府和右派的政府混为一谈一样，他们也不区分政治家个人之间的优劣：“在我们看来，所有政客在各个方面都一样——蛊惑人心的竞选宣传，窃取人民的各种权利，对名声的欲望，机会主义态度、批评指责的能力以及一旦执政为自己辩护时的玩世不恭。”²²

与其他工人组织截然不同的是，全国劳工联合会和伊比利亚无政府主义者联盟避免参加议会活动。²³他们不在中央或者地方政府中任职，不提名候选人参加议会选举，而且，在一九三三年十一月那场导致右派上台的至关重要的大选中，它们指示自己的成员不要投票。“我们的革命不是在议会而是在街头进行的。”《土地与自由》在大选举行前一个月宣称。²⁴“我们对更换政府不感兴趣。”有影响的无政府工团主义者伊萨克·普恩特当时写道，“我们希望废除它们。……无论哪一方获胜，无论左派还是右派，他们都将是我们的敌人，都将是关押我们的狱吏和屠杀我们的刽子手；他们都会使用突击卫队的警棍，秘密警察的恐吓，国民卫队的步枪和监狱看守的目光。工人阶级今天只有：阴森的牢房，密探，饥饿，鞭痕和伤

① 应许之地（Promised Land）语出圣经，意为希望中的乐土。

口。”²⁵在大选举行的前几天，《土地与自由》呼吁：

195

工人们！不要去投票！投票是对你们的人格的一种否定。别理那些要求你们投票给他们的人。他们是你们的敌人。他们打算利用你们的信任上台执政。恳求你们的父母、子女、兄弟姐妹、亲戚朋友不要去为任何候选人投票。对于我们来说，他们都是一样的；所有政客都是我们的敌人，不管他们是共和派、保王派、共产党还是社会党。奥诺里奥·毛拉就像罗德里戈·索里亚诺和[埃兰·]巴里奥维罗一样无耻。拉尔戈·卡瓦列罗和普列托就像巴尔沃丁及其同伙一样玩世不恭和卑鄙。……我们既不需要一个国家也不需要一个政府。为了保护自己的利益，资产阶级需要它们。我们关心的只是我们的工作条件，我们不需要议会保护我们的权利。任何人都不要去投票。……不要关心左派还是右派在这场闹剧中取胜。他们都是顽固的右派。唯一的左派组织是全国劳工联合会，它是真正的革命组织，而且正因为如此，它对议会不感兴趣，那是一个将国家和人民的利益玩弄于股掌之上的肮脏的妓院。撕毁选票！捣毁票箱！砸烂那些监票人和候选人的脑袋！²⁶

不过，在一九三六年二月的大选中，全国劳工联合会和伊比利亚无政府主义者联盟改变了它们的态度；因为，尽管反对人民阵线的竞选纲领——它们认为这是一份与“正在从西班牙的每一个毛孔散发出来的革命热情”格格不入的“极端保守的文件”，²⁷它们仍然决定不再坚决要求它们的成员不去投票。这不仅是因为左派联盟承诺，如果获胜就将大赦数以千计的政治犯，²⁸而且因为对于自由主义运动来说，就像对于支持人民阵线联盟的其他党派一样，再次采取一九三三年的不投票政策将意味着重大失败。²⁹无政府主义者的态度所发生的这种变化确保了人民阵线联盟的胜利，³⁰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他们的信条发生了任何根本改变。无政府工团主义者对所有政府和所有政客根深蒂固的敌意使人们难以想象他们会加入拉尔戈·卡瓦列罗的内阁，特别是因为，在内战爆发之前的多年时间里，他们与这位社会党领导人及其手下的工会竞争对手劳动者总工会一直处于剑拔弩张的敌对状态。

注释：

- 1 见本书第四章。
- 2 实例见一九三八年十月二十九日《土地与自由》，该报为伊比利亚无政府主义者联盟的喉舌；奥拉蒂奥·M.普列托，《自由主义者的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第62—64页，该书作者一九三六年任全国劳工联合会全国委员会书记。伊比利亚无政府主义者联盟的著名成员胡安·加西亚·奥利韦尔写道：“[伊比利亚无政府主义者联盟的]目的是防止改良主义者和政治冒险家夺取全国劳工联合会的控制权。”（《脚步的回声》，第115页）
- 3 西班牙无政府主义研究的权威之一乔治·埃森魏因写道：“根据阿道弗·布埃索的研究（《全国劳工联合会的创建》），一九一〇年十月三十日至十一月一日，全国劳工联合会在工团主义组织工人团结于巴塞罗那召开的第二次代表大会——号称‘美术大会’——上正式成立。它并不是像曼努埃尔·布埃纳卡萨（《西班牙工人运动，1886—1926》，第39页）和何塞·佩拉特斯（《西班牙革命中的全国劳工联合会》，第一卷，第3页）错误地记载的那样成立于一九一一年九月。佩拉特斯后来在《西班牙政治危机中的无政府主义者》（一九六四年版，第13—14页和第20页注释4）一书中纠正了他的错误。另请参阅该书一九七六年版对注释4的修订。关于全国劳工联合会创建的更多信息，请特别参阅由何塞·佩拉特斯作序的《全国劳工联合会（CNT）代表大会章程》，这是当初在一九一〇年十一月四日《工人团结报》发表的‘美术大会’会议活动记录全文的再版；亦请特别参阅哈维尔·夸德拉特的《社会主义与无政府主义在加泰罗尼亚，1899—1911：全国劳工联合会的诞生》，第441页以及随后的内容。”感谢乔治·埃森魏因专门为本书撰写了这一条注释。
- 4 塞萨尔·M.洛伦索，《西班牙无政府主义者与权力，1868—1969》，第66—68页。
- 5 一九七七年四月三日《希望报》。对伊比利亚无政府主义者联盟从一九二七年成立到它在一九三九年内战结束时销声匿迹这一段历史的最佳描述见胡安·戈麦斯·卡萨斯《伊比利亚无政府主义者联盟史》。
- 6 全国劳工联合会，《一九三一年六月十一至十六日马德里特别代表大会记事》，第38页。
- 7 实例见一九三七年四月十八日和五月八日的《工人团结报》以及刊登在一九七七年六月号《历史时期》的费德丽卡·蒙特塞尼访谈录。值得注意的是，在对拙著《精心的伪装》墨西哥版的评论中，全国劳工联合会和伊比利亚无政府主义者联盟领导人迭戈·阿瓦德·德·桑蒂连不同意使用“控制”这个词（一九六五年一月至二月号《重建》）。
- 8 例如，一九四〇年在墨西哥城接受我的采访的全国劳工联合会所属全国运输工人联合会全国委员会书记维克托·萨拉戈萨。另请参阅安东尼奥·阿尔维尼亚纳和梅塞德斯·阿兰西维亚《对加斯东·勒瓦尔最后的采访》，载一九七八年九月号《历史时期》。
- 9 佩拉特斯，《西班牙政治危机中的无政府主义者》，第276—277页。
- 10 实例见《西班牙无政府主义者与权力》，第68—70、79和93页。
- 11 实例见路易斯·阿拉基斯塔因发表在一九四二年十二月号《左派新闻》上的信，信中谈到胡安·内格林反对无政府工团主义者加入政府。
- 12 迭戈·阿瓦德·德·桑蒂连，《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的破产》，第55页。
- 13 一九三六年七月三日《土地与自由》。
- 14 费尔南多·克劳丁，《共产主义运动的危机》，第一卷，第176页。
- 15 巴枯宁，《国家与无政府状态》，第234页。
- 16 埃里科·马拉泰斯塔发表在一九三二年三月十二日《耐火集》上的文章。
- 17 迭戈·阿瓦德·德·桑蒂连在一九三〇年五月号《明天》上的文章，见迭戈·阿瓦

- 德·德·桑蒂连《无政府主义与西班牙革命：一九三〇至一九三八年文集》，第58页。
- 18 一九三三年九月十五日《土地与自由》。
 - 19 一九三三年十月二十七日《土地与自由》。
 - 20 赫米纳尔·埃斯格莱亚斯发表在一九三五年一月十八日《白色评论》上的文章。
 - 21 何塞·博内特发表在一九三三年九月二十二日《土地与自由》上的文章。
 - 22 伊萨克·普恩特发表在一九三三年六月十九日《全国劳工联合会报》上的文章，见伊萨克·普恩特《宣传品》，第129—130页。
 - 23 实例见赫米纳尔·埃斯格莱亚斯发表在一九三五年一月十八日《白色评论》上的文章。
 - 24 一九三三年十月二十七日《土地与自由》。
 - 25 普恩特发表在一九三三年十月二十四日《全国劳工联合会报》上的文章，见普恩特《宣传品》，第126页。
 - 26 一九三三年十一月十日《土地与自由》。
 - 27 见一九三六年一月十七日和四月二日《工人团结报》。
 - 28 见胡安·洛佩斯的演说，载一九三七年二月十六日《社会熔炉报》。另请参阅费德丽卡·蒙特塞尼《玛丽亚·席尔瓦：自由主义者》，第28页；里卡多·桑斯，《工会运动与政治：“团结”和“我们”》，第262—263页。
 - 29 全国劳工联合会和伊比利亚无政府主义者联盟领导人迭戈·阿瓦德·德·桑蒂连在《我们为什么输掉了内战》（第36—37页）和《西班牙革命与内战》（第30页）两本书中都清楚地表明了这一点。他还在前一本书中透露，右派“通过各种方法试图劝说我们不去投票，就像加的斯的情况一样……，在那里，[右派]向我们提供了五十万比塞塔以进行我们通常的反大选宣传”。
 - 30 下面这条发自巴塞罗那的新闻刊登在二月十七日的君主主义报纸《阿贝赛报》上：“昨天下午四点，在工人阶级聚居区的普遍印象是，[由于无政府工团主义者]在大选中所起的决定性作用……左派阵线肯定将以巨大的优势获胜。”

无政府工团主义者加入政府

在内战爆发之前的多年时间里，社会党的劳动者总工会领导人拉尔戈·卡瓦列罗与无政府工团主义者的关系同样被始终不变的敌意打上了印记。在普里莫·德·里维拉将军独裁统治或官方所谓的军事委员会时期（1923—1930），部分是为了保护并且壮大自己的工会组织，部分是希望得到其工会组织被独裁者取缔的无政府工团主义者的地盘，卡瓦列罗作为工人代表任职于国务委员会。杰拉尔德·布雷南在他那部经典著作中写道，最初几年，全国劳工联合会的成员数量迅速增加。“凭借其无与伦比的工会以及组织大罢工的声望，它不仅在安达卢西亚草原遏制了所有竞争对手最近的发展势头，而且侵入了社会党人在中北部的势力范围。在那里，它夺取了劳动者总工会最早的据点之一马德里建筑工人工会的半壁江山，它还使许多铁路工人改换门庭并且在阿斯图里亚斯地区、希洪港以及萨马和拉费尔格拉的那些大型铸造厂站稳了脚跟。

“对于掌控着整个劳动者总工会的卡瓦列罗来说，这是一个严重的问题：他几乎无法摆脱地盘被全国劳工联合会夺走的恐惧。作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他感到了无产者联合起来的绝对重要性。于是他发现，独裁统治为在这方面取得某种进展提供了一个良好的机会。劳动者总工会也许可以

完全吞并全国劳工联合会。这个意图并未实现。”

布雷南继续写道，利用独裁政府的仲裁机构作为依托，劳动者总工会在农村地区大大增强了自己的实力，尤其是在埃斯特雷马杜拉、格拉纳达、阿拉贡和新卡斯蒂利亚地区，但是，它在加泰罗尼亚地区彻底失败而且没有在工业无产者中取得进展。“无政府工团主义者更愿意加入保守的自由工会，他们知道，随着独裁政府的垮台，工会将发生分裂。”¹

197 劳动者总工会与军事委员会的合作引起了一场拉尔戈·卡瓦列罗所谓“几乎从未经历过的侮辱诽谤运动”。²社会党人竭尽全力与诽谤攻击进行斗争。发表在一九二四年十月二十五日《社会主义者》上的一份正式公告说，“[他们]参加政府的各个部门是社会党和劳动者总工会的代表大会和决策机构决定的。这既不包含也不涉及政治合作或者与政府部门之间的协议。”³另外，在一九二四年十日发表的一份声明中，社会党全国委员会一致认为他的行为“完全正确”而且“问心无愧”，因为他“限定自己”只能接受组织交给的任务——这份声明提到了拉尔戈·卡瓦列罗在国务委员会中担任的职务。⁴

尽管劳动者总工会没有明显地侵蚀全国劳工联合会的队伍，但是，几乎可以肯定，军事委员会从它所得到的社会党工会组织的支持中受益匪浅。在保安总局局长一九三〇年一月二十九日写给普里莫·德·里维拉的继任者达马索·贝伦格尔将军的一份报告中，这一点明显地表现出来；

“社会党人过去六年的所作所为是对政府的公开支持。社会党工人之所以不顾劳工危机抵制[无政府工团主义者]那些诱人的呼吁和建议，社会党领导人之所以拒绝参加别人极力劝说他们参加的政治煽动和反抗活动，劳工立法和仲裁机构是主要原因，尤其是后者。”这份报告最后说，保安总局认为，社会党人积极干预社会政治问题“目前对于公共秩序并无危险”，反而成为维护秩序的一种“保证”。⁵

当拉尔戈·卡瓦列罗真的以为劳动者总工会有可能吞并全国劳工联合会时，全国劳工联合会同样曾经真的打算完全控制整个工会运动。一九一九年举行的一次无政府工团主义者代表大会通过一项决议案，限西班牙工人在三个月内加入全国劳工联合会，逾期没有加入者将被斥为工贼。⁶但是，这种吞并与之竞争的工会运动的尝试没有取得什么效果。

几年后，当拉尔戈·卡瓦列罗任职于普里莫的国务委员会并且利用仲裁机构增强劳动者总工会的实力时，他成为全国劳工联合会无情攻击的目标。他们之间的关系也没有随着一九三一年共和国的建立而有所改善，因为，当时担任劳工部长的卡瓦列罗再次利用他的权力，通过损害竞争对手的方式扩大劳动者总工会的影响，而且还因他为国家干预劳动纠纷所做的辩护与全国劳工联合会发生了冲突。布雷南写道：

劳工部长拉尔戈·卡瓦列罗提出一系列法案规定了工人阶级在与资本家打交道时所享有的各种权利。其中最重要的是一九三一年十二月二十四日提出的法案，该法案规定了工人与雇主之间的所有合同为了生效必须满足的一些条件。设立了一个特别法庭裁定涉嫌违规的行为。另外一项《混合陪审团法》设立了一些强制解决劳动纠纷的法庭。……还有一项法案要求每次罢工必须提前八天发出通知。这些法案除了与无政府工团主义者和雇主直接进行谈判的原则背道而驰并且违背突然举行罢工的惯例之外，它们显然意味着国家在工业方面的权力大大增强。大批政府官员——主要是社会党人——出庭推动这些法律的实施，而且只要有可能，就会尽力利用它们在损害全国劳工联合会的情况下扩大劳动者总工会的影响。这当然是制定它们的那些人的目的。事实上，劳动者总工会迅速成为国家本身的一个机构并且利用刚刚得到的权力削弱它的竞争对手。假如一个纯粹的社会党政府上台，无政府工团主义者不可能对自己的命运抱任何幻想。⁷

198

与劳动者总工会不同，全国劳工联合会抵制共和国的劳动法庭或者混合陪审团，不仅因为它们在劳资间的纠纷中强化了国家的权力，而且因为它们的目的是“为‘阶级调和’阉割西班牙无产阶级”——全国劳工联合会和伊比利亚无政府主义者联盟的一位著名成员就是这样认为的。⁸全国劳工联合会希望的不是阶级调和而是劳资双方无法缓和的持续斗争，它的方法是直接行动：激烈地罢工、破坏和抵制。⁹直接行动不仅是工人改善生活水平的一种方法；最重要的是，它是一种激励并且保持为起义之日做准备的反叛精神的鼓动手段。全国劳工联合会为其成员的国际工人协会（AIT）

宣称：“直接行动以总罢工达到其最高境界，这应当是社会革命的一种前奏。”¹⁰在军事叛乱之前那几年，无政府工团主义者以经常起义而著称，他们是西班牙标准的造反势力。无论这些总是局限于少数地区的起义是否因为缺乏其他地方的支持而失败，重要的是，它们唤醒了工人阶级的革命倾向。今天他们可能失败，但是明天他们将获胜。“假如昨天十个村庄揭竿而起，”伊萨克·普恩特写道，“明天肯定有一千个村庄举起义旗，即使我们必须坐满一百条‘布宜诺斯艾利斯’号那种[押解]船只的底舱。起义受挫并不总是意味着失败。未来并非永远属于胜利者。我们绝没有山穷水尽。”¹¹

199 拉尔戈·卡瓦列罗一九三三年的左转并没有使全国劳工联合会与劳动者总工会之间的尖锐分歧在任何方面有所缓和，因为无政府工团主义者继续对他怀有丝毫不减的敌意。他在内战爆发前几个月所提出的通过社会党以及全国劳工联合会劳动者总工会的联合¹²实行无产阶级专政的主张也没有减轻这种敌意；因为无政府工团主义者认为他是一个“跃跃欲试的独裁者”，希望“社会党在工人阶级的起义胜利后取得绝对的支配权”，¹³并且以联合为幌子，掩盖其在劳动者总工会占优势的地方吞并全国劳工联合会的“不可告人的目的”。¹⁴不曾为联合进行过实质性的磋商，劳动者总工会的领导层还在发动武装起义前夕对开展罢工采取了更加谨慎的态度，¹⁵这使得全国劳工联合会的敌意进一步加剧，后者正在一些地方把劳动者总工会的人马吸引到它那一边去。“工人群众不顾一切，”一位敏锐的观察家写道，“因此他们准备追随最激进的领导人。”¹⁶“在马德里，”《太阳报》报道说：“我们正在目睹全国劳工联合会的惊人壮举……宣布举行总罢工，不断组织局部罢工，还有其令人振奋的毫不妥协的强硬态度，这使政府陷入绝望。”¹⁷

接着，内战和革命爆发了，这在两大工会组织之间制造了新的摩擦点。¹⁸

然而，当拉尔戈·卡瓦列罗在一九三六年九月初组阁时，就像他的喉舌《光明报》不久之后指出的那样，不顾双方的这种不和，不顾无政府工团主义者传统的反政府立场以及对他个人的不信任，他试图使他们相信，他们“将会感到自己有义务接受政府措施和权力的约束”。¹⁹但是，尽管需

要无政府工团主义者分担政府的责任以防他们对政府的法令说三道四，卡瓦列罗并未对他们势必公然违背自己的原则给予足够的回报，只向他们提供了一个部长职位。²⁰马德里的无政府工团主义喉舌《全国劳工联合会报》在几周之后评论道，政府提出的条件“既不慷慨也不诱人”，而且“与全国劳工联合会在国内的实力和影响毫不相称”。²¹

的确，虽然在马德里省规模不如劳动者总工会，但是，在左派控制区的大部分省份，例如阿尔瓦塞特、瓜达拉哈拉、哈恩和托莱多（这里提到的只是两大工会的追随者人数大致相同的几个省），全国劳工联合会的实力丝毫不逊于劳动者总工会，而且，除了在阿拉贡、加泰罗尼亚和巴伦西亚等地区实力比劳动者总工会更强大之外，在整个左派控制区，全国劳工联合会的人数很可能超过其社会党竞争对手。²²

不过，全国劳工联合会全国委员会接受了拉尔戈·卡瓦列罗提出的条件，但还须经过地方联合会批准。²³全国地方联合会会议于九月三日召开，然而，代表们拒绝了这个条件。²⁴两天后，当卡瓦列罗已经完成组阁时，马德里的《全国劳工联合会报》发表文章宣称：“许多人可能感到奇怪，全国劳工联合会这一支在前线和后方准备为人民的胜利而斗争的主要力量怎么……没有参加本届政府。毫无疑问，如果全国劳工联合会被政治观念所驱使，它在本届政府中的职位至少应当与劳动者总工会和社会党人一样多。”也就是说，全国劳工联合会应当要求与社会党的拉尔戈·卡瓦列罗派和普列托派——前者因控制着工会的执行机构而代表劳动者总工会，后者因控制着党的执行机构而代表社会党——同样数量的政府职位。“不过，”文章继续写道，“全国劳工联合会再次确认它毫不动摇地坚持反权力主义的要求和信念：社会的自由主义变革只有在消灭国家并由工人阶级掌控经济之后才能发生。”²⁵

尽管全国劳工联合会全国会议的代表拒绝了拉尔戈·卡瓦列罗提供的一个政府职位，一些代表甚至根本反对与这位社会党领导人合作，但是，在“长时间的激烈争论”之后，他们通过了一项折中方案，原则上同意加入政府并且为政府和国家的重建提供帮助。²⁶

根据这项方案，政府各部应当设立由全国劳工联合会、劳动者总工会和人民阵线联盟的各两名代表以及一名政府代表组成的“辅助委员会”。²⁷

这项方案将使全国劳工联合会免遭直接加入内阁的尴尬，但仍使它在政府的各个部门拥有发言权。据洛伦索说，它被卡瓦列罗拒绝几乎一点也不奇怪，因为这些委员会将成为“名副其实的权力机构”，而政府部长将被贬为两大工会组织意志的“纯粹执行者”。²⁸

拉尔戈·卡瓦列罗在其没有发表的回忆录中写道：“为了参加政府，[无政府工团主义者]竟然企图强制推行某种以特设政府机构为基础的国家体制，这种体制事实上将使政府、共和国总统和议会名存实亡，也就是说，使共和政体不复存在。他们想让总理[即拉尔戈·卡瓦列罗]成为这个无政府工团主义国家的总统。他答复说，他接受权力为的是尽一切可能赢得战争从而拯救共和国，并不是为了背叛它。”²⁹他的态度无疑使无政府工团主义者领导人确信，他们的希望落了空。

尽管自由主义运动不可能在不违反正统信条的情况下加入内阁，但是，它的一些领导人并不愿意让政府事务完全被竞争对手所控制。最坚决地主张加入政府的人是全国劳工联合会全国委员会书记奥拉蒂奥·M·普列托，这位讲求实际的自由主义者认为九月三日的方案“不切实际”并且感到“时间正在无情地流逝”，他要求全国劳工联合会加入政府，“公开并且问心无愧地担任若干部长职务”。³⁰“鉴于我们在内战中所起的重要作用，”他在多年以后评论说，全国劳工联合会“不应当拒绝[加入政府]……，但是，对违反运动意识形态原则的担忧、对其思想和宗旨的尊重以及害怕承担这种责任抑制了主观能动性，结果，优柔寡断占了上风”。³¹

201 由于这种优柔寡断，由于担心触犯无政府工团主义的禁忌，但又觉得不能任由中央政府完全被竞争对手所控制，全国劳工联合会地方委员会的代表试图采取一种新的方法。他们在九月十五日举行的一次全体会议上决定，政府应当被一个由五名全国劳工联合会的成员、五名劳动者总工会的成员以及四名各共和派政党的成员组成的国防委员会所取代。³²当然，尽管这个名称对于自由主义运动来说不那么令人反感，但是，国防委员会实际上仍将是一个政府，只不过名义上不是而已。

无政府工团主义者肯定希望加入政府，一名自由主义者在内战结束之后写道，“但是，他们要求政府更名为国防委员会。这种名称的改变纯粹是为了使他们加入政府的强烈欲望与他们的反政府信条协调一致。多幼稚

呀！一个纠正了自己的偏见并且始终只是藐视表象的运动试图以某个名称的改变掩饰其对基本原则的放弃。……这种行为幼稚得像一个既要当婊子又想立牌坊的可悲女人，要求人们把她称为交际花而不是妓女。”³³

正如全国劳工联合会全国委员会书记奥拉蒂奥·M.普列托的儿子塞萨尔·M.洛伦索所说：“全国劳工联合会已经加入了加泰罗尼亚自治政府，而且非常希望加入巴斯克自治政府。那么，为什么要把地方政府与国家政府区别对待呢？……像部长一样，市政府的官员、法官或者警察也是国家机器的组成部分。在一个村庄行使权力像在一个国家行使权力一样违背无政府主义的原则。一个幅员辽阔的国家可以非常民主的进行治理，反之，一个地区也能以暴政来统治。”³⁴

后来批评西班牙自由主义者加入政府的外国无政府主义者³⁵最初赞成国防委员会的主意。赫尔穆特·吕迪格是全国劳工联合会为其会员的国际工人协会驻西班牙代表和两份在巴塞罗那出版的德文报纸《全国劳工联合会-伊比利亚无政府主义者联盟-国际工人协会信息》与《社会革命报》的负责人，他写道：“不可思议的是，几乎所有持不同意见的[外国]同志全都赞成由一个国防委员会领导反法西斯运动的方案。……让我们坦率地说吧，这同样是一个行使权力的方案，唯一不同的是，这个名称让其他国家的无政府主义同志更容易接受一点。”³⁶

为了避免共产党人、社会党人和共和派人士因外国温和派人士可能的反应抵制拟议中的国防委员会，参加九月十五日举行的全国劳工联合会地方委员会全体会议的的代表们提议，曼努埃尔·阿萨尼亚继续担任共和国总统。³⁷全国劳工联合会的主要报纸《工人团结报》宣称：“我们在国外的地位不能由于我们提出的新体制而有所下降；因为我们必须牢记，应当保留具有小资产阶级政权特征的象征性人物，以免外国资本家产生恐慌。”³⁸

不过，全国劳工联合会谋求成立国防委员会的运动没有得到政府中任何党派的支持，另外，在九月二十八日举行的另一次全国劳工联合会地方委员会全体会议上，全国劳工联合会全国委员会书记奥拉蒂奥·普列托抨击这个方案浪费时间，因为它难以被各个政党所接受，而且在他看来，
“考虑到外国列强以及内战的国际因素”，它“显然完全不切实际”。他反复强调他赞成加入政府的理由“非常单纯”，强烈要求代表们抛弃诸

多顾虑、诸多道德和政治偏见、诸多脱离实际的想法、诸多夸夸其谈，因为，“必须迅速采取行动，每一天的流逝都使全国劳工联合会的处境更加恶化”。³⁹

尽管受到普列托的言论的震动，代表们仍然死抱着他们提出的方案不放。几周来，全国劳工联合会持续开展了一场支持成立国防委员会的运动，⁴⁰但是，它的努力徒劳无功。拉尔戈·卡瓦列罗毫不动摇地坚决反对。他的态度在下面的一段话里表现出来，与共产党和共和派的完全相同。⁴¹这一段话摘自其喉舌《光明报》所发表的一篇社论：“现在对国家机关进行一场激进的改革将会导致政府失去连续性，这对我们是毁灭性的。此外，我们正在日内瓦[国际联盟]进行一场斗争，如果斗争获胜的话，可能对我们产生深远的影响，因为，鉴于我们[将]获取赢得战争必不可少的物质条件这一事实，天平将发生有利于我们的倾斜。全国劳工联合会的同志们断然要求突破宪法的约束将会引起什么反应？我们担心，这只能使形势发生我们的敌人所希望的变化。”⁴²一个月后，《光明报》的另一篇社论写道：“与关注内战的纯军事需要同样重要的是，使政府机构具有一种不会在国外引起任何怀疑的形式，这甚至可能更重要。”⁴³一九三六年九月底成为全国劳工联合会全国委员会委员的玛丽亚诺·卡多纳·罗塞利是该委员会与总理进行谈判的人员之一，他确认，这些社论反映了拉尔戈·卡瓦列罗本人的看法。⁴⁴

“喂，如果我们打算接受你们的建议，”据称拉尔戈·卡瓦列罗对一群全国劳工联合会领导人说，“我们实际上是在把自己置于与布尔戈斯军人集团[叛军政府]同等的地位。我们将失去我们手中的王牌：人民在多次大选中从法律上表示认可的合法存在的共和国政府。抛开你们神父般的顾虑，委派你们的代表加入政府，我向你们保证，我们将竭尽全力帮助集体农庄并且尽量对武器进行公平分配，以使共产党人——他们是你们的主要担忧——无法用苏联援助作为胁迫手段控制一切。”⁴⁵

面对拉尔戈·卡瓦列罗的坚决态度以及来自其他方面的抵制，奥拉蒂奥·普列托决定“消除”全国劳工联合会内部“最后残留的反对意见”，于是，他在十月十八日召开了一次地方联合会的全体会议。这一次，他的观点占了上风。全体会议授予他全权，“以他自己的方式”为使全国劳工

联合会加入政府进行谈判。“我相信合作势在必行，”他在内战结束之后写道，“因此，我控制住自己的思想顾虑和良心不安。”⁴⁶

为了解释自由主义运动的新方针，《全国劳工联合会报》写道：“我们正在考虑的是，政府的组成可能与国际形势有关，……由于这个原因，全国劳工联合会准备在不违反其反权力主义精神的情况下做出最大的让步：加入政府。这并不意味着它放弃了在未来充分实现其理想这一目标；这仅仅意味着……为了赢得内战从而拯救我国人民和这个世界，它准备与任何人在一个领导机构里合作，无论这个机构叫作委员会还是政府。”⁴⁷在与卡瓦列罗的谈判中，全国劳工联合会的代表要求得到五个部长职位，其中包括国防部长和财政部长，但是，卡瓦列罗拒绝了他们的要求。⁴⁸最终，在十一月三日，他们接受了四个部长职位：司法部长，工业部长，商业部长和卫生部长。不过，没有一个要害部门；此外，工业部长和商业部长以前是由一个人担任的。

改组后的政府成员如下：

弗朗西斯科·拉尔戈·卡瓦列罗	社会党	总理兼国防部长
胡利奥·阿尔瓦雷斯·德尔巴约	社会党	外交部长
安赫尔·加拉尔萨	社会党	内政部长
安纳斯塔西奥·德·格拉西亚	社会党	劳工部长
胡安·内格林	社会党	财政部长
因达莱西奥·普列托	社会党	海军和空军部长
赫苏斯·埃尔南德斯	共产党	教育和艺术部长
比森特·乌里韦	共产党	农业部长
胡安·加西亚·奥利韦尔	全国劳工联合会	司法部长
胡安·洛佩斯	全国劳工联合会	商业部长
费德丽卡·蒙特塞尼	全国劳工联合会	卫生和公共救济部长
胡安·佩罗	全国劳工联合会	工业部长
卡洛斯·埃斯普拉	左翼共和派	宣传部长
何塞·希拉尔	左翼共和派	不管部长
胡利奥·胡斯特	左翼共和派	公共工程部长
贝尔纳多·希内尔·德洛斯·里奥斯	共和联盟	通讯部长

海梅·艾瓜德

加泰罗尼亚左翼共和派

不管部长

曼努埃尔·德·伊鲁霍

巴斯克民族独立党

不管部长⁴⁹

204

对于跨越部长责任这道陌生的门槛，全国劳工联合会的几位代表并非没有思想准备。实际上，据一位自由主义作家说，他们知道，他们在掌管自己的部门时不能影响革命。⁵⁰当然，拉尔戈·卡瓦列罗决定向全国劳工联合会提供四个而不是一个部长职位，既非出于同情，也不是慷慨大方。有证据表明，希望自己的政府拥有更大的权威是驱使他这样做的部分动机，⁵¹当时，由于相信佛朗哥的军队随时可能占领首都，他正计划把政府转移到巴伦西亚。“离开首都的时候到了。”他后来写道，“敌人集中了大量兵力，随时可能在夜间发动突然袭击，攻进首都。”⁵²另外，不管是否有根据，他还担心，如果政府在接纳自由主义运动的代表之前离开首都，全国劳工联合会和伊比利亚无政府主义者联盟可能建立一个独立的政府。“在马德里形势危急的情况下，”阿尔瓦雷斯·德尔巴约写道，“如果不让无政府主义者分担政府的责任的话，他们很可能抓住政府向巴伦西亚转移所提供的机会尝试建立一个他们自己的地方政府。这只能在整个共和派控制区制造混乱和灾难。”⁵³

无论是否有必要，似乎没有就这种担心与阿萨尼亚总统进行过讨论。两周之前乘飞机离开马德里后，目前他与警卫一起被安置在巴塞罗那，那里靠近法国边境，交通便利。仍然享有总统权力——归根到底，这不是因为他是宪法所体现的法制的产物，而是因为他作为革命的宪法装饰所产生的微妙作用——的阿萨尼亚最初拒绝批准任命自由主义者担任政府部长的法令。拉尔戈·卡瓦列罗写道，总统没有认识到西班牙无政府主义的变化将对未来产生的作用。“它已经从恐怖主义和直接行动转变成为合作和分担权力的责任。……这是一件不同寻常的世界大事，不会不起任何作用。我对他说，如果他不签署这些法令我就辞职。他签署了它们，尽管持有异议。”⁵⁴

据阿尔瓦雷斯·德尔巴约记述，对于被提名担任部长职务的四名无政府工团主义候选人，阿萨尼亚坚决反对任命其中的两位，他们是费德丽卡·蒙特塞尼和胡安·加西亚·奥利韦尔，均为伊比利亚无政府主义者联

盟成员。“在其他情况下，通常的做法是服从总统的意志或者给他时间改变想法。但是，在马德里当时所处的那个暗淡时期，任何犹豫不决都可能是灾难性的。未来的部长——特别是其中来自巴塞罗那的两位——已经开始怀疑上层并未想好他们加入政府这件事，他们正在谈论返回巴塞罗那并且断绝全国劳工联合会与政府的交往。我不得不两次离开总理的书房去安抚他们。共和国总统与总理之间进行的一次不乏某种戏剧性的电话交谈结束了让人为难的局面。尽管听不见阿萨尼亚先生的声音，我们在场的其他人几乎能够感觉到他的愤怒穿过电话线扑面而来。但是，没过一会儿，拉尔戈·卡瓦列罗就得到了授权，发布经总统正式批准的官方公报，宣布对四位全国劳工联合会成员的任命。”⁵⁵

过了大约六个月，在意身后的阿萨尼亚在回忆录中写道：“不仅不顾我的意见，而且不顾我最愤怒的抗议，他们强迫我接受了十一月进行的内阁改组，这次改组把全国劳工联合会和无政府主义者网罗进政府——共和派认为这不可避免而且有用。”⁵⁶

关于这一事件，当时的巴塞罗那市市长、加泰罗尼亚左翼共和派成员和阿萨尼亚的密友卡洛斯·皮·苏涅尔在回忆录中有所记述，他说，一天晚上总统打电话来说想跟他说话。“我立即赶了过去。我发现他心烦意乱，萎靡不振。就连他那过人的智力也显得迟钝，忽隐忽现。他对我说，他想逃走，离开西班牙，辞去共和国总统职务。……发生了什么事情？拉尔戈·卡瓦列罗打电话告诉总统，他准备组成一个包括四名全国劳工联合会成员的政府。阿萨尼亚表示反对，可是，不顾他的反对，任命他们的法令已经以他的名义在官方公报上发表了。不过，他确实不愿意批准这些任命。……我们谈了很长时间。最后，当我很晚离开时，他似乎已经决定对自己剩余的政坛生涯听之任之，命运把他与这种生涯绑在了一起。”⁵⁷

全国劳工联合会几位政府部长的名字在十一月五日的《马德里官方公报》上公布后，拉尔戈·卡瓦列罗立即提出将政府驻地迁移到巴伦西亚这个问题。担任海军和空军部长的社会党温和派人士因达莱西奥·普列托——据其一名支持者说，他像拉尔戈·卡瓦列罗一样相信敌人将在三到六天之内占领马德里⁵⁸——证实：“弗朗西斯科·拉尔戈·卡瓦列罗召集部长开会，提出政府应当撤离马德里……刻不容缓。几周之前我曾提出政

府应当撤离的建议，不过是在公开宣布的情况下撤离。……我不希望在最后时刻突然转移，那会给人一种逃跑的印象。我认为，明智的做法是，让马德里人民在心理上有所准备，以使他们觉得这一措施情有可原，即使我们没有预先通知他们，他们也会祝我们一路平安而不会骂我们是逃兵。但是，总理对我的建议置之不理。

随后对卡瓦列罗的建议进行的讨论非常具有戏剧性。刚刚加入政府的四名全国劳工联合会成员认为，他们是一个骗局的受害者。他们相信，让他们担任部长只是为了使他们承担做出这个重大决定的责任，因此，他们不同意这个决定。”⁵⁹

206 拉尔戈·卡瓦列罗在其没有发表的回忆录中写道：“全国劳工联合会的几位部长最初坚持……即使全部被敌军俘虏，任何部长也不应离开。他们说：‘如果政府保全了自己却牺牲了其余民众，那既不公平也失信于民。’……他们暗示，试图离开是徒劳的，因为人民将阻止他们。这被认为是一种含蓄的威胁。”⁶⁰

因达莱西奥·普列托继续写道：

经过长时间的讨论，[全国劳工联合会的几位部长]提议，除了他们四位部长留在马德里之外，我们可以全部离开。我参加了讨论，强烈反对这个方案。“不是我们全部离开，就是一个也不离开。”我表示，“如果一些人被打上懦夫的印记而另一些人却被当作英雄称颂，那是不能接受的。或者我们全是懦夫，或者我们全是英雄。……”

全国劳工联合会的几位部长要求允许他们私下讨论一下这个问题，然后离开了会议室。……耽搁了相当长的时间之后，他们回到会议室表示，他们同意这个建议。拉尔戈·卡瓦列罗宣布，新的政府驻地将是巴伦西亚而不是预料中的共和国总统已经迁往的巴塞罗那。他要求大家保守秘密并且声明，任何人只要愿意就可以离开。我可以派两架客机在黎明起飞，它们能把愿意乘飞机离开的部长全部带走。当时没有人接受我的邀请。一些人认为等待的时间太长了。

[十一月六日]内阁会议刚一结束，拉尔戈·卡瓦列罗就乘车上路驶过了坐落在直通巴伦西亚的公路交叉口上的塔兰孔市。塔兰孔被罗

萨尔纵队把守着，它由在军事叛乱爆发后从巴伦西亚的圣米格尔·德洛斯雷耶斯监狱释放出来的无政府主义者和犯人组成。当政府就撤离达成一致意见的消息传来时，罗萨尔上校决定不让任何人继续前往[巴伦西亚]。外交部长胡利奥·阿尔瓦雷斯·德尔巴约受到粗暴的对待。⁶¹全国劳工联合会的政府部长胡安·佩罗和胡安·洛佩斯被赶了回来。午夜时分他们出现在我家里，我带他们与我一起乘飞机离开。⁶²

同样半道而回的还有矮胖的马德里市长佩德罗·里科。因达莱西奥·普列托写道，里科回到马德里后并没有再去市政厅，而是立即躲进了墨西哥大使馆。“除了他以外，那里的避难者都是右派，待在大使馆让佩德罗·里科心神不安。他不能返回市政厅，在那里，他试图逃跑的行为已经受到人们的谴责。因为害怕报复，他不敢在家里睡觉，更不必说上街了。……再次面对塔兰孔民兵的可能让他心惊肉跳。我建议，他应当藏在汽车的行李箱里离开，就像一九三四年我和几个社会党人所做的那样，当时我们[逃]到了法国。……需要上帝帮助才能把他塞进行李箱，他肥胖臃肿，体积超过了行李箱的容量，他的笨拙也使把他塞进行李箱变得非常困难。这给那些佛朗哥的支持者提供了乐趣，他们在墨西哥大使馆的院子里目睹了这一场面。”⁶³

因达莱西奥·普列托对政府偷偷逃离马德里的描述基本上得到著名的无政府主义民兵部队指挥官西普里亚诺·梅拉的充分证实。梅拉后来成为第十四师师长和第四军军长，当时他赶到塔兰孔抗议政府的逃跑行为。他在那里发现，部长、副部长和其他政府官员以及民兵组织的高层领导人都被罗萨尔纵队扣押起来。全国劳工联合会全国委员会书记奥拉蒂奥·M.普列托很快就赶到了，他与全国委员会的其他成员也在前往巴伦西亚途中。他以全国委员会必须紧跟政府“以便充分了解事态发展从而确定相应的政策”为由为其离开马德里进行了辩解；梅拉反驳说，全国劳工联合会全国委员会不应当放弃马德里，尤其是在所有人都逃走时。“它在马德里的存在可能对人民具有重要的道德意义，并且可能促使形势发生有利于我们的变化。……政府的离开……是一种可耻的逃跑行为，因为就在不到八小时前它还告诉马德里人民，它将接受它的命运。”

但是，离开马德里的决定已经做出，因此，梅拉只好返回马德里，他没有与这位全国委员会书记握手，“因为我认为他是一个意志薄弱的人，不配在我们这样一个革命组织中担任他所担任的重要职务”。梅拉宣称，他将组织一千人去保卫首都——“这些人要表明的是，当他们逃跑时，我们将捍卫他们抛弃的那些东西。”⁶⁴

无政府工团主义者政府部长离开马德里的决定立即在自由主义运动中引起了反响。塞萨尔·M.洛伦索写道，当这些全国劳工联合会的领导人前往马德里上任时，他们向他父亲奥拉蒂奥·M.普列托请示作为政府部长应当如何行事。普列托回答说，他们具有丰富的斗争经验，知道怎样为全国劳工联合会谋利益。他对他们说，一名自由主义者，即使是全国委员会的书记，也不应当对其他自由主义者发号施令或者使他们受到任何特殊纪律的约束。全国劳工联合会不是共产党。他们应当按照自己的良心行事。洛伦索接着写道，普列托给他们的行动自由很快就被用来对付他，因为，在讨论政府转移到巴伦西亚的问题时，这些部长没有与全国委员会交换意见就同意了。“奥拉蒂奥·普列托不能……要求四名部长辞职……从而引发一场政府危机。政府迁往巴伦西亚——这导致全国委员会的离开⁶⁵——激起了全国劳工联合会激进分子的愤怒。他们认为奥拉蒂奥·普列托应当负责，指责他怯懦并且说他是一个‘清债人’。”结果，十一月十八日，在全国委员会的一次全体会议上，奥拉蒂奥·普列托作为全国委员会书记提交了其“不会收回的辞呈”，然后，他被强大的加泰罗尼亚地方联合会书记马里亚诺·R.巴斯克斯所取代。⁶⁶

但是，比全国劳工联合会的政府部长离开马德里和奥拉蒂奥·普列托辞职更重要的是自由主义运动领导人加入中央政府的决定对该运动所造成的剧烈震荡。这一决定不仅意味着对无政府主义基本信条的全面否定，彻底动摇了自由主义理论的整个结构，而且违反了民主原则，它是在没有征求该运动普通成员意见的情况下做出的。⁶⁷

208

从内阁改组的那一天起，为了打消正统无政府主义者的顾虑，无政府工团主义的主要报纸《工人团结报》试图通过尽量缩小理论与实践之间的差距证明这一决定的正确性。

“全国劳工联合会加入中央政府是我国政治史上最重要的事件之一。

出于原则和信念，全国劳工联合会是反中央集权论者，是一切形式的政府的敌人。

“但是，形势……改变了西班牙政府和西班牙国家的性质。

“现在，作为管理国家机关的手段，政府已经不再是一支镇压工人阶级的力量，就像国家已经不再代表一个把社会划分成阶级的主体一样。如今，全国劳工联合会的成员已经介入，两者更不可能压迫人民。”⁶⁸

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随着自由主义运动内部“合作派”与“拒绝派”之间的矛盾趋于恶化，一些支持与政府合作的人坚持认为，全国劳工联合会加入内阁并不表示放弃无政府主义的理想和策略；⁶⁹而另一些支持者则坦率地承认这违反了教条但却认为这是被现实所迫。“无政府主义的社会哲学思想在理论上出类拔萃，令人惊叹，”全国劳工联合会全国委员会成员曼努埃尔·马斯卡雷尔写道，“但是，当面对像我们这样一场战争的悲惨现实时，它们是不切实际的。无政府主义者和工团主义者的行为应当由我们的无政府主义意识形态所驱使并且与之相符合，但是，当环境、当特定的形势要求改变策略时，无政府主义者不应当把自己局限在狭隘的框框里，在理论上坚持正常时期的行动方针，因为，丝毫不偏离无政府主义教条和宣言所确定的那些东西，顽固地墨守成规、遵循一条一成不变的路线是人们为了证明无所作为或四平八稳的正确性所能采取的最轻松的立场。”⁷⁰

关于反对与政府合作的一方，一位自由主义历史学家写道：“我相信……许多反对合作的激进分子采取了默认的态度，他们虔诚地发出愤怒的呼喊，但是允许别人做出自己的选择。”⁷¹

无论在自由主义运动内部引起了什么反应，全国劳工联合会和伊比利亚无政府主义者联盟的领导人加入政府并非没有经过一番与良心和原则的内心搏斗。他们不是全都承认这种矛盾的心情，但是，担任卫生部长的伊比利亚无政府主义者联盟半岛委员会成员费德丽卡·蒙特塞尼的坦白准确无误地表明了困扰着自由主义运动大部分成员的怀疑和担忧。据她自己生动地描述，她从母亲的乳房中吮吸的就是无政府主义乳汁。⁷²在其离开内阁以后举行的一次全国劳工联合会会议上，蒙特塞尼说：

作为资深无政府主义者的女儿，⁷³作为无政府主义者的后代，当我谈论整个无政府主义运动时，我可能说那是一种成就、一种经历、一种不断捍卫从我父母那里继承的思想的斗争生活，我认为，我加入政府、接受全国劳工联合会委派我担任的职务，其意义绝不只是任命一名部长那么简单。其他政党、其他组织、其他团体不可能意识到由于全国劳工联合会加入政府而造成的自由主义运动当时和现在的内部斗争及其成员的内心挣扎。他们不可能意识到，但人民可能意识到，如果人民意识不到，那就应当告诉他们。他们应当被告知，对于曾经持续与国家进行斗争、曾经总是断言通过国家将一事无成、总是断言“政府”和“权力”这些词汇意味着对人类和民族自由的一切可能予以否定的我们来说，作为一个组织同时也作为个人加入政府意味着，不是一场根本意义上的历史冒险，就是在理论和策略方面对整个运动、整个过去的一次修正。

我们不知道它意味着什么。我们只知道我们陷入了进退两难的困境。……

当我被全国劳工联合会指派为它在政府的代表时，我正在加泰罗尼亚地区委员会；从七月十九日到十一月，我问心无愧地经历了整个这一段史诗般的时期。……

为了接受这个职务，我要独自克服多少郁闷、怀疑和痛苦啊！对于其他人来说，这可能就是他们的目的，这可能满足了他们的强烈欲望。但是对于我来说，这意味着离开了我视为生活的那种工作，意味着与联系着父母理想的整个过去断绝了关系。这意味着一种巨大的努力，要流多少眼泪才能做出的一种努力。但是，我接受了这个职务。我战胜自我接受了它。我接受了它，我准备为了那些我认为与过去的我毫无关系的事情弄清自己眼前的责任，条件是，我将永远保持忠诚、正直和诚实，永远忠实于父母和我毕生的理想。我就这样加入了政府。⁷⁴

伊比利亚无政府主义者联盟加泰罗尼亚地区委员会书记塞韦里诺·坎波斯参加了做出全国劳工联合会加入政府这一决定的那次全国劳工联合会

和伊比利亚无政府主义者联盟领导人会议，他在内战结束之后寄给我的一封信中写道，费德丽卡·蒙特塞尼起初坚决反对指定她为四名部长之一，但最终迫于压力同意了。他说，被指定的另几个人没有参加那次会议。⁷⁵蒙特塞尼在内战结束之后写信告诉我，被委派代表全国劳工联合会加入政府的四个人是全国委员会书记奥拉蒂奥·普列托选定的。她指出，胡安·佩罗和胡安·洛佩斯代表工会中的右派，她和胡安·加西亚·奥利韦尔代表左派。她说：“[奥拉蒂奥·普列托]希望我能控制正统派的反对意见。”⁷⁶

在内战结束几年之后所写的一篇文章里，蒙特塞尼肯定地说，她个人对在政府中有所作为的可能性“从来不抱任何幻想”。“我知道，我们大家都知道，”她断言，“尽管当时的政府实际上不是一个真正的政府，权力在街头，在斗争者和生产者手中，但是，[政府的]权力将被重新整合并加强，而且更加糟糕的是，这是在与我们串通一气的情况下由我们帮助进行的，因此，这将在道德上毁掉许多我们的同志。”⁷⁷

210

全国劳工联合会和伊比利亚无政府主义者联盟对其反政府信条的这么一次彻底背离可能只是由某些理由非常充分的动机决定的。关于它们，全国劳工联合会的一些主要成员所提供的下面这些动机肯定是其中最重要的：

“我们是为环境所迫加入共和国政府的，”蒙特塞尼本人在成为内阁成员不久之后声称，“目的在于避免重蹈其他国家无政府主义运动的覆辙：由于缺乏预见性、果断性和敏捷的思维，它们被驱逐出了革命运动，眼看着其他党派控制了革命。”⁷⁸

后来她承认：“当时我们只看到因为我们而造成的现实情况：共产党人加入了政府而我们没有，各种各样的可能性，我们所有的胜利成果都有付诸东流的危险。”⁷⁹

“我们打算把工人阶级的利益……完全委托给那些政党吗？”担任商业部长的全国劳工联合会成员胡安·洛佩斯问道，“决不！”⁸⁰

在巴伦西亚出版的全国劳工联合会报纸《社会熔炉报》的负责人曼努埃尔·比利亚尔写道：“出于防止工人和农民的胜利成果受到攻击、……防止发生宗派斗争、防止军队变成某个政党的工具、防止在经济和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出现极权主义倾向并且排除独裁的危险……等特殊目的，全

国劳工联合会被迫加入了政府。”⁸¹

担任司法部长的全国劳工联合会和伊比利亚无政府主义者联盟成员加西亚·奥利韦尔提出了另外一个原因。他在离开内阁后声称，为了确保“外国资产阶级”提供军事援助，必须“给人造成不是革命委员会而是合法政府控制局面的印象”。⁸²

最后，据商业部长胡安·洛佩斯说，全国劳工联合会加入政府的根本目的之一是想通过赋予在内战爆发初期如雨后春笋般出现的革命委员会以合法地位来控制西班牙的政治生活。⁸³

但是，如果不包括与政府合作的主要倡导者奥拉蒂奥·普列托提出来的那些理由，自由主义运动的代表们对全国劳工联合会加入政府的根本原因所作出的多种解释将是不完整的。他的儿子塞萨尔·M. 洛伦索写道：

211

奥拉蒂奥·普列托在多次发言、演讲、讨论和商议中说明了全国劳工联合会必须加入政府的各种理由。它们可以概括如下：“自由主义者在共和派控制区并不具备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人的精神或者物质力量，更不必说赢得反法西斯战争了。即使最不可能的事情发生，他们战胜了法西斯分子以及其他反法西斯力量，革命也将受到经济封锁和外国武装干涉的压制。此外，由于其在政治上的盲目和军事上的无能，共和国政府正在把共和派引向灾难，同时它还全力打击工人积极性及其民兵组织和革命成果。因此，必须在某种先进的民主国家的框架内挽救社会主义革命的成果，统一开展[军事]行动并且化解列强的压力。最后，自由主义者从内战爆发的第一天起由于参加各种地方或者地区的管理机构而事实上具有的意志以及人民大众想要看到建立一个真正的反法西斯联盟的愿望必须通过承担最大的责任来实现。”⁸⁴

注释：

1 杰拉尔德·布雷南，《西班牙迷宫》，第224页。

2 弗朗西斯科·拉尔戈·卡瓦列罗，《西班牙劳动者总工会的现状与未来》，第43页。

- 3 见何塞·安德烈斯-加列戈《独裁统治时期的社会主义：1923—1930》，第322页。
- 4 同上，第323页。
- 5 见达马索·贝伦格尔《共和国的独裁》，第52页。
- 6 见赫尔穆特·吕迪格《西班牙革命评论文集》，第25页。内战期间，吕迪格是国际工人协会驻西班牙代表，全国劳工联合会是国际工人协会的成员。
- 7 布雷南，《西班牙迷宫》，第258—259页。另请参阅塞萨尔·M.洛伦索《西班牙无政府主义者与权力，1868—1969》，第76—77页；S.卡诺瓦斯·塞万提斯，《杜鲁蒂和阿斯卡索：全国劳工联合会与七月革命》，第15页；何塞·佩拉特斯，《西班牙革命中的全国劳工联合会》，第一卷，第35—36页；理查德·A.H.鲁宾逊，《佛朗哥西班牙的起源：右派、共和国和革命，1931—1936》，第120—121页。
- 8 全国劳工联合会和伊比利亚无政府主义者联盟的著名成员哈辛托·托里奥发表在一九四〇年五月十九日《自由之路》上的文章。
- 9 实例见鲁道夫·罗克《无政府工团主义》，第116页。
- 10 《国际工人协会原则宣言》，载一九三八年五月号《国际》。
- 11 伊萨克·普恩特发表在一九三二年四月十五日《工人团结报》上的文章，见普恩特《宣传品》，第132页。
- 12 拉尔戈·卡瓦列罗的演说，载一九三六年四月十一日《光明报》。
- 13 一九三六年四月二十四日《工人团结报》。
- 14 一九三六年六月七日《工人团结报》。
- 15 实例见一九三六年七月七日和九日的《光明报》。
- 16 弗兰克·E.曼努埃尔，《现代西班牙政治》，第167页。
- 17 一九三六年六月三日《太阳报》。
- 18 为了了解这些情况，请看下列参考资料：劳动者总工会副书记帕斯库亚尔·托马斯的演说，分别载于一九三六年十二月二十一日和一九三七年二月十七日《巴伦西亚通讯》，一九三七年二月二十六日和三月三日《全国劳工联合会报》，一九三七年四月十三日《光明报》；全国劳工联合会全国委员会和劳动者总工会执委会一九三六年十一月二十六日签署的文件，见佩拉特斯《西班牙革命中的全国劳工联合会》，第一卷，第252—253页；全国劳工联合会中部地区工会一次会议的代表发言摘要，见一九三六年十月八日《全国劳工联合会报》。
- 19 一九三六年十月二十五日《光明报》。
- 20 洛伦索，《西班牙无政府主义者与权力》，第222页；另请参阅一九三六年十月二十七日《光明报》。
- 21 一九三六年十月二十八日《全国劳工联合会报》。
- 22 我知道有些人可能不接受这一总体结论，然而，它并不是在没有认真研究的情况下作出的。在一九六一年出版的《精心的伪装》一书中，我写了下面这一段内容：“在反佛朗哥阵营中，每个工会组织的成员总数可能在一百五十到一百七十五万之间，但是，无法提供战时成员的准确数字。根据倾向于这个或者那个组织的原始资料估计出了上限和下限这两个数字，但是，因为没有办法检查它们的准确性，让这个问题受限于这两个数字没有意义。”在那以后，何塞·路易斯·吉内亚的《西班牙工人运动与工会，1833—1978》一书根据向国际工会联合会缴纳的会费，认为一九三八年劳动者总工会的会员人数为一百九十万零四千五百六十九人，见第94—95页。
- 23 洛伦索，《西班牙无政府主义者与权力》，第222页。
- 24 同上。
- 25 一九三六年九月五日《全国劳工联合会报》。
- 26 洛伦索，《西班牙无政府主义者与权力》，第222—223页。

- 27 同上。
- 28 同上，第224页。
- 29 弗朗西斯科·拉尔戈·卡瓦列罗，《关于西班牙内战的历史记录》，第261—262页。
- 30 洛伦索，《西班牙无政府主义者与权力》，第224页。
- 31 奥拉蒂奥·M.普列托，《政治斗争中的西班牙无政府主义》，第7页。
- 32 见发表在一九三六年九月十七日《全国劳工联合会报》上的决议案。
- 33 见拉萨里略·德·托梅斯[贝尼尼奥·贝哈拉诺]未发表的著作《死者没有原谅你们》，第69页。
- 34 洛伦索，《西班牙无政府主义者与权力》，第249页。
- 35 因加入政府和其他原因谴责全国劳工联合会的最著名的外国无政府主义者是俄国流亡者亚历山大·夏皮罗。关于他在西班牙内战的第一年对全国劳工联合会政策的尖刻指责，见其发表在一九三七年五月二十八日、八月二十七日 and 十一月十九日《工会斗争》上的文章。另请参阅亚历山大·夏皮罗和阿尔伯特·德容的《我们的革命为什么失败?》。著名的美国无政府主义者埃玛·戈德曼也批评了全国劳工联合会，但是没有那么尖刻。在对国际工人协会代表大会发表的一次演说中，她说：“全国劳工联合会和伊比利亚无政府主义者联盟加入政府并向莫斯科那个贪得无厌的恶魔让步肯定不利于西班牙革命，甚至不利于反法西斯斗争。但是，怀着对全国劳工联合会和伊比利亚无政府主义者联盟的远大抱负几乎抑制不住的希望，与西班牙现实进一步的密切接触使我更好地理解他们的策略，并且有助于我提高警惕，以免对我们的同志做出任何教条主义的判断。”（《红色埃玛言论：文章演说选》，第375—377页）另请参阅《无以为家：埃玛·戈德曼和亚历山大·伯克曼寄自流亡地的信》，第271—272页和《我的立场》，载一九三七年七月二日《西班牙与世界》。
- 36 一九三八年一月号《国际》。
- 37 见发表在一九三六年九月十七日《全国劳工联合会报》上的决议案。
- 38 一九三六年九月二十五日《工人团结报》。这种企图蒙骗外国舆论的天真尝试可能是在全国劳工联合会和伊比利亚无政府主义者联盟加泰罗尼亚地方委员会主管宣传的书记哈辛托·托里奥的授意之下进行的。据著名的无政府主义者弗雷亚尔·奥卡尼亚说，托里奥指示自由主义运动的所有演讲者在宣传时不要谈论自由共产主义。“许多自由主义宣传人员显然没有注意到这种行为的愚蠢——即使我们注意到，我们相信我们也将不得不为此付出高昂的代价，于是，我们继续……发表无政府主义言论。”（一九四〇年八月十七日《无产阶级文化报》）另请参阅塞韦里诺·坎波斯发表在一九四一年一月二十五日《无产阶级文化报》上的文章。在西班牙活动的法国无政府主义者加斯东·勒瓦尔当时写道：“因为需要武器弹药，因为必须从国外获得它们，因为必须依靠民主国家的公众舆论（就资产阶级的词义而言），西班牙人民的所有开创性工作都被无声无息地忽略了。这是一个错误，它使得国际无产阶级的注意力更多地集中在其他方面而不是集中在西班牙人民身上。”（《西班牙的社会重建》，第3页）
- 39 洛伦索，《西班牙无政府主义者与权力》，第227—228页。
- 40 关于无政府工团主义报纸发表的一些令人十分感兴趣的社论，见一九三六年九月十九日和十月六日《全国劳工联合会报》；一九三六年九月三十日、十月二日和四日《工人团结报》。
- 41 关于共和派和共产党人态度的实例，见一九三六年十月八日《巴伦西亚商报》（左翼共和派议员安赫尔·莫利内尔的演说）；一九三六年十月一日《劳动报》和一九三六年九月二十二日巴伦西亚《真理报》。
- 42 一九三六年九月三十日《光明报》。
- 43 一九三六年十月三十一日《光明报》。

- 44 马利亚诺·卡多纳·罗塞利写给我的信。
- 45 对全国劳工联合会和伊比利亚无政府主义者联盟领导人费德里卡·蒙特塞尼的采访，载一九七七年六月号《历史时期》。
- 46 奥拉蒂奥·M.普列托，《政治斗争中的西班牙无政府主义》，第6页，另请参阅第7页。
- 47 一九三六年十月二十三日《全国劳工联合会报》。
- 48 见一九三六年十月三十日《全国劳工联合会报》和拉尔戈·卡瓦列罗对《每日快报》记者发表的声明，载一九三六年十月二十九日《光明报》。
- 49 新的任命和职位变化见一九三六年十一月五日《共和国官方公报》。
- 50 拉萨里略·德·托梅斯（贝尼尼奥·贝哈拉诺），《西班牙，自由的摇篮》，第83页。
- 51 见一九三六年十月二十五日《光明报》。“因马德里被围困而产生的严重问题和避免出现内部混乱的迫切需要使卡瓦列罗决定让全国劳工联合会加入政府，全国所有反法西斯的力量由此形成一个阵营。”（胡利奥·阿尔瓦雷斯·德尔巴约，《自由之战》，第215页）
- 52 弗朗西斯科·拉尔戈·卡瓦列罗，《我的回忆：致一位朋友的信》，第187页。
- 53 阿尔瓦雷斯·德尔巴约，《自由之战》，第216页。
- 54 拉尔戈·卡瓦列罗，《我的回忆》，第188页。
- 55 阿尔瓦雷斯·德尔巴约，《自由之战》，第215—216页。在《关于西班牙内战的历史记录》的第261页，拉尔戈·卡瓦列罗提到何塞·希拉尔与阿萨尼亚之间进行的一次电话交谈，但却没有说明他自己与总统谈话的内容。不过，巴塞罗那市长卡洛斯·皮·苏涅尔证实，拉尔戈·卡瓦列罗打电话给阿萨尼亚，说他准备组成一个包括四名全国劳工联合会成员的政府。见接下来的内容。
- 56 《阿萨尼亚文集》，第四卷，第592页。
- 57 卡洛斯·皮·苏涅尔，《共和国与内战：一个加泰罗尼亚政治家的回忆》，第418—419页。
- 58 胡利安·苏加萨戈伊蒂亚，《西班牙内战史》，第181页。
- 59 因达莱西奥·普列托，《我的一生》，第324—325页。
- 60 拉尔戈·卡瓦列罗，《关于西班牙内战的历史记录》，第281—282页。
- 61 阿尔瓦雷斯·德尔巴约关于这件事情的说法见《自由之战》，第217—218页。
- 62 普列托，《我的一生》，第324—325页。
- 63 同上，第325—326页。
- 64 西普里亚诺·梅拉，《一名无政府工团主义者的战争、流亡和监狱生涯》，第74—77页。
- 65 正如塞萨尔·M.洛伦索所指出的那样：“十一月七日，政府撤离的那一天，所有政党和工会组织的领导机构几乎同时离开了马德里。”（《西班牙无政府主义者与权力》，第255页，注释2）
- 66 同上，第254—255页。另请参阅奥拉蒂奥·M.普列托发表在一九四九年七月三日（巴黎）《自由西班牙报》上的文章。关于马利亚诺·巴斯克斯——他被亲切地称为马利亚内特——的生平介绍，见费德里卡·蒙特塞尼发表在一九四九年六月二十四日（巴黎）《全国劳工联合会报》上的文章。
- 67 见一九三七年四月举行的全国劳工联合会加泰罗尼亚地区代表大会通过的决议案，由P.贝尔纳德（贝尔纳多·波乌）发表在一九四八年五月一日《宇宙报》上的文章提供，其中提到了这一事实；另请参阅马利亚诺·巴斯克斯（一九三六年十一月十九日开始担任全国劳工联合会全国委员会书记）向国际工人协会特别代表大会所作的报告，见一九三九年三月十五日《新西班牙》和J.卡普德维拉发表在一九五一年四月七日（巴黎）《工人团结报》上的文章。
- 68 一九三六年十一月四日《工人团结报》。全国劳工联合会的激进分子阿道弗·布埃索认为，为全国劳工联合会加入政府进行这种解释和辩护是伊比利亚无政府主义者联盟领导人阿瓦德·德·桑蒂连（“最坚定的自由主义者”）——但是没有说发表在《工人团结报》

- 上的文章是谁写的（阿道弗·布埃索，《一名全国劳工联合会会员的回忆》，第二卷，第213页）。
- 69 见加泰罗尼亚地区无政府主义团体联合会发表的宣言，载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十九日《土地与自由》。中部地区无政府主义团体联合会发表的一份宣言坚称，尽管全国劳工联合会加入了政府，但是，这“与我们的信条一点也不矛盾”（见一九三七年三月二十日《无产阶级文化报》）。另请参阅（担任商业部长的全国劳工联合会成员）胡安·洛佩斯的演说，载一九三七年二月十一日《工人团结报》，一九三七年五月二十二日和十月三十日《土地与自由》以及伊比利亚无政府主义者联盟半岛委员会向国际自由主义运动发表的宣言，载一九三七年十月二十三日《无产阶级文化报》。
- 70 一九三八年十月号《国际》。
- 71 何塞·佩拉特斯，《西班牙政治危机中的无政府主义者》，第216页。
- 72 在阿利坎特发表的演说，载一九三六年十二月二十二日《每日图片报》。
- 73 她的父母是著名的无政府主义者费德里科·乌拉莱斯（胡安·巴蒂斯塔·蒙特塞尼）和索莱达·古斯塔沃。
- 74 见一九三七年六月八日《社会熔炉报》。
- 75 塞韦里诺·坎波斯一九五〇年十月二十七日写给我的信（现存胡佛研究所）。
- 76 蒙特塞尼一九五〇年五月三十一日写给我的这封信现存胡佛研究所。对奥拉蒂奥·普列托在选择全国劳工联合会和伊比利亚无政府主义者联盟的政府代表这个问题上所起的主导作用的详细描述，见（他的儿子）洛伦索，《西班牙无政府主义者与权力》，第232—234页。
- 77 一九四七年七月《关切》特刊。另请参阅蒙特塞尼发表在一九六六年一月九日《希望报》上的文章。
- 78 在巴塞罗那发表的演说，载一九三七年一月五日《工人团结报》。另请参阅一九三七年六月八日《社会熔炉报》所报道的她的演说。
- 79 蒙特塞尼一九五〇年十二月七日写给我的信（现存胡佛研究所）。
- 80 一九三六年十二月二十三日《全国劳工联合会—伊比利亚无政府主义者联盟情况通报》报道。
- 81 一九三八年六月号《国际》。另请参阅一九三七年四月举行的全国劳工联合会加泰罗尼亚地区代表大会通过的决议案，见P.贝尔纳德（贝尔纳多·波乌）发表在一九四八年五月一日《宇宙报》上的文章。
- 82 一九三七年六月二十四日《自由主义报》所报道的加西亚·奥利韦尔的演说。
- 83 一九三七年五月二十九日《社会熔炉报》所报道的胡安·洛佩斯的演说。
- 84 洛伦索，《西班牙无政府主义者与权力》，第235页。

遏制革命委员会

无政府工团主义领导人希望，自由主义运动加入内阁将使其能够更有效地保护自己的革命成果，与此同时，在另一方面，目光转向西方民主国家的共产党领导人则希望，通过提高政府在全国劳工联合会和伊比利亚无政府主义者联盟普通成员当中的威信，自由主义运动加入内阁将会促进被破坏的国家机器的重建，进而使他们能够在某种民主性质的上层建筑的掩护下，把内战爆发时被革命委员会篡夺的各个部门的国家权力集中到自己手里。此外他们还希望，全国劳工联合会加入政府将使正规的管理机构更快地取代这些委员会。除了篡夺国家权力之外，这些委员会还接管了市政当局以及其他地方管理机构的日常职能；而从革命的第一天起，正规的管理机构不是被强迫靠边站，就是不再行使职能。

对于曾经在一九三四年左派在阿斯图里亚斯暴动时呼吁用革命的权力机构取代共和国的共产党人¹来说，这种政策体现了某种根本的改变。它也与俄国布尔什维克一九一七年奉行的政策截然不同；因为后者在革命初期致力于用苏维埃取代旧的政府机构，而在西班牙革命中，共产党人则致力于用正规的管理机构取代革命委员会。“形形色色的专门委员会像瘟疫一样突然流行起来，它们执行人们完全意想不到的各种职能。”共产党的喉

舌《工人世界报》在内战初期不满地写道，“我们声明，我们每一个人应当关心如何保卫民主共和国，由于这个原因，所有机构都应当准确地反映拉尔戈[·卡瓦列罗]政府的成员结构并促进实现该政府的目标，我们大家全都承诺支持并且捍卫这些目标。这是取得战争胜利的先决条件，它是由诸多因素造成的，具有我国和国际的特点，我们必须采取与其相适应的措施。”²

213

共产党的意见是，这些委员会——它们大部分被全国劳工联合会和伊比利亚无政府主义者联盟中比较激进的成员控制着，而且在各自的地区它们的权力实际上不受任何约束——应当被正规的管理机构所取代，组成政府的所有党派应当在这些管理机构中拥有代表，它们的权力应当受到国家法律的限制。社会党人和共和派人士的意见相同。无政府工团主义者则恰恰相反，他们坚持认为，这些革命机构应当成为新社会的基石。“这些委员会是人民创建的反对法西斯叛乱的机构。”马德里的主要自由主义报纸《全国劳工联合会报》宣称，“……如果不用这些委员会取代省市各级管理部门以及许多其他资产阶级民主机构，就不可能抵抗法西斯主义。它们是人民为了发动革命而创建的革命委员会。……我们这并不是说西班牙应当被数以百计分散在各地的委员会的工作弄得四分五裂。我们希望以这些从人民中间产生的机构为基础……重建西班牙社会，因此，我们应当达成一致，希望它们发挥作用。我们保护它们的主要目的为的是防止在七月十九日被非常可悲地摧毁的那些资产阶级机构和准则死灰复燃。”³

但是在内阁中，全国劳工联合会和伊比利亚无政府主义者联盟的政府部长受到对手的步步紧逼，后者以安抚外国舆论进而增加政府从西方国家得到武器的可能性为由，不断施加压力要求终止委员会的权力。四名无政府工团主义内阁成员之一的费德丽卡·蒙特塞尼写道：“共产党人、社会党人和共和派人士的论点始终一致：必须使西班牙共和国具有一种合法的外表，以消除英国、法国和美国的担忧。因此，国家恢复了它曾经丧失的地位，而作为国家的组成部分，我们革命者帮助它做到了这一点。这就是把我们拉进政府的原因。虽然我们并不愿意加入政府，我们还是加入了，因此，除了在这种恶性循环中被人束缚住手脚之外，我们别无选择。但我可以明确声明，尽管最终我们失败了，我们仍然寸土必争地捍卫了我们的

利益，而且从来没有在不经全国劳工联合会全国委员会——其中有一名伊比利亚无政府主义者联盟的常任代表——事先授权的情况下支持过任何破坏革命成果的事情。”⁴

一九三七年二月，担任工业部长的全国劳工联合会成员胡安·佩罗承认自己担心英法两国不会根本改变它们在向西班牙政府提供武器问题上的立场，但他认为，“在我们打仗而不是闹革命的情况下”，胜利取决于这两个大国。他接着写道，这并不意味着放弃革命。“前进的路线是这样的：我们必须打仗，而在打仗的同时，我们应当通过小心谨慎地控制工厂仅限于为革命做准备，因为，这相当于站在革命的立场上，用切实有效的方式为在内战结束之后给资本主义社会以致命的一击锻炼自己。”⁵一位著名的自由主义运动左派成员写道：“这是害怕那些‘民主’国家看到我们推进革命将使我们失去它们的‘帮助’，政客们还用这一论点成功地使那些为西班牙的自由发动革命的人踌躇不前。”⁶

214

结果，得到全国劳工联合会成员默认政府通过了法令，非但没有如全国劳工联合会加入政府时所希望的那样给予各种委员会以合法地位，⁷反而规定必须解散它们并以正规的省市行政当局取而代之，在这些行政当局中，追随人民阵线的所有党派和工会组织均有代表。⁸另外还颁布了一项法令，要求撤除由地方委员会以及政党或者工会组织在公路沿线和村庄入口设立的一切检查站，并由内政部下属的警察部队接管它们的职能。⁹所有这些措施都对无政府工团主义者在数不清的城镇和乡村所取得的支配地位产生了威胁，并且实际上导致他们在某些情况下被排除在村委会之外，¹⁰自然而然地使敌视全国劳工联合会和伊比利亚无政府主义者联盟主导地位的情绪更加极端。

尽管拉尔戈·卡瓦列罗内战之前立场革命，而且实际上他所控制的劳动者总工会在许多城镇和乡村的委员会中占据着某种支配地位，但是，如果只是因为对于外国舆论的担心，他在解散这些委员会的问题上与共产党人以及政府的其他成员达成共识是可以理解的。当他在上台之后不久宣称必须放弃革命口号以便赢得民主国家的友谊时，他想必已经意识到，他为确保英法两国的支持所做的努力不能仅限于对共和国宪法的口头拥护，因此，必须解散行使国家职能的革命权力机构。

一位左派历史学家坚持认为：“共产党人的压力……和生怕激怒英法两国的担忧使拉尔戈·卡瓦列罗相信，必须尊重共和国的合法地位，[因此]他最终接受了西班牙共产党的论点：首先让我们赢得战争，然后我们再进行革命。尽管坚守着自己的革命信念，但他认为现在不是夺取政权的适当时机，那应当推迟到战争结束以后。……不过，共产党人、社会党改革派和共和派人士希望走得更远。[他们想要]重新夺回当年七月小资产阶级失去的权力并将革命镇压下去。”¹¹

215 撇开外国舆论的问题不说，拉尔戈·卡瓦列罗及其内阁的大部分成员还有其他具有说服力的遏制革命委员会的动机，主要是因为许多革命委员会事实上被全国劳工联合会和伊比利亚无政府主义者联盟所控制，它们影响政府的权威而且几乎全面干扰政府的工作。¹²“目前，”拉尔戈·卡瓦列罗的舆论工具《光明报》评论道，“这些机构只能对仅属于人民阵线政府独家所有的职能造成妨碍，全国的所有党派和工会组织均以充分负责的态度加入了这个政府。”¹³而共产党的《工人世界报》写道：“关于内战之初在西班牙共和派控制区的城镇和乡村建立的诸多机构是否必要可能存在着一些疑问。然而毫无疑问的是，它们现在……严重妨碍了政府的工作。”¹⁴在这一点上对委员会的指责不仅来自共产党人和社会党人，就连担任工业部长的胡安·佩罗也公开承认它们妨碍政府履行职能。在前面提到的那些法令颁布的几周前，他在全国劳工联合会的一次公众集会上说：“政府颁布了一项法令，可是地方委员会却把它们指示塞了进去。当政府试图依法办事时，它们把所有事情搅得乱成了一锅粥。（听众开始低声议论。）不是政府多余，就是委员会多余。（听众高喊‘对！’）这些干预是什么意思？委员会是多余的？（更多人高喊‘对！’‘不对！’‘对！’）……委员会不是多余的，但它们必须成为政府的附属机构。”¹⁵

由于自由主义运动内部在解散委员会的问题上存在着分歧，从法令的颁布到它们的落实还有很长一段距离，结果，在无政府工团主义者占据绝对支配地位的许多地区，甚至在不那么激进的劳动者总工会占优势的一些地区，革命委员会不顾政府的反对继续存在。

不过，应当指出的是，据无政府工团主义者说，新的市政当局迟迟无

法建立的原因是人民阵线的各个党派试图得到与它们的实力不成比例的代表权。“自从要求组成新的市政当局的法律颁布以来，”伊比利亚无政府主义者联盟的喉舌《卡斯蒂利亚自由报》在谈到利夫雷城省（原雷阿尔城省）的情况时写道，“尽管时间一点点过去，可是只有三四个地方建立了新的市政当局。并非代表某一个党派的人民阵线想要占据大多数职位。我们希望按比例代表制分配。”¹⁶

共产党人告诫大家：“那些为像一张大网一样存在的各种各样的委员会进行辩护的人们忘记了一个重要问题：对于我们来说，现在没有什么事情能比权力分散危害更大。我们知道支持委员会的同志们并不希望西班牙被这些数以百计的委员会的各自为政弄得四分五裂。另一方面，他们认为[共和国的]民主机构现在没有用处了。这是一种错误的认识。令人费解的是，当我们因为国家的民主体制适合革命的现阶段并且是赢得战争的重要条件而必须捍卫它的时候，有人竟然想把这种体制和机构变成一种纯粹的装饰。”¹⁷

但是，仅仅劝说并不能保证这些法令贯彻执行。只有通过重建共和国的治安力量，政府才能强制推行它的意愿，从而把被革命委员会篡夺的各个部门的国家权力集中到自己手里。正如我们马上就将看到的那样，拉尔戈·卡瓦列罗的内阁早已意识到这一点。

注释：

- 1 实例见《西班牙的苏维埃：西班牙共和国的工人和农民为权力而进行的斗争》。
- 2 一九三六年九月九日《工人世界报》。另请参阅一九三六年十二月三十日巴伦西亚《真理报》。
- 3 一九三六年十二月二十日《全国劳工联合会报》。此处引述的这一段内容转译自（在巴塞罗那出版的）德文无政府主义期刊《社会革命》一九三七年三月第五至六期。找不到这篇文章的西班牙文本。
- 4 蒙特塞尼一九五一年四月二十一日写给我的信（现存胡佛研究所）。
- 5 胡安·佩罗发表在一九三七年二月二十三日《政治报》上的文章。
- 6 索拉诺·帕拉西奥发表在一九三八年九月二十八日《新时代》上的文章。
- 7 见一九三七年五月二十九日《社会熔炉报》所报道的担任商业部长的全国劳工联合会成员胡安·洛佩斯的演说。

- 8 见一九三六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和一九三七年一月七日《共和国官方公报》。
- 9 见一九三六年十二月二十六日《共和国官方公报》。应当指出的是，这些法令均不适用于半自治的加泰罗尼亚地区，那里的事情采用的是不同的程序。
- 10 实例见玛蒂尔德·巴斯克斯和哈维尔·巴莱罗的《马德里的内战》，第289—290页。
- 11 霍安·埃斯特鲁奇，《西班牙共产党史，1920—1939》，第一卷，第103页。
- 12 关于共产党对革命委员会收税和征用农产品的指责，见一九三六年十二月一日、八日和三十日、一九三七年一月十二日（胡安·何塞·埃斯克里奇的演说）巴伦西亚《真理报》；一九三七年三月三十一日《红色阵线报》。
- 13 一九三七年二月十九日《光明报》。另请参阅拉尔戈·卡瓦列罗在一九三七年二月一日举行的议会会议上的演说，载一九三七年二月二日《每日图片报》。关于社会党温和派以及社会党左派对委员会的其他指责，见一九三七年二月十六日《光明报》（莱昂西奥·佩雷斯的文章）；一九三六年十一月三十日（莫利纳·科内赫罗的演说）、一九三七年二月一日（安赫尔·加拉尔萨的演说）、一九三七年二月十六日（鲁道夫·略皮斯的演说）《巴伦西亚通讯》；一九三七年三月二日、十日和十一日《社会主义者》（社论文章）；一九三七年一月九日巴伦西亚《真理报》（胡安·顿迪多尔的演说）。
- 14 一九三六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工人世界报》。
- 15 一九三六年十一月二十九日《工人团结报》所报道的胡安·佩罗的演说。
- 16 一九三七年三月三十日《卡斯蒂利亚自由报》。
- 17 一九三七年一月二十六日巴伦西亚《真理报》。

治安力量

本书前面讲述了共和国的治安力量在军事叛乱和社会革命的冲击下土崩瓦解的情况。因为大批人员投靠叛军，并且因为左派组织临时拼凑的治安委员会和民兵小分队接管了警察的职能，国民卫队、突击卫队和秘密警察解体了。¹拉尔戈·卡瓦列罗政府的内政部长安赫尔·加拉尔萨说，这些治安力量“或优或劣，或胜任或无能，有一些绝对忠诚，另一些则被卑鄙的欲望和邪恶的本能所驱使，在后方履行着某种职能……，[而且]有时是城镇和乡村可以用来对付法西斯分子的唯一力量”。²“主要由于民兵机智巧妙的工作，”左翼共和派的喉舌《政治报》写道，“在后方消灭了法西斯主义。”³

仅凭少量供其调遣的共和国警察残余部队，一九三六年七月十九日组成的何塞·希拉尔自由派政府面对工人组织的革命恐怖活动无能为力，工人纠察队和巡逻队进行搜查、逮捕并且草率地将人处决。据社会党人阿图罗·巴雷亚说，在马德里，工会和政党的每个分支和派系都建立了“各自的警察、监狱、行刑队及专用刑场”。⁴

无论是希拉尔内阁还是任何其他政府，只有重建并且增强其控制下的治安力量才能成功地制止这种恐怖活动进而确立自己在西方社会心目中的

威信。共产党人、社会党人和共和派人士在这一点上意见一致，尽管他们在最终由谁控制重新组建的警察部队的问题上各有主张。

一九三六年八月三十一日，希拉尔内阁采取了重建正规治安力量的第一个重要措施，它颁布了一项法令，要求清理并且重建国民卫队，今后它将被称为共和国国家卫队。⁵在拉尔戈·卡瓦列罗政府治下，为这支部队招募了数千名新兵；突击卫队的情况一样，据担任内政部长的社会党左派安赫尔·加拉尔萨说，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初，突击卫队增加到两万八千人。⁶同样重要的是由隶属于财政部的海关和税务官员及警卫组成的边防警察部队（carabineros）的发展壮大，像突击卫队和国民卫队一样，它在军事叛乱和革命的打击下土崩瓦解。尽管希拉尔政府打算重建这支队伍然后将其当作一支针对革命左派维持公共秩序的力量来使用，但是，它的重建和扩大并没有为此认真进行，直到一九三六年九月胡安·内格林博士——当时他被认为是因达莱西奥·普列托的门生和支持者——掌管财政部以后，开始将它变成一支完全被社会党温和派控制的精锐部队。虽然战前边防警察部队在全国总共只有一万五千人左右，⁷但是据报道，一九三七年四月，仅仅在左派控制区，也就是说，仅仅在西班牙大约一半的领土上，边防警察部队的总人数已经达到四万人。⁸诚然，他们中的一些人在前线的边防警察特种部队中服役，但是，大部分边防警察被留在了后方。⁹众所周知，普列托和社会党温和派鼓励发展边防警察部队的目的在于加强其与卡瓦列罗派社会党人对抗的实力，不过，他们显然首先认为这是一支与极端革命派抗衡的力量。休·托马斯正确地记述了无政府工团主义者指责内格林“逐步把边防警察部队建设成为一支财政部手下的私人军队”，但是，考虑到我们已经提到的事实——到一九三七年四月时，共和国政府控制的领土已经缩减到战前面积的一半而边防警察部队的总人数却从一万五千人左右增加到大约四万人——他的论点无法被人所接受：他说这是内格林“为了保证政府收到应收的税款”造成的。¹⁰

在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对边防警察部队发表的一次讲话中，社会党温和派人士、内格林的副部长赫罗尼莫·布赫达以带有威胁性的言论阐明了边防警察部队未来的作用：“你们是西班牙希望为自己创建的国家的卫士。那些认为可以允许没有社会秩序和道德的混乱局面出现的空想家们大错而

特错，因为人民的军队以及光荣地成为其组成部分的你们这支边防警察部队知道如何防止这种局面出现。”¹¹

无政府主义者并不掩饰他们的担忧：边防警察部队最终将用来对付他们。¹²在《纽约先驱论坛报》刊登的一条发自巴伦西亚的消息中，詹姆斯·米尼菲报道说：“一支可靠的警察部队正在悄悄而稳步地建立起来。巴伦西亚政府发现边防警察部队是达到这一目的的理想方式。……无政府主义者已经注意到这件事情，因此他们抱怨说，‘在尽人皆知几乎没有足够的人流从陆地或海上过境时’却加强了这支部队的力量。他们意识到，它将被用来对付他们。”¹³

一九三八年初，据一名共产党人透露，边防警察部队从一九三七年四月的四万人增加到了六万人，¹⁴接着，在一九三八年下半年，据无政府主义人士说，增加到了十万人，后者将这支部队称为“内格林的十万子弟兵”。¹⁵我们无法断言是否曾经达到过这个数字，但是，整个一九三八年，扩大这支部队规模的努力仍在继续，首先是把入伍的年龄从十八岁降低到十七岁，然后又把它从四十岁提高到四十五岁。¹⁶内格林对边防警察部队有一种偏爱。他有个儿子参加了这支部队，他的用餐由这支部队伺候，他在巴伦西亚附近的小城纳克拉的住宅也由这支部队负责警卫。¹⁷一九三八年四月成为国防部长后，他任命边防警察部队的一名上尉担任臭名昭著的军事调查局（SIM）局长，而在内战结束后，据卡洛斯·孔特雷拉斯（维托里奥·维达利）说，他“愚蠢地”委托边防警察部队的上校恩里克·普恩特用“比塔”号游艇秘密向墨西哥运送财宝，普恩特是一名社会党人，他背叛了内格林，将财宝交给了内格林当时的头号敌人普列托。¹⁸

由于它所享有的特权，边防警察部队在人民军的官兵中不得人心，因为边防警察身穿绿色军装，人们称之为绿色瘟疫（la peste verde）。一些边防警察部队偶尔也会上前线，据总参谋长比森特·罗霍说，“由于他们享有特权，他们的存在往往成为发生不快的原因”。¹⁹与人民军士兵每天挣十个比塞塔相比，他们每天挣十五个比塞塔，食物和武器也更好。²⁰边防警察部队拥有自己的工厂和车间，还有自己的运输工具，这些运输工具通常比军队的精良。后来，正如我们将会看到的那样，当内格林与因达莱西奥·普列托决裂时，他受到他所创建的这支部队的牵制。²¹

在重建治安部队的同时，拉尔戈·卡瓦列罗政府采取措施将独立的工人纠察队和巡逻队纳入它的控制之下。它在上台之后不久颁布了一项法令，要求工人纠察队和巡逻队合并组成治安民兵，经内政部批准与正规的警察部队合作维持国内的秩序。²²所有执行警察职能但不属于新建警察队伍的民兵都被视为“不安定因素”，如果这些人希望加入正规治安部队的话，他们将得到优先考虑。²³事实很快证明，这项法令只是为了把工人纠察队和巡逻队兼并成为国家的武装力量而采取的一项预备措施。²⁴共产党人、社会党人和共和派人士立即利用这个机会加入了正规的警察部队，而无政府工团主义者则犹豫不决并且无视政府的法令，在许多地方坚持保留自己的纠察队和巡逻队。由于决不能默许自己的民兵被国家兼并，一些立场比较坚定的无政府工团主义者要求解散政府的警察部队，将其成员并入工人的民兵队伍。²⁵但是，这种要求毫无意义，因为，由于重新组建了治安部队，由于担任部长的那些全国劳工联合会和伊比利亚无政府主义者联盟成员没有明确表示抗议，政府变得强硬起来，它开始解除违抗法令者的武装并且将他们逮捕，进而一个接一个地在内战爆发以来一直被无政府工团主义者控制的那些地区重新掌握了公共秩序的管理权。²⁶各地的警察根据内政部长对其管辖下的地方当局下达的命令采取措施，收缴一切不属于财政部、内政部、司法部和国防部下属正式机构的人员所拥有的武器。²⁷

在重建政府治安部门的同时，司法领域也发生着重要变化。内战初期工人组织建立的革命法庭逐渐被一种形式合法的法庭取而代之，后者由三位法官以及人民阵线各个政党和工会的十四名成员所组成，每个党派有两名代表。²⁸尽管一九三六年八月底希拉尔政府颁布了建立新的法庭的法令，但是，直到十一月全国劳工联合会加入卡瓦列罗政府几周后，这些法令才开始在各省执行。²⁹

在正规警察部队的重建工作逐步进行的过程中，共产党人充分利用其越来越大的权力以及他们洗脑、诽谤、渗透的技巧保证自己占据某种优势地位。³⁰阿尔瓦塞特省省长胡斯托·马丁内斯·阿穆蒂奥证实，他们与苏联特工一起想方设法向各省的地方长官施加压力。³¹此外，在公开和隐蔽的上层支持者的帮助下，他们利用社会党和共和派领导人的不好意思或谦恭有礼在重建的警察机构里为自己谋得关键职位。例如，一九三六年十一月，

（拉尔戈·卡瓦列罗政府迁往巴伦西亚之后成立的）保卫马德里委员会公共秩序委员圣地亚哥·卡里略及其继任者何塞·卡索拉——两人均转投共产党——成功地掌控了新建的首都治安警察部门；³²同为共产党员的路易斯·奥马尼亚·迪亚斯和洛雷托·阿佩利亚尼斯被社会党左派内政部长安赫尔·加拉尔萨安插在政府新设立的巴伦西亚警察总署署长和警署督察的位置上；³³共产党员胡斯蒂尼亚诺·加西亚和胡安·加兰分别被任命为内政部情报部门特别处的正副处长，而另外两名共产党员费尔南多·托里霍斯和某个名叫亚当的人则被安排在警察管理部门担任重要职务。托里霍斯被任命为安全总局政治委员，负责警察的任职、调动和督导；亚当则被任命为警察学校秘密警察训练中心主任，负责为新的秘密警察队伍培养骨干。³⁴

从其创建之日起，这支最终比任何穿军装的治安部队都重要的队伍纯粹成为苏联秘密警察的一支武装，由于西班牙在苏联外交政策中目前所占的重要位置，早在内战初期，苏联秘密警察就在左派阵营打下了根基。据瓦尔特·克里维茨基说，一九三六年九月十四日在莫斯科召开了一次紧急会议，苏联秘密警察对外部门负责人阿布拉姆·斯卢茨基³⁵出席了这次会议。“我在这次会议上听斯卢茨基说，”克里维茨基写道，“为了在共和派控制区建立国家政治保卫总局[内务人民委员部]³⁶的特工组织，他手下一名经验丰富的军官被派到了西班牙。这名军官叫尼科利斯基，化名施维德、廖瓦和[亚历山大·]奥尔洛夫。”³⁷早在这些化名还没有在其他地方公布过的一九三九年，克里维茨基就把它披露了出来，这一事实证明，他了解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的内情，这种了解已经得到鲍里斯·尼古拉耶夫斯基和保罗·沃尔的确认，这两个人诚实可信而且熟悉克里维茨基。《亚历山大·奥尔洛夫的遗产》是一九七三年奥尔洛夫在美国——一九三八年叛逃之后他定居美国——去世以后美国参议院国内安全小组委员会所起草的一份文件。据这份文件透露，尼科利斯基是奥尔洛夫在苏共党内的名字；³⁸一九六六年奥尔洛夫本人证实，施维德是斯大林就把西班牙黄金运往苏联的有关事宜与他联系时所用的“代号”；³⁹廖瓦这个名字得到了路易斯·费希尔的证实，一九三六年九月中旬他在马德里与廖瓦见过面并在一九四一年把这一情况公之于世。⁴⁰

为了回答斯坦利·G.佩恩所提出的一份问卷，⁴¹奥尔洛夫在一九六八

年四月一日声明，他于一九三六年八月二十六日受苏共中央政治局委派，因此，克里维茨基所提供的九月十四日这个日期并不准确。这一出入并不重要；考虑到将其斥为江湖骗子的声势浩大的造势运动，重要的是他确实知道属于极端秘密的这一委派。作为对同一份问卷的答复，奥尔洛夫还声明，克里维茨基从来没有担任过苏联秘密警察的高级职务，他只在海牙的一个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的“秘密联络点”工作过，那是“特工等级中最低的级别”。克里维茨基揭露了奥尔洛夫的特工组织在西班牙共和派控制区所扮演的专制角色——我们将看到这种情况，因为后者在他的著作、文章以及向美国参议院小组委员会所作的证词中均对此事只字不提，所以，我们可以把奥尔洛夫的声明当作一次姗姗来迟的贬低克里维茨基的尝试不予考虑。级别如此之低的任何人大概都不可能像克里维茨基这样广泛而准确地了解内情。⁴²

委派奥尔洛夫前往西班牙之后没几个月，通过与西班牙共产党人和外国共产党人、各级社会党人和共和派人士中的地下共产党员以及共产党所控制的西班牙秘密警察密切配合采取行动，苏联秘密警察成为反佛朗哥阵营内部的一个决定事态发展的关键因素。⁴³“事实上，”前共产党领导人费尔南多·克劳丁写道，“斯大林的秘密特工在共和国境内表现得仿佛是在蒙古共和国一样。”⁴⁴

关于拙著《精心的伪装》，在左派控制区采访报道的《纽约时报》记者、具有影响力的公共舆论营造者赫伯特·L.马修斯在他最后一部研究西班牙的著作《半个毁灭的西班牙：对西班牙内战的重新评价》的第113页写道：“博洛滕断言，西班牙的秘密警察‘纯粹’成为苏联秘密警察特工的‘一支武装’，而且苏联国家政治保卫总局迅速‘成为反佛朗哥阵营内部的一支影响事态发展的决定性力量’。这是一种不顾事实的夸大其词。政府的权力始终掌握在西班牙共和国领导人手中。”然而，他在第110页写道：“早在一九三六年九月，在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特工奥尔洛夫的指挥下，共产党人就已开始将数以百计他们的——不一定是共和国政府的——敌人投入监狱，折磨并且杀害了其中许多人。并不是像站在佛朗哥一方的前合众社记者伯内特·博洛滕[实际上我从一九三六年七月十八日起一直站在左派一方]所说的那样，内战期间始终有一个控制着整个共和派地区

的‘独立的苏联警察系统’。当时有许多警务机构（休·托马斯认为有九个），包括一些合法机构。”⁴⁵实际情况当然就像我在本书以及较早之前在《精心的伪装》中已指出的那样，在内战初期，属于不同工会组织和政党派别的各种各样的纠察队、民兵小分队和巡逻队行使着警察的权力。如果像马修斯所承认的那样，实际上这样的机构有很多，包括“一些合法机构”——这意味着不少机构没有得到政府的许可；此外，如果像他承认的那样，共产党人在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的指挥下开始将“数以百计他们的敌人”投入监狱，“……折磨并且杀害了其中许多人”，那么，他所谓“政府的权力始终掌握在西班牙共和国领导人手中”就难以自圆其说了。

从马修斯同一本书的第120页引述的下面这一段内容应当足以指出这种说法的漏洞：“一九三六年十一月六日和十一月七日至八日夜间，当时马德里命悬一线，大约一千名囚犯从模范监狱被带走，然后在马德里及其周围的村庄遭到杀害。……我相信，命令来自共产国际在马德里的代表，因为我知道，阴险的维托里奥·维达利[在西班牙化名卡洛斯·孔特雷拉斯，在美国化名埃内亚·索尔门蒂]那天晚上在某个监狱对囚犯进行简单的审讯，当他像通常那样认定他们是第五纵队成员时，就用他的左轮手枪向他们的后脑勺开枪。”

因为维托里奥·维达利是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在西班牙的特工组织的成员，所以，亚历山大·奥尔洛夫对这些暗杀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然而，在所有书面和口头的证词中，奥尔洛夫始终把他在西班牙的任务说成是担任与人无害的“共和国政府在情报、反情报和游击战方面的首席苏联顾问”，⁴⁶同时避免提到他在左派阵营内部事务中的秘密警察职能和专制角色，无论是对所谓右派还是对反斯大林主义者。另一方面，路易斯·费希尔认为奥尔洛夫是“国家政治保卫总局[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在共和派控制区的特工负责人”，⁴⁷这是一个简单朴素的头衔，更加直截了当地表明了他对西班牙公民的生活所行驶的权力。克里维茨基肯定地说：“国家政治保卫总局[内务人民委员部]特工组织有它自己的专用监狱。[一九七四年，时任流亡的西班牙共产党书记的圣地亚哥·卡里略确认了这一事实。⁴⁸]它的特工实施暗杀和绑架。它有许多秘密的地牢并且进行突然袭击。当然，它独立于共和派政府行动。司法部对国家政治保卫总局的特工组织没有管

辖权，它是一个国中之国。它是一支强大的力量，在它面前，就连拉尔戈·卡瓦列罗政府的一些高官也要发抖。苏联似乎控制了西班牙共和派占领区，那里仿佛已经是苏联的一块属地。”⁴⁹

注释：

- 1 见本书第四章。
- 2 一九三七年八月五日《巴伦西亚通讯》所报道的安赫尔·加拉尔萨的演说。
- 3 一九三六年九月十八日《政治报》。
- 4 阿图罗·巴雷亚：《制造反叛》，第536页。关于军事叛乱的反对者就左派在革命恐怖初期的暴行所作的证词，见一九三七年八月四日《巴伦西亚通讯》所报道的文塞斯劳·卡里略的演说；胡安·何塞·多门奇纳发表在一九四〇年十一月三十日《今报》上的文章；赫苏斯·德·加林德斯，《被围困的马德里城中的巴斯克人》，第15—19、42—43和67—69页；米格尔·佩德罗发表在一九四一年一月二十五日《阿斯图里亚斯邮报》上的文章；因达莱西奥·普列托发表在一九四二年八月十五日《阿斯图里亚斯邮报》上的文章；一九三七年九月十七日《工人团结报》发表的对桑切斯·罗加的采访；胡利安·苏加萨戈伊蒂亚，《西班牙内战史》，第111—112页。关于内战初期为了执行逮捕政权敌人的任务而建立的革命的后方民兵的情况，见玛蒂尔德·巴斯克斯和哈维尔·巴莱罗的《马德里的内战》，第113—115页。
- 5 一九三六年八月三十一日《马德里官方公报》。
- 6 一九三七年八月五日《巴伦西亚通讯》所报道的安赫尔·加拉尔萨的演说。
- 7 拉蒙·萨拉斯·拉腊萨瓦尔提供的数字是一万五千二百五十一人（见比森特·帕拉西奥·阿塔德等著《接近真实的西班牙内战史，1936—1939》中所收入的他的文章，第100页）。里卡多·德拉·谢尔瓦提供了下列分类数字（见《西班牙内战史》，第一卷，第760页）：七百名军官，一千零九十名没有军衔的文官和一万三千名士兵，总共一万四千七百九十人，其中八千七百五十人在一九三六年七月二十日留在左派阵营。迭戈·阿瓦德·德·桑蒂连提供的总人数是一万五千五百七十人（见《我们为什么输掉了内战》，第236页）。
- 8 一九三七年四月二十八日《纽约先驱论坛报》刊登的詹姆斯·米尼菲（发自巴伦西亚）的报道。另请参阅亨利·巴克利《西班牙共和国的生死存亡》，第311页。一九三六年九月二十三日通过的一项法令授权财政部长为这支部队另外招募八千人（一九三六年九月二十四日《马德里官方公报》），一个月后，这个数字提高到两万（一九三六年十月二十四日《马德里官方公报》）。十一月中旬，内格林估计，这支部队很快将达到三万人（一九三六年十一月十八日《共和国官方公报》）。
- 9 巴克利，《西班牙共和国的生死存亡》，第311页。
- 10 休·托马斯，《西班牙内战》（一九七七年版），第666—667页。
- 11 一九三六年十二月二十七日巴伦西亚《真理报》报道。内格林发布过一道与颁布的法令一致的命令，间接提醒边防警察部队全体人员应当避免参与政治活动并且把自己的“热情”限制在“履行对民主共和国合法政府的职责”上（一九三七年二月二十日《共和国官方公报》）。我们将在后面某一章里看到，由于与共产党人的关系更紧密，内格林无视这道禁

令，从西班牙共产党和加泰罗尼亚统一社会党中为边防警察部队招募新人。加泰罗尼亚统一社会党执委会成员米格尔·塞拉·帕米埃斯在离开该党后的一九四四年告诉我：“加泰罗尼亚统一社会党的许多党员加入了边防警察部队。内格林帮我们的忙，我们也帮他的忙。”对其采访的速记记录现存胡佛研究所。

- 12 实例见一九三七年二月十八日《道路》所报道的菲德尔·米罗的演说。
- 13 一九三七年四月二十八日《纽约先驱论坛报》。
- 14 威廉·拉斯特发表在一九三八年三月一日《工人日报》上的文章。
- 15 阿瓦德·德·桑蒂连，《我们为什么输掉了内战》，第236页。
- 16 一九三八年十一月十五日《政治报》。
- 17 路易斯·费希尔，《人与政治》，第415页。
- 18 内战结束之后维达利在墨西哥对我发表的评论，当时普恩特刚刚背叛了内格林。
- 19 比森特·罗霍，《人们，当心！西班牙内战最后阶段的政治-军事研究》，第186页。内战结束之后，前总政治部下设部门官员加夫列尔·加西亚·马罗托向我证实了这种不快。关于加西亚·马罗托的情况，见本书第二十八章。
- 20 罗霍，《人们，当心！西班牙内战最后阶段的政治-军事研究》，第109页。
- 21 见本书第五十五章。
- 22 一九三六年九月十七日《马德里官方公报》。
- 23 同上。
- 24 见一九三七年八月五日《巴伦西亚通讯》所报道的安赫尔·加拉尔萨的演说。这项法令不适用于加泰罗尼亚地区。
- 25 一九三六年十一月全国劳工联合会巴伦西亚地区代表大会通过的决议案，载一九三六年十一月十八日《社会熔炉报》。另请参阅一九三七年四月十日《自由阵线报》。
- 26 关于对解除无政府工团主义者的武装并将他们逮捕以及警察进驻村庄的抗议，见托马斯·卡诺·鲁伊斯在全国劳工联合会巴伦西亚地区代表大会闭幕会议上的讲话，载一九三六年十一月七日《社会熔炉报》；全国劳工联合会中部地区联合会发表的宣言，载一九三六年十二月二十三日《每日图片报》；一九三七年四月二十三日《社会熔炉报》；一九三七年三月十三日、四月五日、七日八日和十日《我们》。另请参阅伊比利亚无政府主义者联盟的《一九三七年四月十一至十五日在阿利坎特举行的莱万特地区无政府主义团体全体会议会议纪要》，第128—131和133页；莱万特地区劳工联合会，《一九三七年七月十五至十九日在阿利坎特夏季剧院举行的莱万特地区工会代表大会会议纪要》，第199—205页。
- 27 实例见刊登在一九三七年二月十五日《巴伦西亚通讯》上的命令；另请参阅一九三七年三月十三日《共和国官方公报》。
- 28 一九三六年八月二十四日和二十六日《马德里官方公报》；另请参阅一九三六年十月七日《马德里官方公报》。
- 29 见担任拉尔戈·卡瓦列罗政府司法部长的全国劳工联合会和伊比利亚无政府主义者联盟成员加西亚·奥利韦尔的演说，载一九三七年六月一日《社会熔炉报》。
- 30 实例见一九三七年三月十日《自由阵线报》；另请参阅何塞·阿森西奥将军对玛加丽塔·内尔肯的评论，见胡利安·戈尔金《政治食人族》，第218页；《全国劳工联合会报》对一九三六年十二月至一九三七年五月担任安全总局局长的文塞斯劳·卡里略的采访，载一九三七年八月十一日《巴伦西亚通讯》；胡斯托·马丁内斯·阿穆蒂奥，《挟持民众》，第213页；赫苏斯·佩雷斯·萨拉斯，《西班牙内战，1936—1939》，第160页。
- 31 马丁内斯·阿穆蒂奥，《挟持民众》，第205—213页。
- 32 胡利奥·阿罗斯特吉·桑切斯和赫苏斯·A.马丁内斯，《保卫马德里委员会》，第228和236页。

- 33 关于路易斯·奥马尼亚·迪亚斯的情况，我要感谢后来担任军事调查局（SIM）高级官员的秘密警察何塞·穆尼奥斯·洛佩斯（一九五〇年在墨西哥接受我的采访）。关于阿佩利亚尼斯，可以在马丁内斯·阿穆蒂奥的《挟持民众》一书中看到他的概况，见第211和228—230页，其他情况见《关于西班牙历史的补充材料：解放战争时期，1936—1939》，第266—267页。
- 34 关于所有这些情况，我同样要感谢何塞·穆尼奥斯·洛佩斯（见本章注释33）。在一九五一年八月七日和十二月十八日写给我的两封信（现存胡佛研究所）中，拉尔戈·卡瓦列罗手下的安全总局局长文塞斯劳·卡里略证实了亚当和托里霍斯的政治身份。一九三七年四月底，胡安·加兰被任命为内政部控制下的武装部队监察长（见一九三七年四月三十日《共和国官方公报》）。
- 35 亚历山大·奥尔洛夫的《斯大林罪行秘史》、伊丽莎白·K.波列茨基（被暗杀的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特工伊格纳西·波列茨基——化名伊格纳西·赖斯和路德维克——的遗孀）的《我们自己的人》以及美国参议院司法委员会文件《亚历山大·奥尔洛夫的遗产》提供了许多阿布拉姆·斯卢茨基的情况。在安赫尔·比尼亚斯所著《莫斯科的黄金》一书的插图中，有一份关于运到苏联首都的西班牙黄金储备的秘密协议的复印件，协议的签署人之一是A.A.斯卢茨基，他当时的头衔是国家安全人民委员，见第14—17页。
- 36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苏联秘密警察之所以有国家政治保卫局、国家政治保卫总局或是内务人民委员部等等不同的称呼，摘自《麦格劳-希尔俄国和苏联百科全书》第502页的下列资料应当解释了这个问题。根据一九二二年颁布的一项法令，在内务人民委员部（NKVD）中建立了国家政治保卫局（GPU）。一九二三年，国家政治保卫局从内务人民委员部中独立出来，改组成为国家政治保卫总局（OGPU），隶属于人民委员会（Совнарком）。一九三四年再次进行了改组。根据七月十日的一项法令，国家政治保卫总局的职能移交给了内务人民委员部。不过，一九三四年七月以后，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出于习惯，人们仍然经常把苏联秘密警察称为国家政治保卫局或国家政治保卫总局。著名的苏联问题专家戴维·达林在《苏联的间谍活动》一书中详细介绍了苏联秘密警察有关命名再命名的先后顺序，见第1—2页（脚注）。另请参阅雨果·迪尤尔《逍遥法外的刺客》，第200—203页。
- 37 瓦尔特·Г.克里维茨基，《在斯大林的情报部门工作》，第82页。
- 38 《亚历山大·奥尔洛夫的遗产》，第4页。他在苏共党内的全名是列夫·拉扎列维奇·尼科利斯基。
- 39 奥尔洛夫发表在一九六六年十一月号《读者文摘》上的文章。
- 40 费希尔，《人与政治》，第361页。
- 41 感谢佩恩向我提供了由奥尔洛夫签名的这份答卷的副本。该副本现存胡佛研究所。
- 42 奥尔洛夫还在回答佩恩的问卷时声称，克里维茨基“从没有负责过全欧洲的情报工作”。这是事实，但是，克里维茨基当年只是说，他是“苏联军事情报机构在西欧的负责人”。值得注意的是，在讯问奥尔洛夫的过程中，当美国参议院小组委员会负责调查的本杰明·曼德尔（在一九五五年九月二十八日）提到克里维茨基是一名“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的高级军官”时，奥尔洛夫并没有对他进行反驳（美国参议院司法委员会，《亚历山大·奥尔洛夫的遗产》，第29页）。
- 43 戴维·T.卡特尔注意到：“共产党人可能确实煽动并且积极引导了恐怖行动，但是，他们在行动中得到了社会党和共和派团体的配合帮助。”（戴维·T.卡特尔，《共产主义与西班牙内战》，第134—135页）如果他说的是“某些社会党和共和派团体”，那就更加准确了。
- 44 费尔南多·克劳丁，《共产主义运动的危机》，第196页。另请参阅赫苏斯·埃尔南德斯《我是一个斯大林的部长》，第111页。
- 45 着重体是我加的。

- 46 实例见亚历山大·奥尔洛夫的《对斯坦利·G.佩恩教授问卷的答复》；奥尔洛夫发表在一九六六年十一月号《读者文摘》上的文章；奥尔洛夫，《斯大林罪行秘史》，第x页。
- 47 费希尔，《人与政治》，第361页。
- 48 圣地亚哥·卡里略，《西班牙的明天：与雷吉斯·德布雷和马克斯·加洛对话录》，第56页。
- 49 克里维茨基，《在斯大林的情报部门工作》，第102页。另请参阅该书第106—107页以及本书第四十八章。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的特工和共产党控制的西班牙秘密警察没有逮捕令就抓人、把人关进私设的牢房、拷打、绑架和暗杀这一类事情得到了左派知情人的充分证实；实例见一九三七年五月十一日国际工人协会法国通讯社《通讯》（油印）特刊，第4页，被戴维·T.卡特尔引用于《共产主义与西班牙内战》第133页和第237页注释3；一九三七年四月十五日至十八日《卡斯蒂利亚自由报》；一九三七年四月十七日《全国劳工联合会报》（梅尔乔·罗德里格斯的声明）；一九三七年二月二十四日《巴伦西亚通讯》（劳动者总工会巴伦西亚省书记处的公开信）；一九三七年九月二十五日和十二月十八日《无产阶级文化报》；一九三七年九月十七日《新西班牙》（埃塞尔·麦克唐纳的文章）；一九三七年四月十六日、十七日和二十八日《社会熔炉报》；一九三七年四月九日《自由阵线报》；一九三七年十一月七日和十二月四日《独立新闻》；一九三七年八月号（雨果·奥勒的文章）和九月号（安妮塔·布伦纳的文章）《现代月刊》；一九三七年四月十一日和十七日《人民报》；一九四七年七月号《无产阶级革命》（霍尔迪·阿克爾的文章）；一九三七年四月二十日（马德里）《社会主义者》；一九三七年四月二十日、二十三日和二十五日（巴塞罗那）《工人团结报》；一九三七年二月二十二日（乔治·科普的文章）和一九三八年一月十五日（约翰·麦戈文报告的摘要）《工人时代》；阿瓦德·德·桑蒂连，《我们为什么输掉了内战》，第183和185—190页；《杀害安德烈斯·宁》，第18—19页；弗朗茨·博克瑙，《西班牙斗鸡场》，第239—240页；芬纳·布罗克韦，《工人阵线》，第123—124页；皮埃尔·布鲁埃和埃米尔·特米姆，《革命与西班牙内战》，第275—286页；克劳丁，《共产主义运动的危机》，第188页；“农夫”巴伦廷·冈萨雷斯，《在苏联的生与死，1939—1949》，第206页；路易斯·费希尔，《苏联从和平走向战争之路：苏联外交关系，1917—1941》，第284页；戈尔金，《政治食人族》，第133、176—179、184和227—240页；胡利安·戈尔金，《巴塞罗那的莫斯科程序》，第53—56、61和106—266页；克里维茨基，《在斯大林的情报部门工作》，第72—73页；凯蒂娅·兰多，《西班牙的斯大林主义》，第14—17、24、27、33—34和45—48页；约翰·麦戈文，《西班牙的恐怖》，第5和9页；加夫列尔·莫隆，《过去的政治与未来的政治》，第99页；帕特里克·冯·米伦，《西班牙是她的希望：参加西班牙内战的德国人，1936—1939》，143—177页；G.穆尼斯，《失败的里程碑：胜利的保证》，第388—390页；何塞·佩拉特斯，《西班牙政治危机中的无政府主义者》，第265—273页。另请参阅前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民兵司令乔治·科普一九三九年一月二十六日写给前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民兵战士哈里·米尔顿的信，科普在信中说，他亲身到过“国家政治保卫总局[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的十七座秘密监狱”。感谢哈里·米尔顿向我提供了这封信的一份副本，该副本现存胡佛研究所。

国有化对集体化

如果为了强制推行政府的意愿必须重建正规的警察部队并解散那些篡夺了以前属于国家的权力的革命委员会的话，那么，共产党人、社会党人和共和派人士还认为，通过将集体化企业，尤其是基础工业中的集体化企业纳入政府的控制之下从而削弱革命委员会在工厂里的权力同样必要。

当革命开始进行时，何塞·希拉尔政府在这方面采取了初步措施。为了提高政府面对革命委员会的地位并使革命委员会的没收行为合法化，八月二日，希拉尔政府批准了工商部长普拉西多·阿尔瓦雷斯·布伊利亚所提出的一项法令，要求国家接收那些被其拥有者或管理者放弃了的企业——换句话说，就是那些在内战初期逃往国外、隐藏起来或者被监禁和被处决的人所拥有或者管理的企业。法令规定，如果企业的拥有者和管理者在法令颁布四十八小时之内没有上班，国家将着手接收他们的企业，以保证企业继续运转。¹

尽管政府最初的干预非常有限，只是向官方指定的一些被工人委员会接管的马德里的工商企业分别派去人民阵线所有党派的代表各一名，²不过，这项法令仍然是中央政府为了控制工业和商业而采取的第一个重要措施。

其他法令紧随其后陆续颁布。

“通过八月十四日和二十日以及九月一日颁布的法令，”共产党的官方内战和革命史写道，“希拉尔政府向各个电力公司连续派出政府顾问，并且成立了一个有权过问这些公司的技术和管理问题的电力委员会（Consejo General de Electricidad）。该委员会的执委会由人民阵线各党派代表组成：共和派的埃尔菲迪奥·阿隆索，社会党的阿马多尔·费尔南德斯，共产党的路易斯·卡博·希奥尔拉，劳动者总工会的曼努埃尔·洛伊斯，等等。”

223

“西班牙经济中出现了一种非常特殊的国家资本主义。它不是那种被金融寡头利用或者操纵的国家资本主义。它是一种通过人民阵线各党派的代表进行控制的国家资本主义，对于工人阶级，这些代表确信具有不可小觑的影响力。尽管具有局限性，希拉尔政府采取的却是西班牙的资产阶级政府在此之前从未采取过的革命性措施。因此，人们只能对它表示敬佩。”³

共产党人知道，国家资本主义或国有化最终将使中央政府不仅能够根据战争的需要组织安排反佛朗哥阵营的生产能力并且控制战争物资——它们经常被工会分发给当地居民以及自己的民兵组织⁴——的产量和分配，而且能够通过切断其主要源泉之一削弱革命左派的力量。当然，他们不会公开承认国有化带来的政治利益，而只是根据军事和经济的理由为其辩护。⁵集体化运动存在明显问题这一事实使共产党人在宣传活动中有机可乘。首先，集体化企业似乎毫不关心按照合理的军需生产专项计划准备配置技术工人、原材料和机器设备的问题。“我们满足于把资本家从工厂赶走然后自己成立委员会进行管理。”全国劳工联合会和伊比利亚无政府主义者联盟加泰罗尼亚自治区领导人迭戈·阿瓦德·德·桑蒂连说，“没有尝试联系业务，没有以适当的方式搞经济合作。我们的工作没有计划，实际上我们不知道自己正在干什么。”⁶此外，只是因为可以产生高额利润，它们一直生产并非急需的民用商品，甚至生产奢侈品，结果造成原材料和人力的浪费。⁷根据迈克尔·塞德曼主要根据工会的原始资料对巴塞罗那经济革命所进行的研究，尽管工会和工人委员会通过引进新的机器设备、改善工作条件并且尽量消除一些明显的漏洞而使生产更加标准化和现代化，但是，它们“经常受到工人自身的抵制，工人们不断要求增加工资，装病偷懒，

破坏生产，拒绝接受工厂规章制度的管理和约束”。⁸

224

激进的全国劳工联合会成员、加泰罗尼亚地区集体化运动的主要参与者阿尔韦特·佩雷斯-巴罗描述了最初的经济混乱：“在头几天的兴高采烈过后，工人们回到工作岗位，他们发现自己没有管理权。这导致产生了工厂、车间和货栈的工人委员会。在这种变化势必带来各种问题的情况下，工人委员会努力恢复生产。由于缺乏训练以及一些留下来的技术人员——许多技术人员跟资本家一起逃走了——的破坏捣乱，工人委员会和临时组成的其他机构不得不依靠工会的指导。……怀着比取得成功更高的期望，同样在经济问题上缺乏训练的工会领导人开始发号施令，以致工人委员会手忙脚乱，从而使生产陷入严重的无序状态。各个工会……经常发出相互矛盾的不同指示加剧了这种混乱局面。”⁹

为了解决这些问题并且赋予集体化运动——某些非无政府主义历史学家将其称为“最重大的工人自我管理实验”¹⁰——以合法地位，加泰罗尼亚地区自治政府一九三六年十月二十四日批准了一项关于“集体化与工人管理”的法令。该法案由全国劳工联合会倡议并由其在自治政府的代表、经济专员胡安·P.法夫雷加斯签署。¹¹法令第二条规定，所有雇用工人超过一百名的企业将自动实行集体化，而雇工少于一百名的企业可以在多数员工同意的情况下决定实行集体化。尽管法令的这一条款只不过是使已经存在的情况合法化，但是，用佩雷斯-巴罗的话说，这项法令“试图协调整合以前由各个工会或工人委员会进行解释的个体实践”。¹²此外，在工人同意的情况下，全国劳工联合会的那位政府经济专员向每个集体化企业派出一名政府代表，这些企业被集中组成了一些大型的所谓工业总会。反过来，每个工业总会也在作为中央计划协调机构的加泰罗尼亚经济委员会中拥有自己的代表。¹³无政府工团主义者并非全都赞同这项法令。伊比利亚无政府主义者联盟的主要理论家之一、接替法夫雷加斯担任经济专员的迭戈·阿瓦德·德·桑蒂连随后写道：“我在担任经济专员之后不准备考虑或者实施这项法令；我打算让我们伟大的人民，根据他们自己的灵感，以他们认为最合适的方式继续完成这项使命。”¹⁴他还在别的地方说过，这项法令扼杀了“工人在某个不需要任何专家建议的领域里的首创精神”。¹⁵因此，这项法令从未得到强有力的贯彻实施、违法行为大量存在以及关于成立一个

为集体企业融资的工商信贷银行的重要条款没有落实也就不足为奇了。同样不足为奇的是，当一些集体工厂的工人向自治政府的左翼共和派财政专员何塞·塔拉德利亚斯请求资金帮助时，据后者自己证实，他试图“利用他们的困境获得集体化企业的控制权”。¹⁶

在加泰罗尼亚地区以外，财政部长、中央集权论者和国有化的坚决倡导者胡安·内格林也想利用经济的混乱局面。“当内战爆发时，”他对路易斯·费希尔说，“工人组成委员会接管了工厂，他们往往是无政府主义者。……他们用销售所得给自己发工资。现在他们没钱了。他们经常为了弄到流动资金和原材料来找我。我们应当利用他们的困境得到工厂的控制权。”¹⁷

尽管共产党人有支持国有化的充分理由，但是，与人们通常认为的相反，对于在全国范围内管理生产并且使之合理化，无政府工团主义者并不是没有自己的计划。因为根本反对国家控制或国有化，¹⁸他们提倡由工会管理整个生产环节的集体化——或者如他们所说，社会主义化。¹⁹“如果像社会党人和共产党人所要求的那样在西班牙实行国有化，”一份无政府主义报纸写道，“我们就将踏上通往独裁专制的道路，因为政府将会通过国有化来主宰一切，成为所有人和所有事情的绝对主人。”²⁰

无政府工团主义者认为，社会主义化将通过把生产掌握在工会手中消除政府专制的危险。这是自由主义的社会主义化概念：在政府不干预的情况下，它将消灭竞争和重复生产造成的浪费，使制订同时满足民用和军事需要的行业生产计划成为可能，并且通过用效益较好的集体企业的利润提高待遇较差企业工人生活水平的方式遏制工人当中自私行为的上升势头。²¹据研究西班牙无政府主义运动的权威人士达尼埃尔·介朗说：“看来……工人的自我管理可能导致一种自私的排他主义，每个企业只关心自己的利益。[巴塞罗那]通过创建一种中心平衡基金改善这一情况。……结果，公共汽车公司的超额收入被用来补贴效益较差的有轨电车公司。”²²但是，实际上存在着许多不那么容易解决的不平衡状况。

内战初期，加泰罗尼亚和西班牙其他地方的一些全国劳工联合会地方工会的领导人已经有限地采用了集体化形式，在局限于一个地方的某个行业，例如马德里、巴塞罗那和卡尔卡亨特的木制家具业，巴伦西亚的服装

剪裁业、金属加工业和皮革制品业，锡切斯的制鞋业，阿尔科伊的金属加工业和纺织业，昆卡的伐木业，格拉诺列尔斯的制砖业，巴塞罗那和比克的制革业以及阿利坎特省的制鞋业，这里只举了几个例子。²³他们并没有把这种局部集体化当作自己的最终目标，而是认为这是在全国范围内把各个生产分支整合成为由工会管理的社会主义（或者说自由主义）经济实体的过渡阶段。

但是，这项集体化的工作不可能像自由主义设计者所希望的那样迅速开展。他们遭到了许多拥有某种特殊地位的企业的反对，这些企业既有全国劳工联合会的工人控制的，也有劳动者总工会的工人控制的，他们不愿牺牲自己的利益帮助效益较差的集体化企业。²⁴另外，像共产党一样，社会党和社会党的劳动者总工会主张政府拥有并且控制基础工业，²⁵反对将小资产阶级的财产集体化。全国劳工联合会的领导人认为，社会党人的计划完全依靠小资产阶级。

226

“关于经济问题，全国劳工联合会与劳动者总工会之间始终存在着观点分歧，”全国劳工联合会全国委员会成员马里亚诺·卡多纳·罗塞利证实，“因为实际上，当全国劳工联合会主张更有效地实行集体化时，它得不到劳动者总工会全国、地区和当地领导人的合作，他们极少关心甚至根本不关心这个重要问题。结果，在许多地方，劳动者总工会的普通成员听从全国劳工联合会的指示。”²⁶这种观点分歧使得既不可能通过自由主义的集体化、也不可能通过国有化建立一个统一协调的工业体系，而且部分解释了在一九三八年一月全国劳工联合会全国经济扩大会议上提出的那个精心设计的工会管理下的工业集体化方案为什么只能纸上谈兵。²⁷

将工业整合成为自由主义经济实体的另一个障碍是，全国劳工联合会所管理的许多企业实际上处于破产或者半破产状态，因此不得不请求政府干预以获得资金帮助。它们一般不向银行求助，因为银行都被劳动者总工会的银行雇员工会组织全国银行联合会控制着，那是支持共产党的联合会主席阿马罗·德尔·罗萨尔的势力范围。由于蔑视金钱，全国劳工联合会和伊比利亚无政府主义者联盟从来没有打算在银行雇员中组织工会，结果被劳动者总工会完全控制，内战期间它们对此懊悔不已。

在加泰罗尼亚地区，经济状况的特点之一是，全国劳工联合会接管了

大部分工商企业，而竞争对手劳动者总工会则控制了银行和另外一些信贷机构，这些银行和信贷机构受到一个由劳动者总工会和自治政府的代表组成的银行委员会的全面监督。因为全国劳工联合会控制的企业由于政治和意识形态方面的原因不愿把它们的资金存入既有的金融机构并且用现金进行交易，所以，那些盈利的企业在它们的经营场所囤积了大量现金。²⁸这种囤积导致了严重的流通不足并且限制了本可以向效益较差的企业提供资金的基本信贷。希望改善这种状况的自治政府财政专员塔拉德利亚斯签署法令，规定所有超过一千比塞塔的款项必须用支票支付，²⁹但是，没人理睬这项措施。“大量现金由于意识形态原因不能流通，”持不同政见的马克思主义政党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的喉舌《战斗报》写道，“只要存在两个工会，只要几乎所有生产手段被一个工会控制而信贷手段被另一个工会控制，这个问题就无法解决。”³⁰因为全国劳工联合会拒绝利用金融机构，同时因为它的集体化方案需要资金，所以，一九三七年二月召开的一次全国劳工联合会代表大会建议，创建工会自己的银行，³¹但是，这个建议没有下文。³²

无论是在加泰罗尼亚地区还是在共和派控制区的其他地方，这种状况都给全国劳工联合会的集体化企业造成了严重的问题。其中一些企业急需资金，以致担任工业部长的无政府工团主义者胡安·佩罗公开建议中央政府进行干预，³³仅在一九三七年一月，他的部门就收到了一万一千份要求资金帮助的申请。³⁴根据共产党的官方内战和革命史，担任工业部长和商业部长的全国劳工联合会成员“用尽一切办法试图巩固全国劳工联合会在大部分经济领域的主导地位并且使之合法化，把国家的资金提供给那些处于破产状态的工团化[即集体化]企业”。³⁵

但是，全国劳工联合会为得到政府的资助以挽救这些企业并且推进集体所有制的实施所做的努力没有成效。无政府工团主义历史学家何塞·佩拉特斯证实，胡安·佩罗打算起草一项要求所有企业实行集体化的法令，但是，拉尔戈·卡瓦列罗制止了他，总理警告他说，在西班牙拥有巨大经济利益的英国、法国和比利时将会收回对共和国政府的外交承认。于是，佩罗重新起草了法令，不过，内阁没有批准这项法令并且对它作了修改。据佩拉特斯说，内阁把它交给了一个部长委员会，委员会把它修改得只剩下一个框架。“但是，劫数仍然未到尽头。要使法令生效必须有钱，也

就是说，贷款必须得到财政部长[胡安·内格林]的批准。他像高利贷者一样讨价还价，终于批准了一笔微不足道的贷款额度。……最终，工业银行介入了，它进一步削减了贷款额度。”佩拉特斯最后说，结果，在工业部长使这项“明显保守”的法令生效之前，一九三七年五月发生了本书后面将要讨论的政府危机，而新政府的第一个行动就是“直截了当地废除这项法令”。³⁶在这个政府中没有全国劳工联合会的代表。

共产党人利用经济问题进一步为支持政府控制工业和金融业大造声势。共产党控制的加泰罗尼亚统一社会党领导人佩雷·阿迪亚卡声称：

“经济权力必须掌握在一个实体手中。”³⁷西班牙共产党总书记何塞·迪亚斯在谈到“为时过早的集体化和社会主义化实验”时说：“即使当初由于大资本家和大地主遗弃了他们的工厂和庄园而生产必须继续进行的事实，这些实验有正当的理由，后来的情况已不一样。……开始的时候，因为无论如何也要继续生产，工人没收被遗弃的工厂可以理解。……我再说一遍，这是可以理解的，我们不会谴责它。……[但是]今天，当一个代表了所有与法西斯主义斗争的力量和人民阵线政府存在时，这种行为不仅是不可取的，而且还会产生适得其反的效果。今天，为了供应前线 and 后方需要的一切，我们必须立即在统一的指挥下协调生产加强合作。……当战局仍然不明朗时，当得到外国法西斯援助的国内敌人正在疯狂进攻我们的阵地并且危及国家的未来时，匆忙地进行这些为时过早的‘集体化’和‘社会主义化’实验荒唐可笑而且等于帮助敌人。”³⁸

注释：

- 1 法令全文发表在一九三六年八月三日《马德里官方公报》上。
- 2 关于工商部在八月二日法令颁布前后对马德里的工业企业的干预，见一九三六年七月二十七日《马德里官方公报》；一九三六年八月三日《全国劳工联合会报》；一九三六年八月一日《工人世界报》和一九三六年八月十八日《政治报》。
- 3 《西班牙内战与革命，1936—1939》，第一卷，第271页。
- 4 见劳动者总工会冶金工人联合会执委会发表的声明，载一九三七年三月二日《巴伦西亚通讯》。
- 5 实例见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八日（何塞·迪亚斯的演说）、十七日（共产党的宣言）和

- 二十三日（社论）巴伦西亚《真理报》，何塞·迪亚斯一九三七年二月八日发表的演说，见何塞·迪亚斯，《斗争的三年》，第325页；一九三七年二月二十七日（社论）和三月十九日（西班牙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宣言）《红色阵线报》。
- 6 迭戈·阿瓦德·德·桑蒂连，《革命之后》，第122页。另请参阅一九三七年六月二十一日《全国劳工联合会-伊比利亚无政府主义者联盟通讯》；一九三六年十月六日《社会熔炉报》所报道的胡安·洛佩斯的演说；一九三六年九月二十五日《工人团结报》（对西班牙工业的采访）；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十七日《真理报》所刊登的共产党的宣言；国际工人协会——全国劳工联合会为其成员——驻西班牙代表赫尔穆特·吕迪格，《向一九三七年十二月六日国际工人协会特别代表大会提交的报告》；阿尔韦特·佩雷斯-巴罗，《加泰罗尼亚地区三十个月的集体化运动，1936—1939》，第43页。
 - 7 见一九三七年三月三日《光明报》所刊登的全国劳工联合会全国委员会和劳动者总工会纺织工人联合会的联合声明；一九三七年一月二日《土地与自由》；赫苏斯·埃尔南德斯一九三七年五月发表的演说，见赫苏斯·埃尔南德斯《拉尔戈·卡瓦列罗政府危机之前、期间及之后的共产党》，第41页；安东尼奥·米赫的演说，见安东尼奥·米赫《为了加强战争工业》，第4页。
 - 8 迈克尔·塞德曼，《工作与革命：西班牙内战期间巴塞罗那的工人管理，1936—1938》，第45—46页。另请参阅该书稿的第28—29和39—44页。这部未出版的书稿的副本现存胡佛研究所，博洛滕资料集。
 - 9 佩雷斯-巴罗，《加泰罗尼亚地区三十个月的集体化运动》，第43—44页。
 - 10 电视系列片《西班牙内战》第五集《革命内部》，历史学家罗纳德·弗雷泽、休·托马斯和哈维尔·图塞尔编辑制作。
 - 11 正如将在后面一章看到的那样，全国劳工联合会在加入中央政府之前加入了加泰罗尼亚地方政府。
 - 12 被罗纳德·弗雷泽在《流血的西班牙》一书中引用，见第11页。
 - 13 法令的全文见佩雷斯-巴罗的《加泰罗尼亚地区三十个月的集体化运动》，第228—236页。罗纳德·弗雷泽对加泰罗尼亚地区的集体化运动作了富有启发性的记述，见《流血的西班牙》，第109—136和575—576页。
 - 14 阿瓦德·德·桑蒂连写给佩雷斯-巴罗的信，被罗纳德·弗雷泽在《流血的西班牙》一书中引用，见第212页注释1。
 - 15 迭戈·阿瓦德·德·桑蒂连，《阿方索十三世，第二共和国，弗朗西斯科·佛朗哥》，第360页。另请参阅阿瓦德·德·桑蒂连一九七一年九月二十五日写给我的信（现存胡佛研究所）。
 - 16 电视系列片《西班牙内战》第五集（《革命内部》）播出的采访录音。另请参阅罗纳德·弗雷泽《流血的西班牙》，第212页注释1。在西班牙内战五十周年纪念会上，塔拉德拉承认，如果没有经济委员会和集体化的法令，内战“持续的时间将非常短暂，因为它们激励整个西班牙为了实现我们的热切希望而斗争。谁也不应忽视这个事实，如果我们的经济没有发生深刻的变化，我们在[军事]叛乱初期取得的胜利不会具有积极持久的效果”（一九八六年七月二十一日《国家报》）。
 - 17 路易斯·费希尔，《人与政治》，第421页。据全国劳工联合会商业雇员工会书记胡安·费雷尔说，内格林拒绝承认加泰罗尼亚自治政府的集体化法令。“他和中央政府的大多数人决定不承认这项法令，也不允许全国劳工联合会参与任何经济管理。”（被罗纳德·弗雷泽在《流血的西班牙》一书中引用，见第576页）另请参阅何塞·佩拉特斯《西班牙政治危机中的无政府主义者》，第263—264页和胡安·内格林一九三七年九月二日以财政部长的身份签署的法令，该法令规定集体工业企业要向国家交税，但是没有赋予它们合法地位。关于对这项法令的重要评论，见佩雷斯-巴罗《加泰罗尼亚地区三十个月的集

体化运动》，第141—142页。

- 18 全国劳工联合会全国委员会在全国劳工联合会加泰罗尼亚地区劳工联合会特别代表大会上发表的声明，见《一九三七年二月二十五日至三月三日在巴塞罗那举行的加泰罗尼亚地区劳工联合会特别代表大会会议纪要》，第197页；另请参阅胡安·内格雷《什么是无政府主义的集体化？》，第5页。
- 19 实例见一九三六年十二月二十六日（《伊比利亚无政府主义者联盟的立场》和加斯东·勒瓦尔的文章）、一九三七年一月三十日（《强制实行社会化》和《实现新的成就》）和二月六日《土地与自由》；一九三六年十二月二十三日《全国劳工联合会-伊比利亚无政府主义者联盟情况通报》；马利亚诺·卡多纳·罗塞利《我们在经济方面的革命》，第3和6页；《集体化：西班牙革命的建设性工作，1936—1939》，第13—16页。
- 20 一九三七年三月九日《我们》。另请参阅一九三七年八月四日《土地与自由》。
- 21 无政府工团主义者所提供的关于这些集体化企业发展趋势的资料，见一九三七年六月二十一日《全国劳工联合会-伊比利亚无政府主义者联盟情况通报》（C.巴索尔斯的演说）；一九三七年七月二十四日《文化与行动报》（马克西莫·略尔卡的文章）；一九三八年三月十五日《新生》（H.N.鲁伊斯的文章）；一九三七年四月二十四日《工人团结报》（普拉扬的演说）；一九三七年五月一日《土地与自由》（胡安·P.法夫雷加斯的文章）；皮埃尔·布鲁埃和埃米尔·特米姆，《革命与西班牙内战》，第145—146页；弗雷泽，《流血的西班牙》，第231—234页；塞萨尔·M.洛伦索，《西班牙无政府主义者与权力，1868—1969》，第246—247页。
- 22 一九六四年九月十三日《希望报》。
- 23 其他例子见一九三八年三月号《西班牙历史文献》；一九三七年十月十六日和十一月十三日《土地与自由》。集体化不一定解决经济问题。据共产党的喉舌《我们的旗帜》报道，阿利坎特省制鞋业的状况“非常糟糕”，因此，唯一的解决办法是国有化，“否则的话，我们将会饿死”（见比森特·拉莫斯《阿利坎特省的内战，1936—1936》，第一卷，第272页）。
- 24 实例见一九三七年四月十四日巴塞罗那《消息报》（列拉的演说）；一九三七年四月二十四日《工人团结报》（普拉扬的演说）以及一九三七年九月号和十月号《新时代》。
- 25 社会党温和派人士、社会党执委会成员曼努埃尔·科尔德罗声称：“有些人认为没收资本家的财产为的是资助某些集体化企业，因此，他们对革命作了错误的解释。他们错了。因共和国的敌人放弃而被没收的那些尚未被国家接管的[工厂]必须由国家来接管。”（一九三八年十月二十一日《先驱报》）另请参阅一九三六年十二月二十一日、一九三七年一月十一日、二月十七日和四月九日《巴伦西亚通讯》所报道的社会党左派人士、劳动者总工会副书记帕斯库亚尔·托马斯的多次演说及其关于集体化的其他言论，见一九三七年二月十三日《前进报》和一九三七年四月六日《光明报》。
- 26 马利亚诺·卡多纳·罗塞利写给我的信（现存胡佛研究所）。
- 27 关于这次全国经济扩大会议的情况，见一九三八年一月当月的《社会熔炉报》和全国劳工联合会全国委员会首席代表马利亚诺·卡多纳·罗塞利写给我的几封信，这封些信现存胡佛研究所。
- 28 实例见J.希门尼斯发表在一九三六年十二月三日《工人团结报》上的文章；一九三七年十月三十日《土地与自由》（食品和餐饮业工会司库发表的声明）；一九三七年三月二十七日《劳动报》。
- 29 一九三七年一月三十一日《战斗报》。
- 30 一九三七年一月三十一日《战斗报》。
- 31 一九三七年二月二十八日《每日图片报》。
- 32 直到一九三八年七月，还在讨论工会银行的问题。

- 33 见胡安·佩罗发表的声明，载一九三七年一月六日《巴伦西亚通讯》和一九三七年二月九日《每日图片报》；还有他签署的关于国家干预工业企业的法令，见一九三七年二月二十四日《共和国官方公报》及其一九三七年三月二日发出的命令，见一九三七年三月七日《共和国官方公报》。
- 34 胡安·佩罗，《我任职于工业部》，见《西班牙内战与革命，1936—1939》，第二卷，第276页。另请参阅何塞普·M.布里卡尔《政府的经济政策，1936—1939》，第200页，注释75。
- 35 《西班牙内战与革命，1936—1939》，第二卷，第276页。
- 36 佩拉特斯，《西班牙政治危机中的无政府主义者》，第263—264页。一九三七年三月五日，拉尔戈·卡瓦列罗签署了佩拉特斯所提到的这项法令（一九三七年三月七日《共和国官方公报》）。它提供了三千万比塞塔的贷款额度。关于全国劳工联合会为它那些集体化企业争取从政府得到资金支持时所遇到的困难，见胡安·洛佩斯《西班牙工会运动的发展》，载一九六四年十一至十二月号《伊比利亚公社》，第32页，被洛伦索在《西班牙无政府主义者与权力》一书中引用，见第244页，注释11；佩罗演说（《工业部长谈马塔罗玻璃厂》）的序言，被洛伦索在《西班牙无政府主义者与权力》一书中引用，见第257页，注释6。
- 37 一九三七年四月十三日《劳动报》。
- 38 一九三七年三月向西班牙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提交的报告，见何塞·迪亚斯《斗争的三年》，第353页。

一个新型的议会制民主共和国

共产党反对全国劳工联合会的自由主义工业集体化计划的根本原因在于，这种集体化实际上是对共产党的国有化计划的一种威胁；另外，为了产生效果，它必定侵犯中产阶级的财产，而克里姆林宫需要中产阶级的支持以取得外交政策的成功。为了对抗这种威胁，西班牙共产党坚持认为，试图以牺牲中产阶级为代价继续进行革命的原因是工人缺乏政治判断力。

“军事叛乱爆发时，”一位共产党领导人在谈到巴伦西亚的情况时说，“许多工人因为相信我们正在进行社会革命而陷入了没收财产和集体化的狂热。几乎所有工厂都实行了集体化。……这种狂热的‘集体化运动’不仅没收了那些支持叛乱的老板遗弃的工厂和车间，甚至还侵占了自由派和共和派雇主的微薄资产。……工人为什么犯这些错误？主要是因为对于当前的政治形势缺乏判断力，以致他们以为我们正在进行社会革命。”¹

听从共产党指挥的统一社会主义青年联盟执委会成员费德里科·梅尔乔断言：“我们今天不是在进行社会革命；我们正在推进一场民主革命，在一场民主革命中，经济……不能在社会主义的轨道上运行。如果我们正在推进一场民主革命并且宣称我们正在为保卫一个民主共和国而斗争，我们怎么能够尝试在经济领域采用一种极权的社会主义方式呢？……阿尔

瓦雷斯·德尔巴约同志前几天说：‘为了胜利，必须有一条正确的政治路线。’我们应当补充的是，必须有一条建立在清晰、正确的经济路线基础上的正确的政治路线。这些经济异常、经济倾向和这些实验出现在我国并非偶然；它们源于一种意识形态体系，源于工人运动某个主要流派的意识形态变种，试图使我国的经济发展脱离这种经济发展需要经过的那些阶段。”²

这些论点当然全面符合共产国际规定的路线并且符合斯大林外交政策的需要。帕尔米罗·陶里亚蒂一九三六年十一月宣称，“西班牙人民面临的任务是进行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从而歪曲了四个月前爆发的这场革命的无产阶级性质。³

在革命狂热盛行的情况下，坚持符合这些路线的主张对于共产党人来说是一项艰巨的任务；因为他们不仅必须与自由主义运动论战，而且必须与劳动者总工会、社会党和统一社会主义青年联盟中的激进分子论战。他们没有逃避这项任务。“在革命热情最高涨时，”西班牙共产党政治局委员安东尼奥·米赫回忆说，“我们共产党人问心无愧地在马德里和西班牙的其他地方发表演说，当时我们明确主张保卫民主共和国。鉴于有些人甚至害怕提到民主共和国，我们共产党人不反对向不了解形势的激进分子说明，为了对抗法西斯主义，保卫民主共和国是政治上的明智之举。”⁴

“我们正在为民主共和国而斗争，我们并不以说明这一点为耻。”在一九三七年一月举行的统一社会主义青年联盟全国会议上，总书记圣地亚哥·卡里略发表讲话声称。他在讲话中概括阐述了这个统一青年组织的政策，自从社会党和共产党的青年运动合并以来，这还是第一次。“面对法西斯主义和外国侵略者，现在我们不是为社会主义革命而斗争。”

（此时，在继续引用这次讲话之前，我们必须插入卡里略多年以后所作的一番陈述，这番陈述也许表明了他和其他共产党领导人对他们自己公开发表的言论的真实态度。在发表于一九七四年的一次访谈中，时任流亡的西班牙共产党书记的卡里略说：“我们当时说那是一场人民革命。这是显而易见的。大资本家、大地主和资产阶级国家机器在哪里？他们全都消失了。因此，整个争论在我看来显得荒唐和教条。”⁵）

但是，在统一社会主义青年联盟的全国会议上，卡里略表达了不同

的思想，他继续说道：“有人说，在现阶段我们应当为社会主义革命而斗争；还有一些人甚至说，我们正在进行欺骗。他们说，当我们宣称我们正在保卫民主共和国时，我们是在设法隐瞒我们真正的政策。不过，同志们，我们正在为一个民主共和国而斗争，而且是在为一个议会制民主共和国而斗争。这不是一种欺骗西班牙民主舆论的策略，也不是欺骗外国民主舆论的策略。我们正在真心实意地为民主共和国而斗争，因为我们知道，如果现在——甚至包括胜利之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我们错误地为我国的社会主义革命而斗争，那么，我们不仅将会看到法西斯侵略者站在我们的国土上，而且将会看到世界各国那些已经明确表示在欧洲当前的形势下不能容忍我国出现无产阶级专政的资产阶级民主政府与法西斯侵略者站在一边。”⁶

本章前面引述过其看法的统一社会主义青年联盟费德里科·梅尔乔断言，不能保护外国资本“将是国际关系中的一个错误，因为英国将立即对西班牙进行干涉，不是站在我们一边，而是站在佛朗哥一边，因为英国在我国有经济利益需要保护”。⁷

尽管没有记录显示任何民主国家的政府曾经威胁要进行干涉，但毫无疑问，相当一部分统一社会主义青年联盟的普通成员担心引起民主国家公开的敌意。然而，对在这次会议上初露端倪的政策的不满没过多久就显现出来；因为几周之后统一社会主义青年联盟阿斯图里亚斯地区总书记拉斐尔·费尔南德斯指责它“决不是马克思主义的政策”。⁸这不仅是一种个人意见。这是统一社会主义青年联盟中许多社会党人的意见，他们感到自己被统一社会主义青年联盟的突然右转背叛了，他们的心情准确地反映在下面这封发自前线的抗议信中：

“我在不同的报纸上多次看到卡里略所发表的讲话……大意是说统一社会主义青年联盟正在为一个议会制民主共和国而战。我认为卡里略大错而特错了。作为一名年轻的社会主义者和革命者，我正在为土地、工厂以及西班牙所有财富的集体化而战，正在为大家和人类的利益而战。

“卡里略和其他想把我们引上反革命邪路的人难道以为统一社会主义青年联盟的战士是绵羊吗？不，我们不是绵羊，我们是革命者！”

“我们在战场上牺牲的同志如果能够抬起头来，他们会怎么做？他们

将如何看待统一社会主义青年联盟已经成为背叛那场他们为之献身的革命的帮凶呢？他们只可能做一件事，把痰唾在那些罪人的脸上。”⁹

如果共产党人难以使统一社会主义青年联盟的激进分子相信其政策的正确性，那么，要使自由主义运动相信更困难。然而，这一政策的成功有赖于这个强大运动的服从，即使不是心悦诚服。为了达到这个目的，据担任卫生部长的无政府工团主义者费德丽卡·蒙特塞尼说，苏联外交代表与全国劳工联合会和伊比利亚无政府主义者联盟的领导人频繁举行会谈。

“他们给我们的建议始终如一，”蒙特塞尼写道，“必须在西班牙建立一种‘民主集中制’（极权主义的委婉说法）；不能给国外造成正在进行一场深刻革命的印象；我们应当避免引起民主国家的怀疑。”她补充说，苏联人的态度彬彬有礼。“我没有听到他们使用任何威胁性的语言。……一九三七年一二月间我去日内瓦参加卫生代表大会时，[苏联大使]罗森堡极力劝我去苏联，他说：‘斯大林同志将非常高兴见到你。去吧，费德丽卡！你将受到公主般的接待。’[俄国人]从未提出过任何可能使我不得不与他们断绝关系的具体建议。他们对此非常敏感。但是，罗森堡多次建议我把女儿送到巴伦西亚，在市郊他所居住的别墅里与他的妻子和孩子一起生活。听到这些建议时，我的血在血管中凝固了。”¹⁰

231

即使这些担任政府部长的全国劳工联合会和伊比利亚无政府主义者联盟成员觉得为了影响民主国家不得不以牺牲革命为代价向苏联的政策作出让步，他们也没有始终不渝地附和共产党人高喊的“民主共和国”这个口号。¹¹据商业部长胡安·洛佩斯说，即使在加入政府时同意采用这个口号，他们这样做也是“为了给国外造成某种印象，决不是为了扼杀工人阶级所取得的正当的革命成果”。¹²

与这些担任政府部长的全国劳工联合会和伊比利亚无政府主义者联盟成员相比，作为一个整体的自由主义运动甚至更不愿意接受共产党人的这个口号，这一点在它的报刊上明显地反映出来：

“前线的成千上万名无产阶级战士不是在为‘民主共和国’而战。”全国劳工联合会全国委员会的《情况通报》写道，“他们是为了闹革命而拿起武器的无产阶级革命者。把革命的胜利推迟到我们赢得战争之后将极大地削弱工人阶级的革命精神。……如果我们希望提高战士的士气并且为

反法西斯的群众注入革命热情的话，我们必须坚定地推动革命前进，消灭资产阶级民主的最后残余，实行工农业集体化并且按照无产阶级的革命目标创建新社会的领导机构。

“这应当被清楚地理解为，我们不是在为民主共和国而斗争。我们是在为无产阶级革命的胜利而斗争。革命和战争不可分离。人们所说的与此相反的一切都是改良派的反革命行为。”¹³

《全国劳工联合会报》愤怒地写道：“‘民主革命。’‘议会制共和国。’‘这不是进行社会革命的时候。’这是一些符合共和派政党的政治纲领而让工会组织引以为耻的口号。……[如果]社会党和共产党及其青年运动恪守它们的原则的话，那就应当消灭‘整个旧的资产阶级国家机器’

（马克思）和资本主义的经济秩序。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从未提到什么‘议会制民主共和国’的过渡阶段。……因此，西班牙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马克思主义是一种与革命的马克思主义毫无共同之处的马克思主义，针对这种马克思主义，列宁在《国家与革命》中概括性地提出了他的革命理论。”¹⁴

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那样，内战刚刚爆发时，共产党就把发生在西班牙的革命比做一个多世纪前已在法国完成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全国劳工联合会和伊比利亚无政府主义者联盟的舆论工具对其政策的谴责造成了令人尴尬的消极影响，为了抵消这种影响，也是为了减少内耗，共产党人不得不修改了他们的用语。“全国劳工联合会的同志们指责我们做了什么？”

《工人世界报》在答复无政府工团主义报刊时问道。

按他们的说法，我们已经背离了马克思主义的革命道路。为什么？因为我们保卫民主共和国。……[我们]希望确定一下我国现在这个共和国的性质。……第一，工人阶级、农民和小资产阶级掌握着一切权力；第二，耕者有其田：农业劳动者正在以前的大庄园里以集体或者个体的方式劳作，佃农现在拥有自己的土地；第三，所有工厂建立了工人管理委员会；第四，没收了参加军事叛乱的大地主、银行家、大资本家和政治寡头的财产，从而使他们失去了社会政治影响力；第五，推动民主革命发展的最大的支配力量、最重要的领导

力量掌握在整个工人阶级手中；第六，以前镇压人民的那支军队已被消灭，我们有了一支新型的人民军队。因此，我们的共和国是一种特殊的类型；它是一个具有以前不曾有过的社会内涵的议会制民主共和国。所以，不能把这个共和国……与[那些共和国]相提并论，在那里，民主是一个谎言、是一种以剥削阶级的绝对统治为基础的民主。这一点已经得到了证实，我们必须告诉全国劳工联合会的同志们，我们并没有因为保卫民主和共和国而放弃或者违背马克思主义的革命原理。正是列宁教导我们，革命者不应脱离实际。正是列宁教导我们，革命者应当始终牢记一个特定国家的具体情况，以便采取最适当的革命策略。¹⁵

在一九三七年三月举行的一次西班牙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上，何塞·迪亚斯发表讲话说：

我们正在为民主共和国而斗争，为一个具有深刻社会内涵的新型议会制民主共和国而斗争。在西班牙进行这种斗争不是为了建立一个像法国或者其他资本主义国家那样的民主共和国。不是。我们正在为之而战的民主共和国与众不同。我们正在为消灭反动势力和法西斯主义赖以生存的物质基础而斗争；因为，不消灭它们，真正的政治民主不可能存在。……

现在我要问的是：[它们]被消灭到了什么程度？在我们控制的每一个省，大地主已经不复存在。作为一种统治力量的教会同样不复存在了。军国主义被消灭了，绝不可能卷土重来。大银行家和大资本家也没有了。现实情况就是这样。这些胜利成果决不会丧失的保证在于，权力实际上掌握在人民手里，掌握在真正反对法西斯主义的人民手里，掌握在始终被等级制度所奴役的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和小资产阶级手里。这是旧社会一去不复返的最有效的保证。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因为我们拥有胜利成果不会丧失的某种保证，所以我们不应当不顾现实匆忙地进行“自由共产主义”和“集体化”实验，无论是在工厂还是在乡村。西班牙政治进程的现阶段是民主革命时期，它的成

233

功有赖于所有反法西斯力量的参与，而这些实验只能起到赶走它们、疏离它们的作用。¹⁶

但是，共产党人说服其批评者的努力没有成效；因为自由主义运动的追随者，尤其是它的极端派系伊比利亚自由主义青年联盟（FIJL），大多数人坚决反对共产党的口号，而且不同于全国劳工联合会和伊比利亚无政府主义者联盟的领导阶层，他们越来越怀疑向外国舆论让步能否得到任何好处。从下面的引文中也许可以发现这一运动发展趋势的一些线索。一九三七年一月共产党领导的统一社会主义青年联盟正式表明支持民主共和国的事业后，在对该联盟的一次抨击中，自由主义青年运动的主要喉舌《自由青年报》宣称：

关于保卫民主共和国，统一社会主义青年联盟所能提出的最充分的理由是，为了不使我们与欧洲民主国家打交道时的处境更艰难，我们应当避而不谈革命。多么幼稚的理由啊！欧洲民主国家非常清楚我们是些什么人以及我们正在向何处去。就像那些法西斯国家知道一样，它们知道正在西班牙与法西斯分子作战的所有战士实际上都是革命者，因此不会认同这个冠冕堂皇的理由以免革命……被它们扼杀。无论我们号称议会制民主共和国还是号称革命，除非使欧洲民主国家满意，它们不会帮助我们。

用一个议会制民主共和国来欺骗我们那些正在战场上英勇地进行殊死战斗的战士，欺骗我们那些正在后方辛勤劳动的工人农民兄弟，这是对西班牙革命的背叛。……

除了权力之外，国家的经济资源同样掌握在我们手里。一切属于我们。……面对国际法西斯主义的罪恶势力，我们正在捍卫我们所拥有的一切。企图窃取属于我们的东西的叛徒应当像法西斯分子一样受到谴责并被毫不留情地枪毙。¹⁷

“现在，当我们有可能改变西班牙社会时，任何对我们说这种改变不会得到国际资产阶级认可的人都是在开玩笑。”《全国劳工联合会报》负

责人何塞·加西亚·普拉达斯说，“从他渴望国际资产阶级允许发动一场革命的那一刻起，他就没有权力告诉我们应当做什么。

“如果我们决不能发动革命以免与国际资产阶级发生冲突，如果我们必须隐瞒我们的所有目的，如果我们必须放弃我们的一切目标，那么，我们的同志是在为什么而斗争？我们大家是在为什么而斗争？我们为什么毫不留情地投身于这场斗争，投身于这场反对西班牙和外国法西斯主义的战争？”¹⁸

全国劳工联合会的喉舌《社会熔炉报》也写道：“[在]一场狂风暴雨、一场真正改变了一切的社会革命猛烈冲击我国的时刻，共产党提出需要一个议会制共和国，一个被形势的发展远远抛在后面的共和国。这导致出现了一种有悖常理的情况：共产党人形成了西班牙共和派的极右翼，成为眼看着自己的世界沉沦的小资产阶级的最后希望。然而，似乎让人感到不可思议的是，共产党是一项政策和一场宣传运动的神经中枢，这项政策无视胜利果实的存在和七月十九日的新生，目的是使我们退回到资产阶级共和国初期。”¹⁹

当然，认为共产党的目的是使革命退回到七月十九日以前并不准确。比较准确的说法应当是，它打算在民主制度的掩护下把人民革命转变成为建立一个极权主义一党制的警察国家的运动。毫无疑问，当斯大林对拉尔戈·卡瓦列罗说“议会道路”可能被证明是一种比在俄国更有效的推动革命发展的手段时，当他坚决支持社会党与共产党合并时，他想的就是这件事。另外还可以更准确地说，正如两位著名的西班牙共产党人在战后所断言的那样，这个“新型的议会制民主共和国”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出现在欧洲的那些“人民民主国家”的先驱——处于它们发展的初级阶段。²⁰

在为掌握控制权铺平道路的同时，为了打败佛朗哥将军，共产党人需要他们所能召唤的每一个人。前西班牙共产党共中央委员会委员恩里克·卡斯特罗坦率地透露了自己当时玩世不恭的想法，他反思道：“[这]应当被称为统一战线时期。打败佛朗哥之后，我们将给每个人贴上适当的标签：共和派，其实就是资产阶级的走狗；社会党人，与共和派差不多一样是资产阶级的走狗；无政府主义者，对我们革命事业的一种威胁。这将使我们在消灭佛朗哥之后有充分的理由消灭他们。在那之前，我们把他们称

为同志并且给他们一些赞美之词。当然，我们的人是历史上的新人类。我们将在‘神圣同盟’时期善待他们。然后，我们将尽快地消灭他们，免得他们长期遭受严重的痛苦。”²¹

235 尽管全国劳工联合会指责共产党人想使革命退回到七月十九日以前，但是，只要不归还大地主和大资本家的财产，换句话说，只要不让大地主和大资本家参与国家事务，就不可能退回到一九三一年的资产阶级共和国时期。那不符合党的长期目标和克里姆林宫在西班牙的意图。克里姆林宫的意图是，在某种民主政体的掩护下，控制西班牙的国内外政策以满足苏联外交政策的需要。西班牙共产党限制革命不是为了归还大地主和大资本家的财产，而是为了在中间阶层的人群中找到自己的支持者，然后根据自己的目的利用他们与反佛朗哥阵营中的革命势力抗衡，确保共产党的支配地位。正如我们将在接下来的一章里看到的那样，这是西班牙共产党在工商领域采取的政策，也是它在农业方面采取的政策。

注释：

- 1 一九三七年三月三十日《红色阵线报》所报道的演说。
- 2 梅尔乔一九三七年一月发表的演说，见费德里科·梅尔乔《组织生产》，第6—8页。
- 3 陶里亚蒂发表在一九三六年十一月十一日《工人国家》上的文章，见帕尔米罗·陶里亚蒂《政论集》，第336页。
- 4 一九三八年五月十八日《工人世界报》所报道的米赫的演说。值得注意的是，据前加泰罗尼亚统一社会党执委会成员米格尔·塞拉·帕米埃斯说，内战初期，在全国劳工联合会和伊比利亚无政府主义者联盟占优势的加泰罗尼亚地区，共产党控制的加泰罗尼亚统一社会党内部有人反对使用“民主共和国”这个口号，因为担心“可能危害党在工人阶级中的发展”。他补充说，在马德里，“提出这个口号轻而易举，因为共产党的力量强大而且得到拉尔戈·卡瓦列罗的支持，但是，在加泰罗尼亚，内战初期革命发展如火如荼，不可能提出这个口号”（引自一九四四年我采访塞拉·帕米埃斯时所作的速记记录，该记录现存胡佛研究所）。
- 5 圣地亚哥·卡里略，《西班牙的明天：与雷吉斯·德布雷和马克斯·加洛对话录》，第53页。
- 6 圣地亚哥·卡里略，《在通往胜利的道路上》，第10页。
- 7 《生产第一线，赢得战争的大型工业》，第13页，引自戴维·T.卡特尔《共产主义与西班牙内战》，第62页。
- 8 拉斐尔·费尔南德斯致卡里略的公开信，载一九三七年四月一日《巴伦西亚通讯》。

- 9 发表在一九三七年五月一日《自由青年报》上的前方来信。另请参阅费德里科·费尔南德斯·洛佩斯发表在一九三七年五月二十八日《前进报》上的文章。
- 10 蒙特塞尼一九五〇年五月三十一日写给我的信（现存胡佛研究所）。
- 11 实例见胡安·洛佩斯一九三七年二月七日发表的演说，收入洛佩斯所著《内战和革命中的联邦制观念》一书，第3—4页。
- 12 一九三七年六月十九日《全国劳工联合会报》。
- 13 一九三七年一月十九日全国劳工联合会全国委员会《情况通报》。
- 14 一九三七年二月二日《全国劳工联合会报》。另请参阅一九三七年二月六日《自由青年报》；一九三七年二月九日《工人团结报》和一九三七年一月二十三日《土地与自由》。
- 15 一九三七年二月三日《工人世界报》。另请参阅一九三七年二月五日《工人世界报》。
- 16 何塞·迪亚斯，《斗争的三年》，第349—352页。另请参阅加泰罗尼亚统一社会党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上的讲话，载一九三七年二月九日《劳动报》。
- 17 一九三七年四月十日《自由青年报》。几天前，由统一社会主义青年联盟和共和派青年运动组成的西班牙青年阵线将它的竞争对手革命青年阵线斥为“托洛茨基分子”。它断言，托洛茨基主义所造成的最大威胁是歪曲“我们的独立战争的性质”。“我们要让所有捍卫我们事业的青年人提高警惕，尤其是我们的自由主义青年兄弟，敦促他们疏远那些虚伪的朋友[托洛茨基分子]，疏远那些阴谋破坏我们的胜利成果的人。”（一九三七年四月七日《政治报》）
- 18 何塞·加西亚·普拉达斯在自由主义青年运动一次会议上的讲话，载一九三七年五月四日《全国劳工联合会报》。
- 19 一九三七年五月二十二日《社会熔炉报》。关于发表在自由主义报刊上的指责共产党人企图退回到一九三一年的共和国的其他言论，见一九三七年五月九日《自由青年报》；一九三七年四月十七日《道路》，第1页。
- 20 何塞·桑多瓦尔和曼努埃尔·阿斯卡拉特，《西班牙，1936—1939》，第85页；另请参阅多洛蕾丝·伊巴露丽《唯一的道路》，第436页。
- 21 恩里克·卡斯特罗，《莫斯科培养出来的人》，第448页。

平衡各个阶层的力量

在其控制的农业部的帮助下，共产党人可以对农村的形势发展产生实质性的影响。在共产党人农业部长比森特·乌里韦所颁布的法令中，最著名的显然当属一九三六年十月七日颁布的法令。根据这项法令，无条件将那些直接或者间接参与军事叛乱的人在农村所拥有的全部财产收归国有。¹“这项法令摧毁了大地主半封建势力的生存基础。”共产党的喉舌《工人世界报》评论道，“为了维护他们惨无人道的阶级特权，为了永远保持两个比塞塔の日工资标准和早出晚归的劳动时间，大地主发动了这场正在毁灭西班牙的血腥战争。”²这项法令的有关条款规定，将那些由庄园主或其管家直接耕种或者租给大的佃户耕种的农庄以永久使用权的方式分给农民和农业工人组织，按照大多数受益人的意愿由他们分别或者集体耕种。租种农庄土地的小型农户获准永久使用他们租种的土地，在干旱地区不超过三十公顷，在灌溉区不超过五公顷，在水果种植区不超过三公顷。³共产党的喉舌《红色阵线报》断言，一九三六年十月七日颁布的法令“是军事叛乱爆发以来所采取的最严厉的革命措施。……它消灭了农村百分之四十以上的私有财产”。⁴

尽管这项法令的措辞用语给人以政府采取主动措施没收军事叛乱支持

者的财产的印象，但是，这一措施实际上只不过是使农业工人和佃农已经实施的没收行为合法化。然而，共产党人经常说它起到了把土地分给农民的作用。社会党左派人士，强大的全国农业工人联合会总书记里卡多·萨瓦尔萨写道：“我们在共产党的报纸上看到许多这样的内容：‘由于担任部长的共产党人采取措施颁布了十月七日那项法令，农民现在拥有了土地。’……这种说法肯定在不了解情况的人当中产生了非常显著的宣传效果，但是，它们无法说服多少了解一些实情的人。……在共产党人担任政府部长之前，根据我们联合会的指示，农民组织实际上已经没收了所有属于叛乱分子的土地。”⁵另外，一九三六至三七年担任土地改革协会秘书长的共产党人拉斐尔·莫赖塔·努涅斯⁶在脱离共产党之后发表的一篇文章中写道：“我可以肯定地说，而且每个人都知道，把土地交给农民的不是政府。农民不等政府决定就把庄园和可耕种土地直接据为己有了。……因此，备受吹捧的十月七日法令——某个政党实际上宣称这项法令完全由它独力促成——并没有把那些庄园分给农民或任何人，因为几个月前农民已经开始耕种它们。当然，由于这是一项得到政府批准的法令，它所产生的唯一效果是使没收财产合法化。”⁷

多年以后共产党人仍然宣称，农民得到土地应当归功于他们主动采取的措施。流亡的西班牙共产党的两位著名党员写道：“西班牙的农业工人和农民不是从资产阶级手中得到的土地，而是——通过共产党人主动采取的措施——从工人阶级手中得到的土地。”⁸

由于这项法令只适用于被指控直接或者间接参与了军事叛乱的那些人的庄园从而在法律上并不允许没收属于共和派人士的财产，也不允许没收其他那些不支持佛朗哥将军叛乱的地主的财产，因此，无政府工团主义者认为它不符合形势的要求。《全国劳工联合会报》评论道：

农业部长颁布的只是一项将那些直接或者间接参与了七月十九日法西斯叛乱的人在农村所拥有的全部财产收归国有的法令。当然，政府像往常一样落后于形势。农民没有等待用法令解决这个问题：他们在政府之前采取了行动，一上来就没收了地主的财产，从底层发动了这场革命。因为真正了解土地问题，他们比政府更有效

率。他们不加区分地没收财产，无论其所有者参与还是没有参与叛乱阴谋。……将没收财产仅仅作为对那些直接参与或者帮助法西斯叛乱的人的一种惩罚并不解决西班牙革命的头号问题。

我们的政府应当充分地认识到，七月十九日摧毁了不公正的特权制度，一种新的生活正在西班牙全国出现。只要它没有认识到这一点，只要它死抱着七月十九日之后已经过时的制度和方法不放，它将永远被人民的进步甩在后面。⁹

238

对这项法令的限制的批评同样来自社会党左派所控制的全国农业工人联合会。在一九三七年六月举行的一次全国会议上，该联合会提出要求，应当修改这项法令，以便使其适用范围不仅包括那些参与军事叛乱的人，而且包括那些因下列情况而被视为工人阶级的敌人的人：违反劳动合同，因为工人的思想信念不公平地解雇他们，没有正当的理由向警察告发工人并且鼓励破坏罢工。¹⁰

但是，共产党不可能同意这种修改。为了寻求反佛朗哥阵营中的有产阶级的支持，它不能让那些在内战之前就对工人运动怀有敌意的中小地主产生反感，于是，通过其控制的农业部和土地改革协会，它以十月七日法令的限制为依据，实际上支持了中小地主所提出的归还他们土地的要求。

“我可以告诉你们卡斯蒂利亚地区农村的情况，”自由主义青年运动伊比利亚自由青年联盟的一位领导人说，“因为我与卡斯蒂利亚的各个农业地区保持着日常联系。为了向资产阶级、法西斯分子和地主归还他们曾经拥有的财产……农业部派代表去了这些地区。农业部长说这些人是小地主。占有大量土地的小地主！农村的政治恶霸和阴谋反对工人的人是小地主？雇用二十或者二十五个工人而且拥有七八头耕牛的人是小地主？我要问的是，农业部长的政策目的何在，‘小地主’这个词的确切定义是什么。”¹¹

共产党甚至保护内战之前属于右翼党派的农场主，尤其是在巴伦西亚省，它在那里把他们组织起来成立了农民联合会，这不可避免地引起大量农民的敌意。一名社会党人在谈到农民联合会时抱怨说：“共产党在村子里专门网罗前自治党派最顽固的残余人员，这些人不仅极端保守，而且道德败坏，通过保证允许他们继续拥有自己的土地，共产党把这些小地主组

织起来成立了新的农民联合会。”¹²

毫无疑问，共产党不顾中小地主的政治背景保护他们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它与社会党左派之间迅速发展的激烈冲突，正如我们所知，后者控制着全国农业工人联合会。¹³共产党人要求集体化应完全自愿，¹⁴从而意味着既要尊重共和派地主的财产权，也要尊重右派地主的财产权。尽管不赞成对共和派小地主的土地强制实行集体化，社会党左派仍然反对为了那些在内战之前与挣工资的农业工人公开冲突的小地主的利益影响农业集体化运动的发展。社会党左派的报纸、劳动者总工会的喉舌《光明报》写道：“不应强迫支持共和国的小地主加入集体农庄，但是，应当向每一个自觉主动加入集体农庄的人提供慷慨的技术、经济和道义援助。当我们说‘支持共和国的小地主’时，我们有意将公然敌视工人阶级的小地主以及那些如今总是哭哭啼啼并且企图潜伏起来的卑鄙恶毒的政治恶霸排除在外，他们在农村地区形成了一支真正的第五纵队。对于这些人，我们必须解除他们的反抗能力。如果不顾勇敢的农民战士所曾遭受的监禁、折磨和苦难，想方设法以这些人员为基础建立一个富农组织，那将造成一场真正的灾难。”¹⁵

239

前共产党领导人恩里克·卡斯特罗是西班牙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委员，一九三六年九月担任土地改革协会主任，他在《莫斯科培养出来的人》一书中证实，他在土地改革协会的主要工作目标是“消灭农村的社会党人”，同时争取农民的支持。¹⁶在这部反省自身的回忆录中，卡斯特罗将其内心的想法公诸于众，这些想法显然也是党的想法。“我们需要所有那些疯狂地希望拥有自己的土地的人。”他回忆说，“我们现在需要他们，未来很长一段时间我们仍将需要他们——只要这能使我们夺取政权并且巩固我们的政权。以后，我们可以讨论它！以后，我们可以澄清问题！以后，我们可能会说谁是土地真正的主人！但是，在那之前，我们每天都得公开宣称，土地是他们的，党将把土地分给他们，我们将向他们提供资金、种子、农具和建议。只有当他们认为他们是‘他们的’财产的主人时，他们才会为保卫这些财产而斗争。”¹⁷

为了争取处于中间阶层的右派和共和派农民的支持，共产党人不仅不得不遏制社会党左派和无政府工团主义者的集体化倾向，而且不得不约束它自己的青年运动的集体化倾向。“我们不仅发现某些组织鼓吹集体

化，”统一社会主义青年联盟总书记圣地亚哥·卡里略说，“而且最初我们还发现，由于不了解当前斗争的性质，我们自己的年轻人也在为集体化进行辩护。不过，巴达霍斯和其他省份的农民同志非常清楚地认识到，在[统一社会主义青年联盟]告诉他们他们正在实行错误的政策以后，在他们开始遵循正确的政策以后，农村的形势逐渐发生了变化。……我们几乎没有必要提醒大家，世界上唯一一个进行了革命的国家苏联是在无产阶级掌握政权九年之后才开始将土地集体化的。那么，我们为什么要在一个民主共和国里去做工人阶级掌握政权九年后苏联才去做的事情呢？我们宣布，只要我国的形势不允许采取其他政策，我们未来的长期政策就是保护小农经济，保护农村小地主的合法利益。”¹⁸

240

除了前面提到的原因之外，农业部长十月七日颁布的法令及其实际运用所体现的共产党的政策还因其他原因遭到批评。既吸收农业工人也吸收穷苦的佃农入会的全国农业工人联合会总书记里卡多·萨瓦尔萨在接受采访谈到阿尔瓦塞特省的情况时证实：“有许多地主的财产没有被没收，或者因为他们支持左派，或者因为他们假装支持左派。法律迫使他们的佃户继续向他们交租，结果，由于支持叛乱的地主的佃农被免除了地租，这造成了一种不公平的状况。”¹⁹萨瓦尔萨批评这项法令还因为，它使把土地分给农村穷人的目标无法实现。萨瓦尔萨的批评所依据的事实是，从这项法令中受益的佃户和佃农依法有权保留他们在革命之前耕种的所有土地，只要不超过规定的限度，因此，他们不愿意把他们占有的一部分土地转让给挣工资的农业工人。“结果，”萨瓦尔萨证实，“许多地方靠工资糊口的农业工人仍然没有土地，或者不得不满足于耕种最贫瘠或是远离村庄的土地，因为其他土地几乎全部归小地主和佃农所有。在这种不公平的状况下，一些人租种不到土地，即使小块土地也租不到，因为他们是革命者，而以前充当政治恶霸狗腿子的那些人却以牺牲他们的利益为代价仍然享有某种特权。由于无法接受这种令人屈辱的不公平状况，以致冲突不可避免。”²⁰

不过，导致农村发生冲突的更重要的原因仍然是，共产党人用十月七日法令刺激了佃户和佃农的个人利益。在这项法令颁布之前，佃户和佃农不是被农业集体化运动所吸引，就是已经接受了有利于农业工人的土地重

新分配方案。

“接着，颁布了十月七日那项法令，”全国农业工人联合会指出，“在不超于干旱地区三十公顷、灌溉区五公顷和水果种植区三公顷的条件下，它使佃户看到了继续拥有其以前耕种的所有土地之永久使用权的可能性。这相当于……提供了一种保证，只要佃户没有公开支持军事叛乱，他就不可能失去他的土地。……因此，这项法令的实际效果是，勾起了那些已经接受土地分配新格局的佃户和佃农重新获得他们以前耕种的土地的欲望。”²¹

被来自共产党的支持所鼓励，许多在革命初期已经接受集体化的右派佃户和佃农要求归还他们以前耕种的土地。在反对集体农庄的声势高涨时，里卡多·萨瓦尔萨宣称：“我们现在最强烈的愿望是保卫革命取得的成果，尤其是保卫本联合会的各个分会组建起来的集体农庄，觊觎革命成果的敌对势力——即过去的反动分子以及那些因为充当政治恶霸的走狗而以租赁的方式占有土地的人——变得越来越强大，而我们的会员不是要求获得土地遭到拒绝，就是被人从所耕种的贫瘠土地上赶走。今天，在臭名昭著的十月七日法令的保护下，这些反动分子正在大肆攻击集体农庄，目的是要瓜分它们——瓜分它们的牲畜、油橄榄树、葡萄园以及所收获的农作物——从而终结农业革命。……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他们正在利用我们最优秀的同志不在之机，这些同志上了前线，如果当他们回来时，他们发现他们的奋斗和牺牲只不过是让世代仇敌作威作福，他们将会愤怒地哭

241

泣。而更加目右派制意味的且 已老和在田其念下！如如始人目上能培岂 告和他们的太斗我舞舞口完斗目上世也
符。”²²

共产党人还竭力动员农业工人参加其针对集体农庄开展的宣传活动。

一九三七年四月初，全国劳工联合会全国委员会书记马里亚诺·巴斯克斯——他于一九三六年十一月接替奥拉蒂奥·普列托担任此职——指责共产党人前往全国劳工联合会和劳动者总工会已经根据双方协议建立了集体农庄的地区“挑逗人们自私的欲望……通过向工人许诺个人好处煽动其瓜分他们正在集体耕种的土地”。²³共产党人并不仅限于这样做，因为巴斯克斯还指责他们在托莱多省杀害了许多无政府工团主义者，²⁴另外，全国劳工联合会卡斯蒂利亚地区农民协会总书记几个月后声称：“我们与共产党人

进行了可怕的斗争，特别是与他们指挥的军队进行了斗争，他们杀害了我们最优秀的农民积极分子，野蛮地破坏了我们的集体农庄并且毁掉了我们以巨大的牺牲为代价才获得的收成。”²⁵

对农业集体化的攻击这一时期主要发生在共产党的军队所控制的西班牙中部的卡斯蒂利亚地区，据全国劳工联合会的历史学家和积极分子胡安·戈麦斯·卡萨斯说，全国劳工联合会和劳动者总工会在那里建立了大约三百个“示范”集体农庄。²⁶在马德里出版的无政府工团主义日报《全国劳工联合会报》负责人何塞·加西亚·普拉达斯声称，共产党民兵第十一师师长恩里克·利斯特对杀害大批卡斯蒂利亚农民负有责任，共产党人指控这些农民是“不法分子”和“法西斯分子”。加西亚·普拉达斯说，在托莱多的莫拉，被处死的农民多达六十人。²⁷利斯特从不否认他杀害了这些人。他在多年以后声称，无政府主义者在这个地区建立了“一种名副其实的恐怖专政，这导致每天都有农民逃出村子……去投敌”。他说，他结束了这种状况。“必须在托莱多的莫拉设立一个法庭，采取非常坚决、严厉的措施。后来，有人指控我枪毙了某某、某某人。我回答说，的确，我的确枪毙过一些人，而且我准备在必要的时候还这么做，因为，如同我在回答指控时所说，我打仗不是为了保护强盗，也不是为了压榨农民。我是为解放人民而战的。”²⁸

242 对集体化的攻击不可避免地将对农村经济和农民的士气产生某种不利的影响，因为，尽管集体化在一些地区遭到大多数农民的诅咒，但是，在另外一些地区，大批农民群众自发地组织起集体农庄。时任国际纵队第十五旅副政委的著名作家拉尔夫·贝茨是研究西班牙和西班牙革命的权威，他在与共产党断绝关系之后写信告诉我：“共产党对集体化的攻击完全是错误的，因为，尽管存在强制推行集体化等大量问题，但是，也有许多正常的集体农庄，即，自愿组织的集体农庄。”²⁹例如，在托莱多省，甚至在内战之前那里就有集体农庄，³⁰据一份倾向于共产党的原始资料提供的数字，百分之八十三的农民决定支持集体耕种土地。³¹

随着反对集体农庄的运动在夏收之前达到高潮——就连比较成功的集体农庄也在那一年的这个时候陷入了经济困境——失望和恐惧的气氛开始笼罩着农庄的劳动者。人们不再下地干活儿或者心不在焉地敷衍了事，因

此，大量即将收获的农作物有烂在地里的危险，而这些农作物对于战争努力至关重要。

于是，共产党人立即改变了他们的政策。

这种一百八十度大转弯的第一个迹象出现在一九三七年六月初，农业部长当时颁布了一项法令，承诺向集体农庄提供各种形式的帮助，以使它们能够“令人满意地尽快开展适合农业生产劳动”。³²这并不意味着过去没有提供帮助。十月七日颁布的法令将帮助法令受益者的任务交给了农业部长领导下的土地改革协会。据共产党的喉舌《红色阵线报》报道，从那以后，土地改革协会以贷款、农具、种子以及肥料的形式向集体农庄提供了五千万比塞塔。³³这并非完全没有可能。但是，这些帮助仅仅提供给那些接受土地改革协会干预的集体农庄；因为，由于政府干预威胁其集体农庄的自主权而不让政府插手的全国劳工联合会指责土地改革协会拒绝向所有集体农庄提供来自农业部长的帮助。³⁴另一方面，据全国劳工联合会全国委员会成员、国家农业信贷机构执委会的全国劳工联合会代表马里亚诺·卡多纳·罗塞利说，即使不允许土地改革协会超越其权限向集体农庄提供贷款和帮助，这些集体农庄还可以向国家农业信贷机构申请资助，除了相关贷款交易所产生的风险之外，没有任何风险控制。³⁵但是，这个在农业部的支持和赞助之下工作的机构——其执委会中除了农业部的官员之外还有全国劳工联合会和劳动者总工会的代表³⁶——直到一九三七年夏末才开始正常运转。此外，据卡多纳·罗塞利说，尽管它向申请资助的集体农庄提供巨额贷款，但是，由于长期以来对官方机构的怀疑态度而且担心贷款可能限制自己的独立性，全国劳工联合会的一些集体农庄并没有利用这个机构。³⁷

前面提到农业部长于一九三七年六月颁布法令，承诺向集体农庄提供各种形式的帮助，这项法令的前言写道，政府有必要提供帮助，以避免出现“可能使那些在没收了参加叛乱的剥削者的土地之后自愿选择以集体农庄的方式进行耕种的农业工人寒心的经济衰退”。法令的第一条说：“为了通过土地改革协会提供帮助，一九三六年七月十九日以来建立的所有集体农庄在本农业年度均被认为是合法的，³⁸因此，土地改革协会所属部门不会受理要求归还被上述集体农庄所占用之土地的任何申诉……即使是在有人指控没收土地的合法性存在问题的情况下，或者是在确定被集体化之土

地以前的拥有者或受益者的政治身份时出现差错的那些地区。”“这意味着，”共产党的喉舌《红色阵线报》评论道，“保证集体农庄合法性的唯一重要的事情是行动，是建立它们的革命行动，因此，任何针对它们设计的法律或政策都不能影响它们。”它避而不谈集体农庄的合法地位实际上只是暂时得到了承认而已。它宣称：“[该法令] 给予一九三六年七月十九日以来建立的集体农庄一种不可动摇的合法地位。……由于这项法令，因广大农业工人自发的冲动而出现的集体农庄如今变成一种合法的农业劳动形式。”³⁹然而，几个月后，在了一项共同行动计划中，全国劳工联合会和劳动者总工会认为有必要提出使集体农庄合法化的要求。⁴⁰这并没有使情况改变，因为，直到内战临近结束时，马德里的无政府工团主义报纸《全国劳工联合会》仍在坚决要求使集体农庄合法化。⁴¹实际上，继续掌管农业部直到内战结束的比森特·乌里韦，始终没有给予集体农庄永久性的合法地位。⁴²

尽管一九三七年六月颁布的这项法令为集体农庄的合法性所提供的保证仅限于该农业年度，但是，在那个重要的收获季节，它在农村营造了一种宽松的气氛，因此达到了它的目的。

然而，农作物刚刚收获完毕，人们立即又担忧起来。八月十一日，中央政府——它在五月进行了改组，全国劳工联合会没有加入这个政府——解散了无政府主义者控制的保卫阿拉贡地方委员会。该委员会成立于内战初期，目的是指导阿拉贡地区的反佛朗哥武装占领区的革命，这一武装主要由自由主义者组成。在共产党人于八月初通过短暂但紧锣密鼓的宣传为解散该委员会做好了准备之后，⁴³根据当时的国防部长因达莱西奥·普列托的命令，在内阁充分知情并且同意的情况下，恩里克·利斯特所指挥的第十一师开进阿拉贡地区并且解散了保卫阿拉贡委员会。⁴⁴为了不引起怀疑，第十一师受命在中部前线的布鲁内特战役之后前往阿拉贡地区“休整”，而中央政府秘密批准的解散保卫阿拉贡委员会的法令直到该委员会被解散之后才公布。⁴⁵“由于遭到人民的怨恨，我们一枪不发便解决了保卫阿拉贡委员会。”利斯特写道，“结果，第二天，当解散它的法令在《共和国官方公报》上颁布时，这个委员会已不复存在。”⁴⁶当时政府中的社会党温和派的喉舌《前进报》对这项法令发表评论说：“昨天发生在阿拉贡地区的

变化也许没有在国外引起特别的反应。没关系。它应当引起特别的反应，因为政府通过这次行动有力地证明了它的权威。”⁴⁷

在这项法令公布的同时，支持共产党的左翼共和派成员何塞·伊格纳西奥·曼特孔——他在内战结束之后加入共产党⁴⁸——被任命为阿拉贡地区首席行政长官。“从第一天起我们相互之间就充分理解，”利斯特写道，“我们与他全力合作，帮助他完成他那艰巨的任务。”⁴⁹在第十一师的武装力量支持下，曼特孔下令解散集体农庄并且逮捕全国劳工联合会的积极分子。⁵⁰据全国劳工联合会阿拉贡地方组织的一份报告说，从右派支持者那里没收的土地、农具和牲畜被归还原主或他们的家人；集体农庄新建的马厩和鸡舍被拆除，在一些村庄，甚至夺走了集体农庄播种用的种子，与此同时，六百多名全国劳工联合会成员被逮捕。⁵¹

革命初期——当时全国劳工联合会和伊比利亚无政府主义者联盟在阿拉贡地区拥有不容争辩的权力——加入集体农庄的佃农和小地主充分利用了这次镇压。他们瓜分了土地以及收获的庄稼和农具，甚至在突击卫队和共产党军队的帮助下，将根据其成员的意愿建立起来的集体农庄洗劫一空。形势变得如此严峻，以致共产党人后来承认他们采取了一项危险的政策，尽管避而不谈个人的责任。

为了扭转形势，共产党再次改变了它的政策，于是，一些被解散了的集体农庄得到恢复。“承认集体农庄的权利并且决定归还不公平地从它们那里拿走的东西，”担任土地改革协会秘书长的共产党员何塞·席尔瓦⁵²写道，“加上阿拉贡地区首席行政长官在这种方针指导下所进行的种种努力，情况恢复了正常。农民重新安居乐业，再次焕发了生产热情，他们为给放荒的土地播种付出了必要的辛勤劳动。”⁵³

经过阿拉贡地区的破坏集体农庄活动之后，在其他地方，面对以前的地主要求归还被没收的土地的尝试，共产党不得不转而支持集体农庄。⁵⁴发生这种转变不仅是因为它原来的政策对农村经济和前后方的士气造成了伤害，而且还有另外一个重要原因：尽管共产党需要反佛朗哥阵营中的中小佃户和地主的支持，它也不能允许他们变得过于强大，以免他们与城市里的中产阶级联合起来，在自由共和派和社会党温和派的领导下争取操控国家事务。为了使国内外政策符合苏联外交政策的需要，共产党人必须居

高临下。只有精心地使棋盘上的棋子相互制约，他们才能做到这一点，因为他们的影响力不仅取决于共产党本身固有的力量——尽管它现在非常强大，而且取决于阶级力量的微妙平衡，由于各阶级之间的利益冲突，它们不可能联合起来对付居中斡旋的人。因此，如果最初共产党人认为通过与中间阶层的民众结盟消灭极左派的力量至关重要，那么，对于共产党人来说，在随后的一个阶段，防止中间阶层的实力过分加强从而威胁共产党的优势地位同样至关重要。

但是，共产党人企图以一个阶层制约另一个阶层的努力长时间无法取得成效，除非他们可以控制前线和后方的武装力量，除非他们能够把独立的革命民兵武装并入由服从他们意愿的参谋军官和政治委员所指挥的正规军。从革命初期开始，他们就认识到这种必要性。

注释：

- 1 一九三六年十月八日《马德里官方公报》。
- 2 一九三六年十月十日《工人世界报》。
- 3 一公顷约合二点五英亩（约合十五市亩——译注）。
- 4 一九三七年三月二十日《红色阵线报》。
- 5 萨瓦尔萨发表在一九三七年五月二十六日《全国劳工联合会报》上的文章。
- 6 担任土地改革协会主任的共产党人恩里克·卡斯特罗证实莫赖塔是一名共产党员，在他手下工作（恩里克·卡斯特罗，《莫斯科培养出来的人》，第386页）。关于莫赖塔对共产党及其领导人幻想破灭（他对卡斯特罗说：“你们都是斯大林主义造就的人，都是被一个教条、一台可怕的机器、一种动物法则以及一种侵蚀了你们灵魂的仇恨所驱使的疯子。”）的一段富有启发性的描述，见卡斯特罗《莫斯科培养出来的人》，第499—504页。一九三七年春天，他被另一名共产党员何塞·席尔瓦取而代之。
- 7 一九四八年十月号《论坛》。
- 8 何塞·桑多瓦尔和曼努埃尔·阿斯卡拉特，《西班牙，1936—1939》，第89页。
- 9 一九三六年十月十二日《全国劳工联合会报》。
- 10 《为了土地革命》，第44页。
- 11 一九三七年七月二十四日《自由青年报》所报道的演说。另请参阅发表在一九三七年三月三十日《卡斯蒂利亚自由报》上的一篇文章和（发表在一九三七年五月二十九日《前进报》上的）全国农业工人联合会总书记里卡多·萨瓦尔萨写给农业部长的信，前者引用了全国劳工联合会利夫雷城省（原雷阿尔城省）委员会的一位成员的话，据他说，农业部派往该省的代表已经要求把那些不是法西斯分子的人的土地归还给他们；后者对土地改革协会的一名代表下令将巴达霍斯省加瓦尤埃拉村的一座大庄园物归原主表示不满。
- 12 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十四日《光明报》。另请参阅发表在拉尔戈·卡瓦列罗的舆论工具《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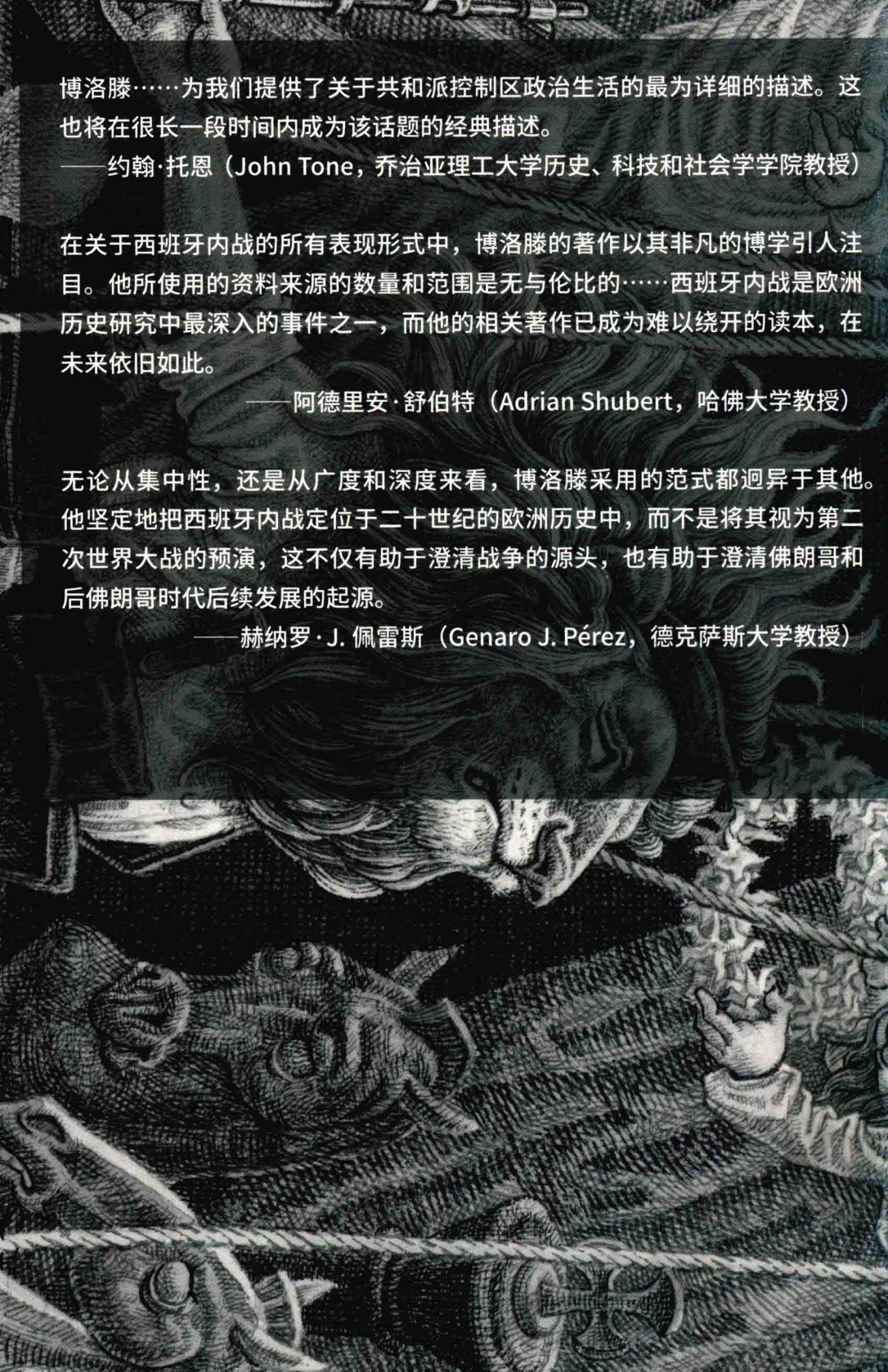
伦西亚通讯》上的文章《西班牙农业工人联合会会员的耻辱》。

- 13 关于社会党左派对共产党的政策产生敌意的种种迹象，见全国农业工人联合会各省的书记对社会党报纸《前进报》就共产党的农村政策所提出的问题的答复，载一九三七年六月十七日和二十日《前进报》以及一九三七年六月十四日和二十一日《全国劳工联合会报》。另请参阅一九三八年五月一日《集体所有制》（A.费尔南德斯·巴列斯特罗斯的文章）。
- 14 实例见农业部长比森特·乌里韦的演说，载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八日巴伦西亚《真理报》。
- 15 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十六日《光明报》。
- 16 卡斯特罗，《莫斯科培养出来的人》，第395和397页。卡斯特罗在扉页前面确定了该书的基调：“为了充分了解[共产党人]，你首先不能听信他们，以免受到他们的蛊惑。第二，你必须随时观察他们，直到你进入他们的灵魂深处。第三，你必须通过人而不是通过宣传材料和统计资料了解他们的社会主义。我从审视自己开始认识他们。因此，我相信这本书会有价值。”
- 17 同上，第407页。
- 18 卡里略在一九三七年一月统一社会主义青年联盟全国会议上的讲话（卡里略，《在通往胜利的道路上》，第41页）。
- 19 一九三七年七月三日《前进报》。
- 20 同上。另请参阅《为了土地革命》，第42—43页和全国农业工人联合会马德里省书记拉蒙·阿尔科斯·阿尔瑙的声明，载一九三七年六月十四日《全国劳工联合会报》。
- 21 《为了土地革命》，第42—43页。另请参阅一九三七年六月十七日《前进报》（赫苏斯·佩雷斯·萨拉斯对该报就共产党的农村政策所提出的问题的答复）；一九三七年九月十五日、一九三八年一月至二月和五月一日（A.费尔南德斯·巴列斯特罗斯的文章）《集体所有制》。
- 22 《前进报》对里卡多·萨瓦尔萨的采访，转载于一九三七年五月二十八日《工人团结报》。另请参阅萨瓦尔萨写给农业部长的信，载一九三七年五月二十九日《前进报》；何塞·埃斯帕尼亚分别发表在一九三七年六月五日《文化与行动报》和一九三七年六月三日《我们》上的文章。
- 23 一九三七年四月十日《卡斯蒂利亚自由报》。另请参阅萨瓦尔萨写给农业部长的信，载一九三七年五月二十九日《前进报》。
- 24 一九三七年四月十日《卡斯蒂利亚自由报》。另请参阅一九三七年三月三十一日《卡斯蒂利亚自由报》（伊萨维罗·罗梅罗的文章）；一九三七年三月二十六日和五月二十九日《全国劳工联合会报》；一九三七年三月二十日和四月六日《自由阵线报》；一九三七年七月二日《西班牙革命》。
- 25 《自由青年报》对全国劳工联合会卡斯蒂利亚地区农民协会总书记的采访，载一九三七年七月十日《自由青年报》。另请参阅一九三七年三月十九日《无政府主义报》（M.萨拉斯的文章）；一九三七年五月二十九日《全国劳工联合会报》；何塞·佩拉特斯，《西班牙革命中的全国劳工联合会》，第一卷，第320—323页。
- 26 胡安·戈麦斯·卡萨斯，《政府中的无政府主义者，1936—1939》，第160—161页。
- 27 何塞·加西亚·普拉达斯，《我们注定要失败！》，第157页。
- 28 一九七七年十一月十九日《胜利报》。
- 29 拉尔夫·贝茨一九四〇年写给我的信（现存胡佛研究所）。拉尔夫·贝茨的这一证言比较可信，因为，一九二三年他作为一名共产党的组织者被派往西班牙时，他是英国共产党党员。我们可以有把握地认为，在那个年代，几乎没有外国作家比他更了解西班牙和西班牙的革命状况。他在一九三九年与共产党决裂，当时我在墨西哥认识了他。他对西班牙革命基本情况的具有启发性的看法对我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不过令人遗憾的是，他打算创作的

关于西班牙内战的全景小说没有结果，我怀疑，这主要是因为他下不了决心把自己知道的一切说出来。他对拙著《精心的伪装》（1961）的看法是，不应当写这本书，因为它常常会使西班牙革命的支持者“幻想破灭”。关于作为作家和政治活动家的贝茨的情况，见凯瑟琳·贝尔·霍斯金斯《今天的斗争：西班牙内战期间的英国文学和政治》，第125—129页。在这本书的第124页，她写道：“不像当时的许多左派作家，贝茨是一位相对资深的共产党人，而且出身于工人阶级。他十六岁开始在工厂做工，整个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作为一名士兵服役。英国共产党成立不久之后他入了党，一九二三年作为一名共产党的组织者去了西班牙。”

- 30 阿尼瓦尔·庞塞的《当代西班牙研究》说有将近五十几个，见第75页；何塞·马里亚·卡波在《赤裸的西班牙》中列出的数字是三十五个，见第88页。另请参阅一九三六年四月七日和九日《光明报》。
- 31 卡耶塔诺·科尔多瓦·伊图尔乌鲁，《人民领导下的西班牙》，第154页。
- 32 一九三七年六月九日《共和国官方公报》。
- 33 一九三七年六月十一日《红色阵线报》。
- 34 实例见《自由青年报》对全国劳工联合会卡斯蒂利亚地区农民协会总书记的采访，载一九三七年七月十日《自由青年报》；一九三七年七月三十一日《自由青年报》对伊比利亚自由青年联盟马德里代表大会的报道；一九三七年三月三十日《卡斯蒂利亚自由报》（关于利夫雷城的文章）；一九三七年七月二十一日《社会熔炉报》；胡安·洛佩斯，《西班牙工会运动的发展》，载一九六四年十一至十二月号《伊比利亚公社》，被塞萨尔·M.洛伦索在《西班牙无政府主义者与权力，1868—1969》一书中引用，见第244页，注释11。
- 35 马里亚诺·卡多纳·罗塞利写给我的信（现存胡佛研究所）。
- 36 见一九三七年一月三十日颁布的法令（一九三七年二月二日《共和国官方公报》）所提供的该机构的人员组成。关于国家农业信贷机构，卡多纳·罗塞利在一九三七年三月二十五日《工人团结报》上发表过一篇内容丰富的长篇文章，他在这篇文章中坚决主张全国劳工联合会的集体农庄利用这个机构。
- 37 关于得到土地改革协会承认的集体农庄数量、没收土地的数量以及（除加泰罗尼亚地区之外）各省给予集体农庄的贷款数额的统计数字，见帕斯库亚尔·卡里翁《第二共和国的土地改革与农业的现实状况》，第135—137页。
- 38 着重体是我加的。
- 39 一九三七年六月十一日《红色阵线报》。
- 40 见《全国劳工联合会和劳动者总工会联盟》，第131—141页。
- 41 一九三八年十月三日和二十一日、十二月三日《全国劳工联合会》。
- 42 见国家农业信贷机构中的全国劳工联合会全国委员会代表马里亚诺·卡多纳·罗塞利一九五〇年四月九日写给我的信（现存胡佛研究所）。
- 43 实例见一九三七年八月四日《红色阵线报》，一九三七年八月五日巴伦西亚《真理报》，一九三七年八月五日《社会熔炉报》的评论；何塞·杜克，《内战初期阿拉贡地区的形势》，30—43页；何塞·佩拉特斯，《西班牙政治危机中的无政府主义者》，第291—294页。虽然本章已经使用了一些资料，本书第五十章（原书误为第四十九章——译注）仍将更详细地讨论解散保卫阿拉贡委员会和阿拉贡地区集体农庄的问题。
- 44 恩里克·利斯特，《我们的战争：对西班牙人民民族革命战争史的贡献，1936—1939》，第151—155页。
- 45 同上，第152页；另请参阅里卡多·桑斯《驰援马德里的部队：第二十六师杜鲁蒂纵队》，第154页。
- 46 利斯特，《我们的战争》，第155页。

- 47 一九三七年八月十二日《前进报》。
- 48 见一九四八年一月二十三日《人民西班牙》，这是西班牙共产党流亡期间的刊物；另请参阅佩拉特斯《西班牙政治危机中的无政府主义者》，第294页。
- 49 利斯特，《我们的战争》，第160页。
- 50 桑斯，《驰援马德里的部队》，第157页。
- 51 一九三七年十月二十三日《社会熔炉报》。其他自由主义方面的原始资料关于解散保卫阿拉贡委员会以及镇压集体农庄的记述可以在下列报刊著作中看到：一九三七年九月二十二日《自由行动报》；一九四八年一月十七日《无产阶级文化报》（米格尔·希门尼斯的文章）；一九三九年五月号《西班牙历史文献》（全国劳工联合会阿拉贡地方组织致中央政府的一份报告的摘要）；一九三七年十月一日和二十九日《新西班牙》；一九三七年八月二十七日《自由阵线报》；一九三七年九月四日《自由青年报》；一九三八年二月三日《西班牙劳工通讯》；一九三七年十月二十二日和一九三八年二月二十八日（纽约）《西班牙革命》；佩拉特斯，《西班牙政治危机中的无政府主义者》，第283—302页；阿拉尔多·普拉特斯，《阿拉贡地区的带头与落后》，第157—158页。
- 52 他于一九三七年春天接替拉斐尔·莫赖塔（见本章注释6）。
- 53 何塞·席尔瓦，《田间地头的人民革命》，第17—18页。与这个问题有关的更多情况，见本书第五十章。
- 54 实例见一九三八年一月二十七日《红色阵线报》。



博洛滕……为我们提供了关于共和派控制区政治生活的最为详细的描述。这也将很长时间内成为该话题的经典描述。

——约翰·托恩（John Tone，乔治亚理工大学历史、科技和社会学学院教授）

在关于西班牙内战的所有表现形式中，博洛滕的著作以其非凡的博学引人注目。他所使用的资料来源的数量和范围是无与伦比的……西班牙内战是欧洲历史研究中最深入的事件之一，而他的相关著作已成为难以绕开的读本，在未来依旧如此。

——阿德里安·舒伯特（Adrian Shubert，哈佛大学教授）

无论从集中性，还是从广度和深度来看，博洛滕采用的范式都迥异于其他。他坚定地把西班牙内战定位于二十世纪的欧洲历史中，而不是将其视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预演，这不仅有助于澄清战争的源头，也有助于澄清佛朗哥和后佛朗哥时代后续发展的起源。

——赫纳罗·J. 佩雷斯（Genaro J. Pérez，德克萨斯大学教授）